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古籍版本学

曹之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古籍版本学

曹之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09号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古籍版本学
©曹　之　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17.875印张 451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1—5050
ISBN 7-307-01262-6/G·182
定价：7.50元

内容提要

本书是国家教委统编文科教材之一。其特点是体系新、内容新、信息量大。

本书分概论、源流、鉴定三编。该书初步建立了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完整体系，全面论述了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基本理论。其中，古籍版本学史、写本源流、雕版起源、考订一书版本源流等内容尤富新意。全书45.1万字，插图34幅。

本书可供高等学校文科各专业作为教材使用，也是古籍整理、出版发行、图书馆学等专业人员以及文史爱好者的必读书。

自　序

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是一笔极可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向人们展示了中华民族极为灿烂的古代文化。版本学仅仅是它的一个侧面，尝鼎一脔，或可领略嘉肴之旨。

我于1985年承乏编写之役，该书系列国家教委“七五”教材编选计划。近几年来，已有数种古籍版本学专著问世，这些著作各有所长，受到人们的重视。除了利用时贤的研究成果之外，本书试图在以下七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建立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完整体系；

（二）完善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基本理论；

（三）研究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历史；

（四）重视写本在版本源流中的历史地位；

（五）重视雕版印刷起源在版本源流中的历史地位；

（六）鉴定古籍版本，既重形式，更重内容；

（七）把考订一书版本源流作为中国古籍版本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在写作过程中，我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把全书分为数十个专题，各个击破。在撰写各个专题的时候，既重文献资料，更重实物证据。例如我写“毛晋刻书”专题时，一方面查阅了大量有关毛本的书目、题跋等，单在《四库全书总目》里，我竟找到有关毛本的102条资料；另一方面，又认真研究了传世毛本《十七史》《津逮秘书》、《禅月集》、《中吴纪闻》、《神农本草经疏》等。然后对文献和实物进行综合分析，写出初稿。为了发

掘更多、更新的文献资料，我披阅了不少古代图书，饱尝了大海捞针的痛苦和欢乐；为了获得更多的实物证据，我曾多次外出访书，经眼古籍，日有所增。就是这样，一个专题接着一个专题，五易寒暑，六易其稿，终于杀青付梓。尽管如此，由于古籍版本情况复杂，加上本人学识卑陋，缺点甚至错误肯定不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

在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廖延唐、廖源兰、刘昭芸、徐孝宓、阳海清、崔建英、冀淑英、魏隐儒、王绍曾、郑如斯以及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彭斐章、谢灼华、查启森、乔好勤诸先生的帮助，武汉大学出版社赵捷同志也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著者　1990年国庆节于
珞珈山望湖楼

目　　录

第一编　中国古籍版本学概论

第二编 中国古籍版本源流

第三编　中国古籍版本鉴定

第一编　中国古籍版本学概论

第一章　古籍版本与古籍版本学

一、古籍及其数量

人们常常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等词语形容我国古籍数量之多。截止目前，我国现存古籍还没有较为精确的统计数字，这是因为：

（一）我国历史悠久，古籍数量实在太多，加上许多古籍正在清理之中，确实不易统计；

（二）古籍收藏单位太多，分布地区太广（包括台湾省在内），确实不便统计；

（三）建国以来，除了地方志、善本书等少数门类的古籍之外，尚未对所有传世古籍进行过认真的普查。

尽管如此，根据有关资料，我们还是可能对传世古籍数量作一个粗略的估计。

什么是“古籍”

在对传世古籍数量进行估计之前，首先必须弄清“古籍”二字的含义，否则，不明确“古籍”的范围，就无法进行估计。那么，到底什么是古籍呢？近年论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种说法：

（一）以装订形式作为标准，凡是线装书都叫古籍。这种说

法貌似有理，其实并不恰当，因为古籍除了线装之外，还可能是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等，把线装以外的其它形式排斥在外，显然不妥。另外，即使是线装书，也不一定都是古代制作的，例如鲁迅作品、毛泽东著作都出过线装本，当然不能把它们算作古籍。

（二）以著者时代作为标准，凡是古人所著之书都叫古籍。这种说法主张把新版平装本也包括进去，例如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都是古人所著，也属于“古籍”。这里，“古籍”的概念是广义的，不能算错。就学术价值而言，许多古籍的新版平装本往往比古代许多本子要好得多，是真正的善本书，因为许多平装本都是聘请有关专家综合各种本子校勘过的，比较接近原书的本来面目，确实值得重视。但是，很多图书馆出于保管和利用的特殊需要，往往采用“古籍”的狭义概念，即把古代抄写、印刷的图书才叫“古籍”。这样做也有道理：首先，就保管的角度而言，古代抄写、印刷的图书具有文物价值，宋元刻本甚至被当做无价之宝，而平装本物虽美而价也廉，就目前来说，还谈不上文物价值，二者应该区别对待。其次，就利用的角度而言，虽然现在出了不少古籍平装本，但是，绝大多数古籍还没有整理，还没有出过平装本，读者查找古代资料，主要依靠古代抄写、印刷的图书。而这些图书都具有文物价值，失而不可复得，在读者范围、借阅制度等方面与平装古籍也应有所区别。另外，就版本的角度而言，古代抄写、印刷的图书与古籍平装本也大不一样，需要将二者加以区分，进行专门的研究。基于上述原因，本书所采取的正是“古籍”的狭义概念。

（三）以语言表达形式为标准，凡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著作都叫古籍。这种说法有两个局限性：其一，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语之外，还有蒙语、藏语等，把古人用其它语种所写的书排斥于“古籍”之外，显然是错误的；其二，近代甚至现代，还有一些人用古代汉语著书立说，显然不能把他们的著

作当作“古籍”。

（四）以成书年代作为标准。其中，又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凡是1840年以前抄写、印刷的图书都叫“古籍”。这种说法把清代后期的大量图书排斥在外，显然不妥；二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凡是1919年以前抄写、出版的图书都叫“古籍”。这种说法把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和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划入“古籍”之中，也不妥当；三是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界，凡是1911年以前抄写、印刷的图书都叫“古籍”。这种说法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因为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成书年以1911年为界，既包括了1911年以前的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各种装订形式的图书，又排除了1911年以后的古籍新版平装本；既包括了清代后期的图书和用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古籍，又排除了近人用古代汉语写成的著作、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以及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然，这里所谓“成书年”是因时而异的。李一氓同志在《论古籍与古籍整理》中说：

> 汉人视秦、周著作作为古籍，他们对此作过很好的工作。魏人、晋人、隋人视汉、秦、周著作为古籍，他们对此亦做过很好的工作。唐人视隋、晋、魏、汉、秦、周著作为古籍，他们也做过很好的工作。以此类推，我们今天要视清、明、元、宋、唐、隋、晋、魏、汉、秦、周著作为古籍，加以整理是自明的道理。我们不是清人，不能把古籍限在明代以上。（《人民日报》1982年1月20日）

现在把时间下限定在1911年，再过几十年（甚至数百年）这个时间下限肯定要变化，至于变到哪一年，就不得而知了。

综上所述，本书所谓“古籍”的概念是狭义的，是指1911年以前抄写、出版的图书。但是需要指出：上述时间下限是粗线条的。出于保管和利用的需要，民国时期出版的线装图书（古人所著），通常仍然当作“古籍”看待。

古籍的数量

根据上述“古籍”的含义，我们可以对现存古籍的数量作出如下估计：

（一）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收录丛书2797部，子目7万种，去其重复，计有单种文献38891种；

（二）清代乾隆以前没有收入丛书的古籍单行本至少有1万种；

（三）清代乾隆以后没有收入丛书的古籍单行本，据孙殿起《贩书偶记》与《贩书偶记续编》著录，计有1.6万种；

（四）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共著录方志8200种；

（五）佛经单种文献4200种；

（六）道藏单种文献1500种；

（七）据全国59个图书馆联合编制的《中医图书联合书目》著录，中医单种文献约有7661种；

（八）碑帖、舆图不少于1万种；

（九）少数民族语文图书不少于1万种；

（十）通俗小说、戏剧唱本、弹词、宝卷、家谱等不少于2万种。

以上10个数字相加，共得126452种，去其重复（还有少数现代著作、平装图书等），总数当不少于10万种。这10万余种古籍，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做到古为今用，我们从版本学的角度对它们进行认真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二、版本与古籍版本学

什么是版本？什么是古籍版本学？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内容是什么？论者各执一词，迄无定论。

"版本"释名

《说文解字》释"版"："判也，从片，反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片也，旧作'判也'，浅人所改，今正。"）释"片"："判木也，从半木，凡片之属皆从片。"据此，"版"之本义是"片也"，"片"是"半木"之意。那么，"版"字为什么当"片"讲呢？因为"版"是"木"之解体，已非全"木"，"木"解体而为"片"，有建筑房屋、制作家具等功能，当然也可以作为制作简牍、雕刻文字之用。段玉裁说："凡施于宫室器用者，皆曰版。今字作板。"① 这就是说，"版"、"板"二字为古今字。《说文解字》释"牍"："书版也。"《周礼·秋官·蜡蔟氏》："以方书十日之号。"郑注云："方，版也。"可见，"版"、"牍"、"方"三字互训。"版"字作为图籍解，始于先秦。例如《论语·乡党》云："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魏何晏注云："负版，持邦国图籍者。"

《说文解字》释"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说明"本"的本意是树根，引申而为根基、原始、本原等。"本"作为书籍讲，始见于刘向《别录》：

> 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②

---

① 《说文解字注》卷七释"版"。

② （梁）萧统：《文选·魏都赋李善注》。

为什么称书为“本”呢？清叶德辉《书林清话·书之称本》云：

> 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吾谓书本由卷子折叠而成，卷不如折本翻阅之便，其制当兴于秦汉间……《太平御览》学部正谬误类引《刘向别传》曰：“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折，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夫不曰“持卷”，而曰“持本”，则为折本可知。

这就是说，书之称“本”，源于折本的“因根而计数”。这种解释有三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叶氏所谓“折本”，是指那种行款皆有定制的册页装。古籍装订史告诉我们：直到唐代，卷轴装仍然是一种主要的装订形式。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①邺侯李泌的三万卷藏书都是卷轴装，唐代卷轴之盛，于此可见。唐代以前，虽然册页装已经出现，但是并不多见。汉代刘向所整理的国家藏书，不可能是册页装。第二，“书根”是指册页装书籍的下部，这个名称是后代才有的，刘向所在的汉代还没有“书根”这个词。既然没有，何能“因根而计数”？第三，“本”和“书”的区别何在？叶氏也没有讲清，其实，刘向所谓“本”，并非“书”之同义语。“书”是指中书、太史书、臣向书、臣富参书等据以校勘的中外藏书，而“本”专指校勘之后尚未抄写的定本。这和现在的情况有些相似，付印稿一般不能称为书，只能称为稿本。《余嘉锡论学杂著·书册制度考》曾对“本”字做过很好的解释：

---

① 《全唐诗》卷三四三。

寻《风俗通》之意，“一人持本”者，持竹简所书改易刊定之本；“一人读书”者，读传写上素之书也。以油素之书写自竹简，则竹简之书为原本，故呼曰“本”。其后简策之制既废，写书者借人之书传录，则呼所借者为“本”。《后汉书·延笃传》注引《先贤行状》曰：“延笃欲写《左氏传》，无纸，乃借本讽之。”是其事也。凡书无不可传写者，因有“书本”之名矣。

这样解释，符合“本”的原意，因为无论校勘之后尚未抄写的定本也好，或者据以传录的借本也罢，都有原始、根据的意思。只是到了后来，因为“凡书无不可传写”，“书”、“本”二字才逐渐通用，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了。例如《梁书·任昉传》：“昉虽家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这里“本”就是“书”。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列举了江南本、河北本、俗本等，其中“本”也是“书”。

“版本”二字连用始于何时？有三说：（一）始于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据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石林燕语》成书于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叶梦得《石林燕语》自序云：

建炎二年，避乱缙云而归，兵火荡析之余，井闾湮废，前日之客，死亡转徙略相半，而余亦老矣，涉罹变故，志意销耗，平日所见闻，日以废忘，因令栋哀集为十卷，以《石林燕语》名之。

（二）始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根据是该年真宗"幸"国子监，祭酒邢昺有"版本大备"之语（详第二编第四章第一节）。（三）始于宋真宗咸平（998～1003）初年，据《宋史·崔颐正传》：

> 咸平初，又有学究刘可名言诸经版本多舛误，真宗命择官详正，因访达经义者，（李）至方参知政事，以颐正对。

比较而言，三说以宋真宗咸平初年为早。当然，宋代"版本"二字见诸文献记载者还有多处，例如：

> 《韩文考异》大字以国子监版本为主，而注其同异，辨其是非，断其取舍。
>
> ——朱熹《晦庵集·与伯谟书》
>
> 尹少稷强记，日能诵麻沙版本书厚一寸。
>
>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

不过，宋代所谓"版本"单指刻本，并不包括写本在内。元明以后，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和图书制作方式日复杂化，"版本"二字的含义逐渐扩大，成为一书各种本子的总称。也就是说，除了刻本之外，还包括写本、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石印本，等等。

古籍版本学及其研究内容

早在先秦，版本随着图书的产生而产生；秦汉以后，版本又伴随着图书的发展而发展。历史把图书、版本、读者三者紧紧地拧在一起，不可分离。版本是读者不可一日或缺的亲密伴侣，许多人对它进行过深入的研究，遂成专门之学。那么，什么是古籍

版本学呢？古籍版本学是研究古籍版本源流以及古籍版本鉴定规律的一门学科。版本源流有广狭二义：从广义上说，是指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从狭义上说，是指每种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写本、拓本、刻本、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等一切形式的图书版本。其中，写本和刻本是其重点研究对象，因为无论从图书版本的发展历史来看，还是从图书版本的流传情况来看，写本和刻本都是我国古籍的主要组成部分。针对上述研究对象，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内容是：

第一，古籍版本学的基本理论，其中包括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内容，古籍版本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研究古籍版本学的意义和方法等。

第二，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历史，其中包括古籍版本学的发展阶段，各阶段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人物等。

第三，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其中包括写本源流、刻本源流等。

第四，单种（含丛书）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其中包括版本数量、版本系统、版本优劣等。

第五，古籍版本鉴定的规律，其中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

以上五个方面的内容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古籍版本学的基本理论关系到古籍版本学的体系建设，是古籍版本学的总纲，纲举目张。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古籍版本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为制造的一门学科。它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古人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今天的古籍版本学研究正是古人版本学研究的继续。研究古籍版本学史是为了借鉴古人的研究成果，把当代的研究工作推向前进。综观版本学史，可知影响版本学发展的因素有四个：一是社会的安定情况。社会安定与否是包括古籍版本学在内的所有学科得以发展的决定因素。二是图书版本的数量。图书版本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

对象，是古籍版本学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三是目录学和校勘学的发展情况。古籍版本学同目录学、校勘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四是整个学术发展的情况。学术繁荣需要版本学的帮助；版本学繁荣也需要学术研究的推动。以上四个因素互相联系，缺一不可。鉴于上述因素的影响，我们拟把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一）从先秦到两汉为版本学的产生时期；（二）从魏晋到宋元为版本学的发展时期；（三）明清为版本学的繁荣时期。有的同志认为，古籍版本学始于清代，清代以前还没有这门学问。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值得研究。古籍版本学研究同任何事物一样，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清代古籍版本学成就之“大”、水平之“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没有前人的“基石”，就不可能有清人的“高楼大厦”。正如人的一生要经历童年、青年、成年的成长过程一样，尽管童年和青年时期不大成熟，甚至幼稚可笑，但同样要一视同“人”。童年和青年是长大成人的必由之路。没有童年和青年，也就没有成年。同理，古籍版本学也要经历从“童年”、“青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如果说，清代版本学处于“成年”时期，那么清代以前的版本学就是“童年”、“青年”时期，否定这一点，就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研究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研究历代抄书或刻书情况，是为了从整体上把握历代图书版本的制作情况，为鉴定古籍版本和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作好准备。它像山水名胜的导游图，先给游客描绘一条清晰的旅游路线，告诉游客各个旅游点的方位、内容和特点。游客沿着指定的路线，可以准确到达各个旅游点。如果没有这张导游图，游客就可能多走弯路，甚至迷失方向，堕入五里雾中。例如当你研究了古代泥活字的发展源流之后，知道宋代毕昇泥活字没有传本，流传至今者只有清代翟金生、李瑶泥活字数种。这样，在你鉴定版本的时候，就不会轻易把其它活字本说成是毕昇泥活字本。有的同志认

为，搞古籍版本鉴定没有必要过多地研究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我们认为，搞古籍版本鉴定必须研究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不了解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就不能搞好古籍版本鉴定。这就好像鉴定一件新的产品，如果不了解产品制作的工艺流程，那就无从鉴定。只有科学的工艺流程，才可能生产出第一流的产品，非科学的工艺流程，只能生产伪劣产品。从工艺流程入手鉴定产品，才是抓住了根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古籍版本同新产品一样，它是特定制作流程的产物，查一查它的制作流程，就大体知道了它的优劣。既然如此，一个从事古籍版本鉴定的人，怎么能置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于不顾呢？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与单种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研究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可以促进单种图书版本演变源流的研究，某朝某代抄书、刻书情况如何，事先心中有数，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单种图书版本演变源流研究中的盲目性。另一方面，研究单种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反过来也能促进整个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的研究。对于单种图书的版本源流知之越多，就越能把握整个古籍的制作方式演变源流，因为整个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是单种图书版本演变源流的总和。例如铜活字印刷的起源问题，是大家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从道理上分析之外，总离不开具体图书的版本。离开了图书的具体版本，用猜想代替现实，总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事实表明：提出"五代说"、"宋代说"、"元代说"的人至今拿不出五代、宋、元诸朝用铜活字印书的例子，而明代铜活字本则证据确凿、历历可数，由此我们似可得出结论：铜活字印刷始于明代。当然，由于古籍版本复杂多变，真正弄清每种古籍版本的演变源流并非易事。研究单种古籍版本演变源流与古籍版本鉴定的具体方法是有区别的，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寻求善本，以便古为今用。鉴定古籍版本不外内容、形式两途：在内容方面，包括审查卷数、编例、学术源流、名物制度、内容

时限、篇目、文字等；在形式方面，包括审查书名页、序跋、卷端、避讳、牌记、行款、字体、刻工、装订、纸张、藏书印、室名等。有人说，鉴定古籍版本，只要抓住版式、字体、纸张等形式特征就行了，不必深究内容。我们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表现为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缺一不可。譬如了解一个人，不仅要知道他的外貌衣着、高矮胖瘦，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他的脾气性格、兴趣爱好等内在特征。如果单纯"以衣貌取人"，就会犯极大的错误。《纂图互注扬子法言》通行本为刻印俱佳的明顾氏世德堂本，宋代建本传世既久，漫漶模糊，不为世重。当年傅增湘曾取二本对勘一过，订正世德堂本200余字，增补脱漏多处。为此傅增湘感慨系之，他说：

> 夫世德堂本开板宏朗，精美悦目，号为善本；非兼金不易致，岂意其夺讹盈目，转不如此陋刊坊本之为愈乎！以此知读者贵得古本，要必悉心玩诵，乃知其胜。惜乎皮相者多，而真赏者日少，为足叹也！①

这里所谓"皮相"，即通常所谓"观风望气"。"皮相"仅能知其外表，"真赏"才能知其里层。

三、古籍版本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古籍版本学与目录学、校勘学是互为依存、相得益彰的关系。

从刘向谈起

刘向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目录学家之一，对于这一点，人们毫无争议。那么，刘向是不是校勘学家和版本学家呢？也应该是当

① 《藏园群书题记·宋本纂图互注扬子法言跋》。

之无愧的。他在整理图书的过程中，网罗众本，比较同异，一篇篇叙录相当于今日的校勘记和版本考证论文。有人说：今天目录学史把刘向说成是“目录学家”，明天校勘学史把刘向说成是“校勘学家”，后天版本学史又把刘向说成是“版本学家”，似乎在打一场争夺刘向的“战争”，到底刘向属于哪一家？叫人捉摸不定。我们认为，这种说法缺乏分析。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例如《山海经》是一部古典名著，我们分别从医药、矿产、地理、神话等不同侧面去研究它，完全可以，因为《山海经》本身的内容确实绚丽多采，应当允许人们进行多方位的研究。又如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他在政治、诗词、书画、养生等方面都颇有建树，我们也不妨从以上几个方面去研究他，说他是一位政治家、诗人、书画家和养生学家。同理，刘向作为学术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他集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于一身，我们从不同方面去研究他，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刘向为什么能集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于一身？除了刘向本人的主观因素之外，也正反映了三门学科的亲密关系，说明三门学科“本是同根生”，是“三胞胎”。著名学者余嘉锡在《藏园群书题记·序》中指出：

> 昔者刘向奉诏校书，所作书录，先言篇目之次第，次言以中书、外书合若干本相雠校，本书多脱误，以某为某，然后叙作者之行事及其著者之旨意。向时未有雕版，所谓中书、外书，犹宋以后之阁本及民间刻本耳。由是言之，则目录、校雠、版本三者，一家之学也。

正因为三者是“一家之学”，所以刘向才能集三者于一身。不惟刘向，后来的晁公武、尤袤、陈振孙、钱曾、纪昀、黄丕烈、顾广圻，直到现代的张元济、傅增湘、王重民等，无一不是集目录学、校勘学和版本学于一身。就拿傅增湘来说，他是一位目录学

家，他对历代图书了如指掌，《藏园群书经眼录》是他的代表作。他也是一位校勘学家，他在《藏园群书题记·校本文苑英华跋》中说：

> 余自辛、壬沧海之交，幸挹簪组，即嗜丹铅，二十余年，雪案萤窗，无时或间，手校之书，为部以千计，为卷以万计。

同时，他还是一位版本学家，《藏园群书题记》所收580篇古籍题跋，详考各书版本，令人心悦诚服。前人的经验告诉我们：治目录者，离不开校勘和版本；治校勘者，离不开目录和版本；治版本者，离不开目录和校勘。单打一，就搞不成学问。

下面详细谈谈古籍版本学与目录学、校勘学的关系。

古籍版本学与目录学的关系

首先，古籍版本学离不开目录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考证一书的版本源流离不开目录学（详第三编第六章第二节）。（二）鉴定古籍版本离不开目录学。鉴定古籍版本固然要以图书本身的种种特征作为依据，但是古籍书目这个辅助工具也是必不可少的（详第三编第五章第二节）。（三）古籍版本鉴定成果的揭示离不开目录学。鉴定成果出来之后，必须运用目录加以宣传，这样的目录通常叫做版本目录。有些版本目录著录过于简单，仅记宋本、明本而已，余嘉锡在《藏园群书题记·序》中说：

> 余谓欲著某书之为何本，不当仅言宋刊本、明刊本已也，刻书之时有不同、地有不同、人有不同，则其书必不尽同，故时当记其纪元干支，地当记其州府坊肆，人当记其姓名别号。又不第此也，更当记其卷帙之分合、篇章之完阙、

文字之同异，而后某书之为某书与否，庶乎其有可考也。

由此看来，编纂一部高质量的版本目录，并非易事。

同样，目录学也离不开古籍版本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书目著录离不开版本学。一般书目著录包括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等项内容，版本项与版本学的关系不言而喻。此外，书名、卷数、著者等项内容也与版本学有关。例如同书异名就有个版本问题，知道了不同版本的同书异名，在著录书名的时候，就不至于张冠李戴。（二）目录学的任务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指导读书门径。要完成这个任务，也离不开版本学。大家知道，古籍同书异本大量存在，作为一个指导读书门径的推荐书目，单单开列书名、著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指出何为善本。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说：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书目答问》在著录各书版本时，采用如下标准：

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出处同上）

这个标准既注意了内容的完整性，又注意到版本的实用性，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鲁迅先生指出：

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①

① 《而已集·读书杂谈》。

古籍版本学与校勘学的关系

首先，古籍版本学离不开校勘学。要从内容上鉴定古籍版本，离开校勘，不克成功。例如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汉书》，每页书口均记明正统刊刻年代和书工姓名。《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定为"宋刻明正统修本"，王重民先生利用校勘的方法证明该书当是明正统间翻刻宋景祐本，他说：

> 持校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景祐本《昭帝本纪》，有改正原书误字处，有翻刻手民误刻处，然其行款一遵原式，无或稍爽，实为明代中叶翻宋本之郅佳者。《昭纪》页一上师古注："伃，美称也。"景祐原本"伱"作"貌"。一下如淳注："谓之液者，言天地和液之气所为也"，原本脱"所"字。二上应劭注"钩盾宦者近署"，原本"宦"作"官"。四上苏林注："栘，音移"，原本"移"误作"栘"；又如淳注："栘，《尔雅》：'唐棣栘也'"，原本上"栘"字误作"移"。八上如淳注："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原本脱"也"字。以上六则，正统本皆较原本为优，疑为翻刻时所校改。惟页五上应劭注："三年中凤凰北下东海海西乐乡，""北"原作"比"。七下应劭注："后丞相御史复问有所请"，"问"原作"间"。并是翻刻时手民之误，原本是也。①

这是利用校勘鉴定版本的一个例子。

同样，校勘学也离不开古籍版本学。这主要表现在选择底本方面。 本书的版本源流犹如一团乱麻，经过一番耙梳整理，谁是源，谁是流，孰善孰恶，一清二楚。校勘时，以善本作为底

---

① 《中国善本书提要》第78页。

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

这里，洪氏把清代版本学家分为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五类，也可以说这是清人研究版本学的五个目的。我们认为，研究古籍版本学固然有利于考订、校雠、收藏和赏鉴，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至于掠贩一途，以古籍善本牟取暴利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对于今天来说，研究古籍版本学的意义何在？

弘扬民族文化的需要

古籍版本学研究古籍的产生和发展，这些内容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字记载的文明古国，文字载体经历了竹木、缣帛、纸张等演变过程，图书制作方式也经历了手写、印刷等过程。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于整个人类所贡献的重大发明之一，(美)卡特等一些外国学者对此深有研究，并出版了一些专著。作为生长在印刷术故乡的华夏子孙，更有必要弄清雕版印刷术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对于这项重大发明的解释权应当属于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图书制作（包括抄书、刻书）确实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事业。就时间而言，尽管频频改朝换代，但是抄书、刻书却像接力赛跑一样，一代一代向远方延续，大量的藏书目录、史志目录正是历代人民辛勤劳动的记

录。就地区而言，如果说唐代雕版印刷还是“星星之火”，那么，到了宋代，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统则已鼎足而立，到了明代，已形成“燎原”之势。除了边远地区之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有本地的刻本（或写本）流传至今，不少方志的“艺文”一目，连篇累牍，反映了一方著书、刻书之盛。就技术而言，从写本到刻本、从刻本到活字、从墨板到套印、从单一字书到上图下文、从黑白版画到饾版拱花……一步一个脚印，一版一个变化，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就人才而论，毕昇、陈起、王祯、毛晋、金简等出版家早已家喻户晓。成千上万的写工篝灯呵冻、露抄雪纂，蝇头小字记载了他们生活的辛酸；成千上万的刻工握刀向木，一笔一画，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至今难以考出他们的真实姓名。以上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一份难得的教材。

读书治学的需要

古籍版本学研究版本鉴定，而版本鉴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读书治学。常常听到一些人说，版本学“与己无关”。常常看到一些出版社不愿出版版本学专著，理由是“读者面太窄”。其实，版本学论著的读者面不是太窄，而是太宽，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版本学与每一个有文化的人都有关系，这种关系还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密切相关。只有文盲才不需要版本学。不管你是否愿意，版本学总是与你作伴，是你最亲密的朋友，因为哪里有书，哪里就有版本，没有版本的图书是不存在的。在你读书的时候，如果不讲究版本，就可能闹出笑话，唐代赵璘讲过一个故事：

> 京兆庞严及第后，从事寿春，有江淮举人姓严，是《登科记》误本倒书庞严姓名，遂赁舟丐食就谒。时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问姓氏，便诣门投刺，称从侄。庞之族人甚

少，览刺极喜，延纳殷勤，便留款曲，兼命对举匕箸。久之，语及族人，都非庞氏之事，庞方讶之，因问至竟郎君姓名，曰："某姓严。"庞抚掌大笑曰："君误矣，余自姓庞，予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谢叔父，从容而退。①

举人严氏因为读了误本《登科记》，"丐食投亲"，最后闹得不亦乐乎。可见，读书不能不讲版本。当然，对于高层次的治学而言，研究版本就更加重要了。首先，研究古籍版本学有利于我们弄清版本源流（详第二编和第三编第六章）。其次，研究古籍版本学有利于我们辨真伪、别善恶。古籍版本数量众多，良莠不齐，或卷帙错乱、残缺不全；或挖改描补、以假乱真；或错误百出、豕亥相望。如果懂得古籍版本学，便可明察秋毫、分清善恶，否则就会黑白颠倒、贻误后人。著名科学家竺可祯在阅读古典文献的时候，十分注意版本考证。周培源指出：

（竺可祯）把自然科学引入版本校勘学的领域。例如，他考证说，王之涣《凉州词》："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很合乎凉州以西玉门关一带春天情况的。玉门关是古代通往西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唐代开元时代，写边塞诗的诗人，对于安西玉门关一带春天几乎每天日中都要刮起黄沙、直冲云霄的情况是熟悉的。但后来不知在何时，王之涣《凉州词》第一句便被改成"黄河远上白云间"。到如今，书店流行的唐诗选本，统沿用改过的本子。实际上，黄河和凉州及玉门关谈不上有什么关系。竺可祯同志这番考证，比起一般的考证更进一步，更带有科学性，所以更有说服力。②

这也说明竺老治学是很严谨的。

① 《因话录》卷四。
② 《自学成才要有文史知识》，载《文史知识》1982年5期。

发展现代出版事业的需要

历代刻书情况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人把刻书当作化身千亿、功德无量的事业，有许多经验值得今天借鉴。例如古代刻书是多渠道的，大而言之，可分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统，三大系统各有利弊，互相补充。现在的出版工作亦可扩大出版渠道，鼓励自费出版好书。自费出书和古代的家刻有些相似，你写了一本好书，只要有钱，就可以付梓刊行，这是缓解"出书难"的一个方法。又如图书发行问题，古代基本是出版发行一体化，出版家既出书又卖书，信息灵通，市场行情了如指掌。现在，图书发行已经冲破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单一发行体系，初步建立了图书发行网络，这也许就是从古人那里学来的。总而言之，在出版发行方面，能够"古为今用"者还有很多，今后应当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发掘文物、保护文物的需要

古籍是历史的产物，其数量不会与日俱增，只会越来越少。时代久远的古籍，例如宋元刻本，不用说都是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就是明刻本以及清代乾隆以前的刻本，也都成为古籍善本了。过去，人们一提起"文物"，就想到古墓出土的钟鼎彝器，似乎还没有真正把古籍包括在内。其实，古籍也是货真价实的历史文物。就文物价值而言，庋藏古籍的图书馆和庋藏钟鼎彝器的博物馆相比，也毫不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古籍版本学家也是考古学家，研究古籍版本就是考古，他们所考之"古"不是钟鼎彝器，而是古代图书。一部古色古香、装帧典雅的古籍经过他们考证之后，是宋本、是元本，一清二楚，这还不是考古吗？现在一些大型图书馆不少古籍尚在书库沉睡，甚或连窗委栋、尘封蠹蛀，其中不乏善本。我们呼吁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抢救文物、保护文物，尽快把积压的古籍整理出来。当然，还有许多图

书馆虽然没有积压古籍，馆藏古籍均已编目上架，但是，对所有古籍的版本鉴定是否都很准确呢？也不见得，一些珍本往往隐藏其中，也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复查。

图书馆工作的需要

图书馆工作包括采购、流通、编目等内容，搞采购的如果不懂版本，购进误本，甚或造成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据悉，某大学藏有一部号称“宋版”的《史记集解正义》，该书目录后有“淳化壬辰临安陈氏万卷堂刊行”牌记，书根有藏书家手书“宋刻本《史记》”、“高邮王氏藏书”等字样，高邮王氏即指清代著名训诂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既是名家藏本，就更令人坚信不移。于是某学院图书馆便当作宋刻本以巨资购藏。后经专家鉴定，此本实非宋本，而是明嘉靖四年（1525年）金台汪谅翻刻南宋绍兴本，因为“淳化”为北宋太宗年号，当时杭州称“余杭郡”，不称“临安”，“临安”是南渡以后才有的名字。另外，当时杭州也没有“陈氏万卷堂”书铺。牌记字体也与正文迥异，牌记所在之页的版框也较正文略小，鱼尾也与正文版心不同。拿来明嘉靖四年（1525年）金台汪谅刻本核对，版式行款均同，书贾挖去汪谅刻书牌记、卷端柯维熊校书题名以及柯氏跋文，伪刻“淳化壬辰临安陈氏万卷堂刊行”牌记，冒充宋刻。搞流通的不懂版本就不能真正搞好读者服务工作。尽管每天到图书馆查阅古籍的读者多少不等，但就目的而言，可以把他们分为查找资料和高层次研究两大类型；就阅读能力而言，把他们分为粗通古文和精通古文两大类型。对于精通古文的高层次读者，可出示各种没有标点、没有注解（或注解简单）的线装本；对于粗通古文的查找资料者，可出示各种带有标点、注解详明的平装本。这样做，既有利于延长古籍的寿命，也能使读者如愿以偿。如果不了解线装本和平装本的区别，就不可能因人而异、区别对待。当然，光知道线装本和平装本的区别，还远远不够，要真正做好高水平的

读者服务工作，必须熟悉线装书的各种版本。搞编目的不懂版本，目录的版本项就写不出来。因为古籍著录决不是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学术性很强的一项工作。每种古籍，都要经过自己亲手鉴定以后，才能正确地写出版本项。过去，在古籍编目中闹了不少笑话，如有的人不知著名刻书家毛晋，把“毛刻本”当作“毛毛草草的刻本”；有的人不知古代刻书圣地福建麻沙镇，把“麻沙本”当作“麻麻（马）虎虎的刻本”；有的人不知“聚珍版”就是木活字本，把“聚珍版”当作“非常珍贵的本子”；有的人不知刻本、活字本的区别，把明代华坚铜活字本《蔡中郎集》著录为“明正德十年（1515年）锡山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刻本”，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人如果不认真学习，就不能胜任古籍编目工作。

目前，古籍版本学还是一个冷门，还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学科本身的研究有待深化之外，也与宣传不力有关。我们希望并且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古籍版本学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把古籍版本学的研究推向前进。

五、古籍版本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古籍版本学有认识问题，也有方法问题，其中，认识问题是首要的，认识问题解决了，方法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破除“神秘”感

过去，人们对古籍版本学存在一种“神秘”感，认为那是一门“玄而又玄”的学问，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个人如果不在幽雅深邃的书库中蹲上几十年，简直没有资格谈论版本。这样，古籍版本学就把自己长期限制在一个极为狭小的天地里，作茧自缚，造成今日不能自立于学术之林、后继乏人的被动局面。今后，要繁荣古籍版本学研究，必须首先解决这些认识问题。当

然，我们并不完全否认古籍版本学研究的难度，由于古籍收藏单位、知识面等限制，对于初出茅庐的人来说，打一场"短平快"，速战速决，在短期内登堂入室，实属不易。但是，经过努力，在不太长的时期内，粗知版本，做到"入门"也并不难。为什么这样说呢？（一）版本源流是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内容之一，只要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大量翻阅史料，善于综合分析，就可以顺藤摸瓜，逆流而上，追本溯源。那些对古籍版本学抱有"神秘"感的人往往只强调版本鉴定，而忽略了版本源流的研究。（二）版本鉴定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另一个内容。版本鉴定无非两种方法：一是形式，二是内容。初学的人因为接触古书不多，从形式上鉴别版本，确有一定困难，但从内容上鉴定版本，完全可以办到。只要能读懂古书，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和校勘常识就行。时间长了，见识多了，把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也并不难。那些对古籍版本学抱有"神秘"感的人往往只强调从形式上鉴定版本，而忽略了内容的鉴定。

那么，研究古籍版本学有什么方法呢？最常见的方法有文献考证法、比较研究法、实验研究法、计量研究法等。

文献考证法

所谓"文献考证法"就是把古籍版本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古籍是历史的产物，其内容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要把古籍版本放到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研究明代藩府刻本，光列出藩刻书目远远不够，关键在于弄清藩王为什么能够刻书？为什么刻本质量比较好？有什么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就需要查阅大量历史文献，认真考证一番。

比较研究法

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通过比较版本异同，鉴定版本。这

里，“比较”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同书前后不同卷页互相比较，看版框大小、行款字体、学术风格等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要找出原因。（二）同书异本互相比较。同书异本在内容和形式上往往有很大差别，通过比较，就可以辨别是非。有时候，一个本子众口异词，争论不休，“山穷水尽疑无路”。然而，把同书异本拿来一比，就真相大白，“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三）同古籍书影进行比较（详第三编第五章第四节）。

实验研究法

所谓“实验研究法”，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例如物理化学实验），对古籍版本进行鉴定。显微分析就是其中最简单的一种，著名造纸技术史专家潘吉星曾经详细介绍过这种方法：

> 用一个40倍的放大镜，在纸张最差处观察。麻纸在纸面上有麻绳头；皮纸上有小皮片，这是由于造纸时韧皮没有打碎的缘故；竹纸在纸面上有筋头；再生纸的纸面上总有没完全打碎的原纸；如果是混合纸，会在纸面上发现两种或多种原料的痕迹。鉴定纸的原料有助于了解纸的时代和产区。麻纸在唐代以后很少，所以，发现是麻纸，就有可能是唐代以前的纸张。皮纸不早于南北朝。竹纸起于北宋。机制纸不能早于清末。另外，根据纸张上的帘纹，也能初步断定纸张形成的时间和地区。一般说，帘子是用竹片做的。但北方得到竹子很困难，常用一种萱草的茎杆制做帘子，帘纹较粗。因此，帘纹较粗的纸可能是北方生产的纸，帘纹较细的纸可能是南方生产的纸。早期的纸帘纹较粗，晚期的纸帘纹较细。①

计量研究法

所谓“计量研究法”，就是通过计量分析研究版本。任何一

① 《中国造纸技术史》，载《北图通讯》1986年4期。

种物质形态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数量的多寡，可以反映物质形态在某个特定阶段的某些特征。例如古籍行款有无规律可循？钱亚新先生对清江标《宋元本行格表》进行了如下计量分析：

行数	经	史	子	集	合计	百分比
四	3				3	0.27
五	4	1	1		6	0.4
六	4	1			5	0.5
七	12	4	2	6	24	2.14
八	38	17	16	12	83	7.2
九	20	38	27	41	126	11
十	82	82	82	113	359	31
十一	29	33	59	48	169	14.6
十二	45	15	50	46	156	13.55
十三	33	19	29	25	106	9.1
十四	13	30	22	8	73	6.2
十五	4	6	11	9	30	2.6
十六	3	2	1	4	10	0.9
十七				1	1	0.09
十八		1			1	0.09
十九				1	1	0.09
二十	3				3	0.27
合计	293	249	300	314	1156	
百分比	25.3	21.6	26	27.1		100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八行本占著录总数的7.2%，九行本占11%，十行本占31%，十一行本占14.6%，十二行本占13.55%，十三行本占9.1%，十四行本占6.2%，其它各行本的总和占7.35%。为什么十行本那么多呢？第一，半页十行，字形大小适中，便于阅读。第二，宋元刻本“要计算每版上的字数，为了实用，当然

以十行最易于达到计算的目的”。①

以上各法常常兼用，其中文献考证法用得最多，也是基本的方法。

最基本的训练

为了胜任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工作，研究人员应着重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训练：

第一，必须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古代天文、历法、音乐、地理、职官、礼俗、宗法等都与今日不同，甚或大相径庭。今日学科如林，学者专攻其一，而古人治学，就没有那么多学科可供选择，往往山海包容，以博取胜。从汉代的郑玄到清代的乾嘉学派，无一不是博大精深。作为反映他们学术成果的古籍，往往兼收并蓄、搜罗无遗，从而内容就显得斑驳陆离，不一而足。从事古籍版本学研究的人，如果不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就难以开展工作。宋人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指出：

> 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曰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

要弄明“书之事物”，非懂文史不可，多多益善。

第二，必须具备目录学和校勘学知识。前面已经说过，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是三门互为依存、相得益彰的学科，因此，治版本的人必须兼治目录、校勘二学。在目录学方面，要把古典目录学作为重点，熟悉历代公私藏书目录和史志目录的收书范围和分类情况，一旦需要查找某书，如探囊取物，不假思索，就能信手拈来。例如要找宋代某书，很快就能想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等。在校勘学方面，要懂得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基本

① 钱亚新：《江标与〈宋元本行格表〉》，载《文献》1986年4期。但该文所附原表计算有误，笔者已作更正。

校书方法，善于比较同书异本的内容差别。如果条件许可，最好自己能够亲自点校一书，这对自己提高最大。

第三，必须熟练掌握各类文史工具书的使用方法。研究古籍版本学需要广博的文史知识，但是人们的记忆能力毕竟有限，人的大脑不可能像计算机那样贮存大量信息。这就需要工具书作为得力助手。治版本的人，必须熟练掌握各类文史工具书的功用、体例和使用方法。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各类文史工具书大多采用四角号码检索有关名词术语，如果你不懂得四角号码，那就很不方便。

第四，熟读版本学家所写的古籍题跋、书目提要和有关专著。古籍题跋和书目提要虽然不是系统的版本学讲义，没有让你从第一章读到最后一章，但是每篇题跋或提要都是版本学家精心考证版本的结晶，正反映了他们鉴定版本的方法。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 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①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已有定评的版本学家，他们所写的题跋或提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鉴定版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前人的经验，是不断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除了书目题跋、提要之外，还应该认真研读有关版本学专著。

当然，鉴定古籍版本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光是纸上谈兵是不够的。傅增湘、王重民为什么能够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古籍版本学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亲手鉴定的书实在太多。《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了傅增湘鉴定的4500种古籍，《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了王重民鉴定的4300种古籍，这两个数字还不是他们鉴定图书的全部。我们要尽可能多多参加鉴定版本的实践活动。

---

①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不应当那样写》。

第二章　古籍的结构与古籍版本的类别

一、古籍的结构

古籍的结构与现代出版物有很大差别，下面从单页版式、外形结构、内部结构等方面加以说明。

古籍的单页版式

古籍单页版式包括版框、界行、版心、鱼尾、象鼻、天头、地脚、书耳等名称（图1），现分别介绍于下：

版框——也叫边栏，指一张印页四周的围线。版框有很多种，以栏线的条数分，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等。四周边栏只有一条围线的，叫四周单边；左右边栏各有两条线组成的，叫左右双边；四周边栏都是两条围线的，叫四周双边，四周双边又叫文武栏。以栏线的图案分，有卍字栏、竹节栏、博古栏等。卍，本来是古代符咒或宗教的标志。佛教认为，它是“万德吉祥”之意。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规定它的读音作“万”。用卍字组成的栏线，叫卍字栏，例如明金陵富春堂刻《绨袍记》用的就是这种栏线；用竹节图案组成的栏线，叫竹节栏，例如有一种清刻本《陶渊明集》用的就是这种栏线；用各种乐器图案组成的栏线，叫博古栏，例如清内府五色抄本《金刚经》用的就是这种栏线。

界行——字行之间的分界线。界行和栏线有朱墨二色，红色栏线叫朱丝栏，黑色栏线叫乌丝栏。

版心——也叫中缝、书口、版口，指每页正中较窄的一格，格内常常刻有书名、卷次、页码、字数和刻工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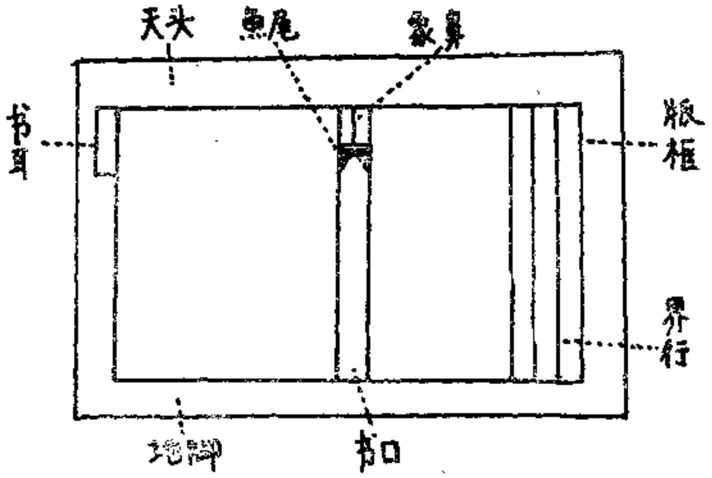


图1　古籍单页版式

鱼尾——版心全长四分之一处的鱼尾形标志。鱼尾种类很多。以鱼尾数量区分，有单鱼尾、双鱼尾、三鱼尾等：版心只有一个鱼尾的，叫单鱼尾；版心有两个鱼尾的，叫双鱼尾；版心有三个鱼尾的，叫三鱼尾。以鱼尾的方向区分，有对鱼尾和顺鱼尾：两个鱼尾方向相反者，叫对鱼尾；两个鱼尾方向相同者，叫顺鱼尾。以鱼尾的虚实图案区分，有白鱼尾、黑鱼尾、线鱼尾、花鱼尾等：只有鱼尾外部轮廓的，叫白鱼尾；鱼尾轮廓用墨填实的，叫黑鱼尾；鱼尾由线条构成的，叫线鱼尾；鱼尾由图案构成的，叫花鱼尾。

象鼻——连接鱼尾和版框的一条线。这条线有粗细之别，粗的叫大黑口或阔黑口，细的叫小黑口、线黑口或细黑口。没有象鼻的，叫白口。白口刻有文字的，叫花口。

天头——也叫书眉，是指上栏以外的空白处。

地脚——下栏以外的空白处。

书耳——也叫耳格或耳子。是指版框外边上端的小方格，用以书写篇名、室名等。

古籍的外形结构

古籍的外形结构包括书衣、书签、书名页、书首、书根、书脑、书脊等名称（图2），现分别介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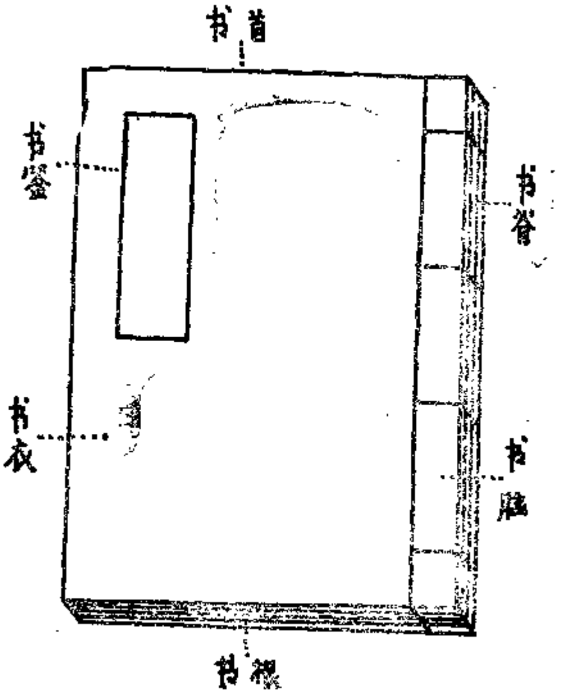


图2　古籍外形结构

书衣——也叫书皮，指包在全书最外层的一张纸，这张纸较厚，有保护全书的作用。明末毛晋汲古阁的书衣多用宋笺藏经纸或宣德纸，清初钱曾述古堂的书衣多用自造五色笺纸。

书签——贴在书衣左上方的一个长方形纸条或丝条，上面标有书名，书签常常请名人或师长题写。

书名页——书衣之后题有书名的一页。

书　首——也叫书头，指书的上端。

书　根——书的下端。古书不便直立，多平放在书架上。为了翻检的方便，藏书家常常在书根上题上书名、册数和册次。因为书根截面较小，书名多题简称。册数一般用"凡×"或"×止"表示，如一部书共有四册，可以在第一册书根上写作"凾"，也可在第四册书根上写作"罡"，第二、三册书根分别写上"二"和"三"。

书脑——装订线右边的部分。

书脊——也叫书背，指装订线右侧的截面。

副页——也叫护页、扉页，是夹在书衣和书名页之间的空白页子。其作用是保护书页、防潮防蛀。

包角——用细绢所包订线一侧上下之角，既美观又有保护作用。

衬纸——修补旧书时，在书页内所加的白纸。

金镶玉——修补旧书时，因书品太小，不可剪裁，书页之内衬一张长于书页上下两端的白纸。因为原书旧页如金之黄，新衬白纸如玉之白，故名。

书帙——包装卷轴装书籍的外衣，因为往往一书多轴，容易混杂，为了避免混杂，就用布帛或竹帘把一部书的许多卷轴包在一起。

书套——书函的一种，指保护古籍的外套。这种外套多以草板纸为里、外敷蓝布制成。书套有四合套、六合套之分。外露书首、书根，仅包前后左右四面的书套叫四合套；前后左右上下六面全包起来的书套，叫六合套。书套多用于我国北方地区。南方湿度大，图书加上书套容易发霉。

木匣——书函的一种，指那种专门盛放珍贵图书的木制匣子。木匣比书套更结实。

夹板——夹在图书上下的两块木板。制作方法是：先找两块

木板，大小和书衣相当，再在板的两端各穿两孔，最后穿带系紧。

高广——书页的长度和宽度。书写时，一般长度在前，宽度在后，以厘米为计算单位，写作“cm”，中间以“×”连接。

书品——有两个意思：一是指书籍的大小，例如开本较大的本子，通常称之为“书品宽大”；一是指书籍的新旧完损程度，例如破损严重的本子，通常称之为“书品太坏”。

古籍内部结构及有关名称

古籍内部结构及其与版本有关的主要名称有序、目录、跋、凡例、卷首、卷末、附录、外集、卷端、小题和大题、牌记、墨钉、墨围、阴文、白文、行款、藏章、帮手等。

序——正文之前说明写作经过、刊刻情况、学术源流等内容的文字（详第三编第二章第二节）。

目录——正文之前的篇章名目，它包括了全书的所有篇名。

跋——图书在流传过程中写上的有关版刻源流、流传源流的文字（详第三编第二章第二节）。

凡例——全书编制体例的说明文字。

卷首——正文之前独立成卷的部分。其内容大多是圣谕、先人著述文字或著者生平资料（行状、神道碑、墓志、传记等）。把圣谕放在卷首，以示荣遇。例如明刘基《诚意伯文集》卷首冠以其孙刘廌编《翊运录》，《翊运录》集刘基所得御书诏诰及行状事实，取诰中“开国翊运”之语为名；清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冠以清高宗弘历所颁关于编纂《四库全书》的圣谕，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一》所说：

> 是书卷帙浩繁，为亘古所无，然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权衡独运，衮钺斯昭。睿览高深，迥非诸臣管蠡之所及。随时训示，旷若发蒙。八载以来，不能一一殚记。谨录历次恭奉圣

谕为一卷，载诸简端。

真是百般吹捧，不遗余力。把先人著述文字放在卷首，以示孝心。例如宋戴复古《石屏集》卷首载其父戴敏诗十首；清程鸿诏《有恒心斋文》卷首有《有恒心斋前集》，专录先人文字。把著者生平资料放在卷首，以便读者了解著者身世和写作背景。例如清朱次琦《朱九江先生集》卷首有门人简朝亮所撰年谱；清顾寿祯《孟晋斋文集》卷首有其弟顾家相所撰年谱；明邓显麒《梦虹奏议》卷首有《大明一统志》中的邓显麒传。

卷末——正文之后独立成卷的部分。其内容多是后人著述文字、著者生平资料、著者同人赋赠之作或与正文相关的一些内容。在正文之后附上他人的作品，古人叫做“附骥而行”。附骥而行者大多是后辈或同辈的少量著述文字，间或也有把长辈著述文字附在后面的。后辈著述文字附骥而行者如明李昱《草阁集》末附其子李辕《筠谷集》一卷；明钟复《云川文集》末附其子钟同遗文四篇；清沈翼机《澹初诗稿》末附其子沈廷荐《见山堂诗抄》一卷；清宋荦《绵津山人诗集》末附其子宋至《纬萧草堂诗》一卷。同辈著述文字附骥而行者如元《丁鹤年集》末附其长兄诗九首、次兄诗三首、表兄诗五首；明黄衷《矩洲集》末附其弟黄槩《樗亭集》一卷；明孙升《孙文恪集》末附其继室杨文俪著作一卷。同辈、晚辈著述文字同时附骥而行者如宋罗愿《鄂州集》末附其兄罗颂、其弟罗頎、其侄罗似臣之文，还有明代罗氏后裔著《月山录》一卷；清曹一士《四焉斋诗集》末附其继室陆凤池《梯仙阁课余》一卷、其女曹锡珪《拂珠楼偶抄》二卷。长辈著述文字附骥而行者如宋黄庭坚《山谷集》末附其父《伐檀集》；宋正楙《野客丛书》末附其父《野老纪闻》；元洪希文《续轩渠集》末附其父洪岩虎诗。卷末附录著者生平资料者如宋穆修《穆参军集》卷末附录穆修遗事一卷；明高攀龙《高子遗书》卷末附录志状年谱一卷；清汪立名编《白香山诗集》卷末附

录年谱二卷。卷末附录著者同人赋赠之作者如明谈修《惠山古今考》卷末有同人赋赠之作三卷；明朱珪编《名迹录》卷末附录同人赠言一卷。卷末附录有关正文内容者如清喻昌《医门法律》卷末附录《寓意草》四卷，皆其所见临床病例；明赵崡是陕西周至人，靠近长安古都，赠爱金石，时挟纸墨拓碑，积三十余年，所蓄拓本颇丰，《石墨镌华》即其所题跋尾253种之汇编。该书卷末附录二卷诗文，记其求索访拓之苦。

附录——正集之后的附加部分，和卷末的情况基本相同。

外集——正集之外的部分。一般地说，它比卷末、附录的篇幅要大。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释家以佛理为内学，以儒论为外学，因此，释家别集均以无关佛理的儒理作品作为"外集"；儒家以儒论为内学，以佛理为外学，因此，儒家别集均以无关儒理的佛理作品作为"外集"。例如，清江沅《染香庵文集》将入禅文字编为"外集一卷"；清释敏历《香域内外集》十二卷，其中内集五卷皆释家语录偈语；外集七卷是无关佛理的诗文。（二）和内集不同文集、不同内容的作品。例如清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外集六卷为奏议公牍；明吴讷《文章辨体》外集五卷、清徐熊《未灰斋文集》外集八卷、清盛大士《蕴愫阁文集》外集四卷皆骈文；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卷为群书序跋及论学书札；清叶昌炽《奇觚庼文集》外集一卷为寿序；清刘凤诰《存悔斋集》外集四卷为试体诗赋。（三）补遗之作。例如清孙星衍《芳茂山人文集》外集五卷为其杂文之未刊者；唐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外集十卷为遗诗407首、遗文22篇。

卷端——每卷正文前两三行表示书名、著者、编纂校刊姓氏、版刻情况的文字。

小题和大题——小题指篇名，大题指书名。古籍卷端书名写在篇名之下者，叫做"小题在上，大题在下"。

牌记——刻书者用以宣传刻书情况的特殊标识（详第三编第二章第五节）。

墨钉——正文中表示阙文的墨色方块，如“■”。

墨围——为了强调“注”、“疏”等有关字眼，在其四周围上墨线，如注、疏等。

阴文——笔画凹下的字，多用于“注”、“疏”等字。

白文——只有正文、不含注疏的本子。

行款——书页版面的行数和字数，一般以半页为计算单位，称“×行××字”（详第三编第二章第六节）。

藏章——也叫藏书印，是古籍在流传过程中钤上的印章（详第三编第二章第十一节）。

帮手——指藏章、序跋等可以帮助鉴定版本的一些东西。

二、古籍版本的类别

古籍版本的种类非常复杂，现按照刻书时间、刻书地点、刻书单位、装订形式、制版工艺、写本种类、字体、行款、纸张、颜色、版式、刻印质量、内容、用途、流传、价值等类别择要介绍如下：

以刻印时间区分

就刻印朝代先后而言，有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三朝本、递修本、旧刻本等，就同书异本的刻印先后而言，有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

宋刻本——宋朝刻的书，其中又可分为北宋本和南宋本。

元刻本——元朝刻的书。

明刻本——明朝刻的书。

清刻本——清朝刻的书。

三朝本——南宋时，国子监刻书甚多，到了元朝，其书版被运入杭州西湖书院，稍事修补，继续刷印。明朝洪武八年（1375年），又将书版运至南京国子监，再次修补印行。因为这些书版

历经宋元明三朝修补刷印，故名。

递修本——书版残缺，经过多次修补而印成的书。例如三朝本就是递修本的一种。

旧刻本——刻印时代不详的早期刻本。

初刻本——同书异本之中的最早刻本。

重刻本——根据原刻本重新付刻的本子。其行款版式不一定与原刻本相同。

翻刻本——也叫覆刻本，是指严格按照原刻本的内容、行款、版式重新付刻的本子。

影刻本——按照原刻本逐页影摹刻印而成的本子。和翻刻本相比，影刻本更酷似原刻本，几可乱真。

初印本——书版刻成之后初次印成的本子。

后印本——初印本之外同一书版的其它印本。一般地说，后印本不如初印本好，因为书版经过多次刷印之后，常常漫漶不清，甚或断裂变形。

以刻印地点区分

就国内而言，有浙本、建本、蜀本、江西本、平阳本等。就国外而言，有朝鲜本、日本本、越南本、梵本等。

浙本——即浙江刻本，浙江是我国古代刻书中心之一。浙本之中又有杭州本、越州本、严州本、衢州本、婺州本等。

建本——又叫闽本，即福建刻本。福建是我国古代刻书中心之一。建本之中又有建阳本、麻沙本、泉州本等。麻沙是福建建阳县的一个小镇，因刻书而著称于世，麻沙所刻的书叫麻沙本。

蜀本——又叫川本，即四川刻本。四川是我国古代刻书中心之一。蜀本之中又有成都本、眉山本等。

江西本——即江西刻本，江西是我国古代刻书中心之一。江西本之中又有江州本、建昌本等。

平阳本——即平阳刻本，平阳又叫平水，在今山西临汾一带，

是金代和元代北方刻书中心。

朝鲜本——即古代朝鲜用汉字刻印的书。因朝鲜古称高丽，故又称高丽本。孙庆增在《藏书纪要·鉴别》中说：

> 外国所刻之书，高丽本最好。五经四书、医药等书，皆从古本。凡中夏（即中国）所刻，向皆字句脱落、章数不全者，高丽竟有完全善本。

日本本——古代日本用汉字刻印的书。日本本印工精巧，但字体和装订形式不如朝鲜本美观、大方。字行间或有平假名或片假名，以便日本人阅读。

越南本——古代越南用汉字刻印的书。

梵本——用古代印度文字书写的佛经。我国古代高僧到“西天”取经，带回的多为梵本。

以刻书单位区分

以刻书单位区分，有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官刻本简称官本，其中有京本、监本、兴文署本、经厂本、殿本、藩本、局本、扬州诗局本、书院本、钦天监本、太医院本、漕司本、茶盐司本、转运使司本、提刑司本、公使库本、布政使司本、郡本、府本、州本、县本、州府县学本等。家刻本种类繁多，著名者如黄善夫本、汲古阁本、涂祯本、陆元大本、朱承爵朱氏文房本、郭云鹏本、王延喆本、范钦天一阁本、金山钱氏本、张海鹏本、胡克家本、南海伍氏本等。坊刻本更是多如牛毛，著名者如陈宅书籍铺本、建安余氏本，荣六郎书籍铺本、金陵唐氏本、新安黄氏本、扫叶山房本、金台汪氏本、金台岳家本等。

官刻本——各级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所刻的书。

家刻本——私人所刻的书。

坊刻本——书商所刻的书。

京本——即京城官本的简称。地方刻书常以京本为真本，大量翻刻，福建书商亦常托名京本以售欺。郑振铎先生在《西谛书话·京本通俗小说》中说：

> 闽书贾为什么要加上“京本”二字于其所刊书之上呢？其作用大约不外表明这部书并不是乡土的产物，而是“京国”传来的善本名作，以期广引顾客的罢。

监本——国子监刻本。自从五代国子监刻印儒家经典以后，历代国子监都刻了不少书，成为官方刻书的主要部门。明朝先后设立南京国子监和北京国子监，它们所刻的书，分别叫做南监本和北监本。

兴文署本——元代兴文署所刻的书。兴文署是元代中央主管刻书的部门。

经厂本——明代经厂所刻的书。经厂是明代司礼监下属专门刻书的机构，是明代中央刻书的主要部门之一。经厂本也叫司礼监本（详第二编第六章第一节）。

殿本——清代武英殿所刻的书。武英殿是清代中央刻书的主要部门（详第二编第七章第一节）。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廷内部刻印的书。

藩本——明代藩王在封地藩府所刻的书（详第二编第六章第三节）。

局本——清代各省地方官书局所刻的书（详第二编第七章第三节）。

扬州诗局本——清康熙间扬州诗局所刻的书，主持者为江宁织造曹寅。

书院本——各地书院所刻的书。

公使库本——宋代各地公使库所刻的书（详第二编第四章第二节）。

汲古阁本——汲古阁所刻的书。汲古阁主人为明末清初著名刻书家毛晋，故汲古阁本又叫毛刻本（详第二编第六章第六节）。

陈宅书籍铺本——南宋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所刻的书。陈宅书籍铺主人陈起，是宋代著名出版家（详第二编第四章第四节）。

建安余氏本——宋代福建建安余氏所刻的书。余氏世代刻书，是中国刻书史上少有的刻书家。

以装订形式区分

以装订形式区分，有卷子本（一名卷轴装本）、经折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等（详第三编第二章第九节）。

以制版工艺区分

以制版工艺区分，有写本、拓本、刻本、活字本、套印本、钤印本、石印本、影印本、铅印本、饾版、拱花等。

写本——人工抄写而成的书。

拓本——把刻在金石器皿上的文字图案用纸拓下来装订而成的书。拓本又有墨拓本、朱拓本、初拓本等名称：用墨色拓印的，叫墨拓本；用朱色拓印的叫朱拓本；初次摹拓的本子叫初拓本（详第二编第九章第二节）。

刻本——雕版印刷而成的书。

活字本——用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套印本——将书中的正文、评点等不同内容分别各刻一版，然后用不同颜色依次加印在一起而成的书（详第二编第九章第四节）。

钤印本——将印章直接钤盖在纸上而成的书。

石印本——用药墨将文字写在特制药纸上，再将药纸上的字

迹移置到石版上，然后滚刷油墨印成的书（详第二编第九章第五节）。

影印本——将原书逐页照相制版印成的书。

铅印本——用铅活字排版印成的书。

饾版——这是一种彩画的印刷方法：把画面按颜色、深浅分刻若干小版，然后刷上颜色，逐块加印在一起。据说古代有一种五色小饼，像花卉禽兽珍宝之形，以盒盛放，名叫饾饤。饾版，大抵色彩斑驳陆离，同饾饤有些相像，故名。

拱花——也是一种图画的印制方法：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画面部分拱起，就像使用钢印的效果一样。

以写本种类区分

以写本种类区分，有写本、稿本、抄本、旧抄本等。

写本——成书时以手写形式流传的本子。例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明清列朝实录等原本既不是刻本、也不是稿本或据其它版本录写的抄本，故称“写本”。这里“写本”的概念是狭义的。

稿本——著者的原稿。稿本又分手稿本、清稿本等。手稿本是著者亲笔写成的稿子，如宋司马光手写的《资治通鉴》、清洪亮吉手写的《卷施阁近诗》、杜馥手写的《晚学集》、蒲松龄手写的《聊斋志异》等。清稿本是指用以增补、校订或付印的著作誊清本。

抄本——又叫传抄本，是指根据底本传录而制成的副本。抄本又有乌丝栏抄本、朱丝栏抄本、精抄本、影抄本、毛抄本、旧抄本等名称。精抄本是指纸墨精良、书法工整、内容错误较少的抄本。乌丝栏抄本是用墨栏格纸所抄的书。朱丝栏抄本是用红栏格纸所抄的书。影抄本是指把透明纸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体、行款照样摹写的本子。毛抄本是指明末清初毛晋所抄的书，毛氏的影宋抄本几可乱真。旧抄本是指时间不详的早期抄本。

以活字种类区分

以活字种类区分，有泥活字本、木活字本、铜活字本、铅活字本等。

泥活字本——用泥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木活字本——用木活字摆印而成的书。清乾隆皇帝以为活字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

铜活字本——用铜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铅活字本——用铅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以字体、行款区分

以字体、行款区分，有大字本、小字本、软体字本、硬体字本、×行本等。

大字本——字体较大的本子。一般地说，大字本的行款小于半页10行、行20字。

小字本——字体较小的本子。一般地说，小字本的行款大于半页10行、行20字。

软体字本——用软体字（即楷体）刻成的书。

硬体字本——用硬体字刻成的书。硬体又叫宋体、匠体，是刻书工匠经常使用的字体。用笔生硬板滞，不如软体生动（详第三编第二章第七节）。

×行本——半页×行的本子。

以纸张区分

以纸张区分，有麻纸本、树皮纸本、竹纸本、公文纸背本等（详第三编第二章第十节）。

以颜色区分

以颜色区分，有朱墨本、朱印本、蓝印本等。

朱墨本——用朱墨二色套印而成的本子。

朱印本——用红色刷印的本子。

蓝印本——用蓝色刷印的本子。明清刻书在版片雕成之后，常用蓝色或红色刷印若干部供校订之用，大约相当于今之"校样"。武汉大学图书馆藏《筹海图编》就是蓝印本。

以版式区分

以版式区分，有巾箱本、两节版本、三节版本、百衲本、黑口本、配本等。

巾箱本——指那些版式较小、便于携带的本子。"巾箱"之名始于汉代，《汉武内传》云：

> 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①

南北朝时南齐衡阳王萧钧曾写巾箱五经，据许嵩《建康实录》卷十六记载：

> （萧钧）好学，常手细字书《五经》，一部为一卷，置之巾箱中。侍读贺玠问曰："殿下家有坟索，何须此蝇头细书，别藏巾箱？"答曰："巾箱《五经》，检阅且易，一更手写，则永不忘。"诸王闻而争效之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也。

两节版本——书版分为上下两栏的印本。或上图下文，或下栏为正文，上栏为注解或批语，多半是民间通俗读物。

三节版本——书版分为上中下三栏的印本。和两节版本有些相似。

---

① （唐）虞世南：《北堂书抄》卷一百三十五。

百衲本——拼凑不同书版印成一部（套）完整的书。“衲”本指僧人用许多布块补缀而成的衣服。王隐《晋书》载董威在市场上收得残缯，辄结以为衣，号曰“百衲衣”。《铁围山丛谈》载唐李汧公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号曰“百衲琴”。《广川书跋》载蔡襄书《昼锦堂记》，每字一纸，择其不失法度者连成碑形，号曰“百衲碑”。以“百衲”名书，始见于钱曾《读书敏求记·史记提要》：

> 予昔藏宋刻《史记》有四，而开元本亦其一焉。今此本乃集诸宋版，共成一书。大小长短，各种咸备。李汧公取桐丝之精者杂缀为一琴，谓之“百衲”，予亦戏名此为《百衲本史记》，以发同人一笑焉。

其后印行百衲本《史记》者，尚有宋荦等人，宋荦集《史记》八十卷，合宋本二种、元本三种印成。《史记》之外，尚有黄丕烈百衲本《宋文鉴》和《昌黎先生集》；汪士钟艺芸精舍百衲本《春秋经传集解》和《唐文粹》；傅增湘百衲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等。

配本——集合许多不同的书版，配合成一种完整的书。

黑口本——古籍版式就书口而言，有黑口、白口之分，凡书口为黑口的本子叫黑口本。

以刻印质量区分

以刻印质量区分，有邋遢本、大花脸本、书帕本、写刻本、精刻本等。

邋遢本——版本模糊、极不整齐的本子。例如南宋绍兴间，四川眉山所刻七史，到了元代，大部分版片模糊漫漶，很不整齐，版本学家便称之为邋遢本。

大花脸本——墨色深浅不一，字体大小不同，而又刷印模糊

的本子。

书帕本——明代官场作为礼品送人所刻的书。因其错误较多，不为世人所重（详第二编第六章第四节）。

写刻本——名家手写上版刻成的书。写刻本除了内容错误较少之外，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

精刻本——内容无误，写、刻俱佳的本子。

以内容区分

以内容区分，有单刻本、合刻本、抽印本、丛书本、增订本、删本、节本、足本、残本、校本、注本、批点本、真本、伪本、序跋本、插图本、过录本、×卷本等。

单刻本——只含一种书的刻本。

合刻本——两种以上著作合刻在一起的本子。

抽印本——抽取一种（套）书的部分内容刻印而成的书。

丛书本——汇刻多种著作而成的书。

增订本——增订原本内容而成的新书。

删本——删节原本内容而成的书。

节本——节选原本内容而成的书。

足本——卷数完整的本子。

残本——卷数残缺不全的本子。

校本——经过校勘而成的本子。

注本——带有注解的本子。

批点本——带有眉批，圈点的本子。

真本——也叫正本，指内容无误的原本。

伪本——通过各种手段作伪而成的书。

序跋本——带有某人序跋的本子，在对同书异本进行比较的时候，常称“××序跋本”，以示区别。

插图本——带有插图的本子（详第二编第九章第一节）。

过录本——将名家批校文字移录而成的本子。清代何焯批校

之书，传本中有很多是学生过录的。

×卷本——正文包含×卷的本子。卷数常常是同书异本互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在对同书异本进行比较的时候，常常称“×卷本”以示区别。

以用途区分

以用途区分，有进呈本、底本、样本等。

进呈本——进呈给内廷的本子。例如清乾隆间编《四库全书》的时候，各地缴送北京的图书均称“进呈本”。进呈各书凡作为《四库全书》底本者，又称“四库底本”。

底本——作为校勘主要依据的本子或据以编纂、刊刻的本子。选择底本是校勘、编刊书籍的重要环节。底本不好，就会以讹传讹，谬种流传。

样本——以待审查、校订、观赏的本子。

以流传情况和价值区分

以流传情况和价值区分，有俗本、通行本、孤本、秘本、善本、焦尾本、××藏本等

俗本——流布较广、容易得到的本子。因为俗本到处可见，广泛流传，所以又叫通行本。

孤本——举世无双的本子。如宋刻三十卷本五臣注《文选》、宋刻《昌黎先生集考异》等都是孤本。

秘本——秘不示人的本子。

善本——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本子（详第三编第六章第三节）。

焦尾本——火灾之后幸存的残本。

××藏本——××藏书家收藏的本子。在对同书异本进行比较的时候，常用“××藏本”加以区别。

第三章　古籍版本学史略

一、古籍版本学的产生

古籍版本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到底古老到什么时候？论者聚讼纷纭，或曰先秦，或曰汉代，或曰宋代。我们认为，古籍版本学伴随着同书异本的出现而产生。

先秦的版本学

早在先秦就产生了版本学。

《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我国正式图书的出现不会晚于商代。我国学校历史悠久，早在夏代就出现了庠、序、校，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学校。商周的瞽宗、辟雍、泮宫等也是学校。学校总是要上课的，要上课就要有课本。尽管先秦简策制作不易，图书流布不广，课本不可能人手一册，但同书异本总是存在的，只是数量不多罢了。相传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就有课本可读，这在《论语》中可以找到许多证据：

>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
> ——《论语·子路第十三》

>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

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论语·季氏第十六》

既然孔子谆谆教导弟子及其后人学习《诗》、《礼》等书，那就说明他们有书可读，如果他们根本没有见过书是什么样子，孔子就不会说这些话了。孔子作为一个教师，也有自己的教科书。《论语·述而第七》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可见孔子也有《易》、《诗》、《书》等课本。既然师生都有课本可读，那么也就说明同书异本也是不少的。《韩非子·外储说》中讲过一个故事：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

类似郢书燕说的错误，在抄书过程中总是难以避免的。这就必然导致同书异本的差异，也就逼着人们去研究版本之间的差异。可见，版本问题伴随图书的产生而产生，伴随同书异本的出现而出现。

另外，早在先秦已经出现公私藏书。例如墨子、惠施、苏秦等是可考的私人藏书家。《商子》、《管子》、《孙子》、《吴子》、《诗经》、《尚书》等著作民间多有收藏，秦始皇焚书之举没有、也不可能把众多图书一烧而光。可见，同书异本在先秦已大量存在，版本问题已经毫不含糊地摆在人们面前。

那么，先秦有人研究版本吗？回答是肯定的。学生上课、学者读书总会遇到不同版本的异同问题。遇到问题之后，总要进行一番考证功夫，弄清孰是孰非、孰善孰劣。这种研究版本异同的学问就是版本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是教育家，他教的课程至少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等，他在讲课之前，必然要对这些书的不同版本进行整理，从而编成定本。《春秋·昭公十二年》有一句话："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传》解释说：

> "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何休《解诂》："子"谓孔子。"乃"，乃是岁也。时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后作《春秋》，案史记，知"公"误为"伯"，"子"误为"于"，"阳"在，"生"刊灭阙。）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解诂》：此夫子欲为后人法……不欲令人妄臆错。）

这就是说，孔子通过对不同版本进行校勘，知道"伯于阳"为"公子阳生"之误。只是为了慎重起见，才没有径改。这是孔子比较不同版本的例证。可见，孔子当是先秦版本学研究的先驱人物。孔子的学生子夏对版本也颇有研究，据《吕氏春秋·察传》记载：

>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亥'与'豕'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这件事说明两个问题：（一）说明当时《史记》（这里的《史

记》非司马迁所著，当为诸侯国史）同书异本很多，诸本之间差距很大；（二）说明子夏对版本内容很有研究，他用正本纠正了误本。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一文字就是其中之一。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行其是，很多字的写法不一样。许慎《说文解字》中所收“古文”大多是战国文字。由于诸国文字各异，则文字形状的差别成了当时同书异本互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秦始皇统一文字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统一同书异本的字体，字体异同也正是版本学研究的一大内容。当然，由于秦代以及先秦的文献资料不足，给我们进一步研究其版本学，带来一定困难。

汉代刘德的版本学

到了汉代，版本学研究有了明确记载。一般认为，汉代是我国版本学的开创时代。当然，汉代版本学的开创性成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以先秦版本学研究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汉代教育发达，“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①东汉学校更多，汉顺帝初年，修太学。到质帝时，人数增至三万余人。汉代私人讲学尤盛。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张兴、牟长、蔡玄、楼望等的学生皆万人左右，宋登、魏应、丁恭、姜肱等人亦有学生数千人。另外，汉代公私藏书日富，石室、金匮是国家藏书之所。刘德、刘安、刘向、蔡邕等是可考的汉代私人藏书家。汉代还出现了书店，著名学者王充少时“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②汉代学生之多、藏书之富、书肆的出现，意味着图书流布之广、复本

①《汉书・儒林传赞》。

②《后汉书・王充传》。

之多。复本的大量增加，研究同书异本，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刻不容缓的课题。汉代研究版本的人很多，刘德、刘向、郑玄、高诱、蔡邕等都是著名版本学家。

刘德，汉景帝第三子，封为河间王。据《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

>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这里所谓“善书”就是后世所说的“善本”。这是我国古代典籍关于“善本”的最早记载。那么，刘德选择“善本”的标准是什么？由于文献不足，我们无法全面了解刘德的“善本观”，但是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刘德选择“善本”的标准至少有四条：就时间而言，必须是“先秦旧书”，秦汉图书一律不收；就内容而言，必须是真本，伪本一律不收；就著者而言，多“七十子之徒所论”，内容质量之高，可想而知；就文字而言，必须是“古文”，用“今文”写成的图书一律不收。什么是今文？什么是古文？西汉政府设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所授经文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今文”。用蝌蚪文写成的经文称“古文”。今古文经书不但文字各异，而且字句、篇章、解释等都有所不同。今古文经书的差别就是版本的差别，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就是由于版本不同而引起的。今文经得到国家承认，是统用教材；古文经国家不承认，流传民间。为了争取古文经的合法地位，古文经学家进行了一系列斗争，这种斗

争愈演愈烈，远远越出了文字之争、版本之争的范围。以时间范围、真伪、著者、字体四个条件作为选择善本的标准，这在版本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另外，刘德以“好写”之书与人交换善本，“好写”者，书法优秀、内容无误之谓也。可见，刘德也很重视版本的书法艺术水平，这在版本学史上也是第一次。

汉代刘向的版本学

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字子政，本名更生，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和文学家。历任谏议大夫、中垒校尉、光禄大夫等职，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受诏整理国家藏书，著作有《洪范五行传》、《列女传》、《列仙传》、《新序》、《说苑》等。刘向整理图书大致分为以下六步：

第一步是网罗众本，例如整理《战国策》用了六种中书版本；整理《管子》用了中书、大中大夫卜圭书、臣富参书、射声校尉立书、太史书等五种版本；整理《晏子》用了中书、太史书、臣向书、臣参书等四种版本；整理《列子》用了中书、太常书、太史书、臣向书、臣参书等五种版本。以上各种版本以藏书处所划分，又可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国家藏书，如中书、太常书、太史书等；一类是私人藏书，如臣向书、臣参书、大中大夫卜圭书，射声校尉立书等。国家藏书又统称“中书”；私人藏书又统称“外书”。

第二步是确定书名。同书异本书名往往不一，例如《战国策》，“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①] 刘向最后始定今名。

第三步是审定篇第。同书异本篇第多有差异，需要去重复、

---

① （清）姚振宗：《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七略别录佚文》。

定先后。例如《管子》中书389篇、大中大夫卜圭书27篇、臣富参书41篇、射声校尉立书11篇、太史书96篇，共计564篇，除去重复484篇，定著86篇。《晏子》中书11篇、太史书5篇、臣向书1篇、臣参书13篇，共计30篇、838章，除去重复22篇、638章，定著8篇、215章。

第四步是校勘文字。同书异本文字或有差异，需要别谬误，定正讹。例如《战国策》，"本"讹作"半"、"赵"讹作"肖"、"齐"讹作"立"等；《晏子》，"天"讹作"芳"、"先"讹作"牛"、"章"讹作"长"等；《列子》，"尽"讹作"进"、"贤"讹作"形"等。刘向在整理诸经时，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他"以《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①他"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②

第五步是缮写定本。

第六步是撰写提要。提要或记作者身世，或叙学术源流。

刘向整理图书的过程就是研究版本的过程，它反映了早期版本学的如下特点：第一，版本学一开始就与目录学、校勘学密切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者如水乳交融，不可分离。第二，版本学离不开比较，版本学就是在比较中找出同书异本的差别。要比较，就必须网罗众本。比较什么？比较同书异本的篇第、文字等，因为这些东西往往是同书异本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这也反映了早期版本学对于内容的重视。

汉代郑玄等人的版本学

郑玄（127～200），字康成，高密（今属山东）人，东汉经

---

①② 《汉书·艺文志》。

学家。他在注书过程中“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① 对于经书版本了如指掌。清人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中指出：

> 郑注诸经，皆兼采今古文：注《易》用费氏古文，爻辰出费氏分野，今既亡佚，而施孟梁邱《易》又亡，无以考其同异。注《尚书》用古文，而多异马融，或马从今而郑从古，或马从古而郑从今，是郑注《书》兼采今古文也。笺《诗》以毛为主，而间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谓“己意”，实本三家，是郑笺《诗》兼采今古文也。注《仪礼》并存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是郑注《仪礼》兼采今古文也。《周礼》古文无今文。《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其注皆不必论。注《论语》就《鲁论》篇章，参之《齐》、《古》，为之注，云“《鲁》读某为某，今从《古》。”是郑注《论语》兼采今古文也。注《孝经》多今文说，严可均有辑本。

高诱，东汉涿郡（今河北涿县）人，有《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等。他在注书过程中非常注意同书异本内容的差异，他在《吕氏春秋序》中说：

> （此书）既有脱误，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犹虑传义失其本真，少能详之，故复依先师旧训，辄乃为之解焉。

《淮南子·本经》有这样一句话：“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诱注云：“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鬼，或作兔，兔恐见取毫作笔，害及其躯，故夜哭。”这里“或作兔”，就是

---

① 《后汉书·郑玄传说》。

同书异本的异文。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今河南杞县）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熹平四年（175年），东汉党锢之祸以后，著名学者多坐流废，经学遂至纷争。有人甚至通过贿赂手段，私改兰台所藏经书定本，以就己意。蔡邕和杨赐、马日磾等人，认真研究了经书的各种版本，发现“文字多谬，俗儒穿凿”，于是“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用之，邕乃自书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① 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可见熹平石经正是统一版本的产物，它纠正了各种写本的错误，对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总之，早在先秦随着同书异本的大量出现就产生了版本学。汉代刘德、刘向等人的版本学是在先秦版本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开创性成就，标志着版本学已经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有人说：既然称“版本学”，就应该拿出理论研究成果，光是列举古籍整理的实践活动是不够的。我们认为，版本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衡量一代版本学之兴衰，主要根据社会实践。脱离实践的版本学是毫无价值的，也是不存在的。另外，实践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盲目实践，这类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毫无关系；一类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这类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的关系十分密切。毫无疑问，刘向、郑玄、高诱等人的古籍整理实践活动决不是盲目实践，而是在版本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可惜他们的版本学理论文献无征，我们只能从其实践活动中略窥其版本学理论之一斑。

二、古籍版本学的发展(上)

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诸朝是古籍版本学的发展时期。古籍版

① 《后汉书·蔡邕传》。

本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极其漫长的道路，现择要予以论述。

晋代版本学

晋代对于同书异本比较重视，公私藏书对于同书异本往往兼收并蓄。据《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记载：

> 大司马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时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春秋》，直书时事，大司马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请改之。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斑白，待之愈峻。至是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不许。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及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

由此可知，晋政府同时收藏了《晋春秋》原本和窜改之本。经过有关人士的鉴定，发现两本在内容上是有区别的：原本记载了桓温监修广陵城时，"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的真实情况，而窜改之本却一笔勾销了这些事实。晋代对版本学进行过深入研究的首推荀勖。荀勖（？～289），字公曾，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西晋大臣，著名学者。他曾两次参与整理国家藏书的工作，第一次是在晋武帝泰始初年，荀勖"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纪籍"。①既是"依刘向《别录》"进行整理，那就说明他们整理图书的方法和刘向是一样的。首先网罗众本、确定书名，接着审定篇第、校勘文字，最后缮写定本，撰写提要。如果不精通版本，就难以胜任这项工作。第二次是在晋武

① 《晋书·荀勖传》。

帝太康二年（281年），亲自参加了汲冢竹书的整理工作。① 他在《穆天子传序》中说：

> 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以臣勖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览，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请事平（按：指平定八王之乱之后）以本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副在三阁。

可见荀勖注意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研究版本，当他从内容方面研究版本之后，才得出“毁落残缺”、“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览”的结论。在形式方面，他已注意到载体、装订、高广、行款、文字等问题。除了荀勖之外，徐广对版本亦颇有研究。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今山东安丘）人，著名学者。晋代《史记》版本纷杂，真伪莫辨，徐广《史记音义》就是精研各种版本的重要成果，裴骃《史记集解序》云：

> （《史记》各本）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

裴骃《史记集解》和司马贞《史记正义》对《史记音义》多所征引。

南北朝版本学

南北朝时期已经大量出现“误本”这个词，“误本”是针对

① 汲冢竹书的出土时间，《晋书》前后说法不一，或作咸宁五年（279年）。

“正本”而言的。这说明南北朝学者已经把版本分为正本和误本两大类别，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中举例说：

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时，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音》，而颇纰缪，误反“颛顼”字，“顼”当为许录反，错作许缘反，遂谓朝士言：“从来谬音‘专旭’，当音‘专翾’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后，更有硕儒，苦相究讨，方知误焉。

可见，误本实在害人不浅，叫人把羊肉当芋头，把“颛顼”读作“专翾”。南北朝学者在校书时非常注意网罗同书异本。颜之推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①] 这就是说，没有大量阅读图书（其中包括所有同书异本），就不能随便校书。颜之推本人正是这样做的。他在《颜氏家训·书证》中列举了江南本、江南旧本、河北本、古本、俗本等多种版本，并指明了误本异文。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6年），诏令樊逊、高乾和等11人校定群书，樊逊建议：

按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每一书竟，表上，辄言臣向书、长水校尉臣参书、太史公书、太常博士书，中外书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后杀青。今所雠校，供拟极重，出自兰台，御诸甲馆。向之故事，见存府阁，即欲刊定，必藉众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

① 《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请牒借本参校得失。①

有关方面采纳了樊逊的建议，共得同书异本3000余卷，把五经诸史的不同版本网罗无遗。南北朝学者也很注意从内容上鉴定版本。上举颜之推、樊逊等人就是这样。此外，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萧梁时，鄱阳嗣王萧范得汉代班固所上《汉书》真本，献给东宫，皇太子令刘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刘子遴从内容入手，认真鉴定后，认为这是一个伪本，他说：

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称为《叙传》。而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秩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前。又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仗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而今本无此卷。②

刘之遴采用比较的方法，从上书年月、篇名、编次、卷数、内容等方面历数伪本作伪之迹，令人信服。

隋唐五代版本学

隋唐五代时期，在版本学方面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重视

① 《北齐书·文苑传》。
② 《梁书·刘子遴传》。

佛经版本的研究，二是重视版本的形式美。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之后，一经而有多译，版本极为纷杂。例如《大涅槃经》有《泥洹》本、北本和南本。《泥洹》本最早，北本次之，南本晚出，据梁慧皎《高僧传·慧严传》记载：

> 《大涅槃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措怀。（慧）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

“品数疏简”、“文有过质”之本即北本，慧严等改编本即“南本”。在文字上，北本四十卷，南本三十六卷；在品目上，南本比北本几乎增加了一倍。《法华经》有三译：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十卷、二十七品；姚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八品；隋阇那崛多译《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七品。唐释道宣说：“三经重沓，文旨互陈，时所宗尚，皆弘秦本”。[1]秦本即姚秦鸠摩罗什译本，这个本子当时流布较广，它和西晋竺法护译本有很大差别，阇那崛多撰《添品妙法莲华经序》说：

> 护似多罗之叶，什似龟兹之文。余验经藏，备见二本，多罗则与《正法》符会，龟兹则共《妙法》允同。护叶尚有所遗，什文宁无其漏？而护所缺者，《普门品》偈也；什所阙者，《药草喻品》之半、《富楼那》及《法师》等二品之初、《提婆达多品》、《普门品》偈也。什又移《嘱累》在《药王》之前。二本《陀罗尼》并置《普门》之后。其间异同，言不能及。

这说明阇那崛多非常注意研究佛经不同版本的内容差别。正因为

---

① （唐）道宣：《妙法莲华经·弘传序》。

经版本复杂多变，隋文帝“乃敕沙门法经，定其正本。所以人中造者五百余卷，同并燔之。惟录正本，通数则有三万余卷，已外另生杂录，并不写之”。[1]“正本”即今之“善本”，就是正确的版本。为了寻求“正本”，不少僧人不辞劳苦，到“西天”留学取经，唐僧玄奘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玄奘（602～664），洛州缑氏（今属河南偃师）人，唐代著名佛教学者、旅行家，“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2]他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西行，至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国，历时17年，行程5万里，带回梵文经典657部。回国以后，在官方的支持下，他把全部精力倾注到翻译工作中去，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翻译家。玄奘等人为了正定佛经版本，翻越万水千山，访求善本，精神实在可佳。汤用彤在《隋唐佛教史稿·隋代传译之情形》中说：

> 经文既因传承派别有异，故前后学说改易，所传又有歧本。经本如此，论更可知。以是西域传本与梵本常不同，西印土传本前后又常互异也。隋唐中所译原本，多系华人自西方携来，既合印土之需要，又直接原本，如玄奘所出不仅丰备，而又不经西域之媒介致有失真，此唐译之所以可贵也。

隋唐五代时期，人们更加注意图书版本的形式美。《隋书·经籍志序》说：

> 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炀

① （唐）道宣：《续高僧传·慧云传》。
② 《旧唐书·玄奘传》。

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

隋人对于版本的纸墨、书法和装订都很讲究，因为缴获陈宣帝太建年间的藏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故而召书霈、杜頵等“工书之士”补续残缺。隋炀帝在位期间，把藏书分为三品，上品即今之善本书，上品和中品用高级的琉璃作为材料制作中轴，既精又美，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版本形式美的追求。唐人也很重视版本的纸张和装订，《旧唐书·经籍志》说：

（四部库书）皆以益州麻纸写。其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分别之。

可见唐代官方藏书，用纸特别讲究，牙签的颜色也因内容而别。

隋唐时期的版本学家有陆德明、颜师古、李贤等。陆德明《经典释文》博采汉魏六朝230余家经书版本，汇集了同书异本的大量异文、音切和训诂，是研究古代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和版本学的重要著作。颜师古精于校勘，据《旧唐书·颜师古传》记载：

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

可见颜师古因对“晋宋以来古今本”如数家珍，才得以“援据详明”，力排众议。传世《汉书注》也是颜师古精研版本的结果。李贤以为《后汉书》作注著称于世，《后汉书注》体现了李贤在版本学方面的深厚功底，他在《后汉书·邓寇列传》中注解“元二”二字时说：

> “元＝”即元元也。古书字当再读者，即于上字之下为小“＝”字，言此字当两度言之。后人不晓，遂读为“元二”，或同之阳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字，明验也。

此例不仅说明李贤重视从文字内容入手研究版本，而且还说明他常以传世文物为佐证鉴定今本。李贤在《后汉书注》中还纠正了不少俗本的错误。

以上就是魏晋至隋唐时期版本学的发展情况。在这段时期中，版本学实践比比皆是，并且出现了直接论述版本的著作。《颜氏家训》所举“误本”之例，实则告诫人们读书不可不讲版本，说明了版本的重要性。“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实则告诫人们同书异本的差异是很大的，不遍观天下同书异本，是不可校书的。这些论述在版本学历史上都是值得重视的。

三、古籍版本学的发展(下)

宋元时期雕版印刷发展较快，但是元代版本学成就不大，这与元代校勘学、目录学不甚发达有关。下面重点论述宋代版本学的成就。

宋代的版本学论述

尽管宋代还没有出现版本学专著，但是宋人著作已对版本学

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索。这些探索虽然缺乏系统性，但不少论述在版本学史上都是第一次，属于开创性研究。

关于雕版印刷起源问题，叶梦得、朱翌等提出“唐末说”，王明清提出“五代说”（详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

关于活字印刷问题，沈括详细总结了毕昇泥活字的制作方法（详第二编第九章第三节）。

关于当代刻书问题，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下谈及权臣贾似道等人的刻书情况：

> 贾师宪尝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少胜多，如赤壁、淝水之类，盖自夸其援鄂之功也。又开《全唐诗话》三帙，盖即唐《本事诗》中事也。又尝自摭本朝十三朝国史及会要杂说中事，如《类说》例，为百卷，名《悦生堂随抄》，版虽刊，未及印，其书遂不传。

龚明之《中吴纪闻》、洪迈《夷坚志》等书都论及了宋代刻书情况。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在谈到各地刻书时说：

> 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

这段话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所谓宋代刻书四大中心（浙、建、蜀、汴）之说，即源于此；“以柔木刻之”一语亦成为后世责难麻沙本的重要依据。

关于载体问题，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一说：

> 古结绳而治。二帝以来，始有简册，以竹为之，而书以漆；或用版，以铅画之，故有刀笔铅椠之说。秦汉末用缣帛，

如胜、广书帛内鱼腹，高祖书帛射城上。至中世渐用纸，《赵后传》所谓"赫蹏"者，注云：薄小纸。然其实亦缣帛。《蔡伦传》：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重不便于人，伦乃用木肤麻皮等。则古之纸即缣帛，字盖从纟云。故今人呼书曰策子，取简策之义；又曰第几卷，言用缣素也。

不管上述论述是否正确，但它至少说明宋人对载体是很重视的，已开始进行研究。

总而言之，宋人关于版本学的论述已大量出现，值得我们努力发掘。

宋代的版本学实践

宋代版本学实践主要表现在治学、藏书、刻书等方面。

宋代学者宋敏求、曾巩、刘恕、刘攽、张耒、叶梦得、洪迈、陆游、朱熹、吕祖谦、魏了翁、王应麟、彭叔夏等在治学过程中，非常注意版本之优劣、文字之异同。宋敏求(1019～1079)字次道，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北宋文学家、史地学家，撰有《长安志》、《春明退朝录》等。淳熙四年（1177年），他在秘阁任职时，曾建议广罗异本，他说：

> 先以《前汉书·艺文志》所载者，广求其本，令在馆供职者，重复校正。既毕，然后校后汉时诸书。窃缘战国以后，及于两汉，皆是古书，文义简奥，多有脱误，须得他本参定，乞依昨来《十七史》例，于京师及下诸路藏书之家，借本誊写送官。①

洪迈（1123～1202）字景庐，鄱阳人，南宋文学家，著有《容斋

---

①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随笔》等。他曾在《容斋四笔·抄传文书之误》中讲过一个著名故事：

> 曾纮所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形夭無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若不贯，遂取《山海经》参校，则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下句相应，五字皆讹。

朱熹（生平详第二编第四章第三节）对宋代各地版本了如指掌。在他的著作里，多次谈到建阳本、四川本、福州本、鄂州本、长沙本、黄州本、信州本、监本、馆阁本等。为了校好韩愈文集，他利用了官本、古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莆田方氏本等，他校书的原则是不看来头，无论官私，以义理为准，"苟是矣，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① 这反映了朱熹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宋代藏书家也很重视版本。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宋代藏书家已开始编制版本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版本目录最早出现在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都是版本目录。晁公武（1105～1180），字子止，山东巨野（一说河南清丰）人，著名藏书家，其《郡斋读书志》所收各书多著录版本，例如该目附志《濂溪先生大全集》提要说：

> 淳祐初元，诏从祀于学，封春陵伯。始道守萧一致刻先生遗文并附录七卷，名曰《大成集》；进士易统又刻于萍乡，名曰《大全集》，然两本俱有差误，今并参校并藏之。

尤袤（生平详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编《遂初堂书目》一书而兼

① （宋）朱熹：《晦庵集·书韩文考异前》。

载数本，如正史类《史记》著录有川本、严州本；《前汉书》著录有川本、吉州本、越州本、湖北本等。陈振孙（生平详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编《直斋书录解题》条析各书版本源流，并注意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别，如该目《杜工部集》提要说：

> 王琪君玉嘉祐中刻之姑苏，且为后记，元稹墓铭亦附第二十卷之末。又有遗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刊附集外。蜀本大略同，而以遗文入正集中，则非其旧也。①

第二，宋代藏书家已开始摸索鉴定版本的方法。卷数差异常常是同书异本互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宋代藏书家特别注意同书异本卷数的多寡。陈振孙鉴定版本往往采用这种方法，他在鉴别《李卫公备全集》时说：

> （耿秉直本）比永嘉及蜀本三十四卷之外，有《姑臧集》五卷，《献替记》、《辨谤略》等诸书共十一卷。②

他在鉴别《稼轩词》时说：

> 信州本十二卷，卷视长沙为多。③

宋代藏书家也很注意不同版本文字、编排之异同，赵希弁在鉴别《昌黎先生文集》时说：

> （与宜春新旧本、杭本比较）饶本刊年谱于目录之后，刊附录于外集之前，又附录止载九篇，而前后共列五序。④

---

①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

③ 《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

④ 《郡斋读书志·附志》卷五下。

第三，宋代藏书家重视根据版本内容选择善本（详第三编第六章第三节）。

宋代出版家亦重版本。朱熹、廖莹中等人每刻一书，在底本选择、校勘文字、纸墨质量等方面非常认真（详第二编第四章第三节），体现了他们在版本学方面的造诣。

宋代版本学发展的原因

宋代版本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呢？

第一，宋代学术的繁荣，促进了版本学的发展。宋代建立以后，在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同时，重视发展学术文化，先后编成《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四部大书，为宋代开展大规模学术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宋代享国的300余年之中，文学、史学等都有较大发展，出现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通鉴纪事本末》、《通志》、《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一大批学术名著。学术研究必须占有资料，而资料的鉴定和选择则离不开版本学。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如果不懂得版本学，他将无法开展工作。学术研究和版本学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学术研究促进了版本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版本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学术的繁荣和版本学的发展总是同步的。宋代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①

①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

这个故事说明宋代版本知识是多么普及，连一般的学生都粗知版本。在他们心目中，监本的质量是比较好的。

第二，雕版印刷的发展，促进了古籍整理，而古籍整理又促进了版本学的发展。雕版印刷效率高、出书多，需要大量书稿，书稿从何而来？除了当代著作之外，大多属于古籍。古籍流传时间长，版本比较复杂，直接拿去刻印，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进行一番整理。而整理这些古籍，离开了版本学，就寸步难行。例如《孟东野集》宋初有汴梁本、吴本、周安惠本、蜀本等，各本篇卷均不同，宋敏求把它们整理了一下，分为十卷、十四大类，才使孟集有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本子。宋敏求在序中说：

> 东野诗，世传汴吴镂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别本五卷、三百四十篇；蜀人蹇浚用退之赠郊句纂《咸池集》二卷、一百八十篇。自余不为编秩，杂录之，家家自异。今总括遗逸，擿去重复，若体制不类者，得五百一十一篇，厘别乐府、感兴、咏怀、游适、居处、行役、纪赠、怀寄、酬答、送别、咏物、杂题、哀伤、联句十四种，又以赞书二系于后，合十卷。嗣有所得，当次第益诸。

以后刷出各本都是以宋编孟集作为祖本的。除了《孟东野集》之外，宋敏求还整理过《李白集》、《颜鲁公集》、《刘宾客集》等。当然，宋代参与古籍整理者远非宋敏求一人，许多文人学者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曾巩整理过《李白集》、《鲍溶诗集》、《新序》、《说苑》、《列女传》、《梁书》、《南齐书》、《陈书》等，王钦臣整理过《韦苏州集》，苏舜钦、王洙、刘敞、王安石等分别整理过《杜工部集》，欧阳修、穆修、方崧卿、朱熹等分别整理过《昌黎先生集》等。宋代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工作，加快了版本学发展的进程。就版本而言，流传至今

的许多图书，几乎都有自己庞大的家族，而宋本往往是这个庞大家族的“祖本”，在这个“祖本”身上，宋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宋人对于古籍的流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三，雕版印刷的初步繁荣，同书异本的大量出现，为版本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版本学是以图书版本为研究对象的，没有图书版本就没有版本学。宋代雕版印刷的发展，出现了官刻、家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刻本到处可见。除了雕版印刷之外，手工抄写仍然是制作图书的重要手段，写本仍然广为流行。复杂多变的图书版本为版本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四、古籍版本学的兴盛

明清时期是版本学的兴盛时期。从此，古籍版本学进入日臻成熟的新阶段。

明代版本学

明代本身在版本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并不算大，但它为清代版本学的发展作了准备。明代版本目录有毛晋《汲古阁校刻书》、范钦《天一阁书目》、周弘祖《古今书刻》、梅鷟《南雍志·经籍考》、刘若愚《内版经书纪略》等。这些目录之中，大多仅记书名，学术价值不大。在明代学者之中，高濂、杨士奇、陆深、胡应麟等对版本学有所研究。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列举了书估作伪的种种手段（详第三编第四章第一节）；杨士奇《东里续集》列举了成都、南昌、常州、黄州、四川、松江等几十种版本；陆深《金台纪闻》对雕版起源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详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下面重点介绍一下胡应麟的研究情况。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又字明瑞），号石羊生（又号少室山人），浙江兰溪人，明代藏书家、文学家。《少室

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反映了他的如下版本学思想：（一）关于图书制作的演变源流，他说：

> 三代漆文竹简，冗重艰难，不可名状。秦汉以还，浸知抄录，楮墨之功，简约轻省，数倍前矣。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且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绌阅展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至唐末宋初，抄录一变而为印摹，卷轴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善具焉。溯而上之，至于漆书竹简，不但什百而且千万矣。

由此可知，胡氏不仅对图书制作源流了如指掌，而且有比较进步的历史观，认为纸书胜于竹简，书册胜于卷轴，印摹胜于抄录。（二）关于雕版起源，他说：

> 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此余参酌诸家，确然可信者也。

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既是"参酌诸家"，说明胡氏还是认真作了一番考证。可见，他对雕版起源问题是很重视的。（三）关于版本价值，他说：

> 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抄刻，抄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

这里提出衡量版本价值的七个标准，实际上就是胡氏的"善本

观”。衡量一本书是否善本，也要用这七条来衡量。在这七条之中，“本”讲的是内容，“凡本，刻者十不当抄一，抄者十不当宋一”。为什么胡氏这么重视宋本呢？他说：“今书贵宋本，以无讹字故。”“刻”讲的也是内容，因为刻书地不同，内容质量也就不同。其它五条讲的多是形式。可见胡氏的“善本观”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除了上面三个问题外，胡氏还谈了活字印刷、明代刻书等问题。在一部著作中，这样集中地论述版本学的有关问题，在版本学历史上还是首次。

清代是版本学的兴盛时期，让我们从版本学论述、版本目录、版本学实践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清代的版本学论述

清代的版本学论述散见于大量日记、笔记、文集之中。日记如钱大昕《竹汀先生日记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等；笔记如陆以湉《冷庐杂识》、王应奎《柳南随笔》、王晫《今世说》、王士禛《香祖笔记》和《居易录》、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俞樾《茶香室丛抄》、阮葵生《茶余客话》、王昭梿《啸亭杂录》、梁章钜《归田琐记》等；文集如顾炎武《顾亭林文集》、朱彝尊《曝书亭集》、缪荃孙《艺风堂文集》、厉鹗《樊榭山房集》、阮元《揅经室集》、段玉裁《经韵楼集》、孙星衍《问字堂集》等。另外，孙庆增《藏书纪要》、叶德辉《藏书十约》等书中也有不少版本方面的内容。总而言之，版本学在清代已是一个热门话题，有关版本学的论述多如牛毛，举不胜举。

在这些论述之中，从写本到刻本，从雕版起源到历代刻书，从活字到套印，从版本源流到版本鉴定，真是面面俱到，无所不谈，向人们展示了版本学丰富的内涵。

关于雕版印刷起源问题，清代学者聚讼纷纭，各抒己见（详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尽管说法不一，但它说明清代学者都认识到发明雕版印刷的伟大意义。

关于宋元明清的刻书情况，清代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清代学者对明代刻书发表了不少批评意见，但并没有完全否定明本。

关于古籍鉴定问题，清代学者多所注意，并找到许多鉴定版本的办法，《藏书纪要》和《藏书十约》都把“鉴别”作为一个专题加以研究。《藏书纪要·鉴别》说：

> 夫藏书而不知鉴别，犹瞽之辨色，聋之听音。虽其心未尝不好，而才不足以济之。

这里谈的是“鉴别”的重要性。《藏书十约·鉴别》说：

> 四部备矣，当知鉴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录始……不通目录，不知古书之存亡。不知古书之存亡，一切伪撰抄撮、张冠李戴之书，杂然滥收，淆乱耳目，此目录之学，所以必时时勤考也。

这里谈的是鉴别方法之一。此外，清代学者已经开始采用审查行款、字体、讳字、藏书印等手段鉴别版本。对于那些千变万化的作伪之书，也能明察秋毫，还其本来面目。清代学者大多精于校勘，他们非常注意从内容上鉴定版本，使版本鉴定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除了版本学的零星论述之外，清代还出现了集中论述版本学诸问题的专门著作，杨守敬《藏书绝句》、叶德辉《书林清话》就是这方面的代表。[①]《藏书绝句》汇集了殿本、监本、经厂本等32种版本的有关资料，每类资料前冠以七言绝句，评价各类版本，对研究古籍版本有一定参考价值。《书林清话》是清代版本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它广泛论及了版本学领域的许多问题，在罗

---

① 关于《藏书绝句》的著者，说法不一，或以为系王葆心作。

列史料的基础上，间有考辨，堪称清代版本学的总结性专著。另外，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名为记载私人藏书的专著，实则内容多与版本有关。该书之中，关于古代抄书者有125则，关于古代刻书者有61则，关于藏印者有160则，关于校书者有50余则，关于古代书目者有80余则。这些资料为版本研究者所重视。

清代的版本目录

版本目录是考订图书版本的记录，本属于版本学实践的范畴，由于清代版本目录影响较大，有必要专门加以论述。

清代版本目录可分书目、题跋、书影（详第三编第五章第四节）三个大类。清代版本书目数量众多，其荦荦大者如钱曾《读书敏求记》、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和《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缪荃孙《艺风堂藏书志》和《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等，其中《读书敏求记》、《天禄琳琅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影响最大。这里需要考辨一个问题：《四库全书总目》到底是不是版本目录？回答是肯定的。让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一，从著录格式看，《四库全书总目》每书之下均著录版本。如唐徐坚等《初学记》书名下注"内府刊本"，唐王勃《王子安集》书名下注"山东巡抚采进本"，清张尔岐《蒿庵闲话》书名下注"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宋王应麟《姓氏急就篇》书名下注"通行本"，《九章算术》下注"永乐大典本"，等等。《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版本可分六个大类：敕撰本、内府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和永乐大典本。敕撰本又可分御定本、御纂本、御批本、御制本、御注本、

御选本和御编本7种；内府本又可分内府刊本、内府藏本等；各省采进本又可分江苏巡抚采进本、浙江巡抚采进本、福建巡抚采进本、安徽巡抚采进本、湖北巡抚采进本、湖南巡抚采进本、陕西巡抚采进本、山西巡抚采进本、山东巡抚采进本、江西巡抚采进本、两江总督采进本、两淮盐政采进本等10余种；私人进献本又可分两淮马裕家藏本、浙江鲍士恭家藏本、编修汪如藻家藏本等100种左右。第二，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内容来看，或谈版本源流、或论版本鉴定，体现了纪昀、戴震等一代名儒在版本学方面的深厚功底。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论述写本的内容有100余则；论述雕版印刷起源的内容有5则；论述宋代刻书的内容有200余则，其中关于浙江刻书者有43则，关于福建刻书者有25则，关于江西刻书者有21则，关于湖南刻书者有21则，关于江苏刻书者有10则，关于四川刻书者有13则，关于湖北刻书者有9则；关于元代刻书的内容有100余则；关于明代刻书的内容有1200余则，其中关于国子监刻书者有20则，关于藩府刻书者有30余则，关于书帕本者有20余则，关于套印者有40则，关于毛晋刻书者有102则。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考订一书版本源流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宋陆九渊《别本象山集》提要写道：

> 考九渊子持之所作《年谱》云：开禧元年乙丑，持之编遗文为二十八卷、外集八卷，杨简序之。三年丁卯，抚州守括苍高商老刊于抚州，是为初本。又云：嘉定五年壬申八月，张衎编遗文成，傅子云序之，未言刊板与否，是为第二本。是年九月，江西提举袁燮刊其文集三十二卷于仓司，称为持之所哀益，是为第三本。嘉熙四年辛卯，燮之子甫文重刊之，是为第四本……（此本）盖后人选刻之本。

《四库全书总目》十分注意从内容上鉴别版本，全目根据内容鉴别伪本之例有100余则。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带有冠词“别

本”的书名有43例，如《别本茶经》等；带有冠词“残本”的书名有9例，如《残本唐语林》等。“别本”、“残本”的审定，离开内容是无法进行的。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关于善本的论述有30余则，《五百家注音辩柳先生文集》提要说：

> 其本椠锲精工，在宋版中亦称善本。今流传五六百年，而纸墨如新，神明焕发。

这里讲的是刀法、纸、墨等外在形式。《齐乘》提要说：

> 援据经史，考证见闻，较他地志之但据舆图凭空言以论断者，所得究多。故向来推为善本。

这里讲的是内容。可见《四库全书总目》选择善本的标准是形式、内容并重。总而言之，无论就著录格式而言，或就提要内容而论，《四库全书总目》作为版本目录，都是当之无愧的。把《四库全书总目》同宋代的版本目录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宋目稍嫌苟简，而清代版本目录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怎样编制版本目录？清人已经摸索出一套办法，这在版本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是清代版本学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孙庆增《藏书纪要·编目》说：

> 一、编大总目录。分经史子集，照古今收藏家书目行款，或照《经籍考》，连江陈氏书目，俱为最好，可谓条分缕晰、精严者矣。前后用序跋，每一种书分一类，写某书若干卷，某朝人作。该写著者、编者、述者、撰者、录者、注者、解者、集者、纂者，各各写清，不可混书。系宋版、元版、明版、时刻、宋元抄、旧抄、明人抄本、新抄本，一一记清。校过者，写某人校本，下写几本或几册。

二、编宋元刻本、抄本目录，亦照前行款式写。但要写明北宋、南宋、宋印、元印、明印本，收藏跋记、图章、姓名有缺无缺，校与未校。元板亦然，另贮一柜，照式行款写之。柜用封锁，不许擅开。精抄、旧抄、宋元人抄本、秘本、书目，亦照前行款式写。但要写明何人抄本，记跋、图章、姓名有缺无缺……

到了晚清，缪荃孙则进一步把著录方法程式化：

××××几卷

××××撰（撰人上有籍贯或官衔，须照原书卷首抄写），××刊本（何时刊本，须略具鉴别力），每半页×行，行××字，白（或黑）口，单（或双）边，中缝鱼尾下有××几字，卷尾题××××（此记校刻人姓名或牌子），前有××几年×××序，××几年×××重刻序，后有××几年×××跋。××字××，××人，××几年进士，官至××××（撰人小传可检本书序跋或四库提要节抄），书为人××所编集（或子侄所编或自编），初刻于××几年，此则据××刻本重刻者。××氏××斋旧藏，有××印。①

清人题跋汇为专集的有王士禛《渔洋书籍跋尾》、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尾》、陈鳣《经籍跋文》、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顾广圻《思适斋题跋》、瞿中溶《古泉山馆题跋》、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钱泰吉《曝书杂记》、陆心源《仪顾堂题跋》，等等。这些题跋专集可视之为版本考证论文的汇编。

① 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载《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清代版本学实践

清代学者学以致用，他们在藏书、刻书、治学等实践活动中，把版本学变为实用之学。和宋代相比，版本学实践活动更加广泛。

清代藏书家多如繁星，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著录明清藏书家497人，这些藏书家大多精通版本之学，他们非常重视从内容上审定版本。清代藏书家重视宋元旧刻，从藏书室的命名可见一斑：黄丕烈藏宋本百余种，书室因名“百宋一廛”；因藏北宋本《陶渊明诗集》和南宋本汤氏注《陶渊明诗集》，又名“陶陶室”；因购得宋刊严州本和景德官本《仪礼》（亦名《士礼》）、又名“士礼居”。陆心源藏宋本200余种，书室因名“皕宋楼”。吴骞藏上千卷元版书，书室因名“千元十驾”；因藏宋刊本百家注《东坡先生集》，又名“苏阁”。周春藏宋本《陶渊明诗集》和《礼书》，书室因名“礼陶斋”；继而《礼书》不存，书室易名“宝陶斋”；最后连《陶渊明诗集》也被迫卖掉，书室又更名“梦陶斋”。翁方纲藏宋版《施注苏诗》，书室因名“宝苏斋”。蒋汝藻以重金购得宋刊孤本周密《草窗韵语》，书室因名“密韵楼”。汪立藏有宋版《金石录》十卷，书室因名“金石录十卷人家”。从以上室名可以看出，清代藏书家对于宋元旧本的重视程度。为什么清人重视宋元旧本呢？一句话，因为宋元旧本错误较少。当然说宋元旧本错误较少，并不等于没有错误，对宋元旧本也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清代版本学家并不盲目崇拜宋本，例如黄丕烈，他虽然号称“佞宋主人”，但他“非惟好之，实能读之。于其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1]他说：

---

[1] （清）王芑孙：《陶陶室记》。

书有不必宋元旧刻而亦足珍者，此种是也。

——明刻本《栟榈集》跋

凡书不可不细校一通，第就其外而观之，谓某本胜某本，此非定论也。

——校旧抄本《衍极》跋

由此可见，黄丕烈始终把内容作为鉴定版本的主要标准。

清代学者积极参与刻书实践，把版本学理论运用到刻书中去。为了保证刻书质量，精于版本学的刻书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慎选底本。底本优秀是保证刻书质量的先决条件，如果底本不好，就会错误百出，谬种流传。蒋凤藻刻《铁华馆丛书》、黎庶昌刻《古逸丛书》、缪荃孙刻《对雨楼丛书》大多是以宋本作为底本刻印的。第二，严于校勘。校勘也是保证刻书质量的一个关键问题。作为一个校勘名家，顾广圻长期奔走于刻书之家，根据宋于庭《铁琴铜剑楼书目序》和李申耆为顾广圻所作的墓志铭可知，顾氏先后为张敦仁、秦恩复、孙星衍、黄丕烈、胡克家、吴元恭等人校过《文选》、《资治通鉴》、《礼记郑注》、《说文解字》、《唐律疏义》、《韩非子》、《盐铁论》、《古文苑》、《晏子》、《扬子法言》、《骆宾王集》、《吕衡州集》、《列女传》、《焦氏易林》、《抱朴子内篇》、《华阳国志》、《尔雅》等几十种古书。阮元以校刻《十三经》而著称于世。阮校《礼记》，网罗了石经本、岳本、附音本、闽本、毛本、惠栋校宋本、卢文弨校本、段玉裁校本、通志堂本、抚州公使库本等17种版本；阮校《尔雅》网罗了唐石经本、元雪窗书院本、明闽本、明监本、毛本、惠栋校本、卢文弨校本等14种版本；校勘《周礼》、《春秋左传》、《孟子》分别网罗了13种版本；校勘《周易》、《尚书》、《仪礼》分别网罗了10种不同版本；校勘《毛诗》网罗了9种版本；校勘《春秋公羊传》、《春

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分别网罗了8种版本。阮刻《十三经注疏》在质量方面超过了前出各本，成为《十三经注疏》的通行本。第三，重视写版。手写上版是刻书的重要工序之一，好的写工，不仅能够保证内容准确无误，而且其书迹也是书法珍品。书法家许翰屏曾为黄丕烈、秦恩复、孙星衍、张敦仁等多家写版；书法家黄仪为王士禛写《渔洋续集》。还有些人自己亲自挥笔写版，如黄丕烈写《汲古阁书目》和《百宋一廛赋》，张敦仁自书草体《通鉴补识误》。第四，名工刻板。刻工对于刻书来说，也很重要，好的刻工能够减少甚至避免内容新出错误，也能把名家书迹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详第三编第二章第八节)。由于版本学家精于版本，真正懂得刻书，所以他们所刻之书多为藏书家插架之珍。

如果说明代学者不是那么重视版本的话，那么到了清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清代学者很多，尽管他们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是精通版本学却是他们的共同之处，版本学已经成为清代学者的必修课。古籍流传久远，往往豕亥相望，清代学者以校勘为己任，做了大量工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中曾经指出：

> 这种工作，清初钱遵王（曾）、何义门（焯）等人渐渐做起，元和惠氏父子也很用功。乾嘉以后，学者个个都喜欢做。

校勘虽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但它与版本是密不可分的。清末著名版本学家叶德辉也惊呼：

> 盖自乾嘉至光宣百年以来，谈此学（即版本学）者，咸视为身心性命之事，斯岂长恩有灵欤？何沆瀣相承、不绝如

是也！①

清代学者确实把版本学"视为身心性命之事"，"个个都喜欢做"。这里以卢文弨、顾广圻、何焯为例加以说明。卢文弨，号召弓，余姚人，终身校书，每日"昧爽起，翻阅点勘，朱墨并作，几间阒阒无置茗碗处。日且暝，始出户，散步庭中，俄而篝灯如故，至夜半而后即安。宦俸脯修所入，悉以购书，闻有旧本，必借抄之；有善说，必谨录之。一策之间，分别迻写诸本之乖异，字细而必工，今抱经堂藏书数万卷皆是也"。②顾广圻（1766～1835），字千里，号涧苹，元和人。室名"思适斋"，为什么叫思适斋呢？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校勘目录学家》转引他的话说：

> 顾子贫，斋非所能有也。即身之所寓，而思寓焉，而"思适"之名亦寓焉。当其坐斋中，陈书积几，居停氏之所藏，同志之所借，以及敝箧之所有，参互钩稽，以致其思，思其孰为不校之误，孰为误于校也。思而不得，困于心，衡于虑，皇皇然如索其所失而杳乎无睹，人恒笑其不自适。而非不适也，乃所以求其适也。思而得之，豁然如启幽室而日月之，举世之适，诚莫有适于此也。

由此可以看出，顾广圻校书之苦心。何焯（1661～1722），字屺瞻（又字润千、茶仙），长洲人。其先世在元代元统间曾以"义行"旌门，因取"义门"二字作为书塾之名，学者因称"义门先生"。何焯藏书数万卷，自少至老，口不绝吟，手不停披，得宋元旧椠，必手加雠校，"凡经传子史、诗文集、杂说、小说，多

① 《书林清话》卷一。

②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校勘目录学家》。

参稽互证，以得指归。于其真伪、是非、密疏、隐显、工拙、源流，皆各有题识，如别黑白。及刊本之讹阙同异，字体之正俗，亦分辨而补正之。其校定《两汉书》、《三国志》最有名”。[①]《义门读书记》反映了何焯在版本校勘方面的成果，像卢文弨、顾广圻、何焯这样精研版本、刻意校书的学者在清代比比皆是，很难找出一个例外，这说明版本学发展到清代已经蔚为大观，版本学已经成为学者不可一日或缺的学问。

清代版本学兴盛的原因

为什么清代版本学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呢？同宋代一样，跟学术空气与版本数量有关。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把清代学术的成就归纳为十三个方面，即经书的笺释、史料之搜补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之编纂、类书之编纂和丛书之校刻，这十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清代的学术空气有关。清代文网严密，学者回避现实，埋头考据。乾嘉学派的知名学者有惠栋、江声、余萧客、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等60余人。他们从校订经书扩大到史籍和诸子，从解释经义扩大到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历史地理、天算乐历，等等，把一切学问都纳入考据的轨道。进行考据，首先必须阅读完整无误的原著，指望那些残缺不全、错误百出的本子是靠不住的。这样，版本问题自然作为首要问题，摆在学者面前，因为“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重要”。[②]段玉裁《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说：

---

① （清）沈彤：何焯《行状》，见中华书局1987年版《义门读书记》附录。

② （清）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

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

段氏所谓"正底本"就是要订正版本的错误，还底本的本来面目，这是校书的第一步，也是考据的第一步。考据学的发展促进了版本学的兴盛。另外，明清两代雕版印刷的繁荣，造就了难以数计的图书版本，为版本学研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五、当代古籍版本学

古籍版本学研究代不乏人，后来居上。当代古籍版本学研究继承了前人的优良传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在古籍版本学领域出现了大量著作，其中版本目录有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阳海清《中国丛书综录补正》、韩锡铎等《小说书坊录》、《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题跋有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和《涉园序跋集录》、郑振铎《西谛书话》、叶景葵《卷庵书跋》、潘景郑《著砚楼书跋》、赵万里《芸庵群书题记》、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等；专著有钱基博《版本通义》、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和《中国印刷史》、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吴则虞《版本通论》、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和《古籍版本鉴定丛谈》、戴南海《版本学概论》、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和《历代刻书考述》等。其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国家书目，它是建国以来古

籍版本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该目于1979年开始编纂，五易寒暑，于1983年蒇事。五年之中，数百名专家同心协力，或切磋琢磨，或鱼雁往还，或舟车访书，未尝稍息，付出了艰巨的劳动。该目共著录782家的古籍善本，其编目人数之多、著录藏家之广、卷帙之富，都是史无前例的。李一氓同志在《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出版》一文中说：

> 从前公私书目都是极个别的，现在这部是全国的古籍善本书目，包罗宏富，任何一部从前的书目都赶不上。这是近年中国图书事业一个最大成就。
>
> ——载《人民日报》1986年9月15日

从内容上分析，上述著作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在使用古籍版本学术语方面，日趋规范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①专业术语模糊、概念不明是学科水平低下的标志，专业术语的准确性和规范化是一门学科发展的起点。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在这方面作了积极的努力，该书对220多个版本学术语作了解释，对推动版本学术语规范化起了一定作用。

（二）重视图书制作方式演变源流的研究，把它作为古籍版本学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张秀民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他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中国印刷史》等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张先生是大家共认的中国印刷史专家。另外，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和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也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

（三）在单种图书版本源流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49年到1981年，全国就整理出版文史

① 《论语·子路第十三》。

哲古籍1561种，① 其中不少古籍在整理过程中，对各书版本源流进行了认真清理，选取善本作为校勘底本。另外，也出版了不少考证单书版本源流的专著，如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万曼《唐集叙录》等，其中《唐集叙录》功力尤深，该书对108家唐人别集的版本源流梳析极精，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版本学论著。

（四）摸索到一套鉴定古籍版本的规律。怎样鉴别版本？古人在实践方面已经摸索出一些经验，但这些经验缺乏系统性，有的经验甚至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古籍版本鉴定成了当代版本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许多论著对版本鉴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魏隐儒《古籍版本鉴定丛谈》、戴南海《版本学概论》、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等都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版本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除了根据形式特征鉴定版本之外，不少学者尤其重视根据内容鉴定版本。张元济、傅增湘、王重民等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他是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人，著名出版家和版本学家，著有《校史随笔》等书。张元济先生非常重视从内容上鉴定版本。例如《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一书，经前人鉴定，认为前两卷为毛氏汲古阁据宋刻影写，余十八卷出于宋刻。张元济先生根据该书官名、地名、年号等记载，认真考证，认定此书不是宋刻而是蒙古刻本。为了审定版本内容，张元济先生尤重校勘。《校史随笔》就是他刻意校书的忠实记录。1939年，他已73岁高龄，仍然冒着酷暑复校《刘弘嫁婢》校本，将错漏之处一一签注。曾经在张元济身边工作过的王绍曾先生在《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一书中说：

我在（商务印书馆）校史处工作期间，亲自见到张先生

①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古籍整理编目》（1949～1981）。

校阅的毛样，总是蝇头细楷，丹黄满纸。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几部大书，张元济先生在选择底本方面真是千方百计、呕心沥血，正如顾廷龙先生所说：

> 先生对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有深邃造诣，充分体现于《四部丛刊》的初、二、三编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编校、影印工作中。皇皇巨编，非有高深的学养，难能作出弘大的规划，博访古本、善本，非熟悉中外藏书情况，难以集事；搜罗异书，发扬特点，非有渊博的学问，不克有所发明。至于辨析版本，他不仅注重其一卷一册，进而精求其书之每一页。因为同一版本，此本与彼本之间，既有清朗与模糊之别，又有复页与脱倚之差，前人谈版本的均不及此。①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著名教育家和版本学家。主要著作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宋代蜀文集要》、《藏园群书经眼录》、《清代典试考略》等。利用内容鉴定版本是傅增湘的主要方法，他酷爱校书，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无时或间。《藏园群书题记》中许多篇章的版本考证都与校书有关。他曾用重金购得一部明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刻本《文苑英华》，该书杀青仓卒，讹误孔多，傅增湘先生以超人的毅力，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校完这部千卷大书，单是增改删乙之字就有四五万个，他在《藏园群书题记·校本文苑英华跋》中记述了校书的全过程：

> 始于丙子九月之杪，览开宗明义之章。始意日竟三卷，

① 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第135页。

经年可以讫工，而人事拘累，作辍不恒，兼以春秋胜日，例作山游，北马南船，一出辄经旬月，立志不坚，初计遂左。迄于丁丑残腊之日，仅得五十六卷。玩时惕日，私用自惭。遂锐意奋起，严定课程，自戊寅正月落灯节起，日以二卷为率，其或偶有参差，则以时之闲冗为卷之赢缩，日晷不足，则继以深宵，人事相缠，则避之别馆。当其目营心注，客至或忘其酬对，食息常致于愆期。延及仲冬，月瓘十更，勘成六百余卷。适以纂修《绥远通志》，暂辍此功。今岁正月之杪，重理日课，逾春涉夏，昕夕靡遑，至七月十九日幸而获竟全功。此九百四十余卷，历时四百有五十日，颓景侵寻，情怀牢落，日暮途远，俯仰咨嗟，几欲辍废者数矣。卒以镞砺矢心，坚持不舍，深凛垂成之戒，私奋炳烛之明，幸藉余光，卒偿始愿。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号冷庐主人，河北高阳人，著名目录学家和版本学家，主要著作有《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目录学史论丛》、《老子考》、《敦煌古籍叙录》等。王重民先生考订版本也很重视内容，《中国善本书提要》就是最好的说明。著名历史学家谢国祯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序》中曾说：

读一部书，要能够知人论世，与明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的情况不能分开。有三兄读书、做事皆极为认真，所以他著的提要，对于古籍的内容，主要的篇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情况，与所交往的人物，所谈的都是确凿有据，言之成理。尤其是有三兄湛深精思，考订事物版本具有真知灼见，如我藏有一本缪荃孙批校宋朱彧著《萍洲可谈》，经他和觉明（向达之字）兄审阅，认定是一个伪本，但确是宋人所著的另一部笔记。这样，既纠正了前人之失，又在宋人

笔记中多发现了一部新的著述，实在是一件发潜彰幽的益事。

（五）古籍版本著录规范化。建国以来，有关方面为实现古籍著录规范化作了不懈的努力。为了便于馆际交流和国际交流，1987年国家标准局正式颁布了《古籍著录规则》，这个规则对于准确描述古籍版本、反映古籍版本学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取得以上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一）国家重视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自上而下，设立了不少古籍整理与出版的专门机构，专业人员大量增加。（二）古籍版本学历史悠久，今人借鉴了古人的研究成果，古为今用，起点较高。（三）古代藏书分散，不重流通。善本秘籍，学者罕觏。而今古籍收藏单位相对集中，古籍成了公共财产，为学者研究古籍版本提供了方便。

当然，当代古籍版本学研究也有不足之处，例如对古籍版本学的基本理论和古籍版本学史的研究非常不够；在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的研究中，对于写本的研究比较薄弱；在版本鉴定实践中，根据内容鉴定版本的优良传统没有发扬光大；古籍版本学同仁缺乏交流研究心得的场所和机会，等等。当然，以上缺点与其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编　中国古籍版本源流

第一章　写本源流

一、先秦两汉写本

先秦两汉的文字主要写在竹木和缣帛上。写在竹木上的称为“简策”；写在缣帛上的称为“帛书”。这两种书虽然已不多见，已经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但是须知：它们是我国古籍之“源”，是先秦两汉古籍的“一传手”，它们的功劳是很大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它们。

简策的外形

简策的制作材料主要是竹，古代文献中有不少记载说明竹曾是文字的载体，《吕氏春秋·明理》云：

> 乱国所生之物，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也。

《汉书·公孙贺传》云：

> 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

“罄竹难书”的成语也反映了古代以竹写书的事实。简策很可能始于南方。只有南方，才能够提供大量的竹材。湖北云梦睡虎地

秦墓出土的简策全是竹简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北方，不产竹子，只好削木代竹，因此，武威、楼兰、疏勒河出土的汉简全是木简（图3）。可以用来制简的木材很多，有松木、柳木等。《太平御览》卷六十引用《楚国先贤传》的话说："孙敬编杨柳简以为经本，晨夜诵习。"可见孙敬读的书就是杨柳木制成的。木材不仅可以制作简策，还可以制作版牍。什么是版牍？就是用木版写成的书。版牍比木简要宽，一尺见方的版牍又叫"方"。成语"连篇累牍"中的"牍"字正反映了古代以木板写书的历史事实。简策和版牍的用处不一样，《仪礼·聘礼》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这就是说，超过100字的长文写在简策上，不足100字的短文写在版牍上。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云："诸侯亦各国有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就是说，大事写简策上，小事写版牍上。还有一种专供练习书法或纪事的版牍，叫做"笘"、"籥"或"觚"。许慎《说文解字》释"笘"："颍川人名小儿所书写为笘。"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笘谓之籥，亦谓之觚。盖以白墡染之，可拭去再书者，其拭觚之布曰幡。"可见，笘、籥、觚三字作为载体，含义是相同的。唐颜师古注解"急就奇觚与众异"时说："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盖简属也。孔子叹觚，即此之谓。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成语"率尔操觚"之"觚"也是版牍的意思。

简策长短不一，王充《论衡》说："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也就是说，汉代简策长度是由内容决定的，经书用长简，传记用短简。又据《后汉书·光武帝本纪》注引《汉制度》云：

> 帝下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

可见，策书有二尺、一尺、一尺一寸三种规格。给诸侯下达命令，用二尺简或一尺简；罢免三公之职，用一尺一寸之简。另外，汉代皇帝发布的征召、声讨的文书，叫做"檄"，"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①文人著书立说，一般使用二尺四寸简，例如东汉曹褒撰《新礼》就是写在二尺四寸简上的。②从出土文物来看，简策长短差别很大，长者如山东银雀山出土的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历谱》，简长69厘米，折合汉尺3尺；短者如长沙伤家湾出土的战国竹简，长仅13.5厘米，折合汉尺6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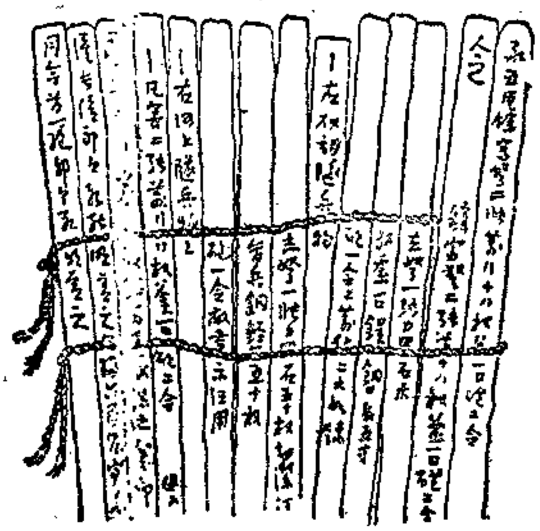


图3　木简

每简的行数大体是一致的，即每简大多一行，也有用两行的，如上所述，罢免三公之职的策书为两行。每简字数因书而异，同一种书的字数基本相同，据《仪礼·聘礼疏》：

① 《汉书·高帝本传纪》。

② 《后汉书·曹褒传》。

郑注《尚书》三十字一简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

出土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武威《仪礼》汉简多60字为一简，儿童启蒙读物《六甲篇》多20字为一简。

秦简字体为小篆、秦隶等。小篆是秦代官定字体，使用较多。但篆字难写，隶书简易，使用价值更大，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用的就是秦隶。汉简字体比较复杂，有篆、隶、草、分书（今隶）、真、行诸体。至于各简采用什么字体，与内容、抄手、抄写时间有关。就内容而言，信札之类则随意草率，书籍章表则严整规范。同是策书，字体也不一样：如上所言，皇帝给诸侯下达命令的策书，用篆书；皇帝罢免三公之职的策书，用隶书。就抄手而言，全书如出一手，则首尾如一；全书如出众手，则风格各异。就抄写时间而言，西汉和东汉是不一样的，西汉处于秦汉书体变革之际，旧体未绝，新体方兴，各体并出，如居延汉简就有篆、隶、分、草、真、行等多种字体；从西汉末到东汉，隶书已经发展成熟，如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都是隶书。

简策正文写好之后，还要写上篇名、篇次、简数，有的还有尾题。篇名、篇次多写在简背，武威汉简甲乙二本都写在简背第二道编绳之下，篇名在每篇第二简背，篇次在第一简背，这与我国古代自右向左读书的习惯是一致的。简数相当于后来纸书的页数，一般写在一简正面（或背面）的下端，其目的有二：一是便于翻检；二是为了防止编绳断烂之后造成脱简、错简。尾题一般在每篇末简的正面下端，尾题内容多记本篇字数。全书尾题还有题写篇名目录之例。如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论语》有尾题残简十枚，上面写了各篇的章数和字数，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也有篇题目录数简。

简策的制作

简策的制作方法可分五步：第一步，截制竹简。王充《论

衡》所谓“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就是先把竹竿截成竹筒，然后把竹筒劈成竹片——牒，牒就是竹简。竹简要磨平，尤其要削平竹节隆起部分。根据武威汉简判断，磨平之后似乎还用一种特殊的液体涂染过，简面略有光泽。第二步，杀青。杀青就是把竹简烘干，以防虫蛀和腐烂。《太平御览·文部二十二·简》转引《风俗通》的话说：

> 刘向《别录》云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

武威出土汉简至今未有虫蛀，出土后风化干裂成丝，说明缮写前是经过杀青这一步骤的。因为杀青去汗，是制作简策书籍的重要步骤，所以后来人们索性用“汗青”代表书籍，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里“汗青”代表史书。第三步，把零简编连成册。编简所用的材料有麻绳、丝绳等。例如汲冢竹书《穆天子传》用的是丝绳；居延汉简用的是麻绳。每册编几道绳？与简的长短有关，从武威汉简来看，至少一道，至多五道。凡编绳经过之处，简棱上刻有极小的三角形契口，用来固定编绳，使其不致上下移动。在编连时，简策开头常常另加两枚无字之简，叫“赘简”。赘简有两个作用：一是保护正文；二是利用简背书写篇名、篇数。古人学习勤奋，为了不耽误晚上读书，就利用白天放牧牛羊的机会把简策编好。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云：

> 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

第四步，缮写正文。是先编后写，或是先写后编？一般是先编后

写，因为竹简数量很多，如果先写后编，先后次序容易弄乱，会给编连工作带来许多麻烦。东汉苏竟曾自我介绍说：

> 走昔以摩研编削之才，与国师公（即刘歆）从事出入，校定秘书。①

从“编削”二字的排列顺序可知，当时抄写图书是先编后写的，写时出现错误，即行削去。又东汉周磐命终之日，令二子“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②这里也是先编后写。但一些流水帐似的簿记是先写后编的，如居延出土的《永元器物簿》便是这样，它以五个月的五种兵器簿编成。毛笔和书刀是书写简策的两种重要工具，晋张华《博物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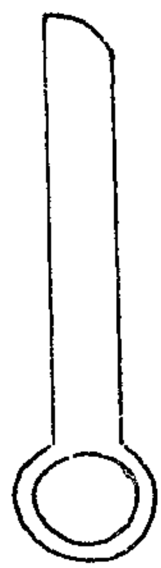


图4　书　刀

> （王充）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万言。

这不仅说明了王充的勤奋，也反映了毛笔和书刀确实是汉代的书写工具。《后汉书·刘盆子传》云：

---

① 《后汉书·苏竟传》。

② 《后汉书·周磐传》。

至腊日，（樊）崇等乃设乐大会，盆子坐正殿，中黄门持兵在后，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笔，书谒欲贺，其余不知书者起请之。

《后汉书·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云：

（韩馥）至厕，因以书刀自杀。

以上二例说明汉人常常随身携带书刀，就象我们现在随身携带钢笔一样。书刀的刀身呈长条形，柄呈环形，刀身一面有铭文，一面有图案（图4）。东汉李尤有《金马书刀铭》云：

巧冶炼刚，金托于刑。贡文错镂，兼勒工名。淬以清流，砺以越石。①

李尤是四川广汉人，四川（尤其是广汉）是汉代书刀制造中心之一。另外，出土文物也提供了有力证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发现有毛笔和削刀，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发现有毛笔、墨、砚和青铜削刀。武威汉简还提供了削改之例：简上被削去薄薄一层，补写之字，墨向四周润开，一望而知。当然，还有一种不用刀削的涂改方法，即刚刚写过就发现错误，马上用水或唾液擦掉，重新书写，留下涂抹痕迹。第五步，收尾工作。收尾是制作简策的最后一道工序，它包括切边、卷起、加帙等手续。切边就是把简片上端排齐后，将简片下端不齐的部分裁去。《说文解字》释"等"曰："齐简也。"就是裁齐竹简的意思。武威汉简页数第二字多不完整，就是简策切边的明证。切边之后，以最后一简为中轴，把简策收卷起来，有字的一面（即简面）在里，简

① （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汉李尤集》。

背在外。为了防止松散，简策卷起之后，外面裹以书衣，盛在书篋、书筒内。书衣常用浅黄色或浅蓝色的丝帛制成，浅黄色的称为“緗帙”，浅蓝色的称为“縹帙”，或笼统称为“緗縹”。书帙的具体做法是：先用细竹条织成帘子，然后在竹帘的表里缝上丝帛，为了便于擦掉灰尘，有的还在丝帛上涂一层油。因为緗縹是古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后人常用“緗帙”、“縹帙”或“縹緗”代称书卷。当然，丝帛比较贵重，穷人用不起，常用它物代替。例如战国游士张仪、苏秦未发迹时就曾用树皮作书衣，据晋王嘉《拾遗记》说，张仪、苏秦“每假食于路，剥树皮为书帙，以盛天下良书”。以上就是制作简策的全过程。

帛书的形制

竹木原料易得，但比较笨重，秦始皇每天处理的公文要按石计，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每石约合现在60公斤。东方朔给皇帝写了一封信，竟用了三千枚竹简，需要两个人才能抬动，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

> （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任之……（武帝）读之二月乃尽。

由于竹木不便阅读，于是人们或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早在春秋时，已有关于帛书的记载，《晏子春秋》卷七云：

> 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

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

就是说，桓公给诸侯的封地，以帛书为证。《墨子》一书多次提到“书于竹帛”的话，《韩非子·安危篇》说“先王寄理于竹帛”。这说明帛书在战国时已相当普遍。《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序》说，《诗经》“遭秦而全者，因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就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烧了大批竹帛制作的图书，《诗经》因家弦户诵，深入人心，所以才完整流传下来。

帛书的形制，文献没有详细记载，《后汉书·襄楷传》说：

> 初，顺帝时，琅玡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

这说明帛书是有界行的。《初学记·文部》说：

> 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

这说明帛书长短是依内容多少截取的，内容少就短些，内容多就长些，总而言之，是写完了再裁。帛书写好之后，多半以卷轴装的形式存放，也有用折叠的形式存放的。帛书的优点是轻便，文字容量大，便于折叠舒卷。但也有两个明显缺点：一是存放时间长了，容易腐烂；二是比较贵重，一般穷人用不起。因此，帛书出现以后，并不能取简策而代之，竹简仍然是主要的书写材料。

先秦两汉帛书在古墓中发现数次，其中有两次比较重要：第一次是解放前在长沙子弹库战国中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楚帛书。这件帛书包括《四时》、《天象》和《月忌》三篇文字，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帛书实物。从古文字的角度看，这件帛书是楚国古文的最完整的长篇，包含的字数最多，有许多字至今还难以识

别，有待进一步研究。第二次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大量帛书。帛书原藏在一个长方形漆奁里，多数折叠成长方形，少数卷在木板轴上，经专家整理，这批帛书总共包括28种图书。从内容、字体、避讳等方面观察可知，其抄写时间是战国末年，最晚的到汉文帝初期，其书写字体有的是篆书，有的是早期隶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由小篆到汉隶的发展过程。有一件暂名为《篆书阴阳五行》的帛书，保留了许多楚国"古文"的写法，对我们研究从战国到汉初文字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代写本

汉代官方非常重视抄书。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诏令"置写书之官"。① "写书之官"是指专门负责抄书的机构，属于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诏刘向等整理国家藏书，每书《叙录》之后都有"杀青而书，可缮写也"之类的话。可见，《七略》著录的13219卷图书都是新写之本。不仅如此，汉代政府还随时注意搜访民间藏书，每遇好书，辄令抄写收藏。例如东汉著名学者贾逵精通《左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② 汉代私人抄书首推河间献王刘德，他用精写本换取民间真本，抄书数量"与汉朝等"。③ 另外，司马迁、梁子初、杨子林、班超等人也抄了不少书。司马迁写成《史记》之后曾说：

> 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④

---

① 《汉书艺文志·序》。

② 《后汉书·贾逵传》。

③ 《汉书·景十三王传》。

④ 《史记·太史公自序》。

说明《史记》于正本之外，还抄了一副本。《史记》全书数十万言，简策堆积如山，对于刑余之人来说，抄写两遍所付出的艰巨劳动是可想而知的。梁子初、杨子林抄书的事迹见于桓谭《新论》：

> 余同时佐郎官梁子初、杨子林好学，所写万卷，至于白首，尝有所不晓，百许寄余。余观其事，皆略可观。

梁子初、杨子林终生抄书，积至万卷，其抄书之勤，不言而喻。班超（32～102），字仲升，扶风平陵人，东汉外交家、军事家，少时"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①可见班超小时候曾以抄书为业，只是到了后来，不安于现状，才投笔从戎。汉代经学是个热门，经书全凭手抄。熹平石经建成之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②可见写经之人的确很多。

总而言之，先秦两汉时期是简策帛书盛行的时代。由于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较少，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今后，随着出土文物的大量出现，一定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实物资料，从而把我们的研究工作推向前进。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写本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是写本书的重要时期。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间，虽然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但是，战争形成和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各民族互相取长补

---

① 《后汉书·班超传》。
② 《后汉书·蔡邕传》。

短，因而经济、文化也有了较大发展。唐代社会比较安定，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为图书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国写本

三国曹魏见于记载的抄书者有蔡琰等。蔡琰，字文姬，陈留人，蔡邕之女，著名女诗人。相传《胡笳十八拍》就是她的作品。她一生的生活道路相当坎坷，起初嫁给河东卫仲道为妻。"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后在曹操的帮助下，得以免死，"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① 蔡琰继承先父遗书4000余卷，后来全部毁于战火，她根据自己的记忆，完整无误地抄写了400多篇，挽回了部分损失。

晋代写本

晋代官方抄书记载不多，西晋惠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国子祭酒裴頠曾"奏修国学，刻石写经"，② 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晋代民间抄书可考者有葛洪、纪瞻、范汪等。

葛洪（284～364），字稚川，丹阳句容人。著有《抱朴子》等书。史书称其"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③

---

① 《后汉书·列女传》。

② 《晋书·裴頠传》。

③ 《晋书·葛洪传》。

纪瞻，字思远，丹阳秣陵人，"性静默，少交游，好读书，或手自抄写"。①

范汪，字玄平，"年十三丧母，居丧尽礼，亲邻哀之。及长，好学，外氏家贫，无以资给。汪乃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然薪写书。写毕，诵读亦遍，遂博学多通，善谈名理"。②范汪家里贫穷，燃柴借光抄书，其好学可知。

晋代图书的制作方式全靠人工手抄，可以说是无书不抄。"洛阳纸贵"的典故就说明了晋代抄书的普遍性。左思《三都赋》写好之后，不为人重，后来，皇甫谧写了篇序言，大加赞扬，张载、刘逵、卫权又先后为之注解，"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③为了抄《三都赋》，人们抢购纸张，纸价为之暴涨，抄家之多，于此可见。由于现在去晋已远，晋代抄本已经非常罕见。1924年新疆鄯善出土的《三国志》残卷，是现存最早的晋代写本之一。

南北朝写本

南北朝时期官方抄书见于记载者有六次：第一次是在宋文帝元嘉年间。文帝"使秘书监谢灵运整理秘阁书，补足遗阙"，④"补足遗阙"的主要手段就是抄写。第二次是在南齐永元末。当时"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王）泰为丞，表校定缮写，武帝从之"。⑤第三次是在梁武帝天监初年。诏令张率抄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勒成百卷，使工书人琅邪王深、吴郡范怀约、褚洵等缮写，以给后宫"。⑥第四次是在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年）。这一年，"到洽迁司徒主簿，直待诏省，

① 《晋书·纪瞻传》。
② 《晋书·范汪传》。
③ 《晋书·左思传》。
④⑤ （清）朱铭盘：《南朝宋会要·文学·藏书》。
⑥ 《梁书·张率传》。

敕使抄甲部书”。①第五次是在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这年张率“除中权建安王中记室参军，俄有敕直寿光省，治丙丁部书抄”。②至此，梁武帝天监年间把四部群书全部抄了一遍。第六次是在北魏孝庄帝时，这次抄书数量很多。但是，抄后有一年多没有编目，乱七八糟。后来，孝庄帝令高道穆编写秘书目录。③除了上述规模较大的抄写活动外，官方亦把聚书、抄书当作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如南朝陈武城人张讥著述甚丰，计有《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后主尝敕人就其家写入秘阁”。④北齐魏收所撰《魏书》除了正本之外，还由官方组织抄了一个副本，据《北齐书·魏收传》记载：

> 及诏行魏史，收以为直置秘阁，外人无由得见。于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邺下，任人写之。

北齐神武皇帝长子高澄曾鸠集书手抄过类书《华林遍略》，据《北齐书·祖珽传》记载：

> 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即高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

可见高澄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抄写《华林遍略》的。

南北朝私人抄书可考者有宋王准之，南齐沈驎士，梁臧逢世、袁峻、王筠，陈郑灼，周裴汉等。

①② （清）朱铭盘：《南朝梁会要·文学·藏书》。
③ 《魏书·高崇传》。
④ 《陈书·儒林传》。

王准之，字元曾，琅邪临沂人，任宋丹阳尹，生前抄书甚多，死后“有遗抄一箧，谓之青箱学”。①

沈驎士，字云祯，吴兴武康人，藏书数千卷。在他80多岁时，一场火灾把其藏书全部烧光，但他并不灰心，“手以反故（即纸背）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②

臧逢世，东莞人。他在20多岁的时候，“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手写一本”。③《汉书》共计100卷、数百万言，抄写一遍，实属不易。而且家贫无纸，全用名片书信纸边抄成，更属难得。

袁峻，字孝高，陈郡阳夏人，“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④每天抄50张纸，每纸以200字计，则总计10000字，抄书速度是相当快的。

王筠，字元礼（一字德柔）。他曾说过：

> 余少好书，老而弥笃，虽偶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自年十三四，齐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六载矣。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⑤

王筠坚持抄书4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① （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二。
② 《南齐书·沈驎士传》。
③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
④ 《梁书·袁峻传》。
⑤ 《梁书·王筠传》。

郑灼，字茂昭，东阳信安人，“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①郑灼家里实在太穷，连毛笔都买不起，笔毫写秃了，将笔头修尖之后继续抄写，其刻意抄书如此。

裴汉，字仲霄，河东闻喜人，“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②

隋唐写本

隋朝享国日浅，但对发展图书事业相当重视，政府各个部门都配备了大量专业书手，单是中书省就有书手200人。③秘书省有书手20人。④这些专业书手是抄写图书的重要力量。隋朝官方抄写佛经以外的各类图书共有三次：第一次抄写是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这年，文帝根据秘书监牛弘的建议，派员到各地搜访图书，“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⑤当时有个名叫刘炫的人，“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⑥“录”即抄写之意，可见刘炫所上伪书，也是写本。第二次是在开皇九年（589年）平陈之后。第三次是在隋炀帝即位之后（后两次参见第一编第三章第二节）。

唐代官方大规模地抄书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在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当时国家初定，图书在隋末战乱中亡佚殆尽，令狐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⑦几年以后，常用书基本抄齐。第二次是在太宗贞观年间。太宗“命秘书监魏徵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

---

① 《陈书·儒林传》。
② 《周书·裴汉传》。
③ 《隋书·百官上》。
④ （唐）张九龄：《唐六典》卷十。
⑤ 《隋书·经籍志》。
⑥ 《隋书·刘炫传》。
⑦ 《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人。徵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毕。显庆中，罢雠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其酬佣，择散官随番雠校”。[1]魏徵出任秘书监的时间是贞观二年(628年)，从贞观二年一直抄到高宗显庆中，历时30余年，抄书之多，可想而知。第三次是在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著名学者褚无量主持了这次抄写工作。褚无量“以内库旧书，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渐致遗逸，奏请缮写刊校，以弘经籍之道。玄宗令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纵观焉。开元六年驾还，又敕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功”。[2]到开元八年（720年）褚无量死的时候，还没有抄完，“临终遗言以丽正写书未毕为恨”。[3]为了广求异书，在开元七年（719年）时，曾“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4]第四次是在唐文宗时。当时“郑覃侍讲禁中，以经籍道丧，屡以为言，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5]除了上述四次带有突击性质的抄写活动外，平时官方也从未停止抄书，据《旧唐书·吐蕃上》记载：

>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吐蕃使奏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

唐代政府各个机关都配备有专事抄写的书手，据张九龄《唐六典》记载，唐玄宗时，集贤院有书直及写御官100人、装书直14人、造笔直4人；秘书省有校书郎8人、楷书手80人、熟纸匠10人、装潢匠10人、笔匠6人；著作局有楷书手5人；太史局有楷书手2人、装书历生5人；弘文馆有楷书手75人、笔匠3人，熟

① 《旧唐书·崔行功传》。

②③ 《旧唐书·褚无量传》。

④⑤ 《旧唐书·经籍志》。

纸装潢匠8人；司经局有楷书25人。这些书手除了抄写公文之外，兼事抄书。集贤院有位书手叫阳城，北平人，“代为宦族，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房，经六年乃无所不通”。① 到官府充当书手，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出身官宦，二是书法优秀。唐太宗时，入弘文馆抄书，必须是五品以上子弟。② 阳城虽家中贫穷，但他“代为宦族”，还是符合应聘条件的。唐代官方抄书知多少？开元年间，“凡四部库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③ 这些书在安史之乱中亡佚殆尽。后来肃宗、代宗、文宗等帝又陆续搜购抄写数万卷，这些书在唐末毁于战火。

唐代民间抄书，以柳仲郢、吴彩鸾等人为最著名。

柳仲郢，字谕蒙，京兆华原人，柳公绰之子。据《旧唐书·柳公绰传》记载：

> （柳氏）退公布卷，不舍昼夜，《九经》、《三史》一抄；魏晋以来南北史再抄。手抄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

吴彩鸾是古代女子抄书的著名代表，据《列仙传》记载：

> 吴猛之女彩鸾，遇书生文箫于道，竟许成婚，箫贫不自给，彩鸾写《唐韵》，运笔如飞，日得一部，售之，获钱五缗。复写如是一载，稍为人知。遂潜往共新越王山，各跨一虎，陟峰峦而去。④

---

① 《旧唐书·阳城传》。

② 《新唐书·艺文志》。

③ 《旧唐书·经籍志》。

④ 《书林清话·女子抄书》。

吴彩鸾成仙的说法虽然并不可信，但她以抄书著称，却是一个事实。吴彩鸾除了抄《唐韵》之外，还抄有《广韵》、《玉篇》、《法苑珠林》等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是古代诗歌的黄金时代，作诗离不开韵书，陆法言《切韵》和孙愐《唐韵》非常流行，写本到处可见。王国维曾经在《观堂集林·艺林》中指出：

> 唐人盛为诗赋，韵书当家置一部，故陆、孙二韵当时写本当以万计。陆韵即巴黎所藏三本已有异同，孙韵传之后世可考见者，除鹤山所藏外，如欧阳公见吴彩鸾书页子本、黄山谷所见凡六本，鲜于伯机藏一卷，传写既多，故名称部目不能尽同。

除了柳仲郢、吴彩鸾之外，还有不少关于唐代抄书的记载，例如韦述"好谱学，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百氏源流，转益详悉"；① 韦温之女"适薛蒙，善著文，续曹大家《女训》十二章，士族传写，行于时"；② 白居易、朱庆余等著名文人的作品也是抄传的（参见第二编第二章第六节）。另外，《敦煌遗书》中也有不少唐写本，如《食疗本草》、《太公家教》、《兔园册府》、《秦妇吟》、《云谣集杂曲子》、《春秋后语》、《道德真经疏》等。《新唐书·艺文志》有隋侯白著《启颜录》十卷，失传已久，唐开元十一年（723年）写本，今存《敦煌遗书》中（详《斯坦因劫经录》0610）。唐写本李隆基撰《道德真经疏》可考唐代避讳制度。该书第八章经文"心善渊"，为避高祖李渊讳，"渊"字缺末笔；疏文"心善渊"，写作"心善泉"，以泉代"渊"。第三章疏文"云自随龙，风常随武"，其中"武"字本作"虎"，避太宗祖李虎讳，以武代之。

---

① 《旧唐书·韦述传》。
② 《旧唐书·韦温传》。

（详《伯希和劫经录》2823、3592）由此可知，唐人避讳的方法是：讳字在经文，则缺笔；讳字在注文，则用代字。

五代写本

五代时期，群雄各自偏安一隅，文化事业颇有可观，虽然监本经书已经付梓刊行，但是抄书仍然是当时图书的主要制作方法，杨邠、查文徽、文谷、王景绝、林鼎、韩熙载等都是五代抄书的主要代表。

杨邠，后汉魏州冠氏人，官至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居家谢绝宾客，晚节稍通缙绅，延客门下，知史传有用，乃课吏传写"。①

查文徽，字先慎，南唐休宁人，"幼好学，能自刻苦，手写经史数百卷"。②

文谷，后蜀成都温江人，"所撰《备忘小抄》十卷，杂抄子史一千余事，以备遗忘，世多传写之"。③

王景绝，后汉人，"时时购四方书抄之，晚年集书数千卷"。④

林鼎，字焕文，吴越侯官人，"性谠正而强记，能书欧虞法，比及中年，夜读书每达曙。所聚图书悉由手抄，其残编蠹简亦手缀之，无所厌倦"。⑤

韩熙载，字叔言，南唐北海人，五代书画家，"性喜提奖后进，见文有可采者，手自缮写，仍为播其声名"。⑥又据记载，后唐滑州郑遨"时时为诗章落人间，人间多写以缣素，相赠遗以

① 《新五代史·杨邠传》。
②⑥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南唐》。
③ 同上书《后蜀》。
④ 同上书《北汉》。
⑤ 旧题（宋）林禹等：《吴越备史》卷三。

为宝，至或图写其形，玩于屋壁”。①

魏晋至五代写本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写本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魏晋至五代时期是文字载体和图书制作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造纸成功是中国出版史、也是世界出版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但是，造纸作为新生事物，其推广和应用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东晋，纸张才渐渐普及，南北朝时期才得以广泛使用。纸张的广泛应用，大大促进了图书的繁荣。据记载，东晋末年，“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② 宋武入关的时间是公元420年，11年之后，即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谢灵运编目的时候，书数猛增到14582卷，比11年前增加了三倍多。当然，影响书数的因素很多，但纸张的广泛应用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图书制作方式也不例外。当魏晋南北朝写本臻于极盛之际，人们对于图书的需求日渐增多，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人工抄写效率低等弱点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样，一种新的图书制作方式的产生呼之欲出，雕版印刷便应运而生（详本编第二章第七节）。

第二，就写本内容而言，可分全本、节本两个大类。全本即全抄之本，节本即节抄之本。全本便于系统学习，有助记忆；节本便于提纲挈领、撷取精华。当然，节抄有一个选择的问题，难度较大。好的节本常常被人们当作新书来读，不少学者都节抄了许多书。例如晋葛洪节抄《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等；晋郭璞节抄京、费诸家精华若干卷；梁张缅节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

① 《新五代史·郑遨传》。

② 《隋书·经籍志叙》。

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① 庾仲容"抄子书三十卷、诸集三十卷，众家地理书二十卷，《列女传》三卷、文集二十卷，并行于代"；② 陈陆瑜为了辅导皇太子学习，遵命节抄子集群书，"未就而卒，时年四十四岁"。③ 可见陆瑜终生抄书，直至生命最后一息。另如"陆澄之《地理书》凡百四十九卷，而其《地理书抄》不过二十卷；任昉增澄之书为《地记》二百五十二卷，而其《地理书抄》不过九卷"。④ 节抄最早始于东汉，《隋书·经籍志·杂史叙》说：

> 自后汉已来，学者多抄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有志，而体制不经。

这说明东汉以降，学者节抄史书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第三，就抄写者而言，除了学者自抄以外，主要依靠经生。经生又叫书手、楷书、佣书、赁书、书工等。它是一种专以抄书谋生的社会职业。社会上流布的许多图书都出自经生之手。对于富家大族来说，可以倩人抄书，也可以用金钱购买经生写本。古典文献中关于经生的记载比比皆是：三国阚泽"家世农夫，幼好学，居贫，常与人佣书以供纸笔，此既写了，诵之亦过"。⑤ 可见阚泽不仅把抄书当作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而且把抄书当作学习的重要方法。南齐周山图"少贫微，佣书自业"。⑥ 南齐庾震"丧父母，居贫无以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

---

① 《南史·张缅传》。
② 同上书《庾悦传》。
③ 《陈书·陆瑜传》。
④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晋南北朝学术》。
⑤ 《建康实录》卷二。
⑥ 《南齐书·周山图传》。

济”。①可见庾震家中一贫如洗，连埋葬父母的钱都没有，只好抄书卖钱。抄书辛勤之至，笔杆把手掌都磨破了。梁王僧孺“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②王僧孺也是把抄书同学习结合起来了。梁沈崇傃“家贫，常佣书以养”。③后魏崔亮十岁那年“居家贫，佣书为业”。④十岁尚未成人，便握笔抄书，当了童工，可见生活之艰辛。后梁贞明五年（919年）四月敦煌郡金光寺学士郎安友盛抄《秦妇吟》有题识云：

今日写书了，合有五斗米。高代不可得，还是自身灾。⑤

这四句话反映了书手报酬之微薄，辛辛苦苦连抄数日，仅能得到五斗米的报酬。要想得到高报酬，简直是不可能的。抄来抄去，到头来还是一身灾祸。

三、宋元写本

宋元是我国雕版印刷的初步繁荣时期。人工抄写，作为图书制作的传统方式，并没有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它仍然是图书制作的重要手段。

宋代官方写本

宋代官方藏书规模宏大。崇文院、秘阁、太清楼、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等处都有不少藏书。其中，崇文院相当于国家级图书馆，藏书达8万卷之多。官方藏书的组成，除了印本之外，写本也占相当比重。宋代政府十分重视抄写图书，兹举

①③ 《南史·孝义传》。
② 《梁书·王僧孺传》。
④ 《魏书·崔亮传》。
⑤ 《斯坦因劫经录》0692。

例如下：

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悬赏求书，不愿进献者“借本缮写”；[①]至道元年（995年）命裴愈到江南两浙寻访图书，“不愿进纳者，就所在差能书吏借本抄写”。[②]

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诏令搜访图书，其方法是以内府及馆阁藏书和私人藏书目录核对，“有缺者，借本抄填之”；[③]咸平三年（1000年）“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之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④]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荣王宫失火，崇文院、秘阁藏书焚烧殆尽，“命重写书籍，选官详覆校勘，常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书成，归于太清楼”；[⑤]景德元年（1004年）三月，直秘阁黄夷简等进上校勘新写御书24162卷；[⑥]天禧元年（1017年）八月，刘涛、侯惟哲献太清楼所阙书各500卷，命“以前诏甄录”。[⑦]

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诏借《道藏》零种《庄子》等给三馆，差人抄写；[⑧]嘉祐六年（1061年）十二月三馆秘阁上所写黄本书6496卷，补白本书2954卷；[⑨]嘉祐七年（1062年）判阁欧阳修奏称：

> （秘阁初为太宗藏书之府）后因宣取入内，多留禁中，而书颇不完，请降旧本，令补写之。遂诏龙图、天章、宝文阁、太清楼管勾内臣，检所阙书录本于门下省誊写。[⑩]

---

①②③ （宋）洪迈：《容斋五笔》卷七。

④⑤ 《宋史·艺文志序》。

⑥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二十四。

⑦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

⑧ 同上书职官六。

⑨ 《续资治通鉴》卷十六。

⑩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

同年六月，进呈补写御览书籍；同年十二月，诏以所抄黄本书10659卷，送昭文馆。

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诏置补写所。

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秘阁抄书2082部，还有1213部和待补残缺289卷未抄，限期抄完；① 大观四年（1110年）准秘书监何志同奏，选文学博雅之士求访异书，不愿进献者，“并借缮写，或官给笔札，即其家传之”；② 宣和四年（1122年）鉴于三馆图书简编脱落、讹舛亡佚，诏建局补完校正，“募工缮写”；宣和五年（1123年）诏令“搜访士民家藏书籍，悉上送官，参校有无，募工缮写，藏之御府”。③

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五月二十八日秘书省复置补写所，招聘书手数十人，规定抄写定额，按劳取酬，“楷书课程旧例每日写二千字，遇入冬书写一千五百字，并各置工课手历，每日抄转书勘点检，月终结押”；④ 同年闰十一月，诏求遗书，不愿进献者，令所在州军借本传写。⑤

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准秘书省奏，抄录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⑥ 淳熙六年（1179年）六月二十七日准吏部侍郎阎苍舒奏，派人到四川寻访图书，遍查四路（即益州路、梓州路、利川路和夔州路）州军官书目录，“如有所阙，即令本司抄写，赴秘书省收藏”。⑦

宋代民间写本

今人袁同礼曾经指出：“宋代私家藏书，多手自缮录，故所藏之本，抄本为多。”⑧ 宋代私人藏书家可考者有200人左右，

---

① 《枫窗小牍》卷下。

②③④⑤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

⑥ 同上书职官十八。

⑦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

⑧ 《宋代私家藏书概略》，载《图书馆季刊》二卷一期。

其中孙光宪、王钦、毕士安、姚铉、晏殊、李行简、司马光、刘恕、周启明、高颐、杜鼎升、吕大防、沈思、王钦臣、李常、赵明诚、陆游、刘仪凤、魏衍、叶梦得、尤袤、陈振孙、黄仲元等均以抄书著称。

李行简，字易从，冯翊（今陕西大荔）人，历任龙图阁待制、尚书刑部郎中等职。“聚书万卷，多其自录，人谓之书楼”。①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编撰《资治通鉴》著称于世。他在68岁高龄时，还亲自动笔抄书，“所抄自《国语》而下六书，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重，无一笔不谨”。②

刘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今江西高安）人，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重要助手之一。为了编好《资治通鉴》，需要大量文献资料，他经常到数百里外访书抄书。有一次他到亳州宋次道处抄书，宋次道以酒肉相待，关怀备至。刘恕不高兴地说：“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宋次道非常理解他的心情，遂嘱易以家常便饭，刘恕在宋次道家住了十多天，“昼夜口诵手抄”，满载而归，可惜把眼睛给累坏了。③刘恕抄书之勤，于此可见。

吕大防（1027～1097）字微仲，蓝田（今陕西蓝田）人，他当宰相时，“常分其俸之半以录书，故所藏甚富”。④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绍兴）人，藏书室名曰“书巢”。他所藏的抄本有买来的，如《刘随州集》便是，他在该书跋语中说：

---

① 旧题（宋）曾巩：《隆平集》卷十四。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
③ 《宋史·刘恕传》。
④ 《郡斋读书志·吕汲公文录提要》。

佣书人韩文持束纸支头而睡，偶取视之，《刘随州集》也，乃以百钱易之，手加装褫。绍兴二十五年正月八日陆某记。①

也有自家人抄的，如《先左丞使辽语录》为其伯父手抄，他在该书跋语中说：

伯父自幼被疾，以左手书，然笔力清健如此。平生凡抄书至数十百卷云，淳熙八年四月五日某谨识。②

刘仪凤，字韶美，普州（今四川安岳县）人。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记载：

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专以传书。书必三本，虽数百卷为一部者亦然，出局则杜门校雠，不与客接。既归蜀，亦分作三船，以备失坏。已而行至秭归新滩，一舟为滩石所败，余二舟无他，遂以归普慈，筑阁贮之。

看来，刘仪凤每书必抄三本的原因在于保存图书，以防不测。如果只抄一本，一旦出事，就无法弥补。

李常，字公择，建昌（今属江西）人，“少读书庐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书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③

赵明诚（1081～1129），字德甫，山东诸城人，他和夫人李清照是南北宋之际的著名藏书家。当时馆阁藏书多有亡诗逸史等罕见之书，赵明诚夫妇凭借在馆阁任职的亲朋好友的帮助，“遂

① （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六。

② 同上书卷二十七。

③ 《宋史·李常传》。

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①

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江苏吴县人，南宋文学家。他的藏书主要靠手抄获得。他总共抄了多少书？没有精确统计。有一年夏天晒书，晒了20多天才晒完，他在《避暑录话》中说：“其间往往多余手抄。”

尤袤（1127～1194），字延之，无锡人，以编撰《遂初堂书目》著称。他把抄书当作日课，每天下班回家，便闭门谢客，专心读书、抄书，家属在其带动下，也帮他抄了不少书。

陈振孙（约1183～1249），字伯玉，浙江安吉人，他以编撰《直斋书录解题》著称于世。他做过官的江西、福建、浙江三地是当时雕版印刷的中心地区，图籍流布较广，他在这些地方搜购和抄写了大量图书。《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51180卷图书，都是他的私人藏书。在他的私人藏书之中，抄本是不少的。《尔雅新义》二十卷、《元经薛氏传》十五卷、《龙图阁瑞物宝目》、《六阁书籍图画目》、《孙子》十卷、《造化权舆》六卷、《云笈七签》一百二十四卷、《景祐天竺字源》十卷、《皇祐新乐图记》三卷、《长乐财赋志》十六卷、《三朝训鉴图》十卷等都是他自己抄的。《元经薛氏传》抄自叶梦得家，《孙子》抄自程文简家。《云笈七签》前后共抄两次：先在莆田所抄，是个略本；后在平江抄得全本。

黄仲元，字善甫，莆田人，曾手抄242家诗文集。②

宋代抄书盛行的原因及元代写本

为什么宋代抄书盛行？

第一，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手工抄写图书。手工抄写，简单易行，只要具备“文房四宝”，就可以随心所欲，无须他人协

① （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② （宋）黄仲元：《四如集》卷四。

助，完全可以单干。而雕版印刷就不是那么简单，其整个印书工序是由写工、刻工、印工、装褙工集体协作完成的，所需人数多、技术精，和人工抄写相比，难度较大。雕版印刷作为新生事物，其普及和推广，仍需要时间。

第二，宋人重视书法，把抄书当作书法练习的重要手段。宋代皇帝多喜书法：太祖善颜体；太宗兼善篆、隶、八分、飞白、行、草等书，淳化三年（992年）出秘阁所藏历代法书，编成《淳化阁帖》十卷，拓赐大臣，影响很大；真宗书法甚得晋人风度；仁宗擅长飞白；徽宗自创瘦金一体；高宗兼善真、行、草诸体。据统计，宋人著名书法家有800多人，其中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尤其著名，号称“四大家”。由于宋代自上而下重视书法，抄书也就自然蔚成风气。抄书既可学习知识，又可练习书法。

第三，宋人把抄书当作学习的重要方法，手抄一遍印象深，记得牢，事半功倍。苏颂是北宋大臣，也是宋代著名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苏轼曾问苏颂：“公记史事，如何这般熟？”苏颂回答：“吾曾将某年某月记下，将事系之，编得一次；复将事下，系以某年某月，又编得一次，编来编去，久遂记得。”苏轼同意他的看法，接着说：“我何尝不如此，毕竟公记得熟。宋景公（即宋祁）尝自言，手抄《文选》三过，始见佳处。”洪景庐（即洪迈）亦有言：手抄《资治通鉴》三过，始究其得失。古人读书著书，未有不手录者。① 另外，宋代有些刻本舛误太多，不可尽据，学者只好手抄。

第四，宋代仍然有不少专业书工。宝元初，范仲淹抨击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因被指控与尹洙、欧阳修等结为死党，贬知饶州，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为范仲淹鸣不平。该诗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不胫而走，“都市人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②

①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七。

②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五。

“鬻书者”所卖的书都是专业书工抄写的。因为时间久远，书工姓名可考者不多。有个叫杜鼎昇的人，以抄书卖书为生，曾经手抄唐孙思邈《千金方》售卖，他身体健壮，耳聪目明，一直抄到死才搁笔，他抄的书很少错误。①宋刘壎《云庄集》曾经提到一个建阳书工，名字叫余焕，“工大小篆，笔势奇伟不常，予尝使之书圣贤言，揭坐侧，如正人端士服古衣冠巍坐拱手，使人望之起肃敬心，虽严师畏友曾不过是，然余君挟此技游四方，其能知之者甚少，爱而候之者又加少”。②说明书工社会地位很低，常常受到人们的歧视。但也确实有些书工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抄本质量不高。宋代科场舞弊成风，考生往往私藏袖珍抄本入试，专业书工大量抄写便于携带的袖珍本，牟取暴利。欧阳修曾说：

> 近年举人公然怀挟文字，皆是小纸细字，抄节甚备，每写一本，笔工获钱三二十千。③

宋刘壎《云庄集》盛行一时，“然皆传录，经于多手，乌焉成马，亘克去取”。④《焦氏易林》“屡经传写，字多舛误，以羊为缶，以快为決，若此者众”。⑤据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宋次道家多唐人诗集，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就是据宋次道藏本编成的。王安石预先将选好的篇目贴上标签，让书工按照标签去抄，书工讨厌字多，就把长诗的标签偷换到短诗上。抄好之后，王安石也没有核对。这些书工只求速度，不求质量，实在误人不浅。

元代私人抄书可考者仅有庄肃等人。庄肃，字恭叔，号蓼

---

① 《藏书纪事诗》卷一。
② （宋）刘壎：《云庄集》卷五。
③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一十一。
④ 《云庄集·聂逊后序》。
⑤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三十。

塘，松江青龙镇人，“性嗜书，聚至八万卷，手抄经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说，靡所不具”。①

总而言之，宋元时期是印本和写本并行的时代。宋元传世写本虽然已是凤毛麟角，但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古籍，大多是以宋元写本作为底本传抄付印的。如果当初没有宋元写本，许多古籍就可能失传，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四、明代写本

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其刻家之多、刻本之多，都是其它朝代无以伦比的。但是，人工抄写仍是经久不衰。无论官方或民间，抄书之例，比比皆是。

明代官方写本

明代官方在重视刻书的同时，也很重视抄书。洪武十五年（1382年）特地从福建、湖广、江西、浙江、直隶等地挑选了1910个书工到内府各部任职，专事抄写。②明政府多次到民间搜访遗书，访到之书均用人工抄写。万历间曾根据焦竑的建议，四出访书，“愿以古书献者，官给以直；不愿者亦抄写二部，一贮翰林院，一贮国子监”。③成化十九年（1483年）十一月，太监王敬以访书为名，令苏州府学儒生赵汴等20人辍学为之抄书，赵等不堪驱使，以妨废学业谢绝，王敬大打出手，赵汴等20人因此获罪④。

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有22877卷、目录

① 《藏书纪事诗》卷一。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一。
③ （明）焦竑：《焦氏澹园集》卷五。
④ 《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四十六。



图5　明写本《永乐大典》

60卷，3.7亿字，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这部大书就是人工抄写而成的。据全祖望《抄〈永乐大典〉记》说，为了编好、抄好这部大书，“公车征召之士，自纂修以至缮写几千人，缁流羽士，亦多予者”。其中抄写人员都是擅长篆隶楷草的书法家。《永乐大典》共装成11095册，每册高1尺5寸6分，宽9寸3分。封面左上有长方框，内题“永乐大典”四字，其下用双行小字注明卷次；右上角有小方格，格内题写该册所属韵目，又低一字注明本册所在该韵目的册次。书页用上等白宣纸，朱丝栏，半页大字8行、小字16行，行28字。墨色黝黑，器物、山川等均有插图，插图用线条勾勒，形态逼真。文中所征引的书名，全用朱笔。版心有三个鱼尾，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下端双鱼尾内题页码（图5）。《永乐大典》于永乐七年（1409年）十月抄成之后，有人建议付刻，因工费浩繁而作罢。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

皇宫失火，世宗亟命救出此书，此书才得以免遭回禄之祸。为了完好地保存《永乐大典》，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决定重抄一部副本，从全国各地招聘书手180人。为了保证重录工作顺利进行，有关方面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规定缮写人员每日抄写3页；领取《大典》底本必须登记；不准私自带出门外雇人代抄；发现有怠工者，严肃处理；每册抄完后，于册后写上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人姓名，各负其责。①这样，整整用了6年，到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抄完。由于该书内容浩博，缮写人员既多又杂，书中的错误也是不少的。例如元代张之翰写了一本书，名叫《张西岩集》；另外一个人叫张起岩，写了一本书，名叫《张起岩集》，因为"西岩"、"起岩"发音相近，书手在抄写时就把张起岩误作《张西岩集》的著者。元代王祯《农书》中的《谷谱篇》讹作《谷谱集》；《斜川集》的著者"苏过"讹作"苏迈"；宋李心传《旧闻证误》所辨条目原书均注书名，而《大典》脱漏十之五六。当然，总的说来，《永乐大典》的历史功勋是不可磨灭的，这部大书是我们的国宝，它凝聚着明代书工的勤劳和智慧。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大书的正本在明末毁于战火，副本在清乾隆间还残存3600多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又多所焚毁，帝国主义分子也趁火打劫，亡佚殆尽。解放后，经多方搜集，仅得730册，只占原书总数的百分之三多一点。

明代民间写本

明代民间抄书之例更多。今人袁同礼指出：

> 明人好抄书，颇重手抄本。藏书家均手自缮录，至老不厌。②

① 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第12页。

② 《明代私家藏书概略》，载《图书馆季刊》二卷一期。

据记载，明代以抄书著称的藏书家有孙道明、宋濂、刘崧、叶盛、杨循吉、陆深、严嵩、姚咨、钱谷、柳佥、俞弁、范钦、谢肇淛、祁承㸁、赵琦美、毛晋、何大成、包柽芳、冯舒等。

孙道明，字明叔，华亭（今上海）人，元末明初藏书家。抄书数千卷，至老不辍。80岁那年还抄有《临汉隐居诗话》。

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浦江人，明初大臣，文学家。少时家穷，无书可读，"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① 因此，人们都喜欢把书借给他，他才得以博览群书。

刘崧，字子高，泰和（今属江西）人，"家贫力学，寒无炉火，手皲裂，而抄录不辍"。②

叶盛（1420～1474），字与中，昆山人，"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虽持节边徼，必携抄胥自随。每抄一书成，辄用官印识于卷端"。③ 如《论语》卷端有"镇抚燕云关防"、"巡抚宣府关防"二印。

杨循吉，字君谦，，吴县人，藏书十余万卷，闻某处有异书，必千方百计购求缮写。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是时吴中藏书家多以秘册相尚，若朱性甫、吴原博、阎秀卿、都元敬辈，皆手自抄录，今尚有流传者，实君谦倡之也。"

陆深，字子渊，上海人，他坚持抄书56年，晚年喜抄方书，他在《俨山集·为己方序》中说：

> 予喜手抄书。方时少壮，夜寒炉灭，不废泓颖，今五十有六年矣，衰病垂及，乃喜抄药方。予外病痔齿，最先最甚，故抄方自治牙始。其次病目，而扶衰之方兼抄。

① （明）宋濂：《宋文宪公全集·送东阳马生序》。

② 《明史·刘崧传》。

③ 《藏书纪事诗》卷二。

严嵩（1480～1567），字惟中，分宜（今属江西）人，明代奸臣，手抄宋元书籍2613本。

姚咨，字舜咨，无锡人，著名藏书家。所抄《续谈助》、《贵耳录》和《稽神录》，为清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珍藏，目为"三绝"。姚氏为了寻访《清波别志》，费时长达30余年，访到之后，日抄5页，手不停挥70余天，终于抄完全书。他在该书的跋中说：

> 一人称姑胥袁飞卿家奴，肩一箧，手一编，乃《清波别志》也，其人视为奇货，索价太高，因持去。三十年来，求之弗得，今始得之贞山陆给事家，前有《杂志》十二卷，后《别志》三卷，比褒者为全。予喜而执笔，日抄五页，积七十日讫事。①

钱谷，字叔宝，号磬室，吴县人，"闻有异书，虽病必强起，匍匐倩观，手自抄写，几于充栋"，其子钱功甫"贫而好学，酷似其父，年八十余，隆冬病疡，映日抄书，薄暮不止"。② 钱谷28岁那年，用精楷抄写的《唐朝名画录》（唐朱景玄撰），今藏苏州博物馆。该书有海鸥客跋：

> 磬室先生少游石田翁之门，又与衡山太史为友，熏染积习，与古为徒，山水小楷，各臻妙境，楷法真可颉颃（王）履吉，不肯下附文门，此名画一录，娟秀超逸，中具晋人风致。

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在《江浙访书记》中说：

---

① 《藏书纪事诗》卷二。

②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

（此书）纸白如玉，墨光如漆，铁画银钩，笔笔俱到，珠光玉气，光彩夺目，不觉老眼之欲明，为之心旷神怡，洵吴门之风范、珍贵之文物也。

《四部丛刊》中《华阳国志》和《南唐书》均据钱氏抄本影印。

柳佥，字大中，吴门人，曾摹写宋本唐人诗数十种，《四部丛刊》中的《白莲集》即据嘉靖八年（1529年）柳佥抄本影印。

俞弁，字子容，长洲人，酷嗜藏书，勤奋抄录，尝从柳佥处借录《随隐漫录》，录毕作诗云：

心爱奇编雨汗流，山妻笑我不封侯。偷闲八日闲中写，一笔看来直到头。①

范钦（1506～1585），字尧卿，鄞县（今属浙江）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任兵部右侍郎，著名藏书家。他从藏书家丰道生、王世贞处抄了不少异书，其从子范大澈“闻人有抄本，多方借之。长安旅中尝雇善书者誊写，多至二三十人”。②

谢肇淛，字在杭，长乐（今福州）人，万历进士，著名藏书家，室名“小草斋”。据方品光《福建版本资料汇编》著录，谢氏抄有《桂林风土记》、《视草余录》、《六壬拔粹》、《意林》、《寓简》、《沈下贤文集》、《王黄州小畜集》、《后村居士集》、《北礀文集》、《古灵先生文集》、《庆湖遗老诗集》、《青山集》、《芦浦笔记》、《竹友集》、《演山先生文集》等书，他在《竹友集》跋中说：

时方沍寒，京师佣书甚贵，需铨京邸，资用不赡，乃手

①② 《藏书纪事诗》卷二。

抄写，每清霜呵冻，十指如槌，凡二十日始竣，万历己酉十二月二十四日。

其抄书之勤如此。

祁承㸁（1562～1628），字尔光，山阴人，万历进士，曾任江西右参政等职，著名藏书家，室名“澹生堂”，有《澹生堂书目》。天启二年（1622年）他在一封家书中说：

近所抄录之书，约一百三四十种，共两大卷箱。此是至宝，自家随身携之回也。我仕途宦况，遗汝辈者虽少，而积书已在二千余金之外，汝辈不知耳。只如十余年来所抄录之书，约以二千余本，每本只约用工食纸张二三钱，亦便是五六百金矣。①

可见祁氏抄书多达2000余本，单是天启二年就抄了一百三四十种，他外出做官，很少为后辈买些珠宝土产之类，唯书是遗。

赵琦美（亦名赵开美），字元度，号清常道人，常熟（今属江苏）人，著名藏书家，室名“脉望馆”。传世《古今杂剧》242种，即为赵氏所抄，此书递经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等名家收藏，抗日战争时期，不知下落，后经近代著名学者、藏书家郑振铎多方寻访，终于1938年5月以万金购得，今藏北京图书馆。

著名藏书家毛晋（生平详本编第六章第六节）以抄书作为补充藏书的重要手段，“其有世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购得者，则选善手以佳纸墨影抄之，与刊本无异，曰‘影宋抄’。于是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而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②毛氏雇了很多

① 黄裳：《银鱼集·澹生堂二三事》。

② 《天禄琳琅书目》卷四。

书工，专事抄书，推官雷某因有“入门僮仆尽抄书”的诗句。①毛氏抄书知多少？仅黄丕烈刻《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就著录毛氏抄本117种。《天禄琳琅书目》中也收录了不少毛氏影宋抄本。该书《王摩诘文集》提要说：

> 自元明以来，刻维集者甚多，今得此（毛氏）影抄以留宋椠面目，亦超出于诸家之上矣。

何大成，字君立，明常熟人，性喜旧椠。有一次，他听说寒山赵氏藏有宋刻《玉台新咏》，秘不示人。何氏“尝于冬月，挈其友舣舟支硎山下，于朔风飞雪中，挟纸笔、袖炊饼数枚入山，径造其庐，乃许出书传录，堕指呵冻，穷四昼夜之力，抄副本以归”。②

包柽芳，字子柳，明嘉兴人。他只要听说某处有异书，不管再偏僻的地方，也要亲自造访。访到之书“则分命左右传写，手自摘录，垂丙夜不休”。③

冯舒，字已苍，明末常熟人，与其弟冯班都是著名藏书家，时人目为“二冯”。冯氏所抄《汗简》有跋云：

> 崇祯乙酉避兵莫城西之洋荡村，大海横流，人情鼎沸，此乡犹幸无恙，屋小炎蒸，无书可读，架上偶携此本，发兴书之，二十日而毕。

冯氏于兵荒马乱之际，冒着酷暑抄书20天，毫无倦意，其刻意抄书，于此可见。

除了上述抄书者外，朱谋垏、何乔新、吴宽、文徵明、朱存

① 杨立诚等：《中国藏书家考略》。

②③ 《藏书纪事诗》卷三。

理、阎起山、王履吉、何钫、陆师道、黄居中、秦四麟、秦景阳、曹学佺、徐𤊹、陆宇、高培、金俊明、顾𫓧、钱谦益、陈煌图、李可敬、王朝志、马弘道等人也抄了不少书。

明代写本的特点和价值

明代抄书有三个特点：（一）明抄内容以“秘本”、“异本”、“善本”为主，而不像宋抄那样以常见书为主。明人所谓“秘本”、“异本”、“善本”，多半是指宋本。（二）明抄书法水平较高。例如吴宽抄本“书法精楷”，书估居为奇货，漫天要价。① 毛晋的女婿高培所抄书法“精好，令人不敢触手，盖深擅楷法也”；② 秦景阳抄本“多用行书好写”；③ 陆师道抄本“丹铅俨然，小楷精绝”；④ 朱存理抄本“尤精楷法”。⑤ 总之，不少明抄都是书法珍品。（三）明代出现影抄。其中以毛晋汲古阁影宋抄本尤其著名。孙庆增《藏书纪要》说：

> 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近世无有能继其作者。

明代抄本对于古代文化的流传发挥了重要作用，《永乐大典》成了后人辑佚的宝库。清编《四库全书》时，组织学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385种、4926卷，其中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大部头著作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薛居正《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郝经《续后汉书》九十卷、王珪《华阳集》七十卷等都是从《永乐大典》中算出来的。我国古代重要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海岛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等在修书

① 《藏书纪事诗》卷二。
②③④⑤ 《中国藏书家考略》。

前有的已失传二三百年，有的残缺严重，修书时，用《永乐大典》进行了辑录和校补，才有了比较完善的本子。《九章算术》在北宋时已经罕传，“自沈括《梦溪笔谈》以外，士大夫少留意者，书遂几于散佚。洎南宋庆元中，鲍澣之始得其本于杨忠辅家，因传写以入秘阁，然流传不广，至明又亡，故二三百年来，算术之家未有得睹其全者，惟分载于《永乐大典》者，依类裒辑，尚九篇俱在”，四库馆臣全数辑出，《九章算术》才得以重见天日。① 东汉班固等撰《东观汉记》，元代已经亡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4卷，可补《后汉书》之不足，亦可考见最早官修史书的本来面目。《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徐松、胡敬、孙尔准、缪荃孙等人也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不少佚书：徐松辑有《宋会要辑稿》、《宋中兴礼书》、《政和五礼新仪》、《秘书省续到阙书》等；胡敬辑有《大元海运记》、《施谔临安志》等；孙尔准辑有《仇远山村词》；缪荃孙辑有《宋十三处战功录》、《曾公遗录》、《顺天志》、《宋中兴百官题名》、《雨清日录》、《泸州志》等。除了《永乐大典》之外，明代其它写本也往往多补阙遗，如宋赵明诚《金石录》，刻本多误，章邱刻本把“壮月朔”三字刻成“牡丹朔”，而明焦竑从秘府抄出之本，文嘉据宋刻影抄之本就很少错误。《四书经疑贯通》传本甚罕，四库馆臣据范氏天一阁写本收入《四库全书》。唐独孤及《毗陵集》旧本失传，世无刻本，四库馆臣据吴宽写本收入《四库全书》。另外，在《四库全书》中，《竹友集》据谢肇淛写本收入；明危素《说学斋稿》据归有光写本收入；元张翥《蜕庵集》据明释大杼写本收入。如上所言，在《四部丛刊》中，也有不少书是据明抄本影印的。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零七。

五、清 代 写 本

清代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尽管新的印刷技术即将取代雕版印刷，图书的制作手段更加先进。然而，人工抄写，作为一种原始的图书制作方式，仍在发挥自己的作用。无论官方或民间，抄书之例仍然屡见不鲜。

四库全书

清代官方抄书以《四库全书》为巨。《四库全书》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全书收书3503种、79337卷。卷数之多，相当于《永乐大典》的三倍半。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修书，修书的第一步工作是征集图书，在以后的七年中，共征集图书33000多种。第二步工作是整理征集的图书：首先要校对同书异本之差异，写出每书的考证和提要，然后提出应刻、应抄、应存的具体意见，送呈皇帝审定。应刻者被认为是最好的书，除抄入《四库全书》外，应另行刊印以广流传；应抄之书比应刻之书稍逊一色，抄入《四库全书》就行了；应存之书是不合格的书，仅仅留存其名可也。这种史无前例的考定汇编工作，需要大量人才，据统计，《四库全书》馆先后共任命大小官员360人，著名学者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翁方纲、朱筠、金榜、王念孙等都曾在这里任职。缮书处是负责抄写的部门，先后网罗书工3826人。为了保证抄书的质量，缮书处还规定了记过的办法，规定每三个月考核一次，对记过多者要给以处分。经过十年的努力，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编纂、抄写完毕，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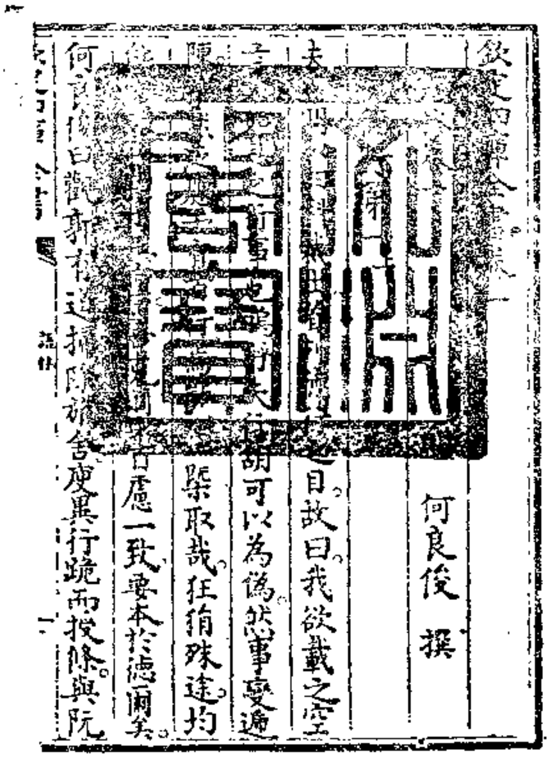


图6　清写本《四库全书》

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北四阁用开化榜纸，朱碾红格，半页8行、行21字，书皮经部用绿绢，史部用红绢，子部用蓝绢，集部用灰绢。抄写南三阁时，因为纸张缺乏，改用竖白太史连纸，行款同上。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图6）。由于抄写人员复杂，加上管理方面的原因，《四库全书》抄写中的错误也是不少的，有的书虽经多次校对，仍然是整篇、整卷、甚至整部的漏抄。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纪昀重校文津阁藏本，仅在经部就查出空白和错误

1000多处。就版本的角度而言，《四库全书》不能称为善本。但如何全面评价《四库全书》，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问题，学术界尚没有统一的认识。

清代民间写本

清代民间抄书著名者有顾炎武、钱曾、孙承泽、黄宗羲、曹寅、朱彝尊、蒲松龄、曹溶、陆漻、黄丕烈、鲍廷博、周尧匚、吴翊凤、严元照、吕无党、蒋衡、梁同书、惠栋、吴骞、汪宪、张隽、王士禛、查慎行、贾炎、宋宾王、金檀、吴尺凫、马曰琯、倪模、汪一之、全祖望、王鸣韶、余萧客、丁杰、孙星衍、陈敬璋、陆芝荣、翁广平、钱熙祚、朱绪曾、章金、胡树声、劳权、刘履芬、朱壬林、瞿世瑛、蒋汝藻、赵魏、曹言纯、丁丙等。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清初思想家、著名学者。他一生抄了许多书，他在《抄书自序》中说：

> 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抄，或募人抄之。

顾炎武治学严谨，他的著作总是一抄再抄，反复修改。据易宗夔《新世说·雅量》记载：

> 《诗本音》卷二稿再为鼠啮，再为抄写，略无愠色，有劝其熏瓦倒壁、一尽其类者，公曰："鼠啮我稿，实勉我也。不然，度置不动，焉能五易其稿耶？"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人，曾任翰林院检讨等职，清康熙间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为了抄书，他想了种种办法。钱曾《读书敏求记》写成之后，秘不示人，朱彝尊

很想抄个副本，据吴焯《读书敏求记·跋》记载：

> 竹垞谋之甚力，终不可见。竹垞既应召，后二年，典试江左，遵王会于白下。竹垞故令客置酒高宴，约遵王与偕。私以黄金翠裘予侍书小吏启钥，预置楷书生数十于密室，半宵写成而仍返之。当时所录，并《绝妙好词》在焉。词既刻，函致遵王，渐知竹垞诡得，且恐其流传于外也。竹垞乃设誓以谢之。

后来，朱彝尊竟以抄书而丢官，他在《书椟铭》中说：

> 予入史馆，以楷书手王纶自随，录四方经进书。纶善小词，宜兴陈其年见而击节。寻供事翰苑，忌者潜请学士牛钮，形之白简，遂罢予官，归田之后，家无恒产，聚书三十椟，老矣不能遍读也。铭曰：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

朱彝尊抄书很多，计有《周易图说》、《内外服制通释》、《三礼图》、《太平治迹统类前集》、《崇文总目》、《国史考异》、《方泉集》、《牟氏陵阳集》、《圣宋文选》、《吴都文萃》、《山中白云词》等。

陆漻，号其清，吴门人。15岁时，以家贫失学，"然喜借书，昼夜抄写，严冬乏炭，屈足腹下，冷暖交换，见者匿笑。抄书一页，于古书肆易刻者五页，购书归，端置于几，揖而后藏"。①

吴翊凤，字伊仲，吴县人，著名藏书家，手抄秘籍数百种。由于昼夜不停地抄，疲劳过度，一只眼睛因此而失明。

---

①《中国藏书家考略·陆漻》。

蒋衡（亦名振生），字湘帆，曾用十二年时间抄写《十三经》，他说：

> 余矢志力书，计全经八十余万言。于是先其难者，以《春秋左传》二十万言始，凡五年讫工；继以《礼记》十万言，又二年；其余《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尔雅》、《孝经》、《论语》、《孟子》，又五年，共历一纪乃毕。以碑洞石经为式，用东洋纸，界乌丝栏书之。①

蒋氏所抄《十三经》，装成300册、50函。乾隆四年（1739年）八月呈进，"上以振生年近七旬，志在尊经，赐国子监学正衔，其手书《十三经》尽用木板刻印，以备颁发"。②据记载，清人刻意抄经者还有：李松霄用12年时间抄完《十三经》；③汤金钊抄九经。④

梁同书，字元颖，号山舟，钱塘人，著名书法家。曾用5年时间手抄《文选》16册，他在该书跋中说：

> 始壬申至丙子，盖五年毕事，全书无一字草率。有误者，则朱书其旁。⑤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自号渔洋山人，新城人，曾任刑部尚书等职，著名文学家。朱彝尊曾在《曝书亭集·池北书库记》中说：

---

① （清）钱泰吉：《曝书杂记·蒋氏自跋十三经字册》。

② （清）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

③ （清）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一。

④ （清）俞樾：《春在堂杂文三编》卷三。

⑤ 徐珂：《清稗类钞选·艺术》。

> 新城王氏，门望甲齐东，先世遗书不少，然兵火散佚者半，先生自始仕讫今，日耕肘书，借观辄录其副。

倪模，字迂村，号韭瓶，望江人，藏书室曰“江上云林阁”、“经锄堂”等。抄有《宣靖备史》、《鄂国金佗粹编》、《孙子》、《刘宾客文集》、《骑省集》、《小畜集》等。在《宣靖备史》抄本之后附书目二页，列书34种，有倪氏题识云：

> 佚存未备之书，购求原本抄录，所有书目附于卷末，俟再得秘藏之本，陆续缮成，以行于时。①

陈敬璋，字汝森，号可斋，海宁人。喜抄书，抄书速度很快，一日可抄一万字。

钱熙祚，字雪枝（一字锡之），松江金山人。为了编刻《守山阁丛书》，曾借抄《四库全书》文澜阁藏本432卷，据《藏书纪事诗》卷六记载：

> 浙江文澜阁，在西湖孤山下，功令愿读中秘书者，许领出传写。道光乙未冬，钱锡之通守辑《守山阁丛书》，苦民间无善本，约同人侨寓湖上之杨柳湾，去孤山二里许，面湖环山，上有楼，楼下集群胥。间日扁舟诣阁领书命抄，毕则易之，同人居楼中校雠，湖光山色，滉漾几席间，意豁如也。是役也，校书八十余种，抄书四百三十二卷，同游六人：金山钱熙祚、熙泰、顾观光，平湖钱熙咸，嘉兴李长龄，南汇张文虎。

刘履芬，字彦清、号泖生，江山人。喜藏书，“其不能得

---

①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四。

者；辄手自抄录，日课数十纸，终日伏案矻矻，未尝释卷以嬉”。①

瞿世瑛，字良玉，号颖山，钱塘人。数十年如一日，把抄书当作日课，抄有近千册图书。根据他的藏书目录记载，瞿氏藏有名人抄本792种，批校抄本475种，影宋元抄本30种。

蒋汝藻，号乐庵，南浔人，室名“密韵楼”。手抄宋本书100多卷，一笔不苟，王国维《观堂集林·乐庵写书图序》说：

> 观其手影《魏鹤山大全集》一百十卷，则又张目哆唇，舌挢而不得下。盖海内藏书家如乐庵者，屈指计之，尚不得四五。至于手模宋本至百余卷之多，非独今所难能，抑亦古所未有者也……乐庵写书，率在傲扰鞅掌之中，然首尾百余万言，无一笔苟简。

赵魏，字晋斋，仁和人，书法精妙，尤精篆隶。其家甚贫，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曾抄秘书数千卷，换米度日。

曹言纯，字种水，秀水人，藏书室名“五千卷室”。坚持抄书30年。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中说：

> 同邑曹种水明经言纯，自弱冠后专心词章之学，家苦无书，借人书籍，取其精华，蝇头细书三十年，无虑千百册。余尝劝其仿庾仲容《子抄》、马元会《意林》，钩玄提要，汇为一编，种水领之，而无暇为。今遗书满簏，恐无人收拾矣。

清代写本的特点和价值

清代抄书有如下三个特点：

---

① 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第213页。

第一，互通有无，借抄成风。为了防止古书亡佚，清初曹溶在《静惕堂记·流通古书约》中说：

> 今酌一简便法：彼此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出所缺者，先经，次史，次文集，次杂说。所著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沾易，则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抄互换。此法有数善：好书不出户庭也，有功于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

其实，早在宋代，王钦臣和宋次道已开了互为借抄的先例，王钦臣"与宋次道相约，互置目录一本，遇所阙，则写寄"。[①]不过，那时这种做法尚未普及。到了清代，互相借抄已蔚然成风。例如清初黄宗羲从曹溶、徐乾学处借抄了不少书；朱彝尊的藏书，曹寅大多抄有副本；朱彝尊也常从宛平孙氏、无锡秦氏、昆山徐氏、晋江黄氏、钱塘龚氏等处借抄图书。他编《明诗综》时，还从林佶那里借抄了不少书。

第二，所抄内容以善本为主。这与清人佞宋之风有关。清代图籍流布较广，质量良莠不齐。比较而言，宋本错误较少，人们重视宋本。但是，传世宋本毕竟有限，每个藏书家都想大量得到宋本是不可能的，只好以影抄来弥补。有些藏书家兼事校书、刻书，版本十分讲究，如果以劣本作为底本校书、刻书，那就会以讹传讹。所以他们对善本非常重视，能购则购，不能购置则借抄。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对抄本尤其重视，他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邵氏闻见录跋》中说：

> 宋人说部虽有刻本，必取其抄本而藏之，恐时刻非出自

① 《藏书纪事诗》卷一。

善本，故弃刻取抄也。抄本又必求其最善者，故一本不已，又置别本也。

单是《吕和叔文集》，黄丕烈就藏有11种抄本，它们是：碧凤坊顾氏本、周松霭十卷本、钱曾藏本、毛扆藏五卷本、叶石君抄本、王西沚校十卷本、崇祯抄本、海盐黄椒升藏十卷抄本、吴岫藏五卷旧抄本、毛晋手跋本和万历抄本。

第三，清代抄本，有不少戏曲唱本、弹词小说方面的内容。根据有关书目著录，百本堂、金镒堂、聚春堂、老聚春堂、别野堂、燕翼堂、萃雅堂、昇平署、车王府等均以传抄戏曲唱本著称。百本堂主人姓张，故人称“百本张”，江南人，书坊设在北京，专门抄写售卖各种戏曲唱本。百本堂历史悠久，从乾隆直到民国初年，经营时间长达100余年。百本张所抄《二簧戏目录》首页有广告云：

本堂专抄各班昆弋、二簧、梆子、西皮、子弟岔曲、赶板、翠岔、代牌子、琴腔、小曲、马头调、大鼓书词、莲花落、工尺字、东西两韵子弟书、石派大本书词，真不二价，不误主顾。逢七逢八在护国寺东碑亭，逢九逢十在隆福寺西角门祖师殿。本堂寓北京西直门内大街高井儿胡同东小胡同路北门，世传四代，起首第一，四远驰名。

这则广告说明百本张抄本的内容十分丰富，应有尽有，并有固定的发售时间和地点，百本张抄本多有木刻图记，文字有“别还价，百本张”；“言无二价”；“童叟无欺”；“由乾隆起至今，少钱不卖别还价”；“当面看明，拿回不换”；“诸公君子莫怪，由乾隆年至今，少钱不卖住西直”等。昇平署是清宫中专为承应帝王后妃寻欢作乐、教习戏班组织演出而设立的专门管理机构，乾隆时叫南府，道光七年（1827年）改称昇平署。为了便于

演员的记诵和满足宫廷的阅读需要，昇平署抄有大量杂剧。据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著录，内府昇平署抄有杂剧300种。清末北京蒙古族车王府抄本也是戏曲唱本方面的内容：戏曲方面包括单折戏、皮影戏、昆腔、皮簧等；说唱方面有鼓词、子弟书、乐曲等。全部共1444种、5131册，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清道光间，福建李桂玉撰弹词长篇小说《榴花梦》是传世规模最大的一部古典小说抄本，全书360卷、483.8万字。

传世抄本，清抄居多。和刻本相比，清抄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首先它可补刻本之不足，如清陈澧《东塾读书记》有多种刻本行世，《皇清经解续编》、《四部备要》、《国学基本丛书》中亦有收录，但均为残本。全书分经、史、子、小学四大部分，刻本仅有经、子、小学三部，史部残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稿本《东塾杂俎》正是刻本所缺的史部，稿本和刻本合在一起，才是足本。清毕振姬《西北文集》长期以来只有三卷本、四卷本流传，《国初山右四家文抄》收的是三卷本，《四库全书》收的是四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十二卷抄本是传世唯一的足本。浙江省图书馆藏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巴西文集》（元邓文原撰）为传世足本，该书有鲍廷博跋：

> 前借抄振绮堂汪氏所藏抄本《巴西文集》，今见新仓带经楼所藏抄本，得有八十余篇，知汪氏本乃不足本，较之尚少十余篇，未免有憾，因以转商，借得全集假归，得以补抄完璧，特志数语，志其由来。乾隆四十年鲍廷博。

《四库全书》本是只有70余篇碑志记序的残本，知不足斋抄本可补其不足。其次，有些清抄本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稿本《五湖异闻录》（清戴熙艾著）记藏书之事甚多，如《记可购书目》、《藏书家备考》、《藏书考》、《修本庐藏书叙》、《沪上出版的洋版书目》、《上海石印书

目》等篇，都是研究清末藏书史和版本史的重要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稿本《粤匪纪略》（清张晓秋著），虽然作者立场反动，但该书记载了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各级领导57人的事迹，对太平军中女兵的记载也很多，说广西女兵"初有万余，中有千人能打仗"，"女兵皆不裹足"。还记载了太平军的战法，如说"每见炮火出，令众伏地。响声前过，乘烟冲突而前"。① 总而言之，该书对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明初伏莽志》（清周昂辑）记元末农民起义事迹，可与钱谦益《开国群雄事略》互相参看。苏州博物馆藏清光绪六年（1880年）抄本《耕心农话》（清奚诚撰）多记农事活动，详述了种植双季稻的方法，还辑录了前人的很多种田经验，是研究农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六、佛经写本

《敦煌遗书》是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其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儒家经典、地志、诗歌、词曲、契约、信札、帐单等应有尽有，而佛经所占比重最大。下面就以《敦煌遗书》为例说明佛经写本的抄写情况。

佛经写本的供养者

所谓"供养者"，就是抄写经卷的主持人。佛教信徒把念佛、诵经、布施等视为"功德"，写经也是造"功德"的重要手段之一。据说，只要怀着虔诚之心抄写佛经，就可以给自己或亲朋带来无限幸福，就可以满足自己的各种要求。归纳起来，供养者主持抄写佛经主要有下列原因：

第一，因病写经，希望通过写经恢复健康。如《斯0980·金

---

① 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

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二》题记：

辛未年二月四日，弟子皇太子为男弘忽染痢疾，非常困重，遂发愿写此《金光明最胜王经》，上告一切诸佛诸大菩萨摩诃萨及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司命司录、土府水官、行病鬼王、疫使、知文籍官院长、押门官、专使可口喽官，并一切幽明官典等，伏愿慈悲救护，愿弘病苦早得痊平，增益寿命。①

第二，因亲人去世而写经，希望通过写经使亲人在"地狱"中不受折磨，并换取来世幸福。如《斯0592·妙法莲华经卷第二》题记：

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清信佛弟子王琳妻齐氏奉为亡女敬写《法华》一部，愿亡者及遍法界众生共成佛道。

又如《斯4476·佛说父母恩重经》题记：

乾符二年（875年）五月为亡女辛兴进敬写此经，愿神生净土，所有罪障，并皆消灭。

第三，为停战而写经，希望通过写经，化干戈为玉帛。如《斯1963·金光明经卷第一》题记：

清信女佛弟子卢二娘，奉为七代先亡见存眷属、为身陷在异番，敬写《金光明经》一卷，惟愿两国通和，兵甲休息，

① "斯"字代表《斯坦因劫经录》。下文"伯"字代表《伯希和劫经录》，"日大"代表《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日中"代表《日本人中村不折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刘"字代表《刘幼云藏敦煌卷子目录》。

应没落之流，速达乡井，卢二娘同沾此福。

第四，为普济众生而写经，希望通过写经，广积功德，换取众生幸福。如《斯2527·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九》题记：

开皇十七年（597年）四月一日，清信优婆夷袁敬姿谨减身口之费，敬造此经一部，永劫供养，愿从今已去，灾障殄除，福庆臻集，国界永隆，万民安泰，七世久远，一切先灵，并愿离苦获安，游神净国，罪灭福生，无诸障累，三界六道，怨亲平等，普共含生，同升佛地。

佛经写本的内容以《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无量寿经》为多。《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它用莲花比喻佛法的清静微妙，宣扬众生都能得到和佛一样的智慧，很容易被人接受。《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该经用“总”、“别”、“同”、“异”、“成”、“坏”等所谓“六相”，来说明世界事物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该经用金刚比喻智慧有能断烦恼的功用。《无量寿经》即《阿弥陀经》，该经描写阿弥陀佛所在的极乐净土的景象，劝人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字，只要这样，死后即可往生极乐净土。此经法门简便，对佛教信徒的吸引力尤其大，据说有些教徒一天竟念十万声“阿弥陀佛”，声嘶力竭，连话都讲不出来了。

供养者主持写经的数量没有明确规定，总而言之，是在虔诚的前提下，多多益善。抄写百卷以上者屡见不鲜，如《斯1945·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题记：

周保定五年（565年）乙酉朔，比丘洪珍，自慨摩心集于愚怀，宿障隔于正轨，仰惟大圣，遂劝化道俗，写千五百

佛名一百卷、七佛八菩萨咒一百卷、诸杂咒三千三头，写涅槃经一部、写法华经一部、写方广经一部、仁王经一部、并疏药师经一部、写药王药上菩萨经一部、戒一卷，并律。

因为传写佛经关系"造功德"之大计，所以供养者往往要题写姓名。如《斯2136·大般涅槃经卷第十》是为亡夫乞福所写，题记中开列了12个供养者姓名，他们是：夫人阴氏卢舍那、弟妻令狐氏、孙男上柱国英彦、英彦妻令狐氏、孙女明正信、孙男英谅、孙男为正、孙女小王、孙女母娘、孙女明尚智、孙男鸿鹤等。这里，全家男女老少一拥而上，阵容颇为强大。

佛经写本的抄写者

《敦煌遗书》佛经写本还署有抄写人姓名。供养者本人也可以是佛经的抄写者，也可以请人抄写。如果请人抄写，费用由供养者负担。但无论由谁抄写，态度必须虔诚。据《太平广记·尼法信》记载：

> 唐武德时，河东有练行尼法信，常读《法华经》，访工书者一人，数倍酬值，特为净室，令写此经。一起一浴，燃香更衣，仍于写经之室凿壁通，加一竹筒，令写经人每欲出息，径含竹筒，吐气壁外，写经七卷，八年乃毕。

为了抄写经书，又是洗澡，又是换衣，甚至连呼吸都不能随便，其态度可谓虔诚之至。所供佛经最忌买卖，如果买来现成佛经供养，那就不能"报应"了。《敦煌遗书》佛经写本可考的抄写者有100多人,其中专业书工有数十人其抄经情况如下表(见下页)：

上列诸人均为专门抄书的经生。经生有在官府任职的，例如萧敬为左书坊楷书；成公道、任道、王智菀为弘文馆楷书；赵文审、刘大慈、袁元哲为门下省书手；孙玄爽为秘书省楷书。经生

抄写人	身　份	抄写内容	抄写时间	出处
郭　德	经　生	妙法莲华经	唐咸亨二年(671年)	①斯3079 ②斯0084
辅闻开	经　生	金光明经		斯0409
萧　敬	左书坊楷书	妙法莲华经	①唐咸亨五年(674年) ②唐上元元年(674年)	①斯0456 ②斯3348
张阿胜	经　生	大方等陀罗尼经	北魏延昌三年(514年)	斯6727
彭　楷	经　生	妙法莲华经	唐龙朔三年(663年)	伯2090
令狐崇哲	敦煌镇经生	大方广佛华严经		伯2110
袁元哲	门下省书手	抄法莲华经	唐上元二年(675年)	伯2195
王　谦	经　生	妙法莲华经	唐咸亨三年(672年)	伯2644
孙玄爽	秘书省楷书	妙法莲华经	唐仪凤元年(676年)	斯1456
王思谦	经　生	妙法莲华经	唐咸亨三年(672年)	伯1556
张显昌	敦煌镇经生	华严经	北魏延昌二年(513年)	日大0705
张　才	经　生	中阿含经	隋仁寿二年(602年)	斯3548
侯　瑜	经　生	佛说贤劫千佛名经		斯6485
马天安	敦煌镇经生	摩诃衍经	北魏延昌二年(513年)	日中0893
蔡义哲	书　手	金刚般若经	唐咸亨四年(673年)	日大0708
令狐世康	经　生	摩诃衍经	北魏神龟二年(519年)	日中0752
曹清寿	经　生	诚实论	北魏永平四年(511年)	斯1427
成公道	弘文馆楷书	妙法莲华经	唐上元三年(676年)	斯1048
刘广周	敦煌镇经生	诚实论	北魏延昌元年(512年)	斯1547
令狐礼太	敦煌镇经生	华严经	①北魏延昌二年(513年) ②北魏延昌三年(514年)	①刘0648 ②斯2067

抄写人	身　　份	抄写内容	抄写时间	出处
杨文泰	书　手	妙法莲华经	唐上元三年(676年)	斯2181
任　道	弘文馆楷书手	妙法莲华经	唐上元三年(676年)	斯2637
令狐善顾	经　生	维摩诘经	高昌延寿十四年(673年)	斯2838
王智毓	弘文馆楷书	妙法莲华经	唐上元三年(676年)	斯4353
刘意思	书　手	妙法莲华经	唐仪凤二年(677年)	斯3091
马元礼	书　手	妙法莲华经	唐上元三年(676年)	斯4168
赵文审	门下省书手	妙法莲华经	唐咸亨三年(672年)	斯4209
刘大慈	门下省书手	妙法莲华经	唐咸亨三年(672年)	斯4551
李道胤	经　生	十地论欢天喜地	北魏正光二年(521年)	斯4823
程　度	书　手	①妙法莲华经 ②金刚般若经	①唐咸亨二年(671年) ②唐上元三年(676年)	①斯5319 ②伯3278

也有流落民间者，他们自谋生路，日事传写。在雕版印刷尚未发明（或尚未普及）的时代，图书的制作方式主要靠人工抄写，经生的数量是很多的。上表中，敦煌镇经生就有张显昌、刘广周、马天安、令狐礼太、令狐崇哲等5人。无考的经生当会更多。这说明敦煌地区已经形成一支写工专业队伍。经生在抄完经卷之后，常常随手写上几句有关抄写、衣食住行、天气等方面的文字，这些文字为我们研究经生的生活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例如《伯2292·摩维诘经讲经文》末题：

> 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二十卷文书，恰遇抵黑。书了，不知如何得到乡地去。

这则题记说明经生的工作十分繁忙，从早上一直抄到天黑。为了糊口，他不得不这样做。天黑抄完之后，想返回遥远的家乡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呢？他左右为难，不知如何度过这漆黑的夜

晚。这一夜，他也许露宿街头，也可能栖身破庙，经生的困苦生活于此可见。

《敦煌遗书》佛经写本除了署有供养者、抄写者姓名之外，还有校勘者、装潢者姓名。如《斯003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除了题写书手吴元礼的姓名之外，还题有校书手萧祎、装潢手解善集的姓名；《斯0312·妙法莲华经卷第四》除了题写书手封安昌的姓名之外，还题有校书手怀福、玄真和装潢手解善集的姓名；《斯5319·妙法莲华经卷第三》除了题写书手程度的姓名之外，还题有校书手大道、智安和装潢手王恭的姓名；《伯3709·佛地经》除了题写书手郗玄爽的姓名之外，还题有装潢手辅文开的姓名，等等。解善集大概是个装潢能手，由他装潢的经卷很多，有案可查的就有20余种。为什么经卷抄过之后，还要校勘呢？因为经卷的版本很多，抄误本对"造功德"是不利的。《斯0102·梵网经佛说菩萨心地戒》在校勘时，网罗19种不同的版本，反复比较。该卷题记说：

> （右此戒本）约共勘校一十九本，将为句义圆满，文字楷定，稍具备于诸本，是故文有多少，差别不同，所以然，恐时人见之欲传，传受者遂妄致生疑执怪，因兹疑怪，则便起讥嫌，有爱有憎，或赞或毁，以赞毁故，乃动其三业，故当即俱坠陷诸宿于恶道邪途之中，自招殃累，讵保安乐。

写本经卷反复校勘，并请装潢手认真装潢，反映了善男信女的虔诚之心。

《敦煌遗书》之外的佛经写本

《敦煌遗书》中的佛经写本是偶然流传下来的，《敦煌遗书》之外更多的佛经写本没有流传至今。史书上有不少写经的记载，例如南朝梁处士刘慧斐"手写佛经二千余卷，常所诵者百余

卷”。[①]南朝陈徐陵之弟徐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饥寒。后主敕石头津税给之。孝克悉用设斋写经，随尽”。[②]石头津税当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经济来源，写经之多，可想而知。隋文帝开皇九年（581年）普诏天下写经（详第二编第二章第四节），规模空前。据张遵骝《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记载：唐代写经者如贞观十年（636年）郑惠王元懿写藏经三千卷；贞观六年（632年）中天竺沙门波颇译诸经毕，敕各写十部流布海内；龙朔二年(662年)净土宗善导和尚念阿弥陀佛，写《弥陀经》数万卷；麟德元年(664年)命沙门惠概等参覆量校所写一切经，共合新旧八百一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天宝元年（742年)鉴真和尚写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天宝七年(748年)杨贵妃兄鸿胪卿杨铦为玄宗写一切经五千零四十八卷；上元二年（761年)肃宗有疾，皇后刺血写佛经；大历十四年（779年)长安郑道觉巡礼五台，舍财写金银字大藏经六千卷；咸通十一年（870年)懿宗诞辰之日，命福寿寺尼缮写大藏经五千四百六十一卷。据赞宁《宋高僧传》记载，唐代写经者还有：唐释鼎尚写经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子瑀写经一万六千卷；玄览写经二千余轴；文纲刺血写经六百卷；增忍刺血写经二百八十三卷。宋代写经者如莫用之写经四十八函、四百五十余卷；[③]海惠院写经八百函、五千四百零八卷，[④]等等。

总而言之，由于佛教的传播，历代佛经写本是很多的。传世佛经写本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等闲视之。

---

① 《梁书·处士传》。

② 《南史·徐摛传》。

③ （宋）刘一止：《苕溪集》卷二十七。

④ （宋）陈舜俞：《都官集》卷八。

第二章　雕版印刷的起源

一、雕版印刷起源的研究方法

雕版印刷起源关系到图书制作方式的划时代转变，它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划时代的贡献

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划时代贡献，因为它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带来无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经济效益而言，它解放了生产力，把千千万万的书手和学者从繁琐的抄书工作中解放出来；它提高了生产效率，缩短了出书周期，加快了知识信息的传播速度；它降低了图书成本，减轻了读者的经济负担，扩大了知识信息交流的广度。就社会效益而言，印刷术的出现，使各类图书有更多的机会付梓刊行，调动了文人学者著书立说的积极性；它造就的大量图书，促进了公私藏书的发展，对于保存古代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造就的大量图书，为人们接受教育和吸收外来文化，提供了精神食粮，对于提高整个人类的文化素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雕版印刷起源的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印刷术大致可以分为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两个大类。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早于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术是印刷术的初级阶段，活字印刷是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那么，雕版印刷发明于何时？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研究的方法。我们认为，研究雕版印刷起源，应该把理论分析、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从长远观点看问题，三者应该是一致的。进行理论分析，离不开社会需要、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所谓“社会需要”，就是客观要求。如果社会上没有这种需要，就不会产生任何有价值的发明创造。所谓“物质基础”是指发明创造的物质前提。没有物质，就没有万事万物，这是不言而喻的。所谓“技术基础”，是指发明创造所必需的技术前提，没有高度的技术水平，也不可能有任何发明创造。因此，社会需要、物质基础、技术基础三者缺一不可。社会需要是必要性，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是可能性。只有必要性而无可能性，就不能把理想变为现实；只有可能性而无必要性，再大的发明创造也只不过是一堆废物。譬如吃饭，首先要有吃饭的欲望，肚子要饿，饥肠辘辘。如果根本不饿，一点没有进食要求，就不会发生吃饭这件事。但如果要吃饭，还要有物质条件，没有米，照样吃不成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吃饭的要求，有了米，没有烹饪技术，照样吃不成饭。当然，有无必要在吃饭问题上搞点发明创造，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于雕版印刷而言，所谓“社会需要”，就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读者需要更多的知识、了解更多的信息，要求社会提供大量复本；书工要求摆脱繁重的抄书之役；著者要求用更快更好的方式把自己的作品公诸同好，吸引更多的读者；藏书家要求不断补充自己的藏书……凡此种种，都属于社会需要，原来手工抄写的落后方式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这种社会需要，新的图书制作方式的发明已是众望所归。所谓“物质基础”是指纸、木材、墨等。纸是雕版印刷发明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没有纸就没有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所需木板是用梨枣等材料制成的，没有梨枣等木材，也不可能有雕版印刷。所谓“技术基础”是指雕版印刷工艺流程的产生。一般认为，雕版印刷技术就是印章面积的扩大和捶拓刷印技术的有机结合。在中

国历史上曾有多次雕刻石经之举。石经是官方审定的正本，不少学者的读本就是他们面对石经一字一句抄写下来的。久而久之，觉得这样抄写速度太慢，也容易抄错，为了提高效率、避免差错，有人就发明了捶拓的方法（详第二编第九章第二节）。采用捶拓的优点是效率高、错误少，只要石经本身没有问题，在捶拓过程中就不会出现新的错误。另外，捶拓的刷印方法，用力均匀，不管面积有多大，字迹也都是清晰的。但是，捶拓也有缺点：一是石头既笨重又坚硬，刻石极为不易；二是拓本黑底白字，阅读效果不甚理想。于是人们就去寻找新的办法。印章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殷墟中曾发现三方商玺，周代大量出现青铜印，秦代多以篆文入印，汉代印章空前兴盛，品种越来越多，价值越来越高，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大量多字印，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说：

> 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

“黄神越章之印”四寸见方，印文长达120字，简直可以说是一篇短文了。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陋室铭》也只有81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也只有89字，说黄神越章之印是一篇短文是毫不夸大的。印章的优点是用刻制的阳文反字印成白纸黑字，阅读效果较好。缺点是印章面积不能过大，否则钤印时，压力不易掌握均匀，会造成字迹墨色浓淡不一。后来，人们又进行了新的设想：如果把捶拓刷印的方法同印章阳文反字的刻字方法结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既可解决钤印压力不匀、墨色浓淡不一的问题，又可解决石料笨重、拓文阅读效果不甚理想的问题，岂不两全其美？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由此可知，雕版印刷的发明与捶拓、治印技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捶拓和印章，就没有雕版印刷。如上所言，印章历史

悠久，早在先秦就已经有了。然而捶拓技术出现在什么时候，至今迄无定论。因此，探索捶拓技术的出现时代，就成了研究雕版印刷起源的一个关键问题。

总之，研究雕版起源要从社会需要、物质基础、技术基础三个方面综合考察。除了从正面论述之外，还可以八面出击，从侧面加以论证。这里所谓“侧面”，主要指雕版印刷带来的社会效果。无音不响，无垂不缩。雕版印刷的发明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必然在社会上引起连锁反应。书业贸易、公私藏书等都会受到较大影响。随着雕版印刷的出现，图书数量剧增，书业贸易势必因此而日益发达；公私藏书势必因此而日益增多，这些社会效益可以作为我们考察雕版印刷起源的旁证。当然，影响书业贸易、公私藏书的因素很多，但是比较而言，雕版印刷的发明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只有通过上述全方位的考察，才可能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结论。就目前的研究情况而言，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不可知论。以为雕版印刷的起源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因而不去积极探索，而是守株待兔，把希望寄托在出土文物上。不可否认，出土文物对于印证历史事实非常重要，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件出土文物或许就可以一锤定音。但是须知，文物出土需要时间，出土古籍不可能年年有、月月有。另外，即使有了古籍出土，其断代也不一定是最早的。雕版印刷是一件客观存在的事物，而不是人们虚构的幻影。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其发明时间是完全可以知道的。（二）抓住文献记载中的片言只语，大作文章。不可否认，挖掘历史文献是我们探索雕版印刷起源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要把文献记载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要把文献记载同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否则，脱离历史背景在那里咬文嚼字，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另外，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应当广泛涉猎，多多益善。否则抓住一二篇文献就匆忙作出结论，也是靠不住的。

二、聚讼纷纭

雕版印刷起源于何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兹汇集整理如下：

第一，东汉说。首先提出此说的是元人王幼学。清人郑机附合此说（详本章第三节）。

第二，晋代说。据今人向达《唐代刊书考》，十九世纪末叶法国人拉古伯里根据《蜀志》和《周书》，以为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四川成都始用雕版印书。但查遍二书，没有发现这样的记载。

第三，六朝说。六朝是指吴、东晋、刘宋、齐、梁、陈六个朝代，也是三世纪到六世纪末前后300余年的泛称。清李元复《常谈丛录》卷一说：

> 书籍自雕镌板印之法行，而流布始广，亦藉以永传。然创之者初不必甚难，以自古有符玺可师其意，正无待奇想巧思也。窃意汉蔡伦造纸之后，当魏晋六朝宜有继起而为之者矣，但未盛行耳。

第四，隋代说。首先提出此说的人是明代陆深，其后明人胡应麟、方以智，清人阮葵生、王士禛等亦倡此说（详本章第四节）。

第五，唐代说。提出"唐代说"的人较多，归纳起来，又可分为初唐、中唐、晚唐三种意见。"初唐说"以张秀民先生为代表，他根据明人邵经邦《弘简录》的记载，提出"唐初贞观说"（详本章第五节）。提出"中唐说"的有清代赵翼、王国维等人（详本章第六节）。首先提出"晚唐说"的是宋人叶梦得，他在《石林燕语》卷八中说：

世言雕版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耳。柳玭《家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

柳玭在蜀的时间是中和三年（883年），属于唐代晚期。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六也说：

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

清代朱彝尊、王士禛、叶德辉等人亦倡此说，

第六，五代说。宋王明清首倡此说，他在《挥麈余话》卷二中说：

毌丘俭（案：当作"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

明人罗颀、杨慎，清人万斯同等亦主此说。

以上六说孰是孰非，需要认真研究。"晋代说"查无实据，"六朝说"但凭臆测，"五代说"为时太晚，不复赘述。兹就"汉代说"、"隋代说"、"唐代说"进行认真的讨论。

三、"刊章捕俭"辨

范晔《后汉书》中有关于"刊章捕俭"的记载，元人王幼学解释说："刊章，印行之文，如今板榜。"① 以上就是"东汉说"的立论根据。

---

① 《纲目集览》卷十二。

“刊章捕俭”的经过

“刊章捕俭”事件发生在东汉后期。当时宦官专政，胡作非为，引起了官僚和知识分子的不满。首都洛阳三万太学生是反对宦官专政的主力军。他们讨论政治、抨击宦官、大造舆论，得到了朝野官僚和士子的广泛支持。宦官对此恨之入骨，诬称官僚和太学生结为朋党，图谋不轨，进行了残酷镇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先后发生两次：第一次发生在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逮捕司隶校尉李膺等200余人。后来，这些人虽被释放，但终身不得做官。第二次发生在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一直延续了十多年，其时间之长、株连之广、手段之狠，远远超过第一次。“刊章捕俭”事件就发生在建宁二年(169年)。这一年，大宦官侯览仗势欺人，无恶不作，山阳都督张俭上书请杀侯览，侯览则有恃无恐，唆使朱并上告，反诬张俭与同郡24人为党，图危社稷，朝廷借此下诏大捕张俭等所谓“党人”，连过去释放的李膺等人也一并构陷在内，受牵连者达六七百人之多，张俭被迫逃亡，这就是“刊章捕俭”事件的大致经过。

“刊”字或系“刑”字之误

《后汉书》关于“刊章捕俭”事件的记载主要有四处：

> 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俭为之魁，灵帝诏刊章捕俭等。
>
> ——《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 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请为东部督邮。时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乡人朱并，素性佞

邪，为俭所弃，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

——《后汉书·张俭传》

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俭与融兄褒有旧，亡抵于褒，不遇。时融年十六，俭少之而不告，融见其有窘色，谓曰："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邪？"因留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遂并收褒、融送狱。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褒焉。

——《后汉书·孔融传》

建宁二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督邮张俭因举奏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及诸罪衅，请诛之。而览伺候遮截，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冢宅，藉没资财，具言罪状。又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干乱郡国，复不得御。览遂诬俭为钩党，及故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等，皆夷灭之。

——《后汉书·侯览传》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以上四处记载有两个地方不一致：一是"刊章捕俭"的时间不一致。《张俭传》作"延熹八年"（166年），即发生在第一次党锢之祸时。《孔融传》无明确记

载，只是说“时融年十六”，考孔融生于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十六岁正值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侯览传》亦作“建宁二年”。“建宁二年”是发生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头一年。显然，《张俭传》的时间是错误的，《孔融传》和《侯览传》的时间是正确的。二是“刊章捕俭”的结局不一致。《张俭传》说“俭得亡命”，《孔融传》说“俭得脱走”，而《侯览传》却说“皆夷灭之”。显然，《张俭传》和《孔融传》的结局是正确的，而《侯览传》的结局是错误的。另外，清人何焯指出：《后汉书》关于览母的记载也不一致，《张俭传》说：“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苑康传》说：“是时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考《宦官传》可知，张俭“不过追论览母生时罪恶”，览母并非张俭所杀。显然，《张俭传》的记载是正确的，而《苑康传》的记载是错误的。① 以上三处错误表明，《后汉书》关于“刊章捕俭”的记载并不完全可信。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后汉书》关于“刊章捕俭”的记载还有其它失误之处。范晔写《后汉书》曾参阅过班固等《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等多种著作，这些著作多已失传。流传至今者仅有《东观汉记》辑本和其它一些记载。关于《东观汉记》内容的时代下限，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经指出：“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② 张俭死于建安三年（198年），即永初之后90余年，和续作《东观汉记》的马日磾、蔡邕等是同时代的人，因此，《东观汉记》中不可能有关于张俭事迹的记载。关于“刊章捕俭”的事件的原始资料，传世文献仅见于《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中。《艺文类聚》摘引的是孔融《卫尉张俭碑铭》；《初学记》摘引的是司马彪《续汉书》中的一段话。具体内容如下：

---

① 《义门读书记·后汉书》。
② 《史通·古今正史》。

中常侍同郡侯览专权王命，豺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西都督邮上览祸乱凶国之罪，鞠没赃奸，以巨万计，佞而制书案验部党，君为览所陷，亦章名捕逐。当世英雄，受命殒身。以籍济君厄者，盖数十人，故克免斯艰，旋宅旧宇，众庶怀其德，王公慕其声，州宰争命，辟大将军幕府，公车特就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复以卫尉征，明诏严切，敕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

——《卫尉张俭碑铭》

山阳张俭以忠正为中常侍侯览所忿疾，览为刑章下州郡，召捕俭。俭与孔融兄褒有旧，亡投，遇褒出。时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俭长者，有窘迫色，谓曰："吾独不能为君主乎？"因留舍藏之。后以客发泄觉知，国相以下密就掩，俭得脱走，登时收融及褒送狱。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融当坐之。"褒曰："彼来投我，罪我之由，非弟之过，我当坐之。"兄弟争死，疑不能决，乃上谳，诏书令褒坐焉。

——《续汉书》

据此可知，《后汉书》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中并没有"刊章"二字，《卫尉张俭碑铭》说是"章名捕逐"，《续汉书》说是"刑章下州郡"。如果再认真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后汉书·孔融传》关于"刊章捕俭"的叙述与《续汉书》的叙述何其相似乃尔！除了"吏问其母"数句之外，其余文字大同小异。我们简直可以断言：《后汉书·孔融传》的那段文字基本上是从《续汉书》抄来的。如果这种分析正确的话，那么，《后汉书·孔融传》中"刊章下州郡"当是"刑章下州郡"之误。"刊"、"刑"二字只有一笔之差，因形似而致误。古人抄书，形似致误之例实在太多，不值得大惊小怪。原文"刑章下州郡"，意为把张俭触

犯刑法的事实，以公文的形式下发到各个州郡，要各地配合，逮捕归案。也许有人以为《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的引文未必可靠。《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先后成书于唐代初期和中期，当时很多古籍尚未失传，例如魏徵等撰《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有司马彪的《续汉书》，这说明唐初《续汉书》尚有传本。既然《艺文类聚》和《初学记》所征引的材料大多出于原书，那么，其真实性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另外，我们今天看到的《艺文类聚》和《初学记》都是经过名人点校的善本，这两个本子综合了各本之长，吸取了前人的校勘成果，也不存在传抄致误的问题。据统计，《艺文类聚》征引各类书籍1431种，现存者不到十分之一。《初学记》也征引了不少古籍。这些征文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成为古籍校勘和辑佚的重要工具。况且《卫尉张俭碑铭》出自孔融之手，其内容就更值得重视，因为孔融和张俭是同时代的人，并且还亲自救过张俭，其记载当是可信的。

释“刊”与“章”

当然，“刊”字系“刑”字之误，只是我们的初步分析，也不能把话说得太绝对。退一步说，如果“刊”字并非“刑”字之误，“刊”字能否当“刻”讲呢？我们以为也是不可以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刊”：“剟也，从刀干声”；释“剟”：“刊也，从刀叕声”；释“删”：“剟也”。由此可知，东汉时，“刊”、“剟”、“删”三字互训，这就是说“刊”、“剟”二字与“删”同义，即删削之义。如《古文苑·扬雄答刘歆书》：“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汉代之字大多写在竹简上，有错就削去。“不刊”即无须修改，不可磨灭之意。《说文解字》于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进上，张俭事件发生于汉桓帝建宁二年（169年），比《说文解字》的成书时间只晚40多年，应该说词义还不会有多大变化。汉代表示“刻”的意思多用“刻”、“镂”二字，清人段玉裁说：“金谓之镂，木谓之刻，此析言

之，统言则刻亦镂也。”①当然，汉代也有用“刊”表示“刻”义的，但用于“刻”义的“刊”字，其对象是石而非木，如《后汉书·巴肃传》：“刺史贾琮刊石立铭以记之。”《后汉书·陈寔传》：“共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为什么刻石称“刊石”呢？段玉裁说：“凡有所削去谓之刊，故刻石谓之刊石。”②这说明“刊”字用于“刻”义，源自“有所削去”之本义。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唐李贤和宋胡三省对于“刊章捕俭”的注解完全正确，李贤注说：“刊，削。不欲宣露并名，故削除之，而直捕俭等。”③胡三省注说：“刊章者，刊去并姓名而下其章也。”④汉代诉讼公文叫“录牒”，据《后汉书·党锢列传》：

时侍御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

可见“录牒”是拘捕党人的凭证。又据《汉书·杜周传》：

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

这里，“章”也即“录牒”，“章”中包含若干“逮证案”。“逮证案”中有犯罪事实和举报人姓名。“刊章捕俭”之“章”当即这个意思。汉代之“章”是写在版牍上的。据《史记·绛侯

① 《说文解字注》刀部释“刻”。

② 同上书刀部释“刊”。

③ 《后汉书·党锢列传叙》李贤注。

④ 《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八·灵帝建宁二年》胡三省注。

周勃世家》：

> 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

"牍背"就是版牍的背面，版牍的正面当是办案公文，即上文所谓"章"（录牒），章（录牒）背有揭发者的姓名。朱并受侯览指使，诬告张俭，侯览作贼心虚，把朱并之名削去，也是合情合理的事。至于后来"刊"义不局限于删削或刻石，而扩大到刻木，那完全是词义变迁的结果。例如《清史稿·史绍登传》称"士民刊章，胪绍登政绩"，同书《钱澄之传》称阮大铖"刊章捕治党人"，其中，"刊"字都是以木刻印之意。但是须知，这里讲的是明清之事，而张俭事件发生于1500年前的汉代。汉语常识告诉我们：词义因时而异，是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不可以今律古。还有几个问题也值得深思：汉代党锢之祸受迫害的人很多，然而奇怪的是，"刊章"二字在《后汉书》中仅见于张俭事迹，其它人均无"刊章"之事。如果"刊"字当"刻"讲，为什么逮捕别人不用"刊章"呢？如果东汉发明雕版印刷，为什么除了"刊章捕俭"之外，文献无征呢？

总之，"刊章捕俭"的"刊"字似非刻印之意，或系"刑"字之误。据此，东汉发明雕版印刷似不可能。

四、"雕撰"辨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中有关于"废像遗经，悉令雕撰"的记载，明陆深、胡应麟、方以智以及清阮葵生、王士禛等人以为这个"雕"字就是雕版印刷的意思。这是"隋代说"的立论支柱。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的原文是：

> 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隋皇帝佛弟子姓名敬白……属周代乱常，侮蔑圣迹，塔宇毁废，经像沦亡，无隔华夷，扫地悉尽……（弟子）作民父母，思拯黎元，重显尊容，再崇神化，颓基毁迹，更事庄严，废像遗经，悉令雕撰……

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我们认为："雕"是雕塑的意思，所雕者，佛像也；"撰"是纂集的意思，所撰者，佛经也。"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应当理解为：敕令重新雕塑被后周废毁的佛像，重新纂集被后周所丢弃的佛经。

"经"和"像"

为什么佛教文献常将"经"、"像"二字并提？如前所言，佛教把造像、写经、念佛、诵经、布施等视为"功德"之事，其中尤重造像，因此，佛教又称"像教"。造像的种类很多：有用木石玉牙等作为材料的雕刻像，有用金银铜铁作为材料的铸像，有泥塑像、砖像、瓷像、绣像、画像，等等。其中以雕刻像、铸像、泥塑像为多。北周高僧慧远曾说："耳目生灵，赖经闻佛，藉像表真。"① 佛教认为：富人造像，活着能够享受荣华富贵，死后可以进入"极乐世界"；穷人造像，大小不拘，以财力而定，"乃至极小，如一指头，能令见者知是尊容"，就可以"永离贫穷，大富充足"。② 造像和写经，对于佛教信徒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两件事情。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南北朝和隋文帝时期佛教的发展历史。

---

① （唐）道宣：《续高僧传·慧远传》。

② 《大乘造像功德经》卷下。

废像遗经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造像、写经的极盛时期。北魏明元帝崇信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①孝明帝时，拥有佛寺3万余所，其中洛阳就有1367所，各寺都有不少佛像。每年四月八日（释迦牟尼生日）诸寺佛像汇集景明寺，举行行像仪式，佛像多至1000余躯。②另外，北魏时期还修了不少石窟，例如大同云冈石窟，造像5100余躯，多完成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洛阳龙门石窟造像10万余躯，其中三分之一是北魏雕造的。除了造像之外，北魏写经亦多。《敦煌遗书》中不少佛经都是北魏时写的。北齐孝昭帝为“先皇写《一切经》十二藏，合三万八千四十七卷”。③北周明帝为先皇敬造等身檀像12躯，“丽极大成，妙同神制”。④南朝佛教虽然偏重义理，但也有一些造像，传世有宋文帝元嘉间造像两躯：一躯为元嘉十四年（437年）韩谦造；一躯为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刘国造。齐永明二年（484年）临沂令仲璋等于千佛岩雕造一躯无量寿像和二躯菩萨像，佛像身高3丈1尺5寸，菩萨像高3丈2尺。梁武帝佞佛尤甚，修了不少佛寺，各寺也有不少造像，例如智度寺金像一躯，高1丈8尺；光宅寺有无量寿佛铜像，高1丈9尺。

既然南北朝时期，造像写经如此繁荣，为什么又会出现“废像遗经”的局面呢？这是因为物极必反，任何事物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走向反面。在南北朝佛教鼎盛之际，儒家阳固、李玚、张普惠、高谦之、杨衒之、刘昼、崔浩等发表了不少排佛的言论。北魏阳固主张“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以存元元之

---

① 《魏书·释老志》。

② 《洛阳伽蓝记·景明寺》。

③④ （唐）法琳：《辩正论》卷三。

民，以救饥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悦亿兆之望”。[①]北魏李玚称佛教为“鬼教”，他说：佛教主张弃亲出家，断子绝孙，“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一身亲老，弃家绝养，既非人理，尤乖礼情，堙灭大伦，且阙王贯”。[②]北魏杨衒之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③]乃撰《洛阳伽蓝记》，借记述洛阳寺塔之盛来说明佞佛无益之理。北齐刘昼上书以为“佛法诡诳，避役者以为林薮”；[④]北魏崔浩“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⑤]在上述议论的影响下，北朝有两个皇帝先后采取了排佛行动，这两个皇帝就是魏太武帝和周武帝。太武帝起初也信奉佛法，礼敬沙门，后来在崔浩的劝说下转而排佛，太武帝下诏说：

> 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有司广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⑥]

结果经像焚毁，“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⑦]周武帝践祚之初亦信佛教，度僧1800人，写经1700余部。后来，在张宾等煽动下，断然排佛，“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⑧]“数百年来，官私佛寺，扫地并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禹贡八州，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弟子，减之百

---

① 《魏书·阳尼传》。
② 同上书《李孝伯传》。
③④ （唐）道宣：《广弘明集·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⑤⑥ 《魏书·释老志》。
⑦ （梁）慧皎：《高僧传·昙始传》。
⑧ 《周书·武帝纪》。

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① 由此可见，“废像遗经”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悉令雕撰

隋文帝在尼姑庙里出生，并由尼姑抚养成人，他对佛教有特殊的感情。他当然不会坐视“废像遗经”的局面继续下去，“悉令雕撰”是历史的必然。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刚即位，就迫不急待“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影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② 隋初，全国有200余州，其中称得上“大都邑”者不下数十，如果每个“大都邑”都写经一部，其卷帙之多，可想而知。为了防止鱼目混珠、真伪相杂，乃敕沙门法经，针对各种本子进行整理。据统计，隋文帝在位期间，总共写经46藏、132086卷。另外，还整理故经3853部。③ 隋文帝之子杨广在平陈过程中任行军元帅，平陈之后“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合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④《敦煌遗书》中也有不少佛经是隋文帝时抄写的，如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庆义写《大比丘弥沙塞戒本》、开皇十三年（593年）李思贤写《大智论》、开皇十五年（595年）何孝聪写《大方等大集经》、仁寿四年（604年）楹维珍写《优婆塞戒经》等等。为了雕塑、修整废毁佛像，隋文帝和皇后分别施绢12万匹，并敕“王公以下台官、主将，以至州县佐史、诸寺僧尼、京城宿老，下逮黔黎，一一施钱，再日设斋，奉庆经像”。⑤ 对于那些继续破坏佛像者，严惩不贷。开皇

① 《续高僧传·静蔼传》。

② 《隋书·经籍志》。

③④ 《辩正论》卷三。

⑤ 《什氏稽古略》卷二。

二十年（600年）下诏说：

> 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①

据统计，隋文帝年间，共造佛像106580躯。②除了写经、造像之外，隋文帝还先后三次下诏各州建舍利塔113座，在全国修建佛寺四五千所，度僧数十万人。

以上事实表明，“废像遗经”是周武帝排佛的结果，“悉令雕撰”是隋文帝佞佛的手段，无论周武帝时废毁的经像，或是隋文帝时重新“雕撰”的经像，都绝不是雕版印刷品。用“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作为“隋代说”的根据，是不足为凭的。

五、“梓行”辩

明邵经邦《弘简录》说：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死后，宫司上其所撰《女则》一书，“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有的同志认为：这里“梓行”二字即雕版印行之意，说明唐初就发明了雕版印刷。这是“唐初说”的主要依据。

释“梓”

从训诂的角度分析，“梓”字在唐代还没有“刻”的意思。《说文解字》释“梓”：“楸也。”这就是说，“梓”的本义是名词“楸树”。陆德明《经典释文》是研究唐代以前字词音义的工具书，该书释“梓”：“音子，本亦作杍。马云：古作梓字，

---

① 《隋书·高祖纪》。

②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百。

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治木器曰梓”是从“梓”的本义引申出来的。唐代称木匠为“梓人”，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名叫《梓人传》。“梓人”之“梓”即“治木器”之意。可见，“梓”字在唐代并无“刻”意。唐代表示刻版印行多用“印卖”、“版印”、“雕印”、“造”、“雕镂”、“雕板”等字眼。（详第二编第三章第一节引文）。就是到了宋代，“梓”字仍然没有“刻”的意思。宋陈彭年等编《广韵》和《大广益会玉篇》是查找宋代字词音义的重要工具书。《广韵》据隋陆法言《切韵》修订而成，以韵分类编排，兼释字义，该书释“梓”：“木名也。”《玉篇》本为梁顾野王所撰，唐孙强据以删节而为《玉篇抄》，宋陈彭年等又据孙强本重修为《大广益会玉篇》，该书释“梓”亦云“木名”。这就是说，直到宋代，“梓”字仍然保留它的本义，没有多大变化。至于宋人称刻版为“锓梓”、“刻梓”、“绣梓”云云，这些词组均为动宾结构，“锓”、“刻”、“绣”等字是动词，“梓”字仍然是其本义，名词作宾语。因为“梓”是雕版的最佳材料，所以宋人用“梓”泛指一切适宜雕版的木料。又据宋陆佃《埤雅》：“梓为百木长，故呼梓为木王。罗愿云：屋室有此木，则余材皆不震。”可见人们对于“梓”的崇拜程度。“梓”既为“木王”，当然就具备代表所有木料的绝对资格。由此可知，“锓梓”、“刻梓”、“绣梓”就是“锓木”、“刻木”、“绣木”的意思。宋代以后，“梓”字才由本义引申而为“雕刻木版”的意思。明张自烈撰《正字通》释“梓”：“俗谓锓刻文字于版上曰梓。”例如明袁宏道《叙尚氏家绳集》：“近者吴川公梓其家集。”明郭云鹏刻本《曹子建集》牌记：“曹集之讹，尝一正之，因梓于家。”“梓行”二字连用，如明张居正《张文忠公集・书牍三・答奉常陆五台》：“闻以《华严》合《论》梓行，此稀有功德也，刻成，幸惠寄一部。”但是需要指出，即使在宋代以后，“梓行”二字连用并不常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刊刻之名义》说：

元明坊间习用者，多曰“绣梓”……盖一时风气，喜用何种文辞，遂相率而为雷同之语，胜代（指明代）至今四五百年，书坊刻书皆曰“绣梓”，亦有用“新刊”字者。

总之，从“梓”义沿革源流来看，宋代以前，“梓”不训“刻”，“刻”义是宋代以后才有的。即使贞观间真正发生了刻印《女则》这件事，也不会使用“梓行”这两个字。“梓行”二字似是邵经邦强加给唐代的。

从原始材料分析

从《弘简录》引据的原始材料分析，“梓行”似属无中生有。邵经邦编写《弘简录》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可能很多，但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和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这四部大书则是非读不可。因为这四部书编写时间早，影响较大，其中关于《女则》的记载，所依据的都是当时尚未失传的有关唐史的第一手材料。那么，这四部书关于《女则》的记载如何呢？

（长孙皇后）崩后，宫司以（《女则》）闻，太宗览而增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我岂不达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

——《旧唐书·后妃上》

（长孙皇后）崩后，宫司以（《女则》）闻，太宗览而增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我岂不达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益令人哀耳。”

——《太平御览·皇亲部七》

及（长孙皇后）崩，宫司以（《女则》）闻，帝为之恸，示近臣曰："后此书可用垂后，我岂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

——《新唐书·后妃上》

及（长孙皇后）崩，宫司并《女则》奏之，上览之悲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

——《资治通鉴·唐纪十》

由此可见，四书均无"梓行"之类的话语。四书关于《女则》的记载大同小异，《旧唐书》和《太平御览》的记载甚至完全一样，（《太平御览》只是在最后一句话中多了一个"益"字）。这说明四书所依据的原始材料是一致的，原始材料中均无"梓行"之事。邵经邦《弘简录》关于"梓行"的记载是值得怀疑的。也许有人会说：邵经邦编写《弘简录》可能参考了四书以外的许多资料，其中包括不少野史笔记，野史笔记中往往有不少出版印刷方面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官修书常常弃而不录，毕昇泥活字不是仅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吗？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也难以成立。邵经邦参考的资料再多，也决不会超过编写四书参考资料之多。例如《太平御览》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征引古籍多至1689种，而《弘简录》成书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比《太平御览》晚573年，当时不少唐代文献资料已经失传，因此，邵氏不可能占有更多的资料。另外，官修书对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不大重视也是事实，但不能一概地说，官修书对于出版印刷之类的事情弃而不录，《宋史》、《明史》等正史中就有不少帝王诏令刻书的记载。关键在于毕昇活泥字和唐太宗诏令刻印《女则》不能相提并论，因为毕昇和唐太宗的身份不一样，

毕昇是一个民间布衣，而唐太宗却是高居万人之上的皇帝，毕昇的成就再大，正史中也不可能有他的位置。而唐太宗就不同了，他的一言一行均有档案可查，如果确有刻印《女则》一事，一是不会漏记的。

唐代内府图书的制作

从唐代内府图书的制作情况分析，“梓行”《女则》也不大可能。根据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唐代的文献资料，唐代内府图书概用手抄。规模较大的抄书活动至少有四次，其中第二次就发生在唐太宗贞观年间（详第二编第一章第二节）。如果当时内府已经使用雕版印书的话，唐太宗何乐而不为？就内府所藏帝后著作而言，数量很多，计有《太宗集》、《太宗凌烟阁功臣赞》、《太宗序志》、《太宗帝范》、《高宗集》、《高宗天训》、《中宗集》、《睿宗集》、《玄宗周易大衍论》、《玄宗韵英》、《玄帝注道德经》、《玄宗开元广济方》、《明皇制昭录》、《德宗贞元集要广利方》等。这些帝后著作也是人工抄写的。例如《唐会要·修撰》卷三十六明确记载：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十月八日“颁《御注道德经》并疏义，分示十道，各令巡内传写，以付宫观”。玄宗天宝十四年比太宗贞观十年（636年）晚119年，既然唐玄宗的著作诏令“传写”，那么，119年之前的帝后著作更不应例外。

总而言之，邵经邦《弘简录》关于“梓行”《女则》的记载是不足为据的。唐初是否发明雕版印刷，还有待于寻找新的证据。

六、“模勒”辨

白居易的诗友元稹所撰《白氏长庆集》的序文中，出现“模勒”二字，清人赵翼因解释说：“模勒即刊刻也，则唐时已开其

端欤！"① 王国维也说："夫刻石亦可云模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雕板不可，则唐之中叶吾浙亦已有刊板矣。"② 现在出版的书史和版本学著作也都因袭赵翼、王国维的说法，认为早在唐代就出现了白居易诗文集的刻本。这也是"唐中说"的主要根据之一。

"模勒"二字到底怎样解释？模，即模仿写作之意，如旧题汉班固撰《汉武帝内传》云："（刘）彻书之金简，以身模之焉。"《北史·冀俊传》云："善隶书，特工模写。"勒，即编辑之意，如王勃《王子安集·续书序》云："始自总章二年，洎乎咸亨五年，刊写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唐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唐故相国李公集记》云："肇自从试有司，至于宰天下，词赋诏诰封章启事歌诗赠饯金石飏功凡四百余篇，勒成二十卷。""模勒"二字联系在一起，就是模写编辑之意。下面从四个方面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

从上下文的语意看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 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原文小字注：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

这一段话有两层意思："其甚者"之前是第一层意思，这层意思中出现两个"模勒"，第二个"模勒"在小字注解中。实际上，小字注解就是对第一个"模勒"的解释。那么，小字注解应当怎样理解呢？"模勒乐天及予杂诗"数字作"书"的定语，是

①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

② （清）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

修饰“书”的，整个小字注解的意思是说扬越间有不少书商把模仿白居易、元稹作品而写的诗编集成书在市场出卖。从“其甚者”三字开始，以下为第二层意思。这里要特别注意“其甚者”三个字，这三个字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字承上，代指上文所说的那些刻意模仿白居易、元稹作品写诗的人；“甚者”二字启下，表示在模仿者之中，还有更为严重的情况。那么联系起来看，第二层意思就是说：在那些模仿白居易、元稹作品的写诗者之中，最严重的甚至欺世盗名，打着白居易、元稹的旗号，兜售模仿之作，牟取暴利，从而造成鱼目混珠、真伪参半的局面，有关人员对此毫无办法。这两层意思联系非常紧密：第一层意思是第二层意思的前提，第二层意思是第一层意思的深化。第二层意思是在第一层意思的前提下，进一步揭露了那些欺世盗名者。这就是说，当时模仿白居易、元稹作品写诗的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只是模仿写作，还不敢欺世盗名的人；另一类是胆大妄为，不仅模仿写作，而且敢于欺世盗名的人。这类人移花接木，硬把模仿之作，说成是白居易、元稹的作品，从中渔利。如果“模勒”当“刊刻”讲，上下文的语意就连不起来，“其甚者”承上启下的作用就无法解释。如“模勒”当“刊刻”讲，刻本自然就会直接署上“白居易”的名字，就不存在“盗窃名姓”的问题了，下文的“盗窃名姓”就无所指。如果“模勒”作“刊刻”讲，那么根据“模勒乐天及予杂诗”这句话，说明元稹的作品当时也有刊本。实际情况如何呢？白居易在给元稹所作的墓志铭中写道：“公著文一百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又集古今刑政之书三百卷，号《类集》，并行于代。公凡为文，无不臻至，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①既是“皆写传之”，就说明当时并无刻本，只是互相传

---

① 《白居易集》卷七十九。

抄而已。

从当时的社会风气看

元稹和白居易是唐代后期著名诗人，元稹曾说："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① 白居易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② 这说明元白诗歌影响之大。元白诗体影响了一代诗风。许多写诗的人争相模仿，欺世盗名者不一而足，此有文献为证，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说：

> 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

元和诗即指以元稹、白居易诗歌为代表的诗体。"递相仿效"即争相模仿元白的作品写诗。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说：

> 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

这里，"妄相仿效"即指那些胡乱模仿的人。元稹《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第七句说："元诗驳杂真难辨。"元稹自注云：

> 后辈好伪作予诗，传流诸处。自到会稽，已有人写宫词百篇及杂诗两卷，皆云是予所撰，及手勘验，无一篇是者。

---

① 《白氏长庆集序》。
② 《与元九书》。

这里，会稽即今之浙江绍兴，古代属越州管辖。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所称扬越间"有至于盗窃名姓"者，指的就是这种情况。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说：

又有《元白唱和因继集》共十七卷、《刘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赏宴集》十卷，其文尽在大集内录出，别行于时。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

这里，所谓"假名流传者"，即元稹所谓"盗窃名姓"者。辛文房《唐才子传·白居易传》说：

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

这里，所谓"伪者"，亦即元稹所谓"盗窃名姓"者。

以上记载说明模仿之风盛行，'盗窃名姓"者确实存在。"模勒"释作"模写编辑"是合情合理的，元稹的议论是社会风气的真实写照。

从白居易本人的记载看

白居易诗文作品有无刊刻，他自己最清楚，兹选录几段白居易的论述，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云：

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至太和三年春已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扶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儿编录，勒成两卷，仍写二本，一付龟儿，一付梦得小儿仑郎，各令收藏，附两家集。

这说明《刘白唱和集》是抄传的。白居易《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

记》说：

> 其集家藏之外，别录三本：一本置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中，一本置于庐山东林寺经藏中，一本置于苏州南禅院千佛堂内。

这说明《白氏文集》是抄传的。白居易在《白氏集后记》中说：

> 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

这说明《白氏长庆集》是传抄的。

从上述白居易的自白来看，其作品在当时均为写传，绝无刊板之事。为了永久保存自己的文集，白居易化费了不少心血，想了种种办法：首先，他非常重视作品的结集，到了一定时候，他就要做一番整理的工作。其作品结集次数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其次，在结集之后，尽量多抄一些复本，复本多了，遇到紧急情况，就不至于全部丧失。另外，复本抄好以后，分放多处。白居易家里珍藏的一份，安放在特制的文集柜中，他还专门作过一首《题文集柜》诗："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大小三千篇。诚知终散失，未忍遽弃捐。自开自锁闭，置在书帷前。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看。"①

① 《白居易集》卷三十。

当然，多数复本是交付寺院珍藏的。一般地说，寺院藏书比其它地方要安全一些。试想，如果白居易的诗文作品当时有大量刻本流传的话，白居易本人可能就不会有“诚知终散失”的后顾之忧了，也就不会去想那么多办法了。

从其它文人作品的流传情况看

如果白居易的诗文作品当时已经大量刊行，那么同时代的其它著名文人的作品也不应例外。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呢？兹举数例：

王维（701～760）字摩诘，祖籍祁（今山西祁县）人，后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唐代著名诗人、画家。生年比白居易稍早。其弟王缙代宗时出任宰相，王缙死于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当时白居易已经8岁。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

> 代宗好文，尝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缙曰：“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翌日上之，帝优诏褒赏。

据此，则王集当时无刊本，几于散佚。

卢纶（748～800？）字允言，河中蒲（今山西永济西）人，唐朝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以反映边塞生活的《塞下曲》著称于世。据《旧唐书·卢简辞传》记载：

> 文宗好文，尤重纶诗，尝问侍臣曰：“卢纶集几卷？有子弟否？”李德裕对曰：“纶有四男，皆登进士第，今员外郎简能、侍御史简辞是也。”即遣中使诣其家，令进文集，简能尽以所集五百篇上献，优诏嘉之。

据此，则卢集当时无刻本。

朱庆余，唐代著名诗人。和白居易、张籍是同时代的人。其诗辞意清新，描写细致，深为张籍所赏识，据《太平广记·朱庆余》记载：张籍"索庆余新旧篇什数通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于怀抱而推赞之。时人以籍重名，无不缮录讽咏"。据此，则朱集当时无刻本。

王维、卢纶、朱庆余等既为名人，其作品流传当是很广的。如果白居易、元稹的作品能够大量刻印的话，他们的作品似也应有刻本，但根据上述记载，他们的作品均为抄传，这就不能不叫人产生疑问：如果"模勒"当"刊刻"解释的话，为什么和白居易、元稹同时代的其它名人作品没有付诸剞劂呢？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模勒"似非"刊刻"之意，那么，白居易诗文集的最早刻本到底出现在什么时候？据现在所掌握的材料可知，宋代蜀本和吴本才是白居易诗文集的最早刻本。蜀本为何友谅刻，何友谅既刻其集，又作《年谱》，刊之集首。吴本为李伯珍刻，该本附有维扬李璜所作《年谱》。《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说：两本"编次亦不同，蜀本又有外集一卷，往往皆非乐天自记之旧矣"。可惜这两个本子今已不传，现存最早的宋刻本是南宋绍兴间杭州刻《白氏文集》，此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当然，我们不同意前人关于"模勒"的解释，并不是想要推翻"唐中说"（详本章第七节），只不过说，把它作为雕版印刷发明的例证，似不恰当。

七、几点结论

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种争论，将会长期持续下去。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文献记载的新发现和历史文物的出土，这个问题将会愈辩愈明。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似可形成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雕版印刷的发明是一个复杂的工艺过程，它不可能是在一个早晨由某一个人突然发现，只能划定一个大概的时间范围。这个时间范围既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把时间范围划得太小，认为雕版印刷是在短期内一蹴而就，甚至强行认定雕版印刷是某年某月某日由某人所发明，把发明雕版印刷看成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这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把时间范围划得太大，认为雕版印刷是在极为漫长的时期内发明的，甚至认为整个发明过程有千年之久，把发明雕版印刷看成是一件难以捉摸的事情，这同样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第二，要把雕版印刷普及应用时间同发明时间相区别。任何发明创造从产生到应用，都需要一个过程。一般地说，发明阶段的产品总是不成熟的，甚至是幼稚可笑的；而普及应用阶段的产品则是成熟的，甚至是有口皆碑的。雕版印刷也不例外。绝对不可把雕版印刷的普及应用时间同发明时间混为一谈，例如"唐初说"把刻印《女则》当作证据，上文已从训诂、原始资料等方面提出质疑。退一步说，假定唐初确有刻印《女则》之事，那么，说明当时雕版印刷已进入普及应用阶段，决非创造发明阶段，则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应由唐初而前推，"唐初"为时已晚。

第三，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当在唐代。理由如下：（一）商代已出现印章，晋代已出现多字印（详本章第一节）。（二）捶拓技术的发现不会晚于南北朝（详本编第九章第二节）。（三）晋代逐渐普及用纸，南北朝时纸张已广泛应用（详本编第一章第二节）。（四）早在先秦已发明了制墨技术，东汉出现制墨作坊，制墨技术日益精湛。（五）唐代著作如林，极需雕版印刷。唐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人著述甚丰：《全唐诗》九百卷收录唐代2200多位诗人的48900首诗歌；《全唐文》一千卷，收录唐代3042位著者的18400篇文章。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先秦到隋代著作仅只3497家。唐代不足300年，比3000年的著者总数还多。著述既多，阅读要求便会随之而来。靠人工

抄写去复制各类作品，远远不能满足阅读需要，一种高效率的图书制作方式的诞生已成千呼万唤之势。（六）唐代以后，书业贸易日渐发达。唐代以前，关于书业贸易的文献记载比较罕见。然而，唐代以后，文献记载逐渐增多。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记载了元白诗作在全国各地的发行情况（详本编第二章第六节）；《全唐文·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柳玭《柳氏家训序》、王谠《唐语林》等记载了成都、剑南、两川、淮南道、江东等地市场出售历日、阴阳杂记、占梦、相宅等类图书的情况（详本编第三章第一节）。当然，由于雕版印刷发明的时间还不长，唐代书业贸易不可能一下子扶摇直上，书业贸易的发展也同样需要时间。到了宋代，书业贸易已相当发达，出版家集出版、发行于一身，既刻书又卖书。国子监常常以优惠价推销图书，陈宅书籍铺、建安余氏等是闻名全国的书商；汴梁、临安、建阳等地是全国的图书发行中心。似可这样说，没有唐代雕版印刷的发明，就没有宋代书业贸易的繁荣，唐代雕版印刷的发明为宋代书业贸易的繁荣作了准备。（七）唐代以后，私人藏书日渐增多。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请看下列宋代之前可考私人藏书家统计表：

朝　代	可考藏书家	藏书数量		
		可考藏数者	万卷以下	万卷以上
先　秦	3	2	2	
汉	8	3	3	
三　国	4	2	2	
晋	5	2	1	1
南北朝	32	21	12	9
隋	5	3	2	1
唐	30	15	2	13
五　代	15	7	5	2
宋	184	45	12	33

由此可知，唐代以前，南北朝时期藏书家数量较多，除了其它因素之外，与纸张的广泛应用分不开。载体变了，制作图书的速度加快，书数大增，藏书家自然会多起来。但是这个时期的万卷户并不多，仅占可考藏数者的43%，大多属于千卷户。唐代以后，私人藏书发展较快，唐代万卷户占可考藏数者的87%。五代虽然时间短暂，战事频繁，但是，可考的藏书家并不少。到了宋代，藏书家数量急剧增至184人，其中，万卷户33户，占可考藏数者的73%，藏书4万卷以上者有王洙、叶梦得、周密、陈振孙、赵宗绰等8人，叶梦得藏书多达10万卷，为宋代私人藏书之冠。为什么唐代以后私人藏书发展如此之快呢？除了其它因素之外，不能不说与雕版印刷的发明有关。应该承认，雕版印刷对公私藏书的影响需要一个过程，不能立竿见影。唐代雕版印刷刚刚发明，还不可能左右公私藏书，唐代私人藏书的发展，也许应归功于政治、经济、纸张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宋代私人藏书的迅速发展，当与雕版印刷密切相关。似可这样说，没有唐宋雕版印刷的发生和发展，就没有宋代私人藏书的繁荣，唐宋雕版印刷的发生与发展是宋代私人藏书繁荣的主要原因。（八）根据论者的时代分析，雕版印刷似应始于唐代。赵宋以降，论及雕版起源者无虑三四十人，计有宋叶梦得、朱翌、王明清、沈括、高承、邵博、罗璧，元王祯，明陆深、方以智、胡应麟、罗颀、杨慎、郎瑛、刘仲达、胡文焕、秦镤，清郑机、李元复、阮葵生、王士禛、赵翼、王国维、李佐贤、高士奇、陆凤藻、朱彝尊、万斯同、包世臣、魏嵩、查继佐、袁栋等。其中，持“汉代说”者有清郑机；持“六朝说”者有清李元复；持“隋代说”者有明陆深、胡应麟、方以智，清阮葵生、王士禛、高士奇、陆凤藻、魏嵩等；持“唐代说”者有宋叶梦得、朱翌、沈括、高承、邵博，明郎瑛、刘仲达、胡文焕，清查继佐、赵翼、王国维、朱彝尊、叶德辉等；持“五代说”者有宋罗璧、王明清，元王祯，明陆深、罗颀、杨慎、秦镤，清李佐贤、万斯同、包世臣、袁栋等。这里有两个问

题发人深省：其一，讨论雕版印刷起源始于宋人，为什么宋代以前无人论及呢？雕版印刷是一个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学者对于雕版印刷具有特殊的感情，如果唐代以前出现雕版印刷的话，历史文献中不可能没有记载，学者不可能熟视无睹、不置一词。既然唐代以前无人论及，那就似可说明唐代以前尚未出现雕版印刷，学者不可能无中生有。其二，“汉代说”、“六朝说”、“隋代说”都是明清人提出来的。宋人除了罗璧、王明清主张“五代说”之外，叶梦得、朱翌、沈括等力主“唐代说”。比较而言，宋人提出的时代较晚，这又说明什么？难道是宋人保守吗？赵宋去唐未远，唐代文献资料多未散佚，唐末遗老宋初甚或健在，宋人议论或据唐代文献，或据先人传闻，其可信度当然要比明清议论大得多。正如当代重大事件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因为距今不过60余年，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至今健在，当代人关于长征的论述，当然要比数百年后的论述可信。宋代苏轼在《东坡全集·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过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

>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

显然，这是苏轼回忆童年时代所闻“老儒”之言，假定“老儒”当时75岁，苏轼当时10岁，苏轼生于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那么10岁正当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又“老儒”之言是回忆“少时”之事，假定老儒是回忆15岁的事，则应从庆历七年（1047年）上溯60年，其具体时间当在宋代建国27年后的雍熙四年（987年）。这就是说，在宋代开国27年的时候，雕版印刷还没有普及，一些常见史书，全凭手抄。既然如此，雕版印刷发明的具体时间距宋代当不会太久，唐代雕版印刷当处于初创阶段。（九）根据中外图书交流和外国雕版印刷的发展情况分析，中国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似非唐代莫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

界大家庭的重要一员，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中国和外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与邻国的交往尤其频繁。雕版印刷的发明在国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记载：中国印刷品流入朝鲜的最早时间是北宋初年，朝鲜最早印刷品《大藏经》的刻印时间是在北宋真宗天禧至神宗元丰间；中国印刷品流入日本的最早时间是唐代，日本最早印刷品《成唯识论》的刻印时间是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中国印刷品流入越南的最早时间是北宋真宗在位时，越南最早印刷品《大藏经》的刻印时间是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中国印刷品流入琉球的最早时间是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琉球最早印刷品《四书》的刻印时间约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中国印刷品流入菲律宾的最早时间是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年），菲律宾最早印刷品《无极天主教真传实录》的刻印时间是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波斯最早印刷品的刻印时间是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波斯最早记载中国雕版印刷方法的著作《世界史》成书于元至大三年（1310年）；埃及最早印刷品的刻印时间约在元至正十年（1350年）之前；欧洲最早印刷品的刻印时间约在明代初期。由此可知，中国印刷品最早流入国外的时间是唐代，国外最早印刷品的刻印时间是北宋真宗天禧至神宗元丰间。为什么唐代之前没有印刷品流入国外，国外也没有发现印刷品呢？原因很简单，由于唐代以前中国还没有发明雕版印刷，因而不可能有印刷品流入国外，国外也不可能从中国学到雕版印刷技术。以上从九个方面论证了“唐代说”。然而，唐代建国近300年，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究竟是在唐初、唐中或唐末呢？从文献记载看，《云溪友议》、《唐语林》、《柳氏家训》等书所记时间，均属唐代晚期。然从实物资料来看，唐代中期已出现《陀罗尼经咒》那样的雕版印刷品。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相比，当然实物资料更为可靠。就时间而言，实物资料在前，文献记载在后，也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既然唐代中期出现印刷品，那么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当不会晚于唐代中期，唐

代初期发明雕版印刷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不过，“唐初说”还有待于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弘简录》的记载不足为据，已见前文。《云仙杂记》实系宋人伪撰，“所引书名，皆古今所不闻，且其记事造语，如出一手，正如世俗所行东坡《杜诗注》之类”，①该书所记玄奘“印普贤像”一事，或系故作新语所致，亦不足凭信。

① 《直斋书录解题·云仙杂记》。

第三章　唐五代刻书

一、唐代刻书

唐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初创时期。研究唐代刻书对于弄清雕版印刷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知见刻书目录

关于唐代刻书的资料不多，现将可信资料整理如下：

（一）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至玄宗天宝十年（751年）之间刻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据胡道静《世界上现存最早印刷品的新发现》（载《书林》1979年2期），1966年南朝鲜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汉译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此件是704～751年间的刊印品，即当我国唐朝武后长安四年（704年）至玄宗天宝十年（751年）之间"。

（二）武宗会昌年间（841～846）之前刻印佛经。据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

> 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

武宗排佛，"焚印本"事发生在会昌间，所焚之"印本"当刻于会昌之前，又上文标题下有一小字注："印本共八百纸"。可知当时确有"印本"。

（三）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之后刻印的《陀罗尼经咒》。

据《中国版刻图录》：

> 一九四四年出成都市内一唐墓人骨架银镯内。四周双边，框外镌"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一行。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成都改称府，因推知经咒板行，当在是年以后。

（四）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刻印历书。据《全唐文·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

> 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冯宿为东川节度使，此疏上于大和九年（835年）十二月。又据《旧唐书·文宗本纪》：

> 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

这说明中央政府试图独揽历书版权，严禁地方政府私自刻印。

（五）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刻印《刘宏传》。据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

> 纥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

纥干泉，字咸一，雁门人，大中元年至三年任江南西道观察

使。①

（六）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年）以前，西川刻印《唐韵》和《玉篇》。据日僧宗睿所编目录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印子"即印本。宗睿咸通三年（862年）来华，咸通六年（865年）回国时，随身携带经卷并《唐韵》、《玉篇》等若干杂书。

（七）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刻印《金刚经》。该经用七张纸粘连而成，长16尺，完整无缺，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此经现藏英国。

（八）唐僖宗乾符间（875～879）四川刻印历书。据宋王谠《唐语林》卷七：

> 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西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

（九）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成都刻印杂书。据唐柳玭《柳氏家训序》：

> 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重城即成都，柳玭即唐代藏书家柳仲郢之子。

（十）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成都樊赏刻印历书，据张

① 纥干泉之"泉"字，各书写法不一，据《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第2156页，当以"泉"为正。

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书首冠图之十：首行有“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等字样，次行小字有“中和二年具注历日”等字样。

（十一）唐昭宗天祐四年（907年）之前西川过家刻印《金刚经》。据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有”字9号《金刚经》残卷，末有“西川过家真印本”七字，又有“丁卯年三月十二日八十四岁老人手写流传”题记。又《伯希和劫经录》3493号也有后晋天福八年（943年）据“西川过家真印本”传抄的写本《金刚经》残卷。由此可知，依“西川过家真印本”传抄的《金刚经》不一而足。案丁卯年即唐昭宗天祐四年（907年）。既然84岁老人于该年抄写，则“西川过家真印本”的刻印时间当在该年之前。

（十二）唐末刻徐夤著《斩蛇剑赋》、《人生几何赋》等。徐夤，字昭梦，莆田人，唐昭宗乾宁初进士，有《钓矶文集》。其《自咏十韵》云：

> 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①

这里，“镌印”当是刻印之意。

刻书特点

综合分析上述材料，可知唐代刻书有如下特点：

第一，就地区而言，四川刻书最多，江苏、浙江等地次之。长安和洛阳作为北方的通都大邑和佛教活动中心，也刻了一些书。为什么四川刻书最多呢？有三个原因：（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四川交通闭塞虽然有它不好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它至少给四川带来两大好处：一是社会安定，免受兵火之

---

① 《全唐诗》卷七百一十一。

灾，给刻书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二是打消依赖内地输入图书的消极思想，迫使四川自己动手刻印图书。四川农业发达，历书需求量大，而历书时间性极强，如果坐待内府所颁新历，就会贻误农时，错失良机。（二）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为刻书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劳力。（三）盛产木材、纸张等刻书必需品，为刻书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言，唐开元间所抄125960卷写本书，用的都是四川麻纸。

第二，就刻书单位而言，坊刻最多，家刻次之。唐代官刻，文献尚无明确记载，可能刻过一些历书。家刻为了广积"功德"，多局限于刻印佛经。

第三，就内容而言，佛经最多，历书、字书、韵书、占梦、相宅等民间常用杂书次之。这说明唐代处于雕版印刷的初级阶段，印刷能力有限，优先印刷的往往是那些需求量较大的图书。至唐代晚期，始刻零星诗赋。

二、五 代 刻 书

五代时期虽然时间短暂，但是雕版印刷比起唐代还是有所发展。

知见刻书目录

关于五代刻书的资料也不多，现将知见资料整理如下：

（一）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开雕"十二经"。据宋王溥《五代会要·经籍》：

> 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需依所颁敕

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

监本经书自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始雕，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年）雕成，共历四朝七帝二十二年。在雕版过程中，冯道一直主持这项工作，他对古代文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历来对于五代监本的底本、刻印时间、种数、刻印顺序、书写人、行款等六个问题说法不一，王国维在《五代两宋监本考》中对上述问题考证甚详：其一，关于五代监本的底本问题，五代监本并非完全照刻西京石经（即开成石经），西京石经只有经文，没有注文，五代监本经注皆备，其注文是据它本另行补入的，就是西京石经的经文，五代监本亦有改窜之处；其二，关于五代监本与蜀本九经的先后问题，五代监本在前，蜀本九经在后，“蜀毋昭裔请刊印板《九经》，正田敏《九经》板成之岁”；其三，关于五代监本经书的种数问题，“或云九经，或云五经，实则《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外，尚有《孝经》、《论语》、《尔雅》，附以《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与唐石经种数正同”；其四，关于五代监本诸经的刻印顺序问题，“《五经》与《孝经》、《论语》、《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皆成于晋汉之间”，“至二礼二传，则经始于乾祐，断乎于广顺”；其五，关于五代监本的写版人问题，《五经》、《孝经》、《论语》、《尔雅》、皆李鹗书，“至二礼二传刊于周初者，则《周礼》、《公羊》皆郭嵠书，《仪礼》、《谷梁》虽不详书人姓名，然以前事例之，疑以嵠书”；其六，关于五代监本经书的行款问题，半页八行，每行大十六字、小二十一字，“窃意此乃五代南北宋监本中经注本旧式也，他经行款固不免稍有出入，然大体当与之同”。

（二）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刻印《经典释文》。据宋王溥《五代会要·经籍》：

显德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敕准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

又据宋王应麟《玉海·艺文》：

周显德中诏刻《序录》、《易》、《书》、《仪礼》、《周礼》四经释文，皆田敏、尹拙、聂崇义校勘。自是相继校勘《礼记》、三传、《毛诗音》并拙等校勘。又《古文尚书》音义，周显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古文并书刻板。

又据宋洪迈《容斋续笔·周蜀九经》：

予家有旧监本《经典释文》，末云："显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列宰相范质、王溥名，而田敏以礼部尚书为详勘官，此书字画端严，有楷法，更无舛误。

由此可知，监本《经典释文》自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始雕，至显德六年（959年）雕成，历时5年，校勘人为尹拙、张昭、聂崇义、田敏等，写板人为郭忠恕和朱延熙。

（三）后蜀孟昶广政十六年（953年）毋昭裔刻印群书。据宋代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毋公印书》：

毋公者，蒲津人也，仕蜀为相。先是公在布衣日，尝从

人借《文选》及《初学记》，人多难色。公浩叹曰："余恨家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习学之者。"后公果于蜀显达，乃曰："今日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匠日夜雕板，印成二部之书。公览之，欣然曰："适我愿兮。"复雕九经诸书。两蜀文字，由是大兴。①

又据《宋史·毋守素传》：

毋守素，字表淳，河中龙门人。父昭裔，伪蜀宰相、太子太师致仕……昭裔性好藏书，在成都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

由此可知，毋昭裔刻有《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九经》等书。他是我国古代家刻的先驱。不过，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毋昭裔与毋守素是父子二人，毌丘俭是三国人，而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首页首条误称毋昭裔、毋守素为一人，王明清《挥麈余话》误称毋昭裔为毌丘俭，应予纠正。

（四）和凝刻印自著诗文集。据《旧五代史·和凝传》：

和凝，字成绩，汶阳须昌人也……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

（五）前蜀乾德五年（923年）昙域刻《禅月集》。这当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别集刻本之一。据《禅月集》昙域后序：

① 关于毋昭裔刻书的记载，以此段文字为最早。

暇日或勋贤见访，或朝客相寻，或有念先师所制一篇二篇，或记三句五句，或未闲深旨，或不晓根源。众请昙域编集前后所制歌诗文赞，日有见问，不暇枝梧，遂寻检稿草及暗记忆者约一千首，乃雕刻板部，题号《禅月集》。时大蜀乾德五年癸未岁。

（六）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张荐明刻印《道德经》。据《旧五代史·晋书·高祖本纪》：

执其伪都监杜光鄴及淮南军五百余人，露布献于阙下。帝曰：此辈何罪，皆厚给放还。癸亥，道士崇真大师张荐明赐号通玄先生。是时帝好《道德经》，尝召荐明讲说其义，帝悦，故有是命。寻令张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

（七）前蜀任知玄刻印《道德经广圣义》。据王欣夫《文献学讲义·道书的刻行》：

在唐朝灭亡的第二年（908年），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赁良工，开雕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五年内雕成四百六十余版，藏在龙兴观，印造流行。

（八）五代刻《唐韵》和《切韵》，载罗振玉《鸣沙石室秘录》，其书为法人伯希和所窃取，今藏巴黎图书馆。

刻书特点

综合分析上举资料，可知五代刻书有如下特点：

第一，就地区而言，汴（河南开封）、成都和杭州三地刻书比较发达。汴是后晋、后汉、后周的都城，鸿篇巨制《监本群经》

等就在这里刻成。另外，和凝刻自著诗文集和张荐明刻《道德经》的地点也当在这里。成都和杭州是我国雕版印刷的发祥地。毋昭裔在成都刻了那么多书，没有一大批熟练刻书工人是难以胜任的。钱俶在杭州刻印佛经84000卷（详本编第八章第三节）。可见杭州印刷规模之大、印刷能力之强。

第二，就刻书单位而言，官刻和家刻发展很快。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代国子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按照既定计划，代代相传，坚持刻完诸经，实属不易。官方能够组织刻印如此卷帙浩繁之书，也正说明官方刻书实力相当雄厚。五代国子监刻书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子监都是历代中央官刻的主体之一。历代学校刻书当是由五代国子监刻书发展而来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之大学出版社也源自五代国子监刻书。毋昭裔刻书之多，在整个中国古代印刷史上也不多见。

第三，就内容而言，在大量刻印宗教、杂书的同时，开始刻印经书、类书、诗文集等。经书如《九经》、监本群经，类书如《初学记》、《白氏六帖》，诗文集如《文选》、《禅月集》等。这说明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五代时期的印刷能力大大提高。刻印儒家经典，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第一次。国子监属于教育部门。作为兼事出版的机构，国子监主要刻印与教学有关的学术著作，这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直到今天，大学出版社仍然把出版学术著作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第四章　宋代刻书

一、国子监刻书

宋代中央刻书单位很多，国子监、崇文院、刑部、秘书监、太史局、礼制局等都刻过书，其中国子监刻书最多，它是宋代中央官刻的主体。

国子监简介

国子监是国家最高教育机关，它除了行使教育职能之外，兼事刻书。淳化五年（994年）判国子监李至上言：

> 国子监旧有印书钱物所，名为近俗，乞改为国子监书库官。①

这就是说，国子监原设掌管印刷事务的印书钱物所，后因名字不雅，改为国子监书库官。该单位"置书库监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②具体来说，国子监书库官有两大职能：一是刻印书籍，即所谓"掌印经史群书"，相当于中央直属印刷总厂；二是发行图书，即所谓"出鬻(图书)而收其直以上于官"。宋代政府对出版事业的投资是相当大的，据记载，太宗雍熙间，国子监祭酒孔维

①② 《宋史·职官五》。

"受诏与学官校定《五经疏义》，刻版行用。功未及毕，被病。上遣太医诊视，使者抚问，初，维私用印书钱三十余万，为掌事黄门所发，维忧惧，遽以家财偿之，疾遂亟，上赦而不问"。①这可算一件特大贪污案，不管其处理是否得当，但由此可知，国家对刻书事业的投资决不至30余万，可能是30余万的几十倍。这说明北宋政府对刻书极为重视。由于官方重视，国子监刻书成绩斐然。

国子监刻书

国子监刻书极多。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以前有案可查，据《宋史·邢昺传》：

> （景德二年夏天），上幸国子监阅书库，问（邢）昺经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宋建国于建隆元年（960年），到景德二年(1005年)，仅仅40多年，书版数量竟增加了二三十倍，可见国子监刻书速度之快、数量之多。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著录北宋监本69种、南宋监本也有六七十种，二者相加，共计140种左右。这当然不是国子监刻书的总数。据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徐松《宋会要辑稿》等书记载，尚有《述六艺箴》、《承华要略》、《授时要录》、《祥符降圣记》、《唐六典》、《御制文集》、《阴阳地理书》、《风角集占》、《孟子》、《道德经》、《金匮要略》、《政和圣济经》等一大批图书没有包括进去。

国子监刻书内容极广。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其中经书、史

---

① 《宋史·孔维传》。

书、医书最多。北宋国子监大规模刻印经书大体有四次：第一次，从太宗端拱元年（988年）至淳化五年（994年），刻完“五经”。“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仪礼》和《春秋左氏传》。第二次从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到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刻完“七经”，“七经”指《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和《尔雅》。至此，“经传正义皆具”。第三次从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至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补刻讹缺经板。第四次从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开始，“令国子监重刻经书印板，以本监言其岁久刓弊故也”。①据记载，宋代皇帝动辄赐九经于臣民邻邦，例如太宗淳化元年（990年）二月赐诸路印本《九经》；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六月赐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九经》；嘉祐七年（1062年）四月赐夏国《九经》；英宗治平年间又赐夏国《九经》……以上《九经》均取之于国子监，可见国子监刻印经书之多。北宋国子监对刻印史书也很重视，“十七史”的刻印大体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太宗淳化五年（994年）至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校刻《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第二阶段从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至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校刻《三国志》和《晋书》；第三阶段从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至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校刻《南史》、《北史》和《隋书》；第四阶段从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到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左右，校刻《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和《周书》。欧阳修等撰《新唐书》是在嘉祐五年（1060年）刻印的。《新五代史》是诸史中刻印最晚的一种，约刻印于熙宁五年（1072年）以后。除了《十七史》外，北宋国子监还刻印了一些其它史学著作，例如《资治通鉴》、《七十二贤赞》等。不过，许多北宋监本是在杭州刻印的，据王国维考证，《周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七

礼疏》、《礼记疏》、《春秋公羊传疏》、《春秋谷梁传疏》、《孝经正义》、《论语正义》、《尔雅疏》、《书义》、《新经诗义》、《周礼新义》、《史记》、《汉书》、《后汉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均在杭州镂版。

赵宋南渡以后，国子监随之南迁。绍兴九年（1139年）九月，应尚书郎张彦实之请，"取旧监本书籍，镂版颁赐"。①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五月，鉴于旧监本残缺不全，"六经"无《礼记》，"三史"无《汉书》，"辅臣复以为言，上谓秦益公曰：'监中所阙之书亦令次第镂板，虽有重费亦所不惜也。'由是经籍复全"。②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三月二十二日，诏令各级考试，"并试刑法，令国子监印造《礼部韵略》、《刑统律文》、《绍兴敕令格式》，并从官给"。③嘉定十六年（1223年）诏令刊修经版，据宋魏了翁《鹤山集·六经正误序》：

> 柯山毛居正义甫其于经传，亦既博览精择。嘉定十六年春，朝廷命胄监刊定经籍，司成，谓无以易。义甫驰书币致之，尽取六经三传诸本，参以子史字书、选粹文集，研究异同，凡字义音切毫厘必校，儒官称叹，莫有异辞。旬岁间刊修者凡四经，乃犹以工人惮烦，诡窜墨本，以给有司，而板之误字实未尝改者十二三也。继欲修《礼记》、《春秋三传》，义甫以病目移告，事遂中辍。

由此可见，这次刊修由毛居正校正，因病中辍，仅修四经。由于

---

①②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四。

③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

刻书工人害怕麻烦，“讫牵墨本，以给有司”，有不少错字没有改正。

国子监在刻印经史的同时，也刻印了不少医书。太祖开宝六年（973年）校刻《卢氏详定本草》；太宗淳化三年（992年）校刻《太平圣惠方》；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校刻《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巢氏病源候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仁宗庆历年间刻有《庆历善救方》；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校刻《千金翼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校刻《外台秘要》和《甲乙经》；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校刻《黄帝针经》；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八月校刻《政和圣济经》；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复刊《太平惠民和济局方》。除了医书之外，国子监也刻印了不少别的子书，例如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刻《庄子》；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刻《荀子》、《文中子》等；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刻《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尉缭子》、《李靖公问对》等兵书；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刻《亢仓子》等。

监本的质量

国子监刻书重视校勘。国子监是国家最高教育机关，高级人才云集，校勘力量极强。一书付刻之前，总要首先校勘，校书已经成了整个刻书过程的第一道工序。兹举国子监校书例如下：建隆元年（960年）崔颂校《礼记释文》；开宝五年（972年）姜融等校《孝经》、《论语》、《尔雅释文》，李昉、李穆、扈蒙等校《尚书》；开宝六年(973年)刘翰、马志、张素、王从蕴、翟煦、王光祐、陈昭遇、安自良等9人校《神农本草》；次年刘翰、马志、李昉等重校前书；端拱元年（988年）陈谔、姜融、李穆、扈蒙、孔维、李说、王炳、邵世隆、李觉、毕道昇、胡迪、李至、杜镐、孙奭、崔颐正、李沆、吴淑、邢昺、舒雅、李

张清、王涣、刘士元等24人参校《五经正义》；淳化五年（994年）杜镐、舒雅、吴淑等校《史记》，陈充、阮思道、尹少连、赵安仁等校《汉书》和《后汉书》；咸平间陈尧佐、周起、丁逊、任随等复校《史记》，刁衎、晁迥、丁逊等复校《汉书》和《后汉书》；景德二年（1005年）刁衎等三校《汉书》；咸平三年（1000年）黄夷简、钱惟演、刘蒙叟、杜镐、戚纶等校《三国志》，杜镐、刘锴、陈充、许衮等校《晋书》；咸平六年（1003年）杜镐、戚纶、刘锴等校《道德经》；景德二年（1005年）孙奭、杜镐等校《庄子释文》；景德四年（1007年）陈彭年、丘雍、晁迥、戚纶等校《韵略》；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马龟符、王勉、冯宗超等校《孟子直讲》；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陈彭年、丘雍等校《玉篇》；乾兴元年（1022年）马龟符、贾昌朝、黄鉴、王宗道等校刘昭注补《后汉志》；天圣二年（1024年）张观、王质、李淑、彭乘、孙觉等校《南史》、《北史》和《隋书》；天圣四年（1026年）王举正、石居简、李淑等校《黄帝内经素问》、《巢氏病源》、《难经》等；嘉祐二年(1057年)掌禹锡、林亿、苏颂等校《千金翼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尽管国子监在校书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有些监本书的质量并不尽如人意，这是可以原谅的。但就整体而言，监本的质量还是比较好的，常被各地书坊誉为"京本"、"京师本"，一再翻刻。就书法角度而言，监本常常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监本多请名家手写上版，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卷中指出：

> 宋初，《五经正义》赵安仁所书最多。《诗疏》，安仁与张致用、陈元吉、韦宿等四人书；《左传疏》安仁一人书……赵安仁字体在欧柳之间，赵德父评李鹗书腐于法度，而韵不能高，安仁亦颇似之。然在刊本之中，当以李赵为最紧劲矣。

李鹗是五代书法家，曾写五代监本《尔雅》等；赵安仁是宋代书法家，史书说他“生而颖悟，幼时执笔能大字，十三通经传大旨，早以文艺称。赵普、沈伦、李昉、石熙载咸推奖之。雍熙二年，登进士第，补梓州榷盐院判官，以亲老弗果往。会国子监刻《五经正义》版本，以安仁善楷隶，遂奏留书之”。[①]赵安仁等书法家亲为监本写版，更使监本锦上添花。

监本的书价

监本书价也很便宜。监本风靡全国，购买相当方便。只要有钱，藏书万卷，可不逾时而集。眉山孙氏就是以“市监书万卷”作为资本，成为藏书家的。[②]潞州张仲宾家产巨万，居全路之首，后来重视智力投资，不惜重金，“尽买国子监书”，自办学校，子孙大多成才。[③]宋代监本书价一直很便宜，因而成为宋代多数藏书家的插架之珍。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上封者言：‘国子监所鬻书，其直尤轻，望念增定。’帝曰：‘此固非为利，正欲文籍流布耳。’不许”。[④]哲宗元祐初，监本曾加价出售，陈师道上言：

> 伏见国子监所卖书，向用越纸而价小，今用襄纸而价高。纸既不迨，而价增于旧，甚非圣朝章明古训以教后学之意。臣欲乞计工纸之费以为之价，务广其传，不亦求利，亦圣教之一助……诸州学所买监书系用官钱买充官物。价之高下，何所损益。而外学常苦无钱，而书价贵，以是在所不能有国子之书，而学者闻见亦寡，今乞止计工纸，别为之价，所冀学者益

---

① 《宋史·赵安仁传》。

② 《鹤山集·眉山孙氏书楼记》。

③ (宋)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录》卷十六。

④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三。

广见闻，以称朝廷教养之意。①

皇帝很快采纳了陈师道的建议，恢复了只收工本费的书价制度。元祐三年（1088年），官方下令刊刻医书小字本，以降低成本，便民购买。《仲景全书四种》有元祐三年（1088年）牒文云：

> 中书省勘会：下项医书册数重大，纸墨价高，民间难以买置。八月一日奉圣旨：令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内有浙路小字本者，令所属官司校对，别无差错，即摹印雕版，并候了日，广行印造，只收官纸工墨本价，许民间请买。奉敕如右，牒到奉行。

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二十五日，哲宗再次指示国子监刊印小字医书，便民购买。

国子监除了刻书之外，还兼有审查全国图书的任务。各类图书经过国子监审查合格后，才能付梓刊行。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五：

> 哲宗元祐五年七月戊子礼部言：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国史、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许人告，赏钱一百贯。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它书籍欲雕印者，纳所属申转运使、开封府牒国子监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凡不当雕印者，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从之。

总而言之，宋代国子监对于刻书事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① 《后山集·论国子卖书状》。

二、公使库刻书

公使库刻本是宋代地方官刻的一种。

"公使库"小考

什么是公使库？宋人李心传曾说：

> 公使库者，诸道监帅司与边县州军与戎帅皆有之。盖祖宗时，以前代牧伯皆敛于民，以佐厨传，是以制公使钱以给其费，惧及民也。然正赐钱不多，而著令许收遗利，以此州郡得自恣。若帅宪等司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熟药，为所不为，其实以助公使耳。①

由此可知，公使库是专供公使厨传的机构，"厨传"即饮食住行的总称。公使库不仅要为公使出差提供饮食住行的方便，而且承担其所需费用。其职能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官办招待所，但又有所不同：今天的招待所只提供饮食住行方便，而所需费用由所在单位报销。宋代以前，公使费用是由老百姓负担的。宋代建立以后，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由国家专门拨给公使钱作为旅差费使用，就不再取之于民了。然而，公使钱数量有限，远远不够公使挥霍，于是国家也许可公使库自找财源补偿。这样，各地公使库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多方开发财源。刻书就是其广开财源的手段之一。

公使库利用刻书大发其财，苏州公使库王琪刻印杜甫诗集就是一个例证。宋代杜集版本比较复杂。苏舜钦、王洙、刘敞、王安石等都曾整理过杜集。其中王洙用力最勤，他在整理过程中不

---

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七。

仅参酌众本，而且将杜诗分为古近二体，按时间先后进行编排。王洙杜集是宋代收录最完整的一个本子。嘉祐四年（1059年），王琪约请何琢、丁修对王本进一步修订，并经裴煜补遗后，刊板行世。王琪在该书后记中说：

> 原叔（王洙之字）虽自编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与苏州进士何君琢、丁君修得原叔家藏及古今诸集，聚于郡斋而参考之，三月而后已。义有并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阅之者固有浅深也。而吴江邑宰河东裴君煜，取以复视，乃益精密，遂镂于版，庶广其传。①

王琪刻本是杜集第一个刻本，也是此后所有杜集的祖本。张元济先生曾经指出：

> 自后补遗、增校、注释、批点、集注、分类、编韵之作，无不出于二王（王洙、王琪）之所辑梓。②

的确，就学术价值而言，王琪不愧为杜集之功臣。就经济价值而言，王琪也因刻印杜集发了一笔横财，正如清人王士禛《居易录》卷七所说：

> 宋王琪守州，假库钱数千缗，大修设厅，既成，漕司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库镂板，印万本，每部直千钱，士人争买之。既偿省库，羡余以给公厨，此又大裨帑费，不但文雅也。

王琪以公使库的名义刻印杜集万册，不仅还了数千缗旧帐，而且

---

①② 万曼：《唐集叙录·杜工部集》。

多所剩余。公使库除了刻书之外，还经营卖酒、卖药等业务，例如台州公使库“每日货卖生酒至一百八十余贯，煮酒亦及此数，一日且以三百贯为率，一月凡九千贯，一年凡收十余万贯”。① 台州公使库甚至“违法收私盐税钱，岁计一二万缗入公使库，以资妄用”。② 当然，资金多了，如果管理不善，就容易发生行贿、贪污、腐败等不良现象。淳熙八年（1187年）台州唐仲友案便是一例。唐仲友，字与政，金华人，绍兴进士，复中弘词科，后守台州，为朱熹所弹劾。唐仲友盗窃公使库物品，“下至鱼盐臭腐，但直一文以上无不津致”；③ 唐仲友还以馈送为名，大肆行贿，数额多至28616贯；④ 台州公使库刻印《荀子》、《扬子》、《韩非子》等书606部、9090册，唐仲友贪污378部、5670册。⑤ 大量事实表明，唐仲友利用职权，蚕食鲸吞公使库财产，实属贪官污吏。当然，这在宋代公使库中并不是个别现象，“公使苞苴在东南尤甚，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帐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每以酒遗中都官，岁有五六千斤，以至数千瓶”。⑥ “苞苴”即贿赂之意。地方官为了巴结中都官（即中央派出公使），用公使库资财行贿，成为当时的一大公害。

知见刻书目录

公使库利用刻书作为广开财源的一种手段。通过刻书积累了大量资金，又反过来促进了公使库刻书事业的发展。公使库还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地方上网罗了一批技术高明的刻工，成为公使库刻书的技术保证。例如，明州刻工蒋辉因伪造会子而被断配台州监狱，而唐仲友竟利用职权私自放出蒋辉，让其为公使库刻《荀子》等书。“会子”是国家会子局印行的一种纸币，其印刷

①②③④ （宋）朱熹：《晦庵集·按唐仲友第三状》。

⑤ 同上书《按唐仲友第六状》。

⑥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七。

工艺比一般图书要复杂得多。蒋辉既能伪造“会子”，可见其技术之精。当时和蒋辉一起为台州公使库刻书者有18人，清黎庶昌翻刻宋台州公使库大字本《荀子》板心有蒋辉等18人姓名。除了台州公使库外，苏州、吉州、明州、沅州、舒州、抚州、春陵、信州、泉州、鄂州、婺州等地公使库都刻过书，其中尤以抚州公使库刻“十二经”为最著名。根据有关文献记载，现开列宋代公使库刻书知见书目如下：

吴郡图经续记三卷 （宋）朱长文撰 宋元符元年（1098年）苏州公使库刻本。

六一居士集五十卷 （宋）欧阳修撰 宋宣和四年（1122年）吉州公使库刻本。

骑省徐公集三十卷 （宋）徐铉撰 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明州公使库刻本。

续世说十二卷 （宋）孔平仲撰 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沅州公使库刻本。

大易粹言十二卷 （宋）方闻一编 宋淳熙三年（1176年）舒州公使库刻本。

礼记郑注二十卷 宋淳熙四年（1177年）抚州公使库刻本。据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图版137：

> 匡高二〇·二厘米，广一四·七厘米，十行，行十六字。注文双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双边。宋讳缺笔至慎字。卷末有淳熙四年（1177年）抚州公使库刻书人衔名七行。据《黄震日抄·咸淳九年修抚州六经跋》，知当时刻有六经三传，至咸淳时又添刻《论》、《孟》、《孝经》，以足十二经之数。今传世抚本诸经，《礼记》外仅存《周易》、《公羊》与《春秋左氏传集解》残帙，他经均佚。此为杨氏四经四史之斋旧藏宋本四经之一。末附陆德明《释文》四卷。原藏瞿氏铁琴铜剑楼，两书分离已百余年，今延

津剑合，俱归北京图书馆。此书初印精湛，无一补版，在抚本中，当推甲选。

河南程氏文集十卷 宋淳熙六年（1179年）舂陵郡库刻本。

颜氏家训七卷 （北齐）颜之推撰 宋淳熙七年（1180年）台州公使库刻本。

荀子二十卷 宋淳熙八年（1181年）台州公使库刻本。

潏水集十六卷 （宋）李复撰 宋淳熙九年（1182年）信州公使库刻本。

传家集八十卷 （宋）司马光撰 宋淳熙十年（1183年）泉州公使库印书局刻本。

杜工部集二十卷 （唐）杜甫撰 宋嘉祐四年（1059年）苏州公使库刻本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 （宋）司马光撰 宋绍兴三年（1133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此本为宋时建本、鄂本、蜀本的祖本。宋元丰监本《资治通鉴》久佚，此本为传世诸刻的唯一宋本。

春秋公羊传解诂 （汉）何休撰 宋淳熙抚州公使库刻绍熙四年（1193年）重修本。

经典释文三十卷 （唐）陆德明撰 宋淳熙四年（1177年）抚州公使库刻本。

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 （宋）司马光撰 宋绍兴二年(1132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

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 （宋）司马光撰 宋绍兴二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

贞观政要十卷 （唐）吴兢撰 宋婺州公使库刻本。

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唐）白居易撰 宋平江公使库刻本。

孔丛子三卷 旧题（秦）孔鲋撰 宋明州公使库刻本。

当然，由于文献无征，更多的公使库刻本已不得而知了。

三、朱熹刻书及其它

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宋代家刻发展较快。可考的家刻有：刻印大字本《资治通鉴》等的广都费氏、刻印《淮海先生文集》等的眉山文中、刻印《东都事略》等的眉山程舍人宅、刻印《唐文粹》等的临安孟琪、刻印《诗品》等的京台岳氏、刻印《史记索隐》等的建邑王氏、刻印《击壤集》等的建安蔡子文、刻印《管子》的瞿源蔡道潜、刻印《新唐书》等的麻沙刘仲吉、刻印《十七史蒙求》等的麻沙虞千里、刻印《史记》等的建溪蔡梦弼、刻印《盐铁论》等的锦溪张监税、刻印《圣宋名贤四六丛珠》等的建安陈彦甫、刻印《史记正义》等的黄善夫、刻印《后汉书》等的建安刘元起、刻印《昌黎先生文集》等的建安魏仲举、刻印《新唐书》等的建安魏仲立、刻印《文苑英华》等的周少傅、刻印《礼记注疏》等的建安刘叔刚、刻印《重校添注柳文》等的姑苏郑定、刻印《汉书》等的钱塘王叔边、刻印《周礼郑注》等的婺州唐宅、刻印《中说》等的王氏取瑟堂、刻印《欧公本末》等的严陵詹义民、刻印《新刊淮南鸿烈解》等的茶陵谭叔端、刻印《隶续》等书的尤袤、刻印《南轩集》等的朱熹、刻印《岑嘉州集》等的陆游、刻印《九经》等的廖莹中，等等。下面重点介绍一下朱熹、陆游、廖莹中等人的刻书情况。

朱熹刻书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朱熹一生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他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朱熹刻书有两个目的：一是传播文化，朱熹一生致力于著书讲学，对传播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刻书也是他传播文

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二是谋生，朱熹一生清贫，每每称穷，被迫"刊小书板以自助"。[①]他的朋友张栻"颇以刊书为不然"，要他寻找别的门路，朱熹认为"别营生计，顾恐益猥下耳"。[②]可见，朱熹把刻书当作高尚的谋生之道。朱熹刻书的态度十分严谨，这与当时的滥刻之风，正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他说：

> 平日每见朋友轻出其未成之书，使人摹印流传，而不之禁者，未尝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远也。[③]

有一次，学官未经允许刻印了他的著作，他马上去信予以劝阻，并要求自己掏钱把已刻之版买下销毁。

朱熹刻了哪些书？根据文献记载，朱熹刻过"四经"（即《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四子"（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书》、《论孟精义》、《近思录》、《南轩集》、《献寿记》、《永城学记》等。此外，他还帮助别人刻过不少书。朱熹刻书非常重视选择底本，反复比较各本优劣，择优而从。底本确定之后，请书工认真抄写，校对后才予付梓。版片刻成之后，还要多次校勘，发现错误，就请刻工赶快修改。绍熙二年（1190年），朱熹在临漳（今福建漳州）主持刻印了"四经"、"四子"。由于刻印方面的原因，"四经"、"四子"出现一些错误，朱熹马上令匠人改正，他在《朱文公文集·答藤德章》中说：

> 向在彼刊得四经四子，当时校刊自谓甚仔细，今观其间，乃犹有误字，如《书·禹贡》"厥贡羽毛"之"羽"误作"禹"字，《诗·下武》"三后在天"之"三"误作

① （宋）张栻：《南轩集·致朱元晦》。

②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别集》。

③ 同上书《答杨教授》。

"王"字，今不能尽记，或因过目，遇有此类，幸令匠人随手改正也。古《易》音训最后数版有欲改易处今写去，所欲全换者两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原版大小及行字疏密写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写过，看令不错误，然后分付匠人，改之为佳。

《南轩集》是著名学者张栻的文集。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南轩集》当时已有多种刻本流传，但是比较而言，以朱熹刻本为优。别本主要收录张栻早期不成熟的"少作"，朱本除收录"少作"之外，还收录了不少最新发现的作品；别本往往随便填补文中空字，朱本则保持本来面目，暂付阙如。

朱熹亲自参与刻书活动，事必躬亲。在刻《礼书》时，书工难觅，为之焦虑数日。由于他常与书工交往，对书工非常熟悉，他曾写过一首诗，题为《赠书工》："平生久要毛锥子，岁晚相看两秃翁。却笑孟尝门下士，只能弹铗傲东风。"① 这首诗形象地描绘了书工的工作特点，高度评价了书工的牺牲精神。为了印书，朱熹到处张罗纸张。有一次，他弄到一万纸张，怎样使用这一万张纸呢？他对印工说：

欲印经子及《近思》、《小学》二仪，然比板样，为经子则不足，为四书则有余。意欲先取印经子，分数以其幅之太半印之，而以其余少半者印它书，似亦差便。但纸尚有四千未到，今先发六千幅，便烦一面印造，仍点对，勿令脱版为佳。余者亦不过三五日可遣也。工墨之费有诸卒借请……库中墨刻，亦各烦支钱买纸打数十本，内《献寿仪》及《永城学记》多得数本不妨，《献寿仪》要者更多也……临行时，

① 《晦庵集》卷十。

② 《晦庵别集》卷三。

令库中刻一书目，如已了，幸寄来也。②

由此可见，朱熹既刻书，又卖书。每书印数依读者多少而定。例如买《献寿记》的人多，就多印一些。为了扩大宣传，还备有刻书目录，供读者查阅。当然，朱熹虽然刻书、卖书，但他总是把刻书质量放在第一位，决不唯利是图，他对"只要卖钱"的书估十分反感，他在《朱文公集·答廖子晦》中说：

> 今人得书不读，只要卖钱，是何见识！苦恼杀人，奈何奈何！

朱熹直到晚年，仍然坚持刻书。他在《朱文公集·答林德久》中说：

> 《中庸章句》已刻成，尚须修一两处，以《或问》未要，亦未欲出，次第更一两个月可了。大抵日困应接，不得专一功夫，今又目盲，尤费力尔。不知天意如何，且留得一只眼，了些文字以遗后来，亦是一事。今左目已不可治，而又颇侵右目矣。

朱熹作为一个著名学者，来访者自然是很多的，他在"日困应接"之暇，能够抽出时间刻书，实属不易。再加上晚年左目失明，"留得一只眼"，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陆游、廖莹中等刻书

陆游（生平详本编第一章第三节）刻有《岑嘉州集》、《陆氏续集验方》、《江公奏议》等。《岑嘉州集》刻于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陆氏续集验方》刻于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江公奏议》刻于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陆游的先祖陆贽为唐代大臣，后贬至四川忠州，因集古方书数卷。后世俱喜方书，

至陆游时编为《陆氏续集验方》付梓刊行，陆游在刻书跋中说：

> 予家自唐丞相宣公在忠州时，著《陆氏集验方》。故家世喜方书。予宦游四方，所获亦以百计，择其尤可传者，号《陆氏续集验方》，刻之江西仓司民为心斋。淳熙庚子十一月望日，吴郡陆某谨书。

陆游之子陆子遹继承父志，也喜欢刻书，他刻的书主要是陆游的著作，如《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等。《渭南文集》刻于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游”字缺笔，刻工陈彬、吴椿、蔡澄、金滋、马祖、丁松年、徐珙、邵亨、刘昭、马良等，皆当时杭州地区良工。明弘治间无锡华珵铜活字本，即据此本排印。《老学庵笔记》是陆游晚年退隐镜湖之后的著作。此书陆游生前并未刊行，直到宋理宗绍定元年（1284年）才由子遹印行，这是唯一的宋本。如果不是陆子遹刻本，陆游的许多著作可能就会失传，那将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

廖莹中，字群玉，号药洲，福建邵武人。刻有《九经》、《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文选》等。其刻《九经》，“凡用十余本对定，各委本经人点对，又圈句读，极其精妙，皆以抚州萆抄清江纸、造油烟墨印刷，其装饰至以泥金为签。然或者惜其删略经注为可议耳”。①韩柳二集刻于度宗咸淳间，“二集字体版式悉同，书法在褚柳间，秀雅绝伦。”②

宋代家刻除了朱、陆、廖三家之外，广都费氏、蔡梦弼、黄善夫、魏仲举等也很著名。

---

① （宋）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下。

② 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昌黎先生集解题》。

四、陈起刻书及其它

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宋代坊刻发展也比较快。可考的宋代坊刻有：刻印《韩非子》等的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刻印《皇宋事实类苑》等的建阳麻沙书坊、刻印《汉书》等的建宁蔡琪、刻印《资治通鉴纲目》的武夷詹光祖、刻印《五臣音注扬子法言》等的崇川余氏、刻印《新书》等的建宁陈八郎书铺、刻印《二十先生回澜文鉴》等的建安江仲达、刻印《南阳活人书》等的杭州大隐坊、刻印《钓矶立谈》等的临安府尹家书籍铺、刻印《寒山拾得诗》等的杭州郭宅、刻印《甲乙集》等的临安府金氏、刻印《梅花喜神谱》等的金华双桂堂、刻印《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的新喻吾氏、刻印《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等的咸阳书隐斋、刻印《十便良方》等的汾阳博济堂、刻印《春秋经传集解》等的闽山阮氏种德堂、刻印多种唐宋别集的临安陈起、世代相传的刻书世家建阳余氏，等等。

临安陈起等刻书

陈起（亦名陈彦才），字宗之，号芸居，南宋临安著名出版家。其生卒年不详，但据有关文献，可推知其生于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左右，死于理宗宝祐五年（1257年）左右，历经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四朝。陈起的书坊位于棚北大街睦亲坊南，坊内藏书处名叫芸居楼，楼内书堆如山。陈起酷爱读书，能写一手好诗，有《芸居乙稿》行世。陈起和读者的关系非常融洽，他的书坊简直成了文人学士的学术活动中心。刘克庄、郑斯立、黄佑甫、杜耒、周文璞、许棐、俞桂、徐从善、周端臣、朱继芳、黄文雷、危稹、吴文英、释庭芳等数十人都是陈起书坊的常客，都与陈起有着深厚的友谊。陈起一生道路坎坷，理宗宝庆年间，即陈起38岁左右的时候，在一起文字狱中受到牵连，这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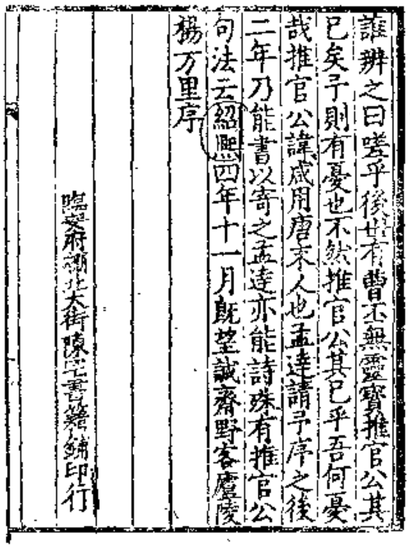
是有名的“江湖诗案”。“江湖诗案”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陈起与江湖诗人过从甚密，先后把江湖诗人的作品编入《江湖集》出版发行。江湖诗人之中有个叫曾极的人，他写的一首小诗激怒了权臣史弥远，史弥远大兴问罪之师，收有曾极诗作的《江湖集》自然不能幸免，该书版片被劈毁，许多江湖诗人也因此受到牵连，敖器之、刘克庄、赵师秀等被捕入狱，曾极被流放到千里之外。陈起也因刻印《江湖集》而被流放数年。

关于陈起、陈解元、陈思的关系，说法不一。陈起、陈解元实则一人，据清丁丙《武林坊巷志》和朱彭《南宋古迹考》：

> 陈宗之，钱塘人，宁宗时乡贡第一，时称陈解元，事母至孝，居睦亲坊，开肆卖书以奉母。

可见“解元”为陈起的功名。又据朱继芳《静佳乙稿·赠续芸》诗：“谁谓芸居死，余香解返魂。六丁将不去，孤子续犹存。”由此可见，续芸为芸居之子，陈起和陈续芸是父子关系。有人以为续芸指陈思，即陈思为陈起之子，此说似难成立。据周端臣《挽芸居》诗：“遽闻身染患，不见子成名。易箦终婚聚，求棺达死生。”可见，陈起死时，其子刚刚结婚，在事业上还没有成名，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然而，陈思早在25年前的绍定五年（1232年）就是一个精通业务的老手了。陈思在绍定五年（1232年）曾编刊《宝刻丛编》。到了宝祐五年（1257年）陈起去世的时候，又过了25年，其年龄之大、业务之精，可想而知。由此可见，陈思决非陈起之子。有人认为，陈起、陈思是一个人。此说亦难成立。陈起、陈思确实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的籍贯相同，均临安人；他们的别号相同，均号陈道人；他们的职业相同，均以写书、刻书、卖书为业。尽管如此，陈起、陈思决非一人。如上所述，陈起死于宝祐五年（1257年）左右，而在陈起死后10年，即咸淳三年（1267年）陈思还刻了《书小史》。在刻

书内容方面，两人也有所不同：陈起多刻唐宋诗人别集，而陈思多刻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如《宝刻丛编》是碑刻资料汇编；《书小史》是历代书法家传记资料汇编；《书苑菁华》是历代书法理论资料汇编；《海棠谱》是关于海棠故实、题咏资料汇编；《小字录》是历代人物名字的资料汇编。


詎辨之曰嗟乎後世有曹不無靈寶推官公其
已矣予則有憂也不然推官公其已乎吾何憂
哉推官公諱咸用唐末人也孟達請予序之後
二年乃能書以寄之孟達亦能詩殊有推官公
句法云紹熙四年十一月既望誠齋野客廬陵
楊万里序

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印行

图7　宋临安陈起刻本《唐李推官披沙集》

陈起刻了哪些书？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大类：第一，唐诗别集（图7）。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元和江标辑《唐人五十家小集》均据陈起刻本翻刻，其中李建勋《李丞相诗集》卷末有“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一行，似非陈起所刊，因为宋代临安陈姓书商甚夥，凡书铺不在棚北大街睦亲坊者，似不应属之陈起。另外，今藏北京图书馆的《常建诗集》、《周贺诗集》、《朱庆余诗集》等，又没有包括进去。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唐人五十家小集》并非陈起所刊唐集的全部，陈起所刊唐集总数当远在50家以上。第二，宋江湖诗人作品总集。陈起刻

印发行的办法是收集一批、刻印一批、发行一批。根据《永乐大典》所录，有《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诸名。由于当时"刻非一时，版非一律"，[①]各藏家所收种数也不一致。《四库全书》收有《江湖小集》和《江湖后集》。《江湖小集》收有62家作品；《江湖后集》收有49家作品。二者相加，总计111人。这111人是否陈起所刻原数？肯定不是。例如江湖诗人曾极、赵师秀等人的诗就没有收录，"且洪迈、姜夔皆孝宗时人，而迈及吴渊位皆通显，尤不应列之江湖，疑原本残缺，后人掇拾补缀，已非陈起之旧矣。"[②]陈起死后，其子继续刻书卖书。陈起父子于南宋政权日暮穷途、摇摇欲坠之际，热心从事刻书事业，为古代文化的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陈起父子之外，临安还有不少书坊，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宋代》中指出：

> 杭州（北宋临安之名）在北宋时已有书坊，南渡后私人书铺更多，纷纷设立，称为经铺、经坊，或称经籍铺、经书铺、书籍铺，又叫文字铺。

可考者有桔园亭文籍书坊、积善坊王二郎、太学前陆家等二十余家。

建安余氏等刻书

建安余氏是福建著名出版家，余氏世代刻书，绵延数百年之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指出：

> 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

① 《四库全书总目·江湖后集提要》。
② 《四库全书总目·江湖小集提要》。

尤以余氏为最。

余氏刻书地点在建阳县崇化书坊。因为古代建阳隶属建安郡管辖，所以余氏刻书每称“建安”。又麻沙在建阳县西35公里处，崇化又在麻沙西南10余公里处，因崇化交通闭塞，刻本多在麻沙出售，久而久之，世人遂以“麻沙本”相称。现在可考的宋代余氏刻书者有余仁仲万卷堂、余恭礼、余唐卿明经堂、余腾夫、崇川余氏、余彦国励贤堂等，其中以余仁仲万卷堂最为著名。余仁仲是南宋中期人，他刻的书有《尚书精义》、《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春秋谷梁经传》、《事物纪原》、《礼记注》、《周礼注》、《尚书注疏》、《陆氏易解》、《尚书全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等。

四川眉山万卷堂以刻印医书著称于世，该堂刻《新编近时十便良方》附有刻书目录：

太医局方　　普济本事方
王氏博济方　　海上方
□门方　　初虞世方
集验方　　鸡峰普济方
苏沈良方　　李畋该闻集
孙尚药方　　本草衍义
南阳活人书　　郭氏家藏方
万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检用，请详鉴。

这个刻书目录实则鬻书广告，它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坊刻的商业性，为了大量推销图书，书坊采取种种手段，刊登书目广告就是其宣传方式之一。第二，坊刻多刻医书之类的民间常用书籍，这些书的读者面广，发行量大，经济效益显著。

五、宋代刻书的特点

综观宋代刻书情况，其刻书特点如下：

第一，就刻书地区而言，汴京、四川、浙江、福建、江西为宋代五大刻书中心。过去人们谈论四川、浙江、福建刻书较多，对于汴京、江西刻书谈论较少。汴京（今河南开封）为北宋都城，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汴京地处中原，北临黄河、南接江淮，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贯城而过，交通十分便利。汴京的手工业有纺织、造船、制茶、兵器制造等。宋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就反映了宋代汴京商业、手工业的繁华景况。汴京作为都城，文化教育也很发达。徽宗时，太学有房1872楹，学生三四千人。北宋实行馆阁制度，馆阁是高级人材的荟萃之地。总之，汴京作为北宋的政治中心，决定了它在北宋雕版印刷中的领导地位；汴京作为北宋的经济中心，决定了它从事雕版印刷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汴京作为文化中心，决定了它从事雕版印刷的优越环境。汴京刻书以官刻为主。官刻除了国子监之外，尚有崇文院、秘书监、印经院等。崇文院除了藏书之外，兼事刻书。淳化三年（991年）刻《儒行中庸编》，咸平三年（1000年）刻《吴志》，景德四年（1007年）刻《切韵》，天圣间刻《齐民要术》和《律文音义》，景祐元年（1034年）刻《土牛经》，皇祐四年（1052年）刻《简要济生方》等。秘书监刻过《张邱建算经》、《辑古算经》等。印经院专门刻印佛经。除了官刻之外，民间刻书也比较发达，相国寺东门大街是书市贸易中心，各类书籍应有尽有。据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三记载，北宋文学家穆修曾在这里设肆卖书：

> （穆修）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详价值，先

展揭披阅，修就手夺取，瞑目谓曰："汝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吾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不售一部。

有个书商名叫荣六郎，也在大相国寺开过书铺，刻过《抱朴子》等书。北宋南渡后，他随之到了临安，继续刻书。他在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所刻《抱朴子》的牌记中说：

旧日东京大相国寺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

这说明荣六郎确实是从开封大相国寺搬到临安的。除了穆修、荣六郎两家之外，宋代笔记、文集中所谓"京本"、"京师本"云者，概非汴京刻本莫属。书商为了牟利，非法刊印边机文字，官方屡禁不止。江西地处长江中游，北临长江，东西南三面群山环抱，形成以赣江、波阳湖为中心的大盆地，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宋代江西除了饶州、信州和南康军划归江南东路之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属江南西路管辖。宋代江西经济发展较快，江西漕粮名列江南诸路第三，曾巩曾在《元丰类稿·洪州东门记》中说过：江西"其田宜粳稌，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宋代江西吉州、景德镇的陶瓷也很有名，瓷都景德镇的命名亦始于宋景德年间。宋代江西发现有金、银、铜、铁、锡、铅等多种矿藏，冶炼业已初具规模。宋代江西造纸业也很发达，南康的布衣纸、吉州的竹纸、抚州清江的藤纸颇负盛名。宋代江西的文化也很发达。据统计，宋代江西共有书院149所，其中白鹿洞书院、豫章书院等闻名全国。《宋史》为江西人立传的有220余人，其中130人左右是进士出身，约占总数的6/10。宋代江西地区出任宰相、副宰相级别的政治家有陈恕、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洪适、周必大、文天

祥等20余人。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都是江西人。如此种种，都为江西刻书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宋代江西刻书主要分布在南康、宜春、萍乡、饶州、吉州、抚州等地。传世刻本数十种，《四部丛刊》中的《方言》（九江刻本）、《清波杂志》（吉安刻本）等均据宋江西刻本影印。四川、浙江、福建是我国雕版印刷的发祥地，宋代刻书方兴未艾。四川刻书主要分布在成都、眉山、广都，涪州、剑州、潼川等地。可考的刻书者有成都辛氏，俞家、周卿、眉山书隐斋、程舍人斋、秀岩山堂、广都费氏进修堂、涪州性善家塾等。浙江刻书主要分布在临安、绍兴、吴兴、温州、建德、婺州、宁波等地。福建刻书主要分布在建阳、建安、福州、泉州、汀州、莆田、邵武、南平、长乐、武夷等地，建阳麻沙刻书尤其著称于世。关于四川、浙江、福建的刻书资料到处可见，这里略而不论。

第二，就刻书单位而言，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统鼎足而立。唐五代时期，由于雕版印刷处于初创阶段，刻家屈指可数，三大系统尚未形成，官刻、家刻的发展比较缓慢。到了宋代，刻家多如牛毛，三大系统发展迅速，尤其是官刻后来居上，在三大系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三，就刻书内容而言，经史、医书、文集渐多。大量刻印经史著作的原因有两个：（一）封建统治者需要通过大量刻印经史著作，向人们灌输封建思想，从而巩固封建统治；（二）经史著作，尤其是经书拥有大量读者。经书是士子飞黄腾达、一举成名的敲门砖。宋代从官方到民间也很重视刻印医书。国子监刻印医书之多，已如前言。民间刻印医书者如刘甲刻《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徐正卿刻《针灸资生经》、严用和刻《严氏济生方》、勤有书堂刻《妇人大全良方》、杭州大隐坊刻《南阳活人书》，等等。有些畅销书，书坊争相刻印，例如《南阳活人书》就有京师、湖南、福建、浙江等多种刻本。当《易简方》盛行时，《易简绳愆》、《增广易简》、《续易简》等改编续补之作便接踵而

来。为什么宋代刻印医书这么多呢？有三个原因：（一）宋代皇帝重视医学，宋代皇帝诏令搜求名方、校刊医书、颁行医书，次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例如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访求医书诏》中说：

> 宜令诸路转运司遍指挥所管州府，应士庶家有前代医书，并许诣阙进纳。及二百卷以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优给缗钱赏之。①

（二）宋代医学出现不少总结性的成就，小儿科、妇产科、外科和针灸科方面均有长足的发展。宋代医学，人皆为之。国家专门建立考试制度，选拔医学人才。很多历史名人都有医学专著，例如文彦博有《节要本草图》，司马光有《医问》，沈括有《沈氏良方》，张耒有《治风方》，庄季裕有《本草节要》，郑樵有《本草成书》和《食鉴》，等等。宋代医学研究的兴盛，为雕版印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书稿。（三）医书的读者面广，千家万户不可缺少。宋代文集大量印行，也有两个原因：一是宋代的印刷能力大大提高，除了刻印经史著作和实用图书之外，完全有能力刻印诗文著作。二是文集拥有大量读者。

第四，就刻本形式而言，有下列特点：（一）前期多四周单边，后期左右双边占绝大多数。就《中国版刻图录》著录宋本的情况来看，四川刻本21种、湖北刻本7种、安徽刻本8种，均为左右双边；浙江刻本74种之中，70种是左右双边；江西刻本21种中，有18种是左右双边；福建刻本40种中，有30种是左右双边。（二）书口，以白口为多。《中国版刻图录》著录的74种浙江刻本、21种四川刻本、7种湖北刻本和8种安徽刻本全部是白口。但是福建刻本例外，《中国版刻图录》著录的40种福建刻本之中有26种是细黑

① 《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一十九。

口，占总数的65%。建阳刻本25种，其中细黑口19种，占总数的76%。宋本书口还有下列特征：书口鱼尾上多刻字数，上下鱼尾间多刻有书名、卷次和页码。下鱼尾下有刻工姓名或斋室名。（三）正文多接在序文、目录之后。其它特点见本书第三编第二章各节。

第五章　辽金元刻书

一、辽国刻书

公元916年，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建国契丹，公元947改国号为辽。辽与北宋对峙，是统治中国北方的一个王朝。公元1125年为金所灭，共历九帝，统治时间长达210年。

阿保机建立辽国之后，重用从燕蓟地区俘虏去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等人，这些人为辽国出谋划策，帮助辽国制定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对巩固辽国政权起了重要作用。在汉人的影响下，儒家思想也成为辽国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圣宗、兴宗都很喜读唐吴兢《贞观政要》，从其中学到不少治国的方法。道宗喜读《周易》、《尚书》、《诗经》等五经。在文学艺术方面，圣宗、道宗均喜吟诗弄赋，圣宗曾有“乐天诗集是吾师”之诗句，可见，白居易的诗歌在辽国影响之大。辽与北宋也有较为密切的贸易关系，沧州、雄州、易州等地的榷场是宋辽官方设置的固定贸易场所。榷场之外，还有大量的民间私市交易。在双边交易中，除了日常生活用品互通有无外，也有不少宋代雕版印刷的图书流入辽国。就内容而言，流入辽国的图书约有两类：一是各种文集；二是儒家经典。有一次苏辙使辽，亲眼看到不少苏轼文集，因有“谁将家集过燕都，每被行人问大苏”之句。在各种文集之中，经常有一些边机文字和议论时政得失的内容，宋代官方是严禁这些图书流入辽国的。真宗时，“诏民以书籍赴缘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

官"。①仁宗时"翰林学士欧阳修言京师近有雕市宋贤文集，其间或议论时政得失，恐传之四夷不便，乞焚毁，从之"。②契丹文字有大字、小字两种，使用范围较窄，仅在契丹贵族文人中流行。精通契丹字的人大多精通汉字，辽文化主要是以汉字为工具得到传播和发展的。

在北宋的影响下，辽国的雕版印刷也有较大的发展。但由于辽国在图书刻印和图书流通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图书的刻印和传播。道宗清宁三年（1057年）"禁民私刊印文字"，③图书也只限国内流通，正如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所说："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金人去辽未远，已有史籍寥寥之叹。元好问曾说："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④如果辽国史籍大量存在，就不至于达到"不知起灭凡几主"的地步。时至今日，可供研究辽代刻书的资料就更少了。现根据《辽史》、《全辽文》以及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所发现的有关资料将辽国刻书简述如下：

辽代官刻有印经院等。辽刻《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和《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有题记云：

> 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印经院判官朝散郎守太子中舍骁骑尉赐绯鱼袋臣韩资睦提点。

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八月，铁骊那沙"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⑤诸如此类的颁赐之书，当也是官方所刻。

---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四。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九。
③ 《辽史·道宗三》。
④ 《元文类·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
⑤ 《辽史·圣宗六》。

关于《辽藏》的刻印情况请参阅本编第八章第三节。

辽国家刻有冯绍文、杨家等。辽刻《妙法莲华经》卷四题记云：

> 经板主前家令判官银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冯绍文抽己分之财，特命良工书写雕成《妙法莲华经》壹部，印造流通。

冯绍文作为一个文士和官僚，既有刻书之才，又有刻书之力，除了为造功德刻印佛经之外，还当刻有其它图书。辽刻《上生经疏科文》题记云："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辽刻《妙法莲华经》卷四题记云："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印造"。这里"杨家"和"冯家"也当属于家刻。

辽国坊刻分布在燕京、范阳等地。燕京是辽国的刻书中心，范阳距燕京不远，影响所及，也有一些书坊。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歌咏》说：

> 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苏轼之字）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

另外，应县木塔所发现的儿童启蒙读物《蒙求》也当是坊刻产品。该书半页10行、行16字，左右双边，白口，是传世至今屈指可数的辽代刻本之一。

二、金国刻书

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领袖阿骨打创建金国，太宗天会年间先后灭掉辽国和北宋，与南宋对峙，统治中国北部达120年之久。

金统治者重视文化典籍。太祖天辅五年（1121年）十二月下诏说：

> 若克中原，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①

宗翰、宗望攻下汴州之后，太宗使穆宗第五子完颜勖前往慰劳，“宗翰等问其所欲，曰‘惟好书耳。’载数车而还”。②名将赤盏晖攻下苏州、余杭等地后，“载《资治通鉴》版以归”。③明昌五年(1194年)章宗依据《崇文总目》下令购求所缺各书；泰和二年(1202年)章宗再次下令搜访遗书。女真人在和汉人接触中所受汉文化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世宗极力尊孔崇儒，为孔子修墓立碑；章宗熟读《尚书》、《孟子》，并诏各州县建立孔庙，避孔子名讳。金国还设立译经所，用女真文翻译《史记》、《汉书》、《周易》、《尚书》、《论语》、《孟子》等一大批汉文书籍。另外，女真人也多通汉字，汉字书籍在金国广泛流传。在汉文化的熏陶下，金国人才济济，“魁儒硕士，文雅风流，殊不减江以南人物，如虞仲文、徒单镒、张行简、杨云翼、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辈，或以经术显，或以词章著，一代制作，能自树立”。④虞仲文“七岁知作诗，十岁能属文，日记千言，刻苦学问”。⑤徒单镒有《弘道集》；张行简有《礼例纂》；杨云翼有《大金礼仪》和《周礼辨》；赵秉文有《易丛说》、《中庸说》、《资暇集》、《滏水文集》、《孟子解》等；王若虚有《慵夫集》；元好问有《遗山集》、《中州集》、《续夷坚志》、《唐

① 《元史·太祖本纪》。
② 《元史·完颜勖传》。
③ 《元史·赤盏晖传》。
④ 龚显增：《金艺文志补录·序》。
⑤ 《金史·虞仲文传》。

诗鼓吹》等。

以上条件促进了金国雕版印刷的发展。官方刻书以国子监为代表。国子监专门有一批刻字工人，待遇因人而异，据《金史·百官四》记载：

> 国子监雕字匠人，作头六贯石，副作头四贯石，春秋衣绢各二匹……初习学匠钱六百，米六斗，春秋绢各一匹，布各一匹；民匠日支钱一百八十文。

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国子监刻有王弼、韩康伯《易经注》，孔安国《尚书传注》，《毛诗郑注》，《周礼注疏》，《礼记疏》，《杜预左传注》，《唐玄宗孝经注》等。①刘迎撰《山林长语》也是由国子监刻印的。另外，国子监还刻有苏轼奏议汇编，据《中州集》卷九记载，耶律履"录（苏）轼奏议上之，诏国子监刊行"。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九月译经所进所译《周易》、《尚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刘子》、《新唐书》等，"命颁行之"。②颁行之书，数量巨大，当是官方刻本，大定二十年（1180年），世宗诏曰：

> 太师（完颜）勖谏表诗文甚有典则，朕自即位，所未尝见。其谏表可入实录，其《射虎赋》诗文等篇什，可镂版行之。③

由此可见，完颜勖的赋诗文等也曾由官方刻印。

---

① 《金艺文志补录·经部》。
② 《金史·世宗下》。
③ 《元史·完颜勖传》。

金国家刻有苏伯修、朱抱一、王宾、常氏、苗君瑞、孙执中等。苏伯修刻有《补正水经》，朱抱一刻有《重阳教化集》，王宾刻有《道德经取善集》；常氏刻有《校补两汉策要》，该书王大钧序云：

先是吾乡同知彦修宅取旧本《两汉策要》，摹搨刊行于世，其间错谬及有不载者，仅数十篇，殆为阙典。彦修痛恨遗脱，尝欲增广，方经营间，不幸早逝，今二孙克家，不坠箕裘之绪，皆业进士，乃承意继志，遂再为编次，时向者遗脱，一一校证，添补附入，命工锓木，用广传布。

苗君瑞刻有《琴辨》，孙执中刻有《素问玄机原病式》。

金国坊刻分布在磻石、嵩州、太原、运城、宁晋、平水等地。磻石赵衍刻有《李贺歌诗编》，嵩州福昌孙夏氏书籍铺刻有《经史证类大全本草》、《本草衍义》等。太原刘氏书坊刻有刘完素《伤寒直格》，该书无名氏序云：

今太原书坊刘生，锓梓以广其传，深有益于世。如宵行冥冥，迷不知径，忽遇明灯巨火，正路昭然。

宁晋（即今河北邢台地区）荆氏是一个刻书世家，刻有《五经》等书。金末荆氏后裔荆祐刻有《泰和律义篇》、《广韵》等书。平水刻书最多，是全国的刻书中心地区。知见书坊有书轩陈氏、中和轩王宅、李子文、张谦、姬氏、徐氏等。书轩陈氏刻有《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中和轩王宅刻有《道德宝章》、《新刊韵略》、《滏水文集》等；李子文刻有《重刊增广分门类林杂说》，前有著者王朋寿序：

乡人李子文一见曰："专门之学，不可旁及，至如此

书，无施不可。好学通变之士之所愿见，我为君刊镂，以广其传，如何？”予谨应之曰：“诺。”于是举以畀之，并为之序。

张谦刻有《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姬氏刻有《四美人图》等，徐氏刻有关羽图像。另外，今藏北京图书馆的《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刘知远诸宫调》、《黄帝内经素问》、《重编补添分门字苑撮要》也是金平水坊本。为什么平水会成为刻书中心呢？第一，平水地理位置优越，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正如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所说：

金源分割中原不久，乘以干戈，惟平水不当要冲，故书坊时萃于此。

第二，平水所在的河东广大地区，雕版印刷历史悠久，著名家刻先驱毋昭裔就是河东人。除了毋昭裔之外，北宋时，河津王氏取瑟堂、解人庞氏等也很著名。这为平水刻书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第三，平水所在的河东地区盛产纸、墨和梨枣等木材，为刻书奠定了物质基础。据《山西通志》记载：

平阳绵纸，以白麻为之，有尺样、双抄诸名，出临汾、襄陵。

唐杜佑《通典·土贡》云：“绛郡贡墨一千四百七十挺”；宋王存等《九域志》云：“上党郡贡墨一百锭。”梨枣二木是雕版印刷的最佳木料，而平水早在秦汉时就以盛产梨枣而著称海内。第四，平水为晋东南重镇，经济繁荣，为刻书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元人胡祗遹在《紫山大全集·平阳府临汾县新廨记》中说：

平阳当河汾间为巨镇，属邑五十余城。临汾剧而最重。经界才百里，占籍者几万五千户，凡兵赋之重、徭役之烦，十常居其二。

既然官方如此重视，说明这里的经济基础是比较好的。第五，平水文化基础较好，古人因有"家住平阳县，无家不读书"的诗句。①金代平水著作如林，如毛麾《平水集》，王涿《姑汾漫士集》和《次韵蒙求》等，王文郁《增注礼部韵略》，王朋寿《增广分门类林杂说》，高守元《冲虚至德真经四解》等。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促进了平水刻书事业的发展。金国专门在平水设有管理刻书的部门，可见平水书坊之多。

三、元代官刻

元朝的建立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交流，刻书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人袁桷《清容居士集·袁氏旧书目序》说：

国家承平，四方无兵革之虞，多用文儒为牧守，公私间暇，鲜享醴会寮属，以校雠刻书为美绩。至于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

元代官方十分重视刻书。早在元代刚刚建立的时候，就把宋代府库书板一抢而光，并从江南招募了不少刻工，据《元史·张惠传》：

宋降，伯颜命（张）惠与参知政事阿剌罕等入城，按阅府库版籍，收其大庙及景灵宫礼乐器物、册宝、郊天仪仗。

① （元）方回：《桐江续集·送杜景斋归平阳县二首》。

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惠选有艺业者仅十余万户。

这些工匠之中，就有不少刻字匠人。

中央官刻

元代中央官刻有兴文署本、广成局本、太医院本、太史院本等，其中兴文署本最为著名。

兴文署"秩从六品，署令一人，以翰林修撰兼之；署丞一员，从七品，以翰林应奉兼之，掌经籍版及江南学田钱谷"。①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兴文署有雕字匠40名、印匠16名。②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兴文署本《资治通鉴》王磐序云：

> （朝廷）于京师创立兴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咸给禄廪，召集良工刻刻诸经子史版本，颁布天下，以《资治通鉴》为起端之首。

这个序言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说明兴文署的编制除了署令、署丞各一员外，还有校理四员，专门负责校勘事宜；其二，说明兴文署刻书内容只有"经子史"三类图书，不包括文集。元代皇帝多次赐书臣民，例如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六月"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书颁诸路"。③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五月，中书右丞何荣祖"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辑为一书，名曰《至元新格》，命刻板颁行，使百司遵守"。④ 大德十一年（1307年），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像孝经》、

① 杨树著：《元代中央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版。

② （元）王士点：《秘书监志》卷七。

③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

④ 《元史·世祖本纪第十六》

《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①敬铉“国初为中都提学，著《春秋备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书”。②延祐五年（1318年）“大司农迈珠进司农丞苗好谦所撰《栽桑图说》，帝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间”。③天历二年（1329年）二月，明宗“颁行《农桑辑要》及《栽桑图说》，”④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吴律令》成，王与诸臣复阅视之，去繁就简，减重从轻者居多，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准唐之旧而增损之，计二百八十五条，命有司刊布中外”。⑤上述各书当由兴文署组织刻印。

兴文署刻书知多少？由于文献无征，不得而知，但据下面一组数字可以推其大略，至元十四年（1277年）裱褙匠焦庆安曾经作过一次统计：

> 书籍文册六千七百六十二册。褙壳绫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尺一寸，每册黄绫二尺，计一万三千五百二十四尺；每册题头蓝绫半寸，计三百三十八尺一寸。纸札每册大小纸六张，计四万零五百七十二张；济源夹纸三张，计二万零二百八十六张；東鹿线纸三张，计二万零二百八十六张。⑥

上述数字当据中央官刻统计，可以相信，刻书单位当以兴文署为主，可见兴文署刻书之多。每册图书均用黄绫、蓝绫裱褙，可见兴文署刻本装潢之精。

广成局属艺文监管辖，“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⑦艺文

---

① 《元史·仁宗本纪第二十四》。
② 《元史·敬铉传》。
③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
④ 同上书卷二百零五。
⑤ 同上书卷二百。
⑥ 《秘书监志》卷六。
⑦ 《元史·百官四》。

监主管编译工作，因此广成局所刻图书当以翻译作品为多。据记载，至顺元年（1330年）广成局刻有《雅克特穆尔世家》。①

太医院刻有《圣济总录》、《危氏世医得效方》、《伤寒论》等。

太史院掌管天文历法，下设印历局专印历书。元代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而历书与安排农事活动密切相关。为了不误农时，历书的出版要求做到及时、准确。据《续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

> （至正二十七年十一月）吴太史院进《戊申岁大统历》，王谓院使刘基曰："古者以季冬颁来岁之历，似为太迟。今于冬至，亦未宜。明年以后，皆以十月朔进。"初，《戊申历》成，将刊布，基与其属高翼以录本进，王览之，谓基曰："此众人为之乎？"对曰："是臣二人详定。"王曰："天象之行有迟速，古今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无差。春秋时，郑国一辞命，必草创、讨论、修饰、润色，然后用之，故少有缺失。辞命尚如此，而况于造历乎？公等须各尽心，务求至当。"基等乃以所录再详校而后刊之。

为了使各地及时看到当年历书，常常由几个地方同时出版，至元十七年（1280年），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太史院工作时，编成《授时历》，这是一部极为精良的历法。至元二十年（1283年）十一月，"命各省印《授时历》"。②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以远方历日取给京师，不以时至，荆湖等处四行省所用者隆兴印之；合剌章、河西、西川等处所用者京兆印之"。③

---

① 《续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六。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六。

③ 《元史·世祖本纪第十三》。

地方官刻

元代地方官刻以九路十七史本和书院刻本比较著名（书院刻书详本章第四节），下面重点介绍九路十七史的刻印情况。

元大德间，全国分22道，江东建康道就是其中之一，治所在宁国路（今安徽宣城）。肃政廉访司是在元中书省和路府之间设置的地方监察区划。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包括宁国路、徽州路、饶州路、集庆路、太平路、池州路、信州路、广德路和铅山州。元大德九年（1305年）刻本《汉书·孔文声跋》云：

> 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以十七史书艰得善本，从太平路学官之请，遍牒九路，令本路以《西汉书》率先，俾诸路咸取而式之，置局于尊经阁，致工于武林。三复对读者，耆儒姚和中辈十有五人，重校修补者学正蔡泰亨，版用二千七百七十五面，工费俱载学记，兹不重出。始大德乙巳仲夏六日，终是岁十有二月二十四日，太平路儒学教授曲阜孔文声谨书，承务郎太平路总管府判官刘遵督工，中顺大夫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副使伯都提调。

据此，则十七史是由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组织下属九路联合刻印，太平路首刻《汉书》，"俾诸路咸取而式之"。其实，最早刻书的不是太平路而是宁国路，宁国路刻印《后汉书》比太平路刻印《汉书》的时间要早一个月，兹有大德九年宁国路刻本《后汉书·云谦跋》为证：

> 江东宪副伯都公语谦曰："浙西十一经已有全版，独十七史则未也。今文移有司董其役，庶几有成。"谦应曰："此盛举也"。宛陵郡学分刊《后汉书》，自大德乙巳孟夏刻梓，至仲冬书成，版计二千二百四十有奇，字计一百二十余

万，郡侯谨斋夏公力赞其成。

在宁国路、太平路的带动下，信州路刻有《北史》、集庆路刻有《新唐书》、饶州路刻有《隋书》、池州路刻有《三国志》。《北史》书口刻有“信州路儒学”、“上饶县学”、“玉山县学”、“弋阳县学”、“贵溪县学”、“永丰县学”等字样。元时，上饶、玉山、弋阳、贵溪、永丰五县均属信州路。《隋书》书口有“尧学”、“番泮”、“乐平”、“浮学”等字样：尧”即“饶”之省文，“尧学”即饶州州学；“番”即“鄱”之省文，“泮”即县学，“番泮”合起来即鄱阳县学；“浮学”即浮梁县学之简称。元时，饶州、鄱阳、乐平、浮梁均属饶州路。这里需要考辩一个问题：不少著作把瑞州路刻《隋书》作为九路诸史之一，洵为大误。考《元史·地理志》：瑞州原称筠州，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避理宗赵昀讳而改名，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为路，属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管辖。既然大德九路诸史为江东建康道肃政访司组织刻印，瑞州路不在其辖区之内，何能参与是役？又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瑞州路儒学刻印《隋书》的时间是在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比大德九路本晚26年，其非大德本甚明。另外，大德九路本均半页10行，而瑞州路本《隋书》却是半页9行。总之，从管辖范围、刻印时间、行款三个方面分析，瑞州路本《隋书》不应属于大德九路本。除了上述各路之外，其它各路分刻何史，由于文献无征，不得而知。但是，《十七史》似已刻完，兹有元谢应芳《龟巢集·募朋友置十七史疏》为证：

命甥女婿周朋举诣集庆路干托士友陈云心买纸，儒学内印置，共作四百六十册，所用装潢作料二真等费，计二百贯，澹泊斋藏贮诸史。时至元五年岁在已卯余在鸣凤王氏家塾。

由此可知，谢应芳所藏《十七史》是后至元五年（1339年）在集庆路儒学印造的。又据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著录，集庆路儒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诸史版片；其中《汉书》版片2775面，与上文所引孔文声跋中所称太平路版片之数正同；《后汉书》版片2266面，与上文所引云谦跋中所称宁国路版片之数正同。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大德十年，集庆路儒学仅仅分刻《新唐书》一史，这里怎么会出现《十七史》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集庆路（即今之南京地区）地处交通要道，九路诸史既竣，版片一并汇集于此，以便四方过往学者刷印流传；另一种可能是集庆路儒学在九路汇刻诸史30余年之后，于后至元五年（1339年）之前将《十七史》重刻行世。总而言之，不管是哪种可能，《十七史》已经刻齐是毫无疑问的。

除了九路诸史之外，见于记载的地方官刻还有江浙行省刻《宋史》、《金史》、《大学衍义》、《大德重校圣济总录》、《燕石集》、《唐诗鼓吹》、《农桑辑要》等。集庆路儒学刻《朱子读书法》、《桧亭集》、《救荒活命类要》、《修辞鉴衡》、《至正金陵新志》等。庆元路儒学刻《玉海》、《周易郑康成注》等，其中《玉海》刻于后至元六年（1340年），提调官为桂克忠等8人，王秉、王昇、杨德载3人书写，张周士等20人刻字。无锡儒学刻《白虎通》、《风俗通义》等，平江路儒学刻《玉灵聚义》等，抚州路儒学刻《道园类稿》等，临江路儒学刻《春秋集传》等，太平路儒学刻《班马异同》等，福州路儒学刻《乐书》等，扬州路儒学刻《石田先生文集》等，嘉兴路儒学刻《大戴礼记注》、《诗外传》等，绍兴路儒学刻《吴越春秋音注》等，江西行省刻《春秋纂例》、《春秋辨疑》、《春秋微旨》，等等。

四、元代书院刻书

“书院”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元代书院发展较快，元统治者曾下令江南诸路：

> 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①

据统计，元代新建书院143所，修复书院65所，改建书院19所，共计227所。②

书院刻书简介

元代书院刻书见于记载者有：兴贤书院刻《滹南遗老集》，广信书院刻《稼轩长短句》，宗文书院刻《五代史记》、《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和《本草衍义》，梅溪书院刻《校正千金翼方》、《类编标注文公朱先生经济文衡》、《书集传纂疏》等，圆沙书院刻《周易传义附录》、《广韵》、《大广益会玉篇》、《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记纂渊海》、《皇鉴笺要》和《山堂考索》，西湖书院刻《文献通考》、《国朝文类》和《金陀粹编》，武溪书院刻《新编古今事文类聚》，龟山书院刻《道命录》，建安书院刻《蜀汉本末》，屏山书院刻《止斋先生文集》和《方是闲居士小稿》，豫章书院刻《豫章罗先生文集》，南山书院刻《广韵》，苍岩书院刻《标题句解孔子家语》和《记纂渊海》，临汝书院刻《通典》，桂山书院刻《孔丛子》，梅隐书院刻《书

① 《元史·选举志》。

② 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0集。

集传》，雪窗书院刻《尔雅郭注》，圭山书院刻《黄氏补注杜诗》，凤林书院刻《元草堂诗余》，中溪书院刻《周易本义附录集注》，阳平书院刻《声律发蒙》，象山书院刻《北史》，道一书院刻《北史》，蓝山书院刻《北史》，稼轩书院刻《北史》，等等。其中圆沙书院、梅溪书院、西湖书院刻书尤为著名。西湖书院在杭州西子湖畔，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在陈基等人主持下，刻书甚多，据元陈基《夷白斋稿·西湖书院书目序》：

重刻经史子集欠缺以板计者七千八百九十有三，以字计者三百四十三万六千三百五十有二；所缮补各书损毁漫灭以板计者一千六百七十有一，以字计者二十一万一千一百六十有二；用粟以石计者一千三百有奇；木以株计者九百三十；书手刊工以人计者九十有二。对读校正则余姚州判官宇文桂，山长沈裕，广德路学正马盛，绍兴路兰亭书院山长凌云翰，布衣张庸，斋长宋良、陈景贤也。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刻板9564块，刻字3647514个，速度之快，可想而知。书院刻本的质量也是比较好的，元泰定三年（1324年）西湖书院刻《文献通考》刻印俱佳，堪称元本的代表作。元大德三年（1299年）广信书院刻《稼轩长短句》卷十二后有"大德已亥中吕月刊毕于广信书院，后学孙粹然，同职张公俊"两行，知为广信书院刻本。据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

此本酬和赠送范先之词共十首，别有宋时甲乙丙丁四卷本八首都作"廓之"，余二首不著姓名。案范先之原名当作"廓之"，四卷本刻于宋宁宗赵扩即位前，故用本名。此本祖本则刻于宁宗朝，或已在稼轩身后，故刻时避宁宗讳嫌名改"廓之"为"先之"。可见此本渊源之古。此本流传最广，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诏刻之，二十四年（1545年）

何孟伦再刻之。毛氏汲古阁本虽合并为四卷，事实上亦源出此本。清光绪间王鹏运四印斋刻本，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印本，均据此帙翻印。

书院刻书的条件

为什么书院能够刻书，并且世称精善呢？

第一，书院拥有大量藏书，其中多有善本。这不仅能为刻书提供较好的底本，而且是校勘工作的重要保证。书院藏书有四个来源，一是御赐，皇帝经常赐书给书院；二是赠送，乡贤名人和地方官吏重视书院建设，常有赠书之举；三是自刻，书院自己刻书，也是补充藏书的一个重要方法；四是购买，书院藏书大多是掏钱买来的。元代书院藏书最多的有西湖书院、四川草堂书院等。西湖书院藏书甚丰，专门编有《西湖书院书目》，上文所提及的重刻、缮补图书的数字，就是西湖书院藏书的一部分。四川草堂书院也有大量藏书，尽管四川与内地交通不便，但它还是克服重重困难，从各地购进27万册图书，正如《草堂书院藏书铭》所说：

> 蜀都阻于一隅，去之万里，孰云能阻，稽于版籍，询于文献，北燕南越，西陕东吴，有刻则售，有本则书，仆输肩赪，车递牛汗，厥数惟何？廿有七万，载之以舟，入于蜀江……①

第二，书院拥有大量学田，这是书院经费（包括刻书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政府所拨“经费”，大多以田产应充；私人筹措经费，亦多用田产替代。《吕思勉读史札记·隋唐以下》指出：

---

①（元）李祁：《云阳集》卷十。

郡县之学，自宋以后，所设日多，其经费大多恃学田也，即书院亦然。

元代官府对书院学田基本上是采取保护政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月，"江南诸路学田昔皆隶官，诏复给本学，以便教养"；①政府还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下来，据《元史·刑法二》：

诸赡学田土，学官职吏或卖熟为荒，减额收租，或受财纵令豪右占佃，陷没兼并，及巧名冒支者，提调官究之。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月诏曰：

江南州县学田，其岁入听其自掌，春秋释奠外，以廪师生及士之无告者。②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命中书省议行贡举之法时，又令"其无学田去处，量拨荒闲田土，给赡生徒，所司常与存恤"。③书院把田租给佃农，按时收租，换得钱粮，以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剩余资金，则可用以刻书。正如明陆深《金台纪闻》所说：

胜国时，郡县俱有学田，其所入谓之学粮，以供师生廪饩，余则刻书。

第三，山长学术水平较高，精于校勘，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刻书的质量。"山长"就是书院的首领，为什么叫山长呢？天下名山僧占多。书院受禅林的影响，院址也多在山林名胜之处，如

①② 《元史·世祖本纪》。

③ 《元典章》卷二。

岳麓书院在岳麓山抱黄洞下；嵩阳书院在嵩岳太室山南；石鼓书院在石鼓山回雁峰下，等等。因为书院多依山而建，故其首领就叫"山长"（也有叫洞主、洞正或堂长的）。山长多由名师硕儒担任，著书立说者甚多。就以元代而言，东湖书院山长赵文著有《青山集》，安定书院山长任士林著有《松乡文集》，聚星书院山长黄泽著有《易学滥觞》，南阳书院山长王申子著有《大易集说》，道一书院山长胡炳文著有《周易本义通释》，先贤书院山长王天与著有《尚书纂传》，上蔡书院山长陈孚著有《观光稿》，美化书院山长胡助著有《纯白斋类稿》，临汀书院山长刘将孙著有《养吾斋集》，丽泽书院山长袁桷著有《延祐四明志》，澄江书院山长许恕著有《北郭集》，贞文书院山长周闻孙著有《鳌溪文集》，等等。大量事实表明，山长确实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他们在讲学之余，对于著书和刻书极为热心，他们参校的书，讹误甚少。如果山长不学无术，他们就不可能关心刻书，更不可能刻出善本。

第四，众多的书院生徒，为书院刻书提供了销售市场。书院虽然不象书估那样四出活动，以营利为目的，但是书院刻本的读者近在眼前，书院生徒就是它的忠实读者。有些书院定期刻印学生的论文汇编，这样的书几乎是人手一册，销售量相当可观。

由于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才得以使书院刻书不断发展。清人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指出：

> 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相互易而传布之，故书院刻书有三善焉：山长无事，则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版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

所谓"版不贮官"，就是说版片不贮存于官府，自己保存，根据需要，可以随取随印，非常方便。

五、元代民间刻书

在官刻带动下，元代民间刻书也有较大的发展。

元代家刻

元代家刻可考者有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平水许宅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平水高氏尊贤堂刻《河汾诸老诗集》，平水司家颐真堂刻《御药院方》，平阳段子成刻《史记集解附索隐》，建安郑明德刻《礼记集说》，建安蔡氏刻《玉篇》，建安刘承父刻《续添是斋百一选方》，建安詹璟刻《蜀汉本末》，麻沙刘通判仰高堂刻《纂图分门类题注荀子》，陈忠甫刻《楚辞朱子集注》，花溪沈氏家塾刻《松雪斋集》，古迂陈氏家塾刻《尹文子》，云坡家塾刻《类编层澜文选》，成都彭寅翁崇道精舍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虞氏南溪精舍刻《春秋诸传会通》，存存斋刻《周易集说》，孙存吾如山家塾刻《范德机诗集》，孝永堂刻《伤寒论注解》，范氏岁寒堂刻《范文正集》，复古堂刻《李长吉歌诗》，从桂堂刻《通鉴续编》，严氏存耕堂刻《和济局方图注本草药性歌括总论》，唐氏齐芳堂刻《尚书表注》，汪氏诚意斋集书堂刻《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集》，余彦国励贤堂刻《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精一书舍刻《孔子家语》，熊禾武夷书堂刻《易学启蒙通释》，崇川书府刻《春秋诸传会通》，商山书塾刻《春秋属辞》，溪山道人刻《山海经》，云衢张氏刻《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盱南孙氏刻《大字毛诗》，刘震卿刻《汉书》，龙山赵国宝刻《翰苑英华中州集》，西园精舍刻《说苑》，田泽刻《大易辑说》，溪山家塾刻《四书疑节》，袁桷刻《汉隽》，张士宁刻《如宜方》，王厚孙刻《六经天文编》，欧阳必学刻《林泉高致集》，成廷珪刻《乐庵遗书》，黄叔善刻《日损斋笔记》，傅若金刻《傅与砺诗文

集》，胡仕可刻《胡氏本草歌括》，吴瑞刻《吴氏日用本草》，丁思敬刻《元丰类稿》，岳浚刻《九经》，李璋刻《九经》和《四书》，刘贞刻《大戴礼记》等。其中以岳浚、李璋、刘贞等比较著名。

过去，人们以为《九经》是岳珂所刻，《九经三传沿革例》亦为岳珂所撰，其实不然，据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图版298解题：

> 《春秋经传集解》卷后有"相台岳氏刻梓荆氏家塾"牌记两行，前人因肯定相台本群经为宋时岳珂家刻本。别有《九经三传沿革例》亦肯定为岳珂编著。张政烺先生谓相台本群经乃元初义兴岳氏据廖莹中世彩堂本校正重刊，与岳珂无涉。按张说甚确。谢应芳《龟巢集·跋岳氏族谱》：岳氏为常之望族，岳王弟经略使之孙，自九江来居，由宋而元，子孙蕃衍。可见岳氏迁居常州，至元初已历数世。荆谿为义兴古名，元属常州路，明清属常州府。常州岳氏，当即义兴岳氏；荆谿家塾，亦即义兴家塾。郑元佑《侨吴集·送岳山长序》：某尝馆于岳君德操长兄汉阳君之家，人言其完盛时，延致巨儒，雠校群经锓诸梓，号为岳氏九经。《万历宜兴县志》：岳浚字仲远，飞九世孙，积书万卷，一时名士多游其门。据上举资料，汉阳君与岳浚必是一家眷属。因此可以肯定，相台本群经刻板负责人似非岳浚莫属。宋咸淳间，廖莹中世彩堂校刻群经，周密《癸辛杂识》、《志雅堂杂抄》记述甚详，义兴岳氏据廖氏总例增补成《九经三传沿革例》，刻之家塾，自与宋时岳珂无关。《四库全书提要》竟误认廖莹中为廖刚，指鹿为马，可称笑谈。廖刻群经久佚。相台岳氏本，除此书（即《春秋经传集解》）外，仅存《周易》、《论语》、《孟子》、《孝经》及《周礼》残帙，今并藏北京图书馆。

岳氏为了刻好"九经三传"，凡用二十三种版本相比较，于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等皆有考证，《九经三传沿革例》集中反映了岳氏的校勘成果。"九经三传"对后世影响很大。《易》、《书》、《诗》、《礼记》、《左传》有明翻刻本、清武英殿翻刻本，清代贵阳、广州、成都、长沙等地均有翻刻。《四部丛刊》中有长沙叶氏观古堂藏明翻岳氏《周礼》十二卷影印本，有江阴缪氏藏昆山徐氏影抄相台岳氏《孝经》影印本等。

李璋，山东巨野人。据元虞集《道园学古录·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

> 承直郎松江府上梅县尹李君璋以广东元帅宣慰王公部中书访集于临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济宁之巨野，去夫子阙里二百里，而近先大父谦斋翁始就外傅时，出游孔林而学焉。是时干戈未宁，六经板本中原绝少，学者皆自抄写以成书。其后朱子《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传至北方，学者传授，版本至者尚寡，犹不能无事手录，及至元混一，东南书颇易致，而阙里无专本，欲刻梓焉，意将省笔札之劳，以富涵泳之目，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益甚欲为之，而未克就。璋也，从事江右宪幕，辟浙闽掾，得学制锦于海滨，秩满少间，请于家君，愿成大父之志，《易》、《书》、《诗》，《礼》先就，既以北还，而《春秋左氏传》及朱子《四书》重至江右而后克成，《四书》版加厚，字加大。命子某谨缮写，不敢忽，犹虑北方风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归诸孔庙之下，俾久于模印而无坏，愿书其事。诸经板凡若干，《四书》板凡若干，其大父讳从道，其父名某云。昔汉建宁中命诸儒刊正六经，去其穿凿谬误，刻石东都太学门外，一时观视摹写者，车日数千辆。甚矣，学者之好之也，如此伟

哉！东鲁自有李氏所刻书，以应四方之来求，将何愧于东都乎！

刘贞，字庭干，海岱人，以文儒起家。出为嘉兴路总管，擢授海道都漕运使。他刻的书有《大戴礼记》、《逸周书》、《韩诗外传》等。其父名克诚，字居敬，号节轩先生，嗜校古书，庭干所刻皆节轩所校。①

元代坊刻

元代坊刻数量也很多，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说：

> 元时书坊所刻之书，较之宋刻尤夥，盖世愈近则传本多，利愈厚则业者众，理固然也。

元代坊刻主要分布在平水、建宁等地。平水书坊有张存惠晦明轩、曹氏进德斋等。建宁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称路，辖建安、建阳、崇安等7县。可考书坊有叶日增广勤书堂、宗文堂、建阳余氏、郑氏积诚堂、刘绵文日新堂、虞氏务本堂、刘君佐翠岩精舍、熊宗立种德堂、魏氏仁实堂、陈氏余庆堂，等等。其它各地书坊还有燕山窦氏活济堂、庐陵泰宇书堂、三衢石林叶敦、茶陵陈仁子、武夷詹光祖等。曹氏进德斋刻有《尔雅郭注》、《中州集》等。张存惠晦明轩刻有《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增节标目音注精义资治通鉴》、《丹渊集》、《滏水集》等。刘锦文日新堂刻有《书集传》、《诗义断法》、《诗经疑问》、《诗传通释》、《四书通义》、《广韵》、《方舆胜览》、《性理群书集览》、《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新增说文韵府群玉》、《新刊医林类证集要》、《奇效良方》、《太平金镜策》、《东汉文鉴》、《唐诗鼓吹》等。刘君佐翠岩精舍刻有《周易传义》、

---

①（清）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二。

《诗考》、《广韵》、《玉篇》、《陆宣公奏议》、《国朝文类》、《翰苑集》等。郑希善宗文堂刻有《艺文类聚》、《经史证类大全本草》、《临川集》、《静修先生文集》等。建阳余氏刻书始于南宋，终于清康熙间，历时500年左右，在中国刻书史上是仅见的。据有关书目著录，元代余志安勤有堂刻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注》、《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三辅黄图》、《四书通证》、《唐律疏义》、《国朝名臣事略》、《易源奥义》、《易学辨惑》、《汉书考证》、《后汉书考证》、《诗童子问》、《诗传纲领》、《仪礼图》、《新编妇人大全良方》、《普济本事方》、《诗辑》、《春秋后传》、《洗冤录》、《古列女传》等；余氏勤德堂刻有《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皇元风雅》、《广韵》等；余氏双桂堂刻有《书集传》、《广韵》、《联新事备诗学大成》等。叶日增广勤书堂也是建阳名肆，刻有《孟子通》、《针灸资生经》、《新刊王氏脉经》等。《新刊王氏脉经》今藏北京图书馆，《四部丛刊》本即据此帙影印。叶日增广勤书堂的部分版片是从建安余氏继承而来，往往将余氏牌记挖去，补以叶氏牌记，冒充新刻。例如《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集》，原为建安余氏所刻，有牌记云："皇庆壬子余志安刊于勤有堂"，版片归叶日增后，将余氏牌记挖去，换上"广勤书堂新刊"牌记，并附以文集二卷，字迹与原刻迥异。叶日增死后，版片传归其子叶景逵，目录之后又增刻"三峰书舍"钟式牌记。故事到此并没有完结，明正统间，版片转归金台汪谅，汪氏又将广勤堂、三峰书舍牌记一并挖去，换上"汪谅重刊"牌记。由此可知，《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集》版片三易其主，牌记换了又换，其流传情况是相当复杂的。

坊刻内容除了部分经史著作之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有关举业之书。例如朱熹《四书集注》充塞市场，元陈栎《定宇集》卷十七说：

自朱文公《四书》行世，学者童而习之，或病其不能骤通也，为《语孟句解》，取《集注》语裂而附之，刊本如麻，数十年比比然，其体弗类。

第二，诸子百家著作。元人吴海《闻过斋集》卷八说：

今天下之书已多矣，然《诗》、《书》、《易》、《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大学》、《中庸》七篇，凡六经圣贤之言未尝多也；商周而下，秦汉以来十八代之史记、纪传、表志、编年、纪事之不可无者，未尝多也，所以多者，皆诸子百氏、外家杂言、异端邪说之不可计其名，读之毕世不能尽其卷帙。

第三，元曲作品。元曲是元人吸收宋金以来诸宫调及其它艺术形式逐渐发展而成的一种文学体裁，清俞樾《茶香室丛抄》卷十八转引明人沈德符的话说：

元人未灭南宋时，以此定士子优劣。每出一题，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画学出唐诗一句，能得画外趣者登高第，故宋画元曲，千古无匹。

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元代剧作家见于记载者有200多人，著名者如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郑光祖等，其中关汉卿尤负盛名。元曲数量很多，见于元末钟嗣成《录鬼簿》著录的就有400余种 其中不少作品都有书坊刻本。《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所收《元刊杂剧三十种》即据元刊影印。《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有关汉卿《新刊关目闺怨佳人拜月亭》、《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王伯成《古杭新刊关目的本李太白贬夜郎》、狄君厚《新编关目晋文公火烧介子推》、金仁杰《新刊关目全萧何追韩信》等。这些杂剧大多是由杭州书坊刻印的。

六、元代刻书的特点

综观元代刻书情况，其刻书特点如下：

第一，就刻书地区而言，大都、平水、杭州、建阳为元代四大刻书中心。大都为元代都城，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兴文署就设在这里，刻书之多，不言而喻。平水承袭金国遗风，刻书亦盛，传世平水刻本有蒙古乃马真后三年（1244年）刻《云笈七签》，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张宅晦明轩刻《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元至大三年（1310年）曹氏进德斋刻《中州集》等。杭州和建阳两地雕版印刷久负盛名。元代很多官刻书都是奉诏下杭州刻板，传世元杭州刻本有大德三年至四年（1299～1300）刻《大德重校圣济总录》，至正七年（1347年）刻《大元大一统志》，泰定四年（1327年）西湖书院刻《文献通考》，至正五年（1345年）刻《金史》，至正六年（1346年）刻《宋史》等。传世元建阳刻本有元天历三年（1330年）广勤书堂刻《新刊王氏脉经》，至顺元年（1330年）宗文堂刻《静修先生文集》，元统三年(1335年)余志安勤有书堂刻《国朝名臣事略》，至元六年（1269年）郑氏积诚堂刻《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至元六年（1269年）刘氏日新堂刻《伯生诗续编》，至元七年（1270年）虞氏务本堂刻《赵子昂诗集》，至正十六年（1279年）翠岩精舍刻《广韵》，广勤书堂刻《针灸资生经》等。

第二，就刻书单位而言，元代学校刻书比较发达。元代官方刻书大多由各级学校承担，学校是元代官方刻书的主体。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曾经指出：

> 元时官刻之书，多由中书省行江浙等路有钱粮学校赡学田款内开支，有径由各省守镇分司呈请本道肃政廉访使行文

本路总管府事下儒学者，有由中书省所属呈请奉准施行，谓转经翰林国史院礼部详议照会行文各路者。

例如延祐五年（1318年）集贤院通过中书省和礼部批准，令江西等行省各路儒学刻印《陵川集》；后至元二年（1336年）礼部通过中书省批准，令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刻印《元文类》，浙西道交由西湖书院刻印；后至元五年（1339年）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令扬州路儒学刻印《石田先生文集》。如前所言，大德九路诸史也是由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下达任务，由各路儒学承办的。至正五年（1345年）江浙、江西刻宋辽金三史，前有牒文云：

准中书省咨右丞相奏，去岁教纂修辽金宋三史，令江浙、江西二省开板，就彼有的学校钱内就用，疾早教各印造一百部。钦此。①

这是皇帝诏令江浙、江西学校刻印史书之例。元代学校刻书除了上文列举者外，尚有武昌路儒学刻《大易缉说》，龙兴路儒学刻《唐律疏议》，中兴路儒学刻《春秋比事》，婺州路儒学刻《论孟集注》，漳州路儒学刻《北溪先生大全文集》，赣州路儒学刻《南轩易说》等。

第三，就刻书内容而言，农书较多。蒙古族在动用武力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把大片农田变为牧场，强制推行牧区的生产方式，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田园荒芜，饿殍千里，蒙古政权面临严重威胁。为了稳定封建政权，迅速改变经济衰败的局面，元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元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②并多次颁布

① 《书林清话》卷七。
② 《元史·食货志·农桑门》。

屯田垦荒之令。中统元年（1260年）命各路宣抚司选通晓农事者任劝农官，其职责是巡行郡邑，察举勤惰。至元七年（1270年）由左丞张文谦等组建司农司，专门负责农桑水利方面的工作。同年，中央还颁布了关于发展农桑的十四条规定。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在江南地区设立大司农司及营田司，强化对江南农业生产的管理。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颁行《农桑杂令》，对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又作了具体规定。成宗大德元年（1291年），罢妨农之役。大德十一年（1307年）取消扰农之禁，奖勤罚懒。以后历代皇帝都很重视农业生产。官方还考虑到"田里之人虽能勤身从事，而播殖之宜、蚕缫之节，或未得其术，则力劳而功寡，获约而不丰矣。于是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披阅参考，摭其切要"，编写了《农桑辑要》等大批农书。①《农桑辑要》共七卷，分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等十类。《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于农家之中最为善本"。《农桑辑要》先后共刻印五次：初刻于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②再刻于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以旧本弗称，诏江浙省臣端楷大书，更锓诸梓，仍印千五百帙，颁赐朝臣及诸牧守，令知稼穑之艰难，以劝谕民"；③三印于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诏江浙行省印《农桑辑要》万部，颁降有司，遵守劝课"；④四印于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丞相暨大司农臣协谋奏旨，复印千五百帙，凡昔之未沾赐者，悉与之"；⑤五印于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印刷1万部。累计五次印刷总数约2.5万部。一部图书发行2.5万部，在中国刻书史

---

① （元）王磐：《农桑辑要序》。

② 此据至元十年王磐撰《农桑辑要序》。而《元史·食货志·农桑门》和《续资治通鉴·元纪五》又称至元二十三年颁行此书。未知孰是。

③ （元）蔡文渊：《农桑辑要序》。

④⑤ 《续资治通鉴·元纪十七》。

上是少见的，这说明元代兴起一般“农书热”，农书销路极广。除了《农桑辑要》之外，元朝还多次刻印过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张光大《救荒活民类要》、苗好谦《栽桑图说》等书。

第四，就刻本形式而言，早期多左右双边，晚期多四周双边。《中国版刻图录》著录元本65种，其中左右双边33种，占著录总数的50%；四周双边21种，占著录总数的32%。各地刻本情况不大一致，例如平水刻本多四周双边，嘉兴刻本多左右双边。就书口来看，早期多白口，晚期多黑口。《中国版刻图录》著录元代黑口本42种，占著录总数的65%。就鱼尾来看，元刻多花鱼尾。鱼尾的位置除了书口之外，目录题名、书序题名、书内标题等处到处可见。其它特点详本书第三编第二章各节。

第六章 明代刻书

一、经 厂 刻 书

明代建国之初，鉴于历史教训，不许太监识字，严禁太监参政，甚至在宫廷内挂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的铁牌。然而，明成祖上台以后，一反前规，开始重用太监。到了宣德年间，宦权日重，秉笔太监甚至可以代表皇帝“御批”重要公文。明中叶之后的几个皇帝大多昏庸无能、不问国事，太监乘机秉权，一再形成太监专政的局面。据记载，明朝末年，一次招募太监，数额多至4500人，有2万多人应招，① 可见明代太监之盛。明代宫廷设有规模庞大的太监机构，号称“二十四衙”（十二监、四司、八局）。在二十四衙之中，司礼监掌管宫内仪礼、刑名、内外章奏、书籍名画等，经厂是司礼监内负责刻印书籍的专门机构。

经厂概述

经厂的规模很大，据记载，嘉靖十年（1531年）经厂拥有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折配匠189名、裁历匠81名、刷印匠134名、黑墨匠77名、笔匠48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计1275名，② 人数相当于现代的大型印刷厂。经厂的工作由提督、

---

① （日）寺尾善雄：《话说太监》。

② 《明会典》卷一百八十九。

掌司、监工等主持，“提督总其事，而掌司，监工分其细也”。①提督掌古今书籍、名画、册页、手卷、笔砚、墨砾、绫纱、绢布、纸札等，这些物品各有仓库贮藏。掌司四至七人，“只管一应经书印板及印成书籍、佛藏、道藏、番藏，皆佐理之”。② 监工负责看管仓库，是仓库保管员。刻书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不少太监在内书堂进行过专门训练。内书堂（也叫内馆）是培养太监的专门学校。宣德四年（1429年）“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而太祖不许识字读书之制，由此而废”。③内书堂收容十岁左右的净身儿童二三百人，所学课本有《内令》、《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四书》、《千家诗》、《神童诗》等，尤其重视书法的训练。对于那些成绩不佳、违犯纪律的学生，轻则用界方打手，重则向圣人罚跪，或者“向圣人前直立弯腰，用两手扳着两脚，不许体屈，屈则界方乱打如雨，或半炷香，或一炷香，其人必眼胀头眩，昏晕僵仆，甚而呕吐成疾者”。④ 就是通过这种方法，使不少太监粗通文墨。“凡各衙门缺写字者，即具印信本奏讨，奉旨拨若干名，即挨名给散”。⑤正德元年（1506年）10月，人称“八虎”之一的太监刘瑾主持司礼监工作，他常常滥用职权，借题发挥，诬陷忠良。据《明武宗实录》卷二十八记载：

> 正德二年秋七月癸卯，《通鉴纂要》进呈后，司礼监官即至内阁，传示圣意，令刊刻板本。中官（即太监）督刻者，检其中有一二张装潢颠倒，复持至内阁见示，欲更定其序耳。是日值大学士李东阳家居，惟同官焦芳，王鏊在阁。芳以为编纂总于东阳，非己责也，慢其人，不加礼遇。其人怒，遂以白于瑾。瑾方欲以事裁抑儒臣，初一日早朝，毕集府部

① （明）刘若愚：《酌中志·土集》。

②④⑤ 同上书《木集》。

③ 《明史·职官三》。

大臣科道等官于左顺门，以进呈本出示，遍摘其中字画之浓淡不均，又微有差讹者百余处，以为罪。

为了这部书稿，处分了20多人。其暴戾恣睢，于此可见。《通鉴纂要》书稿后来改由"文华殿书办官张骏等改誊，超拜官秩，骏由光禄丞擢礼部尚书，他授京卿者数人，装璜匠役悉授官"。① 明代后期，经厂的管理相当混乱，图书、版片丢失现象十分严重，据明刘若愚《酌中志·土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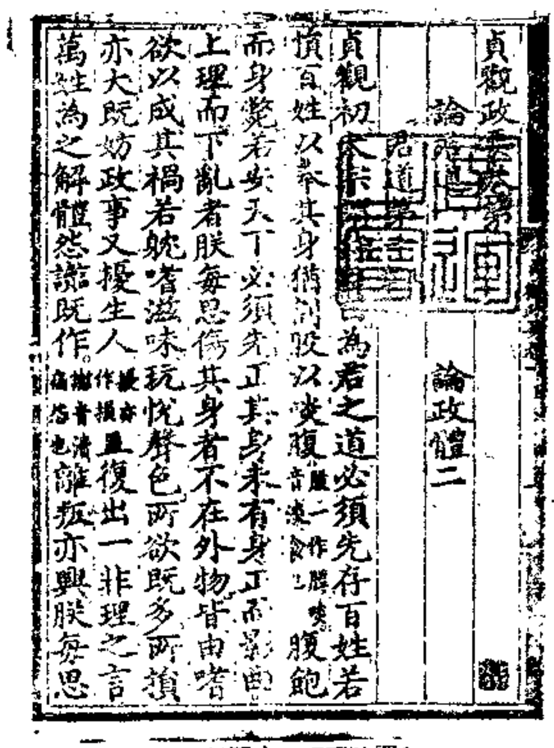
（万历年间）讲幄尘封，右文不终，官如传舍，遂多被匠夫厨役偷出货卖。柘黄之帙，公然罗列于市肆中，而有宝图书，再无人敢诘其来自何处者。或占空地为圃，以致板无晒处，湿损模糊，甚或劈毁以御寒，去字以改作。即库中现贮之书，屋漏浥损，鼠啮虫巢，有蛀如玲珑板者，有尘霉如泥板者，放失亏缺，日甚一日。若以万历初年较，盖已什减六七矣。

为什么会造成如此混乱的局面呢？因为经厂"既无多学博洽之官综核齐理，又无簿籍数目可考以凭销算。盖内官发迹，本不由此，而贫富升沉，又全不关乎贪廉勤惰。是以居官经营者，多长于避事，而鲜谙大体，故无怪乎泥沙视之也。然既属内廷库藏，在外之儒臣又不敢越俎条陈，曾不思难得易失者，世惟书籍为最甚也"。② 这说明混乱的原因有三条：一是经厂缺乏"博学之官综核齐理"；二是"内官发迹"与"贪廉勤惰"没有关系，有关人员把书版看作不值钱的泥沙，以致于"无簿籍数目可考"。三是太监权重，外人"不敢越俎条陈"。

---

① 《明史·宦官一》。

② 《酌中志·土集》。



貞觀政要卷第一

論君道第一

論政體二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

图8　经厂本《贞观政要》

经厂刻了多少书？据明刘若愚《酌中志》统计，有161种，版片105833面。此外，还有佛经一藏、道经一藏、番经一藏、大五大部经、小五大部经、五般经等。据明周弘祖《古今书刻》著录，经厂本有83种，其中《难经》、《素问》、《兴都大志》、《五箴注》、《孝慈录》、《礼仪定式》、《洪武仪式》、《大明令》、《军政条例》、《教民文榜》、《资世通典》、《欧苏文集》、《敬一箴》、《宋元纲目》、《洪武圣教记》等16种图书不见《酌中志》。二目相加，去其重复，共得177种。当然，这177种图书也当是经厂刻书的一部分。其它图书有待进一步查考。

经厂本的内容和版式

经厂本在内容和版式上也有自己的特点。

在内容上，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较多：第一，经书多。如《周易大全》、《书传大全》、《诗传大全》、《春秋大全》、《礼记大全》、《易传》、《书传》、《诗传》、《春秋传》、《礼记》、《四书大全》、《四书集注》、《四书白文》、《大学》、《中庸》等。正统十二年（1447年）经厂本《礼记集说》序云：

> 司礼监钦奉圣旨：五经四书经注，书坊刊本，字有差讹，恁司礼监将《易》程朱传义、《书》蔡沈集传、《诗》朱熹集传、《春秋》胡安国传、《四书》朱熹集注，都誊写的本，重新刊印，便于观览。

可见，经厂大量刻印经书，是听命于皇帝的。第二，诰、训、律、戒、鉴、忠、孝方面的书多。如《御制大诰》、《大明律》、《历代臣鉴》、《女训》、《内训》、《明心宝鉴》、《皇明祖训》、《曹大家女训》、《昭鉴录》、《外戚事鉴》、《忠经》、《郑氏女孝经》、《孝顺事实》、《孝经大义》、《达达字孝经》、《忠经直解》、《孝经直解》、《帝鉴图说》等。第三，史书，尤其是明代史书多。如《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大明集礼》、《大明官制》、《高皇后传》、《洪武礼制》等。第四，小学著作多。如《洪武正韵》、《广韵》、《玉篇》、《古字便览》、《百家姓》、《千字文》、《四言杂字》、《七言杂字》、《三字经》等。嘉万间刻《新编对相四言》相当于今天的看图识字课本，“数百年前，此类儿童读物已通行，实教育史上所应大书特书者”。① 以上四类图书，虽然内容不同，但其目

①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新编对相四言提要》。

的是一样的，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这些书中如《诸司职掌》、《皇明祖训》、《御制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大明会典》、《性理大全》、《五经大全》等都是官修的。正德四年（1509年），武宗在《御制大明会典序》中说：

> 特敕司礼监命工刻梓，俾内而诸司，外而群服，考古者有所依据，建事者有所师法，由是纲举目张，政成化洽，保斯世于无疆，岂曰小补之哉。

由此可知，经厂刻书的目的在于"纲举目张，政成化洽，保斯世于无疆"。

经厂本在版式上也有自己的特征：书品宽大，高20～30厘米，宽15～28厘米。字体以赵体为主，字大如钱。正德以前粗黑口多，正德以后间有白口，册首多钤"广运之宝"印，纸张以绵纸为多（图8）。

经厂刻书的有利条件

经厂是明代内府刻书的专门机构，刻书之多是其它部门无可比拟的。经厂刻书具有下列有利条件：

第一，明代最高统治者把刻书当作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经厂所以大量刻印经、诰、训、律、戒、鉴、忠、孝等图书的原因正在于此。经厂的许多图书都是诏令刻印的。这些图书之中有不少是法定教科书，强令人们购买。例如《御制大诰》第74条规定：

> 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

藐视为戒。

此为强行发卖之例。有此书者，罪减一等；无此书者，罪加一等。必欲做到"户户有一本"，其发行量之大，可想而知。由于明代最高统治者重视刻书，所以经厂的规模才能越办越大。

第二，明代民间刻书发达，为官方利用这种先进技术提供了方便。皇帝内廷虽然高高在上，但它毕竟摆脱不了客观环境的制约。内廷的一切，包括衣食住行在内，都与民间息息相关。经厂的许多刻书工人，都是直接来自民间，发达的民间刻书为经厂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技术和劳动力。

第三，内廷拥有雄厚的财力，为经厂刻书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刻书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没有优裕的经济条件作为后盾，就寸步难行。据《大明会典》记载，全国各地每年要向内廷提供大量纸张：陕西15万张、湖广17万张、山西10万张、山东5.5万张、福建4万张、北平10万张、浙江25万张、江西20万张、河南2.5万张、直隶38万张。经厂刻书所需纸张就是由此而来。

正确评价经厂本

怎样评价经厂本？目前尚有争论。我们的看法是：（一）从形式上看，经厂本"版式字画，颇为工楷"，①这是毫无疑义的。（二）从内容上看，经厂本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贬斥。长期以来，人们出于对太监的反感心理，因人及书，对经厂本否定过多。其实，经厂本也不乏善本，例如明景泰间刻元忽思慧《饮膳正要》是一部营养学名著，"旧时民间传本极稀，近世藏日以抄本为多，究不若此本之可信"。②过去人们给经厂本列举的"罪状"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例如清朱彝尊说经厂本《广韵》"欲均其字

① 《四库全书总目·易传义提要》。

② 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饮膳正要跋》。

数"，大量删掉注文，其实，元刻本早已如此，并非经厂所删。[1]又如《明祖训》一书中本无"委任阉人（即太监）之禁"，有人硬说是主持经厂的阉人刻印此书时故意删去的。《四库全书总目·明祖训提要》曾对此事进行考证：

> 皇甫录《明纪略》云《祖训》所以教戒后世者甚备，独无委任阉人之禁，世以为怪。或云："本有此条，因版在司礼监，削去耳。"然《永乐大典》所载，亦与此本相同，则似非后来削去，录所云云，盖以意揣之也。

过去人们评价经厂本，大多"以意揣之"，这是靠不住的。

二、国子监刻书

朱明王朝是以南京为基地，崛起江南，统一全国的。元末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率部攻下集庆路（今南京地区），改其名为应天府。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九月，将原集庆路儒学改建为国子学。明朝正式建立之后，重视发展文化，洪武八年（1375年）又建中都（即安徽凤阳）国子学。洪武十四年（1381年），对南京（洪武元年改应天为南京）国子学进行了整顿。洪武十五年（1382年）国子学改名国子监。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停办中都国子监，保留南京国子监。明成祖夺取政权之后，决定迁都北京。永乐元年（1403年）又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国子监。这样，明代就出现了南北两监并存的局面。南京国子监简称南监或南雍，北京国子监简称北监或北雍，国子监在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材的同时，对于文化典籍的保管和流传十分重视，下面就来谈谈国子监刻印图书的情况。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广韵提要》。

南监继承的版片

据明周弘祖《古今书刻》著录，南京国子监先后刻印图书270种。这270种图书有新刻的，也有将前代版片略事修补之后重印的。朱明建国之初，南监搜罗了大量宋元版片。如宋刻《宋书》版片2716面、《梁书》版片970面、《南齐书》版片1061面、《陈书》版片556面、《魏书》版片3385面、《北齐书》版片716面和《周书》版片877面。以上七书即所谓"眉山七史"。弘治四年（1491年）南监再次搜罗各地版片，当时祭酒谢铎奏称：

> 本监所有书板，虽旧多藏贮，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遗。虽旋加修补，而切于日用者犹或未备，乞敕各布政司将所有如《程朱大全集》与《宋史》等书，尽行起送到监，而改东西书库屋为楼，上以为庋置之所，下以为印造之局，则不致污坏散漫，而教化之助，亦永有赖矣。①

据黄佐《南雍志》著录，南监搜罗的版片有宋乾道五年（1169年）刻《桂林志》397面，宋景定四年（1263年）刻《临川志》866面，宋咸淳二年（1266年）刻《续文章正宗》569面，元延祐间池州刻《读书工程》145面，元至治二年（1322年）刻《文献通考》741面（双面），元至正间朱天爵刻《朱子行状》67面，元至正间浙东宪使张士和刻《历代十八史略》548面，至元二年（1336年）刻《元文类》1600面，元丁饶介刻《桧亭诗稿》97面，元刻《通志略》13724面，元江浙行省刻《六书统》803面，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监继承元集庆路儒学版片多达20余种，为了弄清这种继承关系，现将《金陵新志》（元张铉撰）著录的元集庆路儒学版片数与《南雍志》著录的集庆路儒学版片数列表对比如下：

---

① （明）黄佐：《南雍志·事纪四》。

书名	金陵新志	南雍志		
		存	亡	总计
史记	1819	1600	219	1819
汉书	2775	2775		2775
后汉书	2266	2366		2366
三国志	1296	1392		1398
晋书	2965	3152	13	3165
南史	1773	1613	130	1773
北史	2721	2676	45	2721
隋书	1732	1694	37	1731
新唐书	4981	4796	85	4881
新五代史	773	763		763
贞观政要	200	78	122	200
南唐书	180	92	88	180
礼部玉篇	270	117	157(其中坏1面)	274
修辞鉴衡	56	56		56
农桑撮要	58	30	28	58
救荒活民书	150	86	46	132
鲁斋先生诗解大学	19	8	11	19
厚德录	60	2	58	60
刑统赋	63	4	59	63
宪台通纪	515	285	258	543
乐府诗集	1380	1316	24	1340

由此可以看出，《南雍志》和《金陵新志》所著录的各书版片大体是一致的，个别不一致者大约是由笔误造成的。这说明上述各书版片原系元集庆路儒学所刻，南监原原本本地继承了集庆路儒学刻书的成果。正如《南雍志·经籍考》所说：

《金陵新志》所载集庆路儒学史书梓数正与今同，则本监所藏诸梓多自旧国子学而来也明矣。自后四方多以书板送入。

南监除了继承宋元版片之外，还收集了不少明代各地所刻版片，如洪武间蜀藩刻《蜀汉本末》173面，洪武四至六年永丰尹蔡玘刻《欧阳居士文集》533面，成化浙江副使张和命等刻《文鉴》2200面，嘉靖五年（1526年）山东巡抚都御史陈凤梧刻《新刊仪礼注疏》860面和《诸史会编》6000面，等等。[1] 因为南监继承了大量前人所刻版片，所以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大大缩短了出书周期，这也正是南监出书多的重要原因。

南监修补的版片

版片毕竟是木制的，随着时间流逝和刷印次数的增加，字迹漫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新刻版片也不例外。为了充分发挥前代版片和新刻版片的作用，南监非常重视版片的修补工作，有案可查的修补之举就有七次：

第一次是在洪武年间。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一月，太祖命礼部修补国子监旧藏书版，谕曰：

古先圣贤立言以教后世，所存者书而已。朕每观书，自觉有益，尝以谕徐达，达亦好学，亲儒生，囊书自随。盖读

---

① 以上数字均据《南雍志·经籍考》。

书穷理于日用事物之间，自然见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谬，书之所以有益于人也如此。今国子监所藏旧书板多残缺，其令诸儒考补，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资于学者。①

第二次是在永乐年间。永乐二年（1404年）三月，成祖"命工部修补国子监经籍版"。②但是，这两次修补，收效甚微，加上管理不善等原因，书版大量丢失，正如《南雍志·经籍考》所说：

洪武、永乐时，两经钦依修补，然板既丛乱，每为刷印匠窃去刻他书以取利，故旋补旋亡。至成化初，祭酒王㑺会计诸书亡数，已逾两万篇。

第三次是在正统年间。正统六年（1441年）四月祭酒陈敬宗言于朝曰：

《文献通考》等书乃朝廷备用书籍，今既捐阙，宜令礼部委官盘点见数，转行工部委官带匠计料修补。上皆从之。③

第四次是在成化年间。成化初年，巡视京畿、南京、河南诸道御史董纶"以赃犯赎金送充修补之费，《文献通考》补完者几二千页"。④成化十八年（1482年）修补了《新唐书》。

第五次是在嘉靖年间。嘉靖七年（1528年）锦衣卫闲住千户沈麟"奏准校勘史书，礼部议以祭酒张邦奇、司业江汝璧博学有

---

① 《南雍志·事纪一》。
② 同上书《事纪二》。
③ 同上书《事纪三》。
④ 同上书《经籍考》。

阅，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考对修补，以备传布”。① 嘉靖八年至十年曾先后修补了《新唐书》、《晋书》、《宋书》、《南史》、《北史》、《元史》等书；嘉靖三十五至三十六年修补了《宋史》；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修补了《晋书》。

第六次是在万历年间。万历五年（1577年）修补《梁书》、《新唐书》、《新五代史》等；万历十年（1582年）修补《汉书》、《晋书》等；万历十六年（1588年）修补《陈书》、《周书》等；万历十八年（1590年）修补《南齐书》、《北齐书》、《南史》等；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修补《北史》等；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修补《宋书》等；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修补《隋书》等；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修补《魏书》、《史记》等。

第七次是在天启二年（1622年）"天启二年（1622年）秋，祭酒黄儒炳上任，'珍护是书，爰有修辑之役，司业叶灿继至同心协赞，正其讹谬，修其残蚀，次其错紊，原无板者购求善本修补，以成全璧"。② 在黄儒炳的主持下，先后修补了《后汉书》、《元史》、《辽史》、《金史》、《宋史》等。

当然，修补版片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随坏随修，从未间断，如《元史》曾于崇祯元年、二年、三年、七年、八年、十年、十一年多次修补。以上七次，规模稍大而已。

南监新刻的版片

南监在利用前人版片印书的同时，也新刻了不少书。嘉靖以前，南监多以旧版刷印，所刻新书不多。弘治五年（1492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丘浚《重编琼台集·请访求遗书奏》云：

> 敕两京内外守备大臣合同南京司礼监、礼部翰林院官查

---

① 《南雍志·经籍考》。

② （明）黄儒炳：《续南雍志·经籍考》。

盘永乐中原留南京内府书籍有无多寡全欠，具数奏知，遂为起取存留，分派锓补。其止有一本无副余者，将本书发下国子监，敕祭酒司业行取监生抄录，字不必工，惟取端楷，录毕散各堂教官校对，不许差错，每卷末识以誊写监生、校对教官衔名。其师生只照常例俸廪，别无支给，挨次差拨如常。合用刊字、折背、刷印匠作及纸笔之费，行合于衙门量为拨办，不限年月，书成装订，陆续付两监典籍掌管，如此则一书而有数本，藏贮而又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矣。

这个奏章是研究明代国子监刻书的重要文献，从刻书目的、刻书方法到刻书经费，都作了具体说明。从此，明代国子监刻书数量与日俱增。就史书而言，嘉靖以前，只就十七史旧板（其中宋眉山七史七种、儒学十种），陆续做了一些修补的工作。史书“大规模之雕板，则以嘉靖七年(1528年)至十年（1531年）为第一期，所刊为《史记》、《两汉》、《辽》、《金》五史，余皆略事修补；万历二年（1574年）至二十四年（1596年）为第二期，所刊者为《史记》、《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新五代史》十四史，其余随时补刻，迄天启、崇祯不替”。[①]嘉靖本与万历本有明显区别：嘉靖本只载祭酒、司业之名，其它一概不书；而万历本则遍载寮属。如嘉靖八年（1529年）南监本《辽史》卷端仅题“大明南京国子监祭酒臣张邦奇、司业臣江汝璧奉旨校刊”；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南监本《隋书》目录后题云：

南京国子监司业季道统校，前监丞詹仰圣，监丞李之皞，博士赵世典，助教何诗，学正郑傲、曾士科、陈一选，

① 柳诒徵：《南监史谈》，载《史学杂志》1930年二卷三期

学录王之机、石可大，典簿刘坚荣，典籍刘邦重同校。

书板刻好之后，交典籍保管，据《续南雍志·职官》记载：

> 典籍掌书籍，经史子杂以类分，椟而谨藏之。刻板者贮于库，呈代交盘各书及各板，一一检验。夏日督役匠曝晒印刷各书。严防匠役，不许损失。诸生入监印监规等书及监中官到任所印送书，皆有定例。按国家典籍官惟文渊阁一员及两太学各一员，秩虽卑而任则重，所谓文学掌故者也。近南雍以其事简，使理号舍园场事。

南监刻书众多的原因

明代南监刻书众多的原因何在？

第一，国子监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人才荟萃，为刻书提供了雄厚的学术实力。大量材料表明，南监从祭酒到监生无不参与刻书。如上所述，万历十年（1582年）参与刊刻《晋书》的人有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等大小官员。就分工来看，祭酒和司业主要担任校勘的任务，张邦奇、余有丁、周子义、赵用贤、冯梦祯等人，为校勘《二十一史》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少监生承担了写刻的任务，如成化十八年(1482年)修补《新唐书》时，由监生汪鉴缮写；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至三十六年（1557年）修补《宋史》时，监生刘梦雷、夏愈等亲自握刀向木。当然，也有不少监生参与了校勘工作。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监生刘世教等就曾参校《三国志》。柳诒徵《南监史谈》曾经指出：

> 南监诸史悉出师生之手，不独写样校样循行数墨，且躬亲剞劂之役。

第二，国子监的大量藏书，不仅为刻书提供了底本，而且也为校勘提供了佐证。据《南雍志》著录，南监共藏正史178部、（含复本），其中彝伦堂52部（含复本），率性堂、修道堂、诚心堂、正义堂、崇志堂、广业堂各21部。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南监藏书之富。

第三，多方面的经济来源，为南监刻书提供了资金。南监刻书经费主要有五个来源：一是变卖庵寺之银。如嘉靖七年（1528年）曾用变卖庵寺银700两修补图书；① 嘉靖十七年(1538年)用变卖庵寺银498两刻印《杜氏通典》。② 二是利用南京户部多余之银。如南监刻印诸史时，就曾从"南京户部羡银内动支一千八百两以给费用"。③ 三是利用各种罚款。万历五年（1577年）南监刻《新五代史》有司业周子义题识云：

> 南雍故藏史刻，岁久刓阙，至不可句，侍御胡君捐所部赎锾，畀梓人重刻之。

"赎锾"就是罚款。万历十六年（1588年）南监刻《周书》有祭酒赵用贤题识云：

> 大中丞王公用汲、督学使者詹君事讲、江台使者陈君邦科，各举所部赎锾来助，遂复刻此。

四是由工部承担刻书费用。如前所言，洪武十五年（1382年）和天启二年（1622年）修补监版费用，均由工部承担。正统六年（1441年）四月，祭酒陈敬宗言于朝：

> 《文献通考》等书及朝廷备用书籍，今既损阙，宜令礼

①②③ 《南雍志·经籍考》。

部委官盘点见数，转行工部委官带匠计料修补。上皆从之。①

这里，工部将所有修补工作全部承包下来，更是国子监所求之不得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祭酒张位疏陈四事：

> 臣谓南监有《二十一史》，而《十三经注疏》久无善本，容臣等率属订校，工部给资，镂梓于监，可为明经造士之助。②

五是由大家捐资。如景泰二年（1451年）“因司业赵琬言，内外诸学生徒兼习兵书，札至南监，旧板已失其半，祭酒吴节、府尹马谅等捐资重刻”。③嘉靖十七年（1538年）刻印《杜氏通典》，监生下崃助银百两④

北监刻书与监本的质量

北监在万历年间刻书最多。《十三经注疏》刻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至二十一年（1593年）；《二十一史》刻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至三十四年（1606年）。北监刻书知多少？据清《钦定国子监志》所附《明太学志载书籍版片名目》著录，北监刻书约有137种，其中经部39种、史部59种、子部37种、集部12种。当然，这个数字也并非北监刻本的全部，北监实际刻书比这还要多。《古今书刻》著录的《忠经》、《西林诗集》、《大都志》等书，就没有包括进去。另外，《二十一史》中的《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等也不见著录。尽管明代国子监刻书较多，但是质量却并不高，前人已经多所非议。例如

① 《南雍志·事纪三》。

② 《续南雍志·事纪》。

③④ 《南雍志·经籍考》。

南监本《史记》将司马贞补撰《三皇本纪》冠于《五帝本纪》之上，殊失旧观；还将《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妄加删削，讹舛丛生。南监本《十三经注疏》也有不少错误，为此，顾炎武撰《九经误字》专门纠正监本、坊本之失。北监本校对草率，除了因袭南监本的错误之外，又增加了不少新的错误。辽金诸史，缺文动至数页，《仪礼》脱误尤多。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八中曾经尖锐地指出：

> 校勘不精，讹舛弥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

把明代国子监刻书比作"秦火"，虽然有失偏颇，但也确实是一针见血之谈。和书院相比，国子监拥有人力、物力、藏书等优势，而刻书质量反居其下，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然，在众多的明监本中也有比较好的，例如南监本《三国志》就是一个代表。

三、藩府刻书

明初，建立"皇子封亲王"之制，明太祖朱元璋陆续将其24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全国各地，以后各代皇帝又陆续分封了一些藩王。这些藩王名义上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①实则皇帝之耳目。他们既能协助中央抵御外族侵略，又能监督地方官吏。正如《明史稿·列传三》所说：

> 西北边远非亲子弟不足以镇抚而捍外患，其它则分王内地用资夹辅焉。

① 《明史·诸王传赞》。

藩王的待遇仅次于皇帝，据《明史·诸王传叙》：

> 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

由于藩王官高位显，因此胡作非为，甚至反叛中央的事件屡有发生。都指挥使、布政使、按察使是掌管地方军、政、监察大权的三大巨头，但和诸王相比，官卑职低，也无可奈何。加上藩王数量众多，在物质供应方面也成了明朝政府的大包袱。所以，有明一代，藩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与明代盛衰关系极大，成为明史研究中的一大课题。本节专谈明代藩府刻书。

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鼎盛时期。藩王凭借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在雕版印刷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藩府刻本被誉为明代官刻的珍品。那么，藩府刻书多而好的原因何在？

财力之富

物力、财力雄厚，为藩王刻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御史林润曾说：

> 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藩禄岁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万三千石，而宗室禄米五百四万石。①

可见藩府粮食之多。嘉靖二十年（1541年）建太庙，蜀府“献黄金六十斤，白金六百斤”；②崇祯十四年（1641年）冬，李自成

① 《明史·诸王一》。
② 同上书《诸王二》。

率领农民起义军攻打开封，周王朱恭枵“出库金五十万，饷守陴者”。①可见藩府资金之富。刻书需要大量木材、纸张等，对于藩府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

藏书之多

藩府藏书之多，为刻书提供了大量优秀底本。藩府藏书最多的有周府、宁府、晋府、辽府、郑府、蜀府、衡府、徽府等。据记载，‘开封周邸图书文物之盛甲他藩”，②周藩镇国中尉朱睦㮮有《万卷堂书目》(或者以为此目亦名《聚乐堂艺文目录》,不确)，共分四部，其中经部下分11大类，收书680部、6120卷；史部下分12大类，收书930部、18000卷；子部下分10大类，收书1200部、6070卷；集部下分三大类，收书1500部、12560卷。总计4310部、42750卷。宁府藏书也多，史称献王七世孙朱谋玮藏书“与天府埒”。③藩府的藏书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皇帝颁赐之书。明代皇帝重视教育子孙，经常赐书各府。例如，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④嘉靖十年(1531年)沈宪王朱胤栘“上疏乞内府诸书，诏以五经四书赐之”。⑤二是藩王自购之书，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中曾经谈及朱睦㮮的购书情况：

> 海内藏书之富，近代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灌甫(朱睦㮮之字)倾赀购之。

把两个大藏书家的书全部买下，耗费之多，可想而知。宁府也买

① 《明史·诸王一》。
② 同上书《高名衡传》。
③ 《藏书纪事诗》卷二。
④ (明)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
⑤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下。

了不少书，据《明史》记载，宁府后裔朱多𤊹、朱多煴“杜门却扫，多购异书，校雠以为乐”。①三是藩府自抄之书。例如周藩朱睦㮮鉴于古人经解失传，“访求诸海内通儒，缮写藏弆，若李鼎祚《易解》、张洽《春秋传》，皆叙而传之”。②宁藩朱谋㙔著书“百十有二种，皆手自缮写”。③

人才之盛

诸藩人才之盛，给藩府刻书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并得以保证刻书的量。早在明朝建立初期，明太祖就很重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征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④封藩之后，藩王为了教育后代，招聘了不少名师，例如蜀藩招聘方孝孺，宁藩招聘胡奎，楚藩招聘管时敏等。郑藩世子朱载堉是学者何塘的外甥，其律数之学就是学自何塘。秦简王朱诚泳“年十岁，康王妃陈教以小学，日记唐诗一章。惠王闻吴人汤潜名能诗，请为教授，传声律之学”。⑤由于重视教育，各藩人材辈出、著作如林。周藩朱橚有《救荒本草》、《普济方》等，朱有燉有《诚斋乐府》等；宁藩朱权有《通鉴博论》、《肘后神枢》等；郑藩朱载堉有《乐律全书》、《历学新说》等。许多藩王虽然身处高门，但决非一般纨绔子弟可比，其“修学好古，则河间比肩；巾箱写经，则衡阳接席”。⑥藩王著述既多，刻书所需书稿则源源不断；藩王学识既博，刻书所需校勘人材则比比皆是。这都为藩王刻书创造了有利条件。

---

① 《明史·诸王二》。

②③ 《列朝诗集小传·闰集》。

④ 《太祖实录》卷三十六。

⑤ 《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下。

⑥ 《书林清话》卷五。

韬 晦 之 计

明代皇帝监督之严，逼得藩王把刻书当作保命的韬晦之计。藩王虽然官高位显，但也并不是那么自由，皇帝对他们也并不放心，采用种种手段严密监视，以防他们犯上作乱。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十二月，“《永鉴录》成，其书辑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颁赐诸王”；①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一月，明成祖对侍臣说：

> 若者，往往作聪明、乱旧章，而卒至丧败不救，可谓鉴戒，朕十余岁侍太祖皇帝侧，亲见作《祖训》，屡经改易，而后成书，是时秦晋周世子皆在。太祖闲暇，即召太孙及诸世子于前，分条逐事委曲开谕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为天子为藩王能每事遵守，岂有不福禄永远者？朕寤寐不忘，今已命司礼监刊印，赐诸子及弟侄。②

显然，颁赐《永鉴录》、《祖训》等书的目的在于约束诸王，要他们规规矩矩，唯命是听。尤其在明代中期以后，“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③ 尽管如此，藩王闹事之例仍然屡见不鲜。为了惩前毖后，明帝毫不手软，对肇事者进行了严厉的制裁。据《明史》统计，在朱明享国276年之中，因图谋不规、违法乱纪而受到制裁的诸藩案例共有60起之多。就制裁范围而言，秦、晋、周、楚、齐、潭、湘、代、襄、肃、辽、庆、宁、岷、谷、韩、沈、唐、伊、靖江、吴、衡、汉、赵、郑、荆、淮、徽等28藩均有制裁之例，其中辽、宁、岷三藩最多，各5例；周、徽二藩各4例；郑、

① 《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

② 《成祖实录》卷四上。

③ 《明史·诸王传赞》。

唐、赵三藩各3例。就制裁手段而言，有削为庶人、守坟园、筑高墙、赐死、斩首等。其中削为庶人者近40例，赐死者4例，斩首者4例。宣德八年（1433年）汉高阳王朱高煦起兵造反未遂，捉拿归案后"覆以巨鼎，燃炭炙杀之"，可见朱高煦是被活活烧死的；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勾结李士实、刘养正等人，诡称奉太后密旨，起兵南昌，夺九江，攻安庆，直逼南京，当时王守仁巡抚南赣，没有正面和朱宸濠对抗，却带兵偷袭朱宸濠的根据地南昌，朱宸濠被迫回救，被王守仁生擒，朱宸濠从起兵到被擒时仅43天，不久即被处死。有些藩王深知刑法严峻，畏罪自焚者亦有多例。①骇人听闻的案例多如牛毛，使得藩王不寒而栗，人人自危。今日还是荣华富贵，明日一旦废为庶人就一落千丈，粪土不如。为了保全自己，诸王不得不采取韬晦之计，力避一切可能产生的嫌疑。韬晦的手段很多，或藏书、或著书、或绘画、或吟诗、或从医，等等，真是不一而足。藩王藏书、著书之例已见上文。绘画者如荆藩朱厚焜，宁藩朱多炡、朱谋䚶、朱谋鹳、朱谋觐、唐藩朱弥鍗等。他们都以画山水花鸟著称。据说，朱厚焜画了一幅葵花图，放在太阳底下曝晒，马上招来一群蝴蝶，屡驱不散。但他们为什么不画人物，却要画山水花鸟呢？恐怕也与避嫌有关。攻书者如蜀成王朱让栩、宁府镇国中尉、荣安王曾孙朱多煴等。朱多煴善行草，颇得钟繇、王羲之书意，每一纸出，好事者往往重价收藏。吟诗者如宁府朱多熿、朱多炡、朱多𤊨、朱多熣，沈府朱恬烷、朱理垸、朱理塯、朱理堳、朱理增、朱敬镃，周宪王朱有燉，肃靖王朱真淤，楚府朱翊钺，朱翊鏊等。朱恬烷、朱理熣、朱理垸、朱理堳四人成立了一个诗社，终日吟诗不绝。朱多熣与南昌余德甫为诗友，因入七子之社。朱翊钺兄弟三人，尝共处一楼，成立了一个诗社，名"花萼社"，朝夕唱和。不过诸王诗作的内容多风花雪月，如"月落棋声

① 以上各例据《明史·诸王传》。

久，凉生酒兴多”，“酒嫌芦笋少，春恨李花多”，等等。为什么诸王诗作不去面对现实，却要吟风弄月呢？当然也与避嫌有关。从医者如桂府灵丘王朱逊铨，在一次瘟疫流行时，他开的药方救活了成千上万的人。诸王为了避嫌，甚至别号也要叫什么“道人”、“山人”、“散人”之类，例如赵府康王朱厚煜号枕易道人；沈府镇康王朱恬焯号西岩道人，安庆王朱恬熾号西池道人，宪王朱胤栘号南山道人，安王朱铨鉌号凝斋道人，德平王朱胤樘号南岑道人，宣王朱恬烄号西屏道人；蜀府温懿王朱宣墡号味一道人；荆府樊山王朱载埁号大隐山人；郑府世子朱载堉号句曲山人；桂王五世孙朱俊噤号芦花散人等。号曰“道人”、“山人”、“散人”，似乎就给人以超脱红尘、与世无争的印象。有的藩王性格怪僻，亦是韬晦之计，如宁献王之孙朱多炡，曾隐名埋姓，把姓名改作“来相如”，轻装出走吴楚间，游山逛水；其子朱谋垔亦把姓名改作“来鲲”，出走三湘吴越间，浪迹江湖，寄情山水。宁献王朱权，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就藩大宁。靖难之变，被迫为燕王草檄。当时燕王与之约定：事成，二人中分天下。然而，后来燕王称帝后自食其言。永乐元年（1403年）朱权被改封南昌，不久，有人诬告朱权犯上，成祖派密探侦查未果，才免于追究。自此以后，朱权心有余悸，事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乃退讲黄老之术，“所居宫庭，无丹彩之饰，覆殿瓴甋，不请琉璃”，①别构精庐，名曰“神隐”，并著《神隐志》以明志。《四库全书总目·神隐志提要》说：“盖借此韬晦以免患，非真乐恬退者也。”当然刻书更是一种功德无量的韬晦之计。刻书既可避嫌，又可名垂千古。

诸藩刻书

据记载，吉府简王朱见浚“刻《先圣图》及《尚书》于岳麓

① 《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下。

书院，以授学者”；① 衡府新乐王朱载玺“索诸藩所纂述，得数十种，梓而行之”；② 庆府安塞王朱秩炅，“人有古今书，辄捐金购之绣梓，与远近学者共”；③ 宁府“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国中”。④ 其它各府都刻了不少书。韬晦的结果，虽然磨掉了诸王的棱角，但确也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这对刻书非常有利。根据有关书目著录，诸藩刻书可考者326种，其中弋阳王府56种，蜀藩38种，楚藩36种，周藩23种，宁藩22种，赵藩20种，辽藩18种，庆藩13种，益藩12种，沈藩11种，唐藩、秦藩、德藩各8种，鲁藩、晋藩各7种，吉藩、徽藩各6种，代藩、衡藩各5种，伊藩4种，崇藩、潞藩、襄藩各3种，淮藩、郑藩、韩藩、靖藩、肃藩各2种，荆藩、汝藩、岷藩、荣藩各1种。就内容而言，宁藩医书、益藩茶书、晋藩文集（图9）、吉藩子书比较有名。顾廷龙等曾经指出：

> 明时藩邸王孙袭祖宗余荫，优游文史，雕椠之业，迈轶前朝，今可溯者殆十数家。蜀府最先，自洪武迄万历，传本不绝；宁藩自号臞仙，所刊多道家养性保命诸籍；他如唐藩之《文选》、吉府之《贾子》，于今传诵；余则代崇肃三府各有垂典，并为世觏。此成化以前藩邸之概略也。嘉靖以下，晋府最著，淹雅奕世，载美光启前业，其所署有宝贤堂、志道堂、虚益堂、养德书院诸称，循名可觇其实，其所刊有《文选注》、《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初学记》诸书，浩瀚卷帙，为诸藩之冠；次则秦藩之《史记》、德藩之《汉书》、赵府之《诗辑》、益府之《玉篇》，并得擅美济武。而郑藩之通音律，所刊《乐律全书》尤为审音家所推重，不独以雕板著艺苑也。其它诸藩，

①② 《明史·诸王四》。

③ （明）朱谋垏：《藩献记》，见《说郛续》卷八。

④ 《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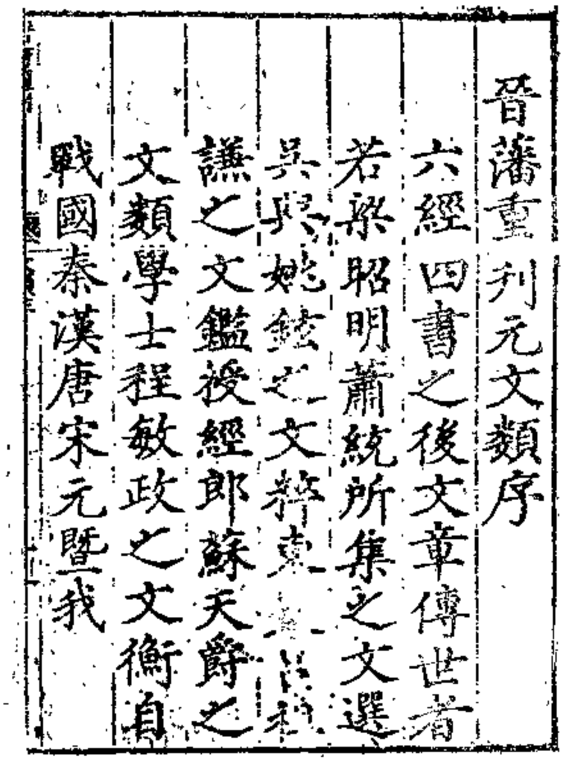

晉藩重刊元文類序
六經四書之後文章傳世者
若梁昭明蕭統所集之文選
吳興姚鉉之文粹東萊呂祖
謙之文鑑授經郎蘇天爵之
文類學士程敏政之文衡自
戰國秦漢唐宋元曁我

图9　晋藩刻本《元文类》

曰周、曰徽、曰沈、曰伊、曰鲁、曰楚、曰辽、曰潞，一二精椠，更仆难数，河间衡阳无与为盛。①

四、书　帕　本

书帕本是古籍版本的一个类别，盛于明代。

---

①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卷四。

“书帕”小考

“书帕”之“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把“帕”同“书”联系在一起呢？“帕”指佩巾之类的物品。据汉刘熙《释名》：

> 巾，谨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当自谨修四教也。

可见，是否“冠庶人巾”是判断成人与否的重要标志。不仅如此，“巾”也是古代成人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记载：

> 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①

在任用贤才和从事外事活动时，“巾”也常被用来当作重要的外交礼品。据李延寿《南史·陶弘景传》记载，梁武帝打算重用陶弘景，“手敕招之，锡以鹿皮巾。后屡加礼聘，并不出”。东晋大将王敦打算攻打梁州刺史甘卓，先礼后兵，便以巾为礼，据邓粲《晋书》记载：

> 王敦欲代甘卓，遣使送大巾。②

到了明代，“巾”仍然是外交场合的重要礼品。为师长祝寿，更是不可缺少的最佳寿礼。据《明史·鲁铎传》记载：

> 大学士李东阳生日，（鲁）铎为司业，与祭酒赵永皆其门生也，相约以二帕为寿。比检笥，亡有，徐曰：“乡有馈干

① 《三国志·魏武帝纪》注引《傅子》语。

② 《太平御览·服章部四·巾》。

鱼者，盍以此往？”询诸庖，食过半矣，以其余诣东阳。东阳喜，为烹鱼置酒，留二人饮，极欢乃去。

以上例子表明，“巾”在古代决非等闲之物。它是“礼”的标志之一。既然如此，在明代官场，除了送“书”骗取风雅美名之外，还要送“帕”表示一下礼节。“帕”的数量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是一书一帕，也可以是一书两帕。明人耿定向《先进遗风》卷下曾说：

梁材为杭州守，会入觐，止具一书二帕，以贽京师。

“书帕本”是家刻吗？过去，人们以为“书帕本”既是私人礼品，便以“家刻”称之。其实，书帕本除了个别自费刻印者外，大多数是动用公款刻印的，应当属于官刻。具体说来，“书帕本”的制作可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官吏朝觐入都，地方官为了巴结上司，慷国家之慨，用公费刊书为其送行，正如明人陆容《菽园杂记》卷十所说：

上官多以（书帕本）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

这些费用，均取之于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民以为困，地方官被迫采取措施，“乃檄毁之”。①《大统历》是明代官颁历书，有关人员挥霍国家资金，大量刻印，以充书帕之用。成化七年（1471年）湖广按察司佥事尚褫上疏：

大统历，我国家正朔所系，近在外两司官视为家藏之

① 《四库全书总目·丹铅录提要》。

这20种书是《素王纪事》、《历代小史》、明车玺《治河总考》、明周诏《石鼓书院志》、元张养浩《三事忠告》、元许衡《鲁斋心法》、明杨道会《性理抄》、元王好古《医垒元戎》、明黄瑜《书学会编》、明杨慎《丹铅录》、明杨昱《牧鉴》、明王国宾《群书摘草》、明朱东光《中都四子集》、宋潘自牧《记纂渊海》、明鲁点《黄楼集》、佚名《群公小简》、明贺泰《唐文鉴》、明傅振商《四家诗选》、明项梦原《宋史偶识》和明郭惟贤《三忠集》。综观这些书帕本，有如下特点：（一）乱题书名。如《群公小简》，第一卷卷端题《五先生手简》，第二卷卷端又题《六先生手简》；《三事忠告》本名《为政忠告》，明宣德六年（1431年）河南知府李骥重刊时臆改今名。（二）著者不明。如《历代小史》卷端不题著者，序称“侍御李公集”，“李公”为何许人，不明；《素王纪事》书首题：“明浙江严州府通判太原傅汝楫校正”，则非傅汝楫所撰，卷末杨奂《东游记》之首又题“河南开封府知府西蜀黄浚辑录”，似为黄浚所撰，然不列姓名于书首，而附于书后，殊乖旧例。《记纂渊海》卷端在潘自牧之后题“中宪大夫、大名府知府、前监察御史东鲁王嘉宾补遗”，然陈文燧序中又称此书为陈文燧、蔡之奇、顾尔行等人补遗，而王嘉宾为刊刻者，前后牴牾，不知“补遗”到底出自谁手。（三）体例参差。如《治河总考》，后署“山东兖州府同知陈铭续编”，然前后无序跋，不知孰为原书，孰为续编。（四）东拼西凑。如《四家诗选》杂选顾起元、焦竑、郭正域、叶向高四人之诗各一卷拼凑成书；《三忠集》从《离骚》、《武侯集》、《金陀粹编》中杂取屈原、诸葛亮、岳飞之文拼凑成书，而一些关键性的文字多所遗漏。（五）校勘不精。如《书学会编》讹脱之多，不可卒读；《丹铅录》讹字如林。（六）刊刻拙劣。字体、版式、刀法等概不讲究，这是书帕本的共同特点。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曾经指出：

今宦途率以书为贽，惟上之人好焉。则诸经史类书卷帙丛重者，不逾时集矣。朝贵达官，多有数万以上者，往往猥复相揉，芟之不能万余。精绫锦标，连窗委栋，朝夕以享群鼠，而异书秘本百无二三。盖残编短帙，筐篚所遗，羔雁弗列。

这说明，明代书帕本盛行的结果，使那些达官贵人都成了“连窗委栋”的大藏书家，然而这些书帕本的质量却糟糕得很，“异书秘本，百无二三”。正是由于书帕本质量低劣，所以《四库全书》除了正式收录《医垒元戎》、《记纂渊海》、《丹铅录》、《三事忠告》4种之外，其它16种一概打入存目，即使正式收录的4种书，也在提要中多所贬斥。

当然，书帕本的名声虽然不好，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刻书之盛。随便一个官吏进京述职，都可以刻一本书作为进见之礼，可见刻书对于明人来说，是多么轻而易举。在官方的影响下，民间交往也多以书帕为礼，这在明代章回小说里有不少记载。①

五、明代家刻

明代家刻多如繁星，著名者有李瀚、朱承爵、张习、许宗鲁、张綖、洪楩、袁褧、顾元庆、顾起经、郭勋、郭云鹏、闻人铨、范钦、胡宗宪、范惟一、王世贞、张佳胤、杜思、吴勉学、吴琯、冯梦祯、屠隆、张燮、李之藻、曹学佺、臧懋循、徐𤊹、张溥、胡正言、毛晋（详本章第六节），等等。现简要介绍于下：

① 王国强：《从〈金瓶梅词话〉看明代的书帕本》，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7年4期。

李瀚，字叔渊（一字冰心），沁水人。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任河南布政使、南京户部尚书等职。刻有《三辅黄图》、《中州集》、《韦苏州集》、《遗山先生文集》、《二程全书》、《容斋随笔》、《庄靖集》、《陵川文集》、《吕氏春秋训解》等。

朱承爵，字子儋，号左庵，别号舜城漫士，室名存余堂，江阴人，著名藏书家。刻有《浣花集》、《黄太史精华录》、《庾开府诗集》、《樊川诗集》、《西京杂记》等。《浣花集》刻有书耳，书耳中有“江阴朱氏文房”六字，《四部丛刊》即据此帙影印。

张习，字企翱，室名金兰馆，吴县人。刻有《雁门集》、《静居集》、《夷白集》、《侨吴集》、《槎轩集》、《姑苏杂咏》、《北郭集》等。另外，还用铜活字印书数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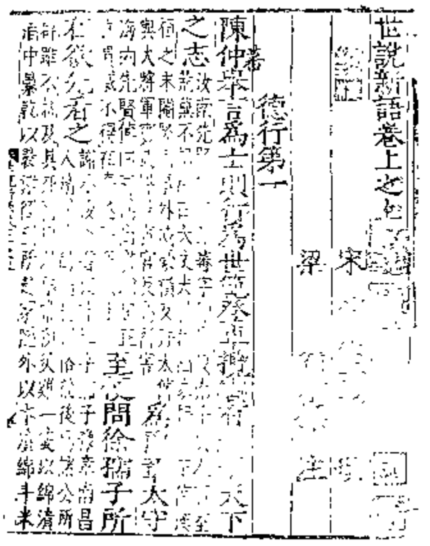
许宗鲁，字东侯，号伯诚，室名宜静书屋，咸宁（今西安市）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著有《归田稿》等。刻有《国语解》、《古文音释》、《太白山人诗》、《吕氏春秋训解》、《少华山人诗集》、《韵补》、《尔雅》、《六子书》等。许氏刻书喜用篆体，既费工费时，又不通俗。

张綖，字世文，室名玩珠堂，高邮人。正德举人，著有《杜诗通》、《南湖集》等。刻有《西昆酬唱集》、《杜工部诗释》、《淮海集》等。《西昆酬唱集》书口下有“玩珠堂”三字，卷次以上下命名。《四部丛刊》即以此帙影印。

洪楩，字子美，室名清平山堂，钱塘人，著名藏书家。刻有《清平山堂话本》、《六臣注文选》、《路史》、《唐诗纪事》、《新编分类夷坚志》、《辑刊医药摄生类八种》、《雨窗欹枕集十二种》等。其中《清平山堂话本》共收话本小说60篇，现存29篇，其中大多是宋元时代的作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话本原作，是研究小说史的重要资料。

袁褧，字尚之，号谢湖，室名嘉趣堂，吴县人，著名藏书

家，著有《田舍集》等。刻有《六家文选注》、《大戴礼记注》、《楚辞集注》、《世说新语》（图10）、《国宝新编》、《夏小正戴氏传》、《金声玉振集》、《奉天刑赏录》等。其中《六家文选注》刻印时间长达16年之久，可见其用心之苦。


世說新語卷上

德行第一

图10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袁褧刻本《世说新语》

顾元庆，字大有，室名夷白堂，长洲人。藏书甚富，著述亦丰。刻有《梓吴四十种》、《顾氏文房丛刊四十种》、《阳山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

顾起经，字长济（一字元纬），号罗浮外史，室名奇字斋，无锡人。刻有《类笺唐王右丞诗集》、《国雅》、《标题补注蒙求》等。其中《类笺唐王右丞诗集》目录之后附有开局氏里姓名表：

无锡顾氏奇字斋开局氏里

写勘：吴应龙、沈恒，俱长洲人；陆廷相，无锡人。

雕梓：应钟，金华人；章亨、李焕、袁宸、顾廉，俱苏州人；陈节，武进人；陈汶、江阴人；何瑞、何朝忠、王诰、何应元、何应亨、何钿、何钥、张邦本、何鉴、何键、王惟寀，何铃、何应贞、何大节、陆信、何昇、余汝霆，俱无锡人。

装潢：刘观，苏州人；赵经、杨金，俱无锡人。

程限：自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望授锓，至三十五年六月朔完局。

冠龙山外史谨记。

《类笺》一书不过五六百页，刻工多至24人，刻书时间长达5个半月。顾氏为了避免差错，特邀建州陈延鹤、姑苏黄姬水等名家19人任校阅。刻版之前，顾氏又亲为复校，增补漏字59个，其认真态度，由此可知。另外，由卷末标识可知，卷一刻于待沐园，卷二刻于长康外圃，卷三刻于宛在亭，卷四刻于祇洹馆，卷五刻于对山开卷之阁，卷七刻于清华亭，卷八刻于木瓜亭，卷十刻于静思之堂。由此可知顾氏私人拥有园林之富。

郭勋，明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五世孙，袭爵武定侯。《明史》称其"桀黠有智数"，① 人品虽不足道，然其刻书甚多。刻有《元次山集》、《白乐天文集》、《三家世典》、《将鉴通论》、《小浒传》、《三国志演义》、《英烈传》等。其中《水浒传》是20多种版本之中刻印最早的版本之一。水浒故事从南宋末流传以来，多以口头和戏剧形式传播，明嘉靖中郭勋等刊本，对于《水浒传》的广泛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当然，郭勋刻书，除了附庸风雅之外，也有其它目的，例如故刻印《英烈传》，编造了陈友谅被郭英射死(实为中流箭而死)的故事，不仅达到为郭英树碑立传的目的，也为他自己飞黄腾达作了舆论准备。刻印《三家

① 《明史·郭勋传》。

世典》（三家指徐达、沐英、郭英），也出于同一目的。

郭云鹏，吴县人，室名济美堂、宝善堂等。刻有《曹子建集》、《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欧阳先生文粹》、《编选四家宫词》、《河东先生集》、《文章备览》等。

闻人铨，字邦正，余姚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刻有《旧唐书》、《阳明先生文录》、《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甘泉文集》、《礼记集说》、《艺文类聚》等。在《新唐书》流行之后，《旧唐书》几乎失传，闻人铨本对《旧唐书》的流传作了重要贡献。

范钦（生平详本编第一章第四节），刻有《范钦奏议》、《阮嗣宗集》、《范氏奇书二十一种》、《天一阁集》、《天一阁帖八种》、《司马温公稽古录》等。《四部丛刊》中《京氏易传》、《穆天子传》、《商子》等均据《范氏奇书》本影印。

胡宗宪，字汝真，号梅林，绩溪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曾任知县、御史等职。刻有《阳明先生文录》、《传习录》、《诗说解颐总论》、《十岳山人诗集》、《历代史纂左编》、《荆川稗编》等。

范惟一，字于中，华亭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有《振文堂集》等。刻有《吴兴掌故集》、《逊志斋集》、《释名》、《范文正公集》、《范仲宣公集》、《范文正公奏议》、《张水南文集》等。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自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等职。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刻有《乔庄简公集》、《沧溟先生集》、《皇明盛事》、《华礼部集》、《唐世说新语》、《尺牍清裁》、《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张佳胤，字肖甫，号居来山人，室名双柏堂，铜梁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著有《居来山房集》、《东巡杂咏》等。刻有《越绝书》、《华阳国志》、《尽言集》、《蛾嫁集》、

《天目先生集》、《居来先生集》、《奚囊蠹余》、《李沧溟集》等。《四部丛刊》中《越绝书》即据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张佳胤双柏堂刻本影印。

杜思，字子睿，室名资深堂，四明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刻有《革朝遗忠录》、《徐干中论》、《齐乘》、《皇极经世观物篇释义》等。《四部丛刊》中《徐干中论》即据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杜思资深堂刻本影印。

吴勉学，字肖愚，室名师古斋，歙县人。刻有《九经白文》、《性理大全》、《河间六书》、《医书痘疹大全八种》、《海岳山房存稿诗》、《对类考注》、《东垣十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四十四种》、《五侯鲭》、《史裁》、《世说新语》、《唐雅》、《管子》、《少室山房笔丛》、《二酉园尺牍选》、《重校证活人书》、《二十二子全书》、《尺牍清裁》、《楚辞》、《何仲默先生诗集》、《国语》、《战国策》、《四季须知》等。

吴琯，字仲虚，号中云，室名西爽堂，漳浦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刻有《新制诸器图说》、《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三国志》、《晋书》、《水经注》、《山海经》、《诗纪》、《古今逸史五十五种》、《唐诗正声》、《薛氏医案》、《疑录》、《宝古堂重考古玉图》、《王元美先生文选》、《楚辞》、《说略》等。

冯梦祯，字开之，室名快雪堂，秀水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著有《快雪堂集》。刻有《妙法莲华经》、《陶靖节集注》、《大唐新语》、《由拳集》、《先秦诸子合编》等。

屠隆，字纬真（一字长卿），鄞县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著有《考槃余事》、《由拳集》等。刻有《董西厢》、《唐诗品汇》、《竹箭编》、《徐孝穆集》、《庾子山集》等。

张燮，字绍和，号海滨逸史，万历举人，家住福建龙溪。刻

有汉晋南北朝诗文别集72种、“初唐四子”等。

李之藻，字振之（一字我存），号淳庵居士（一号存园叟），仁和人。万历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与徐光启等从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译著有《新法算书》、《天学初函》、《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等。刻有《天学初函》，《泰西水法》、《淮海集》、《江湖长翁集》、《左传补注》、《三忠传》等。

曹学佺，字能始，号石仓，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有《易经通论》、《周易可说》、《春秋阐义》、《蜀中名胜记》等。刻有《唐黄御史集》、《欧阳四门集》、《大明一统名胜志》、《五灯会元》、《石仓历代诗选》（亦名《十二代诗选》）等。其中《石仓历代诗选》卷帙繁重，《四库全书总目·石仓历代诗选提要》说：

> 上下两千年间，作者皆略存梗概，又学佺本自攻诗，故所去取亦大都不乖风雅之旨，固犹胜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者。

臧懋循（？～1621），字晋叔，号顾渚，长兴人。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明代著名戏剧家。曾任南京国子监博士，著有《负苞堂集》等。刻有《古逸词》、《古诗所》、《唐诗所》、《元曲选》、《校正古本荆钗记》、《玉茗堂四梦》、《改定昙花记》、弹词《仙游录》等三种，总字数不少于300万。其中《元曲选》一百卷，影响最大，该书是所有元曲选本中收集元曲数量较多、质量较高的一种。其中《灰阑记》、《陈州粜米》、《虎头牌》、《谢金吾》、《冻苏秦》、《昊天塔》、《救孝子》、《伍员吹箫》、《东坡梦》、《秋胡戏妻》、《抱妆盒》、《神奴儿》、《争报恩》、《冯玉兰》、《来生债》等15种当时都是孤本，没有《元曲选》，它们就不会流传至今。臧懋循不顾经济

条件的限制，“穷年铅椠”，①《元曲选》刻印半年之后，由于底本难觅，加上经济困难，被迫中辍，他通过亲朋好友大事宣传，疏通发行渠道，等到卖书换钱之后，才得以刻完全书，正如他在《负苞堂集·寄黄贞夫书》中所说：

> 刻元剧本拟百种，而尚缺其半，搜辑殊不易，乃先以五十种行之，且空橐无以偿梓人，姑藉此少资缓急。兹遣奴子赍售都门，亦先以一部呈览。幸为不佞吹嘘交游间，便不减伯乐之顾，可作买纸计矣。

徐𤊹（1570～1645），字惟起（一字与公），室名红雨楼，闽县人，著名藏书家。著有《红雨楼集》。刻有《唐欧阳先生集》、《幔亭集》、《晞发集》、《焦山古鼎考》等。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太仓人。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复社成员。著有《春秋四传断》、《春秋书法解》、《春秋列国论》等。刻有《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删定名贤奏议》等，其中《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影响颇大，《四库全书总目》在该书提要中说：

> （该书）州分部居，以文隶人，以人隶代，使唐以前作者遗篇，一一略见其梗概，虽因人成事，要不可谓之无功也……溥所撰述，惟《删定名臣奏议》及此编为巨帙，《名臣奏议》去取未能尽允，此编则原原本本，足资检核，溥之遗书，固应以此为最矣。

胡正言，字曰从，室名十竹斋，原籍新安，寄寓南京鸡笼山侧。刻有《订补简易备验方》、《敬事草》、《薛氏医案九种》、

---

① （明）臧懋循：《负苞堂集·回李达亭启》。

《袖珍木医书十三种》、《皇明诏制》、《六书正讹》、《说文字原》、《精选古今诗余醉》、《古今辞命达》、《牌统孚玉》、《四六霞肆》、《千文六书统要》、《韵法横图》、《书法必稽》、《石谱》等。胡氏所刊《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采用饾版彩印，是有口皆碑的艺术珍品（详见本编第九章第一节）。

当然，上述30位出版家仅仅是明代家刻的代表。

六、毛晋刻书

毛晋是明末清初的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对于古代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晋的生平

毛晋（1599～1659），原名凤苞，字子晋（一字子九），以字行。号潜在，虞山人。室名有汲古阁、绿君亭、世美堂、载德堂、笃素居、读礼斋、续古草庐等，其中以汲古阁和绿君亭比较著名。毛晋的父亲毛清为乡间三老，以孝悌著称。毛晋有五男四女，五子毛扆亦喜藏书和刻书。毛晋通明好古，博闻强记，曾是著名学者钱谦益的学生。毛晋尤好行善，常自捐资修建乡间水道桥梁。每逢荒年，常常以米赈济邻里。毛晋藏书甚富，据荥阳悔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

> （毛晋）性嗜卷轴，榜于门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积至八万四千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庋之。

毛晋勤于笔耕，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虞乡杂记》、《香国》、《和古人诗》、《和今人诗》、《和友人诗》、《野外诗》、《隐湖题跋》等，辑有《二家宫词》、《三家宫词》、《宋六十名家词》、《米襄阳志林》等。

毛晋刻书

毛晋一生的主要贡献在于刻书。毛晋刻书可分为三个时期：明天启年间（1621～1627）为第一时期。这个时期，毛晋正当青年，开始爱上刻书这个行业。他“不事生产，日招梓工，弄刀笔”。① 天启元年（1621年）刻《续补高僧传》，天启四年（1624年）刻《河南诗稿》，天启五年（1625年）刻《神农本草经注疏》和《三家宫词》，天启六年（1626年）刻《风骚旨格》，天启七年（1627年）刻《二家宫词》和《极玄集》。这个时期虽然刻书不多，但是已经尝试终芒，为终生刻书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清徐康《前尘梦影录》称毛氏“开工于万历中叶”，不确，因为毛晋于万历中叶刚刚出生（生于万历二十七年），是不可能刻书的。崇祯年间（1628～1644）为第二时期。这一时期是毛晋刻书的兴盛时期，绝大多数毛刻本都是这个时期刻印的。《十三经注疏》刻于崇祯元年至十三年（1628～1640），《十七史》刻于崇祯元年至十七年（1628～1644），《唐人选唐诗八种》和《杨大洪先生忠烈实录》刻于崇祯元年（1628年），《群芳清玩》刻于崇祯二年（1629年），《津逮秘书》刻于崇祯三年（1630年），《宝晋斋四刻》刻于崇祯五年（1632年），《确庵文集》刻于崇祯七年（1634年），《弃草诗集》和《秦张两先生诗余合璧》刻于崇祯八年（1635年），《元人十种诗》刻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重刻历体略》刻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崇祯年间还刻有《重修琴川志》、《列仙传》、《续仙传》、

① 钱大成：《毛子晋年谱稿》，载《中央图书馆馆刊》一期四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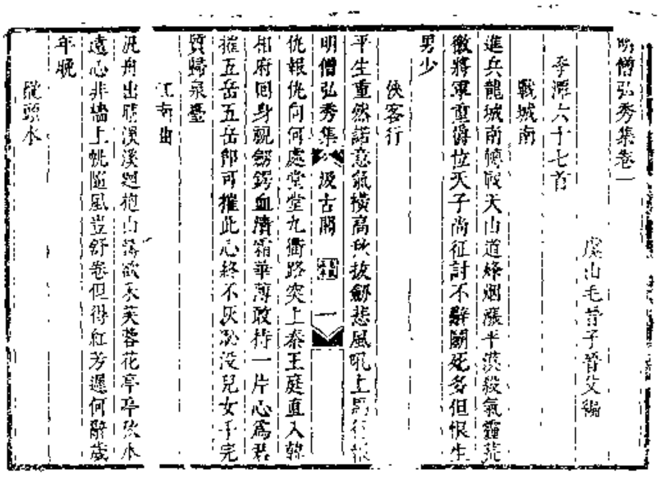

明僧弘秀集卷一
虞山毛晉子晉父編
李澥六十七首
戰城南
進兵龍城南傾轂天山道烽烟漲平漠殺氣霾荒
徼將軍直欲位天子尚征討不辭闘死多但恨生
男少
俠客行
平生重然諾意氣橫高秋拔劍悲風吼上馬行報
明僧弘秀集 汲古閣 一
仇報仇向何處堂堂九衢路突上秦王庭直入韓
相府回身視劍鍔血漬霜華薄敢持一片心爲君
摧五岳五岳郎可摧此心終不灰没兒女手完
質歸泉臺
江南曲
泛舟出横溪溪廻抱山谷欲采芙蓉花亭亭殊未
遠心非檣上帆隨風豈舒卷但得紅芳還何辭歲
年晚
隴頭水

图11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毛刻本《明僧弘秀集》

《野记传》、《西唐人诗》、《元四大家诗》、《说文解字》、《宋十名家词》、《中吴纪闻》、《六十种曲》、《楚辞章句》、《吴郡志》、《诗词杂俎》、《文选注》、《明僧弘秀集》（图11）等。当然，有些书的少数版片是继承他人的，并非毛晋自刻，例如《津逮秘书》中就有胡震亨《秘册汇函》的若干版片；《丹渊集》由吴苍木等原刻，由于吴"能梓而不能行"，终归毛晋。①《南唐书》原由他人刻版，后"半烬于武林之火，庚午夏仲，购其焚余板一百有奇"。②毛晋善于交际，刻书是其广交朋友的一种方法 例如他曾代浙江右布政使王象晋刻《二如亭群芳谱》，代文学家冯班刻《冯定远全集》，代著名学者钱谦益刻《列朝诗集》，代著名文人张溥刻《南史》。入清以后（1644～1659）是第三时期。这个时期，毛晋把主要精力用于已刻版片，

① （明）毛晋：《汲古阁书跋·丹渊集跋》。

② 《汲古阁书跋·南唐书跋》。

“收其放失，补其遗亡”。[①] 例如《十七史》，虽于崇祯末刻完，但由于战争等原因，损毁了不少版片，毛晋被迫大事修补，直到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才得以修补完毕。再过三年，即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毛晋溘然长逝，结束了他的刻书生涯。毛晋一生，数十年如一日，“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②] 为刻书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毛晋死后，毛扆“又补刻书数十种”，以承父志。[③] 毛晋到底刻了多少书？毛晋晚年曾说：“吾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今板逾十万，亦云多矣。”[④] 据统计，毛晋一生刻书600余种、版片10万余块，与毛晋所言是一致的。

毛晋非常重视校勘工作，他的朋友陈继儒在《汲古阁书跋·序》中说：

> 凡人有未见书，（毛晋）百方购访，如缒海凿山，以求宝藏，得即手自抄写，纠讹谬、补遗亡。即蛛丝鼠壤、风雨润湿之所糜败者，一一整顿之。

毛晋所刻各书，校勘尤其认真。这在毛晋写的刻书跋语中都有记载，例如《郑注尔雅》跋说：

> 其间淆讹……一一更定。又如“弇，同也”……“由膝以下为揭”、“由膝以上为涉”、“由带以下为厉”数条，俱已脱落，未见其注何似，不敢妄补，始信落叶难扫，虽宋刻不无遗憾云。

---

①② （明）毛晋：《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

③ （清）钱泳：《履园丛话·梦幻》。

④ （清）毛扆：《汲古阁书跋附编·影宋精抄本五经文字九经字样》。

《史记索隐》跋说：

> 按汴本释文演注与桐川郡诸刻微有不同，如“郑德”作“郑玄”，“刘氏”作“刘兆”，姓氏易晓其讹……《高祖本纪》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诸本皆然。《汉书》作“欲苦之”，兹本独作“欲告之”。此类颇多，不敢妄改。至如“世家”、“世本”具作“系家”、“系本”，避李唐讳也，后人辄为改易，小司马能无遗憾耶！

当然，毛晋刻那么多书，单靠一人校勘是不行的，因此，他招聘了不少文人学士共事丹铅。为了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分别为儒释道三家名流修了招待所，“汲古阁在湖南七星桥载德堂后，以延文士（即儒家）；又有双莲阁在问渔庄，以延缁流（即释家）；又一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即道家）”。①明刻《径山藏》中有200余种为毛晋捐资刻印，由释家担任校勘工作。毛晋到底招聘了多少校勘人员？由于文献无征，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人数是不少的。单是刻印《十三经》、《十七史》时，就招聘了30人，其中13人校经书，17人校史书。周荣起是为毛晋刻书出力最多的一个儒生。周荣起，字砚农，“江阴老儒，书多手抄，精六书之学，毛子晋刻校古书，多其刊正，年八十七乃卒”。②除了校勘人员之外，毛晋还招聘了不少工人，据毛扆回忆：“吾家当日有印书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③一般地说，印书速度快，需人少；刻书速度慢，需人多。除了印工、刻工之外，还有写工。写工有两个任务：一是手写上版；一是抄书。毛氏许多影宋抄本就出自他们之手。根据“入门僮仆尽抄

① 《履园丛话·梦幻》。

② （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衎极跋》。

③ 《汲古阁书跋附编·影宋精抄本五经文字九经字样》。

书"的诗句分析，写工人数也是不少的。汲古阁"楼下两廊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①毛晋刻书用纸比较讲究，每年从江西定造，厚的叫毛边纸，薄的叫毛太纸。

刻书需要大量资金，毛晋刻书经费从何而来？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以田养书。毛晋父辈留下数千亩田产，田产收入很多，用于补贴刻书，后来刻书日多，经济越来越紧张，只好卖田刻书，把数千亩良田全部卖光。另外，还把毛家开设的几个当铺全部卖掉。正如清人钱泳《履园丛话·梦幻》所说：

> 子晋本有田数千亩，质库（即当铺）若干所，一时尽售去，即以为买书、刻书之用。

刻印《十三经》时，因为连年灾荒，债台高筑，一次就卖掉良田300亩。

毛晋死后，版片流落四方。《十三经注疏》版片归常熟小东门外东仓街席氏，《十七史》版片归苏州扫叶山房，《三唐人文集》和《六十家词》版片归常熟小东门兴贤桥邵氏，《八唐人诗》版片归山东赵秋谷，《陆放翁全集》版片归常熟张氏，《十元人集》版片归无锡华氏，《诗词杂俎》和《词苑英华》版片归扬州商家。还有部分版片是烧掉的，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记载：

> （毛子晋）有一孙，性嗜茗饮，购得洞庭山碧螺春茶、虞山玉蟹泉水，独患无美薪，因顾《四唐人集》板而叹曰："以此作薪煮茶，其味当倍佳也。"遂按日劈烧之。

以上就是毛晋刻书的大概情况。

---

① 《履园丛话·梦幻》。

毛晋刻书的功过

应当怎样评价毛刻本？长期以来，毛刻本蒙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毁多于誉。我们认为，毛刻本既有过，更有功，功大于过。其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不少古籍仅赖毛本得以流传至今。例如毛本《南齐书》是明末以来该书的唯一传本，刻附《渭南文集》之后的其它本子，已经改其体例，析其卷数；《孔子家语》明代罕传，到崇祯末年，毛晋始据北宋本刊刻行世；《清閟阁集》明天顺、万历间虽有刻本，但岁久漫漶，惟有毛刻流传，后来刻本均据毛刻；《丽则遗音》原刊于钱塘，岁久佚失，明末毛晋始为重刻；李善《文选注》自南宋以来多与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选》，李善注单行本极为罕传，毛本之外，更无别本；司马贞《史记索隐》，宋代以后多与集解、正义合刊，单行本除毛刻之外，亦无别本；《说文解字》元无刻本，明刊仅毛本一种。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说：

> （毛）刻《说文解字》一书，使元明两朝未刻之本，一旦再出人间。其为功于小学，尤非浅鲜。

宋词创作繁荣，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南宋时，长沙书坊所刻《百家词》早已失传，明吴讷编《唐宋名贤百家词》抄本流传不广，而毛刻《宋六十名家词》是宋代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在清代学者中广为传诵，清冯煦曾据以辑为《六十一家词选》。该书也是1965年中华书局本《全宋词》的主要依据之一，《六十种曲》是一部较好的戏曲传奇选集，其中除少数元人作品之外，大多数是明人作品。它和臧懋循《元曲选》是历来并称的两个本子。(二)不少古籍的毛刻本是传世唯一的全本。例如明人刻印《武林旧事》往往随意删除原作，或六卷，或不足六卷，惟存故都、宫殿、教坊等门，毛本十卷，首尾完具，足资参考。《孔

子家语》明有二本：徐勋本缺20余页，毛本不缺。明陈继儒刊《春渚纪闻》仅前5卷，而毛晋《津逮秘书》本补其脱遗，始成完书。明《稗海》本《齐东野语》删去此书大半，与《癸辛杂识》合为一书，毛晋得旧本重刻，乃成完本。明《汉魏丛书》本《神仙传》据《太平广记》所引抄合而成，而毛本据原本重刻，与裴松之《三国志注》引文一一相合。《花间集》是文学史上最早的词总集。坊本妄增篇目，殊失其旧，而毛晋重刊宋本，尤为精审，是难得的善本。李一氓同志在《花间集·校后记》中说：

(毛本)的好处是目录完备，虽然刊刻时间较晚(明末)，但比起其它万历、天启本子来，还算是规矩的，没有乱分卷帙、臆改字句之处。

关于毛本的问题，前人谈的最多的是底本和校勘两个问题。关于底本问题，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说：毛晋"刻书不据所藏宋元旧本"。其实，毛晋刻书大多以宋本作为底本。他的朋友陈瑚最了解他，陈瑚说：

(毛晋)所锓诸书，一据宋本。或戏谓子晋曰："人但多读书耳，何必宋本为？"子晋辄举唐诗"种松皆老作龙鳞"为证曰："读宋本然后知今本'老龙鳞'之为误也。"①

毛晋自己在题跋中也多次谈到底本。例如《郑注尔雅》跋说：

予家向藏抄本，未甚精确。客秋从锡山购得残编数簏，独斯帙完好，实南宋善版，亟授梓人。

《剑南诗稿》跋说：

① 《书林清话》卷七。

近来坊刻寡陋不成帙，刘须溪本子亦十仅二三。甲子秋，得翁子庚编辑《剑南诗稿》，又吴、钱两先生严订夭天者，真名秘本也，亟梓行之。

由此可见，毛晋作为一个严肃的出版家，在选择底本方面是极为慎重的，大多以宋本付梓刊行。关于校勘问题，孙庆增《藏书纪要·鉴别》说："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率，错误甚多。"黄丕烈、叶德辉等人也有类似说法。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第一，已如前言，毛氏重视校勘工作。错误存在，但并不多。第二，毛晋刻了那么多书，出现一些文字错误，当属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况且有些错误是宋本本身就有的，毛晋从不臆改宋本，总是尽量按照宋本的本来面目刻印古书。后代一些迷信宋本的人，以为宋本十全十美，反而把宋本固有的错误推到毛晋身上，这是不公平的。

当然，我们肯定毛晋刻书的成就，并不是说毛晋刻书完美无缺，毫无问题。毛本也和其它刻本一样，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是客观存在。关键在于纠正传统偏见，肯定主流。

七、明代坊刻

明代坊刻主要集中在建阳、苏州、金陵、新安（详本编第九章第一节）、杭州、北京等地，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建阳书坊

建阳是古代雕版印刷的发祥地，明代建阳书坊主要集中在麻沙、崇化两地。明宣德四年（1429年）衍圣公孔彦缙经礼部批准，曾不远千里到建阳购回大批图书。弘治十三年（1500年）麻沙遭受特大火灾，书版毁于一旦。朝廷及时派员到麻沙清理书版。嘉靖五年（1526年）应福建巡按御史杨瑞等人之请，诏令

“于建阳设立官署，派翰林春坊官一员，监校麻沙书版。寻命侍读汪佃领其事”。①

可考的建阳书坊，余氏有双桂堂、余新安、勤德堂、余良木自新斋、余德彰萃庆堂、余象斗三台馆（双峰堂）、余南扶、余东泉、余碧泉克勤斋、余良史怡庆堂、余应虬近圣居、余昌祚直方堂、兴文堂、余立予存庆堂、余仙源永庆堂、余献可居仁堂、余楷、余长庚、余寅伯、余成章、余廷甫、余应兴、余秀岳、余良进等，叶氏有叶天熹、叶见远、叶翠轩等，刘氏有刘龙田忠贤堂（乔山堂）、安正堂、慎独斋、日新堂等，熊氏有熊冲宇种德堂、熊稔寰燕石居、熊龙峰、熊之璋、熊云滨等，杨氏有杨闽斋清江书堂、杨先春归仁斋、杨美生、杨起元、杨居宷等，郑氏有郑世豪宗文堂、郑少垣联辉堂等，其它还有萧少衢师俭堂、詹易斋西清堂、陈世璜存德堂、罗氏集贤书堂等。其中最著名的有余象斗三台馆、余德彰萃庆堂、刘龙田乔山堂、安正堂、慎独斋、日新堂、熊冲宇种德堂、郑世豪宗文堂、清江书堂等。余象斗（一名余世腾），字仰止（一字文台），号三台山人。以编刊《四游记》、《列国志传》、《诸葛孔明异传》、《英烈传》、《唐志传》、《岳王传》、《东西晋演义传》、《皇明诸司公案传》等通俗小说著称于世。余氏不仅刻书，而且编书，《皇明诸司公案传》以及《四游记》中的《南游记》和《北游记》就是他亲自编成的。他刻的书一般都有插图，郑振铎《西谛书话·列国志传》说：

（余象斗）刻的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继承了宋元以来建安版书籍的形式，特别着意于“插图”，就象现在印行的“连环图画”似的，上层是插图，下层是文字，图文并茂。

---

① （清）俞樾：《茶香室续抄》卷十三。

建阳不少书坊都是刻书世家。例如日新堂由元代（后）至元四年（1338年）一直刻到明嘉靖八年（1529年），共191年；宗文堂由元代大德六年（1302年）一直刻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共298年；安正堂由明代弘治十七年（1504年）一直刻到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共107年，清江书堂由明代宣德六年(1431年)一直刻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共122年。①这么多刻书世家世代相传，得以使建阳成为"图书之府"。据周弘祖《古今书刻》的不完全统计，明代福建刻书470种，其中366种是坊刻，占福建全省刻书总数的78%，而这些坊刻本大多是建阳刻的。

怎样评价建阳麻沙刻本？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论者几乎众口一词，对麻沙本口诛笔伐，以为麻沙本"以柔木刻之"云云。这里"柔木"即指"榕树"。其实，这完全是臆说。宋梁克家《三山志》云："榕，州以南为多，至剑则无。"闽谚有"榕不过剑"之说，这里所谓"剑"即今之南平。南平在福州西北，位于建阳与福州之间。既然南平绝少榕树，那么，位于南平之北的建阳更不可能有榕树了。据今人实地调查，现在建阳麻沙一带有樟、梨、楠等，绝无榕树。②既然麻沙不产"柔木"榕树，何能"以柔木为之"？

苏州书坊

苏州一向是人才荟萃之地，明人叶盛《水东日记》卷十曾说：

> 苏州自国朝洪武中来，凡斯文盛举，未尝乏人。吾所知洪武壬子简会试士，十八人授编修等职

---

① 方品光：《福建刻书考略》，载《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次科学讨论会论文集》。

② 林列：《谈两点对麻沙本的看法》，载《福建图书馆学会通讯》1980年1期。

明代苏州著名文学家有高启、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冯梦龙等多人。苏州地区雕版印刷的基础也比较好，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评价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其精吴为最"。苏州书坊知名者有大观堂、天许斋、五雅堂、玉夏斋、世裕堂、白玉堂、同人堂、酉酉堂、衍庆堂、清绘堂、陈长卿、贯华堂、童涌泉、敦古斋、开美堂、叶龙溪、叶杏园、叶瞻泉、叶青雇、叶敬池、叶华生、陈仁锡、杨文奎、郑子明、拥万堂、宝鸿堂、宝翰楼等。其中，陈长卿、陈仁锡、拥万堂刻书较多。陈长卿刻有《古今医统大全》、《刘氏鸿书》、《文心雕龙》、《妇人良方》等。陈仁锡刻有《三国志》、《石田先生集》、《陈白阳集》、《藏书》、《资治通鉴》等。拥万堂刻有《古名儒毛诗解》16种、《秘书》9种、《吕东莱先生左氏博议》等。苏州书坊大量刻印小说戏曲，尤其令人注目。

金陵书坊

金陵（即南京）是我国五大古都之一，作过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的都城，明初也曾建都这里。这里文化基础好，刻书历史悠久，明代后朝，湖州、歙县刻工又多移居至此，更加促进了金陵雕版印刷的发展。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说：

> 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

金陵书坊知名者有三山书林、周如山大业堂、吴桂宇文枢堂、文秀堂、王慎吾、王凤翔光启堂、友花居、友石居、李澄源、吴继宗、余尚勋、余遇时、宗文书舍、来宾楼、长春堂、周前山、周曰校、周竹潭、周近泉、高谦、许孟仁、陈邦泰、童子山、傅梦龙、叶贵、叶均宇、叶如春、聚锦堂、蔡浚溪、三多斋、积德

堂、李潮、环翠堂、翼圣堂、戴尚宾、龚碧川、陈大林继志斋、唐氏等。其中周曰校、环翠堂、陈大来继志斋、唐氏等尤为著名。周曰校，字应贤，号对峰，室名万卷楼。刻有《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新镌全像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新刊京版批评百将传》、《东垣十书》、《新刊举业利用》、《新刻沈相国续选百家举业奇珍》等书。环翠堂主人汪廷讷，字昌朝（一字无如），号坐隐先生（一号全一真人），原籍休宁人，寄寓金陵。刻有《元本出相西厢记》、《坐隐先生全集四种》、《彩舟记》、《投桃记》等。他刻的书有不少精美插图。陈大来继志斋刻印杂剧甚多。唐氏一门蜚声金陵，可考者有唐鲤耀文林阁、唐富春世德堂（一名富春堂）、唐晟、唐廷扬、唐廷仁、唐鲤飞、唐振吾广庆堂、唐际云积秀堂、唐少村兴贤堂等。

杭州书坊

明代杭州可考书坊有一初斋、雷氏文会堂、玄览阁、虞九章更生斋、周兆斗、段斐君、容与堂、翁文溪、翁月溪、徐象桥曼山馆、冯念祖卧龙山房、段景亭读书坊等，其中刻书最多的是容与堂、徐象桥曼山馆和段景亭读书坊。容与堂刻有《李卓吾先生忠义水浒传》、《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李卓吾先生批评玉合记》、《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等大量小说戏曲作品。徐象桥曼山馆刻有《古诗选》九种、《国朝献征录》、《东坡先生尺牍》、《五言律祖》、《玉堂丛话》、《唐荆川先生纂辑武编》等。段景亭读书坊刻有《怡云阁浣纱记》、《孔子家语注》、《古今诗话》七十九种，《徐文长文集》、《昭代经济言》、《名山胜概记》、《关尹子注》、《扬子法言注》、《证治医便》、《五经纂注》等。除了刻书之外，杭州的书业贸易也比较发达。

北京书坊

明永乐以后，建都北京。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除了发达的官刻之外，坊刻也比较发达。可考书坊有永顺堂、汪谅、冯氏忠孝堂、晏氏忠恕堂、金台岳家、陕医胡同叶铺、赵铺等，其中永顺堂和汪谅刻书最多。永顺堂刻有《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富贵孝义传》、《新刊全相唱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新刊全相莺歌孝义传》、《新编说唱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新刊说唱包待制出身传》、《新刊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新刊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新刊全相说唱张文贵传》、《新编说唱全相石郎驸马传》、《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全相说唱师官受妻刘都赛上元十五夜看灯传》等。汪谅刻《文选注》目录后刻有售书广告：

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古今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

翻刻司马迁正义解注《史记》一部。

翻刻梁昭明解注《文选》一部。

翻刻黄鹤解注《杜诗》一部（全集）。

翻刻千家注《苏诗》一部。

翻刻解注《唐音》一部。

翻刻《玉机微义》一部（系医书），

翻刻《武经直解》一部（刘寅进士注）。

俱宋元版

重刻《名贤丛话诗林广记》一部。

重刻《韩诗外传》一部，十卷（韩婴集）。

重刻《潜夫论》（汉王符撰）一部。

重刻《太古遗音大全》一部。

重刻《臞仙神奇秘谱》一部。

重刻《诗对押韵》一部。

重刻《孝经注疏》一册。

俱古版。

嘉靖元年十二月望日金台汪谅古版校正新刊。

这个广告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说明汪氏刻书之多。限于篇幅，广告仅列举书名14种，还有更多的书名“不能悉载”。其二，说明汪氏刻书底本之好，均“俱宋元版”、“俱古版”翻刻。其中《史记》据宋黄善夫本翻刻，每为后人所称道。

明代坊刻极为发达，以上所谈只是举例而已。

八、明代刻书的特点

综观明代刻书情况，其刻书特点如下：

第一，就刻书地区而言，星罗棋布，遍地开花。河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宁夏、山东、山西、四川、广东、云南、贵州等省都刻了不少书。建阳、苏州、金陵、新安、杭州、北京等地刻家云集，刻本众多，是明代刻书的中心地区。此外，大名刻书也比较发达。大名位于河北、河南交通要冲，漳、卫二水穿境而过，为历来河防要地。宋时为京师汴京的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金兵南下，立刘豫为齐帝，建伪都于此。明代在大名设府，辖区大约相当于今天河北的元城、大名和魏县，河南的南乐、清丰、内黄、滑县和长垣，山东的东明等地。据有关书目著录，明代大名刻有《大名府志》、《经验方》、《山海经》、《遵道录》、《国语》、《此事难知》、《格致余论》、《何子十二论》、《元城语录》、《家规辑要》、《长垣县志》、《王太傅诗选》、《褚氏遗书》、

《古篆体》、《正蒙会稿》、《杨诚斋易传》、《文公字刻》、《经验药方》、《安鼎名臣录》、《史谈补》、《守令懿范》、《皇明三儒言行要录》、《救荒本草》、《两京遗编》、《汇刻三代遗书》、《适志集》、《匡氏痘疹方》、《归田稿》、《华泉集》、《屏居集》、《成氏诗集》、《皇明疏议辑略》、《皇明两朝疏草》、《记纂渊海》、《槐野先生存笥稿》等。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两京遗编提要》说：

余尝谓嘉万以来，大名刻书之盛，者与苏、宁、徽、杭并驾。刀削之技或稍逊，而朴茂实过之。且所刻之书，皆有经济实用，则尤与东南异趣。

王重民先生生前曾多次提到大名刻书，久有作考之志，惜其赍志而没，饮恨九泉。

第二，就刻书数量而言，比比皆是，远轶前代。明代刻书知多少？至今没有也不可能有精确统计数字。下面仅以文集、方志、杂史为例加以说明，管中窥豹，或许可以略见一斑。明代文人学者多有文集行世，"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①据统计，现存唐文集278种，宋文集347种，辽金文集100余种，元文集324种，而明文集就有2000多种，几乎是唐宋辽金元诸代总和的2倍。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诏天下郡国皆修志书，到了万历年间，郡县莫不有志。现存宋方志28种、元方志11种，而明方志就有860种，是宋元两代总和的22倍。明代杂史也多，黄宗羲《南雷文案·谈孺木墓表》说：

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岂有三长，足掩前哲？亦不过此因彼袭、攘袂公行，苟足以记名姓，耙不难办。

① （清）蔡澄：《鸡窗丛话》。

《明史·艺文志》杂史类著录杂史217种、2244卷。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著录明末杂史1000余种，大多出于明人之手。明代以前，史志目录均通代为书，而《明史·艺文志》却一反常规，仅仅著录一代之书，原因何在？清人倪灿在《明史艺文志·序》中说：

> 第有明一代以来，君臣崇尚文雅，列圣之著述，内府咸有开板，而一时作者，亦自彬彬。崇正学者，多以濂洛为宗；尚词藻者，亦以班扬为志。迨夫博雅淹通之士，著述尤夥，故其篇帙繁富，远过前人。虽不无芜蔓，然亦有可采。前代史志，皆录古今之书，以其为中秘所藏，著一代之所有。今文渊之目，既不可凭，且其书仅及元季，三百年作者缺焉，此亦未足称记载也。故特更其例，去前代之陈编，纪一朝之著述。

可见，"篇帙繁富，远过前人"是《明史·艺文志》断代为书的主要原因。另外，明代版本目录、地方著作目录的大量出现，也说明了明代刻书之多。再拿私人藏书家来说，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统计，宋代184人、辽代1人、金代4人，元代35人，而明代就有427人，几乎是宋辽金元诸代总和的2倍。这也与明代刻本众多、聚书容易有关。

第三，就刻书内容而言，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原有的书目分类已经显得陈旧过时，许多图书无类可归。针对这种情况，不少书目纷纷增加新类。例如高儒《百川书志》共分43门，其中经志16门，增设总经、仪注、道学、蒙求四子目；史志21门，增设御记、姓谱、史咏、文史、野史、外史、小史等子目；子志30门，增设德行、崇正、政教、隐家、格物、翰墨、卫生术、房中术、占梦术、刑法家、杂艺术、子抄、类书等子目；集志类目尤为详尽，先依时代分为秦汉六朝文、唐文、宋文、元文、圣朝御

制文、睿制文、名臣文、汉魏六朝诗、唐诗、宋诗、元诗、圣朝御制诗集、睿制诗集、名臣诗集，又依文体分为诏制、奏议、歌词、词曲等。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录》共分46类，其中约史、理学、诏制、丛书等类是新增的。在门类繁多的明刻本中，小说戏剧图书和西学图书尤其令人瞩目。明代小说戏剧盛行。明人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曾经谈及小说盛行之状：

> 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汉、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细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

明人范濂曾经在《云间据目抄》卷二中谈及戏剧盛行之状：

> 各镇赁马二三百匹，演剧者皆穿鲜明蟒衣靴革，而幞头纱帽满缀金珠翠花，如扮状元游街，用珠鞭三条，价值百金有余；又增妓女三四十人，分为寡妇征西、昭君出塞色名，华丽尤甚；其它彩亭旗鼓兵器，种种精奇，不能悉述。街道桥梁，皆用布幔，以防阴雨。郡中士庶，争挈家往观，游船马船，拥塞河道。正所谓举国若狂也。每镇或四日或五日乃至，日费千金。

既然，小说戏剧为人喜闻乐见，刻书家也就投其所好，大量出版。① 据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和《明代传奇全目》著录，明代杂剧有523种，传奇有950种。尽管小说戏剧图书在封建社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儿，然而有明一代，这类图书确实太多，影响实太大，古籍书目再也不能回避现实了。高儒《百川书志》

① 谢灼华：《明代文学书籍的出版》，载《图书情报知识》1980年2期。

在史部野史、外史、小史三类中著录演义、传奇，成为该目的一大特色。晁氏《宝文堂书目》、赵琦美《脉望馆书目》、周弘祖《古今书刻》等也著录了不少小说戏剧图书。15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进行扩张侵略的同时，西学东渐。意大利传教士罗明鉴、利玛窦、熊三拔，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等先后叩开了中国的大门。明代翻译出版了100多种反映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其中有利玛窦的《同文算指》、《测量法义》、《乾坤体义》、《万国舆图》等；熊三拔的《泰西水法》、《表度说》等；汤若望的《浑天仪说》、《远镜说》等。鉴于西学图书的大量出现，赵琦美《脉望馆书目》专门增设了"大西人术"一类，专门著录这类图书。

第四，就印刷技术而言，巧夺天工，炉火纯青。明代印刷技术之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活字印刷的普及。活字印刷技术比雕版印刷复杂得多，自从宋代毕昇发明泥活字以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由于技术等原因，不能推广，到了技术力量雄厚的明代，才得以普及四方。（二）套版印刷广泛应用。套印技术难度较大，变一版为数版，没有精湛的技术，不克成功。（三）插图本的大量出现。插图讲究线条、形象，一般的刻工难以胜任。（四）饾版、拱花的发明。饾版、拱花技术难度更大，寻常刻工望尘莫及（详本编第九章第一节）。

第五，就刻本形式而言，弘治以前，多四周双边，粗黑口；正德以后多白口，书口刻有字数、刻工姓名，序目、卷末等处多刻牌记。万历以后，仍多白口。至于字体、纸张、装订、讳字等，请参考有关章节。

明刻本的缺点也不少，主要表现在：

第一，校勘不精，脱漏甚多。明人杨慎在《丹铅续录》卷三曾说：

> 古书转刻转谬，盖病于浅者妄改耳，如近日吴中刻《世

说》："右军清真"谓清致而真率也，李太白用其语为诗："右军本清真"，是其证也。近乃妄改作"清贵"。"兼有诸人之差"，谓各得诸人之参差，近乃妄改作"美"。"声鸣转急"，改"鸣"作"气"。"义学"改作"学义"，皆大失古人语意。聊举一二，他不能尽。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八中也说：

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后序"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不知"壮月"出于《尔雅》，而改为"牡丹"，凡万历以来所刻之书多"牡丹"之类也。

明监本《史记》张守节注，讹脱1000余条，其中一条长达170余字。

第二，随意窜改古书。《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一说：

明代刊书者往往窜乱旧本，而没所由来，诸版竟出，混淆弥甚，其风炽于万历以后。

例如明杜思刻《别本革朝遗忠录》系由郁衮《革除遗忠录》改窜而成，删去郁书赞语，书首伪冠张芹《备遗录》、黄佐《革除遗事》、敖英《备遗续录》三序，序文与内容毫无关系。又如明本薛瑄《薛子道论》系由薛瑄《读书录》中摘出，别成一书。

第三，多序。明代晚期有一种风气，一本书刊印之前，总要拉一些名人吹嘘一番，拉大旗作虎皮，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详第三编第二章第二节）。

第四，作伪较多，作伪手段千奇百怪（详第三编第四章第一节）。

第七章 清代刻书

一、武英殿刻书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为刻书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清政府在大兴文字狱、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同时，又把刻书作为笼络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因此，清代官方刻书也取得一定成绩。在清代官刻之中，武英殿刻书成绩最大。

武英殿的编制

武英殿刻书始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该年于清廷内务府设立武英殿造办处，在制作内廷所需文具、工艺品的同时，兼事刻书。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把与刻书无关的作坊划归养心殿造办处管理，武英殿造办处才成为内府专门的刻书机构。①章乃炜《清宫述闻》卷三曾经谈及武英殿造办处的编制情况：

> 向以亲王领殿事，而设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其下则为校录之士、收掌之员，若刷刷、装订工匠尤夥。

武英殿造办处后易名武英殿修书处，下设监造处、校刊翰林处、

① 金良年：《清代武英殿刻书述略》，载《文史》31期。

档案房等。监造处又有书作、刷印作、铜字库、聚珍馆等机构。书作又叫裱潢作，主要负责书籍装潢工作，有工匠44名；刷印作又叫刻字作，主要负责图书刻印工作，有工匠40名；铜字库负责铜活字印书；聚珍馆负责木活字印书。校刊翰林处负责武英殿所刻图书的校刊工作，档案房负责收发文稿。工匠刻书按劳取酬，又据《清宫述闻》卷三：

> 凡刊刻御笔，每个寸字工价钱一分，万字锦边宽一寸、长八寸，合一工，值银一钱五分四厘。凡书刻宋字、刻软字，每百字工价银八分；刻欧字，每百字工价银一钱四分，枣木版加倍。凡刻画图，每见方寸合一工，值银一钱五分四厘。凡书写宋字，每百字工价银二分，软字三分、欧字四分。凡画图，每见方寸二寸合一工，值银一钱五分四厘。

武英殿工作人员的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修书翰林等照南书房翰林饭食例：每员每日肉菜半桌、稻米一仓升、茶叶一钱，跟役老米一仓升”，“修书处自五月朔，始逐日赐尚方冰，供以巨盘”。①可见平时除有肉吃之外，炎夏还有冷饮供应。

康熙年间刻书

康熙年间刻了哪些书？康熙一朝刻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四书解义》、《御纂周易折中》、《御纂性理解义》、《御纂朱子全书》、《御制耕织图诗》、《御定词谱》、《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幸鲁盛典》、《万寿盛典初集》、《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清凉山新志》、《清文鉴》、《孝经衍义》、《御选四朝诗》等。另外，还有不少书由大臣出资刻印，例如《全唐诗》为通政使曹寅刻，《历代赋

---

① 《清宫述闻》卷三。

汇》为詹事府詹事陈元龙刻，《佩文斋咏物诗选》为翰林院编修高舆刻，《历代题画诗类》为翰林院编修陈邦彦刻，《历代诗余》为司经局洗马王奕清刻，《佩文斋书画谱》为候补主事王世绳等刻，《御批通鉴纲目》为吏部尚书宋荦刻，《佩文斋广群芳谱》为河南道监察御史刘灏刻，《全金诗》为内阁中书郭元釪刻，《历代纪事年表》为翰林院检讨马豫刻，《康熙字典》为翰林院侍读陈世倌刻，等等。这是什么原因呢？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一说：

> 盖其时士大夫皆以校刻天府秘籍、列名简末为荣，故多有竭诚报效者。

在大臣刻印诸书中，以曹寅刻《全唐诗》比较有名。

曹寅（1658～1712），字楝亭，号荔轩，曹雪芹的祖父，曾任江宁织造等职，创扬州诗局，为武英殿刻过《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书。《全唐诗》刻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该年3月19日，"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① 曹寅领旨后，积极筹备，于当年5月1日开局于扬州天宁寺。因为原颁《全唐诗》是季振宜据钱谦益所辑唐诗残稿重编的717卷抄本，并非完整书稿，所以，在刻印之前，还要进行编辑整理的工作。彭定求、杨中讷、汪士鋐、徐树本、俞梅等编校人员翻阅了胡震亨《唐音统签》等有关书籍，补其所遗，将《全唐诗》增益为900卷，收录2200余位唐代诗人的作品48900余首。为了刻好这部大书，曹寅曾给康熙皇帝上过七件奏折，康熙皇帝对刻书的细节问题一一作了批复。《全唐诗》刻成后，康熙皇帝同意把曹寅等人的名字刻在书上，曹寅感恩不尽，他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3月10日的奏折中说：

---

① （清）宋荦：《西陂类稿》卷四十二。

臣同诸官不过校字督工，令准翰林咨，奉圣谕并抄列臣等衔名，刊刻款式到臣，谨遵旨补入刊刻。但臣系何人亦得列名其上，永垂不朽。臣不胜感愧无地，不知何幸得至于此，谨具香案九叩。①

《佩文韵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十七日开雕，承办者除了曹寅之外，还有苏州织造兼两淮盐差李煦和杭州织造孙文成。孙文成负责在杭州筹备纸张，曹寅在扬州诗局负责刻印工作。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二十三日，曹寅死在扬州诗局，由李煦主持刻印工作，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九月十日刻成，历时17个月。为了刻好这部书，挑选名工巧匠100多人，根据康熙皇帝的旨意，刷印了1000部。这里顺便说明一个问题：通常所谓"殿版"，并非全在武英殿刊行，上述大臣出资所刻书便是一例。此外，武英殿成立以前的内府刻本也多称为"殿版"，例如顺治间内府刻《资政要览》、《劝善要言》、《内则衍义》等。还有个别私人刻版缴入内府者，也多称为"殿版"，例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南巡，知县马骕以所撰《绎史》进呈，倍受称道，遂以书版缴入内府。以上各书虽称"殿版"，但有"殿版"之名，无"殿版"之实，我们姑且称之为"准殿版"。那么怎么区别"殿版"和"准殿版"呢？凡是真正的武英殿刻本均列校刊衔名，再结合字体、纸张及有关文献资料，即可加以区别。不过，严格地说，那些非武英殿刻版者还是不称"殿版"为宜。

雍正以后刻书

雍正一朝，除了用铜活字摆印《古今图书集成》64部外，刻

---

①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江宁织造曹寅奏谢刊刻〈全唐诗〉得列衔名折》。

有《御定骈字类编》、《圣谕广训》、《上谕八旗》、《庭训格言》、《钦定训饬州县规条》、《圣祖仁皇帝御制文四集》、《御制朋党论》、《大清会典》、《钦定书经传说汇纂》、《清汉文孝经》、《御制律历渊源》、《御定音韵阐微》、《悦心集》等。

乾隆一朝，刻书最多。据陶湘《故宫所藏殿版书目》统计，乾隆年间刻书多至100余种，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三经》、《二十四史》等。乾隆四年（1739年）弘历以经史并重，在校刊《十三经注疏》之后，复命校刊《二十一史》，卷末考证，一遵诸经之例。《二十一史》加上《明史》和《旧唐书》，合为《二十三史》。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敕辑《辽史语解》十卷、《金史语解》十二卷、《元史语解》二十四卷，御制改译辽金元三史序，分弁三史简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又敕馆臣重辑《旧五代史》，题诗冠首，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刊成，一并列入，终成《二十四史》。乾隆皇帝非常重视刻书，经常到武英殿检查工作，有时还亲自参与校勘工作，据《清朝野史大观》卷一记载：

> 相传纯庙时刊印《二十四史》，上雅重文史，虑多舛谬，常自校核，诸臣虑无以逞上意，乃故予明显处错误数字，俾待宸翰勘正，以惬圣怀，然不免有漏未正者，故今殿板书常有讹舛云。

根据乾隆皇帝的意旨，武英殿还采用刻印大部头书所剩的零星木料，刻印了9种袖珍本，这9种书是：《古香斋袖珍四书五经》、《古香斋袖珍史记》、《古香斋袖珍通鉴纲目三编》、《古香斋袖珍古文渊鉴》、《古香斋袖珍朱子全书》、《古香斋袖珍渊鉴类函》、《古香斋袖珍初学记》、《古香斋袖珍施注苏诗》和《古香斋袖珍春明梦余录》。

嘉庆一朝刻有《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钦定兰州纪略》、《高宗圣训》、《全唐文》、《钦定明鉴》等。嘉庆以后，武英殿刻书日渐衰落，到光绪初年，武英殿刻书已到徒有其名、不可收拾的地步。又据《清朝野史大观》卷一记载：

> 清初武英殿版书籍，精妙迈前代。版片皆沱殿旁空屋中，积年既久，不常印刷，遂为人盗卖无数。光绪初年，南皮张文襄之洞官翰林时，拟集资奏请印刷，以广流传，人谓之曰："公将兴大狱耶？是物久已不完矣，一经发觉，凡历任殿差者，皆将获咎，是革数百人职矣，乌乎可？"文襄乃止。殿旁余屋乃为实录馆，供事盘踞其中，一屋宿五六人、三四人不等，以便早晚赴馆就近也。宿于斯，食于斯，冬日炭不足，则劈殿版围炉焉。又有窃版出、刨去两面之字，而售于厂肆刻字店，每版易京当十泉四千（合制钱四百文），版皆红枣木，厚寸许，经二百年无裂痕，当年不知费几许金钱而成之者，乃陆续毁于若辈之手。

另外，同治八年（1869年）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武英殿两遭回禄之祸，使武英殿也蒙受了重大损失。当然，武英殿所刻版片除了收藏在本殿之外，也有不少版片寄藏国子监、翰林院、钦天监、太医院等处。其中国子监在乾隆间就收藏了（《十三经》《二十三史》、《旧五代史》除外）51种图书的版片。收藏单位仅仅负有保管责任，版权仍归武英殿所有，武英殿随时可将版片收回。例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收回国子监藏《四书》版片1028面；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收回国子监藏《古文约选》、《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9种图书的版片。尽管武英殿采取了种种措施保护版片，但是版片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不少版片仅仅刷印一次就弃而不用了。

以上就是武英殿刻书的大概情况。武英殿刻书知多少？陶湘

《故宫殿本书库现存书目》著录有300多种，其实，远远不止这些。纵观殿本内容，"钦定"之书不下一百五六十种，这说明殿本姓"官"，是官方加强封建统治的产物。所有殿本书的整理、刻印和发行，均据"上谕"，武英殿不过是"遵旨"而已。

殿版书的发行

清代皇帝不仅关心刻书，而且关心图书发行工作。殿版书的发行，约有赏赐、颁发、发卖等多种渠道。"赏赐"即皇帝亲自把图书赐给个人。皇帝为了对臣下表示恩宠，随时可有赐书之举。例如清修《四库全书》时，对于献书500种以上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4人，各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对于献书百种以上的周厚堉、蒋曾莹、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人，各赐《佩文韵府》一部。一般地说，参与纂修官书的人，待书成之日，照例均可赐书一部。"颁发"即皇帝把图书下发到机关单位。据《钦定国子监志》记载，乾隆年间，国子监就收到颁发之书47种。雍正七年（1729年）正月，"著大学士等将应行颁发之书奏闻，颁赐衍圣公藏之阙里，昭示来兹"。①颁发之书允许各地翻刻刷印，乾隆三年（1738年）上谕称：

> 圣祖仁皇帝御制经史诸书，颁发各省布政司，敬谨刊刻，准人刷印，并听坊间刷卖。原欲士子人人诵习，以广教泽也。近闻书版收贮藩库，士子及坊间刷印者甚少。著各抚藩留心办理，将书版重加修整，俾士民等易于刷印。有愿翻刻者，听其自便，毋庸禁止。如御纂诸书，内有为士人所宜诵习而未经颁发者，著该督抚奏请颁发，刊版流布。②

---

① 《世宗实录》卷七十七.

② 《高宗实录》卷七十.

"发卖"即直接向社会销售。正如乾隆三年(1738年)上谕所称：

> 将刷印各书所需纸墨工价银两，逐步核定。凡满汉官员有愿购诵者，令其在各衙门具呈，自备价值，概准刷印。有情愿捐俸若干、刷印书籍若干部者，由该旗衙门查明，移咨武英殿各衙门，照数给发书籍，交于崇文门监督，存贮书局，准令士子购见。①

由于发行渠道畅通，所以殿版书籍不胫而走天下。

二、国子监刻书

清代国子监承明代北京国子监之余绪，继续刻书。前人未尝注意，特此表而出之。

清国子监对待刻书一事，非常严肃，书稿不得随意付诸梨枣，否则以违纪论处。早在顺治九年（1652年），上谕国子监云：

> 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②

清国子监藏有大量书版，其来源有三：一是武英殿书版（见上节）；二是明代北京国子监遗留书版（详本编第六章第二节）；三是本监所刻书版，清国子监刻了哪些书？据《钦定国子监志》（乾隆）记载，单是乾隆二年（1737年）就刻《御纂周易折中》版1021面，《御纂性理精义》版420面，《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版1906面，《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版1617面，《钦定书经传说汇

---

① 《高宗实录》卷七十.

② 《钦定国子监志》卷二.

纂》版1176面。以上5书版片共计6140面。这些书版都是监臣杨名时请旨据殿版重刻的。国子监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刻书是其余事。在短短的一年中，刻版6000多面，平均每日刻书17面，其刻书之多，于此可见一斑。可惜清国子监所刻其它书版，由于文献无征，已经不得而知了。国子监除了新刻书版之外，还对明监遗留版片进行了一些修补工作。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祭酒王士禛《请修经史刻板疏》云：

> 窃惟列圣道法之传莫备于经，历代治乱之迹莫详于史。古帝王内圣外王之学，不外经史而毕具矣。我皇上聪明天纵，宵旰不遑，犹日御讲筵，研精经史，又以刊刻经书讲义颁赐诸臣，典学之勤，二帝三王蔑以尚矣。查明代南北两雍，皆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板，今南监版存否完缺，久不可知。惟国学所藏原版庋置御书楼。此版一修于前朝万历三十三年，再修于崇祯十二年，自本朝定鼎迄今四十余载，漫漶残缺，殆不可读。所宜及时修补，庶几事省功倍，伏乞敕下部议，查其急宜修补者，早为鸠工，俾刓缺悉为完书，亦仰裨圣朝文教之一端也。①

到《明史》修好后，如其所请，清国子监修补了不少明监残版。

清国子监对书版的管理相当严格，“本监版刻及武英殿寄监存贮版刻均立册详识数目。凡书籍刻版之册，皆钤以监印。新旧交代则详验面悉数之”。②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及时曝晒书版，以防潮湿发霉。每到年终，都要盘查书版一次，将存缺情况记入档案，“或岁久书蠹板泐，随时修补”。③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再次重申监规：“御书楼书籍版片，不时查阅……火烛尤宜

---

① 《钦定国子监志》卷五十三。

②③ 同上书卷二十九。

小心"。[1]当然，国子监在严格管理书版的同时，也鼓励人们就版刷印，只不过要求爱护版片罢了。

清国子监除了自己刻版、补版外，还有向武英殿提供书稿的任务，据《高宗实录》卷七十六记载：

> 乾隆三年（1738年）九月壬子，大学士等议覆国子监奏称大学所贮《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版片模糊，难以修补，请重加校刻，以垂久远，应如所请。令国子监购觅原本各一部，分派编检等官校阅，交武英殿缮写刊刻，即将版片交国子监存贮，以备刷印。再国子监奏有写本《旧唐书》一部，亦请刊刻，以广流传。得旨：版片不必国子监查办，著交予庄亲王于武英殿御书处等处查办。

可见，殿版《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书的底本均由国子监提供，版片刻好后，交国子监收藏。

关于清代国子监刻书的其它情况，有待进一步钩稽。

三、官书局刻书

官书局是清代末期地方官刻的重要代表。它产生于雕版印刷日趋没落、新的印刷技术日渐兴旺之际，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官书局的创立

清代官书局创建于何时？况周颐《蕙风丛书·蕙风簃二笔》曾说：

> 咸丰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公克复安庆，部署粗定，命莫子

[1] 《钦定国子监志》卷二十九。

偲大令采访遗书，商之九弟沅浦方伯刻《王船山遗书》，既复江宁，开书局于冶城山，延博雅之儒校雠经史，政暇则肩舆经过，谈论移时而去，住南城者有南汇张文虎，海宁李善兰、唐仁寿，德清戴望，仪征刘寿、曾宝应、刘恭冕，此江南官书局之缘起也。

这里，江南官书局即金陵官书局的前身，它是各省官书局中创建最早的一个。清人张文虎《行状》说：

曾公方刊其先辈王船山先生书，庀局皖垣，即延先生及仪征刘伯山先生（毓崧）分任校雠。甲子大军克江宁，文正公移节之任，先生与偕，以书局自随。①

由此可知，金陵官书局始创于安庆，既迁至金陵冶城山。至于金陵书局创建的具体时间，《曾国藩日记·同治五年五月三日》明确记载：

同治二年，沅甫弟捐资，全数刊刻（《王船山遗书》），开局于安庆，三年移于金陵。

就是说，金陵官书局在安庆开业的时间是同治二年（1863年），迁至金陵的时间是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同时，如此热心刻书，其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为了挽救清政府岌岌可危的命运，向广大人民灌输封建正统思想。

过去，在金陵书局创建的时间、地点等问题上有不少讹传，"安庆治山"之说便是一例，即认为金陵书局创始于安庆治山。

---

① （清）张文虎：《覆瓿集》附件。

其实，“治山”应作“冶山”，冶山地处金陵，而非安庆。冶山即冶城山之简称，其故址在今南京市江宁县西，本是三国时期孙吴冶铸之所，有朝天宫等古迹。张文虎在《覆瓿集·舒艺室诗存》中曾详细谈到过移局冶山的经过：

> 同治三年初，复金陵，入城访冶城山朝天宫废址，见飞霞阁甍椽仅存，戏谓安得修葺为登眺地。其明年官绅议以宫址改建郡学，巴州廖君督其工，稍葺此阁居之，同人屡来游宴，去秋竣事，廖君请移书局于此。合肥李宫保以为然。今春湘乡相侯（即曾国藩）回江督任，寻前议，遂迁焉。

可见书局迁至冶城山是经过曾国藩批准的。在金陵官书局的带动下，浙江、江西、湖北、安徽、山西、山东、直隶、贵州、云南、四川、广东、福建、湖南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官书局。朱士嘉在《官书局书目汇编·缘起》中指出：

> 官书局创始于同治，极盛于光绪。

这两句话是对官书局发展情况的最好总结。

金陵书局和浙江书局

金陵书局刻的第一部书是《王船山遗书》。如上所述，此书始刻于同治二年（1863年），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到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刻完。金陵书局一开始就很重视校勘工作，以为“刻书机会实为难得”，“但求校雠之精审，不问成书之迟速”。①张文虎、刘毓崧、戴望等“江介名宿分任审阅编校之役”。②张文虎，字孟彪（一字啸山），南汇周浦人，清末著名

① （清）张文虎：《覆瓿集续刻·尺牍·复湘乡相侯》。

② 金陵书局刻本《重刊船山遗书·凡例》。

学者，有《覆瓿集》行世。张氏在去金陵书局之前，为金山钱氏校书凡三十年；《守山阁丛书》、《指海》、《小万卷楼丛书》等均出自张氏之手。刘毓崧为著名学者刘文淇之子，从父受经，著述甚富。刘毓崧及其子刘寿曾都曾在金陵书局工作过，据《清史稿·儒林传》：

> 毓崧主金陵书局，为曾国藩所重。毓崧卒后，招寿曾入局中，所刊群籍，多为校定。

除了名儒参与校勘之外，曾国藩还亲自出马，校阅《王船山遗书》中的《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续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书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①]金陵书局在避讳方面是非常谨慎的，不敢有半点马虎。《王船山遗书》共332卷，其版式特征是：左右双边、粗黑口、双鱼尾，鱼尾中有书名、卷次和页数。半页10行、行22字。《王船山遗书》刻印不久，又刻印了《几何原本》、《西人重学》二书，这两种书原是张文虎为金山钱氏校刻的，后来毁于兵火，张文虎以这两种书"尤切于当世之用，请于文正公重锓以行"。[②]同治七年（1868年），金陵书局还刻印了《五种遗规》，这五种书（即《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极力宣扬封建道德，其刻书目的昭然若揭。此外，金陵书局还刻印了《十三经读本》、《老子章义》、《楚辞》、《文选李善注》、《唐人万首绝句选》、《读书杂志》等。

浙江书局是同治六年（1867年）浙江布政使杨昌浚、按察使王凯泰呈准巡抚马新贻设立的，书局初设于杭州小营巷报恩寺

---

① （清）曾国藩：《王船山遗书·序》。

② 《覆瓿集》末附《州判衔侯选训导张先生行状》。

内，以后局址递有变迁，该局“选士子有文行者，总而校之，集剞劂氏百十人，以写刊之，议有章程十二条，自丁卯（即同治六年）开局，至光绪乙酉（即光绪十一年）凡二十年，先后刊刻二百余种”。[①]其中经部有《御纂七经》、《郑氏佚书》、《四书集注》、《四书约旨》等；史部有《孔子编年》、《九通》、《入幕须知》、《竹书纪年》、《御批通鉴集览》、《胡端敏奏议》、《汉书艺文志考证》、《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子部有《张氏医书七种》、《二十二子》、《玉海》等；集部有《沈氏三先生文集》、《古文渊鉴》、《苏诗编注集成》、《王文成公集》、《輶轩录》、《唐宋文醇》等。民国24年（1935年）曾经进行过一次统计，计得浙江书局书版163000片，其中各家捐赠39893片，自刻122000余片。浙江书局也很重视校勘工作，谭献、王诒寿、杨文莹、张大昌、黄以周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任职。著名学者俞樾还曾在此主持工作，“总办浙江书局”。[②]

崇文书局与广雅书局

湖北崇文书局于同治六年（1867年）6月15日在武昌候补街正觉寺正式成立，据《湖北通志·宦绩传》记载：

> 李瀚章，同治初，再署湖广总督，旋实任。奏设崇文书局刊刻经籍，

李瀚章委派张炳坤、胡凤丹两名官员到书局主持工作。崇文书局发展很快，不久就拥有十间房子作为刻印、装订图书的作坊，刻书工人多达六七十人。据统计，崇文书局先后刻书250余种，书版144700片，其中经部有《经典释文》、《说文解字》、《康熙

---

① （清）丁申：《武林藏书录·浙江书局》。

② 《清史稿·儒林传》。

字典》《说文义证》、《说文提要》、《小学钩沉》、《十一经音训》等；史部有《湖北舆地》、《湖北通志》、《武功县志》、《长江全图》、《武汉城镇合图》、《鄂省全图》、《吏部则例》、《清会典》、《牧令辑要》、《史通削繁》、《明通鉴》、《十六国春秋》、《稽古录》等；子部有《子书百家》、《徐氏医书六种》、《沈氏尊生书》等；集部有《唐四家诗》、《唐宋八大家类选》、《文选》、《文章轨范》、《吴梅村词》、《精刊太白集》等。崇文书局刻本流布甚广，左宗棠在西北任职时，曾专门订购崇文书局刻本发往西北。不过，崇文书局刻本大多行款密集，字体扁平，墨色不匀，读起来颇费眼神。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清末著名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对于崇文书局的发展多所帮助。同治六年（1867年），张之洞出任湖北学政，“仿浙之诂经、粤之学海，创建经心书院，择岁科高等生肄业其中，人文兴起，学业臻盛”，① 为崇文书局发展刻书事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当时主持崇文书局工作的胡凤丹与文士往还甚密，多所唱和，张之洞亲为其唱和集作序，交崇文书局刊行。另外，张之洞还将科试湖北各府州生员的佳作汇编为《江汉炳灵集》（五集），交崇文书局印行。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对于崇文书局的发展更加关心，他指使善后局每月拨银数千两，作为崇文书局的刻书经费。光绪十六年（1890年）还将前任学政赵尚辅三余草堂搜集校刊的《湖北历代名贤著述》版片以白银4000两购回，交崇文书局刷印。

广雅书局建立于清末光绪十二年（1886年），兹有张之洞《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开设书局刊布经籍折》为证：“上年（即光绪十二年），即经臣之洞捐资设局……将省城内旧机器局重加修葺，以为书局，名曰广雅书局。”②广雅书局的提调是王

① 《湖北通志·宦绩传》。

② 《张文襄公奏稿》卷十六。

秉恩，著名学者屠敬山、王仁俊、叶昌炽等都曾参与校勘工作。广雅书局先后刻书300多种（图12），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广雅丛书》，该书收书159种，其中史书97种，几乎包括了唐宋以来的主要史书。但在选择底本、校勘等方面或有疏漏之处，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来只有138种，而广雅书局刻本却有148种，多出10种，这是由于广雅书局没有慎选底本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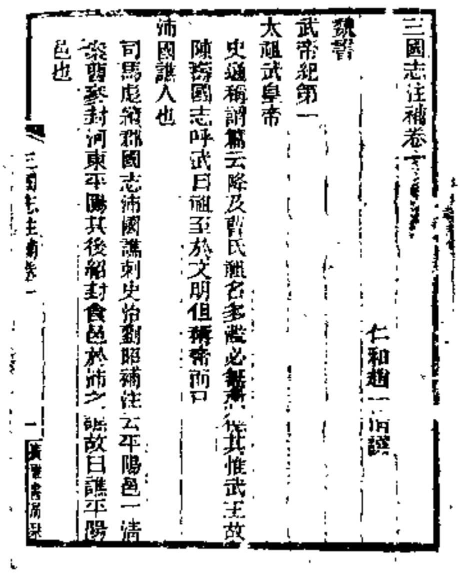


图12　广雅书局刻本《三国志注补》

其它书局

除了金陵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广雅书局之外，湖南书局、淮南书局、四川书局、江西书局、山东书局、濬文书局、敷文书局、福州书局、贵州书局、云南书局等也刻了不少书。湖南官书局亦名湘南书局、湖南省城书局。该局创立于同治年间，刻过《王船山遗书》、《曾国藩全集》等。光绪十七年(1891年)，

湖南官书局与传忠书局均附属于思贤讲舍，故称思贤书局，地址在长沙曾公祠。刻有《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周礼正义》、《墨子闲诂》、《宋元名家词》、《皮氏经学丛书》等。淮南书局在扬州，刻有《十三经注疏》、《毛诗注疏》、《四书集注》、《说文解字》、《南北史补志》、《两淮盐法志》、《东都事略》、《春秋繁露》、《初唐四杰文集》等。四川书局同治年间创立于成都，又名成都书局，刻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江西书局同治间创立于南昌，刻有《御纂七经》、《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五朝纪事本末》、《御纂医宗金鉴》、《王荆公诗注》、《黄文节公正集》等。山东书局设在济南，刻有《十三经读本》、《通德遗书所见录》、《农政全书》等。濬文书局设在太原，是山西省的地方官书局，刻有《十三经读本》等。敦文书局是安徽省的地方官书局，刻书情况不详。另外，还有直隶书局，该局于光绪七年（1881年）由天津知县劳乃宣奏准成立，由于经费无着，没有刻什么书，后来干脆变成专事发行图书的部门，出售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李光明庄等印制的图书。

书局之间的合作

为了缩短出书周期，书局之间还通力合作，刻印大部头书。例如金陵、淮南、江苏、浙江、崇文等五个书局曾联合刻印《二十四史》。其中金陵书局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等14种；淮南书局刻《隋书》一种；江苏书局刻《辽史》、《金史》、《元史》3种；浙江书局刻《旧唐书》、《新唐书》、《宋史》3种；崇文书局刻《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明史》3种。局本《二十四史》的版式大同小异：左右双边（只有崇文书局所刻3种是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半页12

行、行25字。金陵书局刻14史，每卷首末二页书口鱼尾下有“汲古阁”三字并“毛氏正本”方印，卷末有“金陵书局仿汲古阁本刊”长方篆文木记。淮南书局刻《隋书》每卷首页书口鱼尾下有“扬州书局仿汲古阁刊”长方篆文木记，崇文书局刻《新五代史》每卷首页书口鱼尾下有“汲古阁毛氏正本”双行小字。诸局所刻其它各书的所有书口均无“汲古阁毛氏正本”字样，卷末亦无长方篆文木记。这说明五个书局在刻印《二十四史》之前，预先商定了版式行款的统一问题，允许各书局在刻印过程中有所变通，并不强求一律。为了扩大发行渠道，书局之间还建立了图书代销业务。社会有关单位也经常为各地书局提供图书展销场所。为了降低成本，便民购买，各书局还刻印了不少袖珍本。

总而言之，官书局是清末地方官刻的主要代表。局本之中，经史居多，子书次之，诗文较少。为了扩大发行量，也刻印了不少定价低廉的普及读物。因为官书局去今未远，很多局本至今完整地保藏在图书馆里。据《中国丛书综录》所著录的41个收藏单位统计，现存的局本丛书就有40余部。

四、清代家刻

清代前期，官方大规模地组织编书和刻书，对民间刻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刻书成为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稍具条件者，皆跃跃欲试。清代考据学的发达，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图书版本的重要，于是学者争先刻书，力纠误本弊病。清代私人藏书之盛，使刻书成为宣扬善本、交换图书、补充藏书的重要手段。清代家刻的代表人物有周亮工、朱彝尊、徐乾学、黄叔琳、卢见曾、卢文弨、袁枚、鲍廷博、吴骞、孙星衍、张敦仁、张海鹏、黄丕烈、阮元、梁章钜、孔继涵、秦恩复、金山钱氏、蒋光煦、伍崇曜、汪士钟、胡克家、缪荃孙、王先谦、刘喜海、黎庶昌、叶德辉、罗振玉等人。下面重点介绍一下周亮工、鲍廷博、张海鹏、

黄丕烈、金山钱氏、伍崇曜、缪荃孙、王先谦、叶德辉、罗振玉等人的刻书情况。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一字减斋），号栎园，河南祥符（今开封市）人。明崇祯进士，授监察御史。仕清后，任户部右侍郎等职，曾被劾下狱，有《赖古堂集》、《书影》、《读画录》、《印人传》等。周亮工是清代家刻的先驱人物，刻有《天中四君子集》、《黄汉臣集》、《王王屋文集》、《盛此公文集》、《马元御赋》、《中左史宫词》等。周亮工一生“大要有三善：一曰笃故旧，二曰奖人才，三曰搜遗佚”。①在刻书方面也是如此，所谓“笃故旧”就是千方百计刊行亲朋故友的有价值的著作。其友王于一为“一时文人杰士”，“交游半天下”，然死日“囊无一钱，至不办棺殓”，遑论刻书。周亮工不负亡友，多方筹资刊行《王于一遗稿》。②其友黄汉臣于弥留之际，“以大集见属”，周亮工慨然肩负刻书之任，还写了一篇《追报亡友黄汉臣书》。③所谓“奖人才”就是千方百计刊行旷世之才的著作。例如王王屋“少挺杰，姿名满天下，中州之士皆震慑”，周亮工“虽未交王屋，而悲王屋抱才而厄”，因刻《王王屋文集》。所谓“搜遗佚”，就是千方百计网罗放失，刊行遗稿，例如南陵盛于斯（字此公）著述甚丰，惜多不传，周亮公专门派人到盛家抄其遗书，盛母含着泪说：“儿著书咸为人窃去，惟存诗若干。老年人坐则悬之肘，卧则枕之。老年人不即填沟壑者，怜吾儿并数寸之书亦不传耳，今且托之周君。”④周亮工刻的许多书都是在明末清初战火纷飞的社会环境中完成的，对于文化典籍的流传作出了贡献。

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渌饮，安徽歙县人，后

---

① （清）周亮工：《赖古堂集》附《墓志铭》。

② 同上书《王于一遗稿序》。

③ 《赖古堂集·追报亡友黄汉臣书》。

④ 同上书《盛此公传》。

侨居杭州，著名藏书家。鲍氏精于鉴赏，“每一过目，即能记其某卷某页某讹字，有持书来问者，凡某书美恶，所在意旨，所存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抄刻，真伪若何，校误如何，无不矢口而出，按之历历不爽”。①鲍氏筑室贮书，取《礼记》中“学然后知不足”之语，名其斋曰“知不足斋”。鲍氏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始刻《知不足斋丛书》，到嘉庆十九年（1814年）鲍氏去世为止，共刻二十七集。其子继承先父遗志，完成未竟之业，至道光初年又刻三集。经过两代人50年的艰苦努力，总共刻印三十集、二百零七种、七百八十卷。《知不足斋丛书》是以精善著称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在古代书林中独树一帜，大放异彩。

张海鹏（1775～1816），字若云，号子瑜，江苏常熟人，著名藏书家。张氏精研经学，并以剞劂自任，他说：

> 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其道不更广耶？②

张氏生活简朴，然在刻书方面却不遗余力，所刻《学津讨原》、《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抄》三大丛书，共计442种、2008卷。《学津讨源》多收有关经义实学、朝章典故、遗闻轶事之书，间及书画谱录，去取颇为审慎。《墨海金壶》广搜四部，博采九流。《借月山房汇抄》专收明清两朝著述，“论必雅而不俚，事必信而可考，言必实而可施”。③此外，张海鹏还刻有《太平御览》等书。

---

① 《清史列传·鲍廷博》。

② 《藏书纪事诗》卷六。

③ 《借月山房汇抄·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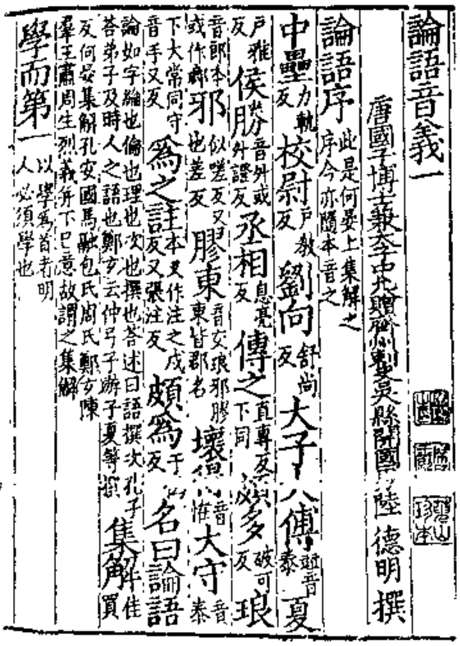


图13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黄丕烈刻本《论语音义》

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一作绍圃），号荛圃、荛夫、复翁等。江苏吴县人。一生无意仕进，不喜声色狗马，一意藏书、读书、校书和刻书。据《士礼居刊行书目》著录，黄氏刻有《国语》、《汲古阁书目》、《国策》、《博物志》、《季沧苇书目》、《百宋一廛赋》、《梁公九谏》、《焦氏易林》、《宣和遗事》、《舆地广记》、《藏书纪要》、《三经音义》(图13)、《仪礼》、《汪本隶释刊误》、《船山诗草选》、《周礼》、《洪氏集验方》、《夏小正》、《伤寒总病论》、《同人唱和集》等20种书。黄氏刻书慎选底本，以宋本作为底本的有《国语》、《国策》、《宣和遗事》、《舆地广记》、《仪礼》、《洪氏集验方》和《夏小正》七种；以影宋本作为底本的有《三经音义》、《伤寒总病论》和《博物志》三种；以稿本作为底本的有《季沧

莽书目》、《百宋一廛赋》、《汪本隶释刊误》和《同人唱和集》四种。晚出之本，只要刻得好，同样可以作为底本，例如《周礼》即据明嘉靖本刻印。黄氏在《周礼》重刻序中说：

> 旧藏嘉靖本字大悦目，颇宜老眼，末有经注字数，其出宋本无疑。仿此开雕，行款悉遵，而幅式稍狭于经注。讹舛之字，悉校宋刻正之，董本（即宋董氏集古堂本）为主，此外参以家藏之岳本、蜀大字本，又借诸家之小字本、互注本、校余氏本，集腋成裘，以期美备。至于嘉靖本之独胜于各本者，其佳处不敢以他本易之，存其旧也。此刻系校宋本，非覆宋本，故改字特多，然必注明以何本改定，非妄作也。若字之可疑者仍之，而于校语中标出字缺疑之义也。刊成之日，附校语一卷，以俟读是书者取证焉。嘉庆戊寅孟冬。

由此可见，黄氏刻书态度之严谨。开雕之前，网罗众本参校，“集腋成裘，以期美备”；开雕之中，决不妄改古书，“字之可疑者仍之”，缺疑之义附于卷末校语中。

金山钱氏是刻书世家。钱氏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开始刻书，一直刻到光绪年间。其刻书时间之长、刻书数量之多，在清代家刻中是首屈一指的。钱氏刻书著名者有钱树本、钱树芝、钱树堂、钱熙祚、钱熙载、钱熙辅、钱培益、钱培名、钱润道、钱润功等。其中钱树本刻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国策》等；钱树堂、钱树立刻有《经余必读》、《醉经楼经验良方》等，钱树芝刻有《温热病指南集》等；钱熙祚刻有《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等；钱熙彦、钱熙载刻有《元诗选》、《元史类编》等；钱熙辅刻有《艺海珠尘》、《壬癸集》等；钱培名刻《小万卷楼丛书》等；钱润道、钱润功刻有《钱氏家刻书目》等。

伍崇曜，字紫垣，南海人。其父经商，为南海巨富，这是伍崇曜从事刻书活动的经济基础。另外，著名学者谭莹寄食门下，是伍崇曜从事刻书活动的学术基础，据《清史稿·谭莹传》记载：

谭莹，字玉生，南海人。弱冠应县试，总督阮元游山寺，见莹题壁诗，惊赏，告县令曰："邑有才人，勿失之！"令问姓名，不答。已而得所为赋以告元，元曰："是矣。"逾年，元开学海堂课士，以莹及侯康、仪克中、熊景星、黄子高为学长。莹性强记，述往事，虽久远，时日不失。博考粤中文献，友人伍崇曜富于赀，为汇刻之，曰《岭南遗书》五十九种，曰《粤十三家集》、曰《楚门耆旧遗诗》，益扩之为《粤雅堂丛书》。

伍氏所刻之书，均由谭莹为之校订，其书卷尾题跋皆谭莹手笔，间有嫁名伍氏者。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清末著名史学家、教育家、藏书家和出版家。他刻的书有《云自在龛丛书》五集十九种、《对雨楼丛书》五种、《藕香零拾》三十八种、《烟画东堂小品》十二种等。田洪都在《艺风堂藏书再续记·序》中说：

（缪荃孙）一生与刻书为缘，孤稿秘籍，多赖流布，广人见闻，裨益文化之功，可谓至巨。

除自刻书外，还为姚彦侍校刻过《咫进斋丛书》，为盛宣怀校刻过《常州先哲遗书》和《续刻常州先哲遗书》。缪氏晚年还为刘聚卿、刘翰怡、张石铭等编刻过丛书。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同

治进士，历官编修、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著有《汉书补注》、《荀子集解》、《尚书孔传参正》、《后汉书集解》、《庄子集解》、《日本源流考》等。刻有《东华录》、《东华续录》、《魏郑公谏录》、《文贞年谱》、《文贞故事拾遗》、《新旧唐书合注》、《郡斋读书志》、《天禄琳琅书目》、《皇清经解续编》、《南菁书院丛书》、《十家四六文抄》、《六家词选》、《世说新语》、《盐铁论》、《合校水经注》、《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骈文类纂》、《日本源流考》、《律赋类纂》、《虚受堂文集》等。以上各书或王氏所自著，或王氏所自校，或以著者稿本作为底本付刻，或以旧本作为底本付刻，质量也是比较好的。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直山（一号郎园），湖南长沙人。叶氏虽然思想反动，但其热心古书的收藏和校勘工作，是清末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著有《观古堂藏书目》、《藏书十约》、《书林清话》等。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劝刻书说》中曾说：

> 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刻书不择佳恶，书佳而不雠校，犹糜费也），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

叶氏非常赞同这番议论，他在《书林清话》一开篇就引用了这段话，并身体力行。据有关资料统计，叶氏刻书多达160余种。由于他精研版本，尤重刻印书目著作，《观古堂书目丛刊》汇辑了包括《南雍志·经籍考》、《万卷堂书目》、《古今书刻》在内的

15种书目。《郎园读书志》是叶德辉藏书题跋的汇辑。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辛亥革命后，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图谋复辟。后又积极参与制造伪满洲国的汉奸活动。罗氏从事甲骨文的收集和研究工作，有《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等著作。罗氏刻印书籍甚多。宣统二年（1910年）刻《玉简斋丛书》二十二种，宣统三年(1911年）刻《宸翰楼丛书》五种。民国时期，罗氏影印有《永慕园丛书》、《云窗丛刊》、《吉石庵丛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嘉草轩丛书》；石印有《七经堪丛刊》、《百爵斋丛刊》等；排印有《雪堂丛刊》、《贞松老人遗稿》等。

以上10位出版家仅是清代家刻的代表。

五、北京琉璃厂刻书及其它

细雨无尘驾小车，
厂桥东畔晚行徐。
奚童私向舆夫语：
"莫典春衣又买书。"

这是清人潘际云写的一首诗。① 清代文人居客北京，无不往游琉璃厂访书。王士禛、孙星衍、黄丕烈、李慈铭、张文虎、叶昌炽、缪荃孙等都在琉璃厂留下他们的足迹。琉璃厂在北京南城，本名海王村。明清两代在此设窑烧制琉璃砖瓦，供营建宫殿、王公邸舍之用，从明代开始，琉璃厂即有书市出现，书市至清而大盛，据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概述》：

琉璃厂书市发展时期，当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

①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概述》。

库开馆之日起。当时参与工作者多系翰詹中人，且多寓居宣南，而琉璃厂地点适中，与文士所居密迩，又小有林泉，可供游赏，故为文人学士所常至，书市乃应其需要而设。

除了书市贸易之外，不少书坊还从事刻书活动。

清代琉璃厂计有文光楼、富文堂、晋华书局、文盛堂、同善堂、善成堂、文汇阁、近文斋、三槐堂、半松居士、文明斋、二酉斋、怀文堂、龙威阁、正文斋、九经阁、有益堂、希古堂、奎文堂、文道堂、宝经堂、宏文堂、藜光阁、纯华阁、书业堂、修本堂、酉山堂、玉生堂、来鹿堂、鉴古堂、文远堂、文澜堂、荣禄堂、松筠阁、荣锦书屋、文宝堂、文华堂、宏道堂、宏远堂、文贵堂、荣华堂、修文堂、文友堂、多文堂、翰文堂、古芬阁、书业公司、龙文阁、会文斋刻书铺、龙云斋刻字铺、聚魁堂、五柳居等书肆120余家。其中富文堂、文盛堂、善成堂、近文斋、半松居士、二酉斋、龙威阁、正文斋、有益堂、奎文堂、宝经堂、藜光阁、书业堂、酉山堂、来鹿堂、鉴古堂、文澜堂、荣禄堂、荣锦书屋、文宝堂、宏道堂、文贵堂、荣华堂、文友堂、翰文斋、书业公司、会文斋刻字铺、龙云斋刻字铺、文富堂、聚魁堂、五柳居等30余家书肆都在清代刻过书。

富文堂（亦名双峰书屋）主人饶玉成，字新泉，抚州人，咸同间设肆于厂东门内路北。刻有《皇明经世文编》、《余墨偶谈》、《十三经注疏》、《全唐诗》、《宝绘录》、《昭明文选》等。

文盛堂主人王氏，江西人，光绪间设肆于厂西门外。刻有《关帝事迹征信编》、《元龙杂字》、《六部成语》等。

善成堂主人汤祥瑟，道光间设肆于厂东门内路南。门口有大字广告和对联，广告云："内藏各省新旧书籍，照行发兑。"对联云："善言善行，其则不远；成己成物，斯文在兹。"该堂于诸肆之中刻书最多，计有《监本书经》、《唐诗三百首补注》、

《说唐前传》、《徐氏十二种》、《证道秘书十种》、《第一才子书》、《古文辞类纂》、《南北宋志传》、《诗义折中》、《幼学故事琼林》、《本草原始》等49种。①

近文斋主人不详，道光九年（1829年）刻《产科四十三症》。

半松居士姓氏不详，刻《贰臣传》、《南疆绎史勘本》等。另有木活字本《明季南略》、《明季北略》等。

二酉斋主人徐春祐，江西人，光绪四年（1878年）设肆于厂东门内路南，刻《鉴撮》等。

龙威阁主人李氏，江西人，咸丰间在厂设肆，刻《北徼汇编》等，另有木活字本《小腆纪年附考》。

正文斋主人谭锡庆，字笃生，河北冀县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开肆于文昌会馆，刻《长安获古编》等。

有益堂主人邓存仁，字峻山，河北束鹿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厂设肆，刻《汇刻书目》、《五方元音》、《儿女英雄传》等。

奎文堂主人魏清彬，字文甫，河北冀县人，光绪间在厂设肆，刻《客窗闲话》正续集。

宝经堂主人程永年，河北冀县人，光绪间在厂设肆，刻《绣像第一才子书》等。

藜光阁主人姓氏不详，江西人。咸丰间设肆于厂东门内。刻有《三字经注解备要》、《百家姓考略》、《千字文释义》等。

书业堂主人崔贞礼和韩均。崔贞礼，字玉峰，山西长治人；韩均，字重恒，河北深县人。同治间在厂设肆，刻《景德镇陶录》等。

酉山堂主人李澎，字月潭，河北冀县人，光绪间在厂设肆，刻《十五家妙契同岑集谜选》等。

① 孙殿起、雷梦水：《记厂肆刊本书籍》，载《琉璃厂小志·书肆变迁记》。

来鹿堂主人王永田，河北深县人，咸丰间在厂设肆，刻《平易方》、《太上感应篇图说》、《芥子园诗经》等。

鉴古堂主人韦氏，湖州人。何时设肆于厂，时间未详。刻有《辑宋诗抄》等书。

文澜堂主人孙占熹，光绪间在厂设肆，刻《东塾读书记》等。

荣禄堂主人丁福铖，字蕴卿，河北束鹿人，光绪十年(1884年)在厂设肆，刻《朝市丛载》、《洗冤录详议》、《经略洪承畴奏记》、《奏折谱》、《庸吏庸言》、《都门纪略》等。

荣锦书屋主人不详，刻《满洲名臣传》、《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汉名臣传》等。

文宝堂主人曹氏，江西人，同治间在厂设肆，刻《字法举一歌》等。

宏道堂主人程存立，字书屏，河北冀县人，光绪间在厂设肆，刻《笠翁对韵千家诗》等。

文贵堂主人魏显泰，字履庵，河北冀县人，光绪间在厂设肆，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

荣华堂主人张瑞亭，天津宝坻人，光绪间在厂设肆。刻《圆通广禅师语录》等。

文友堂主人孙占良（字殿臣）和孙占云（字宇澜），河北冀县人，光绪八年（1882年）在厂设肆，刻《吉金志存》、《宸垣识略》、《古今集联》、《明诗纪事》、《中国艺术家徵略》、《太平广记》等。

翰文斋主人韩俊华，字星垣，河北衡水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厂设肆。刻《元遗山先生全集》、《潘刻五种》、《贷园丛书初集十二种》、《樊川全集》、《清秘述闻》、《墨缘汇观计法书》、《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百宋一廛赋注》、《钦定蒙古源流》、《思补斋笔记》，《恩福堂笔记》等。

书业公司主人刘学江（字子涵）和祁书山（字酉峰），河北

衡水县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厂设肆，刻《冬心先生集》等。

会文斋刻字铺主人不详，刻《阴骘文图说》等。

龙云斋刻字铺主人不详，刻《太上感应篇图说》等。

聚魁堂主人不详，设肆于厂西门外南柳巷，以刻印《连镇跑》、《红旗学》、《头本康有为进书》、《查抄康有为》、《红灯照叹十声》等小唱本为业，内容多与时事有关，这些唱本用极为粗糙的毛边纸刷印，每本仅三五页。

五柳居主人陶正祥，字庭学，江苏吴县人，乾隆时设肆于琉璃厂路北，精通版本之学。刻有《十三经注》、《太玄经集注》等。

以上是清代琉璃厂书肆刻书的大概情况。这些书肆除刻经史著作之外，尤重字书、医书、通俗小说等民间常用书籍的刻印。这些书发行量大，经济效益显著。不少书肆主人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据《琉璃厂小志·概述·海王村人物》：

> 至书肆主人，于目录之学，尤终身习之者也。光绪初，宝森堂之李雨亭、善成堂之饶某，其后又有李兰甫、谭笃生诸人，言及各朝书版、书式、著者、刻者，历历如数家珍，士大夫万不能及焉。

乾嘉以来，琉璃厂书肆多由江西人经营，代之而起的是河北南宫、冀县一带的人。

除了琉璃厂之外，清代北京隆福寺等处的著名书肆还有同立堂、聚珍堂、宝书堂、三槐堂、明经堂、带经堂、文奎堂、文元堂、镜古堂、文成堂、老二酉堂等。其中聚珍堂、宝书堂、文成堂、老二酉堂等也出版了不少图书。聚珍堂主人刘英烈，字魁武，河北束鹿人，以摆印木活字本著称于世，根据孙殿起、雷梦水《记厂肆坊刊本书籍》记载，该堂摆印的木活字本有《王希廉

评红楼梦》、《红楼梦影》、《儿女英雄传》、《御制悦心集》、《想当然耳》、《三侠五义》、《文虎》、《济公传》、《聊斋志异拾遗》、《蟋蟀谱》等。此外，该堂还刻印有《孙子兵法》、《幼学琼林》、《书经》、《御制翻译四书》、《清语摘抄》、《初学必读》、《四书章句》、《红楼梦赋》、《满文圣谕广训》等。宝书堂主人李兰芳，字香林，河北冀县人，刻有《蒙古游牧记》等书。文成堂主人高致平，字均亭，河北深县人，刻有《牛马经》、《新注韵对千家诗》、《龙文鞭影》、《唐诗三百首注释》、《绣像升仙传》、《监本易经》、《监本书经》、《小学集注》、《监本诗经》、《四书备旨》等。老二酉堂主人陈氏，河北束鹿人，刻有《四书章句》、《说岳全传》等书。

总而言之，北京作为清代都城，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而且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琉璃厂等处书肆刻书就是一个例证。

六、清代刻书的特点

综观清代刻书情况，其刻书特点如下：

第一，就刻书时间而言，前期比较发达，康雍乾三期刻书最多。清代后期，尤其是在石印技术传入中国以后，雕板印刷日暮穷途，不少书坊主要从事书业贸易活动，刻书是其余事。

第二，就刻书地区而言，和明代一样，分布地区较广，通都大邑，无不刻书。但比较而言，北京和江浙地区刻书最多。北京为清代都城，中央官刻都在这里进行。清代中期以后，琉璃厂的坊刻也比较发达。江浙地区文化基础较好，藏书家大多兼事刻书，不少学者也把刻书视为不朽之盛事。位于江浙地区的南京为江南一大刻书中心，全国各地的书商常年在这里贩书。清李绿园《歧路灯》第九十七回说：

现今舅氏吩咐，要在河南省城开一座大书店，在南京发了数千两银子典籍，所雇车辆就在书店街喂着。

可见河南省城开封的书商是从南京贩书的，一次就买了"数千两银子"，书数之多，可想而知。在南京众多的书坊之中，李光明庄尤其著名。李光明，字榕峰，号啸星樵人，室名何陋居，刻书167种。所刻各书版心下有"李光明庄"四字，书首或冠广告文字，书末或附刻书目录。另外，东昌刻书也比较发达，东昌即今山东聊城地区，下辖聊城、堂邑、博平、茌平、清平、莘、冠、恩、馆陶、高唐十县。自元代以后，东昌为南北漕运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刘鹗《老残游记》第七回中书店掌柜对老残的一段话正反映了东昌的刻书情况：

我们这东昌府，文风最著名的。所管十县地方，俗名叫做"十美图"，无一县不是家家富足，户户弦歌。所有这十县用的书，皆是向小号来贩。小号店在这里，后边还有栈房，还有作坊，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板，不用到外路去贩买的……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即《三字经》）、百（即《百家姓》）、千（即《千字文》）、千（即《千家诗》），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

东昌刻工也有到外地谋生的，例如北京文成堂刻《四书备旨》、《大学》等书就是由东昌府堂邑县刻工杨金雄雕版的。

第三，就刻本内容而言，丛书较多。《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2797种丛书中，清代丛书占绝大多数。现存历代郡邑丛书152种，清代有74种；现存历代族姓丛书228种，清代有131种；现存历代数学丛书27种，清代有24种。清初丛书往往汇集短书小品，例如《水边林下》收书59种，每种各一卷；《檀几丛书》以"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为序，分为十帙，所收各书均一卷；

《昭代丛书》收集90种，每种各一卷。曹溶辑《学海类编》八百一十卷，一反清初丛书的旧制，始向博大发展。该书分经翼、史参、子类、集余四个大类，集余又分行诣、事功、文词、记述、考据、艺能、保摄、游览等八个小类，收书441种，每书不再限于一卷，所收《韵语阳秋》和《梦粱录》多达20卷。规模博大的丛书还有《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学津讨源》、《墨海金壶》、《玉函山房辑佚书》、《艺海珠尘》等。清人汇刻丛书主旨各异：或以汇辑罕见之书为宗旨，例如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所收207种书多海内异书，每书均为足本，校勘也比较精审，在清代影响很大，后有高承勋辑《续知不足斋丛书》、佚名辑《仿知不足斋丛书》、鲍廷爵辑《后知不足斋丛书》等。顾修辑《读画斋丛书》专收《知不足斋丛书》未收之书，体例全仿鲍氏。金忠淳辑《砚云甲乙编》五十卷，所收16种书大多是流传较少的写本。或以汇刻宋元善本为宗旨，黎庶昌辑《古逸丛书》一百八十六卷，所收27种书亦多古本逸编。郁松年辑《宜稼堂丛书》二百五十五卷，所收12种书皆元明旧本，世不多见。或以校雠精审为宗旨，这类丛书多由著名学者校勘，例如卢见曾辑《雅雨堂丛书》由惠栋校勘；吴骞辑《拜经楼丛书》由江声校勘；毕沅辑《经训堂丛书》由孙星衍等校勘；孙星衍辑《平津馆丛书》由顾千里校勘；钱熙祚辑《守山阁丛书》由张文虎等校勘。除了丛书之外，为了科举的需要，民间刻印举业著作也很多。一些号称"选家"的文人墨客动辄为人选批书籍，其书泛滥成灾。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卫体善、马纯上、匡超人、季苇萧、萧金铉等一批"选家"的形象。该书第二十回有匡超人的一段话：

> 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

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抛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

这里“房书”指进士的文章，“行书”指举人的文章。总而言之，都是些八股文之类。匡超人在六年之中，选了95本书，平均每年16本，可见速度之快。每种书卖掉一万部，可见印数之多。

第四，就版式而言，左右双边多，白口多。不少刻本都有书名页，书名页正中刻大字书名，右上小字刻著者姓名，左下小字刻藏版者或刻印者，这为鉴定版本提供了方便。至于清代刻本的字体，纸张、装订、讳字等，请参阅第三编第二章。

第八章　太平天国刻书及其它

一、太平天国刻书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为了教育和发动群众，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非常重视宣传工作，刻印图书就是他们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手段。

知见刻书目录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今南京）以后，专门设立镌刻营和刷印衙，每天都有数百人坚持刻印图书。起义军打到哪里，印刷品就散发到哪里，起义军甚至随身携带版片，每攻克一处，就刷印一处，到处散布革命的火种。1955年在山西临汾刘村发现太平天国刻印的《幼学诗》封面刻板一块。据《临汾县志》记载，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太平军将领李开芳、林凤祥曾率部在临汾与清兵激战。该板当是太平军北伐部队的遗物。太平天国到底刻印了多少图书？由于清廷的焚毁以及文献资料的缺乏，很难作出精确的统计。现根据《旨准颁行诏书总目》、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荣孟源《太平天国所刻书考略》、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等有关资料开列知见书目如下：

书　　名	刻印时间	页数	行　款
幼学诗	辛开元年(1851年)	14	
太平礼制	辛开元年(1851年)	7	8行22字
天条书	壬子二年(1852年)	9	10行23字
幼学诗（重版）	壬子二年(1852年)	14	
天命诏旨书	壬子二年(1852年)	14	9行22字
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	壬子二年(1852年)	13	10行23字
太平诏书	壬子二年(1852年)	14	10行24字
太平军目	壬子二年(1852年)	34	
太平条规	壬子二年(1852年)	5	6行22字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	壬子二年(1852年)	26	
颁行诏书	壬子二年(1852年)	10	10行24字
旧遗诏圣书	癸好三年(1853年)		
新遗诏圣书	癸好三年(1853年)		
幼学诗（重版）	癸好三年(1853年)	14	
三字经	癸好三年(1853年)	18	
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	癸好三年(1853年)		
天父上帝言题皇诏	癸好三年(1853年)	5	
天朝田亩制度	癸好三年(1853年)	8	10行20字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历	癸好三年(1853年)	26	
建天京于金陵论	癸好三年(1853年)		
贬妖穴为罪隶论	癸好三年(1853年)		
诏书盖玺颁行论	癸好三年(1853年)		
天理要论	甲寅四年(1854年)	25	
御制千字诏	甲寅四年(1854年)	14	
太平救世歌	甲寅四年(1854年)	51	
天情道理书	甲寅四年(1854年)	51	
行军总要	乙荣五年(1855年)	26	
天父诗	丁巳七年(1857年)	292	
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新历	丁巳七年(1857年)	26	
醒世文	戊午八年(1858年)	8	

书名	刻印时间	页数	行款
太平礼制续编	戊午八年(1858年)	8	
资政新篇	己未九年(1859年)	25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	庚申十年(1860年)	46	
福音敬录	庚申十年(1860年)	9	10行24字
钦定士阶条例	辛酉十一年(1861年)	33	
诛妖檄文	辛酉十一年(1861年)	13	
钦定英杰归真	辛酉十一年(1861年)	46	8行20字
钦定军次实录	辛酉十一年(1861年)	30	
钦定制度则例集编			
武略书			
太平天日		36	
开国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		14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会试题		2	
幼主诏书		5	7行15字
敬避字样			
改定四书五经			
忠王会议辑略			

以上各书除了《太平天日》为铜版外，其余均为木版。

刻本特点

太平天国刻本有如下六个特征：

第一，封面的设计大体相同，中间是大字书名，两边是二龙戏珠装饰图案，下边是波涛图案，上边用小字题“太平天国××××年新刻”字样（图14）。

第二，字体多横细竖粗的匠体字。

第三，有不少代用字，如以“添”代“夫”、以“花”代“华”、以“鉴”代“镜”、以“绣”代“秀”等。地支中的丑、卯、亥三字分别用好、荣、开代替，干支纪年“辛亥”改为





图14　太平天国刻本封面

“辛开”、“癸丑”改为“癸好”、“乙卯”改为“乙荣”。

第四，多用白话文。辛酉十一年（1861年）洪仁玕等奉天王洪秀全之命张贴布告说：“嗣后本章禀奏以及文移书启，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才合天情，才符真道，切不可仍蹈积习，从事虚浮，有负本军师等谆谆谕戒之至意焉。”这反映了太平天国在文学方面的革新思想。《三字经》、《御制千字诏》等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政治主张，更易为群众所接受。

第五，使用了“·”、“。”、“—”、“═”等几种简单的标点符号。“·”用在句中停顿处；“。”用在句末；“—”用于人名右侧；“═”用于地名、国名、朝代名右侧。《天父诗》第265首有两句诗：“一直是名读某名，双直地名读出声。”说的就是上述第三、四种标点符号。

第六，就内容而言，太平天国刻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诏令。诏令体现了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战略决策，要做到家喻户晓，需要量大，单靠口头宣传或人工抄写，供不应求，

采用雕版印刷，便可大大提高效率。（二）典制图书。太平天国运动参加人数之多、席卷范围之广，史无前例。这样大的运动，要做到整齐划一，就必须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加以约束，否则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典制图书体现了太平天国建立新秩序的具体制度和措施。（三）军事著作。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战争推翻封建统治，打仗是第一位的工作，怎样打仗？《太平军目》、《太平条规》、《行军总要》等书就体现了太平天国运动首领的军事思想。另外，还刻印了一些古代兵书名著，如《武略书》就是汇刻《孙子》、《吴子》、《司马法》而成的。（四）历书。太平天国二年开始颁行新历，现存太平天国历书只有三年、四年、八年、十一年四种，其余各年历书均未发现。（五）诗文集。诗集如《天父诗》、《幼学诗》等，《天父诗》收录了洪秀全的500首诗，《幼学诗》曾多次刻印，可见需求量之大。文集如《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诏书盖玺颁行论》等。《建天京于金陵论》收录了何震川等41个人的论文41篇。以上各书的篇幅都不长，超过40页的只有《天父诗》等4种，大多在20页以下，最少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已未九年会试题》只有2页。《太平条规》和《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只有5页。篇幅短小，易于大量散发，有利于发动群众。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刻书方面的成绩还是不小的，可惜有不少太平天国刻本流入国外，国内传本屈指可数，为我们研究太平天国刻书增加了不少困难。

二、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

民国时期出版了大量线装古籍，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古籍出版概况

据有关资料统计，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家至少有500家。它

们分布在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湖南、广东、湖北、广西、浙江、四川、陕西、山东、安徽、河南、河北、江西、吉林、贵州、云南、福建、山西等广大地区，其中，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是古籍出版业的中心地区。仅就《中国丛书综录》统计，上海的古籍出版家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书店、古书流通处、大东书局、广益书局、扫叶山房、世界书局等60余家；北京的古籍出版家有直隶书局、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燕京大学、富晋书社等20余家；浙江的古籍出版家有西泠印社、绍兴墨润书苑、归安沈氏、乌程张氏、吴兴张氏、刘承干嘉业堂等30余家；江苏的古籍出版家有苏州文学山房、昆山赵氏、无锡杨氏、苏州李氏、常熟丁氏等30余家。

雕版与活字

就出版形式而言，采用雕版印刷这种传统制作方式的有乌程秦氏、合肥蒯氏、刘承干、武进赵氏、侯官郭氏、董康、陶湘、合肥王泽华、成都义生堂、龙溪林氏、张钧衡、东莞张氏、渭南严氏、四明张氏、刘世珩、瑞安陈氏、嘉兴朱氏、徐乃昌、蒋汝藻、怡兰堂、朱孝臧、建德周氏、苏斋、陈准、郑国勋、归安朱氏、华亭封氏、顺德龙氏、甘鹏云等五六十家，下面重点介绍数家。

刘承干（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浙江吴兴南浔人。其祖刘镛为南浔首富，其父刘锦藻为光绪二十年(1844年)进士，清末著名学者。刘承干自幼刻意读书和藏书，是清末民国时期的著名藏书家。除了藏书之外，刘氏也很热心刻书，他先后刻过《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留余草堂丛书》、《求恕斋丛书》、《章氏遗书》、《四史》、《王章诗存合刻》、《辽东三家诗抄》、《嘉业堂金石丛书》等。其中《吴兴丛书》收吴兴乡贤著作，《求恕斋丛书》则录近人著述、稗史、年谱、地理艺文等。从民国二年（1913年）到民国七年（1918年），刘承干

共刻书100余部，选择其中50部，并附以《张燕公集》、《刘宾客集》等成为《嘉业堂丛书》。这部丛书所收都是“世间不经见之书，”底本“则兼采海内外藏书家”，刻工“则征之上海、苏州、扬州、金陵”。[①]刘氏刻书的态度十分严谨，每刻一书，事先必请专家学者审定。所刻《章氏遗书》是著名历史学家沈曾植推荐的；《嘉业堂金石丛书》是著名金石学家褚德彝校订的。吴昌硕、王国维、张元济、罗振玉、缪荃孙、叶昌炽等不少学者都为刘氏刻书作过贡献。刘氏除了刻印社会上通行的著作之外，还刻了一些清代禁书，如屈大均《安龙逸史》、李清《三垣笔记》等，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评论说：

> 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每种书的末尾，都有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的跋文，他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

董康，字授经，江苏武进人，室名诵芬室。刻有《广川词录》、《杂剧三集》、《诵芬室丛刊》等。《诵芬室丛刊》刻于清光绪至民国间，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令人赏心悦目。

陶湘，字兰泉，江苏武进人，室名涉园。刻有《儒学警悟》、《百川学海》、《涉园墨萃》、《托跋廛丛刊》等。董康、陶湘两位出版家所刻之书，多由北京琉璃厂文楷斋刻印。文楷斋创立于民国八年（1919年）正月十六日，是专门承办刻书业务的书坊，刻工多至三四百人，其中写工30余人。民国期间琉璃厂书肆印书者除了文楷斋之外，尚有印行《清秘述闻》、《樊川全集》、《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钦定蒙古源流》等书的翰文斋，印行《诗经》、《书经》、《山带阁注楚辞》、《广韵》等书的来薰

① 刘承干：《嘉业堂丛书·自序》。

阁，印行《琴谱谐声》、《巢经巢诗抄》、《声韵考》、《许氏说音》等书的松筠阁，印行《西夏书事》、《南曲九宫正始》、《都市丛谈》的文奎堂，印行《抱经堂丛书》、《文渊楼丛书》等书的直隶书局，印行《衹平居士集》等书的修绠堂，印行《过庭录》等书的开明书局，印行《音注韩文公文集》、《周礼郑注》等书的文禄堂，印行《二洪遗稿》、《鹤寿堂丛书》等的通学斋，印行《西厢记》等书的富晋书社，印行《邃雅斋丛书》、《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等书的邃雅斋，等等。

张钧衡，字石铭，号适园主人，浙江吴兴人，刻有《适园丛书》、《择是居丛书》等。《适园丛书》"择本必善，选工必精"，①其中《内阁藏书目录》、《千顷堂书目》、《敬乡录》、《群雄事略》等前人从未刻过；《月隐先生遗集》、《魏书地形志校录》前人虽有刻本，但流传极少。

刘世珩，字聚卿，安徽池州人。自幼刻书，凡二十年。刻有《玉海堂影宋元本丛书》、《贵池先哲遗书》、《暖红室汇刻传奇》、《聚学轩丛书》、《宜春堂影宋巾箱本丛书》等。

徐乃昌，安徽南陵人，刻有《南陵先哲遗书》、《随庵丛书》、《积斋丛书》等20种丛书，这些书大多是清代乾嘉道咸四朝鸿生巨儒所著，未尽刊布者。

朱孝臧，原名祖谋，字古微，号彊村（一号沤尹），浙江归安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所刻词总集《彊村丛书》是中国文学史上规模较大的刊刻词集之举，该书包括唐至元代词总集5种，别集174种，材料丰富，校刊颇精，为词学研究者所重视。

陈准，字绳夫，浙江瑞安人，室名湫漻斋，刻有《湫漻斋丛书》等。该书收录了人所罕见的古籍书目和金石著作，例如清代著名藏书家和版本学家孙庆增有《上善堂宋元版精抄旧抄书目》，该目著录宋版55种、元版76种、名人抄本89种、影宋旧本72种、

① 缪荃孙：《适园丛书·序》。

旧抄本145种。陈氏通过其友赵诒深的推荐，将该目收入《湫漻斋丛书》。

甘鹏云，湖北潜江人，刻有《崇雅堂丛书初编》，刻工是陶子麟、陶尧钦、陶舫溪等。陶子麟，湖北黄冈人，江阴缪氏、宜都杨氏，常州盛氏、南陵徐氏、贵池刘氏等所刻诸籍多出其手。陶氏精于影刻，他所影刻的宋元善本，几可乱真。陶尧钦、陶舫溪是其族人。

木活字印刷也是一种传统的图书制作方式，民国时期仍然后继有人。例如苏州文学山房摆印的《江氏聚珍版丛书》，秦宝瓒摆印的《冷红馆全集》，桐城翰宝斋摆印的《华胥赤子遗集》，味经堂摆印的《秦氏三府君集》，西泠印社摆印的《蕉窗九录》和《遁庵丛编》等。

影印与铅印

除了传统的制作方式之外，多数出版家都采用了石印（参看本编第九章第五节）、影印、铅印等现代化的制作方式。采用影印的出版家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上海古书流通处、上海大东书局、上海博古斋、上海贝叶山房、上海千顷堂书局、武进陶氏、上海石竹山房、上虞罗氏等四五十家。其中商务印书馆、上海博古斋、上海古书流通处比较著名。商务印书馆影印有《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十通》等宏篇巨制。《四部丛刊》初编辑印罕见之书323种，其中宋本39种、金本2种、元本18种、影写宋本16种、影写元本5种、校本18种、明活字本8种、朝鲜本4种。《四部丛刊》续编收书81种，《四部丛刊》三编收书73种。百衲本《二十四史》是以善本作为底本汇印的一部大型历史丛书。上海博古斋设在三马路惠福里弄口，主人柳蓉春，苏州洞庭山人。他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实践经验相当丰富，加上与江标等学者过从甚密，亦精通版本之学。据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

（柳蓉春）遇旧本书，入手即知为何时何地所刻，谁家装璜，及某刻为足本、某刻有脱误，历历如数家珍。家本寒素，后积致小康，每得善本，辄深自珍秘，不急于脱售。夜深人静时，招二三知音，从谈藏书家故事，出得新书，欣赏传观。①

博古斋影印有《百川学海》、《拜经楼丛书》、《士礼居丛书》、《守山阁丛书》、《苏斋丛书》、《津逮秘书》、《岱南阁丛书》、《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抄》等。上海古书流通处亦精版本，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说：

大江以南言版本者，书肆以古书流通处为第一。②

该处影印有《知不足斋丛书》、《楝亭藏书十二种》、《老庄正义合编》、《元四家诗》、《汲古阁影抄南宋六十家小集》等。

采用铅印的出版家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苏州文学山房、上虞罗氏、上海广益书局、西泠印社、杭州朱氏、慈溪沈氏、无锡杨氏、梅县古氏、南海黄氏等150余家。其中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比较著名。商务印书馆印有《戊戌六君子遗集》、《孤本元明杂剧》、《宋人小说》、《御纂医宗金鉴》、《说郛》、《涵芬楼秘籍》等。中华书局印有《四部备要》、《辑佚丛刊》、《袖珍古书读本》、《锡山先哲丛刊》、《散曲丛刊》、《杨升庵夫妇散曲》等。其中《四部备要》收书336种，书的内容以实用为主，如经部有《十三经注疏》、《清代十三经新疏》，史部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子部有周秦诸子，集部有历代名家别集。然其底本问题较多。

①② 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古籍出版的特点

那么，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图书制作方式日趋现代化。古老的雕版印刷如从唐代算起，到辛亥革命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千余年之中，雕版印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作出了无可比拟的重要贡献。但是，生产力总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产生，雕版印刷成本高、周期长、效率低等弱点也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自从清代晚期石印技术叩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天起，雕版印刷就开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辛亥革命之后，局势日趋明朗，雕版印刷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民国时期虽然尚有一些出版家继续使用雕版印刷技术制作图书，但绝大多数出版家则顺乎潮流，开始采用新的印刷技术。用现代印刷技术印书，成本低、周期短、效率高，显示了巨大生命力。民国时期虽然时间不长，由于采用先进印刷技术，出书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第二，民国出版古籍丛书的数量很多。早在清代，丛书已经大量出现。民国时期丛书的印行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中国丛书综录》共收录2797种古籍丛书，其中民国印本就有700种左右，约占著录总数的1/4。这就是说，在现存古籍丛书之中，每4种之中，就有1种是民国印本。

第三，官方印书较少，出版业多由私人经营。民国时期，清代晚期各地建立的官书局纷纷倒闭，大多附属于各省图书馆，利用原有版片稍事刷印，间或刻一些新书。从整个中国古代印刷史来看，官刻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只有官刻能够左右形势。然而民国期间官方的主导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

三、佛经刻本

雕版印刷发明之后，佛教信徒捷足先登，采用这种最新技术

刻印了大量佛经，这些佛教刻本成为我国古代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唐五代时期就出现了佛经刻本 除了上文所说的成都唐墓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和王玠刻《金刚经》之外，传世五代佛经印刷品也有两种：一是清光绪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殊师利菩萨像》；一件是吴越王钱俶刻印的《一切如来心秘金身舍利宝箧陀罗尼经》，1924年杭州西湖雷峰塔倒掉，从砖孔中挖出此经，根据题记可知，钱俶共造此经八万四千卷。以上就是仅见的唐五代佛经刻本。下面重点讨论宋代以后佛经的刻印情况。

宋代佛经刻本

宋代规模较大的刻经之举有五次：第一次刻于宋太祖开宝年间。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命张从信等人前往益州（今成都）监雕全藏，历时12年，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刻成。版片运至都城汴梁太平兴国寺印经院，用硬黄纸刷印。该藏用卷轴装，共480函、5048卷。因为该藏始刻于开宝间，故称《开宝藏》。第二次刻于宋神宗元丰年间，元丰三年（1080年），由僧人冲真、普明等发起，始刻于福州东禅等觉院，历时32年，至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刻成，南渡后迭经修补。该藏用经折装，共580函、6400余卷。因为主持人普明在题记中称刻经目的在于“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故称《万寿大藏》，或称《崇宁万寿大藏》，“崇宁”是宋徽宗第二次改元的年号。第三次刻于北宋徽宗政和年间。政和二年（1112年），由蔡俊臣、陈靖以及僧人本明、宗鉴等发起，始刻于福州开元寺，历时60年，至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刻成。该藏用经折装，共567函、6117卷。因为该藏题记中有“毗卢大藏”四字，故世称《毗卢大藏》，“毗卢”是佛名毗卢遮那的略称。《大日经疏·入祕密漫荼罗位品》说：

> 所谓毗卢遮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冥，

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事业，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故以为喻也。

第四次刻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绍兴二年（1132年）湖州（即今浙江吴兴）归安县松亭乡思溪王永从捐资开雕，竣日不详。该经题识中有‘雕经作头”李孜、“印经作头”金绍、“掌经沙门”觉清、“对经沙门”仲谦等衔名 该藏为经折装，共548函、5480卷。因为施主王永从雕刻此经的目的在于劝缘住持圆觉禅院慈受大师怀深，故称《思溪圆觉藏》，简称《思溪藏》。第五次刻于宋理宗绍定年间。绍定四年（1231年）由法忠禅师等发起始雕于平江府（今苏州）碛砂延圣院，该院创设于宋乾道间，绍定四年（1231年）专门设立大藏经局，开雕全藏，历时91年，到了元代至治二年（1322年）才大功告成。该藏对于刻书工人的有关情况记载甚详，从刻工姓名可知，该藏是动员许多家庭刻成的。许多家庭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把雕版印刷当作一项家庭手工业。该藏为经折装，共591函、6362卷。今陕西省图书馆有藏本。因为该藏刻于碛砂延圣院，故称《碛砂藏》。20世纪30年代，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曾将该藏影印发行，装订为593册。以上是宋代五次刻印藏经的大致情况。除此之外，许多施主或刻书家还零星地刻印了不少佛经，如崇宁元年（1102年）石处道等刻《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崇宁间秀州海盐县陈五娘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宝祐三年（1255年）江陵府先锋隘李安检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等等。

辽金佛经刻本

辽国在宋朝影响下，也刻过一部大藏经。因为刻于辽国，故名《辽藏》。又因为辽国系契丹人耶律阿保机所建，亦名《契丹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发现了不少辽代印刷品，其中有《辽藏》十二卷，根据题记可知，《辽藏》刻于圣宗至道宗时

期，① 刻经地点是燕台圣寿寺（即今北京圣寿寺），书手智云等，雕刻者是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潓等，刻经主持人有沙门可元、觉苑等。金皇统九年（1149年）前后，相传有一女子，名叫崔法珍，断臂募刻大藏经，历时30余年，至金大定十三年（1173年）前后竣事。全藏共682帙、约7000卷。施主多为平民，总其成者为解州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 因为该经刻于金代，故名《金藏》；又因为该经原藏山西赵城镇东南四十里广胜寺，故又名《赵城广胜寺藏》。1942年八路军在陈赓等同志领导下，打退日军，从广胜寺抢出该经4330卷，后转交北京图书馆，经北京图书馆多方搜集，现馆藏增至4541卷。

元代佛经刻本

元代佛经刻印也比较多。元人张之翰《西岩集·普照寺藏殿记》曾说：

> 初经之未广也，或以银，或以金，或以血写者尝多；及经之既广也，印于福、印于杭、印于苏，读者益少。

元代刻印藏经可考者有五次：第一次刻于元世祖至元间。至元六年（1269年）由僧人道安、如一等发起刻于杭州路余杭大普宁寺，历时16年，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刻完。该藏用经折装，共587函、6010卷。因为该藏刻于普宁寺，故名《普宁藏》。第二次刻于元成宗大德年间。大德间元成宗命杭州路大万寿寺雕造河西字大藏，散施宁夏永昌等路寺院。该藏久佚，卷帙不详，北京图书馆藏有残卷。因为该藏用河西字（亦名西夏文）刻印，故名《河西字大藏》或《西夏大藏经》。第三次刻于元至大、延祐年间。元程钜夫《雪楼集·大慈化禅寺大藏经碑》云：

① 一说《辽藏》刻于圣宗统和间。

《大藏经》为书繁多，世鲜能备，亦莫能以是施。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皇太后命刻大藏经板于武昌。既成，整至京师，印本流传天下，名山巨刹则赐之。

考《元史·后妃传》："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皇太后"为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十月给皇太后答己的封号，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答己又加封为"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全德泰宁福庆皇太后"。据此，则《大藏经》当刻于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至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之间。该经经板刻于武昌，后将经板运至大都（即北京）。惜其经板俱轶弗传，鲜为后人所知。因为该藏刻于武昌，我们姑且称之为《武昌藏》。第四次刻于仁宗延祐年间。延祐二年（1315年）由福建行省长官亦黑迷失赞助，始刻于建阳，后因故中辍，仅刻成《般若》、《宝积》、《华严》、《涅槃》四大部。因为该藏刻于建阳，我们姑且称之为《建阳藏》。第五次刻于元顺帝（后）至元间。（后）至元二年（1336年），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发愿施印大藏经，由负责太后事务的徽政院总其事，在大都（今北京）刊行。据云南图书馆所藏残卷可知，该藏至少有651函、6510卷。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因为该藏刻于大都，我们姑且称之为《大都藏》。以上是元代五次刻印藏经的大致情况。除此之外，零星刻经之例亦屡见不鲜，如左德明刻《金刚经》、比丘绍明刻《大颠和尚注心经》等。

明代佛经刻本

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极盛时期，规模较大的刻经之举也有五次：第一次刻于明太祖洪武年间。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命众僧校刻藏经于蒋山（属南京），竣日不详。该藏刻好后，收藏大报恩寺。其内容篇目可参看《大明重刊三藏圣教目录》。该藏用经折装，共636函、6330卷。因为该藏刻于南京，故名《南藏》。第二次刻于明成祖永乐年间。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

倡刻，历时30年，至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刻成。该藏用经折装，共637函、6361卷。万历十二年（1584年）又续刻41函、410卷，和初刻相加，共计678函、6771卷。据明刘若愚《酌中志》记载，该藏所用物资甚多，计有白连四纸15025张，蓝绢253匹7尺4寸、黄绢26匹2丈4尺1寸（每匹长3丈2尺）、黄毛边纸570张、黄连四纸347张，蓝毛边纸4912张、白户油纸10895张、黑墨286斤8两、白面1225斤、明矾45斤。因为该藏刻于北京，故名《北藏》。第三次也是刻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始刻于永乐十至十五年（1412～1417），永乐十七年（1419年）刻成，是洪武《南藏》的再刻本，内容略有变动。全藏638函、1612种、6358卷。因为该藏刻于南京，故名《永乐南藏》。今甘肃省图书馆有藏本。第四次亦刻于明成祖永乐间，僧人道开倡刻于杭州昭庆寺。道开撰《募刻大藏文》，倡议把梵夹改为方册（即线装本）。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该藏是方册本，但据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收藏的残卷来看，仍然是经折装。因为该藏刻于杭州（亦名武林），故名《武林藏》。第五次刻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万历十七年（1589年）由僧人紫柏、憨山等发起，始刻于山西五台山妙德庵，历时88年，直到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才得以竣工。在刻印过程中，因五台山地处北方，终年积雪，交通不便，供应困难，编刻人员不堪苦寒，几至中辍。四年后，迁至杭州径山寂照庵和径山兴圣万寿寺继续刻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主持人紫柏入狱而死，憨山亦流放儋耳（今属海南），由陆光祖、冯梦祯等人赞助，在嘉兴、金坛、吴江等地按原版式分别雕刻，但是，由于组织不力，进展缓慢，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版片还没有汇集径山。后来贵州赤水名僧继庆毛遂自荐，自愿肩负刻经重任，他调查了已刻未刻详目，奔跑于杭州、吴兴等地。未刻之版，限期完成。由于继庆认真负责，加上著名刻书家毛晋等人的支持，该藏才得以最后刻完。该藏采用方册装（即线装），这是我国古代唯一的方册式藏经。全藏共计678函、6956卷。因

为该藏大部分刻印于径山，故名《径山藏》。又因为嘉兴楞严寺为该藏的组织联络地点，又称《嘉兴藏》。《径山藏》每卷之后有牌记，说明施主、字数、用银、书工、刻工、校对等。据该藏所收《景德传灯录》卷末牌记统计，刻印《景德传灯录》共用银187两4钱4分，书工有徐普、邹大成二人，校对有可霞、海潮、在照、范时泰、宗远、性云等六人，刻工有洪以忠、陶邦本、丘添祥等23人，这些刻工分别来自进贤、上元、建阳、真州、金陵、吉水、江宁、南昌等地。这些都是研究古代刻书史的重要资料。除此之外，明人零星刻经之例多如牛毛，兹不赘述。

清代佛经刻本

清代较大的汉文佛藏刻版只有一次。雍正十一年（1733年），由雍正皇帝胤禛倡刻，开藏经馆于北京东安门外贤良寺，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画总理藏经馆事务，下设校阅官、监督、监造等大小官员133人。历时五载，于乾隆三年（1738年）十二月十五日竣工。全藏共724函、7240卷，6700多万字。后乾隆帝敕编《四库全书》，先后三次撤经毁板：乾隆三十年（1765年）抽毁钱谦益注《楞严经疏解蒙抄》；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抽毁《永乐御制序赞文》等4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抽毁武则天为《华严经》撰写的序文。该藏先后刷印150部左右。解放后，经版交北京图书馆保存。1980年5月，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将经版转交北京市文物局保管，1982年8月，经版庋置明代古刹智化寺。经清点，现存经版74792块，相传大乘经典最初藏在龙宫，故名《龙藏》。清代私人刻经首推杨文会。杨文会（1837～1911），号仁山，安徽石埭县人。自幼好学，不喜举业。同治五年（1866年）他在南京结识了王梅叔、刘开生、曹镜初等人，以为佛经多毁，不利弘扬佛学，主张恢复刻经。于是建金陵刻经处，募款重刻方册藏经，亲与校勘之役。赞助最力者为江都人郑学川。郑在扬州砖桥设江北刻经处，与金陵刻经处分工合作。著

名文学家鲁迅曾捐款给金陵刻经处，刻印了一部《百喻经》。《百喻经》由古印度僧伽斯那著，南齐求那毗地译，该书通过故事宣传佛教思想，被称为东方的《伊索寓言》。同治十二年（1873年），杨文会研究造像，请画家画成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大悲观音像等，与他搜集的古代著名佛像画，一并刻版流通。后来，他先后赴英法日等国，在日本搜罗280余种大藏经未曾收录的重要著述，择要刊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于南京延龄巷修建居室数间，附带收藏经板并流通佛经。四年后将这些房屋捐给金陵刻经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于刻经处创办祇洹精舍，招收僧俗学徒10余人，由他亲自讲授佛学。著名佛学研究者欧阳竟无居士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杨文会弘扬佛学40年，以刻经、讲经为己任，对中国近代佛学影响甚大。杨文会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在遗嘱中，仍念念不忘刻印佛经，不愿和毕生刻印的经版相分离。后人遵照其遗嘱，把他安葬在金陵刻经处，并建立了纪念塔。

清代藏文佛经刻印首推德格印经院。德格印经院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由四十二世德格土司却吉·登巴泽仁首创。该院刻经非常认真，大约经过下列步骤：（一）劈版，即每年秋天将红桦木劈成版块。（二）烘版，即用微火将木版烘干后，放到羊粪中沤一个冬天，再次烘干。（三）刻版。为了保证刻书质量，规定每人每天只刻一寸版面。（四）校版，书版刻好之后，马上校对，及时挖改错讹。（五）浸版，即把校改好的版片放到酥油中浸泡一天，取出晒干，再用一种名叫“苏巴”的草根熬水将版面洗净晾干。（六）刷印。印色有朱墨之别，重要经典用朱砂刷印，一般经书用烟墨刷印。德格印经院至今已有250年的历史。据统计，该院现藏书版217500块，一块两页，每页以600字计，总字数约有2.5亿之多。

佛经刻本众多的原因

综上所述，可知历代佛经刻印之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历代帝王佞佛，为佛经刻印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后周世宗等少数帝王排佛；绝大多数封建帝王是佞佛的。例如，北宋建立之初，一反周制，对佛教实行保护政策。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度僧8000人。乾德四年（966年）派僧行勤等157人到西域取经，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到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度僧17万人；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设印经院，专印佛经，据《枫窗小牍》卷下：

> 乾德四年三月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访经西域，兴国五年北天竺僧天息灾与施护各诗梵夹来献，及中天竺僧法天有意翻译，乃诏内侍郑守钧于太平兴国寺大殿两度地作译经院，中设译经堂，其东序为润文堂、西序为正义堂，七年六月院成，召息灾等三人入院，以所赍梵本各译一经，命光禄卿汤悦、兵部郎张郎润色，法进等笔授缀文，慧达等证义。七月十二日息灾等各上新译经两卷，诏镂版入藏。自是取禁中梵文藏录半载者译之，每圣诞节五月一日即献新经，八年改译经院为传法院，又置印经院。

帝王重视，为佛经刻印提供了可靠的社会保险。

第二，和其它宗教相比，佛教更善于开展宣传活动。就宣传对象而言，佛教能够因人而异：对于低层次的普通群众，佛教笼统宣传佛经、佛像的灵验，谁出几个钱抄写或刻印几卷经，造个小佛像，就会得到“善报”；对于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则大讲其理，津津有味。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少长咸宜。相比之下，道教宣传修仙、炼丹、画符等，一般群众根本没有财力购买昂贵的水银、丹砂，去炼丹服食。对于高层次的知识分子来说，道教理论也显得粗浅苟简，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就宣传方式而言，佛教善于采用各种有效的方式宣传群众，广造舆论。例如南北朝

时，儒道佛三家鼎立，争夺激烈，佛教及时运用"义疏"、"讲疏"等著作方式对佛教进行了大量通俗的解释，因而争取了不少群众，使儒道二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儒家为了生存下去，也跟着为儒家经典作了义疏，才算摆脱了困境。再拿雕版印刷来说，我们虽然还拿不出证据，说明雕版印刷是佛教信徒发明的，但从现存文物来看，佛教信徒至少是雕版印刷这种先进技术的最早传播者和使用者。刻印佛经的效率当然比人工抄写要高得多，影响也大得多。

第三，因为佛教善于宣传，所以施主很多，所谓"施主"，就是指那些施舍财物者，这里是指施舍财物刻印佛经的人。施主包括各种各样的人。以地位而言，最高者可以是帝王将相，最低者可以是普通百姓。当然，施主施舍钱财是有条件的。他们希望通过施舍，得到某种"善报"，例如明刻《北藏》，前有明英宗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撰"御制"文曰：

> 天清地宁，阴阳和顺，七政明朗，风雨调均，百谷常丰，万类咸畅，烽警不作，礼教兴行，子孝臣忠，化醇俗厚，人皆慈善，物靡害灾，外顺内安，一统熙皞，九幽六道，普际光明，既往未来，俱登正觉。

可见官方刻印《北藏》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天清地宁，阴阳和顺"等"善报"。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也曾施印藏经十部分捐鸡鸣山寺、北京皇后寺、静海禅寺、金山禅寺、三峰塔寺等。郑和在题记中说：

> 切念生逢盛世，幸遇明时，谢天地覆载，日月照临；感皇上厚德，父母生我。累蒙圣恩，前往西洋等处公干。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往回有庆，经置无虞。常怀报答之心，于是施财，陆续印造大藏尊经，舍入名

山，流通诵读。①

可见，他印经的目的在于感谢“佛天护持”、一路平安之恩。又如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石处道等刻《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有题识曰：

承议郎石处道同妻繁昌县君梁氏敬瞻经相，虔发愿心，舍财命工镂板印施，祈乞子孙蕃盛，福寿增延。

可见，石处道刻经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子孙蕃盛”等“善报”。

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赵朴初先生在《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一文中指出：

要搞中国古代文史哲艺术等的研究，不搞清它们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及所受的影响，就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不可能总结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规律。②

为了批判继承文化遗产，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方面的丰富资料，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领导下，成立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辑出版《中华大藏经》。这部《大藏经》无论在版本方面，或者在校勘方面，都是历代藏经不可比拟的。《中华大藏经》预计收书4200余种、23000余卷，在数量方面也远轶前代。

四、道藏刻本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同其它宗教一样，道教也拥有丰富的典籍。唐代以前，道教著作都是写本，五代之后出现不少

①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三记》。

② 中华书局：《佛教与中国文化》第3页。

刻本。

五代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张荐明刻《道德经》是古代刻印道教著作的最早记载（详本编第三章第二节）。随着雕版印刷的繁荣，宋代开始刻印道藏。政和中，宋徽宗诏令全国访求道教仙经，由道士元妙宗、王道坚等校勘后，送福州闽县万寿观雕版，刻完之后，把经版送至京师。由于该藏刻于万寿观，故名《万寿道藏》，该藏共540函、5481卷。主持这次刻经的人是黄裳。黄裳，字冕仲，南平人，先后任越州通判、福州知州等20种不同的职务，著有《演山集》六十卷。刻印《万寿道藏》时，黄裳正任福州知州。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年），诏以汴梁《万寿道藏》版片交给中都（今北京西南）十方大天长观。章宗明昌元年，由提点孙明道主持，据以补刊，两年竣事。除修复《万寿道藏》残卷外，还新刻若干卷，二者相加，共计602帙、6455卷。在刻印过程中，有个叫赵道真的人，自愿担负筹集板材的重任，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因为据说该藏降自玄都玉京山，故名《大金玄都宝藏》。泰和二年（1202年）天长观毁于火，经版俱焚。

蒙古太宗九年（1237年）宋德方倡刻道藏。宋德方，字广道，莱州掖城人。曾师事长春演道主教真人丘处机，久有汇刊道藏之志，丘处机临终把汇刊道藏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丘处机死后，宋德方与弟子秦志安开始筹备锓木之事，丞相胡天禄捐金千两以助其成。还先后设立了棲霞宫八卦局、井门钧天局等27个分局，招募工人500多人，总局设在平阳玄都观，由秦志安总领其事，宋德方亲与校勘之役，坐镇玄都观将近十年，手不释卷，日课校雠，三洞四辅18000余种著作，多出其手，到乃马真后称制三年（1244年）竣事。全藏共有7800余卷，亦名《玄都宝藏》。经版最初存放在玄都观，定宗时移贮平阳永乐镇纯阳万寿宫，到了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经版尽毁。

明永乐间，敕第43代天师张宇初校刊道藏，遂招道士涂省躬等任辑校之役，永乐八年(1410年)，张宇初去世，诏令第44代天师

张宇清继续编修。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张宇清卒，亦未完成。英宗上台后，诏通妙真人邵以正总其事，道士喻道纯、汤希文等重加订正，增所未备，于正统九年（1444年）开始雕版，至正统十年（1445年）刻成，共480函、5305卷。因为该藏刻于正统年间，故名《正统道藏》。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又敕第50代天师张国祥续刊道藏32函，因续刊于万历间，故名《万历续道藏》。正续道藏共512函、5485卷。据明刘若愚《酌中志》记载，该藏所用物资计有：白连四纸30897张、蓝绢182匹1丈8尺6寸、蓝毛边纸3018张、黄绢20匹1丈6尺、黄连四纸176张、黄毛边纸502张、白户油纸8107张、黑墨160斤8两，白面750斤、明矾25斤。《正统道藏》底本搜访不够周全，主要根据元《玄都宝藏》残帙刻成。其实，当时福建龙溪县玄妙观尚存宋《万寿道藏》564函未运北京。否则，今《道藏阙经目录》所著录的道书，皆可收入《正统道藏》。《正统道藏》刻成后，明清历朝就其版片印施各地宫观者甚多。清光绪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存版尽毁。现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等少数单位尚有《正统道藏》印本。清康熙年间，彭定求从《正统道藏》中选出200多种，编为《道藏辑要》；清嘉庆间，蒋元庭编《道藏辑要目录》，收入道书279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都二仙庵据以翻刻，又增入数种，其中包括清代晚出的道书，此书版片现存成都青羊宫。民国十四年（1925年）上海涵芬楼将北京白云观所藏《正统道藏》影印发行，这次影印除将版面缩小之外，还将经折本改为线装本，共印350部、1120册。后来台湾艺文印书馆据上海涵芬楼线装本影印装订为平装本60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据以影印装订为精装本60册。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上海诂林精舍出版社出版守一子编《道藏精华录》，包括道书100种。解放后，1987年由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三家联合影印出版了十六开《正统道藏》。

以上所举是历代规模较大的《道藏》刻印活动。

第九章　插图本、拓本及其它

一、插　图　本

“图书”二字连用，初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 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

这里“图书”指的是“图谶”。再见于《史记·萧相国世家》：

> （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这里，“图书”指地图、法令、户籍等文书。我们现在所说的“图书”则是书籍、期刊、画册、图片等出版物的总称。其实，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间，有图之书固然很多，但无图之书也不在少数。尽管有些书没有图，我们仍然以“图书”相称。这反映了“图”和“书”的历史渊源关系。在我国古代，图和书的关系非常密切，插图本是古籍版本的一大类别。

先秦到唐代的插画本

我国最早的插图本可追溯到先秦。《汉志·六艺略》中有《孔子徒人图法》二卷，这是孔子七十二弟子的画像集。此书原

出鲁壁，是秦火之后的幸存者。先秦出现插图本并不是偶然的。首先，当时绘画已经有了较高的水平，这是插图本产生的技术基础。其次，帛书的产生是先秦出现插图本的物质基础。帛书之前，简策是最主要的书写材料。竹简不仅笨重，而且不能容纳大幅画面。而帛书不仅重量轻，而且幅度大，完全可以绘图。

汉代绘画艺术达到新的水平，出现了毛延寿、刘白等著名画家，民间也出现了不少以绘画为业的工匠，帛画、壁画、漆画等艺术水平更加提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插图本大量出现。王俭《七志》专为图谱设立专类《图谱志》。阮孝绪《七录》虽然没有为图谱著作设立专类，但是并没有摒图于《七录》之外。《七录》内篇有图770卷，外篇有图100卷。《隋志》也没有为图谱设立专类，但它著录的插图本也在百种以上。其中，经部《孝经》的插图本最多，计有《孝经古秘图》、《孝经左右契图》等八种。史部杂传、地理等类插图本较多，子部天文、历数、医方等类的插图本较多。《七志》、《七录》和《隋志》的分类和著录情况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插图本已很普遍。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族文化同少数民族文化融会贯通的时期，绘画水平有了新的飞跃，人物画尤其兴盛，顾恺之、张僧繇等著名画家无不擅长人物画。第二，自从东汉发明造纸技术以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已被广泛应用，纸上作画要比帛上作画方便得多。

唐代以前的插图本都是写本，图是由人直接画上去的。唐代以后，随着雕版印刷的发明，插图本也由人工绘制发展成为雕版印刷，雕版印制的画又叫版画。当然，版画又有木版画、石版画、铜版画等类别，这里只谈木刻版画。鲁迅先生在《木刻纪程·小引》中指出：

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

由于雕版印刷初兴，所以唐代除了少量佛经版画之外，其它图书的插图仍由人工绘制。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经部的《毛诗草木虫鱼图》是开成年间唐文宗亲命集贤院撰写并绘图，书成之后，由大学士杨嗣复和学士张次宗献上。子部杂艺类和医术类插图最多：杂艺类有《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开元十八学士图》等；医术类有《图经》等。《图经》一书是显庆四年(659年)由英国公李勣、太尉长孙无忌、太子宾客兼弘文馆学士许敬宗、尚药奉御许孝崇、侍御医巢孝俭、太医令许弘、右监门府长史苏敬等23人编纂。

宋元插图本

随着雕版印刷的初步繁荣，宋代版画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从内容上看，宋代版画一方面像唐五代那样继续刻印了不少佛像，如咸平四年（1001年）赵宗霸刻《大随求陀罗尼经咒》，雍熙元年（985年）高文进画、僧知礼刻《弥勒佛像》等；另一方面插图版画也大量散见于其它各类书籍，如吴翬飞、黄松年等编《六经图》有图309幅，其中以《周礼文物大全图》最为生动。嘉祐八年（1063年）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刻《古列女传》有图123幅，相传图为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绘。南宋景定刻本《梅花喜神谱》是我国雕印最早的一部画谱。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代医书插图最多，如《孙思邈芝草图》、《崔氏产鉴图》等。从形式上看，宋代除了沿袭五代卷首冠图、上图下文的旧制以外，还出现了连环画的新形式。连环画是用多幅画面连续叙述故事发展过程的绘画形式。早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的一些造像常常分为若干段，每段表示一个故事情节，实开了连环画之先河。但是，连环画正式产生的时间应该说是在宋代。如崇宁间江苏地区刻印的《陀罗尼经》就是用数幅图版描写一个故事内容，南宋临安府众安桥贾官人宅雕印的《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连环版画多至56幅，绘刻精工，左图右文，图下附诗。

金代的平水是北方的刻书中心。这里刻了不少插图版画，如书轩陈氏刻《铜人腧血针灸图经》，姬家刻《四美图》，徐家刻《义勇武安王位》等。另外，山西赵城崔法珍刻印的《赵城藏》，每卷之前都有扉画，其画结构严整，线条生动，表现了北方版画豪放雄浑的风格。

元代统一全国以后，也刻了不少插图本。如建安椿桩书院刻《事林广记》、建安虞氏刻《虞氏平话五种》等。《虞氏平话五种》包括《全相武王伐纣平话》、《全相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平话》、《全相秦并六国平话》、《全相续前汉书平话》和《全相三国志平话》。每种三卷，上图下文，画面占版面的三分之一，文字占三分之二。刻图者为樵川吴俊甫、黄叔安等。这五种平话对研究连环画史具有重要价值。元代以前的连环画以宗教为主要内容。从元代开始，连环画开始出现在话本小说之中。

明代插插本

明初版画承袭宋元遗风，线条粗犷，不拘细节，版面多上图下文，画面题词多幡幢式。明代后期是我国古代版画的黄金时代。据统计，现存历代插图古籍有4000余种，明本就占一半。① 归纳起来，明代后期版画有如下特点：第一，表现手法有了重大突破。在构图上，画幅较多地打破了上图下文的旧制，按内容要求或大或小，有半幅的，有对幅的，有团扇式的。如金陵唐氏富春堂刻《白兔记》、唐氏世德堂刻《月亭记》等都以半幅为图；唐氏广庆堂刻《观杯记》、唐氏文林阁刻《易鞋记》、陈氏继志斋刻《红拂记》等，均以对幅为图。金陵汪氏环翠堂刻《义烈记》有对幅图22幅。画面题词也多打破幡幢式旧制，题词或长或短，均题在画面最适宜的位置，成为整个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物刻画方面，人身各部比例适当，注意通过面部表情和背景

① 江丰：《武林插图选集·代序》。



图15　胡正言刻本《十竹斋笺谱》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在刀法上，由明初的大刀阔斧一变而为精密整肃，由粗犷一变而为婉丽工细。第二，彩色套印技术精湛。为了印制彩色插图，明人发明了饾版、拱花的印刷方法。用饾版印出的版画，颜色深浅适中，阴阳向背分明，极为逼真。我国采用饾版、拱花技术印刷的最早作品是天启六年（1626年）吴发祥印的《萝轩变古笺谱》。后来，胡正言用饾版印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更是千古传颂的佳作。《十竹斋书画谱》是一部带有教材性质的画谱，系统地展示了传统的绘画技法。《十竹斋笺谱》是一部图案性画册，它汇古今之名迹，集艺苑之大成，化旧翻新，巧夺天工（图15）。第三，插图应用广泛，几乎遍布各类图书。插图历史书如汪氏环翠堂刻《人镜阳秋》、黄应瑞刻《状元图考》等。明代史部仪注类著作插图也有很多，

《明史·艺文志》该类著录图书57部，其中插图的就有21部。插图地理书如汪忠信刻《海内奇观》等，插图农书如徐光启《农政全书》等，插图兵书如《神器谱》、《利器解》等，插图医书如《本草纲目》等。插图类书如章潢《图书编》、王圻《三才图会》等。小说、戏曲的插图最多，可以说是无书不图，《水浒传》的插图本就有万历天都外臣序本、万历新安本、万历容与堂本、万历余氏双峰堂本、明末杨定见本、明末雄飞馆本等。金陵富春堂一家所刻传奇有十余套，插图千幅之多。明代以插图为主的画谱也不少。如《高松画谱》、《顾氏画谱》等。插图本在明代是很时髦的，许多书在书名上冠以"绣像"、"全相"之类的字眼以招徕读者。所谓"绣像"是指书前冠有人物的画像，一般用单线条勾勒，摸写精细，不画背景。所谓"全相"是指正文中插有反映故事情节的画面。当然，明代插图版画取得这么大成就，与画家、刻工的努力分不开。明代晚期，画坛十分活跃，呈现百花争艳的局面，当时的主要画派有建安派、金陵派、徽派等。其中徽派是明代版画艺术的杰出代表，徽派的发源地在安徽歙县。徽派最早兴起于明代弘治年间，当时歙县有个地方叫仇村，村里住着仇姓大族（其中也有黄姓），因那里地处皖南山区，山多田少，很多人不得不另求谋生之道。仇村人大多以刻书为业，尤以刻图见长。后来仇姓衰落，黄姓代之而起，技艺日臻成熟，终于形成遐迩闻名的徽派艺术。徽派作品线条精细，刀法婉丽，背景繁富，人物刻画细致。徽派艺术的代表作如丁云鹏画、黄鏻刻《程氏墨苑》、项南洲刻《吴骚合编》，黄一楷刻《浣纱记》，黄真如刻《盛明杂剧》、黄一凤刻《牡丹亭》等。据中国古代版画史专家周芜同志考证，黄氏从明代正统年间开始刻书，一直刻到清代道光年间。前后共历400余年，刻书241种（实际数字当远远超出此数）。明代是黄氏刻工最活跃的时期，黄氏28世以前的280位刻工都生活在明代，210种书都是在明代刻的。其中，明代万历年间刻书多达132种。在众多的黄氏刻工中，刻书5种以上者有黄应

瑞、黄应祖、黄应光、黄一楷、黄一彬、黄一凤等29人，其中刻书最多的是黄应光，共刻书11种。① 黄姓刻工之中，不少人都是能画能刻的高手。

清代插图本

清代前期，插图版画在明末影响下，也有一定成绩。顺治年间的代表作有：陈洪绶画、项南洲刻《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插图6幅；萧云从画，刘荣、汤义、汤尚刻《太平山水图》43幅。陈洪绶、萧云从都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项南洲、刘荣、汤义、汤尚都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刻工。康熙年间的代表作有：刘源绘、朱圭刻《凌烟阁功臣图》30幅，朱圭为吴中名工，他还刻有《大汕画传》、《耕织图》46幅、《万寿盛典图》等。《大汕画传》是明遗民僧人大汕的传记，冠于大汕文集《离六堂集》卷首，共33图，其中有负薪图、读书图、吟哦图、钓鱼图、乐琴图、长啸图等。每幅图反映了遗民生活的一个侧面，带有连环画的性质。《耕织图》是反映农业生产的连环画。我国自古以来以农为主，历代封建帝王也多鼓励耕织。南宋楼璹在宁宗时，曾进献过一种《耕织图》，先刻图于石，后有木刻本流传，今已亡佚。清朱圭等刻《耕织图》耕织各23图，耕有浸种、耕、插秧、收刈、入仓等；织有浴蚕、采桑、练丝、纬织、经、成衣等，图为著名画家焦秉贞绘。吴逸绘、阮溪水香园刻《古歙山川图》24幅是徽派版画的代表作之一。程致远画、郑子猷刻《第六才子西厢记》也是较好的作品。另外，康熙间李渔的女婿沈心友还用饾版印了《芥子园画传》，刻印俱佳，对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熙间还有人用饾版翻印过《十竹斋书画谱》，但质量远不如胡正言原本。雍正年间的代表作有内府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其山川地志、名物图录均为良工刻木，极为精细；金圣叹评本《第

① 周芜：《徽派版画史论集》附《黄氏刻工表》。

五才子书》冠图40幅，是翻刻陈洪绶的画稿，乾隆年间的代表作有：《南巡圣典图》、《避暑山庄图咏》、《圆明园图咏》、《江南名胜图》等。以上各书均为内府刻本 乾隆三十年（1765年）方观承进献有《棉花图》，该图仿《耕织图》把棉花的整个生产加工过程用16幅图表现出来。另外，金简《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中，用16幅图表现了木活字印书的全过程。乾隆晚期，版画已渐趋衰败。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活字本《红楼梦》附图24页，虽然是《红楼梦》最早的插图本，但人物形态稍嫌呆板。嘉庆以后，虽然戏曲小说的插图本很多，但刻印粗率，不为世人所重。

以上就是历代插图本的大概情况。总而言之，古人对图书插图是很重视的。"图书"这个称号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应该把这个优良传统继承下来。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曾说：

> 我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但是希望一样看重并且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这些研究和由此而来的创作，自然没有现在的所谓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们的照例的叹赏，然而，我敢相信：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

二、拓　本

拓本是一种"特种"古籍，其制作方法与写本、刻本等均不相同。它是图书馆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拓本与搨本

现在人们常把"拓本"和"搨本"混为一谈，其实，拓本和

搨本原先是两回事。“搨”又叫“摹”（或“模”），是“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搨之”。①用通俗的话来说，“搨”就是影写，即把透明的薄纸覆在原迹上细心描摹。窦暨《述书赋》云：

> 季初则隐姓名，展纤劲，写搨共传，赏能之胜（注释云：杨肇，字季初，今见草书一纸，共十行，有古署榜，无姓名，今共传搨之）。②

从注文可以看出，后人所“传搨”的不是金石器皿上的文字图像，而是晋代著名书法家杨肇写在纸上的十行草书。可见，这里所谓“传搨”就是影写的意思。搨本有双钩本和填廓本两种：双钩本是仿字画轮廓描摹下来，中间留作空心；填廓本是将描摹下来的空心字，用墨填满。唐代搨本多属填廓本，每易与真迹相杂。《新唐书·百官志》记弘文馆有搨书手3人、集贤殿书院有搨书手6人。“搨书手”就是专门负责影写的工作人员。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是唐太宗时期的著名搨书手，他们经常影写《兰亭序》等名家手迹供太子、诸王、近臣等学习。拓本与搨本不同，其制作程序比较复杂，大致可分六步：第一步，清理金石器物上的灰尘和污垢，使文字和图像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第二步，把柔软的薄纸（多用生宣纸）浸湿后刷在石碑等金石器皿上；第三步，用棕刷和小槌隔着毡布轻轻捶拍，使薄纸紧贴文字图像，嵌入文字的凹入部分；第四步，晾干薄纸，薄纸不可太干或太湿，将干未干，恰到好处；第五步，朴墨，即用朴子蘸墨（多用油烟墨）反复轻拍纸面，使文字图像显现出来，墨色逐渐

①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论临摹二法》。

② 转引自施蛰存《金石丛话·谈拓本》，载《文史知识》1987年4期。

加深；第六步，把一张张拓片装订在一起，就成了拓本。拓本又有打本、脱本、蜕本等名称，古都西安有一个唐代尊胜陀罗尼经幢，末附题识云：

> 元和八年八月五日女弟子那罗延建尊胜碑，打本散施，同愿受持。①

这里“打本”即今之“拓本”。唐韦应物《石鼓歌》云：

> 令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黑白分。②

后人据此又称“拓本”为“脱本”。又有人把拓印比作秋蝉蜕壳，故称“拓本”为“蜕本”。

拓本源流

拓印技术始于何时？至今迄无定论。东汉建造熹平石经，不见拓印的记载。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71回中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曹操在蔡琰家中“偶见壁间悬一碑文图轴”，据说那是《曹娥碑》的拓片。照此推理，三国时代似乎就出现了拓印技术，但小说家言，真伪参半，不可轻信。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著录200多块古碑，或据碑前摘录，或凭记忆叙述，也没有提及拓印碑文之事。在魏徵等撰《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一卷、一字石经周易一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一字石经鲁诗六卷、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一字石经春秋一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一字石经典论一卷、三字石经尚书九卷、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等12种，据小

①② 转引自施蛰存《金石丛话·谈拓本》，载《文史知识》1987年4期。

字注，另有梁石经文7种，共计19种。《隋书·经籍志》说，这19种图书均为“相承传拓之本”，也即拓本。这是拓本见诸古籍书目的最早记载。这说明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拓印技术，

唐代捶拓技术已广泛运用，传世唐拓有《孟法师碑》、《温泉铭》等。《孟法师碑》为岑文本撰，褚遂良书，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刻，碑石久佚，清人李宗瀚所藏唐拓本，现已流入日本。《温泉铭》为唐太宗李世民撰书，刻石不传，敦煌石室中有此铭拓本，拓本末题”永徽四年八月围谷府果毅儿”，“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果毅”是唐代统帅府兵的武官，因此前人定为唐拓。此拓已为法人伯希和所窃，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

宋代捶拓盛行，赵明诚、李清照夫妇雅嗜金石，收藏拓本颇丰，到赵明诚死时，收藏金石拓本多至2000件，其中汉唐石刻拓本数十轴。[①]传世宋拓不一而足，著名者有《九成宫醴泉铭》、《大观帖》、《纪功颂》、《孔颖达碑》、《皇甫诞碑》、《夏承碑》、《集字圣教序》等。《九成宫醴泉铭》，魏徵撰，欧阳询书，贞观六年（632年）四月刻石。此碑因捶拓过多，磨损严重，后人捶拓时又多次开凿，致使笔划或肥或瘦，多所失真。相比之下，北宋拓本最佳，现藏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北京图书馆等多处。《大观帖》为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蔡京奉诏所刻，其石毁于靖康之乱，拓本传世甚稀，北京图书馆藏有宋拓残卷。《纪功颂》为三国吴天玺元年（276年）刻石，原存江苏江宁县学，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毁于火，原石拓本稀少，故宫博物院藏有宋拓。《孔颖达碑》刻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现存陕西礼泉县昭陵，碑文2500余字，可识者仅200余字，故宫博物院藏有宋拓善本。《皇甫诞碑》，唐于志宁撰，欧阳询书，现存西安碑林。该碑于明万历间因地震而断裂，据此断纹可知拓本新旧，上海图书馆藏有北宋拓本。《集字圣教序》包括唐太宗

---

① （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为玄奘译经所撰之序，皇太子（李治）为玄奘译经所作之记、太宗答敕、皇太子笺答和玄奘所译《心经》等五个部分，书由怀仁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遗墨中集字而成，唐咸亨三年（672年）刻石，现存西安碑林。碑石在北宋以后中断，加之捶拓日久，笔画逐渐浅细，故没有断痕之拓本，均为宋拓。

金代拓本不多，上海博物馆藏有金拓《重修蜀先主庙碑》，该碑于金承安四年（1199年）刻石，金代著名诗人兼书法家王庭筠撰书，拓本传世稀少，有文物出版社影印本。明代拓本有北拓、南拓的区别，"南纸坚薄，极易拓墨，北纸松厚，不甚受墨。故北拓如薄云之过青天，以其北用松烟，墨色青浅，不和油蜡，故色淡而文皱，非夹纱作蝉翅拓也。南拓用烟和蜡为之，故色纯黑，面有浮光"。①明代书商为了牟利，时作赝拓，明人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云：

> 今之赝帖，多用油蜡拓者，间有效法松烟墨拓，色似清浅，而藏法入石太深，字有边痕。用墨深浅不匀，浓处若乌云生雨，浅者如白虹跨天，殊乏雅趣……近有吴中高手，赝为旧帖，以坚帘厚粗竹纸，皆特抄也。作夹纱拓法，以草烟末香烟薰之，火气逼脆本质，用香和糊若古帖臭味，全无一毫新状，入手多不能破。

传世明拓有《七佛偈》、《麓山寺碑》等。《七佛偈》为宋黄庭坚书，摩崖刻，位于庐山秀峰寺后读书台侧。上海图书馆藏有明拓本。《麓山寺碑》亦名《岳麓寺碑》，因位于长沙岳麓山而得名。该碑由李邕撰书，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刻石，碑阴字多剥落，拓者多遗碑阴文字，全拓本极为罕见，今上海书画社有明拓影印本（图16）。

---

① （明）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



图16　唐李邕书《麓山寺碑》拓本

清代拓印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拓本数量之多、技术之精，远轶前代。李宗瀚、侯念椿、叶昌炽等以鉴藏拓本著称于世。李宗瀚，字公博（一字春湖），江西临川人，乾隆进士，酷嗜金石文字，筑湖东楼专藏名拓，其中不乏桂林奇山岩壁名迹。侯念椿，苏州人，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书商，精于鉴别，何地拓本，一望而知。叶昌炽，字颂鲁，号鞠裳，苏州人，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和金石学家。叶氏20年如一日，收藏碑拓多至8000余通，朝夕摩挲，对拓本颇有研究。他在谈到精拓时说：

有同一碑为同时拓本，而精粗迥别者，此拓手不同也。

陕豫间庙碑墓碣，皆在旷野之中，苔藓斑驳，风高日熏，又以粗纸烟煤，拓声当当，日可数十通，安有佳本！若先洗剔莹洁，用上料硾宣纸，再以绵包熨贴使平，轻椎缓敲，苟有字画可辨，虽极浅细处，亦必随其凹凸而轻取之，自然钩魂摄魄，全神都见。……粗纸烟煤拓本，最不耐观，每一翻帘，十指尽黑，煤气上熏鼻观，令人啰恶。大抵佳拓本有二：一为乌金拓，用白宣纸蘸浓墨拓之，再研使光，其黑如漆，光可鉴人。一为蝉衣拓，用至薄之纸，以淡墨轻拓，望之如淡云笼月，精神气韵，皆在有无之间。凡古碑之剥泐过甚者，此拓最宜。如用螺纹笺，则更上一层矣。①

清代拓本到处可见，其中江苏、浙江、陕西、河南、湖北、山西、河北、福建、广东、云南等地尤多。江浙地区文化发达，拓印技术精湛，谢庸、马傅岩、释六舟、李锦鸿等是该地的著名拓手，其中谢庸是苏州人，马傅岩是嘉兴人。马氏曾为阮元作《百岁图》，外廓草书一个特大"寿"字，廓内取金石百种捶拓填满，巧夺天工，阮元赞赏之极，酬以百金。释六舟、李锦鸿为马傅岩的二传、三传弟子。陕西拓本多用粗纸，色黄而厚，间或有用香墨连史纸者。车永昭为陕西著名拓手，其作品人称车拓本。山东潍县著名拓手陈簠斋，号称海内之冠。为了保证拓印质量，陈氏专门定造一种既坚又薄的宣纸，陈拓墨淡而有神，不但不失古人笔意，而且也不损坏碑石。传世清拓数量最多，其中以《三希堂法帖》、《快雪堂法帖》等为最著名。三希堂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养心殿内，清乾隆时曾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收藏于此，认为是三件稀有的珍贵文物，故名。《三希堂法帖》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由梁诗正等人奉敕校刊，该帖集魏钟繇至明人书家真迹于一石，现存北京北海公园

---

① 徐珂：《清稗类抄·鉴赏类》。

阅古楼。初拓浓墨本谓之“乌金拓”，惟赐大臣，流传极少。道光十九年（1839年）加刻花边，以淡墨拓。其后石渐磨损，后拓多无花边。《快雪堂法帖》是清初冯铨所刻丛帖之一，冯铨以晋王羲之书《快雪时晴帖》首先摹刻，并筑堂储石，堂名为快雪堂。整个丛帖遂名《快雪堂法帖》。该帖初拓本称“涿拓”；后来石刻转售闽人黄可润，此时拓本称“建拓”；乾隆时闽督杨景素购入，献给内廷，弘历遂命筑堂嵌石，堂名仍名快雪堂。此时拓本称“内拓”或“京拓”，原石现存北京。以上讲的是古代拓本的大概情况。

总的说来，古代拓本能够流传下来的是极少数，大多数早已亡佚，原因何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云：

> 铜玉耐久而多，书帖易败而少。且宝珠玉者似多，宝金石文者更少。兼之兵火销烁，人世变迁，岂容片纸砥砺、尘磨其中！幸存一二，散落人间。好之者力或不足，不知者用以覆瓿，此又劫会业逢，不知灾害其几，何能得聚古人于一堂，与之心谈手执，接丰采于几案！

当然，尽管古代拓本流传不多，但是，拓印技术并没有失传，它仍然是今天复制金石资料的重要手段。著名的房山石经，公元七世纪静琬法师始刻，继刻者绵延不绝，历时千年之久。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在政府支持下，用了两年时间，鸠工拓印七份，送交有关部门作为研究之用。据统计，房山石经拓本包含佛经3500余卷，其卷帙之多，史无前例。

拓本的价值

拓本有什么价值？第一，古代许多碑石多由书法名家亲笔所写，例如柳公权是唐代书法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

权于笔者，人以为不孝”。① 这些碑石拓本不仅可供习字临摹，而且也是研究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今天出版的许多碑帖都是据拓本影印而成的。第二，拓本可证史误，可补史阙。赵明诚在《金石录序》中指出：

> 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

拓本是碑石文字的复制品，亦当“可信不疑”。例如《后汉书》有《宋均传》：“宋均，字叔庠，南阳安众人也。”又有宋均族子《宋意传》：“孙（宋）俱，灵帝时为司空。”然而，《后汉书·灵帝纪》却说：“太常宗俱为司空。”注云：“俱字伯俪，南阳安众人。”《姓苑》载南阳安众宗氏云：“后汉五官中郎将（宗）伯，伯子、司隶校尉、河内太守（宗）均，均族兄辽东太守（宗）京，京子司隶校尉（宗）意，意孙司空（宗）俱。”《元和姓纂》记载同上。通过上述考证，赵明诚认为《后汉书》宋均一族当姓宗，不姓宋。后得《汉司空宗俱碑》，碑额题：“汉故司空宗公之碑”，碑文云：“公讳俱，字伯俪，南阳安众人也。”至此，更加证实了赵明诚考证之确，可惜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没有吸收赵明诚的研究成果，仍作“宋均”。由于条件的限制，人们亲临碑石极不容易。这样，碑石拓本就给人们带来了极大方便。千里之外之物，足不出户，便可展观研读，堪称人生一乐。然而，由于拓本资料比较集中地收藏在一些大型图书馆，能够摩挲赏析、先睹为快者，实属少数。1988年，北京图书

---

① 《旧唐书·柳公权传》。

馆从馆藏拓片中选出两万种交出版社出版，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们希望今后能够出版更多的拓本资料。第三，捶拓技术对于雕版印刷的发明具有重要意义，弄清拓本的产生时代是雕版起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详本编第二章第一节）。

三、活字本

我国不仅是发明雕版印刷最早的国家，而且也是发明活字印刷最早的国家，早在11世纪40年代，宋人毕昇就发明了泥活字。活字的种类很多，有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

泥活字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云：

>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两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沾，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

沾污。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①

这是我国古代史籍中关于毕昇泥活字的唯一记载。根据这段记载可知，毕昇的身份是"布衣"，即普通的老百姓。毕昇是什么地方人？很可能是沈括的同乡。根据有三：（一）如果不是同乡，在信息闭塞的古代，沈括对毕昇的造字方法就不可能及时了解；（二）古代交通不便，毕昇死后，泥活字不可能一下子散入千里之外，为其乡人所得，合情合理；（三）浙江雕版印刷历史悠久，有发明泥活字的技术基础。如果这种分析正确，那么，毕昇当和沈括一样都是钱塘（今杭州）人。根据沈括的记载，可知毕昇用泥活字印书的程序如下：第一步是用胶泥刻字。各字所刻字数不等，一般的字刻几个就够用了；"之"、"也"等常用字，要刻20多个；有些冷僻字，在排版时临时去刻，也来得及。第二步是烧字。泥字烧过之后，就坚固多了。第三步是排版。其具体做法是：先在一块铁板上撒上松脂蜡、纸灰等粘合剂，接着用铁框把四周围起来，把活字排在铁框里边，然后用火在铁板下烘烤，等粘合剂熔化以后，用平板把版面按平即可。第四步是印刷。为了加快印刷速度，可用两块铁板，印第一版时，第二版便可排字，等到第一版印完的时候，第二版也排好了，互相轮换，接连不断。印数越多，效率越高。第五步是回收泥活字。回收方法是：用火烘烤铁板底部，等粘合剂熔化后，用手一推，字就掉了，然后按字韵分别把字存放在木格里，等到下次印书时再用。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虽然原始些，但其基本原理却和现代印刷技术大致相同，这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才智。

宋代以后，泥活字印刷技术沉寂了七八百年，只是到了清代道光年间，泥活字才又得以重返历史舞台。李瑶和翟金生是清代道

---

① 此段引文各本互有异同，此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梦溪笔谈校证》。

光年间两位著名的泥活字出版家。李瑶，字宝之，苏州人。曾于道光九年（1829年）用泥活字印《南疆绎史勘本》；道光十二年（1832年）用泥活字印《金石例四种》。翟金生，字西园，安徽泾县水东村人。他以教书为业，能诗善画，鉴于"遗编蠹蚀，每嫌借读之烦，善本梓行更乏开镌之力"，①决计造泥活字印书。嘉庆十九年（1814年）他开始造字。为了保证质量，他到外地寻找胶泥；为了早日完成，他动员全家参加。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终于制成十万多个泥活字。翟金生在一首诗中写道：

> 一生筹活版，半世作雕虫。珠玉千箱积，经营卅载功。②

这10万多个泥活字的确凝聚了他30年的心血。接着又在亲属的帮助下，先后印出了翟金生《泥版试印初编》、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翟廷珍《修业堂集》、翟震川《水东翟氏宗谱》等书。

木活字

木活字的起源也可追溯到宋代毕昇。据上文所引沈括语：毕昇"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沾，不可取"。这说明毕昇也用木活字印过书，只是没有成功。

元代始有木活字印书的明确记载。王祯是第一个成功地用木活字印书的人。王祯，字伯善，东平（今属山东）人。他在安徽旌德县做县官，为官清廉，政绩卓著，尤其关心农业生产，他整理了前人在农业方面的文献资料，结合生产实践，写了一部《农书》。这是我国农学史上一部名著，全书有13.6万字。在工匠的帮助下，他自己设计制作了3万多个木活字，准备采用木活字摆

---

① （清）翟金生：《泥版试印初编·自序》。

② 同上书《拙著编成赋五绝·自刊》。

印。为了保证印刷质量，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首先用木活字试印了《旌德县志》，这部6万多字的县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印成100部，效果很好。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正当他准备摆印《农书》时，奉命调离旌德，到江西永丰（今属广丰）任职。他把木活字从安徽带到江西，准备到江西继续摆印。可是到了江西以后，发现江西即将鸠工刻版，于是中辍摆印计划。这里需要考辩一个问题：不少版本学著作以为王祯用木活字摆印《旌德县志》的时间是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根据是清嘉庆本《旌德县志·职官·政绩》：

王祯，字伯善，东平人。元贞元年以承事郎为县尹。惠爱有为，凡学宫、斋庑、尊经阁及县治坛庙桥道，捐俸改修，为诸绅士倡。莅任六载，山斋萧然，尝著《农器图谱》、《农桑通诀》，教民勤树艺，又兼施医药以救贫疾。种种善迹，口碑载道，后调永丰。

据此，王祯于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始任旌德县尹，“莅任六载”之后，调至永丰。“六载”即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而《旌德县志》是在调至永丰前二年（见下引文）摆印的，则摆印时间正好是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我们认为，这个结论是不可靠的，最可靠的当是王祯本人的自述，他在《农书》后附《造活字印书法》一文中说：

前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时，方撰《农书》，因字数甚多，难于刊印，故尚己意，命匠创活字，二年而工毕，试印本县志书，约计六万余字，不一月而百部齐成，一如刊板，使知其可用。后二年予迁任信州永丰县，挈而之官。是《农书》方成，欲以活字嵌印，今知江西，见行命工刊板，故且收贮，以待别用。

由此可知，王祯调至永丰的时间正是“《农书》方成”之时。那么，《农书》成于何时？《农书·自序》后署“皇庆癸丑三月望日东鲁王祯书”，“皇庆癸丑”即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这就是说，王祯调至永丰的时间是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据以上引文，王祯调至永丰的时间较摆印县志的时间“后二年”，那么，由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上推二年，正好是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这就是说，王祯摆印木活字本《旌德县志》的确切时间当是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这里，还要弄清“今知江西，见行命工刊板”这句话的意思，其中“知”字非“知道”之意，当是“主持”的意思；“行”是“即将”的意思。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就是：现在我来到江西永丰主持工作，（当地得知我的《农书》刚刚写成）江西准备鸠工刻版。把“见行命工刊板”理解为“已经刻版行世”，从而把它当作王祯中辍摆印计划的原因，似不确。如上所言，既然王祯调到永丰时“《农书》方成”，江西怎么会可能超前刻版行世呢？

王祯用木活字印书的程序是：第一步是刻字。把字按韵写在纸上，再贴到木板上，然后象雕版印刷那样把字刻好。第二步是锯字、修字。把刻好的木板一个字一个字地锯开，其高低大小按照同一规格修理整齐。第三步是造轮贮字。造两个直径七尺的轮盘，盘面以韵分格编号，各字按韵摆入相应位置。然后整个轮盘固定在一个3尺高的轴上，轮盘可以绕轴转动（图17）。第四步是排字。排字需要两人，一人按韵喊号，一个就盘取字，并依次放入带有边栏的平板上。第五步是刷印。刷印必须竖刷，不可横刷。以上便是王祯用木活字印书的大致过程。王祯把这些方法写成《造活字印书法》一文，附在《农书》后面，至今尚可看到。这篇文章也是活字印刷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国外。除了王祯之外，元代采用木活字印书的还有马称德，他在浙江奉化作官时，刻了10万个木活字，至治二年（1322年）印过《大学衍义》等书。在甘肃敦煌千佛洞中也曾发现元代用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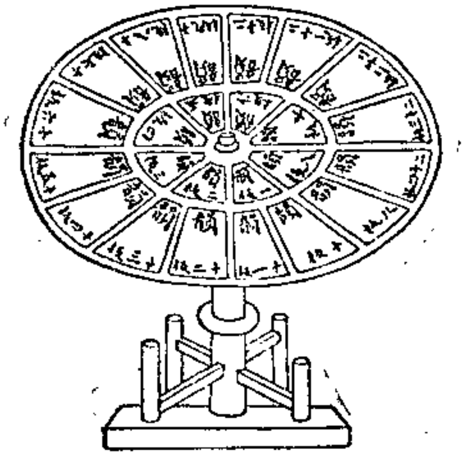


图17 王祯设计的轮盘

吾尔文刻制的木活字，这些木活字大多为帝国主义分子盗走，仅剩下5个，现在陈列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明代木活字印刷已相当盛行。著名的木活字出版家有长洲韩氏、丽泽堂、虞山荥荆堂、海虞黄美中、海虞赵用贤、太仓赵枢生、太仓张溥、上海顾从德、仁和卓明卿、豫章魏显国、蜀人张佳胤、鄞人包大柯、朱仁儆、庐陵陈嘉谟、福州林氏、碧云馆、浙江倪灿、嘉定徐兆稷、南京李登等20余家。他们分布在江苏、浙江、福建、江西、云南、四川等省，尤以江苏为多。在民间木活字印刷的带动下，明代官方也开始采用木活字印书，如蜀藩《栾城集》、益藩《辨惑集》等。明末《邸报》也用木活字摆印。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说：

> 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1639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并是写本。

《邸报》是明代官方报纸，时间性强，采用活字印刷非常方便，

排了就印，印了就拆，然后再排再印再拆。明代中期以后，还有用木活字印家谱的，如北京图书馆藏《东阳卢氏家乘》便是嘉靖间的木活字本。

清代用木活字印书已经蔚成风气。各地衙门、书院和官书局多有活字印书者，私人用木活字印书的也很多，有的书坊索性把坊名叫做“活字印书局”或“聚珍堂”。清代最著名的木活字印本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图18）。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的时候，负责刻书的是金简，他算了一笔细帐：如用雕版印刷，刻一部《史记》需木板2675块，用银1450余两；如用活字印刷，刻15万个木活字（包括零件），也仅需银1400余两，而且有了一套木活字，可以摆印很多书。在金简的主持下，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刻成枣木字253500多个，①后来，就用这些活字摆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种。武英殿聚珍版（以下简称“聚珍版”）比王祯木活字印书法（以下简称“王祯法”）有了改进和发展，二者的区别在于：第一，活字制作方法不同。王祯法是在整块板上把所有的字刻出来，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锯开；而聚珍版则是先做好一个个独立的木子，然后刻字。第二，栏线制作方法不同。王祯法是用竹片作行线，可以自由去取；而聚珍版的栏线是刻在漕板上的（详第三编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贮字方法不同。王祯法把字按韵贮在转盘里，而聚珍版则把字贮放在十二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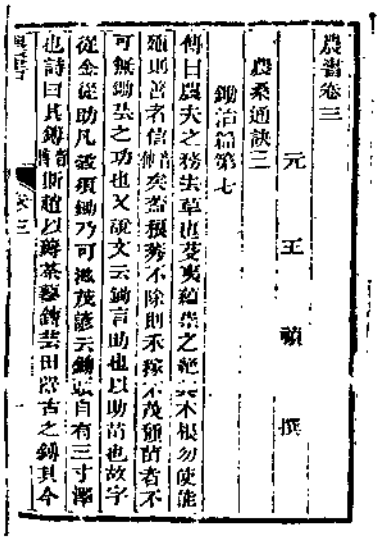

農書卷三
元 王禎 撰
農桑通訣三
鋤治篇第七
傳曰農夫之務去草也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
殖則善者信矣然去草不除則禾稼不茂種苗者不
可無鋤芸之功也又說文云鋤言助也以助苗也故字
從金從助凡穀須鋤乃可滋茂諺云鋤頭自有三寸澤
也詩曰其鎛斯趙以薅荼蓼鎛芸田器古之鎛其今

图18 清乾隆武英殿聚珍本《农书》

① （清）金简：《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大字柜里，每柜有200个抽屉，每个抽屉分大小八格，每格存放大小活字各四个，每个抽屉上都标明某部某字和画数。第四，排字所需人数不同，王祯法用2人，1人按韵喊号，一人就盘取字；而聚珍版则要6人，其中4人管平上去入四声之字，2人按书向管字者要字摆字。聚珍版排字，大字每人一天可排两版，小字只能排一版。金简把这次木活字印书的经验写成《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这是继王祯《造活字印书法》之后，我国活字印刷史上又一重要文献，这本书被译成德文、英文等多种文字，流布国外。在聚珍版的启发下，全国各地纷纷仿效，流行地域比明代更加广阔。据统计，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甘肃等14省都有木活字印书的。清代木活字本的内容十分丰富，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其中历代诗文集最多，有200多种，丛书也有20余种。另外，鼓词、弹词、宝卷、唱本、小说、戏曲等民间文学作品也不少，如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味尘轩木活字本《放杨枝》、《投圂中》、《谒府帅》、《题园壁》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杭州实文斋木活字本《天花乱坠》等。清代木活字本中家谱的数量也不少，家谱是连续出版物，通常二三十年修一次。修谱之风流行于江南广大地区，尤其是江苏常州和浙江绍兴一带，每到农闲季节，一些所谓"谱匠"就挑起活字担子，游乡串村，专印家谱。据统计，流传到现在的清木活字本估计有数千种，其中不少书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铜 活 字

关于铜活字的起源问题，众说不一。归纳起来有五代、宋、元、明四种说法。一般学者认为，铜活字始于明代较为可信。

明代铜活字出版家的代表人物是无锡华氏和安氏。华氏一家四代从事铜活字印刷，华珵、华燧、华坚、华镜是其主要代表。华珵，字汝德，号尚古，成化八年（1472年）贡生，他富于藏

书，勤于学习，精于鉴赏，印有《渭南文集》、《剑南续稿》等。华燧，字文辉，华珵之侄；他每得到罕见之书，总要认真校订一遍，并说："吾能会而通之矣！"遂以"会通馆"名室。他先后印有《宋诸臣奏议》、《锦绣万花谷》、《容斋随笔》、《文苑英华纂要》、《百川学海》、《音释春秋》、《九经韵览》等书。其中《宋诸臣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铜活字本。华坚，字允刚，华燧之侄，书坊名"兰雪堂"，印有《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因为华坚铜活字本每格排印两行，所以又叫"兰雪堂双行本"。华镜，华坚之子，也印过书，事迹不详。华氏四代之中，华燧、华坚比较著名。安氏名安国，字民泰，室名"桂坡馆"。安氏为明代中期无锡巨富之一，人称"安百万"。在政治上也比较开明，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他既能用雕版印刷，又能用铜活字印刷。安氏铜活字本有《正德东光县志》、《吴中水利通志》、《颜鲁公文集》、《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初学记》、《春秋繁露》、《五经说》、《石田诗选》等几种，其中《正德东光县志》最早，印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这是我国唯一的铜活字本方志。安氏印书认真，质量优于华氏。关于华坚和安国的关系问题，过去有人说华坚晚于安国，其实华坚早于安国，华坚兰雪堂印第一部书的时间是在正德十年（1515年），而安国桂坡馆印第一部书《正德东光县志》的时间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除了华氏、安氏之外，明代铜活字本还有常州佚名氏印《杜氏通典纂要》，苏州金兰馆印《石湖居士集》和《西庵集》，苏州五云溪馆印《玉台新咏》，南京张氏印《开元天宝遗事》，建阳游榕印《文体明辨》和《太平御览》，建宁佚名氏印《墨子》，等等。

清铜活字印刷以内府本《古今图书集成》为最著名。《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全书1万卷，目录40卷，雍正四年至六年（1726～1728）清内廷以铜活字印了64部，每部5200册。其卷帙之富、排印之精，史无前例。可惜，所用铜活

字，在使用一次以后就被销毁熔化，铸成铜钱了。清代民间铜活字印书可考者有吹藜阁、福州林春祺、满人武隆阿等。吹藜阁印有《文苑英华律赋选》，比《古今图书集成》还要早40年。福州林春祺是历史上造铜活字最多的人，他克服重重困难，化费二十多万两银子，用了20多年时间，共造铜活字40多万个。他的原籍在福清县的龙田，所以他的铜活字定名"福田书海"。他印的书有《军中医方备要》、顾炎武《音论》和《诗本音》等。他还写过一篇《铜版叙》，说明他造字的原因和经过，这是我国古代制造金属活字仅有的一篇文献。满洲人武隆阿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任台湾总兵官时，曾用铜活字印过《圣谕广训》。另外，咸丰八年（1858年）常州也有人用铜活字印过《毗陵徐氏宗谱》，这是家谱中唯一的铜活字本。

明清两代的铜活字，是刻是铸？说法不一。据研究，清代内府铜字，是手工刻成的，林春祺的铜字也是一个个刻成的。此外，其它铜活字的制作情况，文献无征，不得而知。明清两代铜活字印本，传世至今的只有20多种，几乎全部藏在北京图书馆。

锡活字和铅活字

王祯《造活字印书法》中有"近世又铸锡活字"之语，这说明元代初年，我国就出现了锡活字。另外，也有关于明人华燧制造"铜版锡字"之说，似乎华燧在大造铜活字的同时，也铸过锡活字。可惜语焉不详，我们无法了解元明两代铸造锡活字的具体情况。

清代始有关于锡活字的明确记载，十九世纪中叶，有个叫卫三畏的美国人记载了广东佛山唐姓书商铸造锡活字的详细情况。佛山是清代四大名镇之一，又是当时南方的出版中心，纸行、墨行、刻字行、书籍行遍布全镇。唐姓书商为了印刷当时最畅销的赌博彩票，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开始，化了一万多元铸造了20多万个锡活字，这些锡活字依照字体分为三套：一套是漂亮的

扁体字，一套是长体大字，一套是作注解用的长体小字。他铸造锡活字的方法是：先在小块木头上刻字，然后把刻好的字压印到澄泥上，做成泥模，再把熔化的锡液浇入泥模，等锡液冷却后，打碎泥模，锡字就铸成了。铸成之后，还要进一步整修，使所有锡字高低大小一致。印刷的时候，把锡字摆在坚固的梨木盘里，札紧四周，中用黄铜条作界行，然后上墨印刷。唐姓书商用锡活字除了印刷彩票之外，还印了马端临《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全书共19348面，装订成120大册，大字悦目，纸张洁白，墨色鲜明，质量很高。

铅活字始于明代，明人陆深《金台纪闻》说："近日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毗陵即常州，这说明常州不仅有铜活字，且有铅活字。可惜缺乏较为详细的文献资料，也没有实物可证。

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它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世界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套 印 本

套印的产生标志着雕版印刷技术的重大进步，是雕版印刷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套印的产生

公元前2世纪以后，我国陆续出现了很多传注之类的解释性著作，如《春秋》有左氏传、谷梁传、公羊传；《春秋左氏传》又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史记》有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等等。为了便于学习，必须想办法把不同著作方式的内容用不同颜色的标抹圈点区别开来。相传早在一世纪时，研究《春秋》的贾逵、董遇等人就已经用朱墨二色来写

《春秋》的传注。6世纪时，有人把《神农本草经》和陶宏景《本草集注》合为一书，用红笔抄写《神农本草经》原文，用墨笔抄写陶宏景所集注文。7世纪初，陆德明《经典释文》也“以墨书经本，朱字辩注，用相分别，使较然可求”；①敦煌所出唐写本佛经也有用朱墨二色分写经注的。宋范冲根据《神宗实录》，“为《考异》一书，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②宋翰林学士张洎等撰《太祖纪》也是以朱墨二色分记太宗圣谕和史官采摭之事。以上是人们在抄写图书时，用朱墨二色区别不同内容的例子。用朱墨二色抄书，虽然内容界限分明，但是，天长日久，辗转传抄，很容易把朱墨二色混在一起，或把经文当作注文，或把注文当作经文。印刷术发明以后，用同一墨色印刷不同内容，更加困难，为了便于学习研究，人们又做了种种尝试：（一）用大字、小字把不同著作方式的内容区别开来，如正文作大字单行，注文作小字双行；（二）用阴阳文以示区别，如有人刻印《神农本草经》时，用阴文表示经文，用阳文表示名医传注；（三）用加括号的办法把传注之类同正文区别开来；（四）把不同著作方式的内容单独印刷，分开发行。但是以上这些方法远远不如写本那样朱墨分明，既醒目又美观。因此，如何使印本也像写本那样表示朱墨等色，就成为印刷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课题。后来，经过人们反复实践，终于发明了套印技术。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三幅彩印的《南无释迦牟尼佛》，其印刷时间是在辽统和年间（983～1011），这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套印作品，也就是说，至迟在辽代就已经发明了套版印刷技术，比欧洲第一本彩印作品《梅因兹圣诗篇》还早四百多年。元代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无闻和尚套印的《金刚经》经文红色，注文墨色。这是

①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

② 《宋史·范冲传》。

继辽代《南无释迦牟尼佛》之后，又一部较早的套印作品。套印一页要刻几次版，要刷印几次，费时费工费钱，成本较高，一般平民无力购买，书估亦无利可图，故一般书坊不屑为之。因此套印虽然在辽代就已发明，但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并没有被普遍采用，只是到了明代后期，套印才得以广泛应用。

那么，套印为什么会在明代得到广泛应用呢？第一，明代经济繁荣，为套印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套印成本高，刻一部书要多化几倍的钱，没有钱是办不成的。第二，明代印刷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这为套印普及作了技术准备。套印工艺复杂，达不到一定的技术水平是不行的。第三，明代套印的广泛应用也与评点盛行有关。所谓“评”，即评论，就是对书的内容发表意见，这些意见一般是写在天头上，因此又叫“眉批”；所谓“点”，即圈点，就是遇到精彩之处，在字旁加上圈点，说明这些地方语意深刻，应当深思。评点虽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它却很自由，常常能讲出大块文章难以讲到的妙处，寥寥数语，就能画龙点睛，因此颇受人们的欢迎。评点始于南宋，刘辰翁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评点《世说新语》和杜诗的人。除了《世说新语》和杜诗之外，他还评点过王维、李贺、陆游等人的诗，对后世影响较大。元代方回也喜欢评点，他所编唐宋诗选《瀛奎律髓》以评点的形式标榜江西诗派。明代评点之风最盛。李卓吾、杨慎、钟惺、孙鑛等都评点了不少书。李卓吾大胆冲破封建士大夫对文学的传统偏见，大力推崇通俗文学，评点有《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琵琶记》、《浣纱记》、《金印记》、《绣襦记》、《香囊记》、《鸣凤记》等。杨慎评点有《晏子春秋》、《商子》、《公孙龙子》等；钟惺评点了《水浒传》、《封神演义》等；孙鑛评点各类图书43种。另外，明代科举考试以八股文取士，“四书”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五经以宋元注疏为准绳。为了辅导人们应考，四书五经的评点著作尤其泛滥成灾，四书讲章充斥天下。总而言之，评点在明代是很时髦的东

西，有些书坊为了赶时髦，常常拼凑数十种评点著作刊行。有的甚至假托名人编造伪书欺世，如《檀弓丛训》假托南宋著名诗人谢枋得评点；《孟子》假托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评点；《疑耀》则假托李卓吾评点。坊刻本常常喜欢在书名前冠以“×××批评”、“×××批点”等字样，以招徕读者。明袁无涯刻本《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云：

> 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失则如批颊涂面，污辱本来，非可苟而已也。今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字一句之精神，无不拈出，使人知此为稗家史笔，有关于世道，有益于文章，与向来坊刻，夐乎不同。如按曲谱而中节，针铜人而中穴，笔头有舌有眼，使人可见可闻，斯评点所贵者耳。

由此可见，明代出版家对于评点非常重视。明代评点本的大量出现，是套印得以广泛应用的前提，尽管评点本并不一定都是套印本。

明清的套印

明代套印出版家的代表人物是闵氏和凌氏。闵氏一门如闵齐伋、闵光瑜、闵昭明、闵元衢、闵绳初、闵齐华、闵无颇、闵振业、闵振声等都刻过书，其中以闵齐伋最为著名。闵氏最早的套印本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套印的朱墨本《左传》，以后又相继套印了不少书。闵本的内容比较丰富，经、史、子、集等无所不有。其中闵齐伋刻有朱墨本《东坡易传》、《老子》、《庄子》、《列子》、《楚辞》、《陶靖节集》、《韦苏州集》、《王右丞集》、《孟浩然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花间集》等，还有三色本《孟子》、《战国策》、《杜子美七言律》和四色本《国语》等。闵光瑜刻有朱墨本《邯郸梦》，闵齐华刻有朱

墨本《九会元集》，闵绳初刻有四色本《文心雕龙》，闵昭明刻有朱墨本《新镌硃批五经七书》。凌氏一门有凌濛初、凌稚初、凌澄初、凌瀛初、凌汝亨、凌弘宪、凌启康、凌杜若等人。其中以凌濛初最著名。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崇祯初年，以副贡生授上海县丞，升徐州通判。他对当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极端仇视，曾献《剿寇十策》，后为起义军所困，呕血而死。所编“二拍”较为著名，“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凌濛初刻书多戏曲小说，多用朱墨二色套印，并附插图。所刻戏曲今存者有《琵琶记》、《绣襦记》、《幽闺记》、《南柯记》等。此外，还刻有朱墨本《韩非子》、《吕氏春秋》、《孟浩然集》等。凌汝亨刻有朱墨本《管子》，凌瀛初刻有四色本《世说新语》，凌濛初、凌瀛初合刻有三色本《古诗归》、《唐诗归》等，凌启康刻有四色本《苏长公集》。明代闵氏、凌氏套印本的特点是：四周有版框，中间无界行，纸张洁白如玉。两家共有套印本130多种，就质量而言，闵氏比凌氏好，“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①除了闵、凌二氏之外，明代的可考套印出版家还有一贯斋、庆云馆、苏之轼、版筑居、唐建元、茅映、程氏滋兰堂、张少吾瑞云馆等。

清代套印承袭明风，继续发展。据杨绳信《中国版刻综录》著录，清代套印出版者有40余家，其中有内府、二友堂、文美斋、书业堂、古香斋、北宜阁、守意龛、观海堂、红兰室、林栖梧、两广节署、步月山房、听雨斋、元和邱氏、享金宝石斋、芜城青云楼、径香阁、叶氏海录轩、读有用书斋、蒋立昂、汉口森宝斋、湖北官书处、赖古堂、方氏碧琳琅馆、樵石山房、粤东翰墨园、麈谈轩等。乾隆间内府刻有五色本《唐宋文醇》、《唐宋

---

① （明）谢肇淛：《五杂俎·事部》。

诗醇》、《曲谱》等；雍正间内府有《硃批谕旨》等；乾隆间内府还刻有《昭代箫韶》、《劝善金科》、《西湖佳话》等。北宜阁刻有《西厢记》，守意龛刻有《南游记》，两广节署刻有《文心雕龙》，步月山房刻有《四六法海》，听雨斋刻有《楚辞集注》，羊城青云刻楼有《聊斋志异新评》，径香阁刻有《天文地舆图》，叶氏海录轩刻有《文选》，汉口森宝斋刻有《东周列国志》，清许槤享金宝石斋刻有《六朝文絜》（图19），湖北官书处刻有《文章轨范》。就整体而言，清代前期套印好于后期。

以上就是我国古代套印的产生和发展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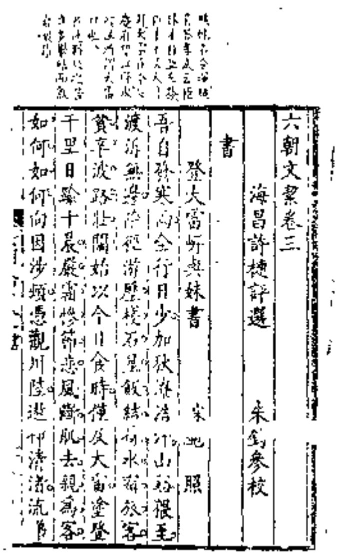

六朝文絜卷三
海昌許槤評選　朱鈞參校
書
登大雷岸與妹書　宋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為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盼

图19　清道光五年（1825年）许槤套印本《六朝文絜》（原件正文为墨色、眉批和圈点为朱色）

五、石　印　本

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30年代，随着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石印曾一度取代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的主导地位，垄断出版事业数十年之久，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石印出版家简介

石印首先出现在上海，点石斋、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三家鼎足而立，名噪一时。点石斋是光绪中叶上海规模最大的出版企业，有石印全张机十多部，并在北京、浙江、湖南、广东、江

西、贵州、广西、湖北、河南、四川、山东、陕西、甘肃、江苏、福建、山西、云南等地开设了20多个分店。点石斋石印的内容十分丰富，正如点石斋的一则广告所说：

> 专办一切石印经史子集以及中外舆图、西文书籍、名人碑帖画谱、楹联册页，花色齐全。①

点石斋开业后，第一获利之书是《康熙字典》，该书前后开印两次，印数10万部：第一次印4万部，不到几个月就卖完了；第二次又加印6万部，适逢某科举人赴京会试，途经上海，每人各买五六部，很快又抢购一空。后来，点石斋还印了不少通俗小说和丛书。如光绪十一年（1885年）印冯桂芬《校邠庐逸笺》，光绪十二年（1886年）印邹圣脉辑《五经备旨》，光绪十四年（1888年）印通俗小说《镜花缘》，民国十三年（1924年）印《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此外，还印有《皇清经解》、《史学丛刊》等。同文书局是光绪十年（1884年）开办的，规模颇大，有石印机12部，雇工500人。该局先后印有《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佩文斋书画谱》、《通鉴集览》、《子史精华》、《康熙字典》、《篆文六经》、《毛公鼎释文》、《茜窗小品画谱》、《快雪堂法书》、《谈瀛录》、《京尘杂录》、《四书古注群义汇解》等等，其中以《古今图书集成》和《二十四史》为最著名。拜石山房也印了不少书。

在点石斋、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的带动下，石印技术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据《贩书偶记》、《中国丛书综录》、《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书著录，从清末到民国，全国各地采用石印技术者有上海大通书局、上海文明书局、元和胡氏、上虞罗氏、武进陶氏、上海文瑞楼、罗田王葆心、上海会文堂书局、上海扫叶山

---

①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卷首图版。

房、桐城郑氏、沔阳卢靖、禹县存古学社、秋浦周氏、海宁王氏、商务印书馆、温州、潍县丁氏、上海脉望仙馆、上海锦章图书局、上海世界书局、上海鸿文书局、上海鸿宝斋、上海积山书局、上海蜚英馆、上海五凤楼、上海受古书店、上海六艺书局、上海千顷堂、大成书局、上海二酉书庄、上海广益书局、上海铸江书局、上海三星书局、集古阁、上海大东书局；宁波汲绠书庄、邵阳何氏、抚州府署、古今图书局、上海天宝书局、番禺沈氏、上海江东书局、北京龙文阁、北洋官报局、保定官书局、上海医学书局、上海有正书局、上海朝记书庄、上海书局、上海进步书局、上海珍艺书局、上海晋江书庄、粤东书局、上海富文书局、上海顺城书局、上海宝善书局、上海共和书局、上海十万卷楼、崇文书局、同人社、上海文元阁书庄、上海中西书局等百余家。从石印经营者看，官方、私人都有。官方如保定官书局印有《归钱尺牍》；抚州府署印有《格言汇编》、北洋官报局印有《畿辅通志》，等等。私人经营者如武进陶氏印有陶湘《喜咏轩丛书》；海宁王氏印有王国维《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潍县丁氏印有丁锡田《稼民杂著》；桐城郑氏印有郑福照《洁园遗著》等等。当然，比较而言，私人经营石印者最多，印的书也最多。从石印的分布地区看，有上海、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浙江、江苏、四川、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山西、山东、甘肃、陕西等20多个省市，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上海，上海是当时我国石印的中心。就上海地区而言，又以扫叶山房、上海书局等为最著名。扫叶山房的创始人是席世臣，早在明末就设肆于苏州阊门，因与苏州叶氏书铺争利，故名"扫叶"。后来又在上海、汉口等地设立支店。据《扫叶山房发行石印精本书籍目录》统计，扫叶山房先后石印各种图书419种。今人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坊刻本》说：

清时书坊刻书之多，莫如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如《十七

史》、《四朝列史》、《百家唐诗》、《元诗选癸集》为其最著者 贩夫盈门，席氏之书不胫而走天下。

过去许多著作，如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杨立诚等《中国藏书家考略》、吴晗《江浙藏书家考略》等均将席世臣误作“席鉴”，应予纠正。席鉴，字玉照，室名酿花草堂（一名敏逊斋），留心说部小集，与席世臣是同时代的两个人。①

石印本的内容

就整个石印本的内容来看，有四个方面：

第一，常用古籍。这类图书数量最多。在众多的石印古籍中，经史子集四部皆备。经书如《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五经备旨》、《御纂七经》、《说文体例》、《说文定声》，等等；史部如《二十四史》、《历朝纪事本末》等；子部如《百子全书》、《二十五子汇函》、《子书四十八种》、《仲景全书》、《潜斋医学丛书》，等等；集部如《七子诗选》、《历代诗话》、《晋四家诗》、《宋代五十六家诗集》、《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等。根据《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传世石印丛书有144种，单是扫叶山房一家就有18种，这18种丛书是：

李氏五种　（清）李兆洛撰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印
国朝文录　（清）李祖陶辑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印
梁氏笔记　（清）梁章钜撰
　　清宣统元年（1909年）印
金壶七墨　（清）黄钧宰撰

① 瞿冕良：《版刻质疑·其它》。

民国元年（1912年）印

娱萱室小品　雷瑨辑

民国6年（1917年）印

虞初志　（明）汤显祖撰

民国6年（1917年）印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明）张溥辑

民国6年（1917年）印

陈修园医书全集六十种

民国8年（1919年）印

百子全书　（清）崇文书局辑

民国8年（1919年）印

唐人说荟　（清）陈世熙辑

民国11年（1922年）印

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

民国13年（1924年）印

五朝小说大观

民国15年（1926年）印

曾文正公六种汇刻　（清）曾国藩撰

民国22年（1933年）印

顾氏医镜　（清）顾靖远撰

民国23年（1934年）印

清人说荟　雷瑨辑　民国印

八家四六文钞　（清）吴鼒辑　民国印

江左十五子诗选　（清）宋荦辑　民国印

十子诗选　（清）沈德潜选

民国29年（1940年）印

第二，通俗小说和唱本。据《小说书坊录》著录，地处上海的上海书局石印小说103种、锦章图书局石印小说38种、广益书局石印小说33种、会文堂石印小说17种、同文书局石印小说10

种、铸记书局石印小说10种、章福记书局石印小说8种、文宜书局石印小说11种、海左书局石印小说5种，等等。石印唱本也不少，据孙殿起《琉璃厂小志》记载，北京"民国十年前后，菜市口同达堂前，有两家小书摊，专售石印七字唱本，种类至多"。

第三，地图和画刊。石印地图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印《江西全省舆图》，光绪十七年（1891年）印《吉林通志》和宣统七年（1909年）印《甘肃新通志》中的图版部分。画刊有单色、彩色两种，单色画刊如《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新世界画册》、《时事报图画旬刊》、《图画日报》、《民立画报》、《小说画报》、《书画谱报》、《求我报》、《蒙学画报》等。《点石斋画报》于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八日创刊，这一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因此刊有不少关于中法战争的画面，该刊为蝴蝶装，旬刊，随《申报》附送。文明书局有石印机三部，专门设立彩色石印部，印刷彩色课本、图画和地图。

第四，报刊和新著之书。据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统计，清末石印报刊有《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蒙学报》、《萃报》、《农学报》、《格致新闻》、《工商学报》、《普通学报》等。光绪间反映中日甲午战争的石印新书有《东方兵士纪略》、《绘图扫荡倭寇纪要初集》、《谏止中东和议奏疏》、《普天忠愤全集》、《中东大战演义》、《刘大帅百战百胜图说》、《刘大将军大事记》等。

石印的优缺点

石印有哪些优点呢？第一，省工。雕版印刷，工序复杂，而石印可省去许多工序。工序少则成本低，成本低则价也廉。第二，出书速度快。由于工序减少，自然要节省不少时间，提高生产效率。第三，能保持古书的本来面目。石印古籍善本，在版式、字画等方面尤不失古书风貌，远胜"影抄"、"影刻"等法。正是因为石印具有上述优点，所以才得以取代雕版印刷的主

导地位，独步一时。

当然，石印也不无缺点。书商为了速售，多将原书缩印作袖珍本。袖珍本固然价格便宜、便于携带，但蝇头小字，不便阅读。有的书商为了招徕顾客，随意标新立异，常将原书稍加变动，带来一些混乱，通俗小说石印本变换书名者甚多，形成一种风气。清末书坊多把《三国演义》、《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白圭志》、《斩鬼传》、《驻春园》等10部书称为"十才子书"。书坊石印时多题"第×才子书"，而不题真实书名。有的石印本底本欠佳，以致谬种流传。同文书局石印《二十四史》便是一例，钱基博《版本通义·读本第三》指出：

> 徒以所得非初印本，字迹漫漶，乃延人描使明显，便于付印；又以书手非通人，遇字不可解者，辄改以臆，讹谬百出。尤可笑者，自言所据乾隆四年本，而不知四年所刻，固无《旧五代史》，又未见乾隆四十九年殿本，辄依殿版行款，别写一通，版心亦题"乾隆四年"，书估无识，有如此者。然世乃以其字迹清朗，称为佳本。竹简斋印《二十四史》，遂用同文书局本，故错字一仍其旧。

不过，总的说来，石印本的缺点与其贡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石印在古代文化的传播方面作出了贡献。许多古籍传世刻本极少，众多的石印本使其得以广为流传。

第三编　中国古籍版本鉴定

第一章　根据内容鉴定版本

一、卷　　数

卷是古籍的重要计量单位之一。

篇与卷

篇和卷都是古籍计量单位，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就产生时间而言，篇早于卷，因为“篇”开始是简策的计量单位，“卷”开始是帛书的计量单位，简策的出现比帛书要早。就作用而言，“篇”主文义起讫，不可分合；“卷”主帛书短长，可以分合。但是汉代竹帛并行，二者几乎没有严格的界限了。卢文弨《钟山札记》卷一说：

> 篇即卷也。《汉志》：《易》皆言篇，《诗》皆言卷。其余一类之中，或篇或卷不一，至末总其数云：“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此非“篇”即“卷”乎！

分卷方法

一书多卷，分卷方法并不一样。或一篇就是一卷，《汉志·孝经类》著录十一家五十九篇，五十九篇就是五十九卷。但是

《汉志》中也有卷大于篇的。例如《诗经》三百零五篇，《汉志》著录为二十八卷。纸书盛行之后，卷大于篇的现象非常普遍，如《墨子》七十一篇，高儒《百川书志》著录为十五卷；《文心雕龙》五十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卷，等等。既然卷大于篇，那么一卷到底有多少篇呢？这要考虑各卷篇幅长短的平衡、各卷内容的相对独立等因素，因书而异。例如宋代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诗》，每100首绝句为一卷；① 明叶盛《菉竹堂书目》四卷，经史子集各一卷；明陈堦《日涉编》十二卷，杂采故实诗歌，按时令编次，每一月为一卷；明何伟然《广快书》五十卷，收书50种，每一种书为一卷；清内府编《佩文韵府》正集四百四十四卷，拾遗一百一十二卷，以韵分卷，每韵一卷。

卷次的命名

一书多卷，卷次的命名方法也很复杂，一般说来，绝大多数古籍都用一、二、三……依次命名，但也有下述情况：

（一）二卷本用"上下"、"内外"、"前后"等命名。例如宋费枢《廉吏传》二卷，便用"上下"命名。

（二）三卷本用"上中下"命名。如唐林慎思《伸蒙子》三卷和唐殷璠《河岳英灵集》三卷便是。

（三）四卷本用"甲乙丙丁"、"春夏秋冬"、"元亨利贞"等命名。例如唐陆龟蒙《笠泽丛书》四卷用"甲乙丙丁"命名；明嘉靖刻本韩邦奇《启蒙意见》四卷用"元亨利贞"命名。

（四）五卷本用"甲乙丙丁戊"、"宫商角徵羽"等命名，例如元王士点《禁扁》五卷用"甲乙丙丁戊"命名；明万历刻本王兆云《王氏青箱余》十卷，前五卷用"仁义礼智信"命名，后五卷用"乾元亨利贞"命名；明段一元《化机汇参》五卷用"端的上天梯"五字命名。

① 本节所举各例的版本除注明者外，均为《四库全书》底本。

（五）六卷本用“礼乐射御书数”命名。例如明罗汝芳《近溪子集》六卷和抄本高攀龙《高子未刻稿》六卷便是。

（六）七卷本用“王侯将相有种乎”等命名。例如宋谢枋得《文章规范》七卷，旧本用“王侯将相有种乎”七字命名，清刻本又用“九重春色醉仙桃”七字命名。

（七）八卷本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命名。清厉鹗《樊榭山房集》前集诗八卷便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命名。“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是一个典故。传说东汉汉安二年（143年）五月五日，会稽上虞（今绍兴）人曹盱溺死江中，他的一个14岁的女孩名叫曹娥，沿江呼号，悲痛不已，17天后投江而死。当地的人为了表彰曹娥之孝，在江边特树“曹娥碑”，碑文由13岁的才子邯郸淳书写，深受人们称赞。①后来，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慕名而来。他读了以后，认为碑文的确写得很好，名不虚传，便在碑的背面写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8个大字。这8个大字是什么意思呢？“黄绢”指带颜色的丝织品，即“绝”字；“幼妇”指少女，即“妙”字；“外孙”指女儿的孩子，即“好”字；“齑臼”指盛放酱菜的器皿，即今“辞”字（异体字作“辤”），合起来即为“绝妙好辞”4个字，称赞碑文写得好。

（八）十卷本用天干命名，例如明隆庆刻本王交《绿槐堂稿》十卷、宋《群公四六续集》十卷等便是。此外，也有用“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等命名的。

（九）十二卷本用地支命名。明郑太和《麟溪集》二十二卷，前十卷用天干命名，后十二卷用地支命名。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十二卷，鲍氏刊本用“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十二字命名。

---

① 《后汉书·曹娥传》。

还有用二十八宿、千字文等命名的。例如明嘉靖本何良俊《何翰林集》二十八卷用二十八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命名；明万历刻本《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二十卷用“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命名，佛经刻本多用千字文命名。

卷数的增减

一书多卷，在流传过程中，卷数常常发生变化，有的增多了，有的减少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内容有所增加。如许慎《说文解字》原书分十四篇，叙目一篇，许慎之子许冲奏上时以一篇为一卷，共十五卷。后来徐铉校此书时，除纠正脱误之外，又增加了反切、注释和新附字，以其篇帙繁重，每卷又各分上下，变成三十卷。宋代杨甲《六经图》原本六卷、三百零九图，后来东嘉叶仲堪重新编订，增图八十幅，卷数也因此由六卷变成七卷。《文选》旧本三十卷，唐代李善作注后，每卷一分为二、全书遂增至六十卷。第二，内容有所亡佚。宋代龙衮《江南野史》原本二十卷、八十四传，后亡佚五十传，到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只见到十卷本。清姚际恒《九经通论》原本一百六十三卷，而今天只能看到《诗经通论》数十卷和《春秋通论》残卷。第三，刻书者的任意分合。有些刻书者喜欢改变卷数，标新立异。朱熹《诗集传》原本二十卷，后来坊刻肆意合并，清编《四库全书》时，只看到八卷本。陈彭年《江南别录》原本四卷，宋齐梁陈每朝各一卷，可是，到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只看到一卷本，那是后人把四卷合成一卷了。第四，计算方法不一。宋吕祖谦《春秋左氏传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将《续说》四册一并计算，著录为三十卷，《四库全书总目》不计《续说》著录为二十卷。《周易注》，其中包括王弼《易注》六卷，《略例》一卷、韩康伯《系辞注》三卷；王俭《七志》将三者合计著录，得

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和《旧唐书·经籍志》仅计王弼所撰，得七卷（包括《略例》在内）。《后汉书》一书，《新唐书·艺文志》析其子卷计之，得一百卷，《宋史·艺文志》合其子卷计之，得九十卷。第五，一书原无定本。如宋程颐《易传》，王称《东都事略》作六卷；《宋史·艺文志》作九卷，这是为什么呢？据杨时跋，程颐没有写完《易传》就死了，其门人张绎续作，没有多久，张绎也死了。因为《易传》这本书根本没有定本，所以传本各异。第六，计算有误。例如明嘉靖刻本胡缵宗《鸟鼠山人集》，《四库全书总目》错误著录为二十九卷，《四库全书总目》说：

> 是编凡《正德集》四卷、《嘉靖集》七卷、《鸟鼠山人小集》十六卷、《后集》二卷。

四数相加正好二十九卷。其实，这里的四、七、十六、二等数应是各分集的终卷数，即《正德集》从第一卷至第四卷、《嘉靖集》从第五卷至第七卷、《鸟鼠山人小集》从第八卷至第十六卷，再加上《后集》二卷，共得十八卷。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了卷数的变化。

卷数与版本鉴定

卷数是我们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之一。卷数差异往往是同书异本互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卷数不同，也就意味着版本的不同。例如《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宋刻本一百卷；《四库全书》本和张金吾爱日精庐藏本一百一十卷；陆心源藏精抄本一百二十六卷。宋司马光《涑水纪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本十卷；清武英殿聚珍本十六卷；明范氏天一阁藏旧抄本二卷。各种杜诗注本分卷也不同：九家集注、黄鹤补注本为三十六卷；《草堂诗笺》本为五十卷；集千家注分类本为三十五

卷；刘须溪评点本为二十卷（外文集二卷、附录一卷）。宋张耒《文潜集》抄本有八十二卷本、六十五卷本和六十卷本等，明嘉靖郝梁本为十三卷，清武英殿聚珍本为五十卷。唐王绩《东皋子集》的版本有五卷本和三卷本两个系统，三卷本属于删节本，五卷本早已失传，传世刻本如明崇祯本、清孙星衍岱南阁本、罗振玉唐风楼本均属三卷删节本系统。利用卷数鉴定版本一定要详审卷数，详审卷数，仅仅查看目录是不行的，必须翻阅正文，因为目录和正文不一致的情况还是有的。有时候，可能"有书无录"，即正文卷数多，目录卷数少。如明天一阁刻本《京氏易传》目录二卷，正文则有三卷。有时候，可能"有录无书"，即目录卷数多，正文卷数少。如宋罗从彦《豫章文集》目录题十七卷，实则第一卷有录无书；明梅鼎祚《书记洞诠》目录题一百一十六卷，实则"补遗四卷"有录无书；清吴之振《宋诗抄》目录题一百零六卷，实则邓肃、魏了翁、方逢辰、岳珂、严羽、谢枋得、郑思肖、王柏等16家皆有录无书。

二、编　例

所谓"编例"就是指一书内容的编制体例。编例有时代性，一个时代的版本在编例方面往往会有某种倾向，这种时代倾向可以作为我们鉴定版本时代的一个依据。

宋代类书盛行，《宋史·艺文志》著录类书278部、10526卷，后来清人倪灿《补志》又增补类书2341卷。这些类书基本上都是依内容分类编排，例如《太平御览》分55部、5363类（如果加附类，共5426类）；《太平广记》分92个大类、150多个小类；《册府元龟》分1104类。在类书的影响下，宋本唐诗别集常常将内容分类编排，例如《韦苏州集》分为燕集、寄赠、送别、酬答、逢遇、怀思、行旅、感叹、登眺、游览、杂兴等类；《孟东野集》分为感兴、咏怀、游适、居处、行役、寄赠、怀寄、酬

答、送别、咏物、杂题、哀伤等14类；《姚少监集》分送别、寄赠、闲适、时序、风月、题咏、游览、宴集、和答、酬谢、花木、鸟兽、器用、哀挽、杂咏等类。为什么宋人喜欢分类呢？第一，宋代公牍、应酬文常作四六之体，为文词藻华丽，多掇拾前人佳句，别集分类编次，正可备作獭祭之用。元刘埙《隐居通议》说：

> 宋初承唐习，文多俪偶，谓之昆体。至欧阳公出……旧格遂变，风动景随，海内皆归焉。然朝廷制诰，缙绅表启，犹不免作对。虽欧曾王苏诸大儒，皆奋然为之，终宋之世不废，谓之四六，又谓之敏博之学，又谓之应用。

四六骈文讲求工对，分类之书不可或缺。第二，宋代举业甚盛，士子为了金榜题名，常常投机取巧、舍本逐末，遍求分类之书，权作敲门之砖，正如宋岳珂《愧郯录》卷九所说：

> 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日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至传习。

明本唐诗别集则与宋本不同，往往将内容分体编排。例如明正德王廷相序本《沈佺期集》将内容分为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五绝、七绝等类；明本《孟襄阳集》将内容分为五古、七古、五排、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等类；明本《岑嘉州集》将内容分为五古、七古、五律、五言长律、长短五七言、七律、五绝、七绝等类；明本《钱考功集》将内容分为五古、七古、五律、五言长律、七律、五绝、七绝等类。为什么明人喜欢分体呢？这与明代前后“七子”掀起的复古运动有关。早在“七

子"之前，为反对虚浮的台阁体，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就提出了效法唐诗的文学主张，他在《怀麓堂诗话》中说：

> 诗用实字易，用虚字难。盛唐人善用虚，其开合呼唤，悠扬委曲，皆在于此。用之不善，则柔弱缓散，不复可振，亦当深戒……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耳。

后来"七子"正式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李梦阳《与徐氏论文书》说：

> 夫诗，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贵宛不贵险，贵质不贵靡，贵情不贵繁，贵融洽不贵工巧。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庄波简侈浮孚之界分也。至元、白、韩、孟、皮、陆之徒为诗，始连联斗押，累累数千百言不相下，此何异于入市攫金，登场角戏也。

元、白等俱为中晚唐诗人，把他们比做"入市攫金，登场角戏"，其推崇盛唐诗歌之意，溢于言表。何景明在《大复集·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说得更明确：

> 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

明人推崇唐诗，重于各种诗体的写作方法，而不大关心其内容是"送别"或是"寄赠"等。为了迎合这种社会风气，明本唐诗别集多因体而编，以便人们模拟。

知道了宋本、明本唐诗别集编例之不同，在我们鉴别版本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作为区别宋本、明本的一个标准。关于这个问

题，万曼先生在《唐集叙录》中多次提到，该书《韦苏州集叙录》说：

> 宋人编定唐集，喜欢分类，等于明人刊行唐集，喜欢分体一样，都不是唐人文集的原来面目。

当然，编例包括的内容很多，以上只是举例而已。但是，利用编例的时代特征鉴定版本，也不能绝对化。例如宋本唐集喜欢分类，也并非一概如此。在不少宋本唐集中，常常是分类、分体并用，只不过以分类为主而已。在我们鉴定版本的时候，还要综合考虑其它方面。

三、学术源流

学术的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可以分为若干阶段。这些阶段有先有后，有源有流，不可颠倒其先后关系。例如古代诗歌有古体诗和近体诗之别：古体诗在前，泛指唐代以前的诗歌，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不求对仗，平仄和用韵比较自由；近体诗在后，泛指唐代形成的律诗和绝句，句数、字数、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规定。如果有人说魏晋时期出现了七绝，那就不符合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另外，在学术发展的各个阶段中，通常又有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除了具有共性之外，亦各具特征。例如，近体诗发展到宋代就出现了西昆体、江西诗派、江湖诗派等派别：西昆体专从形式上模仿李商隐，一意堆砌词藻和典故；江西诗派崇尚瘦硬风格，要求字字有来历，每每袭用前人诗意而略改其词；江湖派是指政治上没有地位的江湖诗人的诗风。实际上，在各个派别之中，每个诗人也有区别于他人的作品风格和学术思想。就是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也常常会有变化，不可能始终一

致。古今中外莫能例外。例如鲁迅先生开始是进化论者，到了后来才成为共产主义者。一个从事古籍版本鉴定的人，如果熟悉古代的学术源流和学术派别，熟悉古人的思想演变过程，就可以把古籍版本鉴定工作从表皮深入到里层，就能使古籍版本鉴定工作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之上。下面以太平天国刻本的鉴定为例加以说明。

在太平天国刻本之中，有的书刻印多次，怎样将初刻本和重刻本加以区别呢？封面标识的刊刻年代完全相同，非要从内容入手不可。在内容方面，重刻本与初刻本多有不同，萧一山在《天条书》跋中曾经谈到两种本子的不同：

> 其尤不同者即序言中"方孝顺得父母乎"下加商汤周文事一段。又"妄说拜上帝是从番"下加中国有史鉴可考一大段，是洪氏思想之重要变迁，其踪迹已显然可寻，而以拜上帝为中国古代遗教，秦汉以后始差入鬼路，用意甚明，惜乎晚矣。①

萧一山在校对了《太平诏书》两种本子的文字异同之后总结说：

> 太平诸人思想之变化颇有足征者，当其初起，惟以尊上帝拜基督为事，举中国一切之圣经贤传胥毁弃之，因有不准读孔孟书之条……今改正本所增文句皆引据经典，故为佐证。盖积数年之经验，因社会之情形，不得不翻然变计。（出处同上）

因此，萧一山认为：凡不引据儒家经典而宗教意味特浓的为初刻本，凡引据儒家经典而富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则为改正重刻本。王

---

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现存经籍考》。

重民、郭廷以、罗尔纲等人的看法与萧一山截然相反。王重民说：

> 盖太平军之初起也，虽利用天主教义，然洪秀全诸人非深于教义者，故诏书谕旨多援用儒家思想与术语，及用耶稣以设教，渐渐深入兵士之后，乃完全定天主于一尊，遂排斥儒教，此必然之势也。（出处同上）

因此，王重民认为：凡引据儒家经典与近于儒家思想的为初刻本，凡改削所引儒家经典以谋渐合于耶稣教的则为改正重刻本。郭廷以说：

> 《太平诏书》内收天王论文三篇，一种本子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另一种本子，"歌"、"训"均作"诏"。按此三文乃天王为塾师时所作，原稿当作"歌"、"训"，举事后初刻未及改，至重刻乃改为"诏"。故歌训本当为初刻本，而诏字本当为重刻本。

> 洪杨初起事时，其基督教之知识有限，教义认识不清，而秀全本人及其编纂者又皆幼读经传、久受传统道义熏陶之人，因之行事论文，常用旧有成典，仍带儒家色彩，而不能出其范围。稍后教义认识加深，情绪增浓，遂举一切经传术语故事而排除删改之。盖愈至晚年，天王之宗教信心愈诚愈坚，初不过借宗教以愚人，至是竟自身亦为所愚。（出处同上）

因此，郭廷以认为：萧一山所谓改正重刻本实则初刻本。罗尔纲列举大量证据说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删改儒家经典的事实：

甲寅四年（1854年）二月天王诏令曾钊扬、何震川等删改儒家经典《六经》，以曾钊扬总其成；卢贤拔以罪革职，亦与删书之役。天王洪秀全诏曰：

> 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钦此。（出处同上）

这里，《诗韵》即《诗经》，天王此时认为《诗经》等儒家经典没有资格称“经”，故改名《诗韵》。罗尔纲先生在对重刻本与初刻本认真比较之后说：

> 对太平天国旨准颁行诏书的版本问题，今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了：天王洪秀全本儒生，久受儒家传统思想的薰陶，虽以耶稣教发动革命，而其初所认识的教义仅限于梁亚发的《劝世良言》；故当时所著述多援用儒家思想与术语，不能出其范围。其后起义建国，急于宣传，而军事倥偬，未及删改，遽尔付刻。及定都天京，草创渐定，“万样更新”，于是乃有删书之举，定一尊于上帝，以谋宗教上思想上的统一化，于是遂排斥儒教。这原是一种很自然的趋势。（出处同上）

比较而言，王重民、郭廷以、罗尔纲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引用儒家经典较多、具有浓重儒家传统思想的本子是初刻本；删改儒家经典、宗教思想特浓的本子是重刻本。这是一个根据内容鉴定古籍版本的范例。这个例子说明两个问题：（一）根据内容鉴定版本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必要。（二）根据内容鉴定版本并非易事，没有对有关学术演变源流的深刻了解，即使

注意到了版本内容，也仍然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四、名物制度

我国历史悠久，朝代众多，名物制度常常因时而异。不了解名物制度的变迁历史，就会犯常识性错误。陈垣先生在《元典章校补释例》第五卷中专门谈了沈刻《元典章》在名物制度方面的九条错误：

（一）不谙元时年代而误例：元祐、正统分别为宋、明年号，而沈刻《元典章》却误作元代年号。

（二）不谙元时帝号、庙号而误例：元有太祖、世祖而无圣祖，而沈刻《元典章》有之。

（三）不谙元时部族而误例：元时部族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而沈刻《元典章》误"色目"为"色日"。

（四）不谙元时地名而误例：元有"重庆路"而无"重庆府"，而沈刻《元典章》误作"重庆府"。

（五）不谙元时人名而误例："帖木儿"为元时常见人名，而沈刻《元典章》误作"站木儿"。

（六）不谙元时官名而误例："总把"为元代官名，"把总"为清代官名，而沈刻《元典章》误作"把总"。

（七）不谙元时物名而误例：元称"被絮"为"絮被"，而沈刻《元典章》有"冬则终以被絮暖匣"之误。

（八）不谙元时专名而误例：元代"腹里"专指中书省所辖山东西、河北之地，而沈刻《元典章》误"腹里"为"肠里"。

（九）不谙元时体制而误例：元代皇帝圣旨称"钦此"，皇太后懿旨及太子令旨称"敬此"，沈刻《元典章》多把"敬此"误作"钦此"。元代规定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二弦（初八、二十三）为禁刑日，四天之内不得杀害生物。沈刻《元典章》不谙此制，遂有"禁刑日每月初二、初八、十五、二十五"

之误。元代规定京府州县官员每日早聚圆坐，参议公事，称为“圆坐署事”，颇似现代的圆桌会议。其所议谓之“圆议”；其所签押谓之“圆签”或“圆押”。沈刻《元典章》不谙此制，多误“圆”为“图”、“原”等。

陈垣先生讲的虽然是刻书、校书，但是对于鉴定古籍版本也完全适用。古籍涉及大量的年号、庙号、地名、人名、物名、规章制度等，这些名物制度常常因版本不同而不同。不熟悉这些名物制度，就无法从内容上鉴定版本。兹以《皇舆全图》为例加以说明：

《皇舆全图》是全国地图，原著录为“木刻本”，刻印时代不详。但既然是地图，总要标识地名，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地名的时代特征判断其刻版时代。该图山西省内有“朔平府”、“右玉县”、“左云县”、“平鲁县”等地名；陕西省内有“耀州直隶州”、“乾州直隶州”、“鄜州直隶州”、“葭州直隶州”、“绥德直隶州”等地名；直隶省内有广平府“磁州”等地名。据《雍正实录》卷三十二记载：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设朔平府，治右玉，大同右玉卫改右玉县，左云卫改左云县，平鲁卫改平鲁县。同书卷三十六记载：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西安府之华、耀、邠、乾六州和延安府的鄜、葭、绥德三州俱升为直隶州。同书卷四十三记载：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河南彰德府之磁州改属直隶广平府。以上记载均与《皇舆全图》相合。又据《雍正实录》卷四十六记载：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末，湖北景陵县改天门县。图中未有反映。因此，《皇舆全图》绘制刻版年代当在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至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之间。此图字迹线条纤细挺直，棱角分明，和常见的乾隆铜版非常相似，当非木刻，应属铜版。①

这个例子说明考证包括地名在内的各类名物制度，对于鉴定

---

① 崔建英：《古籍著录琐见》，载《图书情报工作》1981年4期。

版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五、内容时限

任何人物的活动，都不能超越特定的历史时期；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不能超越特定的历史背景。作为记人记事的古籍，也有相应的时限范围。我们可以把内容时限作为鉴定版本的一个依据。例如一本记载明初宋濂事迹的图书，那么，这本书的版本时代当在明代中期之后，最早不得超过明代初期。如果把这本书定为宋本，那就不对。一本书记事截止清代乾隆年间，那么这本书的版本时代当在清代乾隆之后，最早不得超过清代乾隆年间。如果把这本书定为明本，那就不对。下面再看几个具体例子：

《新锲皇明纪政录》，或据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陈建序定为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刻本。查该书为编年体史书，书中记事已至明隆庆六年（1572年），因知此书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刻板之后，尚有续刻，续刻时间不应早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

《皇明诏令》，或据该书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黄臣序及目录所载时间定为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刻本，查该书所载诏令实至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因知此书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之后，尚有续刻，续刻时间不应早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①

《太岳太和山志》，或据明隆庆六年（1572年）凌云翼序定为明隆庆六年（1572年）刻本。查该书记事已至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知此书在明隆庆六年之后尚有续刻，续刻时间不应早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②

---

① 《中国善本书提要·皇明诏令提要》。

② 同上书《太岳太和山志提要》。

明张孚敬《罗山诗稿》，或据版刻风格定为明正德刻本。查该书所载诗作以编年为序，始“辛未”终“丙申”，“辛未”即明正德六年（1511年），“丙申”即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仅就内容时限而论，已远非明正德刻本。又考张孚敬原名“璁”，因犯嘉靖皇帝朱厚熜讳，请旨改名，嘉靖皇帝因赐名“孚敬”。《罗山诗稿》卷三《吊桂见山三首》自注云：

上御文华殿问臣孚敬曰：“桂萼安否？”时予已逝数日矣！伤哉！

这里既载“孚敬”之名，可见此事当发生在嘉靖皇帝赐名之后，非正德刻本所应载，正德间张孚敬尚名张璁。因知此书决非正德刻本。①

以上数例说明古籍时限与版刻年代密切相关。我们鉴定版本的时候，必须详察内容的时间下限，做到版刻时代与内容时限相一致。鉴定方志尤应注意这种情况，因为方志刻版之后，续修续刻之举司空见惯，如将续刻之本混同原刻，那就不符合客观事实。

六、篇　　目

篇是古籍的最小单位。篇目的数量、排列等也是鉴定版本的依据，下面略举数例：

北京图书馆藏《新编对相四言》是一种儿童读物，“相”就是“图”，一字一图，看图识字。有人以为是明初刻本，王重民先生根据篇目的排列次序定为明嘉靖、万历间刻本，他在《中国善本书提要·新编对相四言》中说：

---

①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审订札记》，载《图书情报工作》1983年第1期。

其刻书时代，余疑应在嘉、万间。何也？第八页载算盘，一如今式，而次于算子（即筹算）之前。考陶宗仪《辍耕录》，虽有“算盘珠”之名，而明初人布算，尚莫不用筹，其确言用算盘，始见于景泰元年吴敬之《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至万历二十年程大位《算法统宗》出，算盘之用始广。盖正德、嘉靖间算盘始稍稍普及。是书列算盘于算于前，必在盘珠胜于算筹之后，余因谓必非明初刻本也。

明凌氏四色套印本有六卷本和八卷本两种，两种版本均用同一版片印成，孰先孰后，世鲜知之。王重民先生从对照两本的篇目入手，发现八卷本将六卷本的文学、赏誉、轻诋三类各分上下两篇，并变易分卷方法，遂多出两卷。又通过对校两本文字异同，终于得出结论：六卷本先印，八卷本后印。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世说新语》中曾经详细谈及鉴定经过：

八卷较六卷本多两卷，凡增出之卷，必须空出书题一行，类目标题一行。如八卷本卷一凡三十四页，即用六卷本前三十四版，而问题在八卷本如何增出书题“世说新语卷二”一行，类目“言语下”一行，因六卷本之第三十五页无此空地也。其方法为改刻第三十六页全版，增入书题及题目，而删减注文，俾空出两行（“晋武帝始登祚”条，删去注内“咸熙二年”四字及条末全注。“诸葛靓在吴”条，删去注文十余字，将原版四行改为三行。）则适成为一新本矣。但不对校，不知其技不过如此而已。

以上二例说明内容篇目可以作为我们鉴定版本的线索，抓住这个线索，利用考订学术源流、校勘文字异同等方法就可以弄清刻印时代。

七、内 容 文 字

内容文字是古籍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同版本的文字差异大量存在。一字之差，意思甚或大相径庭。杜牧《秋夕》诗云：“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刻划了一个纯真无邪的少女形象。第三句是环境描写，“天阶”指天井里的平台，是少女活动的空间，凉如水的夜色是少女活动的背景。然而，《唐诗三百首》中“天阶”作“天街”；《四部丛刊》本《樊川文集》中“天阶”作“淫阶”；《唐人绝句精华》中“天阶”作“瑶阶”。一字之差，境界全非。作“天街”的本子把诗中少女说成“宫女”，暗中突出一个“怨”字。这种解释与少女的情态格格不入。①当然，我们不想在这里过多地评论是非，但是此例至少说明文字差异常常是不同版本互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下面我们再举两个例子：

唐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收有朱湾《咏三》诗：“献玉屡召疑，终朝省复思。即哀黄鸟兴，还复白圭诗。请益先求友，将行必择师。谁知不鸣者，独下仲舒帷。”为什么题为《咏三》？因为该诗每一句都包含一个“三”字，第一句“献玉屡召疑”指楚人卞和三次献玉之事；第二句“终朝省复思”指代《论语·学而》中“吾日三省吾身”之句；第三句“即哀黄鸟兴”指这样一件事：秦穆公死，命以奄息、仲行、鍼虎三个良人殉葬，国人因作《诗经·秦风·黄鸟》，寄托对三人之哀思；第四句“还复白圭诗”指“南容三复白圭”之事，语详《论语·先进》；第五句“请益先求友”指“益者三友”，语详《论语·季氏》；第六句“将行必择师”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语详《论语·述而》；第七句“谁知不鸣者”指淳于髡和齐威王的一段对话：

---

① 臧克家：《一字之差，境界全非》，载《文史知识》1990年6期。

"淳于髡说于齐威王曰：'国中有大鸟，止于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事详《史记·滑稽列传》；第八句"独下仲舒帷"指汉董仲舒"三年不窥园"之事。后人不解诗意，把"三"字改作"玉"字，妄题《咏玉》，元明刻本皆然。知道了这一点，鉴定元明刻本就便当多了。①

清程伟元萃文书屋曾先后两次用木活字排印古典名著《红楼梦》：第一次排印时间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世称"程甲本"；第二次排印时间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世称"程乙本"。程甲本和程乙本有什么区别？俞平伯先生曾将甲乙两本对勘，发现两本异文多至5900余字。"第一回"的"回"字，程甲本作"囬"，程乙本作"回"。正文第十四回标目，程甲本作"林如海捐馆扬州城"，程乙本作"林如海重返苏州郡"。

八、小　　结

通过内容鉴定版本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以上只是举例而已。著名学者沈从文先生对于古代服饰很有研究，他根据南唐降宋官吏一律服绿的规定，断定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成于宋初南唐投降之后，而不能成于李煜未降以前。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中还就鉴定古代名画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 历代鉴定画迹时代的专家，多习惯于以帝王题跋、流传有绪、名家收藏三大原则作为尺度，当然未可厚非。可最易忽略制度的时代特征……古人说："谈言微中，或可以排难解纷。"但从画迹本身和其它材料互证，或其它器物作旁证的研究方法，能得专家通人点头认可，或当有待于他日。

---

①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中兴间气集提要》。

这就是说，人们鉴定名画往往侧重于帝王题跋、流传有绪、名家收藏等外在方面的东西，而忽略了事物“制度的时代特征”，忽略“从画迹本身和其它材料互证、或其它器物作旁证的研究方法”。沈先生讲的是名画鉴定，但是对于古籍版本鉴定也完全适用。对于古籍版本鉴定来说，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外在特征鉴定版本，而忽略了版本内容的鉴定，应当纠正这种不良倾向。当然，我们这里说的“版本内容”是狭义的，仅指卷页正文的内容。广义的“版本内容”应该包括序跋、卷端题名等所涉及的官名、地名、人名等，因为弄清它们的时代，是不可能“一望而知”的，必须进行一番考证功夫。

第二章　根据形式鉴定版本

一、书　名　页

书名页是古籍结构的组成部分。

书名页的类型

书名页有四种类型：(一)只有书名。如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刻本《赖古堂集》书名页仅题“赖古堂集”四字；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刻本《雪庄西湖渔唱》书名页仅题“雪庄西湖渔唱”六字。（二）除了书名之外，还有刻书者（或藏版者）。如清雍正九年（1731年）陆氏水云渔屋刻本《南宋诗选》书名页除了书名之外，于左下角题“水云渔屋刊本”六字；清康熙刻本《西昆酬唱集》书名页除了书名之外，于左下角题“本衙藏板”四字。（三）除了书名、刻书者（藏版者）之外，还有刻书时间。如清嘉庆四年（1799年）席氏扫叶山房刻本《钱塘遗事》书名页中题大字书名，右上小字题“嘉庆己未年镌，”左下小字题“扫叶山房藏板”；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朴存堂刻本《曲目新编》，书名页中题大字书名，右上小字题“道光二十三年刻”，左下小字题“朴存堂藏板”。（四）除了书名之外，还有广告式的文字或插图。如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翠岩精舍刻本《广韵》书名页除题大字书名之外，右边小字题“五音四声切韵图谱详明”十字，左边小字题“至正丙申仲夏绣梓印行”十字，横眉题“翠岩精舍校正无误”八字（图20）；明万历间福建书林金拱塘刻本《新调

万曲长春》书名页分上下两节，上图下文。上图有对联云："洒落千般调，清新万曲齐"。下部除了大字书名之外，还有小字"徽池滚唱新白"、"书林金拱堂梓"等字样。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刻本《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书名页除大字书名外，右边小字题"十月十一两月因事未出此书，请看官恕之，嗣后必随月随出"；左边小字题"儒者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横眉小字题"道光癸巳年十二月"。这是一本类似期刊一样的出版物，自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起，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至，初刊于广州，后迁新加坡刊行，多载宗教、政治、科学、商业等内容。



图20　元翠岩精舍刻本《广韵》书名页

以上四种类型，除第一类外，其它三类都揭示了刻书时间、刻书者（或藏版者），为我们鉴定版本提供了线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须知，翻刻者常将原刻书名页照样刻出，这样的书名页就不足为据。有的书商甚至伪刻书名页冠于后出之本卷首，冒充早期刻本，尤足警惕。

关于"藏版"问题

书名页常见"藏版"二字。"藏版"者，收藏书版也。刻版、藏版和刷印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古籍书版刻好之后，只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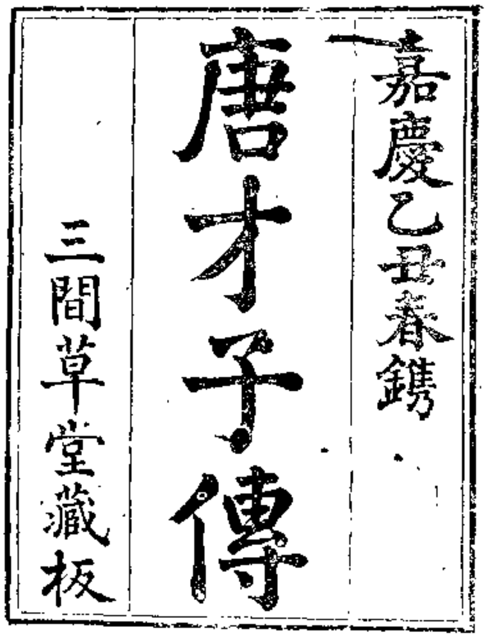
版完好无缺，就可以一直印刷下去。即使书版个别地方漫漶断裂，经过补修仍然可以继续刷印。书版传世既久，可能为刻版者世代珍藏，也可能数易其主。藏版者可能是刻版者，也可能是“二传”、“三传”等。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藏版者同刻书者划上等号。藏版者是否刻书者，要参考其它条件才能确定。例如清光绪中会稽章氏辑刻《式训堂丛书》初集、二集、三集，后版片售于朱记荣校经山房收藏，朱氏合二、三集版片辑印为《校经山房丛书》，朱氏在序跋中未就版刻源流作任何说明，不知底细的人，遂误以为《校经山房丛书》为朱氏原刻。①再如《六书正讹》卷端题“元鄱阳周伯奇编注，明海阳胡正言订篆”，书名页题“古香阁藏版”。据此，则该书由胡正言十竹斋原刻，后版片售与古香阁。那么，此书的版本仍应定为明胡正言十竹斋刻本。又如《四书考异》书名页题“无不宜斋雕本”、“武林竹简斋藏板”，则此书由无不宜斋刻版，后版片转归竹简斋，此书的版本仍应定为无不宜斋刻本。②以上是藏版者并非刻书者的例子。当然，也有不少藏版者即刻书者的例子。例如《唐才子传》书名页题“嘉庆乙丑春镌”、“三间草堂藏板”（图２１），据考证，该书即清嘉庆十年（1805年）萧山陆芝荣三间草堂刻本。《说文系传》除了书名页题“新安汪氏藏板”外，卷末有跋云：

（说文系传）在宋时已多残阙，较韵谱之显于学官者，大不侔矣。淑綦想有年，幸逢圣朝文治光昭，馆开四库，淑得与诸贤士大夫游，获见《系传》稿本，爱而欲广其传，因合旧抄数本校录付梓，其相沿传写既久，无善本可稽者，不

---

① 阳海清：《谈谈中国古籍丛书的衍变》，载《赣图通讯》1981年第4期。

② 此例据何远景《藏版与古籍著录》，载《内蒙古图书馆工作》1989年第3～4期。



嘉慶乙丑春鐫

唐才子傳

三間草堂藏板

图21　清三间草堂刻本《唐才子传》书名页

> 敢以臆改也。刻既竣工，爰赘数语于后，时乾隆壬寅巧月古歙汪启淑跋。

结合其它条件，则此书可定为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汪启淑刻本。汪启淑，字秀峰，原籍安徽歙县（一名新安），侨居杭州，著名藏书家。又如《周易本义》，除了书名页题“怡府藏版”之外，卷首有《五经四子书序》云：

> （五经四子）多从旧刻，虽有讹者亦鲜矣，士子束发受书，其于五经四子如日用饮食须臾而不可离，乃或负笈从师，担簦就试，简编繁重，既携挈之维艰，行李间关，又被

吟之无自，此亦有志之士所窃虑者也，爰鬻梨枣之材，裁尺寸之度，钩摹详悉，缮刻精良，异日游学之徒袭之巾箱，携之行笥，夫亦可朝吟而夕诵也已。乾隆七年岁次壬戌孟春和硕怡亲王撰。

结合其它条件，则此书可定为乾隆七年（1742年）怡府刻袖珍本“五经四子”之一。怡亲王为清圣祖之子，藏书甚富。古人购书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拿钱到书肆购买成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二是自带纸张到藏版处刷印，稍微给点刻板费就行了。古籍书名页刻有“×××藏版”等字样，带有广告宣传的作用，它等于向读者揭示藏版地点，以广招徕。另外，书名页标识“×××藏版”字样，也有附庸风雅的意思在内。古时候，官宦之家刊刻几部书稿是极普通的事情，这些书标识藏版地点，并不是为了好做生意，而是借此显示一下门庭之不凡。正如清李绿园《歧路灯》第九十五回中谭观察所说的一句话：

我们士夫之家，一定要有几付藏板、几部藏书，方可算得人家。

总而言之，“藏版”者是否刻书者，不可一概而论，要进行具体分析。

二、序　跋

序跋是古籍内部的组成部分，对于鉴定古籍版本有一定作用。

序跋概说

序又叫“叙”或“引”，这是由于避讳所造成的，“苏东坡

祖名序，故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为未安，遂改为'引'"。①既然苏轼撰文不用"序"字，那么影响所及，不少文人也便仿而效之。序的起源可以推到屈原的《离骚》，刘知几《史通·序传》指出：

> （离骚）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主，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

当然，《离骚》毕竟是一篇楚辞，还不能说它是一篇真正的序文。真正的序究竟始于何时？明刘师曾《文体明辨》说：

> 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天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

《诗序》有大序、小序之分。郑玄认为"大序"为子夏所作；宋以后学者或以为"大序"为东汉卫宏所作。可见序的产生时间不会晚于东汉。

序的位置今古不一。汉代多在书后，这是由写作时间的先后所定。写书之始，要从正文第一章写起，一直写到最后一章。只有在全书写完后才有可能回顾一下全书内容或交待一下写作经过，才有可能写序。如《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序传》、《说文解字·叙》等都是放在书后的。然而，对于读者来说，由于序能揭示全书梗概、提示读书门径、激发读书兴趣，在读正文之前，首先读序是非常有益的。因此，汉代以后，为了方便读者，抄书者或刻书者就把序移到书前。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书，大多数序是在书前的。

序的种类很多。就作者而言，有自序和他序：自序是作者本

---

①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

人所写；他序非作者本人自写，而由他人写成。就序的内容范围而言，有总序和篇序（或类序）：总序是针对全书而写，范围较大；篇序（或类序）是针对某篇而言，范围较小。例如《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是总序，儒林、酷吏、滑稽、游侠、佞幸、货殖等传之序就是篇序。《四库全书总目》四部之首各有总序，各类之首亦有类序。就写序的时间先后而言，有原刻序、重刻序等：原刻序又叫初刻序，就是一书初刻所写的序；重刻序是指重刻一书时所写的序。

序的数量多少也不等。一般是一书一序，但一书多序也并不罕见。一书在流传过程中几经传刻，内容有所增删，是造成一书多序的主要原因。明刻本的序言往往是很多的，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例如明崇祯刻本潘一桂《中清堂集诗》累计有李维祯、邹迪光、姚希孟、陈继儒等15序；明十竹斋刻本《苏米谭史广》累计有何伟然、吴从先、王山、周本正、徐造等16序；明万历刻本程大约《程氏墨苑》累计有申时行、王锡爵、翁正春、董其昌、王思任、屠隆、曹学佺等18序。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指出：

> （明代图书）有两序矣，有三、四序而不至者矣。两序非体也，不当其人非职也，世之君子不学而好多言也。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记成书之岁月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

序的内容也很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解释书名，交待卷数。如元代孙作撰《〈南村辍耕录〉序》云：

> 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至吴间，有田一廛，家于松南。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时时辍耕，休于树荫，抱膝而叹，鼓腹而歌，遇事肯綮，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

树根，人莫测焉。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得凡若干条，合三十卷，题曰《南村辍耕录》。

此序说明了书名的来历和卷数。作者在耕作之余，以树叶为纸，积十年之功，汇为一书，令人叹为观止。第二，介绍作者生平及写作经过。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自序云：

公武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为业者七世，故家多书。至于是正之功，世无与让焉。然自中原无事时，已有火厄，及兵戈之后，尺素不存也。公武仕宦连蹇，久益穷空，虽心志未衰，而无书可读，每恨之。南阳公天资好书，自知兴元府至领四川转运史，常以俸之半传录。时巴蜀独不被兵，人间多有异本，闻之，未尝不力求，必得而后已。历二十年，所有甚富。既罢，载以舟，即庐山之下居焉。宿与公武厚，一日贻书曰："某老且死，有平生所藏书，甚秘惜之，顾子孙稚弱，不自树立。若其心爱名，则为贵者所夺；若其心好利，则为富者所售，恐不能保也。今举以付子。他日其间有好学者归焉，不然，则子自取之。"公武惕然从其命，书凡五十箧，合吾家旧藏，除其复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今三荣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岂敢效二三子之博闻，所期者不坠家声而已。书则固自若也，傥遇其子孙之贤者，当如约。

此序说明了作者的家世、得书经过以及著作之旨。第三，介绍学术源流，评论得失。如清代龚自珍《〈上海李氏藏书志〉序》云：

目录之学，始刘子政氏。嗣是而降有三支：一曰朝廷官簿，荀勖《中经簿》、宋《崇文总目》、《馆阁书目》，明

《国史经籍志》是也。一曰私家著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以下是也。一曰史家著录，则汉《艺文志》、隋《经籍志》以下皆是也。三者其例不同，颇相资为用，不能以偏废。三者之中，其例又二：或惟载卷数，或兼条最书旨。近世好事者则又胪注某抄本，某椠本，某家藏本。兹事殊细，抑专门之业必至于是而始可谓备，则亦未易言矣……上海李氏乃藏书至四千七百种，论议胪注至三十九万言，承平之风烈，与鄞范氏、歙鲍氏、杭州吴氏、汪氏相辉映于八九十年之间。李君犹且恨生晚，不获遇纯皇帝朝，亲献书。顾异日数本朝目录，必不遗李氏。吾生平话江左俊游宾人之美，则极不忘李氏。东南硕，斷縫曙天半矣哉。

此序介绍了目录源流，对李氏藏书给以高度评价。第四，介绍刊刻情况。如清代张士元《震川文抄序》云：

震川文集有昆山本、常熟本，皆不全，且为后人所涂乙，颇改旧观。最后其曾孙庄出所藏抄本，商订于虞山而刻之，虽亦不免移篇改字之误，然赖有此刻，人始得见其大全。

此序评论了各本之得失。当然，以上四点并不是孤立的，很多序这四个方面兼或有之，只是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除了序之外，古籍大多有跋。明人陈师曾《文体明辨》说：

“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

具体地说，跋与序有三点不同：第一，就位置而言，跋在正文之后，即“缀于末简”；而序一般是在正文之前（后序除外）。第二，就写作时间而言，跋为“后览者”所写，一般是在图书流传过程中写的，成书时没有；而序则是成书时固有的。第三，就详略而言，跋略而序详，跋的篇幅一般没有序长。书跋大约始于唐代，例如韩愈《读荀子》、李翱《题燕太子丹传后》等就是后世所谓“跋”。“跋”作为一种文体正式出现于宋代。宋代欧阳修有《集古录》“跋尾”若干篇，是他考证碑刻的文字。明毛晋刻《津逮秘书》中收有苏轼《东坡题跋》、黄庭坚《山谷题跋》、秦观《淮海题跋》、陆游《放翁题跋》、欧阳修《六一题跋》、曾巩《元丰题跋》、朱熹《晦庵题跋》等数十家，可见宋人题跋之盛。宋代以后，不少读书人都有题跋的习惯，一书读完之后，乘兴握管，或叙述著者身世，或详察学术源流，或考订版本原委，足资参考。有些善本书，跋语往往连篇累牍，叫人目不暇接。例如清王士禛抄本宋琬《宋荔裳入蜀诗》累计有王士禛、莫友芝、叶裕仁、戴望、张文虎等18跋。

序跋与版本鉴定

序跋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之一。现存最早的《盐铁论》刻本前有都穆序云：

> 其书在宋尝有版刻，历世既久，寝以失传，人亦少有知者。新淦涂君知江阴之明年，令行禁止，百废俱兴，亲民之暇，手校是书，仍捐俸刻之，使学者获见古人文字之全，而其究治乱、抑货利以裨国家之政者，则不但可行之当时，而又可施之后世，此固涂君刻书之意也。涂君名祯，字宾贤，予同年进士。弘治十四年岁在辛酉朔旦吴郡都穆书。

结合其它条件，可知此本为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江阴涂祯刻

本。《陆士龙文集》有都穆跋云：

> 士龙六岁能文，性清正有才，与兄士衡齐名，人谓士龙文虽不及，而持论过之。其所著有集十卷，然人间之传，率皆录本，仍讹踵误，不便览观，吴士陆元大近刻士衡集讫工，复取斯集以予家本校而刻之，其亦有功于二俊者哉。正德己卯七月之望太仆少卿郡人都穆。

结合其它条件，可知此本为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陆元大刻本。当然，通过序跋鉴定版本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工作，为了避免差错，要注意下列问题：（一）根据序跋确定刻版年代，要把原刻和翻刻加以区别。有些重刻本往往将原刻序跋照样刻出，这样，原刻序跋只能向我们提供原刻本的刻印情况，并不能说明重刻本的刻印情况。重刻本的刊刻年代、刊刻地点和刊刻者只能根据重刻序跋和其它特点考查。例如《晦庵先生语录类要》有宋淳祐四年（1244年）王遂序、元大德六年（1302年）詹天祥跋和明成化六年（1470年）韩俨跋，后两跋已失，有人据王遂序定为宋淳祐四年（1244年）刻本。其实，就版式而言，该书是大黑口，非宋版所常见，应据韩俨跋定为明成化六年（1470年）刻本。（二）有的书正文是原刻，序是若干年后增刻的，这样的书应仍以原刻时代、原刻地和原刻者为准。清同治十年（1871年）天空海阔之居刻本《见闻随笔》，有同治十一年（1872年）补刻跋，仍应定为清同治十年（1871年）刻本。（三）根据序跋所确定的刻版年代应与刻书者、抄书者的时代一致。例如《孔子家语》有明正德二年何孟春跋，版心有"汲古阁"、"毛氏正本"字样，有人将二者简单地组合在一起，定为明正德二年（1507年）毛氏汲古阁刻本。然正德二年（1507年）毛氏尚未出生，岂能刻书！（四）根据序跋所确定的刻版年代，应与校注者的时代一致。例如《理学类编》有嘉靖壬寅益藩重刻序，有人据此定为明嘉靖二十一年

（1542年）益藩刻本，然卷端下题“新安后学毕懋康孟侯参订”数字，毕懋康为万历人，岂能列名于嘉靖本卷端？此书当系明万历刻本。又如《穆天子传》前有元至正十年（1350年）王渐序，有人据此定为元至正十年（1350年）刻本，然卷端题“四明范钦订”，然范钦为明代著名藏书家，岂能列名于元本卷端？此书实为明范钦刻本。（五）根据序跋所确定的刻版年代，应与讳字的时代一致。例如《宋元资治通鉴》有万历四年（1576年）序，有人据此定为明万历四年（1576年）刻本，然书中避明熹宗朱由校讳，改“校”为“较”，岂有万历四年避天启帝讳之理？此书当系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刻本。总而言之，序跋仅仅是鉴定版本的依据之一，而不是唯一依据，要全面考虑其它情况。

三、卷　端

卷端书名、编纂校刊姓氏等对于我们鉴定版本是不可缺少的。

卷端书名冠词

书名是一书之名。书名冠词与版本的关系比较密切。书名冠词比较复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反映内容情况的冠词。这类冠词或反映内容编排，或反映内容多寡，或反映插图情况，或反映内容类别等。反映内容编排的冠词多有“新编”、“分类”等字样。例如《新编历法大成》、《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等；反映内容多寡的冠词多有“增订”、“附”、“广”等字样，有的直接标明卷回数，例如《增订汉魏丛书》、《附释音左传注疏》、《广文选》、《大广益会玉篇》、《四十四回本红楼梦》等；反映插图情况的冠词多有“绣像”、“绘图”、“全像”等字样，例如《绘图千家诗》、《绣像四游合传》等；反映内容类别的冠词往往画龙点睛似

的点出内容类别，例如《古今演义三国志》、《第五才子佳人书水浒传》等。

第二，反映著者及著作方式的冠词。这类冠词或反映著者，或反映著者时代，或反映著者籍贯，或反映著者官职，或反映著作方式，或反映评注批校者，或反映皇帝参与著述等情况。反映著者的冠词如《南丰先生元丰类稿》、《扬子法言》、《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等；反映著者时代的冠词如《唐元次山文集》、《唐孙樵集》等；反映著者籍贯的冠词如《豫章罗先生文集》、《临川吴文正公集》等；反映著者职官的冠词如《翰林杨仲弘诗》等；反映著作方式的冠词如《注解伤寒论》、《笺注陶渊明集》等；反映评注批校者的冠词如《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六臣注文选》、《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金人瑞删定水浒传》等；反映皇帝参与著述的冠词多有"御定"、"钦定"、"御纂"等字样，例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御定康熙字典》、《御定律吕正义》等。

第三，反映版本情况的冠词。这类冠词或反映刊刻年代，或反映刊刻者，或反映版本类别，或反映版次，或反映底本，或综合反映版刻情况等。反映刊刻年代的冠词如《元刊梦溪笔谈》等；反映刊刻者的冠词如《三桂堂王振华刊本警世通言》、《太平路新刊汉书》等；反映版本类别的冠词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别本说唐后传》等；反映版次的冠词如《新刻急就篇》、《重刊拜经楼丛书》等；反映底本的冠词如《旧时真本红楼梦》等；综合反映版刻情况的冠词集上述版本情况之大成，包括刊刻年代、刊刻者、刊刻地、版本类别、版次、底本等种种情况，例如《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宋刊巾箱本八经》等。

第四，综合性冠词。这类冠词内容复杂。全书内容、著者、刊刻等情况兼而有之，如《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等。

由此可知，古籍书名冠词的表现形式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为什么古籍书名冠词这么复杂呢？因为我国古代雕版印刷发达，一本书往往有多种版本，为了标新立异，避免重复，刻书者往往在书名上搞些花样，以广招徕。这样就造成书名冠词纷杂多变的局面，也导致了同书异名的大量出现。在历代刻本中，明本的冠词是最多的，这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刻家之多、刻书之盛。在众多的明刻本中，坊刻本的冠词又是最多的。在浩如烟海的坊刻本中，小说、戏剧的冠词又是最多的。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二中指出：

> 坊肆刻小说，率将原书妄加品题或改易名称，以炫耀世人。

《三国演义》在明代流传甚广，各书冠词纷杂举例如下：

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　（书林杨起元刻本）
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　（余氏双峰堂刻本）
新锲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　（笈邮斋刻本）
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　（书林刘龙田刻本）
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传　（明刻本）
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
（明黄正甫刻本）

同是《三国演义》，版本不同，书名冠词也不同。在明代，“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①] 像《三国演义》一样，很多小说戏剧著作都有多种版本，各种版本的书名冠词同样千奇百怪。

书名冠词不同，版本也就不同。书名冠词常常是同书异本互

①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我们鉴定一书的时候，不妨从书名入手，了解一下本书的原名。如果本书在原名之前另有冠词，那就说明这本书可能是同书异本。再进一步结合其它条件，确定其版本类别。但要注意一个问题，版本不同而书名冠词相同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例如《东周列国志》清代星聚堂本、义合斋本和森宝斋本书名均题《蔡元放评定本东周列国志》。这就要求我们鉴定版本的时候，不要把书名冠词绝对化，只能把它当作鉴定版本的线索之一。该书是什么版本要全面考虑所有条件。

编纂校刊姓氏

卷端编纂校刊姓氏也可作为鉴定版本的参考，例如《王子安集》卷端题“唐龙门王勃子安著，明闽漳张燮绍和纂”，这里出现“唐”、“明”两个朝代名称，可据以初步断定，此本决非宋元刻本，只能是明清刻本，否则，宋元本不可能由明人编纂。再查书首曹荃序：

> 绍和雅志好修，不仅立言垂世，然其撰述之富，抑亦近代所无。既已搜刻汉魏以来七十有二家，将渐次及于三唐两宋，令后世尚文作者如入宝林，岂非快事。乃所梓仅及初唐四君子，尚未竣事，而绍和告殂矣。

结合其它条件，可知此书为明张燮刻本。当然，编纂校刊衔名除了题在卷端之外，亦常题于目录、卷首、卷末等处，这些题名同样可资鉴定版本参考。明人刻书习于标榜，每刻一书，常将名流姓氏作为校刊题名冠于简端，连篇累牍，自欺欺人。明崇祯刻本《皇明文徵》卷首有122人参校姓氏，明本姚允明《史书》卷首有参校姓氏283人，明本张自烈《四书大全辨》卷首竟有参订姓氏286人之多。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明万历刊本唐黄先生文集跋》中说：

> 明末士大夫通声气、广交游，凡刻一书，必罗列胜流，以震耀当世，甚至多至百余人。

此风延及清初，清本范良《诗苑天声》卷首罗列参订姓氏509人，创了最高纪录。这种风气虽然可恶，但对后人鉴定版本不无好处。例如《周易说旨》卷首题：

> 吉永丰一峰罗伦著，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武林陈禹谟选辑，督学江西按察司佥事嘉禾朱廷益校阅，南昌府知县东嘉何懋官校刊，吉安府知府京口卜维新、永丰县知县吴兴吴期炤、南昌府儒学教授时达行、新建县儒学教谕冯文盛、南昌府儒学训导王世昌校正，府学生员朱学海、叶呈祥、黄以义、熊尚贤同校。

一览卷首题名，即知此为巡按江西监察御史陈禹谟率领部下刻印者，又卷首有陈禹谟万历十九年（1591年）序：

> 江右为礼义之国，诸儒渊萃其间，名公大夫如吉永丰罗一峰先生，禀淳谙粹，以经术明圣人之道，五经皆有训释，而独注意于《易》。兹得其《周易说旨》，大较以经属本义，故惟因义以明经。义所未备者，则修以释词。义所不释者，则补以己意；其或他氏之足以发明者，亦取附之。不佞诵法是经，亦既有年，既入仕，不遑卒业，乃奉而珍录之。偕朱学使详加校阅，刊布学宫，以公之多士。

结合其它条件，可知此本为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南昌府儒学刻本。又如李时珍《本草纲目》卷首题名：

> 敕封文林郎四川蓬溪县知县蕲州李时珍编辑，云南永昌

府通判男李建中、黄州府儒学生员男李建元校正，应天府儒学生员黄申、高第同阅，太医院医士男李建方、蕲州儒学生员男李建木重订，生员孙李树宗、李树声、李树勋次卷，荆州府引礼生孙李树本楷书，金陵后学胡承龙梓行。

卷首还有万历十八年(1590年)王世贞序，结合其它条件，可知此书为明万历初刻本。冯琦《经济类编》前有"校刻姓氏"三页，末题"大明万历三十二年校刻于浙虎林郡南屏山"。结合其它条件，可知此书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杭州刻本。利用编纂校刊人衔名鉴定版本要注意两点：

第一，详考编纂校刊人生平，并据以确定时代、地点。例如明丘濬《琼台类稿》有明弘治五年（1492年）何乔新序，或据以定为"明弘治五年（1492年）刻本"。然审其卷端题衔："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谥文庄丘濬仲深"，赠官、谥号都是人死之后才有的，丘濬死于明弘治八年(1495年)，则此书当是明弘治八年（1495年）之后刻本。又如明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书名页有"沙村草堂藏板"等字样，或据以定为"明天启元年沙村草堂刻本"，然审其卷端题衔，有"济南孙××曾孙××校阅"等字样。考王象晋孙辈有王士禛，曾孙辈有王启汸、王启涑等。王士禛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王启汸生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王启涑生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则此书当为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之后刻本。①

第二，翻刻本可能将原刻本的编纂校刊衔名照样刻出，将翻刻本和原刻本加以区别。有些递修本虽然编纂校刊衔名依旧，但也不能定为原刻本。例如有人仅据北宋国子监校勘官衔名34行，把《扬子法言》定为宋治平监本。其实，该书刻工分为南宋初

---

① 崔建英：《对版本目录学的探讨与展望》，载《津图学刊》1984年4期。

期、南宋中期和元代三期，应定为宋刻宋元递修本。

除了卷端书名、编纂校刊衔名可资鉴定版本之外，古籍卷端也有直接标明刻书者的例子，如《梁昭明太子文集》卷端题有：

> 大明辽国宝训堂重梓
> 梁昭明太子撰
> 明成都杨慎　周满
> 东吴周复俊　皇甫汸校刊（图22）

不过，对于这种情况要认真分析，不可草率行事。《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据卷端题名及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周满序，著录为“明杨慎等校定辽府宝训堂刊本，五卷，在嘉靖乙卯”，“嘉靖乙卯”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这样著录似不确，因为明嘉靖三十四年的刻书者是周满，而非辽藩。辽藩是据周满刻本重刻者。杨慎等校刊者是周满刻本，而非辽藩刻本。周满刻本与辽藩刻本是两种不同的本子。周本九行二十字，辽藩本八行十六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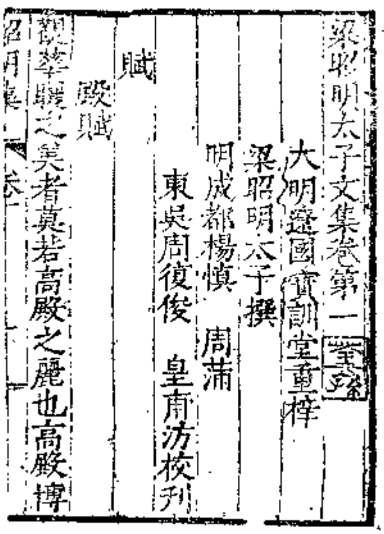

梁昭明太子文集卷第一
大明遼國寶訓堂重梓
梁昭明太子撰
明成都楊慎　周滿
東吳周復俊　皇甫汸校刊
賦
殿賦
觀華麗之美者莫若高殿之麗也高殿博

图22　明辽藩刻本《梁昭明太子文集》卷端

总而言之，卷端书名、卷端编纂校刊衔名及其它有关文字均可资鉴定版本参考。

四、避　　讳

千载英雄想子陵，钓台缘此几人登。
谁知避讳更严氏，滩与州名总误称。

这是宋人俞元德写的一首诗。①诗中“子陵”是东汉隐士严光之字。严光本姓庄，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姓严。他本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即位后，隐身不见。后被召至京师洛阳，授谏议大夫，不就，归隐于富春山，耕钓而终。诗中所称“钓台”，即其垂钓之处，后人称为严陵濑。宋宣和间，方腊起义，改睦州为严州。作者有感于避讳改名之乱，作了这一首诗。什么叫避讳？所谓“避讳”就是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圣贤或尊长的名字，避免直接说出和写出的种种规定。避讳有两种类型：一是国讳（一名公讳），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回避的；一是家讳（一名私讳），是指本家族的人必须回避的。汉明帝刘庄的“庄”字就属于国讳。

避讳的历史

我国避讳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先秦，《礼记·曲礼上》说：“礼不讳嫌名，二名不遍讳。”这就是说，发音相近的字不讳；名有两字，只讳其中之一，例如孔子母名“徵在”，讳“徵”不讳“在”，讳“在”不讳“徵”。不过，那时还没有一套完备的避讳制度。秦汉时期，避讳制度逐渐形成。秦汉史书上讳字触目可见。例如避秦始皇嬴政之名，改“正月”为“端月”；避秦始皇父亲子楚之名，改“楚”为“荆”；避汉高祖刘邦之名，改“邦”为“国”，等等。但秦汉时期的避讳制度并不严密，史籍中犯讳之例时有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讳极严，有一次，晋

①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九。

安帝与桓玄一块儿饮酒，安帝因嫌酒冷，就说："温酒来！"犯了桓玄的家讳（玄父名桓温），玄便流涕呜咽。鲁迅先生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指出：

> 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

避讳至唐宋而极盛。唐代规定，当代君主上数七世，均需避讳。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往往采用以"代"代"世"、以"人"代"民"等方法。唐代家讳也很厉害。李贺父名"晋肃"，终生不能考进士。韩愈很为此事打抱不平，专门写过一篇题为《讳辩》的文章，他在该文中说：

> 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宋代规定更严，七世以上的君主先人名字也要避讳。据洪迈《容斋三笔》卷十一记载：

> 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

宋代除了君主名字需要避讳之外，一些特殊字眼也需避讳，《容斋续笔》中还有一段记载：

> 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于是

毛友龙但名“友”，叶天将但名“将”，乐天作但名“作”……

宋代一些地方官吏甚至可以在自己管辖的地区硬性推行避讳制度，据《老学庵笔记》卷五记载：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为了避田登之讳，改“灯”为“火”，成语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即源于此。明代早期避讳较宽，万历以后渐严，如避明熹宗朱由校之讳，“校书”之“校”常写作“挍”或“较”。清代避讳始于康熙，雍正、乾隆两朝避讳最严，因犯讳而形成的文字狱时有发生，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举人王锡侯《字贯》案便是一例。《字贯》一书将圣祖、世宗、高宗名字照样开列，不加回避，终成大狱。道光、咸丰以后，国势日下，避讳亦渐趋衰落。

避讳的方法

避讳有改字、空字、缺笔三种方法。

第一，改字法，即用同音字或同义字代替讳字。这是一种最常用的避讳方法。司马迁父名谈，《史记》中改“谈”为“同”；范晔父名泰，《后汉书》中改“泰”为“太”；刘禹锡父名绪，其诗文改“绪”为“引”。以上是避父名改字之例。汉文帝名刘恒，因改“恒山”为“常山”；唐高祖李渊之祖名李虎，因改“虎林”为“武林”；宋太祖赵匡胤始祖名玄朗，因改“朗山”为“确山”。以上是避君主名改地名例。孔子名丘，因改“丘”为“邱”；西楚霸王项羽名籍，因改“籍”为“席”；汉宣帝名

刘询，因改“荀卿”为“孙卿”。以上是避讳更改姓名之例。隋炀帝名杨广，因改《广雅》为《博雅》；唐太宗名李世民，因改《齐民要术》为《齐人要术》；宋太祖名赵匡胤，因改《廖匡图诗》为《廖正图诗》；清圣祖名玄烨，因改《极玄集》为《极元集》；清高宗名弘历，因改《弘明集》为《宏明集》。以上是避讳更改书名之例。“至圣先师”孔子名丘，《算经》著者张丘建易名张邱建；清世宗名胤禛，《池北偶谈》著者王士禛易名王士祯；清仁宗名颙琰，《周易集注》著者王琰易名王琬。以上是避讳更改著者人名之例。还有因犯讳而改官名者，如唐太宗名李世民，因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等。古人姓名犯讳，以字行的也不少。隋炀帝名杨广，《史记音义》著者徐广易名徐野民（以字行），到了唐代，“民”字又犯了讳，“徐野民”又变作“徐野人”；唐玄宗名李隆基，史学家刘知几因称“刘子玄”，子玄是其字；清圣祖名玄烨，《后汉书》著者范晔因称“范蔚宗”，蔚宗是其字。

第二，空字法，即碰到讳字，用“某”或“上讳”等字代替，或用符号“□”表示。例如《史记·孝文本纪》云：

> 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

“某”即指汉景帝刘启的“启”字。《说文解字》中，汉光武帝刘秀的“秀”字，写作“上讳”。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叙》中说过一段话：

> 《史记》、《汉书》、《法言》、《大园》叙，皆殿于末。

查遍所有古籍书目，不见《大园》其名，经过认真分析，才知道这是避讳所致：《大园》即汉代杨雄撰《太玄》，古时“太”、

"大"二字通用，"玄"字犯清圣祖玄烨之讳，改"玄"为"元"，并在"元"字四周围上方框，便呈"圆"形。

第三，缺笔法，即省去讳字的最后一笔不写。这种方法始于唐初，"世"、"民"二字就有采用缺笔避讳的。宋版书中，采用缺笔避讳的字最多，例如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刻《世说新语》中，"玄"、"朗"、"弘"、"殷"、"敬"、"匡"、"胤"、"桓"、"恒"等字，均缺末笔。清康熙以后刻本，"玄"、"烨"等字用缺笔避讳者也常常看到。

避讳的功过

避讳是一种历史现象。由于避讳随意改易文字，给古籍整理工作带来一些困难，《宋史·艺文志》别集类著录有商璠《丹阳集》一卷，总集类又有殷璠《丹阳集》一卷。其实，二书实为一书，前书著者因避赵匡胤父弘殷之讳，改"殷"为"商"。《宋史·艺文志》农家类有《时镜新书》和《时鉴新书》两种。其实，二书实为一书，后书因避赵匡胤祖赵敬之讳，改"镜"为"鉴"。在古籍书目中，一书重出，多半是由避讳易名造成的。

避讳也有"功"，它又可以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些条件，兹举数例：《北齐书·神武纪》称高欢父名高树，而《北史》和《魏书》称高欢父名高树生。到底哪个对？《北齐书·杜弼传》云：

> 相府法曹辛子炎咨事，云须取署，子炎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杖之于前，弼进曰："礼，二名不遍讳，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

据此，高欢父名当作"树生"，否则，避讳就无所指。这说明《北齐书·神武纪》脱一"生"字。这是根据讳字校勘讹脱之

例。《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隋王通《中说》一书，隋文帝父名杨忠，兼避嫌名“中”字，《中说》之“中”正好犯讳，著者王通既为隋人，岂敢如此！著名史学家陈垣据此断定，《中说》非隋王通所著，而是伪书。这是根据讳字辨伪之例。《宝刻类编》撰人无考，其内容始于周秦，终于五代。由此可知，著者不可能是宋代以前的人。宋宝庆间避理宗赵昀之讳，改江南筠州为瑞州。此书正有瑞州碑刻，据此，作者当为宋末人。这是由讳字推知著者时代之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庄助》、《庄安》二书，而《汉书》卷六十四又有严助、严安二传。按照避讳规定，自然称“严助”、“严安”为对。为什么《汉书·艺文志》竟犯讳而称“庄助”、“庄安”呢？这反映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的源流关系。《七略》是源，《汉书·艺文志》是流。《汉书·艺文志》不仅在类目安排方面因袭《七略》，而且它所著录的图书除少数新增者外，绝大多数是从《七略》直接抄来的。庄助、庄安都是西汉武帝时人，《七略》又成书于西汉哀帝时，它是不可能回避东汉明帝之讳的。既然《七略》把书名著录为《庄助》、《庄安》，那么，《汉书·艺文志》也就照录不误。这是由避讳研究书目源流的例子。

通过讳字，还可以帮助我们鉴定版本。因为讳字有时代性，什么朝代讳什么字，是规定好了的。我们通过讳字可推知其版本时代。清卢文弨校《太玄经》，得一旧本，以为是北宋刻本，钱大昕据书末所署“干办公事张寔校勘”数字，认为是南宋刻本，理由是“干办公事”原作“勾办公事”，南宋避宋高宗赵构之讳，改“勾”为“干”。钱大昕的分析是正确的。《后汉书》中玄、玹、絃、縣、懸、朗、朓、敬、儆、驚、竟、镜、境、殷、弘、匡、筐、恇、洭、胤、[illegible]、恒、祯、侦、浈、贞、徵、懲、让、襄、穰、署、曙、树、澍、竖、顼、勖、畜、戌、煦、桓、垣、完、丸、纨、浣、莞、筦、構、媾、購、遘、垢、瑗、瑋、慎、轩、辕等字皆缺末笔，其中玄、玹、縣、懸、朗等字避宋太

祖赵匡胤始祖玄朗之讳；朓字避赵匡胤高祖赵朓讳；敬、儆、警、竟、镜、境等字避赵匡胤祖名赵敬讳；殷、弘等字避赵匡胤父名弘殷讳；匡、筐、恇、胤、𠑾等字避宋太祖赵匡胤讳；恒字避宋真宗赵恒讳；祯、侦、贞、湞、徵、懲等字避宋仁宗赵祯讳；让、襄、禳等字避英宗父赵允让讳；署、曙、树、澍、竖等字避英宗赵曙讳；頊、勖、畜、戌、煦等字避哲宗赵煦（初名傭）讳；桓、垣、完、丸、纨、浣、莞、筦等字避宋钦宗赵桓讳；構、媾、購、遘、垢等字避宋高宗赵构讳；瑗、瑋、慎等字避宋孝宗赵昚（又名赵瑗、赵玮）讳。据此，张元济先生认为此书“蓋刊于高宗南渡以还，而成于孝宗受禅之后”。① 利用讳字鉴定版本要注意两点：第一，熟悉历代有关讳字的规定。一般地说，皇帝及其先人之名均需回避。第二，后出之本往往将祖本的讳字照样刻出或写出，这就要求我们不要把讳字当作鉴定版本的唯一根据，还要结合其它特点综合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把祖本同后出之本区别开来。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关于〈三藏取经记〉等》中曾经指出：

> 前朝的缺笔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而遗老们所刻的书，“儀”字还“敬缺末笔”。非遗老们所刻的书，“寧”字、“玄”字也常常缺笔，或者以“甯”代“寧”、以“元”代“玄”。这都是在民国而讳清讳，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所以，我以为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戏曲之类。

五、牌　　记

牌记又叫墨围、木记、碑牌、书牌等，它是古籍版面内容的

① 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后汉书跋》。

组成部分之一。它最早出现于宋代，在宋代以后的历代印本中也都屡见不鲜，牌记的位置并不固定，序后、目录后、各卷之后，到处可见、清本牌记多在书名页。各书牌记的数量不等，有一书一个牌记的，也有一书两个或多个牌记的。牌记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就字体而言，篆、隶、草、楷、行等各体均有，但以楷书为多；就字数而言，有详有略，详者长达数百字，略者短至数字；就形状而言，有长方形、正方形、亚字形、鼎形、钟形、爵形、碑形、幡形等，但以长方形为多。牌记四周大多围有边框或图案，但是，有些文字四周虽然没有边框或图案，然而，具有牌记的功能，我们不妨也把它们看作牌记。

牌记的内容

牌记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刻书情况；二是反映图书内容情况。

反映刻书情况的牌记说明了刻印图书的种种情况。元延祐五年（1318年）刻本《书蔡氏传辑录纂注》有"延祐戊午"钟形牌记，说明了刻书时间。宋建阳蔡琪刻本《汉书集注》有"建安蔡纯父刻梓于家塾"长方形牌记，说明了刻书者(图23)。宋刻元明递修本《临川先生文集》卷末有"嘉靖丁亥秋仲国子监补刊完"牌记，说明了补刊情况。宋嘉泰二年（1202年）刻本《会稽志》有牌记云：



图23　宋建阳蔡琪刻本《汉书集注》牌记

绍兴府今刊《会稽志》一部三十卷，用印书纸八百幅，古经纸一十幅，副页纸二十幅，背古经纸平表十一幅，工墨钱八百文，每册装背□□文，右具如前。嘉泰二年手分俞澄、王思忠具。

这个牌记说明了刻书原料及成本。日本翻元本《碧岩录》卷五后有牌记云：

隅中书隐鼎刊圜悟《碧岩录》，幸已讫事，四方禅友或收得《祖庭事苑》、《万善同归录》及禅宗文字世罕刊本者，幸乞见示，当为绣梓，以广禅学，此亦方便接引之一端也，告毋金玉幸甚，禀白。

这个牌记像是征刻启事。明刻本《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目录前有牌记云：

《宋史通鉴》一书，见刊本者节略太甚，读者不无遗恨焉，本堂今得善本，乃名公所编者，前宋已盛行于世，今再绣诸梓，与天下士大夫共之，诚为有用之书，回视它本，大有径庭，具眼者必蒙赏音，幸鉴。

这个牌记说明了刻书缘起。宋刻本《东都事略》目录后有牌记云：

眉山程舍人宅刊本，已申上司，不许覆板。

这个牌记说明了版权。明刻本《陶靖节集》有"嘉靖丙午毗陵蒋孝校刊"牌记，则综合说明了刻书时间、刻书地点和刻书者。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与刻书有关的某些情况。

反映图书内容情况的牌记说明了校勘、底本、体例等情况。宋王叔边刻本《后汉书注》有牌记云：

> 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证，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英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边谨咨。

这个牌记说明了校勘情况（图24）。清康熙间翼圣堂刻本《闲情偶寄》牌记云：

> 先生之书充塞宇宙，人谓奇矣绝矣莫能加矣，先生自蔑视如也，谓平生奇绝处尽有，但不在从前剞方中。倘出枕中所秘者公世，或能真见笠翁乎。因授是编，梓为后劲，翼圣堂主人识。

这个牌记说明了底本情况。明刻本《铜人针灸经》中有牌记云：

> 夫疗病简易之法，必须针灸。欲明针灸之方者，必须注意于是经。是经也得之秘传，治病则有受病之源，指穴则有定穴之法，效验神速，绣梓与众共之，卫生君子请鉴诸。

这个牌记像是内容提要。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金陵周曰校刻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牌记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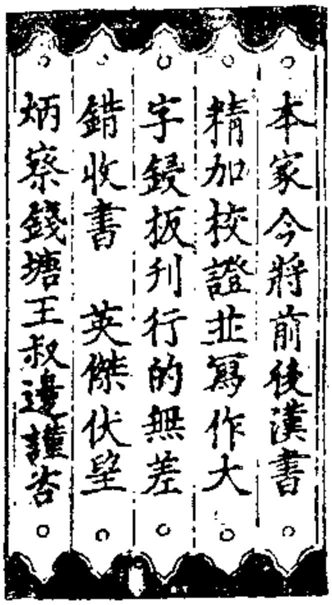

本家今將前後漢書精加校證並寫作大字鋟板刊行的無差錯收書 英傑伏望炳察錢塘王叔邊謹咨

图24　宋钱塘王叔边刻《后汉书注》牌记

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讹舛，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里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

这个牌记说明了全书的体例。凡此种种，都与内容有关。

牌记的作用

牌记有两个作用：一是申明版权，二是广告宣传。

反映刻书情况的牌记旨在申明版权。[1]我国古代雕版印刷繁荣，刻家众多，刻本良莠不齐，牌记就有各负其责的意思在内。有些善本是畅销书，为了防止别人翻刻，除了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版权之外，也往往在牌记中予以强调。上文所举《东都事略》牌记便是一例。又如明万历刻本《月露音》牌记云：

杭城丰东桥三官巷口李衙刊发，每部纹银捌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

明刻本《大明万历七年岁己卯大统历》牌记说：

钦天监奏准印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

刻书缘起和反映刻书内容的牌记大都带有广告宣传的性质。这类牌记的文字，或说明校勘之精，或说明底本质量之高，或说明内容之好，或说明体例之佳。总而言之，都是些溢美之词。坊刻本中这类牌记尤多。鲁迅先生在《准风月谈·商定文豪》中说：

---

① 廖延唐：《古书牌记》，载《图书情报知识》1980年2期。

一看杂志的广告，作者就个个是文豪，中国文坛也真好像是光焰万丈，但一面也招来了鼻孔里的哼哼声。

鲁迅先生这里讲的虽然是近代的杂志广告，但是古籍中的广告式牌记也有类似情况，从牌记看，刻书者好像个个都是功德无量的优秀出版家，一个胜似一个，其实，优秀出版家并不多见。

牌记的价值

对于今天来说，牌记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牌记可以作为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因为牌记文字大多反映了刻书时间、刻书地点、刻书者和版本类别，这就为鉴定版本提供了条件。①但是，利用牌记鉴定版本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一部书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牌记，要进行综合分析。例如明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吴郡袁褧嘉趣堂刻本《六家文选》有五个牌记，第一个在序后：

此集精加校正，绝无舛误，见在广都县北门裴宅印卖。

第二个在卷三十后：

皇明嘉靖壬寅四月立夏日吴郡袁氏丙庚草堂善本雕。

第三个在卷四十后：

此蜀郡广都裴氏善本，今重雕于汝郡袁氏之嘉趣堂。嘉靖丙午春日。

第四个在卷六十后：

① 黄强祺：《古书牌记简述》，载《图书馆杂志》1985年4期。

吴郡袁氏善本新雕。

第五个在书后：

余家藏书百年，见购宋刻本《昭明文选》有五臣、六臣、李善本、巾箱、白文、大字、小字殆数十种。家有此本，甚称精善，而注释本以六家为优，因命工翻雕，匡郭字体未少改易，刻始于嘉靖甲午岁，成于己酉，计十六载而完。

第一个牌记是明人将宋本牌记照样翻刻而成；第二个牌记说明了刻书时间、刻书地点和刻书者；第三个牌记说明了所据底本、刻书地点、刻书者和刻书时间；第四个牌记说明了刻书地点和刻书者；第五个牌记说明了所据底本和刻书时间。经过分析可知，刻书地点是"吴郡"，刻书者是"袁褧嘉趣堂"。刻书时间呢？五个牌记中除了第四个外都有刻书时间：第一个牌记所指的时间是底本的刻书时间，不足为据；第二个牌记称"嘉靖壬寅"，即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第三个牌记称"嘉靖丙午"，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第五个牌记称"始于嘉靖甲午成于己酉"，即始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成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牌记所记时间各异，到底以哪个为准呢？当然应该以第五个牌记为准。也就是说，这本书的刻书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至于第二和第三个牌记所指时间应分别指刻第三十卷、四十卷时的具体时间，不是刻完全书的时间。这说明古书在雕版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刻上牌记，牌记并不一定是刻完全书后补刻上去的。因此，我们在鉴定版本时，对于牌记文字所指时间要进行认真分析。第二，翻刻本常将原刻本的牌记照样刻出，这类牌记只能说明原刻本的刻书情况，并不说明翻刻本的刻书情况。例如《六家文选》中宋代广都裴氏牌记即是一例。第三，补刻之书，应据牌记所称时间定为递修本或补配本，不应单以牌记所称原刻时间或补刻时间作

为出版时间。如《临川先生文集》不应以"嘉靖丁亥秋仲国子监刊补完"牌记定为明嘉靖六年刻本。《论衡》不应以"正德辛巳四月吉日南京国子监补刊完"定为明正德十六年刻本，以上两书均为宋刻元明递修本。第四，古籍版本的情况是复杂的，牌记仅仅是鉴定版本的一个条件，要想准确无误地鉴定版本，还必须全面考察其它条件。在反映刻书情况的牌记当中，或有刻书时间而没有刻书者，或有刻书地点而没有刻书时间或刻书者，或有刻书者而没有刻书时间和刻书地点，总是很难找到完美无缺的答案。况且，有些翻刻、补刻、作伪的书，情况更加复杂，还有些书根本没有牌记。以上种种情况说明：牌记仅仅是鉴定版本的一个条件，完全依赖牌记鉴定版本是不行的。

另外，牌记还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些史料可与正史稗乘相互印证，甚或可补正史稗乘之不足。在牌记所提供的史料当中，出版史方面的资料是最多的。例如明嘉靖四年至六年震泽王延喆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是一种著名的善本。清王士禛在《池北偶谈·谈异三》中讲过一个故事：

> 一日有持宋槧《史记》求鬻者，索价三百金，延喆给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后可来取直。"乃鸠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而毕工。其人如期至索直，故给之曰："以原本还汝。"其人不辨真赝，持去。即而复来曰："此亦宋槧，而纸差，不如吾书，岂误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数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获三百金耳，今如数予君，且为君书幻千万亿化身矣。"其人大喜过望。

根据这个故事可知，王延喆刻《史记》所用底本来自书估，所用时间仅有一个月。事实如何呢？该书索隐之后有牌记云：

> 延喆不敏，尝闻于先文恪公曰："国语、左传、经之翼

也；迁史、班书、史之良也。”今吴中刻《左传》，郢中刻《国语》、闽中刻《汉书》，而《史记》尚未版行。延喆因取旧藏宋刊《史记》重加校雠，翻刻于家塾，与三书并行于世。工始嘉靖乙酉腊月，迄于丁亥之三月，林屋山人王延喆识于七十二峰深处。

据此可知，王延喆本《史记》始刻于明嘉靖四年十二月，至嘉靖六年三月刻完，共历一年零四个月．而且所用底本并非来自书估，而是自家旧藏。这说明《池北偶谈》的记载是不足凭信的传闻而已。日本刻本《新刻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集》卷末牌记称：

祖在唐山福州境界福建行省兴化路莆田县仁德里台谏坊住人俞良甫，久住日本京城阜近，几年劳碌，至今喜成矣。岁次丁卯仲秋印题。

俞良甫，何许人也？据有关资料记载，俞是福建莆田县仁德里台谏坊人，是一个颇有才学的刻工。元末避乱到日本，自称“中华大唐俞良甫学士”或“大明国俞良甫”。他在日本刻有《月江和尚录》、《李善注文选》、《碧山堂集》、《白云诗集》等十多种书，人称之为“俞良甫板”。他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上述牌记内容正好和有关资料相印证，成为反映中日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史料。

六、行　款

什么是行款？行款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行款”指文字的书写顺序和排列形式。世界各国文字书写的行款不尽相同，有自左往右写的，有自右往左写的。还有一种“牛耕式”的行款，即第一行由左往右，第二行又由右往左。我国汉字的行款在甲骨文、

金文时期相当自由，有时简直难以分辨其书写的先后顺序。直到后来才渐渐产生了直行书写的格式，字序自上而下，行序自右而左。我国古籍一般都采用这个格式。现在改用横排的书写方法，字序自左而右，行序自上而下。狭义的“行款”是指古籍书页版面的行数和字数，或叫行格、行字。本节所谈的就是狭义的行款。

行款的源流

古籍讲究行款始于何时？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答李驹书》曾说：

> 梓法依《献吉集》行款大小，得二十四卷，刻手颇精，新岁二三月可办也。

这大约是“行款”二字见诸典籍的最早记载之一。然而，古籍讲究行款则远在明王世贞之前。出土文物告诉我们，早在竹书盛行的时代，人们就讲究行款了。每根竹简上的字数大体相当，可以说，这是古籍行款之滥觞。纸书出现以后，人们对行款就更讲究了。1924年，新疆鄯善出土的东晋写本《三国志》残卷，每行一般为18字，看起来比竹书更加整齐了，行款逐渐规范化。雕版印刷发明以后，刻本的行款日臻严整。每页几行，每行多少字从头到尾都不改变，确实做到了整齐划一，执一而终。为什么人们这样讲究行款呢？大约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美观。一本书如果讲究行款，行字疏密得当，能给人以节奏美。如果不讲究行款，忽密忽疏，乱纸涂鸦，就会面目可憎，令人作呕。二是为了计数。现代图书的版权页有“字数”一项内容：对于读者而言，由此可推知书的厚薄；对于出版社而言，由此可算出稿费的多少。古籍也要计算字数，如宋本《周易》卷末注“经三千二百五十五字，注五千九百四十四字”；宋本《汉纪》卷末注：“汉

纪本凡七万二千四百三十二字，王莽一万字”。宋抚州公使库本《礼记郑氏注》卷末记“凡二十万一千九百九十二字”等等。古人这样做，是否在为读者着想，不得而知，但由此去计算刻工的报酬则是确定无疑的。刻工报酬多以百字为计算单位，如明末毛晋刻《十三经》、《十七史》，每百字给银三分。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二说：

> 刻字匠徐承惠供，本犯与刻字工银，每字一百，时价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静处刻，勿令人见，每百字加银五厘、约工银三钱四分，今算妖书八百余字，与工银费相同。

行款整齐，计算起来就方便多了。三是为了便于阅读。一本书讲究行款，阅读起来就便当多了，可大大提高阅读速度。如果行款不清，读了这一行还不知道那一行在什么地方，东找西找，把时间都浪费完了。更有甚者，由于行款不清，不可卒读，只好抚卷长叹，束之高阁。

既然古人讲究图书的行款，那么，正式记载行款始于何时？清人刘肇隅《宋元本行格表·序》说：

> 书之记行字也，自何小山校宋本《汉书》始也。洎孙氏《平津记》（即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黄氏士礼居（即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诸目而益备焉。

在清代乾嘉之前，记载行款的著作非常罕见，就是乾隆年间编纂的《天禄琳琅书目》和《四库全书总目》也都没有记载行款。黄丕烈（1763～1825）是最早记载行款的版本学家之一，例如他在《重雕嘉靖本校宋〈周礼〉札记序》中说：

> 郑氏之学惟三礼为最精，三礼之注惟郑氏为最善。向来

三礼郑注本合刻者以十六行十七字本为佳，相传为嘉靖本是也。

清代后期，随着版本学研究的盛行，记载行款的书目才越来越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江标撰《宋元本行格表》是我国最早的记载宋元本行款的专著。江标（1860～1899），字建霞，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光绪进士，曾入同文馆学习，研究时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任湖南学政，整顿校经书院，增设舆地、算学等学科。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湖北巡抚使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及谭嗣同等办时务学堂，刊《湘学报》等。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因病死去，终年不到40岁。江标一生锐意改革，热心刻书，先后编刊有《灵鹣阁丛书》、《唐贤小集五十家》等，世称元和江氏湖南使院本。《宋元本行格表》系江标原著，由其门徒刘肇隅编校，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江氏自刻本和1914年上海文瑞楼影印本。全书共著录宋元刻本1156种（内含影宋本65种、影元本15种和金本6种），分上下两卷，其著录体例是以行数为经，以类目为纬。全书分四行、五行、六行、七行、八行、九行、十行、十一行、十二行、十三行、十四行、十五行、十六行、十七行、十八行、十九行、二十行等17个大类，每类之下，先后以经史子集和字数多寡为序排列。各书著录内容用大小两种字体，大字以"版本＋书名＋字数"的顺序著录，小字注明卷数、校刊人、刻工、讳字、牌记、出处等。如梁沈约撰《宋书》排在"九行"类下，先用大字著录为："宋槧明修本宋书行十七字"，然后用小字著录："一百卷，版心有字数及刻工姓名，绍兴眉山刻七史之一，有弘治四年、嘉靖八年、九年、十年修版，《仪顾堂续跋》。"又如《三苏先生文粹》排在"十行"类下，先用大字著录："宋蜀大字本三苏先生文粹行十八字"，然后用小字著录："七十卷，版心有刻工姓名，语涉宋帝皆空格，宋讳避至桓构止，《仪顾堂续跋》。"

《宋元本行格表》虽然名为“行格”专著，但它著录的内容已经包括了古书版本的许多问题。当然，由于著者多据书目题跋辑录，视野不广，明清刻本摒而不录，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除了《宋元本行格表》之外，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行字之疏密”一节中也谈到宋本的行款问题。解放后出版的版本目录，如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等对于行款著录都比较详细，可资参看。

行款与版本鉴定

我们今天研究行款有什么意义呢？

研究行款有助于我们鉴定古籍，行款是版本鉴定的依据之一。一种书的同一版本，不管其印数如何多，其行款都是绝对一致的；而同种书的不同版本，除影刻等情况外，其行款多数是不相同的。例如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建康郡斋刻《花间集》行款为八行、行十七字，假如当时印500部，那么这500部《花间集》的行款肯定都是八行、行十七字；而《花间集》的另外一种版本为宋公文纸本，它的行款就不是八行、行十七字，而是十行、行十七（或十八）字了。又如传世《资治通鉴》，宋元刻本有两种：一种是宋绍兴三年（1133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行款为八行、行十七字；一种是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福州魏天佑刻本，行款是十一行、行十九字。根据上述特点，我们可以据行款大体推知古籍的版本系统。如传世宋蜀本唐人集有两个系统：一为十一行本，约刻于南北宋之际；一为十二行本，约刻于南宋中叶。北京图书馆藏《骆宾王文集》、《李太白文集》、《王摩诘文集》均十一行、行二十字，属于十一行本系统，当是南北宋交替之际四川刻本；北京图书馆藏《孟浩然诗集》、《孟东野文集》、《李长吉文集》、《郑守愚文集》等均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属于十二行本系统，当是南宋中叶四川刻

本 又如北京图书馆藏《书集传音释》六卷，原京师图书馆旧目定为元刻，而《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定为明刻，到底哪个对呢？清望三益斋有翻明本《书集传音释》，在翻刻之前，曾据元刻本及抄本校其讹误。北图所藏正与元本相同，没有明本之讹误。王重民先生在比较元明两刻的内容正误之后，又据行款断定北京图书馆藏本为元至正十三行本系统。他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书集传音释》中说：

> 考元刻有数本，《天禄琳琅书目续编》卷八有至正乙酉虞氏明复斋刻本；《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有至正辛卯德星书堂刻本，又邵氏《标注》称："蒋寅昉（按：寅昉系清代藏书家蒋光焴之字）新得元刻本，半页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按望三益斋本有祝凤喈跋，称"海昌蒋君光焴寄以元至正间《音释》刻本。"因知所据校之元至正本，即邵氏所称十三行本也。此本行款正同，宜其文字无异，然则此本又当为元至正间所刻者矣。

另外，版本学所谓"大字本"、"小字本"也与行款有关，一般古书版框高二十公分左右，半页宽十三、十四公分，行款为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左右。大字本，字大如钱，其行款小于此数；小字本行紧字密，其行款大于此数。如宋蜀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的行款是八行，行十六字；元延祐大字本《论语集注》的行款是七行，行十五字；元大字本《毛诗注疏》的行款是八行，行十八字；宋小字本《晋书》的行款是十四行，行二十六、二十七字；宋小字本《汉书》的行款是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古代有些刻书家所刻各书的行款很有特点。有时候，在没有序跋、牌记等版本记载的情况下，亦可根据行款大体推知其为某家刻本。如宋临安陈起陈宅书籍铺刻唐诗别集的行款都是十行、行十八字，北京图书馆藏有唐代《唐求诗集》，虽然该书没有任何版本

记，但专家们鉴定该书的行款也是十行、行十八字，再结合字体、刀法、版式等情况一并考虑，认为该本很可能也是宋临安陈起陈宅书籍铺刻本。通过行款鉴定版本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不应盲从前人旧说。由于版本情况多变，加上见闻所限，前人的说法不一定全对。清人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五说：

> 或谓余曰："宋人刻书每行字数如其行数。如每页二十行，则每行各二十字；每页二十二行，则每行各二十二字。"此亦不尽然，如钱竹汀日记所载宋版《仪礼注》，每页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宋刻《汉书》每页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宋刻《司马温公集》每页二十四行，行二十二字；宋刻《史记》每页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又一本每页十八行，每行十六或十七字；宋刻《列子》每页二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则其说不足据矣。近日书贾无不作伪以欺世，新进后生，皆当慎之。

第二，要把翻刻本同原刻本加以区别。有些翻刻本同原刻本的版式、字体、刀法、行款、牌记、讳字等完全一致，惟妙惟肖，几可乱真，就不可简单地根据行款等特点定为原刻本。如宋代黄善夫本《史记》的行款是半页十行，行十八字，而明代四种著名翻刻本(即王延喆本、秦藩本、廖铠本和汪谅本)的行款均为十行、行十八字。这样，就不能简单地依据行款把它们都定为宋黄善夫本。这就要求我们在审查行款的同时，还要对其它版本特征（如内容、卷数、序跋、牌记、讳字、版式、刀法、墨色、纸张、藏书印等）进行全面考察，不能把行款作为鉴定版本的唯一依据。

七、字　体

古人非常重视书法。古书的字迹常常是我国书法艺术宝库中

的珍品，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古书的字体非常复杂，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一）依汉字演变的先后次序分类，有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二）依书法流派分类，有欧体、颜体、柳体、赵体等；（三）依字体大小分类，有大字、小字等；（四）依笔画繁简分类，有繁体、简体等。

依汉字演变的先后次序分类

我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因为它是用刀刻成的，所以笔画直而细，圆笔少。甲骨文盛行于商代后期，直到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被人们发现。现在所见到的甲骨文总数有4600字左右，可识者只有1700余字。周代盛行金文，金文是刻铸在钟鼎彝器上的文字，因此又叫钟鼎文。这种文字的笔画开始有了粗细之分，也有一些圆笔。现在所见到的金文有3000多字，可识者有2000字左右。大篆是战国时期的文字。由于当时群雄争霸，各自为政，文字极不统一，一个字往往有多种写法，有些字甚至还加了一些与字义无关的图案。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全国文字统一为小篆，小篆的象形性大大减少，字形稍长，笔画符号化、规律化，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字规范化实践。隶书是由篆字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它把篆书圆转的笔画变为方折，象形符号减少，字形扁阔，笔画平直，横画蚕头燕尾，这种字始于秦代，盛于汉魏。西汉末年出现草书。草书笔画太简，强调牵丝连系，字形易混，辨认费力，所以始终没有取代隶书。东汉末年，出现楷书。楷书是以隶书为基础发展而来，楷书初叫“正书”，稍后又叫“真书”。“楷书”之名始于唐朝。“楷”是模范、法式之意。顾名思义，楷书就是供人们学习模仿的标准字体，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一丝不苟。楷书之后又出现行书。楷书易认，但书写较慢；草书写得快，但苦于认读。行书取二体之长，

补二体之短，可以说是楷书之草化、草书之楷化。整个汉字演变过程，主要就是上述几种字体。

古籍字体，不管是抄本还是刻本，多为楷书。这是因为：（一）楷书容易认读，而草书笔画龙飞凤舞，篆书笔画繁复曲折，都不易认读；（二）楷书易写易刻，而草书笔画交错如网，篆字部首叠床架屋，难写难刻。历代刻书亦多延请楷书名手缮写。如前所言，五代监本由书法家李鹗、郭嵘缮写；宋监本由书法家赵安仁、张致用、陈元吉、韦宿等缮写；明代经厂本的写工都进行过专门训练；清代的写刻本更是出自名家之手。楷书是古书使用最多的一种字体。当然，除了楷书之外，其它字体也间或使用，草书多用于书画题辞，行书多用于序跋。序跋也有用草书的。篆字多见于藏书家印章。到了清末，随着甲骨文的发现，也有用甲骨文入印的。明代许宗鲁刻书喜欢用篆字。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近市居刻《尚书集注音疏》（江声编）也全用篆文刻印，此书现藏武汉大学图书馆。由此看来，我们阅读古籍，要懂得汉字演变史，要有点文字学知识。

依书法流派分类

古籍字体多为楷书，楷书在长期使用和书写实践中形成各种流派。各种流派都有其代表人物。比如东汉的张芝，三国的钟繇，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隋代的智永，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文徵明、董其昌等，清代的林佶、许翰屏、邓石如、梁同书、翁方纲、包世臣、何绍基等都是各自有体，自成一家。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对古籍字体有重大影响的王羲之和欧、颜、柳、赵诸人。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琅玡临沂（今属山东）人，东晋书法家。因做过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其书法博采众长，精研体势，结构严谨。其传世手迹有行书《兰亭集序》、

楷书《黄庭经》、《乐毅论》等。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对历代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代书法家。其书法特点是结体长方，于平正中见险绝。笔画以方为主。善于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笔画多的字，写得特别大；笔画少的字，却写得特别小；有些字形本来就扁，却写得特别扁。有些笔画往往是奇峰突起，出人意料。尽管如此，欧体字仍然给人以端庄稳重之感，并不因长短大小不一而显得凌乱散漫（图25）。其传世手迹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等。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书法家。他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过大功。唐代宗时，封为鲁郡公，人称"颜鲁公"。他的学术成就也很高，除了文集之外，还有《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可惜今已失传。其书法特点是气势雄伟，笔画丰肥，用笔以圆笔为多。捺笔斜度大、份量重、出脚长。横画比竖画细，口字上宽下窄，竖画起笔重、顿挫有力（图25）。其传世手迹有《多宝塔碑》、《颜家庙碑》等。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代书法家。其书法特点是字形比颜字稍长，笔画也稍细。筋骨外露，笔画富有弹性，无论横、竖、撇、捺，笔势都向四方伸展。用笔方圆兼施，横画短者愈短，长者愈长，竖钩向左平出，撇细而轻，包围结构的字上宽下窄（图25）。其传世手迹有《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等。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号水晶宫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元代书法家。其书法特点是点画圆润，结体秀美，运笔纯正，不故弄玄虚，笔路交待得十分清楚，点画呼应十分紧密。外似柔润而内实坚刚，形体端秀而骨架劲挺（图25）。他对小楷、大楷、行书、篆书等无不擅长，对明清两代影响甚大。过去，有人因为他是宋朝皇室后裔，当了元朝的官，从而贬低其书法价值，是不公平的。其传世手迹有《洛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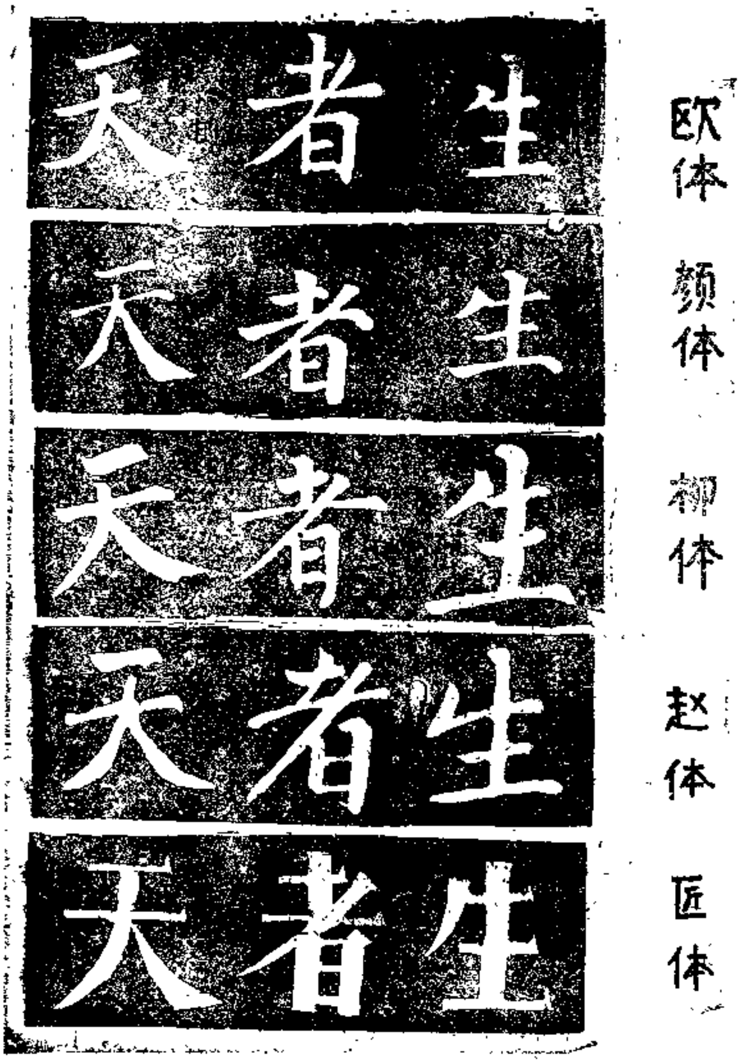


图25　各种书体比较

赋》、《道德经》、《四体千字文》等。

除了欧颜柳赵诸体之外，还有匠体、馆阁体等。匠体（一名宋体）是指那种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字体，其笔画特点是竖粗横细，字形长方（图25）。它是专业刻工发明的。清人指出：

> 宋体字者，流俗通用刻书之字体也。盖北宋时刊本，俱能书之士各随字体书之。元人刊书，盛仿赵松雪字体。明隆万时始有书工专为写肤廓字样，谓之宋体。刻书者皆能写之。①

因为匠体字生硬板滞，毫无生气，又称“硬体字”。馆阁体是流行于馆阁及科举试场的一种字体，因馆阁及翰林院官僚擅写此体而得名。馆阁体始于明永乐间，当时叫“台阁体”。明成祖朱棣召善书之士为宫廷服务，称为“中书舍人”。沈度、沈粲是较早的代表人物。到了清代，“台阁体”易名“馆阁体”，许多书工擅长此体。其书法特点正如清人的一首打油诗所说：

> 软而圆，匀而细。松烟墨，笔毫紫。个个簪化妆，行行红格子。上下兼四旁，而无不方矣。其名伊何欤？则曰馆阁体。②

馆阁体是一种僵化的御用书体。它是文人仕进的敲门砖。清代文学家龚自珍因不习馆阁体，翰林摒而不录，据清易宗夔《新世说·忿狷》：

> （龚自珍）生平不善书，以是不能入翰林，既成贡士，改官部曹，则大忿恨，乃作《干禄新书》，以刺执政。凡其

① 徐珂：《清稗类钞选·艺术》。
② 《清朝野史大观·咏馆阁体书》。

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令学馆阁书。客有言及某翰林者，必艴然作色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邪！我家妇女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

以上各家书体在古籍中都可以找到。其中欧颜柳赵四家对古籍字体影响尤大。当然，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又有自己的特征。宋本字体，欧颜柳三家都有。就时间而言，北宋早期多欧体字，后期多颜体字，南宋柳体字多。就地区而言，汴梁本、浙本多欧体；蜀本多颜体；建本多柳体。元本字体多赵体。清人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说：

元代不但士大夫竞学赵书，如鲜于困学、康里子山，即方外如伯雨辈亦刻意力追，且各存自己面目。其时如官本刻经史，私家刊诗文集，亦皆摹吴兴体。

吴兴体即赵体，因赵孟頫家居吴兴而得名。明本字体可分三个时期：洪武至弘治间为第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刻本承袭元风，多赵体字。正德和嘉靖间为第二时期，是由赵体转向匠体的过渡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字形逐渐趋向长方，笔画亦向横平竖直发展，这是专业刻工机械模仿宋本字体的结果。那么，正嘉间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变化呢？这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正德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发动复古运动，反对虚浮的台阁体，反对当时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嘉靖至万历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再一次反动复古运动。复古运动虽有其进步的一面，但由于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专从字句形式上模仿古人，也带来了消极影响，一些刻书的人由此而兴起了翻刻宋本的热潮，专从形式上模仿宋本字体。结果是邯郸学步，适得其反，与真正的宋本字体相去日远。万历以后，为第三时期，这个时期，匠体字已经完全形成。明匠体已经作为一种独特

的字体问世。这种字体虽然是从宋本字体"学习"而来，但早已失去宋本字体的风味，它是机械模仿宋本字体走向反面的产物。清本字体可分两个时期：康熙以前为第一时期，这个时期字形长方，横细直粗，尚存明末硬体风味；康熙以后为第二时期，这个时期是硬体、软体并存。明末清初匠体盛行，遭到人们的反对。康熙以后，在馆阁体的影响下，软体字日渐增多。刻书者多请名人手写上版，著名者如林佶书写的汪琬《尧峰文抄》、陈廷敬《午亭文编》、王士禛《古夫于亭稿》和《渔洋精华录》，这就是所谓"林氏四写"。扬州诗局刻书多用软字，密行端楷，酷肖宋镌。

历代书法流派和书法风气大致如上所述。

依字体大小及笔画繁简分类

古籍字体依大小分类，又有大字、小字之别。宋代眉山刻书多用大字，每行至多不过十七八字。小字本节省纸张，成本较低，便民购买。一般来说，宋元小字本不甚多见，藏书家尤珍视之。

古籍字体依笔画繁简分类，有繁体字和简体字(或叫俗字)。许多书坊为了简易速成，刻书多用简体，如"個"作"个"、"勢"作"劳"、"單"作"单"、"儀"作"仪"、"劉"作"刘"、"婁"作"娄"，等等。元人刻书最喜欢用简体字。刘复等曾抄录宋元明清各代12种不同版本的简体字编为《宋元以来俗字谱》一书，现将该书所列宋元明版本简体字数比较如下表（见下页）：

据此可知，元本简字数量远远大于宋明刻本。就内容而言，小说戏剧图书的简体字是最多的。小说戏剧图书的读者是广大民众，字体笔画由繁到简，反映了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天使用的许多简体字在宋元时期已触目可见。古代那些大胆使用简体字的出版家，堪称文字改革的先驱。

版本朝代	书　　名	简体字数	平均每书简体字数
宋	古列女传	348	263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179	
元	京本通俗小说	547	629
	古今杂剧三十种	959	
	三国志评话	382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	628	
明	娇红记	393	351
	白袍记	292	
	岳飞破虏东窗记	370	

八、刻工姓名

古籍刻本的成书过程大致有定稿、校勘、书写、刻版、刷印、装订等六个环节，其中最后四个环节均由刻书工人完成。刻书工人对于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对于古代文化的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刻工简介

封建社会轻视劳动人民，刻书工人名不上经传，因而，研究刻书工人并非易事。值得庆幸的是，许多古籍版面中都留下了刻书工人的姓名，为我们进行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刻书工人的姓名绝大多数刻在书口下方，也有刻在序后、目录后、凡例后、书后的。如明万历刻本《新编篇韵贯珠集》，“王朝刊刻”四字在序后；明隆庆陆治校刻本《孔子家语》，“长洲顾檈写、章掖刻”数字在凡例后。书口刻工姓名多阳文，也有个别为阴文，如宋本

《刘梦得文集》中书口下方"任显"其名就是阴文。为了简易速成，刻工姓名常常采用简称，或单书姓，或单书名。如宋本《刘梦得文集》中，"杨中"作"中"；"任达"作"达"。亦有把刻工籍贯也刻上去的，如宋刻大字本《荀子》书口下有"金华徐通"、"双溪李忠"等字样，这里"金华"、"双溪"显然是地名。就具体分工而言，刻书工人又可分为写工、刊工、印工和裱褙工。写工又叫书工；刊工又叫手民、劂劂氏、刻字匠等；印工又叫刷印匠，是负责印刷的；裱褙工又叫装潢匠。为了谋生，大多数刻书工人既能写版，又能刻版，甚至有的人能把写、刻、印、装四项工作全部兼起来。更有不少书是由书工、写工等多人通力合作完成的。每种古籍刻工人数的多少与内容多寡有关，如明天顺刻本《顺成文集》四卷，刻工只有沈诚、沈诠二人；宋庆元成都刻本《太平御览》一千卷，刻工则多至150人左右。有时为了加快出书速度，卷数不多的书也可以动员许多刻工来完成，如宋本《扬子法言》十三卷，全书只有72页，竟组织了40个刻工，大多数刻工只刻了一页，出力最多的李倍也才刻了6页。

历代刻工

根据古籍刻本中关于刻工的记载以及有关资料，现将历代刻工情况介绍于下。

宋代刻工可考者有3000余人。①杭州、成都、眉山、建阳、南京、苏州、抚州、吉州、池州等地刻本之中，刻工姓名记载较详。南宋初期，杭州名工有牛实、徐升、顾忠、陈政、陈明仲、陈询、陈忠、陈晔、施宏、洪新等。南宋中期，杭州名工有丁松年、金荣、金嵩、陈寿、陈彬、陈晃、刘昭、吴椿、金滋、马良等。宋末元初杭州名工有李德瑛、郑野、胡胜、范坚、徐泳、李宝、何庆、赵遇春、俞声等。宋代成都名工有兹仲、杜俊、任

①张秀民：《宋元的印工和装褙工》，载《文献》1981年10辑。

纯、田龙、宋圭、李顶、王福、张元等。眉山名工有王朝、张福孙、文望之、史丙等。建阳名工有蔡庆、邓生、吴清、刘生、吴文、阮生等。南京名工有陈震、陈仰、毛仙、周清、孙彦等。苏州名工有蒋宗、贾裕、蒋荣祖等。抚州名工有高智广、高安道、高文显、周昂、余安等。吉州名工有胡元、蔡中、蔡章等。池州名工有刘用、王明、刘彦中、唐彬、刘迈、刘彦龙等。宋代刻工对古代文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流传至今的许多古籍刻本都是以宋本作为祖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宋本在历代刻本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也与宋代刻工的辛勤劳动密切相关。

元代刻工可考者有平阳名工姜一、何川、郑思、杨三等，杭州名工王正卿、胡进之、张君用、袁云卿等，宁波名工王元吉、章宇、章子成、王子仁、张公等。元刻本中刻工姓名省文的现象比较严重，元大德本《南史》，刻工“朱敬之”或作“朱苟”，或单署“敬”字；“徐进卿”或单署“徐”字，“徐”或省作“余”；“何甫”或署“何”，或署“甫”，“何”或省作“可”；又单书“张”、“杨”、“董”、“郑”等姓，“张”又作“弓”，“杨”又作“木昜”。元代刻工的精湛技艺在文人笔下多所反映，例如程钜夫《雪楼集·刻字熊生》诗云：

> 精艺令人注意深，斯文百世得追寻。
> 伏经口授终非古，周鼓体讹犹至今。
> 子已万言归一默，谁知只字抵千金。
> 铅刀可是传心具，有画无心画是心。

方回《桐江续集·赠刊工程礼》诗云：

> 镂金镌石切瑶琨，深入诗家不二门。
> 刻画功夫初亦苦，终然芒角了无痕。

谢应芳《龟巢集·赠刊字张生序》云：

金沙张敬之，善锓书者也，家本业儒，故能矫二者之弊（抄误、刻误），且以篆、隶究字书原委，偏旁点画，毫发无外，士大夫咸以是称之。

以上歌颂刻工的诗文在古代文献中颇为难得，故不惜篇幅迻录至此。

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极盛时期。活字印刷的普及，套印的广泛应用，饾版、拱花的发明，都是刻书工人智慧的结晶。明代后期，盛行竖粗横细的匠体字。匠体字是专业刻工模仿宋刻本而发明的一种字体。过去，论者对匠体字多所非议，其实大可不必。作为图书，主要是供人"读"的，只要内容正确，字迹清晰，没有错别字，就算达到要求了。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书法价值高一点，自然更好。如果没有书法价值，也不必苛求，因为图书毕竟不是书法作品，不是字帖。实际上匠体字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今天出版物的字体就是从匠体字学来的。应该说，匠体字是刻字工人对于印刷字体的一大贡献。明代刻工总数有多少？据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统计，明代可考的出版家有4993个，如果以每个出版家平均有5个刻工计算，那么明代刻工总数当有25000人。这些刻工大都集中在苏州、新安、北京、南京、杭州、建阳等刻书中心地区。苏州、新安更是刻工荟萃之地。据统计，明代苏州地区可考的刻工有650余人。其中刻书5种以上者有王成、王伯才、李安、李清、李潮、李泽等44人，张敖刻书多达12种。苏州地区写工可考者有吴曜、顾檈、钱世杰、徐普、吴应龙、何伦、章仕、徐冕、吴时用、江南隽、朱恒、沈恒、李伦、周朝、周慈、金三枝、金应奎、高洪、侯臣、侯祖、章扞、章营、陆廷相、陈怡、陈知占、谈诏、缪渊、顾植、龚士廉等29人。①其

① 以上数字据冀淑英《谈明刻本及刻工》（载《文献》1981年7辑）和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统计。

中，以吴曜、顾榥、钱世杰三人写版最多，吴曜写了12种，顾榥写了9种，钱世杰写了5种。新安刻工大多出身于刻书世家（详第二编第九章第一节）。除了新安黄氏之外，明代以刻图著称的刻工还有刘素明、刘君裕、刘希贤、魏少峰等。刘素明刻有《西厢记》、《幽闺记》、《红拂记》、《丹桂记》、《麒麟记》、《三国志》、《古今小说》、《警世通言》、《禅真逸史》等。刘君裕刻有《二刻拍案惊奇》、《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等书。刘希贤刻有《征番奏捷传》、《金陵梵刹志》等。

清人承袭明风，刻书亦盛。刻工无处不有，正如钱泳《履园丛话·艺能》所说：

> 雕工随处有之，宁国、徽州、苏州最盛，亦最巧。

湖南、广东等地的农民甚至把刻书当作家庭手工业，一边种田，一边刻书。全家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出现不少女刻工，据《清稗类抄·工艺》：

> 湖南永州人民，类以剞劂为业，妇孺且有从事者。牧牛郊野，辄手握铅椠，倚树根镌之。广东顺德县之手民，率系十余岁稚女，价廉工速，而鲁鱼亥豕之讹误，则尤甚于湖南。

清代后期，湖北地区的刻工影响较大，据《清稗类抄·工艺》记载：

> 同、光以来，刻书者争挟稿以寄鄂，谓其椠精而值廉也。然鄂之手民，初亦甚劣，宜都杨惺吾大令守敬多方指教刊本，久之，且能影摹宋元版矣。

清初刻工著名者有刘荣、汤尚、汤义、朱圭（以上诸人已见前文）、鲍天锡、鲍承勋、鲍文野等。鲍天锡、鲍承勋刻有《秦楼月》等，鲍文野刻有《午亭文编》等。乾嘉名工有刘文奎、刘文楷、刘文模兄弟等，他们曾合刻《文选注》等书。总之，清代刻工可考者不如宋元多，这与康雍乾诸朝大兴文字狱有关。一旦有事，往往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受到株连，连刻书工人也一并构陷在内，据陆莘行《秋思草堂遗集》记载：

> （庄廷钺案）凡刻书送板钉书者，一应俱斩。一刻字匠哭曰："上有八十之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妻必嫁，母其谁养！"言讫就刑。

在《齐召南跋齐周华天台山游记案》中，甚至连"不通文理"的刻工也未能幸免于难，据《清代文字狱档》：

> 刻字匠周景文虽据供不通文理，不知悖逆情事，究属违犯，请照违制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再加枷号一个月，示儆余。

骇人听闻的案例，使许多刻书工人不敢在书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以防不测。

以上是历代刻工的简单情况。

研究刻工的意义

研究刻工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刻工具有时代性和地区性，我们可据以了解一时一地的刻书情况。例如明代苏州、新安两地刻工众多，说明苏州、新安两地是明代刻书的中心地区。

第二，可以通过刻本关于刻工姓名的记载鉴定版本。例如宋

绍兴本《广韵》刻工有王珍、徐杲、徐升、徐政、徐颜、陈询、姚臻、余永、余竑、陈锡、陈明仲等人；宋绍兴十六年浙东茶盐司刻本《事类赋注》刻工有王珍、徐杲、徐政、徐升、余竑、陈锡、陈明仲等人；宋绍兴九年临安府刻本《唐文粹》刻工有朱祥、朱礼、沈绍等人；宋绍兴十六年刻本《高诱注战国策》刻工有王珍、徐杲、朱明等人；宋绍兴刻本《管子》刻工有李恂、李懋等人。据此可知，王珍、徐杲、徐升、徐颜、徐政、陈恂、陈明仲、姚臻、余永、余竑、朱祥、朱礼、朱明、沈绍、李恂、李懋等均为绍兴间刻工。有一本书叫《乐府诗集》，刻工有王珍、李恂、李懋、徐杲、徐升、徐颜、徐政、沈绍、余永、余竑、姚臻、朱祥、朱礼、陈询、陈明仲等人，此本虽然没有序跋、牌记等，但刻工均宋绍兴间人，据此，该本亦可定为宋绍兴刻本。利用刻工鉴定版本要注意以下几点：（一）对于跨时代刻工所刻的书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定为前代或后代，如六晏、六付、罗六、虞亮是元末明初人，元末刻《金史》和《宋史》，明初刻《慈溪黄氏日抄》、《北史》等，不能把以上四书统统定为元本或明本，是在元代刻的就定为元本，是在明代刻的就定为明本。（二）有些翻刻本将原刻本的刻工姓名照样刻出，这样的刻工姓名就不足为据了。如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秦恩复重刻宋本《扬子法言》，虽把宋本40余名刻工姓名照样刻出，仍应定为清刻本。（三）不同时代的刻工姓名出现在同一书上，应定为递修本。如《国语解》刻工分为三期：南宋初期杭州刻工张升、卓宥、张明、方通、骆升、王介、严忠等为第一期；南宋中期杭州刻工马松、何泽、陈彬、陈寿等为第二期；元代杭州刻工何建、缪珍、熊道琼等为第三期。经过分析可知，第一期刻工为原刻本刻工，第二、三期刻工是补版刻工。因此，全书应定为宋刻宋元递修本。

查找刻工姓名的工具书有日本人长泽规矩也编、邓衍林译《宋元刊本刻工表初稿》（载《图书馆学季刊》第8卷第3期，

1934年9月出版）、王肇文编《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等。此外，周芜《徽派版画史论集》附《黄氏刻工考证表》、魏隐儒《古籍版本鉴定丛谈》附《宋至清各代部分刻本所见刻工及写画人姓名简表》、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附《刻工人名索引》等亦可参看。

九、装　　订

明周嘉胄《装潢志》云：

> 圣人立言教化，后人抄卷雕版，广布海宇，家户诵习，以至万世不泯。上士才人，竭精灵于书画，仅赖楮素以传。而楮质素丝之力有限，其经传接非人，以至兵火丧乱，霉烂蠹蚀，豪夺计赚，种种恶劫，百不传一。于百一之中，装潢非人，随手损弃，良可痛惋。故装潢优劣，实名迹存亡系焉。

这说明装潢作用之大，它直接关系到"名迹存亡"，不可等闲视之。当然，装潢含义较广，它包括封面、版面、插图的设计以及装订形式等。这里专谈古籍的装订形式。自从图书产生以后，装订形式几经变化，经历了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多种演变形式。现将各种形式的特点叙述如下：

卷　轴　装

卷轴装又叫卷子装。这种形式早在简帛流行的时代就产生了，这是一种最早的装订形式。在纸书出现以后，这种装订形式更加完善了。它盛行于汉魏六朝和隋唐五代时期，卷轴装由卷、轴、褾、带、签五个部分组成。"卷"是整个卷轴的主要部分，它由若干张纸粘连而成。卷的长短不一，长的可达二三丈，短的

只有数尺，这主要依据文字的多少而定。“轴”是一根短棒，卷子就缠绕在上面。轴可用檀木、象牙、琉璃、玳瑁、珊瑚等多种材料制成，到底选用什么材料作轴，主要依据藏书者的地位和卷子的价值而定。例如隋炀帝以红琉璃轴、绀琉璃轴和漆轴把图书分为三个等级。“褾”也叫包头，是卷端另加粘接的厚纸或丝织品，有保护全卷的作用。“带”是指褾头的丝带，用以捆扎卷子。“签”是指轴头所系标明书名、卷次等内容的牌子。签和轴一样，也用牙、骨、玉等不同材料表示不同的内容和价值。如前所述，唐代官方藏书就是以不同的轴、带、签表示不同的内容。卷轴装虽然有容量大等优点，但卷面过长，翻阅极不方便(图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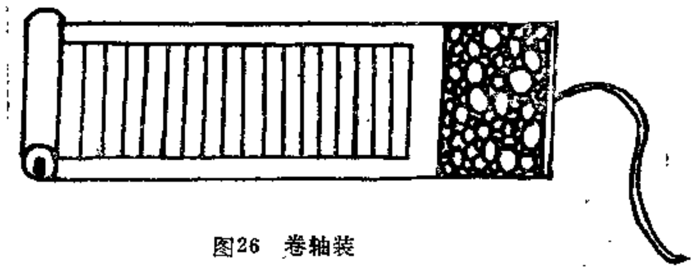


图26 卷轴装

旋风装

唐代后期出现旋风装，旋风装是由卷轴装向册页装转化的过渡形式。这种装订形式在古典文献中有不少记载：

> 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页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页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彩选》之类是也。
>
>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 古书皆卷，至唐始为页子。
>
>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五

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页，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

吴彩鸾龙鳞楷《韵》（指《唐韵》）……鳞次相积，皆留纸缝。

——（元）王恽《玉堂嘉话》卷二

相传彩鸾所书《韵》，散落人间者甚多，余从延陵季氏曾睹其真迹……逐页翻看，展转至末，仍合为一卷。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旋风页者即此，真旷代奇宝。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

以上所谓“页子”、“旋风页”、“龙鳞”云者，指的就是旋风装。值得庆幸的是，吴彩鸾的《唐韵》至今完好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其具体装订方法是：以一长卷子作为底纸，首页单面书写，全幅裱于底纸右端。从第二页起，双面书写，将每页右侧底部无字的边缘部分鳞次相错地粘裱于前页下面右侧的底纸上。收藏时从右至左卷起，从外形看，仍然像卷轴装。阅读时，除首页不能翻动外，其余各页均与现代书籍一样，可以自由翻转。[①] 旋风装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卷轴装的旧制，但它克服了卷轴装不便翻阅的缺点，实开了后世册页装的先河（图27）。

经折装

经折装（一名折子装）是唐代后期产生的一种新的装订形

① 李致忠：《古书旋风装考辨》，载《文物》1981年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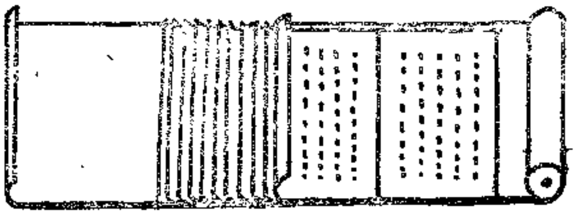


图27　旋风装

式。其制作方法是将写好的长条卷子，按照特定的行数，就像折扇那样均匀地折叠成长方形折子，再在前后分别加上两块硬纸片，保护封面和封底。它和旋风装的区别在于：旋风装是双面书写，仍保留卷子形式，而经折装是单面书写，已变为折子形式了。经折装的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的经折装成为一张张散页，和后来的册页装非常相似（图28）。过去，人们常将经折装和梵夹装混为一谈，其实，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就时间而言，梵夹装源自古代印度，早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土的佛经就是梵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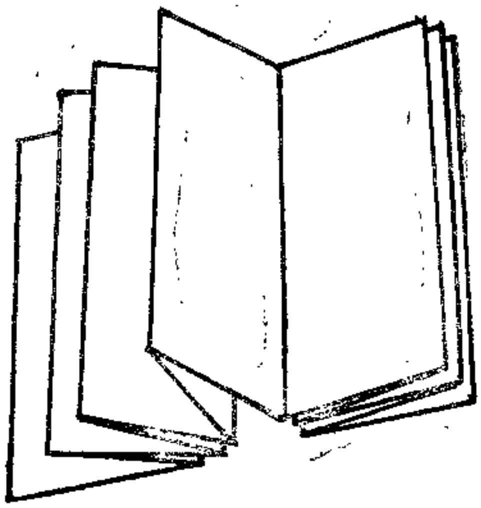


图28　经折装

装，而经折装则是中国的土产，它产生于唐代后期。就载体而言，梵夹装的书是写在多罗树叶上的，而经折装的书大多是写在纸上的、就装订方法而言，梵夹装是将写好的贝叶经依次叠放，用木板夹紧，最后穿孔以绳结札，显然与经折装不同。

蝴蝶装

蝴蝶装简称蝶装，因书页展开似蝶形而得名。这是古代图书册页装的最初形式，盛行于宋代。其装订方法是将每一印页有字的一面向内对折，然后把书口的背部粘连在裹背纸上，再装上硬纸作为封面就成了，正如《明史·艺文志》所说：

> 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

蝴蝶装所用浆糊是特制的，据明张懋修《谈乘》记载：

> 王古心问僧永光："前代藏经，接缝如一线，日久不脱，何也？"永光曰："古法用楮树叶、飞面、白芨末三物调和如糊，粘接纸缝，如胶漆之坚。"此法文房可用。

蝴蝶装的书可以在书架上直立，书口向下，书背向上，书根向外，与现代图书的排架形式差不多。由于这种装订形式是版心向内、单口向外，因此，书背保护完好。其余三边若有污损，可以裁去，而不影响文字内容，这是它的优点。其缺点是每读一页，必须连翻两页，不胜其烦（图29）。

包背装

包背装始于南宋，流行于元代和明代前期，因用一张厚纸对折包裹书背而得名。早期的包背装是将书页有字的一面正折，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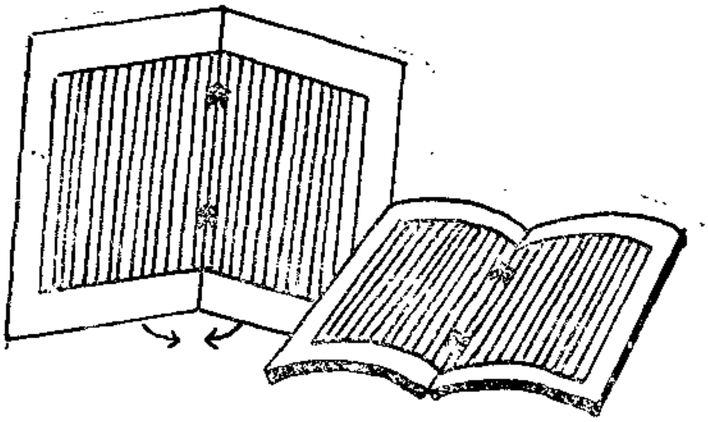


图29　蝴蝶装

粘在包背纸上。后期的包背装是在书页边栏外的余纸上打孔，用纸捻穿订，然后加上封面（图30）。用纸捻穿订比用浆糊粘连要牢靠得多，但在装订时，书脑要留宽一点，打孔处要远离边栏，正如元孔齐《至正直记》卷三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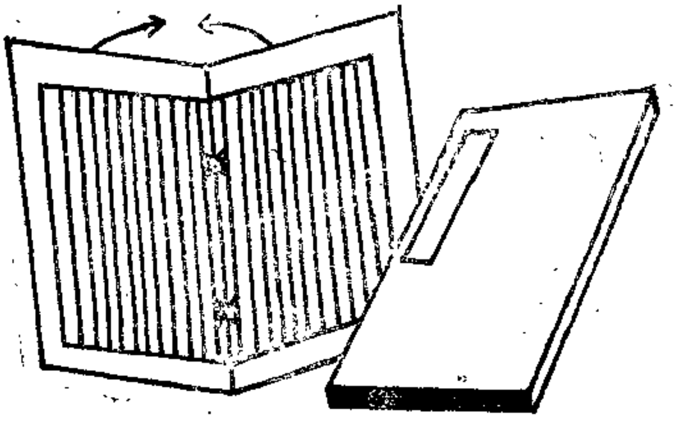


图30　包背装

抄书当多留边栏，则免虫啮之患。书册必穿订，不可用脑折也。若《通鉴》大本数多至百者，则脑之以下皆穿订可也。脑者久而糊纸无力，必致损脱而零落矣。书帙必厚至一二寸，或三寸亦无妨，但订近边缘多空余处，不可迫近边栏间，且易观，又免零落也。抄书外边栏留一寸以上，如内穿订处缘边栏亦留一寸以上方可。

包背装和蝴蝶装的区别在于：包背装书口在外，用纸捻穿订；而蝴蝶装书口在里，用浆糊粘连。包背装克服了蝴蝶装每读一页必须连翻两页的麻烦。

线 装

线装始于南宋初，通行于明代中叶，至清初而大盛。其装订方法是：（一）折页，即把书页对折为两个半页；（二）分书，即依卷页顺序分为若干册；（三）齐栏，即每页以书口为准对齐；（四）添副页，即加入书衣内的空白页；（五）草订，即先用纸捻穿订；（六）外加书衣；（七）截书，即用刀把书口之外的三边截齐；（八）打磨，即用砂纸磨去毛边；（九）包角，即珍贵书籍用绫绢包其订线一侧的上下两角；（十）订眼，即打引线之孔；（十一）穿线；（十二）贴签，即贴上书签(图2)。线装和包背装的区别在于：线装不用整张书衣包背，而是在书的前后各加书衣，然后订眼穿线。一般的线装书多打四孔，开本大的也有打六孔的。线装的优点有两个：一是比包背装结实，不易脱落；二是书本旧了可以重装，可以整旧如新。其缺点是重装次数越多，针孔也就越多，有损原书。清人孙庆增在《藏书纪要·装订》中也曾谈过线装的具体方法：

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折书页要折得直，压得久，

捉得齐，乃为高手。订书，眼要细，打得正而小，草订眼亦然。又须少，多则伤书脑，日后再订眼多易破，接脑烦难。天地头要空得上下相趁，副页用太史连，前后一样两张。截要快刀截，方平而光。再用细砂石打磨，用力须轻而匀，则书根光而平，否则不妥。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根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可见线装大有学问。从折叠、打眼，到截纸、穿线，都很讲究。

以上是古籍的几种主要装订形式。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形式特征大体确定版本时代。当然，由于宋元刻本历时既久，其原装形式多为后人所改易，早期的装订形式今已很难看到。今天所能看到的大多属于线装。只要我们认真对比研究，就会发现各种线装本的差别也是存在的。

十、纸　　张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传世古籍基本上是以纸作为载体的。了解古代纸张的使用情况，对于鉴定古籍版本是不可缺少的。

古籍用纸的种类

古籍用纸种类繁多，就其原料而言，主要有麻纸、树皮纸、竹纸、草纸四大类别。

麻纸是以苎麻、大麻等为原料制成的，其特点是纸面洁白，没有光泽，纸背粗糙，偶见未开麻团或草棍，质地坚韧，吸墨性能较强。帘纹宽约两指。所谓“帘纹”是指捞纸留下的痕迹。捞纸是指在造纸过程中用竹帘捞取纸浆的一道工序。竹帘是由帘子、帘床和帘尺三部分组成，帘子是由许多圆而细的竹条编连而成；帘床是一个木制的长方框架，是承受帘子的支架；帘尺在帘

床两端，用以绷紧帘子，使之保持平直（图31）。捞纸时将竹帘斜插纸槽中，让纸浆均匀地附在帘子上，然后提起竹帘，让多余的水从竹条缝隙中滤出，帘面上就形成一层湿纸，最后，把这种湿纸刷在烘墙上烘干，一张纸就制成了。捞纸是造纸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序，因此，许多纸上都留下帘纹。帘纹宽窄就成为鉴定版本的一个依据。麻纸有白黄二种，白麻纸比较多，是没有经过加工的麻纸。黄麻纸是由白麻纸染色而成。所谓"染色"就是以黄柏为染料，将白麻纸浸泡加工的一种方法。黄麻纸不仅颜色好看，而且可以防虫，一举两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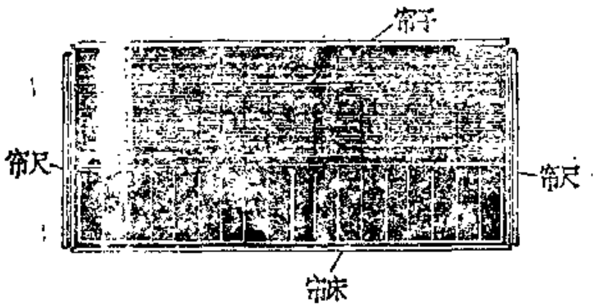


图31 造纸所用竹帘

树皮纸是以楮树皮、藤树皮、桑树皮、青檀皮等为原料制成的。因为树皮纤维坚实，所以树皮纸韧性较好，举凡绵纸、开化纸、开化榜纸等均属此类。绵纸（南方通称皮纸）也有白黄二种，白绵纸纸色洁白，质细而柔韧，纸破丝连，如同绵丝。宣纸是白绵纸中的精品。宣纸产于安徽泾县一带，因向皇帝进贡而著称。该纸主要以檀树皮为原料，加工精细，手艺高超。其纸颜色纯白，质地柔软坚韧，吸水性能很好，与湖笔、徽墨、端砚并称"文房四宝"。黄绵纸由白绵纸染色而成，颜色稍带黑黄，韧性不如白绵纸。开化纸（亦名桃花纸）因产于浙江开化而得名，这种纸颜色洁白如玉，帘纹不大明显，纸虽薄而韧性强，藏书家陶湘喜欢藏开化纸殿版书，人称"陶开化"。开化榜纸比开化纸稍厚，颜

色稍暗，帘纹也不明显。

竹纸是以毛竹、苦竹等为原料制成的，颜色稍黄，纸性稍脆，举凡毛边纸、毛太纸、连四纸（亦名连史纸）、太史连纸、万年红等均属此类。毛边纸颜色呈米黄色，正面光滑，背面粗糙，厚薄适中，韧性稍差。毛太纸比毛边纸薄，纸幅稍小，质量不如毛边纸。连四纸以嫩竹制成，纸色洁白，纸面平滑，纸背稍粗糙，没有草棍等杂物。太史连纸颜色稍黄，质细而平滑，抖之有声。

草纸是以麦杆、稻草等为原料制成，质量较差，只能作为卫生纸和包装纸用，个别书商间或有用草纸印书的。

古籍用纸有较强的时代性。大而言之，约分三个阶段：唐代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以麻纸为主；从宋到明代中期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以树皮纸和竹纸为主；从晚明到清代为第三阶段，这个阶段以竹纸为主。

从晋到唐的图书用纸

晋代以使用麻纸为主。晋人已经掌握了一些加工纸张的简单技术。除了染色之外，涂布也是一种加工方法，即把白色矿物细粉用粘合剂或淀粉刷糊到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做，既可使纸变白，又可增加纸的平滑度和吸墨性。1924年新疆鄯善出土的东晋写本《三国志》残卷，用的就是这种涂布纸。

南北朝图书仍然以麻纸为主。经专家检验，北魏延昌二年(513年)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就是麻纸。南北朝人对纸的加工技术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贾思勰《齐民要术》中专门叙述了染潢的全过程。

隋代在使用麻纸的同时，已经开始使用树皮纸。新疆出土的隋代写本《典言》是麻纸；北京图书馆藏隋开皇二十年（600年）写本《波罗蜜经》是楮皮纸。

唐代抄书多用唐纸。造纸专家对新疆出土的19种唐代纸张进

行检验，发现其中12种都是麻纸。①故宫博物院藏唐代诗人杜牧太和三年（829年）书写的《张好好诗》也是麻纸。除了麻纸之外，唐代也使用少量的树皮纸，据记载，僧人修德“种楮树凡历三年，兼之花药，灌以香水，洁净造纸”，然后召善书人为之抄写《华严经》。②《敦煌遗书》中的唐写本《无上秘要》就是树皮纸。另外，唐代使用的藤纸也是树皮纸。唐纸的加工技术也有很大提高，唐代加工纸可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薛涛笺、谢公十色笺等染色纸。第二类是硬黄纸、金花纸等名贵纸。硬黄纸是把纸染色之后，涂上黄蜡，并用熨斗把纸熨平，晾干之后即成。这种纸质地硬密，呈深黄色，防水防蛀，唐人多用来抄写佛经，北京图书馆藏有硬黄纸经文实物。金花纸是把真金碾成薄片，撒在涂有胶料和颜色的纸面上，晾干而成。这种纸装饰效果较好，色彩对比鲜丽，豪华而又精细，秀美而又严谨。第三类是带有各色花卉图案的印花纸。

宋元图书用纸

宋元时期麻纸渐少，树皮纸和竹纸渐多，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实：第一，从宋元的造纸情况看，我国南方各省有丰富的竹材资源，各种竹材多达50余种。如果从汉代发明造纸技术算起，到宋代已有800多年的历史。经过人们的长期实践，宋代造纸技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树皮纸早在汉代已经出现，竹纸在唐代也已出现。到了宋代，树皮纸和竹纸的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是空前的，兹引文献记载为证：

> 吴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晾令稍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澈，是谓“春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新疆出土古纸研究》。

② （唐释）法藏：《华严经传记》第五。

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

——（宋）陈槱《负暄野录·论纸品》

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

——（宋）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

余杭由拳村出藤纸，富阳有小井纸，赤亭山有赤亭纸。

——（宋）吴自牧《梦粱录·物产》

《宋史·地理志》中亦有临安、湖州、衢州盛产藤纸的记载。因为藤纸质地坚韧，宋人经常用来制作衣服、蚊帐等。四川广都纸是用楮树皮为原料制成的，有假山南、假荣、冉村等品种。宣纸作为一种名贵的树皮纸，在宋代亦有大量生产。第二，从文献记载看，宋代树皮纸、竹纸的使用相当普遍，明屠隆《纸墨笔砚笺·纸笺》云：

宋纸有澄心堂纸，极佳。宋诸名公写字及李伯时（李公麟）画，多用此纸……有歙纸，今徽州歙县地名龙须者，纸出其间，光滑莹白可爱。有黄白经笺，可揭开用之。有碧云春树笺、龙凤笺、团花笺、金花笺。有匹纸，长三丈至五丈，陶谷家藏数幅，长如匹练，名"波阳白"。有藤白纸、观音帘纸、鹄白纸、蚕茧纸、竹纸、大笺纸。有彩色粉笺，其色光滑，东坡山谷多用之作画写字。

上举诸纸多是树皮纸和竹纸。宋代诗人梅尧臣《送杜君懿屯田通判宣州》云："日书藤纸争持去，长钩细画似珊瑚。"可见写诗也多用藤纸。第三，从现存实物看，造纸专家通过物理实验，发现传世宋元图书多为树皮纸和竹纸：南宋廖莹中刻《昌黎先生集》是桑皮纸；南宋吉州刻《文苑英华》、宋淳熙内府写本《洪范政

鉴》、元茶陵刻本《梦溪笔谈》等都是楮皮纸；宋乾道七年（1171年）福建刻《史记集解索隐》、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福建刻《毗卢大藏》、元天历三年（1330年）福建刻《王氏脉经》、元至元六年（1269年）建阳郑氏积诚堂刻《事林广记》、元至顺三年（1332年）福建刻《唐律疏议》、元大德三年（1299年）江西信州刻《稼轩长短句》、元大德间广州刻《南海志》等都是竹纸。以上各本均藏北京图书馆。当然，宋元图书也有少数使用麻纸的例子。

由于宋元雕版印刷发展较快，纸张供不应求，于是人们想了种种办法来缓和这种紧张局面：（一）以纸换书。买书人除了交付少量刻书费之外，还要自备纸张。例如元人谢应芳购买《十七史》就是托人买纸，在集庆路儒学印置的（详第二编第五章第三节）。（二）以纸背印书。宋纸"极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①]版本学所谓"公文纸背本"（亦名"牍背本"）就是用户口钱粮册子等纸背印成的。宋代著名词人晏殊就常用纸背抄书，据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

晏元献（晏殊之谥）平居书简及公家文牒，未尝弃一纸，皆积以传书。

清人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编·芦川词跋》说：

宋本每页纸背大半有字迹，盖宋时废纸多直钱也，此词用废纸刷印，审是册籍，偶阅之，知是宋时收粮档案，故有更几石，需几石，下注秀才进士官户等字，又有县丞、提举乡司等字，户籍官衔略可考见。

---

① （清）俞樾：《茶香室续钞》卷二十二。

今藏北京图书馆的宋镇江府学刻本《新定三礼图集注》、宋姑孰郡斋刻《洪氏集验方》和宋湖北刻本《花间集》等均属公文纸背本。今藏南京图书馆的宋金华刻本《欧阳先生文粹》也是公文纸背本。

明清图书用纸

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极盛时期，纸张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刺激了造纸业。明代纸的品种大量增加，明人王宗沐在《江西大志》中列举了白榜纸、中夹纸、小开化纸、呈文纸、玉版纸、藤皮纸、大绵纸、小绵纸、小户油纸等28个品种。明纸的加工技术也有很大提高，明人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详细介绍了造葵笺法、染宋笺色法、造捶白色法、造金银印花笺法、造松花笺法等。明代还生产一种防蠹纸，该纸呈桔红色，俗称“万年红”，只要将其装在图书扉页、封底等处，就能防虫。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明崇祯四年(1631年)刻《梦溪笔谈》，就是因为衬有这种防蠹纸，至今完好无损。明纸就颜色而言，可分白黄两个大类，据苦竹斋主《书林谈屑》记载：

> 白纸复分白绵与白皮。白绵纸色纯白，质坚而厚，表面不如开化之光滑；白皮纸白中微带灰黄，颇似米色，不如白绵之细密，亮处照之，尝见较粗之纤维盘结于帘纹间。黄纸复分黄绵与竹纸，黄绵与白绵略同，而色带灰黄；竹纸则类多脆薄，易碎，故藏书家购求明版，必以白纸为贵。①

这里所谓“白绵”、“白皮”、“黄绵”等都属于树皮纸。这就是说，明代前期用纸仍以树皮纸和竹纸为主。例如明写本《永乐大典》用的上等宣纸就属于树皮纸。明代后期，树皮纸渐少，竹

---

①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

时代特征，我们可以根据纸张的时代特征鉴定版本。但是，由于古籍用纸比较复杂，也不能绝对化，不能把纸张当作唯一依据，还应结合其它特征一并考虑。例如公文纸背本的鉴定就不是那么简单，宋鄂州刻本《花间集》用南宋淳熙十一、十二年的公文纸背刷印，公文中有"进义副尉本州指使监公使库范"等字样，就不能简单地定为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鄂州公使库刻本。《一氓题跋·花间集校后记》说：

> 从用淳熙册子纸来说，可以是淳熙以前的(假定北宋的)刊板，以后才用淳熙册子纸来印的；印的时候必须等到这种册子已经失去时效，变成了作废档案以后才行。这就是说北宋刊板，南宋印刷。但更可以是淳熙以后的刊板，把过了时的淳熙册子纸翻过来印的。假如是北宋刊板，为什么不用比淳熙更早的作废了的档案纸？因此不能判定其必为北宋刊板。其次就只好看刊板的风格了。照原书刊板的行格(每行十七、十八字不等)与字体看来，都已经比较草率了，应该认为是南宋的。但杨绍和于《楹书偶录》中著录此书时，径称为"宋淳熙十四年丁未鄂州使库所刊板"，则完全是臆定的。王鹏运写四印斋复刻本的跋时，也仅说："此本其刻于鄂州乎？"连刊刻地方都出以谨慎怀疑的态度。怎么可以因为用了淳熙十一、十二年的册子纸，就把刊刻时间定在"十四年"、刊者定为"鄂州使库"？这个本子是南宋淳熙十二年以后在鄂州刷印的，但时间不能臆定为"十四年"，刊者不能臆定为"使库"。

可见利用纸张鉴定版本并非易事，只有全面考虑，方可万无一失。

十一、藏　书　印

当代文学家唐弢在《晦庵书话·藏书印》中说：

> 有时买了一本心爱的书，晴窗展读，觉得纸白如玉，墨润如脂，不由你不掇出印章，在第一页右下角钤上一方朱红的印记，替这本书增些色泽，也替自己的心头添些喜悦。

这种喜欢在图书上钤印的习惯古已有之，我们现在常常看到一些古籍上朱印累累，确实叫人赏心悦目。

藏书印的历史

藏书印起于何时？根据史书记载，官方藏书印始于唐代，"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书皆未行印记，但备列当时鉴识艺人押署"。① 这就是说，唐代以前，官方藏书只不过有许多鉴赏者的签名而已。从唐代开始，官方藏书钤印逐渐相习成风。唐王建《宫词百首》中有这样的句子："集贤殿里图书满，点勘头边御印同。""御印"即帝王之印。可见，集贤殿官书都有印章。唐代官方藏书印可考者有"贞观"、"开元"、"集贤"、"秘阁"、"翰林"、"元和"等等。宋代有内府图书印38方，其中如"内府图书之印"、"龟龙上珍"、"云汉之章"、"大观中祕"、"政和"、"宣和御览"、"常乐未央"等。② 元代官书有"翰林国史院官书"长方木印，宋绍兴四年温州刻本《大唐六典注》里也有一方元代官书印，印文是："国子监崇文阁官书，借读者必须爱护，损坏阙失，典掌者不许收受。"明代官书有

---

①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古今公私印记》。

② 《金史·礼四》。

"广运之宝"、"礼部官书"等印，明代藩府藏书印知见者有"晋府书画之印"、"潞国永传"、"衡王图书"、"楚府图书"、"周府御书楼宝"、"养德书院之印"等。清代官书所钤印章最多，单是乾隆皇帝就有"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图32）、"八征耄念之宝"等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谕文渊阁新藏《四库全书》，自四月四日始，每册用御宝二：前曰'文渊阁宝'，后曰'乾隆御览之宝'"。①清代王府藏书印知见者有"果亲王府图书记"、"怡府世宝"、"果亲王点定"、"安乐堂藏书记"等。

私人藏书印早于官方。据《历代名画记》记载，早在东晋就出现了收藏家的印章，可惜时代久远，已无实物流传。唐宋以后，私人藏书印逐渐增多。唐代藏书家刘禹锡、白居易、皮日休等均有藏书之印。皮日休《鲁望戏题书印囊奉和次韵》诗云："金篆方圆一寸余，可怜银艾未思渠。不知夫子将心印，印破人间万卷书。"②宋代藏书家赵彦若、富弼、刘羲仲、楼钥、贾似道、俞琰、俞贞木等都有一方或数方印章。例如楼钥有"四明楼钥"印，俞琰有"石磵书隐"印，俞贞木有"俞贞木"、"立庵图书"等印。元代藏书家倪瓒、陆友、张雯、赵孟頫等都有藏书印，其中以赵孟頫的藏书印为最多，计有"水晶宫道人"、"大雅"、"天水赵氏"、"赵文敏书"等。藏书印至明清而极盛，多数藏书家都有自己的专用印章。虞山毛氏藏明翻刻宋本《春秋经传集解》一书，就钤有"汲古阁"、"稽古阁书印"、"隐湖渔夫"、"醉枕离骚"、"竹篱茅舍"、"宝鼎香浓、绣簾风细、绿窗人静"、"道东"、"虞山毛氏汲古阁收藏"、"毛表"、"字奏叔"等50多方不同的印章。其中"毛表"是毛晋第四子。明清藏书印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明代藏书家

---

①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八十一。

② 《全唐诗》卷六百一十五。

文彭同时又是篆刻家，其印得六朝苍劲古朴之气，虽然结构略嫌松散，而饶有金石趣味。清代藏书印同一般印章一样有浙派、徽派、齐鲁派、莆田派等不同风格，犹如百花争艳，大放异彩。藏书家丁敬是浙派的代表人物，和黄易、奚冈、蒋仁、陈豫钟、陈鸿寿、钱松、赵之琛等，被称为“西泠八家”，其印铁笔古健，韵味翻新，给人以清新明快之感。藏书家赵之谦刻的印章和邓石如、吴熙载齐名，在印林别树一帜。

为什么明清藏书印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元末画家王冕用青田花乳石自刻印章为治印开创了一条新路。王冕以前，印章的材料多是硬度极高的金属（如金、银、铜、铁等）和价格昂贵的玉石、象牙等。制作方法大多是由文人与刻工共同完成，即文人写字，专业刻工刻铸。当时社会认为治印下人一等，“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因此，文人不屑为之，这就大大影响了篆刻艺术的发展。王冕治印的成功，给人们以极大启发。花乳石易得易刻，不少文人开始自己动手刻制印章。刻印材料与制作工艺的改革，使篆刻艺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二，金石学的发展，对清代篆刻也有较大影响。清代以前，虽然已经有人研究金石，并出现一些专著，如南朝梁谢庄《碑集》、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但尚未形成金石学。清代随着碑铭、印章、瓦当、甲骨等的大量出土及其研究的不断深入，金石遂成专门之学。金石学的形成促进了清代篆刻的发展。

藏书印的种类

藏书印千奇百怪，种类繁杂。

就藏书印的形状而言，有方印、套印、亚字印、六面印、狮印、瓦印、钟印、鼻印、钱印、葫芦印、琵琶印、鼎印、瓶印等，但以方印为多（图33）。就藏书印的文字而言，有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等多种字体，但以小篆为多。还有用叠文入印的。所谓“叠文”，就是指那种把笔画折叠成像弹簧一样的字体

（图34）。叠文印既失掉了多年来传统文字之美，又破坏了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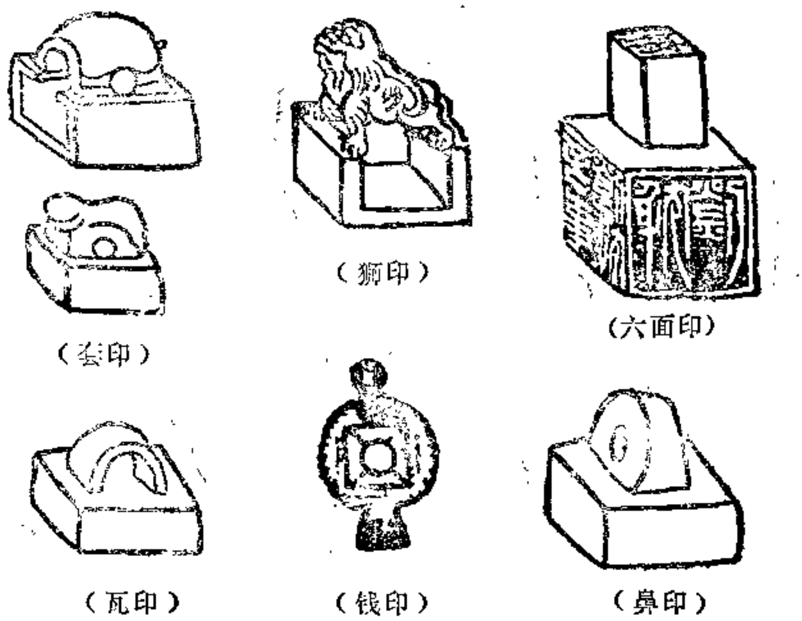


图33　藏书印形状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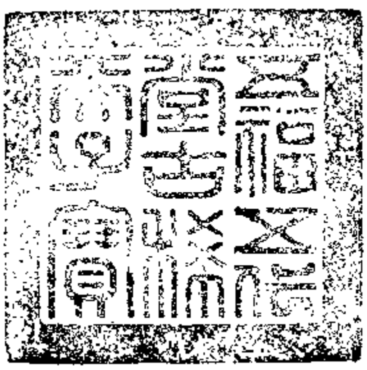


图32　清弘历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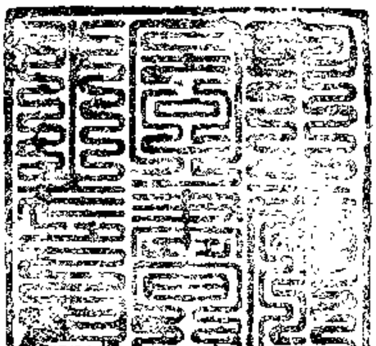


图34　叠文印

印文朴茂的雄厚气概，给后世带来了不良影响。印文字数多少不等，有一印一字者，有一印数字者，清藏书家杨继振有一方印，多至190多字。就印文的颜色而言，有朱、墨、蓝、青绿等，但以朱色为多。朱印以质料区分，又可分为水印、蜜印和油印。水印色淡，不能持久；蜜印色艳，经久不变；油印厚亮细腻，色彩鲜明。油印又有紫朱、黄朱、红朱之别。唐集贤院图书和明清居丧间所钤图书印多墨印。清代前期朱印多紫，清代晚期朱印多黄。一书印章的数量多少不等，有一书一印的，也有一书数十印的，上文提到的毛氏藏《春秋经传集解》便是一书多印之例，另如北京图书馆藏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唐女郎鱼玄机诗》钤有印章40多方。一书印章的多少与版本价值、流传时间有关。一般地说，流传时间较长的善本书，藏书印就可能多一些。

就藏书印文字的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如下类别：

第一，反映藏书家的有关情况。这类印章数量最多，内容也最复杂。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又可分为名号印、堂号印、仕履印、门第印、里居印、行第印、肖形印、纪年印等。清人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曾经谈过这类印章的演变情况：

> 古印只有姓名与字，唐宋稍著斋室名，元时尚未阑入成语，至明代则某科进士某官职、无不羼入。

名号印即以名字号入印，如明唐寅的“六如居士”印、清钱曾的“遵王”印、徐乾学的“乾学之印”等。堂号印即以斋堂室名入印，如元赵孟頫的“松雪斋”印、明文徵明的“翠竹斋”印、清杨以增的“宋存室”印、瞿镛的“铁琴铜剑楼”印等。仕履印以功名、官职名称入印，如宋江正的“越州观察使者”印、明唐寅的“南京解元”印、清翁方纲的“秘阁校理”等。门第印即以高贵的门第名称入印，如明叶国华的“文庄七世孙”印（文庄指明正统进士叶盛，任礼部左侍郎等职）、清顾千里的“陈黄门侍郎三

十五代孙”印（黄门侍郎指顾野王，初为梁宣城王宾客，梁亡入陈，任黄门侍郎，著有字书《玉篇》）。里居印即以籍贯里居名称入印，如明项笃寿的“浙西世家”印、明邵宝“锡山邵氏家藏”印。行第印即以排行顺序之数入印，如清杨绍和的“东郡杨二”印、汪洋度的“汪十”印。肖形印即以藏书家肖像入印，或附以诗文，如清陈鳣有一方印，上刻陈鳣肖像，下刻十二字：“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纪年印多以生年或年龄入印，如文徵明的“惟庚寅吾以降”印，其语出自屈原《离骚》，说明他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年），干支纪年正当庚寅。毛晋的“戊戌毛晋”印，是说顺治十五年（戊戌）刻制此印，那年他正好60岁。

第二，反映鉴赏校读情况。如明安国的“桂坡安国鉴赏”、清惠栋的“惠定宇手定本”、汪士钟的“郎园真赏”、缪荃孙的“艺风审定”、张之洞的“张之洞审定旧椠精抄书籍印”等。毛晋常在善本书上钤上“宋本”、“元本”、“甲”、“乙”等印记，则直接表明了鉴定的结果。

第三，反映藏书家的志趣。这类印文多用箴言或诗文典故。如明王鏊有一方印，引杜甫《春日赠李白》诗：

>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表示与朋友欢聚痛饮、切磋诗文之乐。清方功惠有印云：

> 十年作吏仍糊口，百金购书收散亡。
> 老矣不能穷雨简，一廛幽僻得深藏。

清萧梦松有印云：

> 名山草堂，萧然独居。门无车马，坐有图书，沈酣枕

籍，不知其余。俯仰今昔，乐且宴如。潇碧亭铭。

以上二印反映了藏书家嗜书如命、乐在其中的心情。

第四，告诫后人。古代藏书家多把图书视为私有财产，秘不示人，藏书印文字中，“子孙永宝”之类的字眼最多。明吕坤有印云：

> 吕氏典籍，传家读书，子孙共守，不许损失借卖，违者茔祠除名，万历七年坤记。

清顾锡麒有印云：

> 昔司马温公藏书甚富。所读之书终身如新。今人读书，恒随手抛置，甚非古人遗意也。夫佳者难得易失。倘一残缺，修补甚难。每见一书，或有损坏，辄愤惋浩叹不已。数年以来，搜罗略备，卷帙颇精，伏望观是书者，倍宜珍护。即后之藏是书者，亦当谅愚意之拳拳也。谀闻斋主人记。

古代也有心胸豁达的藏书家，他们认为聚久必散，不必“子孙永宝”，但不管散入谁手，均应加以爱护。明赵元方的“曾在赵元方家”印，似有意告诉后来收藏者：此书原为赵元方旧藏。清卢文弨的“精校善本，得者宝之”印，似在告诫后人：这是一种精校善本，不管谁人收藏，都要倍加爱惜。

藏书印的价值

对于今天来说，藏书印到底有什么价值？第一，藏书印同其它印章一样，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它们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篆刻水平，是研究篆刻史的重要资料。第二，藏书印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甚或可以补充史书的不足。米芾是宋代著名书画家。

由"辛卯米芾"印可知，米芾生于皇祐三年（辛卯），即公元1051年，至大观元年（1107年）卒，终年57岁。据此可知《宋史·米芾传》所谓"卒年四十九"的记载是错误的。藏书家高承埏有一方印，"醉李高承埏字八遐藏书记"，朱彝尊为高所撰《墓表》、朱辰应为高所撰《传》，并称承埏字寓公，一字泽外，不举"八遐"。此印之"八遐"可补史阙。又如清代学者朱彝尊，清史有传，生卒年不详。钱仪吉《碑传集》说他"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卒，年八十一"，生年亦不详。其实，朱彝尊有一方印已经说明其生年："我生之年岁在屠维大荒落月在桔壮十四日癸酉时"，这里用的是岁星纪年，"屠维"即"己"，"大荒落"即"巳"，"壮"即"八月"，由此可知，朱彝尊生于明崇祯二年（己巳）八月十四日，正可以弥补史书之不足。第三，藏书印是鉴定版本的依据之一。古籍版本学所谓"××藏本"大多是根据题跋和藏书印确定的。另外，由藏书印还可以推知一本书的流传源流，如清吕无党手写本《后村居士集》有"寒中"、"古盐官州马思赞之印"，"张敦仁读过"、"古盐张氏"、"黄锡蕃印"等30余方印章，由此可知，此书原藏马思赞，继归张古余、海盐张氏、黄锡蕃等，终归黄丕烈（据跋）。一本书的流传源流既定，其版本时限范围也就相对确定。这就为我们鉴定版本提供了重要线索。例如一本书确有明代藏书印，那么，此本至迟应是明本，或者是明代以前的本子。如果定为清本，时间的先后次序就矛盾了，清本怎么会有明人的印章呢？

十二、室　　名

古时候，文人墨客或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为了显示高雅，常常给自己的居室或书房取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叫室名。

室名概说

《晋书·刘毅传》记载：

> 初，桓玄于南州起斋，悉画盘龙于其上，号为盘龙斋。

这是我国古代可考的最早斋名之一。唐代室名渐多。例如李林甫"偃月堂"、杨国忠"四香阁"、颜真卿"三癸亭"、司空图"休休亭"、刘禹锡"陋室"、白居易"池北书库"，等等。宋代许多藏书家都有自己的室名，例如尤袤"遂初堂"、陈振孙"直斋"、陆游"书巢"等。室名至明清而大盛，一般粗通文墨的人都有自己的室名，甚至一些商人（包括书商）为了附庸风雅，也常常给自己的店堂取个雅号。

室名常用"室"、"庵"、"亭"、"轩"、"堂"、"馆"、"斋"、"园"、"阁"、"楼"、"庐"、"山房"、"书屋"、"草堂"、"书舍"、"精舍"、"山庄"等字眼命名。室名的数量不一，一般是一个人只有一个室名，但是一个人拥有多个室名之例也屡见不鲜。例如宋范成大有天镜阁、北山堂等；清黄丕烈有百宋一廛、士礼居、陶陶室、学耕堂、蜗庐、养恬轩、求古居、小千顷堂、石泉古舍、读未见书斋、太白楼、学山海居、红椒山馆、求古精舍等；清缪荃孙有艺风堂、对雨楼、联珠楼、云自在龛等。

按照室名的内容分类，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以所居之室命名。其中又可分为以居室、环境、形状、建筑时间、建筑地点、建筑材料等命名者。以居室环境命名者如明代安国于居室后冈植丛桂二里余，因名其室曰"桂坡馆"，明胡正言因于斋前植竹十余竿，因名其室曰"十竹斋"。它如一石庵、一草亭、一角山楼、一亩园、芥子园、九梅堂、二十七松堂等都反映了居室的环境特点。以居室形状命名者如唐李林甫有室

似偃月之形，因名其室曰“偃月堂”，据说李林甫常在这里密谋策划陷害忠良之计，后人因以比喻嫉害忠良之地。以建筑时间命名者如唐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在浙江乌程西南杼山造亭，其建筑时间是癸丑年（大历八年）癸卯月（十月）癸亥日（二十一日），因命之曰“三癸亭”。以建筑地点命名者如宋王安石旧居在金陵报宁寺，自城中上钟山，到这里正好走了一半，因命之曰“半山亭”。以建筑材料命名者如唐杨国忠穷奢极欲，以沉香造阁，以檀香造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而为泥，涂饰阁壁，因名之曰“四香阁”。

（二）以所寓之志命名。宋遗民郑思肖入元不仕，隐居平江，把“大宋”二字析为“本穴”二字（即把“宋”中之“十”置于“大”下），名其室曰“本穴世界”，寄托怀念故国之情。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人卫泾因取此句之意，名其室曰“后乐堂”，寄托忧国忧民之心。元遗民丁鹤年入明不仕，屡召不应，名其室曰“贞素斋”，寄托洁身自好之志。明人戴金以力行、责己、克终为三件难事，因名其室曰“三难轩”，寄托征服三难之心。明人吴钟峦对子孙提出十大愿望，“其一曰，吾愿子孙世为儒，不愿其登科第；其二曰，吾愿其读圣贤书，不愿其乞灵于西竺之三车；其终曰，吾愿其见危授命，不愿其偷生事仇”，因名其室曰“十愿斋”，寄托遗愿。① 明末江阴官兵抗拒清军，可歌可泣，终因寡不敌众，城陷人亡，僧人印可收拾忠烈遗骨2700余具，买地瘗之，名曰“万骨茔”，并筑庵其旁，名曰“泽枯庵”，寄托怀念壮士之思。清人张时泰尝作自传《实懒先生传》，末有诗云：

懒送穷愁懒顾身，懒趋权贵懒干人。

---

①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十愿斋全集》。

懒寻枯句每经日，懒作报书恒几旬。
幽尝懒殊寻景物，远游懒已绝风尘。
懒眠懒起情如醉，十懒先生懒是真。①

因名其斋曰“实懒斋”，寄托玩世不恭、旷达闲适之志。古代以诗词典故命名的室名大多寓志其中。

（三）以所藏之书命名。其中又可分为以藏书目的、藏书方法、藏书内容命名者。以藏书目的命名者如章钰“四当斋”表示嗜书如命，为读而藏。“四当”兼取宋尤袤和明胡应麟之语。尤袤说：

> 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②

胡应麟说：

> 所嗜独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韶濩，览之可以当夷施。③

宋司马光“读书堂”、明陈继儒“读书台”、明毛晋“目耕楼”等，均表示为读而藏。清周永年有感于释道有《藏》而儒家独无，聚书5万卷，广招来学，名其室曰“借书园”，表示为弘扬儒家著作而藏。清徐乾学筑楼藏书，一日“与其子登斯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女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唯是

① 《四库全书总目·实懒斋诗集》。
② 《藏书纪事诗》卷一。
③ 同上书卷三。

矣！'遂名其楼为'传世'。"①可见，"传是楼"之名，表示徐氏为遗传后代而藏书。以藏书方法命名者如明祁彪佳"八求楼"和清潘祖荫"八求精舍"，"八求"即宋代藏书家郑樵所总结的求书八法：

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②

以藏书内容命名者最多：金元好问多藏野史，"往来四方，采摭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纪录，至百余万言，捆束委积，塞屋数楹，名之曰'野史亭'。"③清石韫玉对于淫词小说及一切违犯儒家道德规范的著作深恶痛绝，家置一库，名曰"孽海"，聚而烧之。历代帝王为了笼络人心，多赐书臣民，臣民感恩不尽，遂以"赐书"名室。清代以"赐书堂"名室者有鲍廷博、李象元、聂镐敏、汪圣清等；以"赐书楼"名室者有李文田、蒋杲、胡亦常等。

（四）以所敬之人命名。宋代文学家虞俦钦佩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因名其室曰"尊白堂"；明代文学家袁宗道极为推崇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苏轼，因名其室曰"白苏斋"；明代诗人黄淳耀羡慕晋代陶渊明，因名其室曰"陶庵"；清代许友喜欢书画，师法宋代著名书画家米芾，因名其室曰"米友堂"；清刘体仁尊崇成连、陆贾、司马徽、桓伊、沈骥士、王绩、韦应物等七个历史人物，一一为之作"颂"，遂以"七颂堂"名室；宋代著名学者杨时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一日见（程）颐，颐偶瞑坐，（杨）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

① 《藏书纪事诗》卷四。
② 同上书卷一。
③ 同上书卷二。

一尺矣”。① “程门立雪”的故事即源于此。清人程大年一意尊师，并与程颐同姓，遂名其室曰“立雪斋”。

（五）以所宝之物命名。清潘仕成喜欢收藏金石书画等历史文物，以历史文物为宝，遂以“周敦商彝秦镜汉剑唐琴宋元明书画墨迹长物之楼”作为室名。清圣祖南巡，吴廷祯以举人的身份应召面试，深受圣祖青睐，御书《古剑篇》以赐，吴氏受宠若惊，遂以“书剑书屋”名室。清顾沅先人曾得清世宗所赐古砚一个，珍爱之至，因名其室曰“赐砚堂”。清李元鼎家有古砚一台，状如五瓣梅花，质如黄玉，相传为汉将灌婴庙瓦制成，宝藏之至，遂以“灌砚斋”名室。清人瞿镛在藏书的同时，兼藏金石器物，有古代铁琴铜剑各一，遂以“铁琴铜剑楼”名室。清金石学家吴大澂的“八虎符斋”、“十圭山房”、“十铜鼓斋”、“十二金符斋”、“十六金符斋”、“二十八将军印斋”、“五十八璧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等也是以所宝之物命名的例子。

以上是几类常见的室名。除此以外，还有以生平经历命名者，例如清代郑燮的“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之斋”、胜保的“十五入泮宫二十八词林三十为大将之斋”。还有以学习方法命名者，例如明张溥“七录斋”，“七录”就是张溥的学习方法。张溥读书有一个习惯：边读边抄，抄完一遍，读后烧掉，然后再抄再读再烧，一连七次。

室名与版本鉴定

室名对于我们今天鉴定版本很有帮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根据室名可以考证同书异名，而同书异名正是不同版本的重要标志。古籍以室名命名是造成同书异名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明余继登室名“淡然轩”，其别集因称《淡然轩集》，与《余文恪公集》是同书异名；清屈大均室名“九歌草堂”，其

① 《宋史·杨时传》。

别集因称《九歌草堂集》，与《翁山诗略》是同书异名。熟悉著者室名，为我们辨别同书异名提供了方便。第二，根据室名可以考证著者姓名。而著者姓名与考证版本作伪关系极大。封建时代轻视戏剧小说，著者不敢直书其名，往往题写别号或室名，我们可据室名查出其真实姓名。例如《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卷端题“墨憨斋新编”，经查证，“墨憨斋”是明末冯梦龙室名，著者应是冯梦龙。《九尾龟》卷端题“漱六山房著”，经查证，“漱六山房”为清张春帆室名，著者应是张春帆。《西游补》卷端题“静啸斋主人著”，经查证，“静啸斋”为明代董说室名，著者应是董说。第三，可据室名查出刻书者。不少古籍刻本的书名页、版心等处都有刻书者的室名，可据室名查出刻书者。例如《说文解字注》书名页有“经韵楼藏版”五字，经查证，“经韵楼”为清代段玉裁室名，结合其它条件，此本可定为清金坛段玉裁自刻本。又如《西昆酬唱集》版心有“玩珠堂”三字，经查证，“玩珠堂”为明代张綖室名，结合其它条件，此本可定为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高邮张綖玩珠堂刻本。室名重复的现象特别严重，例如历代用“一草亭”作为室名的至少有7人，用“一经堂”作室名的至少有8人。我们在利用室名整理古籍的时候，要结合其它条件将它们加以区别。

第三章　写本与活字本的鉴定

一、写本的鉴定

写本的时间跨度很长，从先秦到明清都有大量写本，但就传世情况而言，简策、帛书以至宋元写本已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明清写本数量较多。因此，写本的鉴定主要是指明清写本的鉴定。

那么，应当怎样鉴定写本呢？鉴定写本可分两步：

第一步，首先把写本同刻本区别开来，由于制作工艺的不同，刻本一般具有下列特征：（一）字体比较规整（匠体字尤如此）；（二）笔画的锋芒棱角比较明显，这与刀刻有关；（三）版面常有模糊残缺之处，间有断裂痕迹，这与木版多次刷印受潮腐烂有关；（四）卷末空白部分常常有大块墨迹，这是刻工为了省事，没有把空白部分剜去所造成的。写本是人工抄写的，其最大特点是字迹流利生动，不像刻本字体那样生硬板滞（写刻本例外）。根据上述特点，一册古籍在手，打开一看，是刻本还是写本，一望而知。但要注意一点：写本据刻本抄录者，往往将刻本序跋一并抄写，而刻本序跋中往往有"镌版"、"刊行"之类词语。不能一看到这些词语，就不加思索地定为刻本。

初步定为写本之后，接着就应进行第二步工作，即弄清是谁家写本。这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一）书法。一般来说，明代写本字体飘洒，书写自然，毫无约束；清初写本亦有明末遗意，落落大方，不拘一格。康雍乾写本则受馆阁体影响较

大，工整秀丽，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当然，具体到各家抄本而言，书法特点也有差别，这就要求我们多多观察比较，找出各家书体的规律。（二）纸张。就整体而言，写本用纸同刻本一样，具有时代特点（详见本编第二章第十节）。但就各家写本而言，用纸有三点区别：一是有格无格之别，即有的写本用有格纸，有的写本用无格纸；二是栏线颜色之别，或红或蓝或绿，不尽一致；三是题名不同。写本书口或栏外多题室名，室名因人而异。掌握了各家写本的用纸特点，鉴定起来就容易多了。现将明清两代各家用纸择要列表如下：

时代	姓 名	字	号	室 名	籍贯	用 纸 特 点
明	吴 宽	原博	匏庵	丛书堂	长洲	红格、版心有“丛书堂”三字。
明	叶 盛	与中	蜕庵	赐书楼、菉竹堂。	昆山	用绿墨二色格张，版心有“赐书楼”三字，卷端多钤官印。
明	文徵明	徵仲	衡山	停云馆、玉兰堂。	长洲	蓝格，栏外有“玉兰堂录”四字或“停云馆”三字。
明	沈与文	辨之		野竹斋	吴县	栏外有“吴县野竹斋沈辨之制”，或版心有“吴郡沈氏野竹斋校录”九字。
明	杨 仪	梦羽		七桧山房、万卷楼。	海虞	版心有“嘉靖乙未七桧山房”八字，或“万卷楼杂录”五字。
明	姚 咨	舜咨		茶梦斋	无锡	版心有“茶梦斋抄”四字，蓝格。
明	秦四麟	季公		致爽阁、又玄斋。	常熟	版心有“致爽阁”、“玄览中区”、“又玄斋”等。
明	祁承㸁	尔光		澹生堂	山阴	版心有“澹生堂抄本”五字，蓝格。
明	毛 晋	子晋	潜在	汲古阁、绿君亭，目耕楼等。	常熟	版心有“汲古阁”三字，栏外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八字，墨格（或不印格）。

时代	姓　名	字	号	室　　名	籍贯	用　纸　特　点
明	谢肇淛	在杭		小草斋	长乐	版心有“小草斋抄本”五字，墨格，半页10行。
明	叶树廉	石君		归来草堂、朴学斋。	吴县	栏外有“朴学斋”三字。
明	范　钦	尧卿	东明	天一阁	鄞县	多用红、蓝、墨三色格纸。
明	赵琦美	元度	清常道人	脉望馆	常熟	墨格。
明	赵宧光	凡夫		寒山堂、小宛堂。	吴县	版心刻“寒山堂篆书”五字。
明	吕　坤		北野	了醒亭	杭州	版心有“了醒亭”三字。
明	曹学佺	能始		石仓	侯官	版心有“曹氏书仓”四字、墨格。
明	唐顺之	应德		纯白斋	武进	白绵纸、蓝格、十行、行二十字。
清	钱　曾	遵王	也是翁	述古堂	常熟	栏外有“钱遵王述古堂藏书”八字，或“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十字。
清	曹　溶	洁躬	倦圃	倦　　圃	秀水	版心有“槜李曹氏倦圃藏书”八字。
清	徐乾学	原一	健庵	传是楼	昆山	版心有“传是楼”三字。
清	朱彝尊	锡鬯	竹垞	潜采堂、曝书亭。	秀水	无格毛太纸。
清	惠　栋	定宇	松崖	红豆斋	吴县	栏外有“红豆斋藏书抄本”七字。
清	赵　昱	功千	谷林	小山堂	仁和	栏外有“小山堂抄本”五字，版心有“小山堂”三字。
清	吴　骞	槎客	兔床	拜经楼	海昌	无格毛太纸。
清	吴寿旸	虞臣	苏阁	拜经楼	海宁	无格毛太纸。
清	鲍廷博	以文	渌饮	知不足斋	歙县	无格毛太纸、10行、版心有“知不足斋正本”六字。
清	汪远孙	久也	小米	振绮堂	钱塘	无格毛太纸。

时代	姓　名	字	号	室　　名	籍贯	用　纸　特　点
清	金　檀	星轺		文瑞楼	桐乡	墨格、版心有"文瑞楼"三字。
清	钱熙祚	锡之		守山阁	金山	12行绿格，栏外有"守山阁抄本"五字。
清	姚觐元	彦侍		咫进阁	归安	13行绿格，版心有"咫进阁"三字。
清	厉　鹗	太鸿	樊榭	樊榭山房	钱塘	8行、墨格。
清	钱谦益	受之		绛云楼	常熟	墨格或绿格，版心刻"绛云楼"三字。
清	钱谦贞	履之		竹深堂	常熟	版心有"竹深堂"三字。
清	冯　班	定远	钝吟	空居阁	常熟	蓝格，版心有"空居阁藏"四字。
清	冯　舒	已苍	默庵	空居阁	常熟	栏外有"冯氏家藏"四字。
清	叶奕苞	九来	二泉	小有堂	昆山	墨格，版心有"昆山叶氏小有堂抄"八字。
清	吴　城	敦复	瓯亭	瓶花斋	钱塘	墨格，版心有"瓶花斋"三字。
清	汪　宪	千陂	鱼亭	振绮堂	钱塘	版心下有"振绮堂"三字。
清	汪　森	晋贤		裘杼楼	桐乡	版心下有"裘杼楼"三字。
清	彭元瑞	掌仍	芸楣	知圣道斋	南昌	半页10行，版心下有"知圣道斋抄校书籍"八字。
清	陆芝荣	香圃		三间草堂	萧山	蓝格，半页10行，栏外下有"陆香圃三间草堂藏书"九字
清	黄丕烈	绍武	荛圃	士礼居、百宋一廛等	吴县	墨格、多题跋。
清	袁廷梼	又恺		贞节堂	吴县	绿格，版心下有"贞节堂抄本"五字。
清	倪　模	迂村	韭瓶	经锄堂	望江	绿格，左栏外有"经锄堂重录"五字。

时代	姓　名	字	号	室　　名	籍贯	用　纸　特　点
清	刘喜海	燕庭		嘉荫簃、味经书屋.	诸城	绿格，11行，版心下有"东武刘氏味经书屋"八字，左栏外或有"燕庭校书"四字，或有"嘉荫簃藏书"五字。
清	全祖望	绍衣	谢山	双韭山房	鄞县	墨格，版心右下方有"双韭山房"四字 。
清	徐时栋	定宇		城西草堂	鄞县	墨格，版心有"城西草堂"四字。
清	莫友芝	子偲	郘亭	影山草堂	独山	无格或绿格，栏外有"影山草堂"四字。
清	缪荃孙	筱珊	艺风	艺风堂等	江阴	墨格，版心有"艺风堂"三字。

（三）题跋。不少写本卷末都有跋，这些题跋或抄书人自题，或藏书家题写。内容多记抄写情况或版本源流，对于鉴定版本十分有用。例如毛氏影宋写本《石林奏议》栏外有毛晋自跋云：

> 从李中麓先生宋本、影宋本影写，希世之宝也。惜有糜烂处。

毛氏精写本《琴谱》有黄丕烈跋云：

> 此毛抄本郑世子《琴谱》，余数年前得诸书友，云是宋商邱家故物，既检《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有之，知非通行本矣。

明隆庆元年（1567年）姚咨写本《春秋五论》有姚氏自跋云：

> 旧借故编修王尧衢懋中家藏本手录，尧衢则自其内兄荆川官谏处得之者也。隆庆改元夏六月五日皇山樗老姚咨重录，时年七十有三。

明初孙道明抄书题跋必记抄写时间、抄写地点和抄写时的年龄，这是孙氏写本的一大特色，如《北梦琐言》题云：

> 武林忻悦学家藏，至正二十四年甲辰五月七日写起，至二十七日缀卷。华亭在家道人孙道明识于泗北村居，时年六十有八也。

《脚气集》题云：

> 录于城南寓舍，时吴元年，岁在丁未腊月二十八日庚午，华亭孙道明明叔父，年七十有一。

明柳佥抄书题跋中常有即兴小诗，例如柳氏抄《乐府古题要解》跋云：

> 正德乙亥七月二十二日录讫，以诗寄兴云：偶病不粒食，抄书二十番。娱生无此癖，守死亦为冤。把笔头软帽，衣绵酒罢裈。时名付流水，此外复何言。布衣柳佥。

不过，根据跋语鉴定写本要注意分析，要把题跋原作同摹仿之作加以区别。例如《汗简》后有冯舒题跋，陆心源因定为冯氏写本。其实，察其字迹，庸俗之极，决非冯氏手迹，书估作伪无疑。

除了上述各点之外，鉴定写本还要注意讳字、藏书印等。例如清吕留良后人写本，“留”字缺末笔，以避家讳。

二、活字本的鉴定

古籍版本就制版工艺而言，可以分为写本和印本两大类别。印本以活字本和刻本的数量为最多。一般地说，区别写本和印本

并不困难，详审字迹，便可知其大略。而活字本和刻本的区别倒是值得认真研究一番。就制版工艺而言，活字版和雕版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为我们鉴定版本增加了困难；不同之处为我们鉴定版本提供了方便。归纳起来，其不同之处在于：

（一）栏线连接：由于活字版的栏线是临时用木（竹或金属）条拼成的，所以活字本的栏线连接不甚严密，栏线间都有宽窄不等的空隙；而雕版的栏线是在一块整板上刻出的，其印本栏线连接十分严密，浑然一体。

（二）界行：如上所言，活字版的行线由木（竹或金属）条制成，木（竹或金属）条本身常常弯曲变形，平放到字行间则高低不平。刷印时，高处受力大，着墨多；低处受力小，着墨少。因此，活字本的界行常常着墨不匀，时有时无；而雕版界行是在版上直接刻出，其印本一般不存在上述情况。

（三）版面长短：活字版刷印完毕，即行拆掉，基本上不存在热涨冷缩的问题，因此，活字本的版面长短一致，上下栏线整齐划一；而雕版由于热涨冷缩等原因，天长日久，版面可能长短不齐，上下栏线或高或低，不尽一致。装订时一般是齐下不齐上，即不管上栏，只要下栏整齐就行了。然进呈之本要求甚严，常常采用烘煮之法使上下栏线并齐。烘煮的结果，大大缩短了版片的寿命。为此，清人方苞曾给皇帝建议说：

> 刻字之板，材有老稚，干久之后，边框长短不能划一，故自来古籍止齐下线。惟殿中进呈之书，并齐上线，临时或烘板使短，或煮板使长，终有参差，仍用描界取齐。数烘数煮，板易朽裂。凡字经刳补，木皆突出，散落再加修补，则字画大小粗细不一，而舛误弥多。经史之刊，以垂久远，若致剥落，则虚縻国帑，伏乞特降谕旨：即进呈之本，亦止齐下线，不用烘煮，庶可久而不敝。为此请旨，钦定程式，以

便遵行。①

（四）版面断裂：活字版是由单字排成，印罢即行拆去，下次再排再印再拆，循环往复，版面完整无缺，无断版、裂版现象；而雕版由于木质不坚，加上风吹日晒、寒暑干湿的影响，版面常常断裂，其印本常常留下断裂痕迹。

（五）字行：活字版是由一个个单活字汇聚而成，其印本字行常常左右弯曲，不是那么笔直，甚或有卧字、倒字的现象，例如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明福建詹佛美木活字本《招摇池馆集》卷六第10页“首”字倒置就是一证；而雕版是在一块整板上连续刻出的，其印本字行比较整齐，没有左右倾斜的现象。

（六）字的大小和笔画粗细：活字版是一字一刻、多人汇刻，字的大小和笔画粗细不免因字而异、因人而异，其印本常常字体大小不一，笔画粗细不一；而雕版的字是在一块整板上由一人一气刻成，能够前后照应，其印本字体大小、笔画粗细比较匀称。

（七）字与字的关系：活字版由多字汇聚而成，排版之前，字与字各自独立，排版之后，字与字界限分明，其印本字与字绝不交叉；而雕版因是在一整块板上雕刻而成，字与字的界限不太明显，有时为了版面的整体美，对于那些笔画悬殊太大的两个字，常常故意采用抢挡让步、互相穿插笔画的办法，使其协调一致，所以刻本的字间笔画时有交叉。

（八）墨色：活字版是由多字汇聚而成，每字高低不会绝对一致，摆在一起则高下不平，像高低不平的行线一样，刷印时，各处受力不匀，故其墨色常常浓淡不一；而雕版版面平整，刷印受力均匀，故其墨色比较一致。

以上讲的是活字本与刻本的基本区别。当然，就活字本来

---

① 《方苞集·集外文·奏重刊十三经二十一史事宜札子》。

说，木活字本和金属活字本也有区别：木活字吸墨性强，印本墨色较浓；金属活字本吸墨性较弱，印本墨色较淡。另外，木活字的硬度不如金属活字，印刷时所形成的纸痕不大明显；而金属活字质地坚硬，印刷所形成的纸痕就比较明显。还有一种影刻活字本，也需同原活字本加以区别：影刻活字本虽然依照活字本影摹，惟妙惟肖，但与活字本并不完全相同，影刻活字本四角栏线连接严密，不像活字本那样疏松；有的影刻活字本存在断版裂版现象。实际上传世影刻活字本屈指可数，仅有如下四种：（一）明徽藩崇古书院刻锡山华氏会通馆铜活字本《锦绣万花谷》；（二）明影刻锡山华氏会通馆铜活字本《文苑英华辨证》；（三）明影刻锡山华氏兰雪堂铜活字本《蔡中郎集》；（四）清广雅书局影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锦绣万花谷》原活字版书口上端的"会通馆"三字改为"徽藩崇古书院"六字；《蔡中郎集》已将原活字本书口上端的"兰雪堂"三字去掉，书内间有断版痕迹。《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原本用开化纸、太史连纸印刷，而广雅书局影刻本则用广东的山贝纸和本槽纸。

最后谈谈武英殿聚珍版的鉴定问题。武英殿聚珍版虽然也是木活字本，但其制版工艺和一般木活字略有不同：（一）刻制套格，即在整块木板上刻制栏线和界行；（二）刷印套格，即将书名、卷次、页码、校刊人姓名等文字嵌入套格版心，先行刷印；（三）套印正文，即将正文文字排在板槽内，以印好的相应套格复于板槽上刷印。① 因此，《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有相应特点：（一）栏线界行的连接没有缺口，这与刻制套格有关；（二）书内文字与栏线、界行时有重叠，这与套印不慎有关。另外，《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版式也很有特点：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白口，书口下右侧有校勘官姓名，卷首有《提要》和高宗《御题聚珍版十韵诗序》，目录前下方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

---

①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第四章　古籍版本作伪

一、古籍版本作伪举例

大千世界，熙熙攘攘，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如孪生兄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古籍版本也是真伪相杂，良莠不齐。

版本作伪同伪书有什么区别？一个是版本问题，一个是著者问题。版本作伪是版本不真实；伪书是著者不真实。版本作伪者多为书估；伪书著者多文人墨客。版本作伪多出于经济原因：或以新充旧，即以新本冒充旧本；或以俗充雅，即以俗本冒充高雅的善本；或以残充全，即以残本冒充全本；或以同充异，即以同本冒充异本。旧本、善本、全本、异本价格昂贵，可据以牟取暴利。伪书的产生也有出于经济原因的，历代开国皇帝照例都要悬赏访书，一些利欲熏心之徒往往乘机编造伪书，骗取钱财，隋代刘炫编造《连山易》等便是一例（详第二编第一章第二节）。但是，比较而言，经济原因并不是主要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才是主要的。古代社会"出书难"，一般儒生出书更难，这就迫使儒生冒名顶替，在自己的著作上面伪冠大人物的名字，借以行世。例如兵书冒充诸葛亮撰，医书冒充孙思邈撰，不一而足。有的伪书是政治斗争、学术斗争的工具。古人在派别斗争中，常常编造伪书，借名人之口，攻击对手。三国王肃借孔子之口编造《孔子家语》攻击郑玄就是一例。版本作伪手段比较复杂，有书名作伪、著者作伪、卷数作伪、序言作伪、牌记作伪、藏章作伪、题跋作伪、纸张作伪等。而伪书仅仅在著者问题上进

行欺骗，不涉及版本问题。这里还要把版本作伪中的著者作伪同伪书加以区别：伪书的虚假著者是在成书时就有的，伪书的真正著者大多是伪书的编造者。而著者作伪造成的虚假著者是图书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搞著者作伪的人，并不是全书的真正著者，他们只不过做了些挖改的手脚，通过挖改，轻而易举地“造”出一批“罕见之本”，以广招徕

下面我们举例说明版本作伪的种种手段。

书名作伪

书名作伪即用挖改书名的办法冒充新本。例如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吴鹏等刻本《杜氏通典》，书估为了冒充宋本，将书名挖改为《国史通典》，并挖去著者“杜佑”之名，加印“南宋礼部尚书锡山邵宝国贤撰”木记，挖改处钤“南宋翰林院印”和著名藏书家季振宜藏书印。然邵宝为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士，岂能在南宋任职？“南宋翰林院印”亦属子虚乌有。明崇祯刻本《历代名臣奏议》（杨士奇辑），书估为了冒充宋本，将书名挖改为《历代大儒奏议》，伪题“无锡邵宝撰”，挖改处钤“南宋翰林院印”。明天启间陈仁锡刻本《藏书》（李贽撰），书估为了冒充罕见之本，将书名挖改为《国书》，著者挖改为“梁溪李应祥徵善辑著”，挖改处钤著名藏书家吴骞藏书印。① 清刻本《东都事略》（王称撰），书估为了冒充宋本，将书名挖改为《东京实录》，著者易名“尤袤”，挖改处钤“御史之章”掩饰。

著者作伪

著者作伪即用挖改著者姓名的办法冒充新本。明刻本《词致录》，原为明李天麟撰，书估于目录卷六中挖去“欧阳修”之

① 王元才：《书估作伪例析》，载《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年2期。

名，移补目录首页标题之下，取“李天麟”而代之，以此书为欧阳修作。然书中南宋作品甚多，岂有北宋欧阳修编纂之理？明正德刻本《宋学士文集》（明宋濂撰），书估除将书名挖改为《新刊梁溪张太史文集》之外，还将著者姓名挖改为“无锡张筹”；明万历刻本《弇州史料后集》（明王世贞撰），书估除将书名挖改为《皇明琬琰文录》之外，还将著者姓名挖改为“梁溪高攀龙”。

卷数作伪

卷数作伪即以残充全欺人。例如，明景泰刻本《五伦书》残缺不全。书估移后补前，致全书次第错乱，卷七为原书卷五十三，卷八、卷九分别为原书卷五十四、五十五，卷十、卷十二分别为原书卷十三、十四。凡腐蚀书口卷数及剪贴书内子目之处，皆书估所为。宋刻本《新刊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二十二卷至四十五卷残缺，书估将卷二十二至卷四十五的目录割去，并将原在目录卷四十五之后的“目录终”三字移补于卷二十一目录之后，冒充全帙。抄本《兵录》原为十四卷，残存八卷，书估则乱其次第，改其卷数、补写目录，以充完书。如卷四之“地利”、“天时”，原在卷十四；卷五之“水攻”，原在卷十；卷六、卷七和卷八之“火攻”，原在卷十一、卷十二和卷十三。

序言作伪

序言作伪即伪撰序言欺人。例如元刻本《博古图》有郑朴序，序首云：“粤稽赵宋，时维宣和”；序末署“宣和五年十月朔”；序文多诋毁徽宗语。考《宋史·徽宗本纪》，徽宗以宣和七年（1125年）传位钦宗，岂有当时臣民敢肆然诋毁其君并付诸梨枣者？况其序若作于“宣和”，不应有“粤稽”、“时维”等追述之词。考宋元以来正史、杂史等，皆无郑朴其人，可见郑序之伪。明刻本《增广类联诗学大全》有无名氏序，称放翁先生（陆

游之号）因杨月轩先生之请，勒成此书。然"百官门"中有元代官名"总管"、"蒙古教授"等，非南宋陆游所应知。书末刻"大德丙子仲春吉旦西园堂刊"，"丙子"乃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估人挖去"正"字，补填"大"字以充元版，然元大德起"丁酉"迄"丁未"，无"丙子"年，作伪无疑。明弘治刻本《古今类雅》，有宋谢枋得序云：

> 余闲居多暇，幽愤成疾，每好集古今成论，择其言尤雅训者，辄命童子缮录，久之成帙。时一翻阅，宿疴顿捐，不禁为之掀髯满引大白也，爰命之曰《古今类雅》，庶此物此志也。

末署"淳祐乙酉"。淳祐乙酉为淳祐九年（1249年），谢枋得生于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淳祐九年（1249年）正当23岁，还是青年人，当无髯可"掀"，其伪托甚明。谢枋得有《文章轨范》盛行于明，书估托名作伪无疑。

牌记作伪

牌记作伪即伪造牌记欺人。元翠岩精舍本《苕溪渔隐丛话》接著者胡仔自序之后题"绍兴甲寅槐夏之月陈奉议刊于万卷堂"一行，伪充宋本。傅增湘考辨说：

> 宋代刻书，例加标识，谓之牌子。或在序后，或在目后，或刊首卷之尾，或附末卷之尾，虽款式有钟鼎碑幡之不一，字体有楷行篆隶之不同，然皆在版心空处，大字别占一二行，以示表异。断无直接本文，且顶格楷书，与撰序人并列，混淆耳目者，其为伪造可知。且其标题"绍兴甲寅"，尤为大谬。考胡氏两序，前集成于戊辰，为绍兴十八年，后集成于丁亥，为乾道二年。今万卷堂陈氏刊书乃题为"甲

语，以冠其首云。淳熙二年（1175年）春三月迪功郎新差鄂州司参军林秀发题。

此林秀发衔名抄自《后村居士集》，又妄加淳熙年号，以充宋本。明崇祯刻本《孔子家语》有跋云：

此本为云间夏氏允彝所注，刊于宋乾道年。而图绘精细，确是宋版之印于元时，故毛氏亦未之见。

夏允彝，字彝仲，华亭人，明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授长乐知县。后吏部举天下廉能知县七人，以夏允彝为首。南都陷，投水而死。允彝既为明人，岂有明人著作宋代刊印之理？作伪无疑。明刻清印本《金史》目录后有朱笔题识：

此《金史》为己酉冬月退值所手校者，乙卯夏五月七十岁老人记于阅微草堂。

阅微草堂为纪昀室名，纪昀生于雍正甲辰，至乾隆乙卯为七十二岁，题记与实际年龄不合，作伪无疑。明抄本《新刊监本册府元龟》卷五之后有朱笔题识：

壬午三月十日，假子晋不全宋本始校于绛云楼，东涧老人谦益。

壬午为崇祯十五年（1642年），决无不避明讳之理，明熹宗名朱由校，"校"字不作"较"，只此一字，已出破绽，作伪无疑。

纸张作伪

纸张作伪即把新纸伪作旧纸欺人。例如明嘉靖顾从德影宋刻

本《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书估挖去顾从德刻书年款，将纸熏染成陈旧颜色，并于目录、卷端等处遍钤"宋刊奇书"、"徐氏传是楼藏书"等印，扉页伪题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无锡秦蕙田跋：

> 此真宋刻佳本，人世存者少矣。吾家世有旧刻，久多散佚。此书得之玉峰徐氏吉光，为味经窝藏书珍本之一。子子孙孙其善守之。

秦蕙田，字树峰，号味经，无锡人，乾隆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书估欲以乡贤名人诱惑无锡藏书家。不过，书纸色调偏板，水渍不匀，作伪之迹，一望而知。[1]明人高濂曾经谈过纸张作伪的种种情况：

> 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棉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筒卷用槌细细敲过，名之日刮，以墨浸去嗅味印成。或将新刻板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妆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锥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物，仿佛以惑售者。[2]

以上是几种常见的作伪方法。除此之外，还有凡例作伪、书

① 王元才：《书估作伪例析》，载《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年2期。
② （明）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

表作伪、校刊衔名作伪、书口作伪等。明刻本《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有明汪克宽考异和陈济正误。书估割取它本凡例冠于卷首，凡例中有宋王柏识语，欲借柏语以充宋椠。然汪、陈既为明人，宋人王柏安能知之？这是凡例作伪之例。原麻沙本《针灸资生经》卷首冠以宋徽宗崇宁中陈承、裴宗元、陈师文等校奏医书表，其内容与序与书皆不相应。考陈、裴诸人即宋代校正《太平惠民和济局方》者，盖书估移他书进表置之卷首，欲以官书取重于时。然宋代官书，只有王惟德《铜人针灸经》，而无《针灸资生经》。这是书表作伪之例。明嘉靖刻本《定山先生全集》卷内原有题衔四行，知为应天府江浦知县刘缙等刻。然有人于四行题衔之后，又增"应天府江浦县知县庐陵萧惟馨校刊"等4行。考侯宗海《江浦埤乘》，惟馨知县事在嘉靖之末，与刘缙中隔七人，不可能与刘缙同刻此书。盖惟馨等无力刻书，而又欲附名于骥尾，遂改换每卷之一二版。原版每行18字，改版因多容行数，改为每行20字。冒称重刻，此为校刊衔名作伪之例。明刻本《春秋集传集解》书口上方刻"咸平辛丑刊"五字，以充宋本。然书口太窄，"咸"字已印出边栏之外，而"刊"字则缩其结体用墨补填于下。作伪之迹，一望而知。此为书口作伪之例。总之，版本作伪手段多样，举不胜举。狡猾书估常将几种作伪手段并用，更增加了识别的难度。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分析，总可以找出蛛丝马迹。

二、古籍版本作伪的鉴别

古籍版本作伪是一种普遍现象，稍不留心，就可能上当受骗。古代不少藏书家有过这方面的教训。那么怎样识别版本作伪呢？第一，要熟知各个时代的刻书特点，如版式、刀法、字体、纸张等。书估作伪一般是局部的，只要把握了一个时代的整体特点，不管其局部如何作伪，也是徒劳的。第二，要详审内容。书

估作伪多半在形式上搞些挖改描补的手脚，对于内容则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不管书估在形式上装扮的如何巧妙，详审内容往往能戳穿其西洋镜。当然，详审内容离不开考证，那些涉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问题，往往需要查阅有关资料，就书论书是不行的。本编第一章所论根据内容鉴定版本的种种方法，对于鉴定版本作伪都是不可缺少的。第三，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比较是识别版本作伪的重要方法，碰到那些有问题的书，把同类版本拿来一比，或可立见真伪。第四，利用工具书。工具书中最常用的是古籍书目，凡书名作伪、著者作伪、卷数作伪等，非查古籍书目不可。以上四点对于识别版本作伪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清内府藏本《古玉图谱》修书衔名均系作伪，《四库全书总目》辨之甚详，兹迻录于下：

> 案宋制，凡修书处有"提举监修"、"详定编修"诸职名，从无"总裁"、"副总裁"之称，其可疑一也。宋制翰林学士承旨以学士久次者为之。《宋史·佞倖传》载龙大渊绍兴中为建王内知客。孝宗受禅，自左武大夫除枢密副都承旨，知阁门事，出为江东总管。是大渊官本武阶，不应为是职。又"提举嵩山崇福宫"下加一"使"字，宋制亦无此名。且《传》称大渊于乾道四年死，此书作于淳熙三年，在大渊死后九年，何得尚领修纂之事，其可疑二也。又字文粹中列衔称"翰林直学士"，考《南宋馆阁录》及《翰院题名记》，自乾道至淳熙，仅有王淮、崔敦诗、胡元质、周必大、程叔达诸人，无"粹中"之名，其可疑三也。又《宋史·佞倖传》载曾觌字纯甫，汴人。绍兴中为建王内知客，孝宗以潜邸旧人，除权知阁门事。淳熙元年，除开府仪同三司。六年加少保醴泉观使。今是书既作于淳熙三年，而于觌之列衔仅称"检校工部侍郎"，转无"仪同三司"之称。且考《宋志》检校官一十九，但有"检校尚书"，从无"检校侍

郎"者，殊为不合，其可疑四也。张抡即明人所称作绍兴内府古器评者，《武林旧事》称为"知阁张抡"。盖其官为"知阁门事"，亦武臣之职，而是书乃作"提举徽猷阁"。按"徽猷阁"为哲宗御书阁。据《宋志》，只设有"学士待制直阁"，并无"提举"一官。若提举秘阁则当用"宰执"，又非抡所应为。显为不考宋制，因知阁而附会之，其可疑五也。《宋志》皇城司但有"干当官"，无"提举"之名，此作"提举皇城司事张青"，与志不合，其可疑六也。又士䜣列衔称"带御器械忠州防御使直宝文阁"，叶盛列衔称"带御器械汝州团练使直敷文阁"。案"带御器械"、"防御"、"团练"皆环卫武臣所授阶官，而"直阁"为文臣贴职，南宋一代从未有以加武职者，其可疑七也。北宋有"太常礼仪院"、元丰定官制，已归并"太常寺"，南渡无"礼仪院"之名，而此又有"太常礼仪院使钱万选"，其可疑八也。《书画谱》引陈善《杭州志》，载刘松年于宁宗朝进《耕织图》，称旨赐金带。此书作于淳熙初，距宁宗即位尚二十年，而已云"赐金带"，其可疑九也。《图绘宝鉴》称李唐官"成忠郎画院待诏"，而此乃作"儒林郎"，既不相合，且唐在徽宗朝已入画院，建炎中以邵宏渊荐，授待诏，《图绘宝鉴》称其时已年近八十。淳熙距建炎五十年，不应其人尚存，其可疑十也。《画史会要》称马远为光宁朝"待诏"，陈善《杭州志》称夏圭为宁宗朝"待诏"，今淳熙初已有其名，时代不符，其可疑十一也。《宋志》枢密院无"都事"，工部无"司务"，文思院只有"提辖"、"监官"、"监门"诸职，无"掌院"之名，种种乖错不合，其可疑十二也。此必后人假托宋时官本，又伪造衔名以证之，而不加考据，妄为据摭，遂致舛错乖互，不能自掩其迹，亦不善作伪者矣。

通过查考《宋史》、《南宋馆阁录》、《翰院题名记》、《武林

旧事》、《书画谱》、《杭州志》、《图绘宝鉴》、《画史会要》等书，《四库全书总目》列举了十二条理由，从职官制度和人物生平两个方面历数修书衔名之非，证据确凿，无可辩驳，堪称版本辨伪的一个范例。

第五章　利用有关图书鉴定版本

一、利用辞书鉴定版本

辞书是辞典和百科全书的统称。辞书种类繁多，约有如下类别：

- 辞书
  - 百科全书
    - 综合性百科全书
    - 百科辞典
  - 专科辞典
    - 学科专科辞典
    - 人名辞典
    - 地名辞典
  - 语文辞典
    - 字典
    - 详解语文辞典
    - 特种语文辞典
    - 韵书
    - 辞藻典故辞典
  - 双(多)语辞典
    - 双(多)语语文辞典
    - 双(多)语专科辞典
    - 双(多)语综合辞典
  - 综合性辞典
  - 特种辞典

以上各类辞书都是鉴定古籍版本常用的工具书，其中人名辞典、地名辞典、字典等尤其常用，我国历史悠久，行政区划屡经改易，一地往往而有数名。我们可以利用地名的时代特征鉴定版本。例如宋刻本《文选五臣注》卷三十后有“杭州猫儿桥河东岸

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数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杭州》条云：

> 隋置杭州，治余杭。寻移治钱塘，改曰余杭郡。唐复置杭州，又改余杭郡，寻复为杭州。五代时，钱镠建吴越国。宋仍曰杭州余杭郡。建炎三年升临安府。

就是说，宋代杭州地名以建炎三年（1129年）为界，建炎三年之前称“杭州余杭郡”，建炎三年之后称为“临安府”。该书既称“杭州”，必定刻于建炎三年之前。另外，古籍词语含义纷出，异体字触目皆是。为了从内容上鉴定版本，弄清某些字词的真正含义，字典也是经常使用的。

利用辞书鉴定版本要注意两点：第一，由于古籍中的人名、地名、官名等记载常有翻刻、伪造等情况，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辞书，在查找辞书的同时，还要参考其它条件综合考虑。第二，辞书内容均据它书汇聚而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最好找到原始材料加以核对。例如上引“杭州”资料，就可在《宋史·地理志》中得到证实。

二、利用古籍书目鉴定版本

各种古籍书目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揭示了整个历史长河中某个阶段或某个局部图书之存佚，书目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是我国古籍的清单，是鉴定古籍版本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具体来说，古籍书目对于版本鉴定的作用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古籍书目（主要指版本书目）是我们比较版本的工具。当我们对一本古书初步鉴定之后，必须翻阅有关古籍书目，

比较一下著录本与鉴定本的异同。这是鉴定版本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程序。如果著录本与鉴定本的特点相同，而鉴定结果不同，就要进一步找出原因，弄清孰是孰非。

第二，古籍书目是考订版本异同和图书存佚的工具，知道了图书存佚，有利于识别伪本。利用书目考订版本异同，就是通过比较的办法，找出同一种书在不同时代书目中的著录情况，从而找出早出之本和晚出之本的差别。例如司马迁《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太史公百三十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通过比较可知，《史记》在汉代尚未正式定名，《史记》之名是后来才有的。另外，汉代《史记》写本也没有目录，"目录"是后人整理之后续补的，以上两点就是汉代写本和隋代写本的区别。又如刘向父子《七略》，《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到了《宋史·艺文志》突然不见了，这说明《七略》是在唐宋间失传的。宋代以后除了辑佚本之外，其余当属伪本。又如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均无著录，可是到了明末清初，忽然有人说见到了元大德刻本，有人说见到了明永乐四十卷本。鉴于宋元诸目没有记载，不少学者莞尔一笑，认为那是无稽之谈，不足凭信。

第三，古籍书目是审定版本价值的工具。具体作法可分两步：第一步可查《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书目，了解本书的流传情况。一般认为：《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者多有传本；《四库全书总目》打入"存目"之书，传本少见；《四库全书总目》未收之书（于例不收者除外），传本罕见。如果是少见、罕见之书，再进行第二步工作，即进一步查阅各种古今书目，看看本书在其它书目中曾否著录，如果没有著录，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需要认真审定。如果其它书目已有著录，那就要反复比较该书与著录本的

异同，从而确定其价值。

由于种种条件所限制，古籍书目常常出现一些错误。例如《天禄琳琅书目》把《增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定为宋本，实则书估伪造之本。该书版心有"绍定重刊"四字，宋版无此格式，且刊刻时间只有年号而无年数，古代刻书向无此例。又如《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列举四条理由把《春秋经传集解》定为宋监本，然根据版式、行格、刻工等条件考察，当是宋抚州刻本。其它书目也有类似错误。这就要求我们利用书目鉴定版本的时候，要有分析的头脑，不可盲从。

三、利用史料鉴定版本

史料的内容广泛，其中不乏书林故事、制度沿革、人事安排等，这些资料均可作为鉴定版本的旁证。例如宋洪迈《容斋四笔》云：

> 赵德甫《金石录》，其妻李易安作后序。今龙舒郡庠刻其书，而此序不见取。

北京图书馆藏宋本《金石录》正缺李易安后序，因结合其它条件推知此书当为宋龙舒郡庠刻本。《宋史·地理志》云：

> 绍兴元年，以鄂岳潭衡永郴道州、桂阳军为东路，鄂州置安抚司；鼎澧辰沅靖邵全州、武冈军为西路，鼎州置安抚司。二年，罢东、西路，仍分南、北路安抚司，南路置潭州；北路治鄂，寻治江陵。

据此，则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荆湖北路安抚司刻本《建康实录》的刻书地当在江陵。《宋史·艺文志》载有宋魏野《钜鹿东观集》十卷，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卷数正与此同。又宋修《新定续志》载经史诗文方书80种，《钜鹿东观集》亦在其中。另据"游"

字缺笔等条件考查，可知北图藏本为陆游之子陆子遹知严州（古名新定）时所刻。《梦溪笔谈·艺文》云：

> 熙宁中，有人自虏中得之（即《龙龛手鉴》），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帅浙西，取以镂板。

蒲传正即蒲宗孟，于元丰八年（1085年）七月知杭州，元祐二年（1087年）徙知郓州，因知元丰、元祐间杭州曾有《龙龛手鉴》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本有刻工宋祥、沈绍、宋礼、胡杏等，这些刻工于南宋初又刻《乐府诗集》、《资治通鉴》等，因推知此书当是南宋初年杭州地区重刻蒲宗孟本。

史料分布极广，举凡正史、野史、方志、文集等各类图书中比比皆是。其中，正史中有不少诏令镂板之记载，可为鉴定官板之一证；野史中有不少民间刻书之记载，可为鉴定民间刻本之一证；方志的人物志、艺文志等，于乡贤事迹及其著述记载甚详，可为鉴定地方刻书之一证；文集中收有不少刻书序跋和考证版本的论文，足资参考。既然版本史料到处可见，这就要求我们广泛涉猎，处处留心。

四、利用书影鉴定版本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比较是鉴别版本的重要方法。然而，除了少数图书馆之外，一般图书馆的古籍藏本是有限的。由于空间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把本馆藏书一一搬到千里之外去“比较”。另外，由于某些藏本具有文物性、学术性和艺术性，收藏单位出于保管的需要，也不会轻易地让你“比较”，有的甚至秘不示人，这就给我们鉴定版本带来一定困难。有没有办法，既能保护古籍原本，又能便于人们进行比较研究呢？制作书影就可以满足上述需要，书影是鉴定版本常用的工具书之一。书影有广狭二

义：广义的书影，包括一切影印本，如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部丛刊》，中华书局影印的《太平御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善本丛书》等，这些书影除了便于人们进行比较研究之外，兼具可读性。有一册这样的书影在手，既可研究版本，又可研读内容，真可谓一举两得。狭义的书影是指古籍零星书页版式的汇集。下面主要谈谈这种书影。

我国出现的第一部书影是杨守敬影刻的《留真谱》。杨守敬在序中说：

> 著录家于旧刻书多标明行格以为证验，然古刻不常见，见之或未之卒考，仍不能了然不疑，余于日本医士森立之处见其所摹古书数册（或摹其序，或摹其它，皆有关考验者），使见者如遇真本面目，颜之曰《留真谱》，本《河间献王传》语也。余爱不忍释手，立之以余好之笃也，举以为赠。顾其所摹多古抄本，于宋元刻本稍略，余仿其意，以宋元本补之。又交其国文部省书记官严谷修与博物馆局长町田久成，得见其枫山官库、浅草文库之藏，又时时于其收藏家传录秘本，遂得二十余册。即于其国鸠工刻之，以费重仅成三册而止，归后以续成之，而工人不习古刻格意，久之始稍有解，乃增入百余翻，友朋见之者多欢赏，嘱竟其功。至本年春，共得八册，略为分类印行，观者不以为嫌，当并所集之二十余册，赓续刻之，光绪辛丑四月宜都杨守敬记。

由此可知，《留真谱》原为日本医生森立之摹写之本 每种书仅仅摹写序言、字体等可资考证版本的内容。“留真”二字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留真”在这里就是保留原本真面目的意思。杨守敬看到《留真谱》之后，爱不释手，森立之“举以为赠”。杨守敬仿照森立之的方法，从枫山官库、浅草文库等公私藏书家那里又摹写了不少秘本，陆续鸠工刻成，刻本仍然沿用了

《留真谱》之名。《留真谱》分为初编、二编两部分，初编刻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编刻于民国六年（1917年）。为了节省工费，《留真谱》仅仅摹刻每书单页的局部，或摹刻其版式与行格，或摹刻其卷端或卷末，或摹刻其藏章或牌记，或摹刻其目录或衔名，或摹刻其序言之数行。如何摹刻其版式行格？除了摹刻边栏、界行、书口之外，单页文字仅摹刻第一行的全部和其它各行的首末二字，中间留作空白，从而影响了它的实用价值。尽管如此，《留真谱》的开创之功，还是不可泯灭的。在《留真谱》的影响下，缪荃孙也曾据其藏书摹刻《宋元书影》，该书以原书版式大小将单页全部摹刻下来，字体、行款等与原书惟妙惟肖。后来，摄影技术流行之后，开始用照像制版影印古籍书影，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国粹学报社出版的《古学汇刊》开始印制铜版书影，后继者接连不断。这类书影主要有：

（一）《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

瞿启甲辑，民国十一年（1922年）常熟瞿氏影印本，附丁祖荫《识语》四卷，九册一函，收宋金元本270种，其中宋本160种，金本4种，元本106种。孙毓修序称该书和《留真谱》、《宋元书影》相比，"甄录益精，卷帙尤富"，可"述祖芬于既往，衍绝学于方来"。

（二）《故宫善本书影初编》

张允亭等编，民国十六年（1927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印行，一册一函，收宋元本34种。

（三）《盋山书影》

柳诒徵编，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学图书馆印行，五册一函，分为两辑：第一辑收宋本35种，第二辑收元本89种。据柳氏序，该书所收均为丁丙所藏善本。

（四）《嘉业堂善本书影》

刘承干编，民国十八年（19[illegible]8年）吴兴刘氏嘉业堂石印本，六册一函，收宋元等本163种，前有傅增湘序。

（五）《重整内阁大库残本书影》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影印，收各类刻本、写本38种。

（六）《文禄堂书影》

王文进辑，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出版，一册一函，收宋金元本50种。

（七）《涉园所见宋版书影》

陶湘辑，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出版，收录李盛铎所藏宋本20余种及傅增湘、海源阁杨氏所藏精本17种。

（八）《明代版本图录初编》

顾廷龙、潘景郑合编。民国三十年（1941年）开明书店出版，该书四册一函，收明本203种，有分代、监本、内版、藩府、书院、家刻、毛刻、书林、活字、套印、绘图、附录等12大类，每类之前有小序言其源流沿革，每书之后有按语，言其版本。

（九）《中国版刻图录》

北京图书馆编，1960年文物出版社影印本。该书八册一函，收录古籍善本550种，图版724幅。分为刻版、活字版、版画三个大类，每类所收书影以时代先后为序，卷首有序文一篇，简述我国版刻的历史。第一册为书影目录，每书有书名、著者、版本、收藏单位及版本考证。该书是诸书影中印制最精、实用价值最大的一种。

（十）《善本书影》

上海图书馆编，1978年上海古籍书店印行。该书是为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有关人员提供版本著录方面的知识而出版的，全书共1册，收录上海图书馆藏各种版本30种，书前有书影目录，每书略言版本。

除了影刻、影印之外，还有一种制作书影的方法，就是将原书散页汇集成册，如1953年江静澜《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初编》就

是采用这种方法编成的。严格地说，这种书影不能称其为“书影”，而应称其为“图谱”，因为它不是原书之“影”，而是原书之实体。以上三种方法制作的书影各有利弊：影刻、影印而成的书影，虽然对原本没有什么损害，但它不能把原书的纸张、墨色、作伪等如实反映出来；第三种方法虽然较完整地保存了原书的风貌，连原书的纸张、墨色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然而这种方法将古籍原本化整为零，好比剜肉补疮，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

以上是书影制作的大概情况，这里需要指出两点：第一，以往的书影偏重宋元旧本，降低了实用价值。因为就传世古籍而言，宋元旧本稀如凤毛麟角，明清刻本多如恒河沙数，明清版本的鉴定是图书馆面临的主要课题，今后如有条件制作新的书影，应把重点放在明清版本上。第二，书影毕竟不是实物（汇集原书散页者除外），提高鉴别能力还是应以多看实物为主，而以翻看书影作为提高鉴别能力的辅助手段。

五、利用古籍版本学专著鉴定版本

古籍版本学专著内容丰富，对于鉴定古籍版本，功非浅鲜。古籍版本学专著所讲版本源流，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历代版本的特点；古籍版本学专著所讲鉴定方法，可以作为我们鉴定版本的钥匙；古籍版本学专著列举的大量书例，可以作为我们鉴定版本的佐证；古籍版本学专著汇编的各种材料（行款、刻工姓名等），可以作为我们鉴定版本的工具。影响较大的古籍版本学专著有数十种，除了前文已经介绍过的江标《宋元本行格表》、叶德辉《书林清话》、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魏隐儒等《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之外，又如：

（一）古书版本常谈　毛春翔著　中华书局1965年版

该书是解放后最早出版的古籍版本学专著之一，是作者长期从事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的总结。全书虽然文字简略，但内

容全面，重点论述了古籍版本源流和古籍版本的鉴定问题。

（二）版本通论　吴则虞著　1978年至1979年连载于《四川图书馆学报》

该书内容全面，重点论述历代刻本源流。每代之中，首先分论官刻、家刻和坊刻，最后综论本代刻书特点。全书旁征博引，资料丰富。

（三）中国古籍印刷史　魏隐儒著　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

该书专论古籍版本制作源流，是我国最早的系统论述中国古籍印刷史的专著之一，是作者积30年之经验，在广泛涉猎大量古籍的基础上写成的，书中列举的大量书例，多为作者亲眼所见，翔实可靠，每为今人所称引。

（四）书籍装帧艺术简史　邱陵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该书专论古今图书装帧艺术，而以古籍装帧沿革为重点。全书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说明了历代古籍装帧的特点，书后附有100个版本名词解释和数十种古籍书影。

（五）版刻质疑　瞿冕良著　齐鲁书社1987年版

该书系版本考辨之作，就300余种书目、题跋、论著中的可疑之处考而辨之。全书分版本、刻工、年代、行款、歧异、刊误等类，各类之下，逐条释疑，多所发明。

（六）中国古籍版本概要　施廷镛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该书虽然篇帙无多，但是内容全面。作者提出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鉴定古籍版本，尤足称道。

（七）版本学概论　戴南海著　巴蜀书社1989年版

该书论述了古籍版本学的诸多问题，其中关于版本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古籍装订、古籍鉴定、佛道二藏之版本、版刻优劣等问题言之甚详。全书内容全面，资料丰富，体系完整，是作者长期从事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的丰硕成果。

（八）古籍版本学概论　严佐之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该书综论古籍版本源流和版本鉴定。结构新颖，自成体系；内容翔实，多有新意，重视写本在古籍版本学中的地位，尤其难得。另外，关于一书版本源流考订的论述，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九）中国印刷史　张秀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在北京图书馆供职40年，有幸博览群书，并获睹海内诸多善本，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并发表了大量印刷史方面的论文和专著，该书是作者退休后的总结性著作。全书洋洋64万言，共分雕版印刷的发明和发展、活字印刷的发明和发展、历代写工刻工印工生活及其事略、中国印刷术对亚洲各国与非洲欧洲的影响四章，每章之下又分若干小题，书后附有《中国印刷史大事年表》。该书对历代刻书地点、刻本内容、印刷物料、官私藏书等历历条陈，如数家珍；对于标点、书签等前人未尝注意的问题亦多所阐发；对于前人有争议的问题亦多所考辨。总而言之，该书资料之博、内容之详，堪称空前。

（十）图书版本鉴定研究　李清志著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该书专论版本鉴定。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综论鉴定方法；第二、三、四、五章分述字体、版式、纸墨和避讳问题；第六章论述活字本、套印本、石印本、影印本和写本的鉴定方法。

（十一）图书版本学要略　屈万里、昌彼得著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

该书综论版本源流和版本鉴定。全书共分四卷：第一卷论述历代书籍名称、形制等；第二、三卷分论版本源流和版本鉴定；第四卷略举考订善本常用的参考书、版本著录方法、版本术语等。

（十二）版本目录学论丛　昌彼得著　台湾学海出版社出版

该书包括善本书、明藩刻书、历代版刻演变、中国的版画等内容。

（十三）历代刻书考述　李致忠著　巴蜀书社1990年版

该书详论历代刻书。作者研究刻书历史有年，该书基本上是作者多年来研究成果的结集。作者注意把图书出版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该书都堪称版本源流研究方面的重要收获。

（十四）古书版本学概论　李致忠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该书论述了古书版本学的起源、发展以及鉴定古书版本的方法和基本知识。作者注意全方位地考证古书版本，较同类著作颇富新意。

限于篇幅，其它古籍版本学专著不再一一列举。

第六章　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

一、考订一书版本源流的意义

古籍版本千头万绪，一源十流。它像一个蕃衍的家族，子又有孙，孙又有子，子子孙孙，世代相传。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就像考订一个家族的宗谱，就是要清理该书版本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又像梳理蓬头散发，经过梳理，将盘根错节的各种版本理成几个系统。实际上，版本系统往往比人类的宗族关系还要复杂的多。各种版本纵横交错、左右穿插，编织成一个迷人的网络。

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对于鉴定版本的优劣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一个庞大的版本"家族"来说，"子孙"既多，"子孙"之中，既有"孝子贤孙"，也有"不肖子孙"。考订版本源流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孝子贤孙"和"不肖子孙"加以区别。例如唐贾岛《长江集》，有十卷本和七卷本两个系统，十卷本基本保持了宋本的本来面目，七卷本则是明人按照体裁重新编排的错误百出的本子。当你拿到一本《长江集》的时候，知道了它是十卷本或是七卷本，也就大体知道了他的优劣。如果不了解版本源流，不明版本优劣，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例如陈寿《三国志》的版本源流相当复杂，唐魏徵等撰《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叙》说：

> 晋时巴西陈寿删集三国之事，唯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

这说明唐人所见之本是以魏帝为“纪”、以吴蜀之主为“传”的。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说：

> （三国志）以魏为纪，而称汉吴曰传，又改汉曰蜀，世颇讥其失。

这说明北宋时该书虽然保留本来面目，然而人们已“颇讥其失”了。到了南宋，《三国志》卷端虽然保留“纪”、“传”等字样，但在“总目”上，已经删削了“纪”、“传”二字，这说明南宋已开始改窜其目录。到了明清，最终完成了窜改过程，连卷端的“纪”、“传”字样也一并挖去，使《三国志》成了一部体例殊乖的史书。这就是《三国志》的版本源流。一些研究陈寿及其《三国志》的人，不懂得这一点，随便抓来一部明清刻本作为根据，大谈陈寿所谓“帝蜀寇魏”的史学思想，岂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吗？① 又如《旧唐书》，版本源流也比较复杂，最早的北宋刻本早已失传，现存最早的本子是南宋绍兴间浙东路茶盐司刻本（残卷），后来，由于《新唐书》的出现，《旧唐书》被打入冷宫，直到明嘉靖间闻人铨在苏州做官时，才据南宋绍兴间浙东路茶盐司本重刻。清人为《旧唐书》恢复了名誉，成为殿本二十四史之一，但这本书的考证是沈德潜写的，沈德潜是诗人，有《沈归愚诗文全集》，还编过《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他于历史不大内行，因此，考证多所失误。清道光间，扬州岑建功重刻殿本，请著名学者刘文淇写了校勘记，虽对殿本错误多所补正，但仍然有不少问题。近代商务印书馆又出了百衲本《旧唐书》，这个本子是据南宋绍兴茶盐司残本补配闻人铨本影印而成。以上就是《旧唐书》版本源流的

---

① 徐孝宓：《对古籍善本一些问题的看法》，载《湖北省图书馆学会1979年年会论文集》。

大致情况。比较而言，百衲本远胜它本。可惜，现在通行的点校本，却以属于殿本系统的岑建功本为底本，在整理时，又据其它文献改动了原文。因而，不能尽如人意。这也是不明版本源流而造成的。①明察版本源流，对于古籍校勘工作极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选择底本的问题。如上所述，点校《旧唐书》以百衲本作为底本，才是正确的。

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当薄弱。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所有古籍的版本源流进行一次总的清理。

二、考订一书版本源流的方法

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与鉴定版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就目的而言，考订一书版本源流是考出同书异本的源流关系；而鉴定版本则是考出古籍的版本类别。就方法而言，鉴定版本主要以实物作为依据，辅以其它条件；而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除了利用实物之外，还要采用文献考证的方法，因为流传至今的古籍毕竟只是少数，大量同书异本早已亡佚，我们只能从古典文献中探索它们的特征。但是，二者也是有联系的：一方面，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应以鉴定版本作为基础，只有在对所有同书异本作出鉴定之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弄清其源流关系；另一方面，弄清一书的版本源流，对于从内容上鉴定版本，也不可缺少。具体地说，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通常需要经过查考结集（成书）原貌、查考同书异本和梳析源流三个步骤。

查考结集（成书）原貌

一书的结集（成书）是同书异本的源头。结集时的书名、篇

① 黄永年：《旧唐书与新唐书》，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卷、编例等反映了一书的原貌。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嗣出各本多么复杂，都是在原貌的基础上变化而成的。因此，考证一书版本源流的首要任务是查考结集时的原貌。

那么，怎样查考结集原貌呢？主要通过查考传记资料、祖本序文、跋语、书目、进书表等去了解。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一）查找传记资料。传记中一般都有生平著述的记载，这些记载是作者著书立说的原始资料，反映了结集时的本来面目。例如《旧唐书·骆宾王传》云：

> 敬业败，伏诛。文多散失，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兖州人郄云卿集成十卷，盛传于世。

这就是说，《骆宾王集》结集时是十卷。《宋史·穆修传》云：

> 庆历中，祖无择访得诗、书、序、记、志等数十首，集为三卷。

这就是说，《穆参军集》结集时是三卷。

（二）查找祖本序文。祖本是一书的最早版本，编者在序言中往往叙述结集（成书）的经过。例如唐中和四年（884年）《孙樵文集自序》云：

> 遂阅所著文及碑碣书檄传记铭志得二百余篇，藂可观者三十五篇编成十卷，藏诸箧笥，以贻子孙。

这就是说，《孙樵文集》结集时是十卷。陆希声《唐太子校书李观文集序》云：

> 自广明丧乱，天下文集略尽，予得元宾（李观之字）遗文于汉上，惜其或复磨灭，因条次为三编，论其意以冠于首。

这里，“三编”就是三卷。这就是说，《李观文集》结集时是三卷。当然，由于很多图书的祖本今已不存，在祖本中寻找原编序文实属不易。我们有时或许可从后出之本中查到原编序文，因为后出之本往往将原编序言照样刻出。另外，古书序言多请文人撰写，文人作品结集时，往往将序文搜罗无遗，因此，我们查考一下有关文人别集，也可能找到有关序文。

（三）查找有关题跋。例如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梨岳集跋》云：

> 《梨岳集》一卷，唐建州刺史李频所撰也。建州东南十五里有山如覆釜，名曰梨山。频刺州有异政，郡人建祠山中，且尊山为岳，因以梨岳名其集，诗凡百九十五篇，真德秀得遗稿于三馆，欲以私钱刻梓于庙，未果。

这就是说，《梨岳集》结集时是一卷（一百九十五篇）。《藏园群书题记·孙尚书大全集跋》云：

> 仲益（孙觌之字）为南渡初大作家，学问渊博，文章雅赡，历事徽钦高孝四朝，文人中最为老寿，其文集传世者名《鸿庆居士集》，凡四十二卷，为其子介宗所编。

这就是说，《鸿庆居士集》结集时为四十二卷。

（四）查找有关书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景迂集提要》云：

> 晁说之（字景迂）平生著述甚多，兵火散逸。其孙子健裒其遗文得十二卷，续广之为二十卷。

这就是说，宋晁说之《景迂集》结集时是十二卷，后来又增加为

二十卷，《四库全书总目·象山集提要》云：

(陆九渊)集为其子持之所编，其门人袁燮刊于江西提举仓司者，凡三十二卷。

这就是说，《象山集》结集时是三十二卷。查找有关史志目录也可知道图书结集(成书)的原貌，例如《宋史·艺文志》所载《苏颂集》七十二卷、《刘攽集》六十卷和《元丰类稿》五十卷就分别是宋代苏颂、刘攽、曾巩三别集结集时的卷数。

(五)查找进书表。古籍数量众多，然其著者不外官修、私撰两类。官修之书修成之日进呈御览，进书表可见成书原貌。例如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司马光等进《资治通鉴》表云：

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这就是《资治通鉴》成书的原貌。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云：

(刊修官、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给事中、知制诰臣欧阳修等)并膺儒学之选、悉发秘府之藏，俾之讨论，共同删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义类凡例，皆有据依。

这就是《新唐书》成书的原貌。有时候，有关传记资料、序言、题跋、书目等关于结集(成书)原貌的记载不大一致，这就要

求我们认真分析一番。例如唐《李峤集》，《旧唐书·经籍志》作“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五十卷”，《旧唐书·李峤传》和辛文房《唐才子传》均作“五十卷”。据考证，《旧唐书·经籍志》的“三十卷”当是“五十卷”之误，《李峤集》结集时的卷数当是“五十卷”。

考查同书异本

一书结集（成书）之后，各种版本就会相继出现。怎样查考所有同书异本呢？主要通过查考官私书目和有关序跋来了解。兹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一）遍查各种官私书目。公藏书目汇集一代藏书之盛，大量著录同书异本；私藏书目是私人藏书的记录，常常会意外发现许多异本。要想最大限度的网罗同书异本，翻阅的书目越多越好，多多益善。比较而言，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和邵懿辰等《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同书异本最多。查考同书异本，这两种书目非翻不可。《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丛书版本比较完备，《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单行本比较完备，但它仅限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著录的图书。例如唐李频《梨岳集》，钱曾《读书敏求记》著录有元（后）至元三年(1337年)刻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有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龚道立刻本；《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有席氏琴川书屋刻《唐诗百名家全集》等四种丛书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有明永乐中河南师祐刻本等13个版本。其它各目所载不再一一列举。

（二）查考有关序跋。古籍序跋除了叙述结集经过之外，往往也有历代版本的记载，例如明正德十年（1515年）吉藩刻本《新书》有杨节跋云：

> 太傅（即贾谊）此书始刻于宋程给事，再刻于我朝陆郡守（即陆相）。三百年来，止得此二公言……我贤王殿下于

讲读经训之余，取是书而读之，知其有益于天下国家，而虑其传布之未广，乃命工重刻，乐与四方共之。

由此可知，《新书》有宋潭氏本、明陆相本和明正德十年（1515年）吉藩刻本。当然，这几个本子并非《新书》的所有本子。又如清黄廷鉴跋《意林》云：

此本为明嘉靖丙戌黄凤仪刊本，与殿本云嘉靖己丑廖自显本自出一时，皆无原序，而脱误殊甚。去冬子荣茂才假得万历间徐元太校刻《道藏》本，畀余勘校，余复取邑中张氏新刊本汇校，盖张本即从殿本出也。三本以徐刊《道藏》本为善，而黄本最下。①

由此可知，《意林》有明嘉靖丙戌黄凤仪本、嘉靖己丑廖自显本、明万历徐元太《道藏》本、殿本和清张氏刻本，虽然并不完全，但足资参考。

除了查考书目、序跋之外，还可以翻阅野史、笔记、文集等，全方位地考查同书异本。例如明杨士奇《东里续集》中就载有明苏州刻本《战国策》、明四川刻本《忠经》、明常州刻本《四书集注》、明北监刻本《朱子语略》等。查考同书异本，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所有同书异本的成书时间不得早于结集（成书）时间。二是注意同书异本的存佚，重点查考传世同书异本，因为我们查考同书异本的最终目的在于弄清版本优劣，为校勘和学术研究提供一个精良的底本。

梳析源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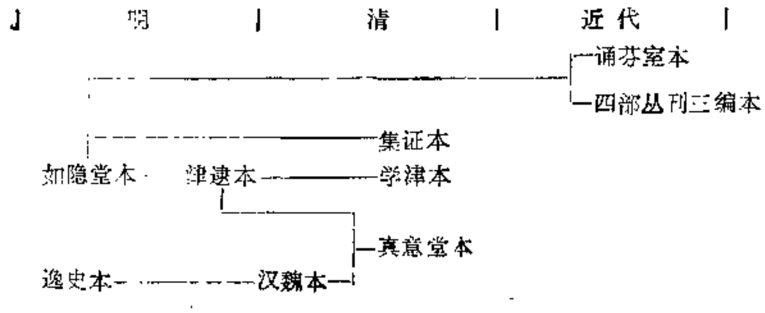
所谓“梳析源流”，就是以结集本为依据，比较各种版本，考

① 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意林跋》。

订同书异本之间的先后关系，将其排比为一个或几个系统。其具体作法可分两步：第一步是找出各种版本的底本和特征，所谓“特征”主要指篇卷、文字、附录、编例、行款等。第二步是分析归纳。

怎样找出各个版本的底本和特征呢？对于佚本来说，可以通过书目提要、序跋等间接加以考查；对于传本来说，除了间接查考外，主要通过传本本身直接考查。下面以《洛阳伽蓝记》等书为例加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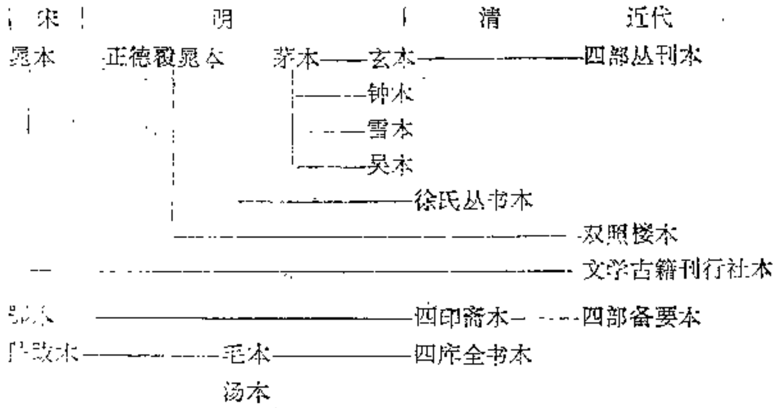
《洛阳伽蓝记》成书于南北朝时期，作者杨衒之史书无传，成书情况不详。宋元旧本，早已失传。隋唐以来，除了《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著录三卷本之外，其余书目著录者均是五卷本。《洛阳伽蓝记》传世的主要版本有明嘉靖间如隐堂刻本、明万历间吴琯《古今逸史》本、明崇祯间毛氏《津逮秘书》本、清乾隆间王谟《汉魏丛书》本、清嘉庆间张海鹏《学津讨原》本、清嘉庆间吴志忠《真意堂三种》活字本、清道光间吴若准集证本、民国董氏诵芬室本和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如隐堂本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下镌“如隐堂”三字。嘉靖间吴人陆采室名“如隐草堂”，观此书字体版式，纯系明代中叶吴中风格，因知此本当出陆采之手。该本是《洛阳伽蓝记》传世最早之本。《古今逸史》本与如隐堂本文字有异，来源不同。《津逮秘书》本刻于明崇祯间，该本以如隐堂本为底本，间有据《古今逸史》本改窜者。清吴若准集证本亦以如隐堂本为底本，网罗众本，校其异同，重为编次，然论者谓其不免混淆，未尽尘障。清《学津讨原》本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小有改易。清《汉魏丛书》本以《古今逸史》本为底本。清《真意堂三种》活字本参取《津逮秘书》本和《汉魏丛书》本两本而成。民国董氏诵芬室本和《四部丛刊三编》本均出自如隐堂本。以上就是《洛阳伽蓝记》几个主要版本的底本和特征。现将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图示如下：



关于《洛阳伽蓝记》的版本源流，周祖谟先生在《洛阳伽蓝记校释·叙例》中归纳说：

> 伽蓝记之传本虽多，惟如隐堂本及古今逸史本为古，后此传刻伽蓝记者，皆不出此两本。故二者殆为后日一切刻本之祖本也。校伽蓝记，自当以此二者为主，如振裘挈领，余皆怡然理顺。苟侈陈众本，而不得其要，则览者瞀乱，劳而少功矣。

又如《花间集》的同书异本也比较多，主要有宋绍兴十八年（1620年）晁谦之跋本、宋鄂州刻本、宋开禧元年（1205年）陆游跋本、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陆元大覆晁本、明万历八年（1580年）茅一祯刻本、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玄览刻本、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汤显祖评本、明天启四年（1624年）钟人杰刊本、明新安吴勉学校刻本、明末雪艳亭活字本、明末毛晋《词苑英华》本、清《四库全书》本、清《邵武徐氏丛书二集》本、清《四印斋所刻词》本、吴氏双照楼《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十种》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等。李一氓先生考证了各本特征及其源流关系，归纳《花间集》的版本系统如下：



其中，汤本没有归属，因为“从它的板本、卷帙、序跋、目次等来考察，都无法测定它的来历。从文字上着手，它一般的接近于鄂本；但某些鄂本误而晁本正的地方，它又多从晁本；和毛本则大有区别。它是一个接近鄂本而又比较独立的本子，现在还难于就把它肯定在这个或那个本子的系统下，所以把它单列起来。在没有其它证据以前，只好阙疑”。①由此可知，《花间集》有三个版本系统，明清以后诸本均分别由三个宋本（晁本、鄂本、陆跋本）演变而来。

三、善　　本

虽然，宋代以前已经出现“善本”的概念，但是“善本”一词正式出现还是宋代的事情。欧阳修《集古录·田弘正家庙碑跋尾》云：

> 自天圣以来，古学渐盛，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

① 图表及引文均据《--误题跋·花间集校后记》，图表中“吴本”系笔者据《补记》增入。

这是"善本"一词见诸典籍的最早记载之一。考证版本源流和鉴定版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给治学和科学研究提供善本，善本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善本因人而异

什么是善本？选择善本的标准如何？我们在第一编第三章中谈了刘德、胡应麟等人的"善本观"，可知"善本"这个概念常常因人而异。黄裳先生在《八方集·善本的标准》中举例说：

> 富翁买书，是为了保存财富，装点门面、附庸风雅，那当然以"贵"为标准。一分钱一分货，价钱大的，当然就是善本了。学者意在研究，也买不起大价的书，他们就以实用为标准。只要有识见，少错字，内容丰富完整的书就算做善本了 还有一般读书人，那标准就要更低一些，只要使他们得到满足的书，也就是他们的善本。

为什么善本因人而异？一是经济原因。善本标准随着经济条件不同而不同。有钱人往往把"价钱大的"视为善本；没钱的往往把物美价廉的书视为善本。著名历史学家谢国祯先生生前酷爱藏书，他的善本标准大抵属于后者，他在《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序》中说：

> 我家本寒素，为了奔走衣食，养老哺幼，不得不省吃俭用。偶而获得一点稿费，得以络续购到一些零星的书籍。至于善本书籍，佳椠名抄，我自然是买不起的，只能拾些人弃我取、零编断缣的东西 好比买瓜，人家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过是捡些瓜蒂而已。所以我起的书斋之名，以前由工资和稿费所入买书，叫"佣书堂"，后来干脆就叫"瓜蒂庵"，名副其实而已。

其实，谢老所藏之书并非“瓜蒂”，其中多有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已择其中尤珍者辑印为《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室名“瓜蒂”，自谦而已。二是职业原因。善本标准往往随着职业不同而不同：你是一个博物馆工作者，你就可能把时代久远的图书视为“善本”；你是一个工艺美术工作者，你就可能把制作精巧的图书视为“善本”；你是一个古籍整理工作者，你就可能把完整无误的图书视为“善本”。另外，善本标准也与年龄大小、文化层次有关。就年龄而言，少年儿童可能把插图本视为“善本”；老年读者因目力不济，可能把大字本视为“善本”，插图与否，关系不大；就文化层次而言，低层次读者可能把简本视为“善本”；高层次读者可能把繁本视为“善本”，等等。

善本因时而异

虽然“善本”因人而异，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之内，人们又有一个基本倾向，这个基本倾向又是因时而异的。下面以宋、明、清诸代为例加以说明。

宋代把内容无误的本子当做“善本”。例如前引欧阳修语中“屡更校正”之本，错误自然会少。又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和姓纂提要》云：

> （该书）绝无善本。顷在莆田，数本参校，仅得七八。后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

这里，“善本”讲的也是内容问题。校对前的《元和姓纂》错误百出，故称“绝无善本”。除了内容之外，宋代少数藏书家也把纸张、字体等作为选择善本的标准。王钦臣所谓“镇库书”就是善本书，据《藏书纪事诗》卷一说：

> （王钦臣）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校，

至无差误，乃缮写之，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页，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传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

可见他的善本除了“无差误”之外，还要书法“精好”，且“以绢素背之”。当然，宋代像王钦臣这样以形式美作为善本者还不多见。

明代选择善本有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明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云：

即有富而好书，不乐读诵，务得善本，绫绮装饰，置之华斋，以其观美，尘积盈寸，经年不识主人一面，书何逸哉……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涸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

可见高氏所谓“善本”是从宋本的纸张、刀法、字体、版式、墨色等形式方面讲的。明张应文《清秘藏》说：

藏书者贵宋刻，大都肥瘦有则，佳者绝有欧柳笔法，纸质莹洁，墨色青纯，为可爱耳。

这里所谓明代藏书家“贵宋刻”，就是以宋刻为贵，把宋刻当作“善本”，可见张氏所谓“善本”也是从刀法、字体、纸张、墨色等形式方面讲的。明代以前，虽然已经注意到版本的形式美，但象明人如此重视形式特征，全方位地考察版本形式特征，在版本学历史上尚属首次。当然，明代也有像胡应麟那样既重形式又重内容者（详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但是人数不多。

清人选择善本，内容、形式并重，已蔚然成风。除了前举《四库全书总目》（详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之外，再举数例：

（五行精记）抄写精妙，又经旧人勘对过，洵为善本无疑。

——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

（山海经）字仿欧体，用笔严整，刻手虽未能尽得其妙，而摹印清朗，在元刻中洵为善本。

——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卷五

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二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

——张之洞《輶轩语·论读书》

善本书室择可珍者约有四端：一曰旧刻，宋元遗刊，日远日鲜，幸传至今，固以球图视之。二曰精本，朱氏之朝，自万历后，剞劂固属草草，然追溯嘉靖以前，刻书多翻宋椠，正统、成化刻印尤精，足本、孤本所在皆是。今搜集自洪武迄嘉靖，萃其遗帙，择其最佳者，甄别而取之，万历以后间附数部，要皆雕刻既工，世鲜传本者始行入录。三曰旧抄，前明姑苏丛书堂吴氏、四明天一阁范氏二家之书，半系抄本，至国朝小山堂赵氏、知不足斋鲍氏、振绮堂汪氏多影抄宋元精本，笔墨精妙，远过明抄，综家储藏将及万卷，择其优异，始著于编。四曰旧校，校勘之学至乾嘉而极精，出仁和卢抱经、吴县黄荛圃、阳湖孙渊如之手者，尤雠校精审。他如冯己苍、钱保赤、段茂堂、阮文达诸家手校之书，朱墨灿然，为艺林至宝，补脱文、正误字，有功后学不浅，荟萃珍藏，如与诸君子面相质问也。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自序》

由此可知，清人所谓“善本”，是指那些内容好、形式美的本子。清人尤重宋元刻本，丁丙所谓“旧刻”，指的就是宋元刻本，他们之所以重视宋元刻本，就是因为宋元刻本内容较好。当然，清人重视宋元刻本并不等于完全排斥其它本子，非宋元刻本，只要内容好，同样可称“善本”。张之洞所列三条，并没有划定时代范围，《书目答问》中所推荐的善本书大多属于比较易得的清本。丁丙所谓“精本”、“旧抄”和“旧校”，指的也是宋元以外的其它本子。清人也把形式美作为选择善本的标准。上引《天禄琳琅书目·山海经提要》讲的就是书法美、刀法美和刷印美。孙从增《藏书纪要·鉴别》也说：

> 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色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宋刻之妙尽之矣。

这里讲的是线条美、纸色美和墨香美。

民国时期善本标准为市场风气所左右，几经变化。黄裳先生在《八方集·善本的标准》中指出：

> 即以近数十年而论，宋元版当然一直是善本，但在过去，四部里的经部，是最受重视的。科举废后，“经”就从宝座上跌落下来了。有一个时候，重视起“集”部来。到了清末民初，集书大红，这自然是受了民族革命的影响。后来，好运就轮到戏曲小说和地方志。小说的走运是因为“五四”以后重视了俗文学。至于地方志价格飞涨，那原因就更能发人深省，因为帝国主义十分“关心”地大物博的中国，想收集资料，掌握中国的风俗、地理、物产、矿藏之类的情报。

以上谈了宋、明、清等代比较流行的善本标准。可见善本的标准确实因时而异。那么，因时而异的原因何在？第一，政治原因。善本标准常被政治风云所左右，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例如民国时期，禁书、小说、地方志之走运，均属此类情况。第二，学术原因。善本标准被学术空气所左右，与学术盛衰密切相关。学术繁荣的时候，重视内容；学术不振的时候，重视形式。当然，这里所谓“学术空气”主要是指古籍整理、版本学方面的研究情况。例如宋代重视古籍整理，版本学发展较快，人们较多重视内容；明代古籍整理的成就不大，人们就较多重视形式；清代古籍整理出现总结性成就，又是版本学的兴盛时期，因此，清代内容、形式并重。

当今善本

当今选择善本的标准是什么呢？在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有关专家拟定了“三性”、“九条”。“三性”是指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九条”是：

（一）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和零页）。

（二）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零页），但版印模糊、流传尚多者不收。

（三）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四）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五）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六）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

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七）辛亥革命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八）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九）明代印谱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各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三性”是选择善本的总则，“九条”是“三性”的具体化，是“三性”的注解。“三性”、“九条”批判地继承了版本学研究领域的文化遗产，是前人经验的科学总结。前人把“旧本”、“旧刻”、“旧抄”等视为善本，“旧”字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它既没有明确的时代界限，也没有反映事物的本质。那么，“旧”的可贵之处何在？“旧”的可贵之处当在两个方面：一是流传较少，物以稀为贵，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二是时代较远，较好地保留了图书的本来面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三性”中的“历史文物性”和“学术资料性”就道出了“旧”的本质。前人所谓“足本”、“精本”，贵在何处？贵在内容较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三性”中的“学术资料性”就道出了这类图书的本质。前人所称字体、版式、刀法等，贵在何处？贵在他们是艺品珍品的重要标志，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三性”中的“艺术代表性”就道出了这类图书的本质。“三性”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例如“历史文物性”固然是指“旧本”之类，但也包括时代较晚的具有某种纪念意义的图书，一种图书可能具有“一性”、“二性”，甚至兼具“三性”，只要具有其中一“性”，就可以当作“善本”。“三性”、“九条”是我们现在选择善本的标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收录古籍的。

当然，“三性”、“九条”也不是绝对的，它仍然因人而异。所谓“因人而异”，就是说由于职业、地位的不同，人们对“三性”、“九条”都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对于学者来说，学术资料性高于一切，历史文物性和艺术代表性都无关紧要。除了因人而异之外，还有个“因馆而异”，即因图书馆的不同而不同。各个图书馆除了上报入选“善本”采用“三性”、“九条”的标准之外，也都还有本馆内部的善本标准。例如，有些地方文献，在别馆看来，可能分文不值，而在藏馆看来，可能被视为镇库之书。鉴于上述情况，似可将“善本”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善本”指那些“三性”兼具的善本，这些善本不会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因馆而异；狭义的“善本”是指某一时代、某一职业、某一图书馆认定的善本，这些“善本”的概念仅仅适用于某一特定范围之内。考订一书版本源流得出的善本均属狭义的善本。